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藝術史研究所

博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塑造群體：

清代（十七、十八世紀）王羲之蘭亭會傳統之新面貌

Shaping Collectives:

New Faces of Wang Xizhi's Lanting Gathering Tradi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盧宣妃

Hsuan-fei Lu

指導教授兼所長：黃蘭翔博士

Lan-Shiang Huang, Ph.D.

指導教授：石守謙博士

Shou-chien Shih, Ph.D.

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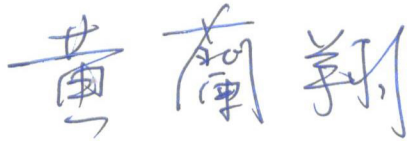
January, 2019



本論文係盧宣妃君於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班期間完成之博士論文，經論文考試委員審查及考試合格通過，特此證明。

This thesis is submitted to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Philosophy of Doctor.

口試委員：




(所長；指導教授)

黃蘭翔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專任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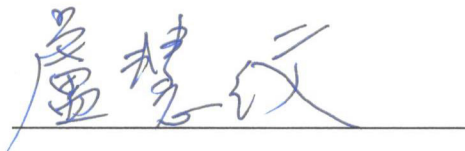


(指導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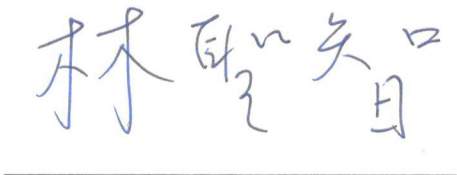
石守謙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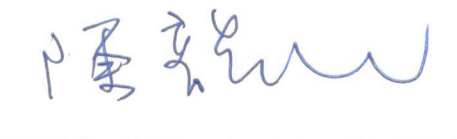
陳弱水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特聘教授



盧慧紋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專任副教授



林聖智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副研究員



陳韻如
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
研究員

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11 日

January 11, 2019



謝 辭



從我二〇〇五年進入臺大藝術史研究所就讀博士班至今，剛好是十三年半，這麼長的一段就學時間——即使之間有一半的日子我都在休學，終究是十三個年頭，一點都不短。在這麼長的時間中有好幾度，我都以為走不下去，畢不了業了，沒想到今日我還有機會打開電腦開始寫謝辭。

就讀這麼長的一段時間，要感謝的人、必須感謝的人，實在太多太多，多到我想我一定會遺漏很多很多人，並且，也只能用很簡短的話語來感謝我想感謝的人。但無論如何，我仍然想要盡力地向這些幫助過我的人表達謝意。

首先我最感謝的，莫過於我的指導教授石守謙老師及師母。我很喜歡上老師的課，老師雖然指導學生十分嚴肅，但課堂上除了專業的修養令人佩服之外，老師的妙語如珠更讓學生如沐春風。而老師與我的相處之中，除了指導我的論文之外，也經常告訴我許多人生的道理，寬慰我的心，師母也則總會偶爾稍來一兩個訊息，提醒我照顧自己與家人，溫暖著我。老師、師母為我做的，遠遠超過論文指導教授所需要做的事情，這樣的溫暖與提攜，真的令我不知該如何表達對他們的感激。

所上的老師及辦公室的成員對我的指導與照顧，也是支持著我完成學業的重要助力。已經退休了的傅申老師、陳葆真老師，從我在師大就讀碩士班開始，就關懷我許多。碩士班休學當時，傅老師一通鼓勵的電話帶給我許多溫暖；陳老師也總是在見到我時，問著我最近如何。此外，也已退休的李玉珉老師則總是在偶爾見面時親切地問著我的近況，有時也給我一個大大的擁抱；陳芳妹老師在退休之後，長年於傅斯年圖書館繼續著他的研究，每每遇到他，也總是與我話著家常。所上的謝明良老師雖然對學生十分嚴格，但總是帶給我很大的溫暖與鼓勵，我經常在老師的鼓勵下獲得支持的力量。我的次修指導教授黃蘭翔老師，對待學生如朋友一般，總會與學生討論很多他所關懷的事，同時也尊重我們的建議，而無論我遇到甚麼困難想請老師協助，他也總是飛快回信指導。而除了上面提到的老師，我也曾修習過顏娟英、邢義田與劉巧楣老師的課，感謝老師們的指導與啟發。另外，盧慧紋、施靜菲、邱函妮以及陳韻如等諸位老師，因為年紀與我相當，他們總對待我如友輩，既指導我也關心著我。

至於辦公室的玉華助教、卉秀、張小姐與羅小姐，在我出入所上的這十幾年間，也為我提供了全面的幫助。他們除了在我辦理休學、復學、考試申請等公事上給予全然的協助之外，也關懷著我的家人與我，因此總帶給我只要遇到問題，隨時都有辦公室可以支援的感覺。臺大藝術史研究所的老師們與辦公室成員，在這十幾年間對我的指導與關懷，我都一一記在心裡，真的很感謝老師與大家對我的關照。

除了本所之外，我的論文副修指導教授歷史系的陳弱水老師，我很感謝他在我還沒決定論文題目時，就願意接受我作為他的指導學生，並在這些年裡，不論課堂上或偶爾與老師見面時，他總不吝給我許多研究上的建議，這些都令我收穫良多。而我對老師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宛若與古人為友，每次聽老師討論古代歷史中的大小事，總讓我大開眼界。老師的知識淵博以及對歷史的態度，讓我深切感受到他對歷史研究的濃厚興趣，這種感染，十分深刻。

除了學校的師長之外，也要感謝中央研究院最初由石守謙教授擔任計畫總主持人的「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研究計畫。我有幸自這個計畫最初成立之時即開始參與，除了感謝計畫提供給我的獎助學金之外，透過讀書會與研討會的參與，我在此間學習很多。尤其感謝計畫中的朱秋而、衣若芬、巫佩蓉、黃立芸、廖肇亨與劉序楓等諸位教授，老師們除了給予很多的關懷之外，總會隨時回應我的提問，並提供許多資料。參與這個計畫，讓我除了所上的學習之外，也打開了一個通往東亞藝術史研究的門窗。

此外，我也要特別感謝我的六位論文口試委員，包含指導教授石守謙老師、副修指導教授陳弱水老師、次修指導教授黃蘭翔老師，以及林聖智、盧慧紋、陳韻如三位教授。感謝諸位老師撥冗閱讀我的論文，指導我的研究，由於我的論文涉及的面相較多，各個領域的老師們所給予我的意見與指正，令我獲益良多。

除了師長之外，這本論文完成也受到許多學友的幫忙。我要特別感謝何炎泉、楊肅毓、裴英姬、游逸飛、余玉琦、王鈴雅、張筠、簡欣晨、柯輝煌、孫璐、吳岱芸、李宜蓁、李定恩、楊雅琲、王怡婕、葉雅婷、梁哲璋、李欣葦、黃文玲、劉宜璇等人在問題討論、資料蒐集、打字編排等諸多方面的協助，沒有他們的幫忙，我的論文難以順利完成。此外，余佩瑾、黃琪惠、王淑津、高明一、邱士華、方令光等博士班同儕，以及林亭宇、林宛儒、王廷君等碩士班學妹們，在我的博士班學習過程中，總是與我互相打氣，相互激勵。因為有他們的陪伴，博士班的歲

月才更為豐富、有活力。此外，任教於外校的王正華、林麗江、賴毓芝、蕭振邦等諸位教授，及陳永模、江文進、王靜靈、彭盈真、曾瑞珠、蘇雷文郁、劉曉梅等多位師長、好友，他們在我漫長的博士班生涯中，對我的關懷與提攜甚多，我也要在這向他們一併致謝。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母親游素梅女士，以及我的先生邱欣、女兒奕懷、大姑邱琪，若沒有他們無私的愛與支援，這個論文是絕對不可能完成的。至於論文撰寫後期，我經常無法陪伴他的五歲奕懷，我也要特別感謝他對媽媽的體諒。當我論文口試結束之後聽到她說：「你要陪我玩，因為我知道你已經畢業了。」的話，讓我感覺接下來我真的要好好陪伴她，開始我的另一段人生旅程。

臺大藝術史研究所的十三年時光倏忽一瞬，就這樣結束了。我在臺大的學習過程雖然不算平順，很多時候也感覺十分辛苦，但同時，我也接受到來自各方師長、同學們的照顧和鼓勵，這些體驗與心意對我來說都萬分珍貴。博士論文研究過程，也要特別感謝科技部提供的「博士論文獎(獎勵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獎助、陳啟德先生建輝社會文教基金會提供「本所研究生出國調查」補助及「研究生發表一級期刊論文獎勵」，與張小鶯女士所提供之「書畫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學位論文獎學金」，因為有這些獎助，我才能順利完成我的論文寫作。最後，我要向所有曾經幫助過我、關懷過我——不管以上我是否已經特別列名致謝——的長輩與朋友們，獻上我最深的謝忱，因為有您們的存在，才讓我了解到人生原來是如此的溫厚豐富。

感謝上天！感謝生命！

2019.2.8 於大璞



中文摘要



本論文以十七世紀後半至十八世紀之宮廷內、外續蘭亭會為研究對象，主要想了解清代「續蘭亭會」在王羲之集會的參考模式下，如何透過「物」的製作，完成「塑造群體」的目標，進而了解這些調整與改變，在蘭亭傳統的延續上發揮了甚麼樣的重要性。王羲之蘭亭會因產出《蘭亭序》名蹟而為後代一再追仿，這個可供後代續蘭亭會進行「調整」之「紀念物」製作，可用以展現不同的文化趣味與社群品味。這個調整的過程與趣味的創造，同時可藉以展現該群體之文化資本（如收藏、畫家資源等）、學術興趣，突顯該群體的特殊性格，因此也利於作用在「塑造群體」上。要之，本文將續蘭亭會之空間設計、活動安排及紀念物的創造等，視為一個有機的結構性組合，在此結構性組合上，討論其每個環節所具有的意義。

本文以第二章為始，梳理「曲水流觴」及修禊活動之早期現象，並討論王羲之蘭亭會如何在唐代成為歷史典範。第三章是以清宮內部之流杯建構與「紀念物」的製作為中心，探討康熙、乾隆兩位皇帝如何透過流杯亭的建造及使用，來塑造帝王與臣子、外藩間之群體感。本文第四、五章，將焦點轉往宮廷外部，檢視同時期地方所發生之續蘭亭會的發展。第四章回顧紹興蘭亭在清初康熙、乾隆兩位帝王時期的整修狀況，以及地方官員與地區菁英如何透過續蘭亭會的舉辦以「塑造群體」，聯手恢復地方榮耀的過程。第五章，筆者挑選了兩個成功透過續蘭亭會之「紀念物」的製作，以達「塑造群體」期待的地方社群。分別為紹興知府李亨特及畢沅幕僚劉錫嘏所主持的續蘭亭會。這兩個集會都是由幕僚團體所組織。此二集會對蘭亭傳統的調整，主要呈現在「紀念物」的製作上，這樣的「紀念」方式有別於過去的蘭亭傳統，甚有新意。第六章，則討論了十九、二十世紀中、日、韓、臺灣等地之續蘭亭會個案，以及為本論文研究作一總結。

總之，本文從「集會」的角度，透過對「紀念物」與「塑造群體」之運作觀察出發，試圖說明以往不受重視之清代續蘭亭會，在蘭亭傳統發展上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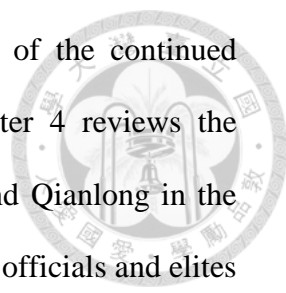
關鍵詞：王羲之、蘭亭會（蘭亭雅集）、蘭亭序、蘭亭、清代宮廷、李亨特、畢沅、流杯亭、曲水流觴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centers on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Lanting Gathering (Orchid Pavilion Gathering) in and out of the Qing court during the lat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eighteenth century. By examining how the model of the Wang Xizhi-led gathering was referred to and continued in the Qing dynasty, this dissertation explores how the making of objects came to shape a collective and what crucial roles the adjustments and changes made to the gatherings have played in continuing the Lanting tradition.

The Lanting Gathering led by Wang Xizhi has been followed and imitated in later generations for its production of *Lanting Xu* (Preface to the Poems Collected from the Orchid Pavilion). The making of such a poetic work—a memorial open to changes by later generations—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demonstrate different cultural interests and community tastes. Both the process of making changes and the creation of tastes showcased a collective’s cultural capital (i.e., collections and painters’ resources) and scholarly interests, highlighting the unique character and thus conducing to the shaping of the collective. Importantly, this dissertation deems the spatial design, activity arrangement, and memorial creation of the continued Lanting Gatherings an organic and structural constitution, and prob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constituents.

In Chapter 2, this dissertation details the early implementation of *qushui liushang* (Floating Wine Cups on a Winding Stream) and *xiuxi* (purification ceremony) while discussing how Wang’s Lanting Gathering became a historical paradigm in the Tang dynasty. Chapter 3 focuse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liubei* (floating cup) and the making of memorials in the Qing court to explore how Kangxi and Qianlong built and adopted Liubei Pavilion (Floating Cup Pavilion) to create a sense of collectivity among the emperor, subjects, and vassal states.



Chapters 4 and 5 shift the focus to the local development of the continued Lanting Gatherings outside the court in the same period. Chapter 4 reviews the renovations of Lanting in Shaoxing during the reign of Kangxi and Qianlong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Moreover, it examines the process of how local officials and elites continued the Lanting Gathering to build a collective and thus collaboratively restore local glories. In Chapter 5, the author provides two examples of successful loc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namely the continued Lanting Gatherings directed by Shaoxing prefect Li Hengte and Bi Yuan's staff member Liu Xigu. Organized by staff members, both gatherings aptly exemplify how the making of memorials for the events fulfilled the expectation of shaping collectives. The changes made by the two gatherings to the Lanting tradition are mainly reflected on the making of memorials. Their modes of commemoration were distinct from the tradition in an innovative way. Chapter 6 discusses the cases of the continued Lanting Gathering in places such as China, Japan, Korea, and Taiwan during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and provides a conclusion to the dissertation.

In summary, the dissertation observes the practice of memorial making and collective shaping through the lens of gatherings to elaborate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ntinued Lanting Gatherings in the Qing dynasty, a previously neglected field of stud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nting tradition.

Keywords: Wang Xizhi, Lanting Gathering (Orchid Pavilion Gathering), *Lanting Xu* (Preface to the Poems Collected from the Orchid Pavilion), Lanting (Orchid Pavilion), Qing court, Li Hengte, Bi Yuan, Liubei Pavilion (Floating Cup Pavilion), qushui liushang (Floating Wine Cups on a Winding Stream)



目 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謝辭.....	III
中文摘要.....	VII
英文摘要.....	VIII
目錄.....	i
圖版目錄.....	V
表目錄.....	X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問題提出.....	1
第二節 研究回顧.....	8
第三節 研究方法.....	18
第二章 王羲之蘭亭會作為「雅集」典範的確立.....	23
第一節 溯源：王羲之「蘭亭會」前之修禊活動與修禊場所.....	24
第二節 入唐，王羲之「蘭亭會」作為雅集典範的確立.....	32
第三節 小結.....	53
第三章 對群體感的營造：清初宮廷之蘭亭文化新象與追憶.....	55
第一節 蘭亭傳統的新創造：康熙、雍正朝之「天趣蘭亭」.....	55
第二節 對蘭亭傳統的全面掌握：乾隆皇帝對蘭亭傳統的回歸與追憶.....	84
第三節 小結.....	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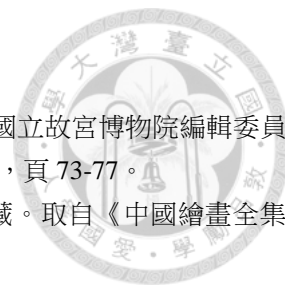
第四章 清初地方之續蘭亭會與紹興蘭亭的狀況.....	109
第一節 紹興蘭亭的重建.....	109
第二節 紹興蘭亭的狀況.....	128
第三節 小結.....	136
第五章 塑造群體之實踐：宮廷外部續蘭亭會之傳統重塑與意義.....	139
第一節 乾隆五十七年（1792）紹興知府李亨特於紹興蘭亭 舉辦的續蘭亭會.....	139
第二節 乾隆五十八年（1793）畢沅幕賓劉錫嘏之武昌借園修禊會.....	164
第三節 小結.....	179
第六章 結論.....	181
第一節 中國十九世紀之續蘭亭會的發展列舉.....	181
第二節 東亞「塑造群體」之傳統延續： 十九、二十世紀韓國與日本之續蘭亭會.....	185
第三節 結論整合.....	197
參考文獻.....	205
附表.....	233
III-表一 《紫檀雕山水八屨蘭亭八柱插屏》 與「蘭亭八柱」內容、順序對照.....	233
V-表一 李亨特續蘭亭會參與者名單.....	235
V-表二 《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前後序、記之釋文.....	239
V-表三 《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題跋釋文.....	241

V-表四	《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題字者整理.....	251
V-表五	《借園修禊圖》之題跋者.....	261
V-表六	《借園修禊圖》題跋釋文.....	267
圖版	277





圖版目錄



- 圖 I-1 明，趙原初，《蘭亭圖卷》，部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故宮書畫圖錄（十八）》（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9），頁 73-77。
- 圖 I-2 明，張宏，《蘭亭圖卷》，部分，1616 年，北京，中國首都博物館藏。取自《中國繪畫全集（十七）》（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圖 37-40。
- 圖 I-3 明，吳彬，《勺園袂褻圖》，部分，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取自北京大學出版社編，《勺園修褻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 圖 II-1 明，1603 年安徽滁州知府盧洪夏建「意在亭」，已經多次整修。取自醉翁故居和諧滁州，網址：<http://big5.huaxia.com/hxcz/czmj/2342158.html>，檢索日期：2017 年 11 月 12 日。
- 圖 II-2 宋，崇福宮之「泛觴亭」遺跡。取自常盤大定、關野貞，《支那文化史蹟》，第 5 輯（京都：法藏館，1941），圖 17。
- 圖 II-3 宋，《營造法式》之「國字流杯渠」（左）與「風字流杯渠」（右）。取自李誠，《營造法式》，卷二十九，收入紀昀等總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據國立故宮博物院 1986 出版本影印，2007），頁 14 上-15 下。
- 圖 II-4 明，《明拓明益王重刻大蘭亭圖卷》拓本，「王羲之」部分，1592 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取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網頁，網址：<http://en.dpm.org.cn/dyx.html?path=/tilegenerator/dest/files/image/8831/2011/0158/img0003.xml>，檢索日期：2018 年 8 月 1 日。
- 圖 II-5 宋，游似本《五言蘭亭詩》，部分。取自王連起，〈陸柬之和他的蘭亭詩〉，《文物》，第 2 期（2010），頁 77-86。
- 圖 II-6 明，《明拓明益王重刻大蘭亭圖卷》拓本，「庾蘊」部分。
- 圖 II-7 明，《明拓明益王重刻大蘭亭圖卷》拓本，「亭」部分。
- 圖 III-1 清，《（乾隆）直隸遵化州志》中之「湯泉浴日圖」，1794 年刊本。取自劉清原纂，傅修續纂修，《直隸遵化州志》，卷三（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乾隆 59 年〔1794〕刊本），頁 6 下-7 上。
- 圖 III-2 遵化湯泉，流杯亭。取自個人網頁，網址：http://www.sohu.com/a/140427744_269545，檢索日期：2018-06-01。
- 圖 III-3 清，麟慶，《鴻雪因緣圖記》，第一集，〈二插修褻〉。取自麟慶，《鴻雪因緣圖記》（北京：線裝書局據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影印，2003），頁 67。
- 圖 III-4 清，西苑，「曲澗浮花」流杯亭（上圖額：「流水音」）。取自 Osvald Sirén, *Gardens of China* (New York: Ronald Press Company, 1949), Pl. 22.
- 圖 III-5 清聖祖撰，沈喻繪圖，馬國賢製圖，《御製避暑山莊詩（並圖）》第十五景「曲水荷香」，1713 年。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康熙年間武英殿刊朱墨套印本，銅版畫。
- 圖 III-6 清聖祖撰，沈喻繪圖，馬國賢製圖，《御製避暑山莊詩（並圖）》第二十三景「香遠益清」，1713 年。
- 圖 III-7 「乾隆時期避暑山莊與外八廟平面圖」局部。取自天津大學建築系、承德市文物局編著，《承德古建築：避暑山莊和外八廟》（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2），頁 16-17。
- 圖 III-8 清，冷枚，《熱河行宮圖》（又名《避暑山莊圖》），約 1708-1711 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取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網站，網址：<http://en.dpm.org.cn/dyx.html?path=/tilegeneraor/dest/files/itmage/8831/2007/1390/img0011.xml>，檢索日期：2018-7-21。



- 圖Ⅲ-9 清，冷枚，《熱河行宮圖》，局部，「香遠益清」。
- 圖Ⅲ-10 清，冷枚，《熱河行宮圖》，局部，「澄觀齋」與「暖溜暄波」。
- 圖Ⅲ-11 清，和珅等纂，《欽定熱河志》之〈避暑山莊總圖〉，乾隆四十六年（1781）武英殿刊本。取自和珅等纂，《欽定熱河志》，卷二十八，收入曲延鈞主編，《中國清代宮廷版畫》，第 7 冊，頁 346-347。
- 圖Ⅲ-12 「曲水荷香」景區建築群示意。「曲水荷香亭」，約 1005×1005 公分。2017 年 7 月 14 日筆者約略測繪。
- 圖Ⅲ-13 「曲水荷香」景區建築群示意及今日景觀。2017 年 7 月 14 日筆者拍攝。
- 圖Ⅲ-14 清，和珅等纂，《欽定熱河志》之「曲水荷香」，乾隆四十六年（1781）武英殿刊本。取自和珅等纂，《欽定熱河志》，卷二十八，收入曲延鈞主編，《中國清代宮廷版畫》，第 7 冊，頁 566-567。
- 圖Ⅲ-15 清，和珅等纂，《欽定熱河志》之「曲水荷香」、「玉琴軒」、「寧靜齋」、「千尺雪」四頁，乾隆四十九年（1784）《欽定四庫全書》版。取自和珅等纂，《欽定熱河志》，卷二十七（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 33 上-下；卷 33，頁 10 上-下、頁 26 上-下、頁 31 上-下。
- 圖Ⅲ-16 清，錢維城，《熱河千尺雪圖卷》，1753 年，承德，避暑山莊博物館藏。取自「展覽博見」網站，網址：<http://wap.g.com.cn/culture/46371257/>，檢索日期：2018-7-21。
- 圖Ⅲ-17 「香遠益清」景區建築群示意。「香遠益清亭」，約 470×470 公分。2017 年 7 月 14 日筆者約略測繪。
- 圖Ⅲ-18 「香遠益清」景區建築群示意及今日景觀。2017 年 7 月 14 日筆者拍攝。1) 入口右側望向「含澄景」流杯亭。2) 虎皮石城牆外，通往水車之水道。3) 水車望向「依綠齋」，中景為不知名五楹基址。4) 「蘋香汨」望向水車方向。5) 「依綠齋」前入口望向不知名五楹基址，右側為「紫浮」基址。6) 「依綠齋」望向「含澄景」流杯亭。7) 「依綠齋」北面入口全景。8) 「依綠齋」南面。9) 「依綠齋」南面望向「含澄景」流杯亭。10) 「含澄景」中之水道，由西面望向東面。
- 圖Ⅲ-19 清，冷枚，《熱河行宮圖》，局部，「香遠益清」景區標示。
- 圖Ⅲ-20 清，和珅等纂，《欽定熱河志》之「香遠益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武英殿刊本。取自和珅等纂，《欽定熱河志》，卷 28，收入曲延鈞主編，《中國清代宮廷版畫》，第 7 冊，頁 652-653。
- 圖Ⅲ-21 「含澄景」亭之水臺盤，由西面望向東面。2017 年 7 月 14 日筆者拍攝。
- 圖Ⅲ-22 清，高晉等編撰，《欽定南巡盛典》，卷 102，「曲院風荷」，局部，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刊本。取自高晉等繪，張維明選，《南巡盛典名勝圖錄》（蘇州：古吳軒出版社，1999），頁 112。
- 圖Ⅲ-23 清，姚文瀚，《紫光閣賜宴圖卷》，部分，1761 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取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網站，網址：<http://www.dpm.org.cn/collection/paint/228968.html>，檢索日期：2018-7-21。
- 圖Ⅲ-24A 清，王致誠、郎世寧等，《萬樹園賜宴圖》，1755 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取自聶崇正主編，《清代宮廷繪畫》（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頁 172-173。
- 圖Ⅲ-24B 清，王致誠、郎世寧等，《萬樹園賜宴圖》，「三車凌」同列十五人局部。取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網站，網址：<http://en.dpm.org.cn/dyx.html?path=/tilegenerator/dest/files/image/8831/2011/0174/img0002.xml>，檢索日期：2018-9-10。
- 圖Ⅲ-24C 清，王致誠、郎世寧等，《萬樹園賜宴圖》，「三車凌」局部（右：車凌親王；中：車凌烏巴什郡王；左：車凌孟克貝勒）局部。檢索日期：2018-9-10。
- 圖Ⅲ-25 清，沈源、唐岱，《圓明園四十景圖詠》之「坐石臨流」，1744 年，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 圖Ⅲ-26 A) 綺春園清夏齋之「寄情咸暢亭」水臺盤，366×320 公分，高 32 公分。2011 年 10 月 27 日筆者拍攝。B) 「寄情咸暢亭」平面圖，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樣式雷排架 101-009 圖。灰色框起處

(有黑線繪製的痕跡)，應為舊有面積。取自郭黛姮、賀艷，《圓明園的“記憶遺產”——樣式房圖檔》(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頁 601。

- 圖 III-27 寧壽宮，「禊賞亭」及石渠水道。東面入口約 541 公分。取自 Nancy Berliner et al., *The emperor's private paradise: treasures from the Forbidden City* (Salem, Mass.: Peabody Essex Museum, 2010), p. 97; 北京，故宮博物院網站，網址：<http://en.dpm.org.cn/dyx.html?path=/tilegenerator/dest/files/image/8831/2007/0358/img0007.xml>，檢索日期：2018-9-27。
- 圖 III-28 「禊賞亭」東立面、平面圖。東立面取自天津大學建築工程系編，《清代內廷宮苑》(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1986)，頁 111。
- 圖 III-29 「禊賞亭」東立面入口踏石、屏欄。2017 年 7 月 12 日筆者拍攝。
- 圖 III-30 李乾朗繪，「禊賞亭」水臺盤及左側假山中之水缸。取自李乾朗部落格，網址：<https://reurl.cc/068nK>，檢索日期：2018-9-27。
- 圖 III-31 「禊賞亭」明間中之黑漆雲龍屏門。取自 ger0830 部落格，網址：<http://blog.udn.com/ger0830/108419783>，檢索日期：2018-9-27。
- 圖 III-32 「禊賞亭」根雕家具三件，單人座椅 105×74×60 公分，臥床 115×237×152 公分。取自 Nancy Berliner et al., *The emperor's private paradise: treasures from the Forbidden City*, pp. 98-99.
- 圖 III-33 清，郎世寧等，《乾隆帝歲朝圖》，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取自 Nancy Berliner et al., *The emperor's private paradise: treasures from the Forbidden City*, p. 104.
- 圖 III-34 寧壽宮「頤和軒」東牆上方，木刻乾隆御書《開惑論》，部分。2017 年 7 月 12 日筆者拍攝。
- 圖 III-35 清，《鴻雪因緣圖記》第三集之〈猗玗流觴〉，由北往南望。取自麟慶，〈猗玗流觴〉，《鴻雪因緣圖記》(北京：線裝書局，2003)，第 3 集，頁 311-312。
- 圖 III-36 潭柘寺「猗玗亭」，由南往北望。約 340×300 公分。A)圖階梯上方香爐後之屋舍內，有一「乾隆寶座」，但此應為後人所設。2017 年 7 月 10 日筆者拍攝。
- 圖 III-37 靜宜園中宮圖樣，局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輿 343-0646，「靜宜園內中宮各殿座遊廊圖樣」。取自殷亮，〈宜靜原同明靜理，此山近接彼山青——清代皇家園林靜宜園、靜明園研究〉(天津：天津大學建築學院碩士論文，2006)，頁 60。
- 圖 III-38 A)寧壽宮「禊賞亭」。2017 年 7 月 12 日筆者拍攝。B)綺春園清夏齋之「寄情咸暢亭」。
- 圖 III-39 A)目前位於北京中山公園中的「蘭亭八柱亭」(現為「景自天成亭」)。B)亭中的八柱。C)亭中王羲之蘭亭會石屏。D)石屏正面蘭亭會圖象。E)石屏背面乾隆御製詩文。F)筆者所繪中山公園「八柱」與石屏排列方式。G)第一柱正面刻帖排列方式示意圖。A~C，2017 年 7 月 12 日筆者拍攝。D~E 取自「壹讀」部落格〈圓明園裡的曲水流觴〉文，網址：<https://read01.com/6zNmza.html>，W9 gRdXsza02，檢索日期：2018-10-28。
- 圖 III-40 清，《清院畫十二月令圖》，局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III-41 清，乾隆朝，《清紫檀木雕蘭亭修禊圖八柱帖插屏》，A)正面，B)背面(為《紫禁城》廣告所刊之紅木仿製品)，C)正面蘭亭圖上方乾隆四十四年(1779)所題〈蘭亭八柱冊(并序)〉詩。約 1779 年，高 83 公分×寬 62.5 公分×厚 40.5 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A、C 取自故宮博物院編，《蘭亭圖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頁 383-385。B 取自〈蘭亭八柱詩插屏〉廣告，《紫禁城》，2014 年第 11 期。
- 圖 III-42 清，乾隆跋董其昌《臨柳公權書蘭亭詩》，1770 年。取自故宮出版社編，《蘭亭八柱》(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蘭亭八柱第七」冊。
- 圖 III-43 清，乾隆跋董其昌《臨柳公權書蘭亭詩》，1771 年。取自故宮出版社編，《蘭亭八柱》，「蘭亭八柱第七」冊。

- 圖 III-44 柳公權《書蘭亭詩》部分，孫綽四言詩：A)柳公權，《書蘭亭詩》（八柱第四）。B)常福，《內府鈎填戲鴻堂刻柳公權書蘭亭詩原本》（八柱第五）。C)于敏中，《補戲鴻堂刻柳公權書蘭亭詩缺筆》（八柱第六）。D)董其昌，《臨柳公權書蘭亭詩》（八柱第七）。E)乾隆，《臨董其昌倣柳公權書蘭亭詩》（八柱第八）。F)《明拓〈戲鴻堂法書〉柳公權書蘭亭詩冊》。A~E 取自故宮出版社編，《蘭亭八柱》。F 取自故宮博物院編，《蘭亭圖典》，頁 196。
- 圖 III-45 「蘭亭八柱」石屏與《清紫檀木雕蘭亭修禊圖八柱帖插屏》比較：A)畫面右上角閣樓。B)畫面右側中段王羲之蘭亭段落。
- 圖 III-46 《清紫檀木雕蘭亭修禊圖八柱帖插屏》之「孫綽題壁」局部。
- 圖 III-47 明，「李在」款，《蘭亭圖》，部分，16 世紀晚期，個人藏。取自 Kazuko Kameda-Madar, “Pictures of Social Networks: Transforming Visu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Orchid Pavilion Gathering in the Tokugawa Period (1615-1868)” (PhD diss.,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011), p. 463.
- 圖 III-48 (傳)明，仇英，《西園雅集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故宮書畫圖錄（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1），頁 295。
- 圖 III-49 明，程大約編，《程氏墨苑》之〈竹林七賢〉，1605 年刊行。取自上海古籍出版社編，《程氏墨苑》，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 476。
- 圖 III-50 明，程大約編，《程氏墨苑》之〈修禊圖〉。取自上海古籍出版社編，《程氏墨苑》，上冊，頁 384-385。
- 圖 III-51a 清，于敏中編，《欽定西清硯譜》所收《宋薛紹彭蘭亭硯》側面圖。取自于敏中編，《欽定西清硯譜》，卷九（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 25 上-下。
- 圖 III-51b 清，于敏中編，《欽定西清硯譜》所收《宋綠端蘭亭硯》側面圖。取自于敏中編，《欽定西清硯譜》，卷十三（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 26 上-下。
- 圖 III-52 明，仇英，《蘭亭圖》，上海博物館藏。取自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繪畫全集（十四）》（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頁 73。
- 圖 III-53 明，張宏，《蘭亭圖卷》，部分，1616 年，北京，中國首都博物館藏。取自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繪畫全集（八）》（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圖 37-40。
- 圖 III-54 清，《青玉蘭亭修禊圖山子》，背面鐫有乾隆丁卯（十二年，1747 年）御臨《蘭亭序》，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取自故宮博物院編，《蘭亭圖典》，頁 368-369。
- 圖 III-55 明，《明拓明益王重刻大蘭亭圖卷》拓本，部分三段，1592 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取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網站，網址：<http://en.dpm.org.cn/dyx.html?path=/tilegenerator/dest/files/image/8831/2011/0158/img0003.xml>，檢索日期：2018-9-30。
- 圖 III-56 清，《清拓乾隆御題補刻明代端石蘭亭圖卷》，部分，1781 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取自故宮博物院編，《蘭亭圖典》，頁 300-301。
- 圖 III-57 清，《欽定補刻端石蘭亭圖緝絲》，部分，私人藏。取自張瓊，〈欽定補刻端石蘭亭圖緝絲全卷考略——兼析清高宗時期的緝絲書法〉，《中國歷史文物》，2005 年第 6 期，圖版二。
- 圖 III-58 A 「蘭亭八柱」第三柱上刻字。B 寧壽宮《敬勝齋法帖》刻石。，2017 年 7 月 9、12 日筆者拍攝。
- 圖 III-59 清，《清乾隆蘭亭修禊圖御墨》，此為白色，右側局部為「謝滕」形象，1737 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取自故宮博物院編，《蘭亭圖典》，頁 348。
- 圖 III-60 清，《清乾隆竹管蘭亭真賞紫毫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取自故宮博物院編，《蘭亭圖典》，頁 345。
- 圖 III-61 清，《清乾隆竹管蘭亭真賞紫毫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取自故宮博物院編，《蘭亭圖典》，頁 374。



- 圖IV-1 紹興，戴山，王羲之故居「戒珠寺」，2017年7月7日筆者攝。
- 圖IV-2 紹興，戴山，「題扇橋」，清道光8年〔1828〕重建，2017年7月7日筆者攝。
- 圖IV-3 紹興，戴山，戒珠寺右前方之「墨池」，2017年7月7日筆者攝。
- 圖IV-4 清，佚名，《西湖孤山圖》，收入王復禮編，《御覽蘭亭志》，1719年。取自王復禮編，毛奇齡校，《御覽蘭亭志》（天津圖書館藏康熙58年〔1719〕刻本），頁1下-2上。
- 圖IV-5 清，朱其昌，《蘭亭曲水圖》，收入王復禮編，《御覽蘭亭志》，1719年。取自王復禮編，毛奇齡校，《御覽蘭亭志》，頁1下-2上。
- 圖IV-6 杭州，西湖，放鶴亭（1915年整修）中之康熙臨董其昌《舞鶴賦》刻石，240×75公分，2017年7月6日筆者拍攝。
- 圖IV-7 A、B)紹興，蘭亭，御碑亭（1983年整修）中之康熙《蘭亭序》刻石，碑石尺寸686×264公分，2017年7月7日筆者拍攝。C)清，康熙，《清聖祖御筆蘭亭詩序軸》，1693年，408.1×209.1公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D、E)為B、C局部比較。取自「書畫典藏資料檢索系統」網頁，網址：<https://reurl.cc/28k36>，檢索日期：2017-11-20。
- 圖IV-8 上：清，朱其昌，《蘭亭曲水圖》，收入王復禮編，《御覽蘭亭志》，1719年。
下：紹興，蘭亭，鳥瞰圖。取自「鳥瞰紹興蘭亭景區」網頁，網址：<https://kknews.cc/zh-hk/culture/yobqzg.html>，檢索日期：2017-11-20。
- 圖IV-9 清，陸振宗繪，《復古曲水圖》，收入吳高增輯，《蘭亭志》，1752年。吳高增輯，《蘭亭志》，卷二（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間〔1736-1795〕刻本），頁10下-11上。
- 圖IV-10 清，陸振宗繪，《今蘭亭圖》，收入吳高增輯，《蘭亭志》，1752年。吳高增輯，《蘭亭志》，卷二，頁7下-8上。
- 圖IV-11 明，佚名，〈蘭亭圖〉，收入蕭良榦主導編修，《紹興府志》，1587。取自張濟編撰，《蘭亭》（杭州：西泠印社，2001），無頁碼。
- 圖IV-12 清，高晉輯，《南巡盛典》之「蘭亭」。取自劉托、孟白主編，《清殿版畫匯刊（10）：南巡盛典圖（一）》（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頁724-725。
- 圖IV-13 大正二年（1913）四月九日，長尾兩山及友人於蘭亭續修禊事。收入陶德民主編，《大正癸丑蘭亭會への懷古と繼承：関西大学図書館内藤文庫所蔵品を中心に》（京都：關西大學出版部，2013），頁29。
- 圖IV-14 紹興，蘭亭，王右軍祠（1867年重修）。取自「漢隆園地」網頁，網址：<https://reurl.cc/YdrQ0>，檢索日期：2017-11-20。
- 圖IV-15 西川寧目測，《蘭亭平面圖》，1931年。收入陶德民主編，《大正癸丑蘭亭會への懷古と繼承：関西大学図書館内藤文庫所蔵品を中心に》，頁29。
- 圖IV-16 清，楊恩澍，《墨池》碑，1867年，紹興，蘭亭，王右軍祠，2017年7月7日筆者攝。
- 圖IV-17 紹興，蘭亭，《蘭亭》碑亭，碑石尺寸173×102公分，取自喻革良編著，《聖地絕品·神游蘭亭》（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頁27。
- 圖IV-18 宋，高宗皇帝，清拓《安素軒石刻》宋高宗臨《蘭亭序》，部分，1149年，32.5×15.1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取自「故宮博物院」網頁，網址：<http://www.dpm.org.cn/collection/impress/233458.html>，檢索日期：2017-11-20。
- 圖IV-19 宋，《定武蘭亭序》（《定武蘭亭真本》）拓本，部分，柯九思藏本，24.9×66.9公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取自石守謙、葛婉章主編，《大汗的世紀：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頁34-35。
- 圖IV-20 紹興，蘭亭，御碑亭（1983年整修）中之康熙皇帝《蘭亭序》刻石，局部。根據圖IV-14C《清

聖祖御筆蘭亭詩序軸》，尺寸應為 408.1×209.1 公分。

圖IV-21 清，陸振宗繪，《古蘭亭圖》，收入吳高增輯，《蘭亭志》，1752年。吳高增輯，《蘭亭志》，卷二，頁3下-5上。

圖IV-22 明，《明拓明益王重刻大蘭亭圖卷》拓本，1592年。

圖IV-23 左：《明周府東書堂重摹唐模賜本蘭亭序及圖跋全卷》拓本，「蘭亭」局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藏。

右：清，陸振宗繪，《古蘭亭圖》，「蘭亭」局部。

圖IV-24 左：《明周府東書堂重摹唐模賜本蘭亭序及圖跋全卷》拓本，「楊模」局部。

右：清，陸振宗繪，《古蘭亭圖》，局部。

圖IV-25 左：明，《蘭亭修禊圖》拓本，「王獻之」局部，1417年摹刻，藏地不明。取自王樹村主編，《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19 石刻線畫》，頁88。

右：清，陸振宗繪，《古蘭亭圖》，局部。

圖IV-26 清，陸振宗繪，《今蘭亭圖》，局部，收入吳高增輯，《蘭亭志》，1752年。吳高增輯，《蘭亭志》，卷二，頁7下-8上。

圖IV-27 清，陸振宗繪，《復古曲水圖》，局部，收入吳高增輯，《蘭亭志》，1752年。吳高增輯，《蘭亭志》，卷二，頁10下-11上。

圖IV-328 清，陸振宗繪，《復古曲水圖》，局部，收入吳高增輯，《蘭亭志》，1752年。吳高增輯，《蘭亭志》，卷二，頁10下-11上。

圖IV-29 紹興，蘭亭，御碑亭中之石碑。（左，碑陽）康熙皇帝，《蘭亭序》，1693年；（右，碑陰）乾隆皇帝，《蘭亭即事詩》，1751年。2017年7月7日筆者拍攝。

圖IV-30 揚州，瘦西湖，遠望整修中的紅橋（重建於1973年），2017年7月19日余玉琦拍攝。

圖IV-31 清，《揚州畫舫錄》中之「虹橋修禊」，1795年初刻。取自李斗撰，汪北平、涂雨公點校，《揚州畫舫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218。

圖IV-32 明，文徵明，《蘭亭修禊圖卷》，1542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取自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繪畫全集（十三）》（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頁44-45。

圖IV-33 明，文徵明，《祝允明書蘭亭序文徵明補圖卷》，瀋陽，遼寧省博物館藏。取自遼寧省博物館藏寶錄編輯委員會，《遼寧省博物館藏寶錄》（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香港：三聯書店聯合出版，1994），頁47。

圖IV-34 （傳）明，文徵明，《蘭亭修禊圖軸》，1524年，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故宮書畫圖錄（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1），頁63。

圖IV-35 （傳）明，文徵明，《蘭亭修禊圖卷》，泰和嘉成 2013 秋拍。取自雅昌藝術網，網址：<http://auction.artron.net/20131029/n526702.html>，檢索日期：2017年11月12日。

圖IV-36 （傳）明，文徵明，《蘭亭修禊圖》，1544年，藏處不明。取自「壹讀」部落格，網址：<https://read01.com/nAdA73.html#.Wgf00Yh-W00>，檢索日期：2017年11月12日。

圖 V-1 清，丁健、陳枏、闕嵐，《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1792年，69×369公分，私人藏。

圖 V-2 （上左）清，丁健、陳枏、闕嵐，《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上右）明，《蘭亭修禊圖》拓本，「王獻之」局部，1417年摹刻，藏地不明。取自王樹村主編，《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19 石刻線畫》，頁88。

（下左）清，丁健、陳枏、闕嵐，《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下右）《明周府東書堂重摹唐模賜本蘭亭序及圖跋全卷》拓本，「孫統」局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藏。

圖 V-3 清，禹之鼎，《城南雅集圖》，1682年，50.5×126公分，東京國立博物館藏。余玉琦拍攝。



- 圖 V-4 清，方士庶、葉芳林，《九日行庵文讌圖》，1743 年，32.4×201.2 公分，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藏。取自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網頁，網址：http://www.clevelandart.org/art/1979.72?collection_search_query=literary+gathering+in+a+a&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ZP3iFf4V Gp84QKN09j3KJcTLUwXliF5qajRraLUDNBE&form_id=clevelandart_collection_search_form，檢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12 日。
- 圖 V-5 清，丁健、陳棻、闕嵐，《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人名標示。
- 圖 V-6 清，丁健、陳棻、闕嵐，《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畫面分組標示。
- 圖 V-7 清，丁健、陳棻、闕嵐，《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卷首局部。
- 圖 V-8 清，丁健、陳棻、闕嵐，《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卷尾局部。
- 圖 V-9 清，丁健、陳棻、闕嵐，《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李善祺局部。
- 圖 V-10 清，方士庶、葉芳林，《九日行庵文讌圖》，局部。
- 圖 V-11 (傳)唐，周昉，《麟趾圖》，局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取自劉芳如、葛婉章執行編輯，《嬰戲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0)，頁 6。
- 圖 V-12 A)《明周府東書堂重摹唐模賜本蘭亭序及圖跋全卷》拓本，「謝萬」局部。B)清，丁健、陳棻、闕嵐，《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郭恕堂局部。
- 圖 V-13 《明周府東書堂重摹唐模賜本蘭亭序及圖跋全卷》拓本，「王玄之」(右)與「王彬之」(左)局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藏。
- 圖 V-14 明，《蘭亭修禊圖》拓本，「王獻之」局部，1417 年摹刻，藏地不明。
- 圖 V-15 清，丁健、陳棻、闕嵐，《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史少岡、平恕局部。
- 圖 V-16 清，丁健、陳棻、闕嵐，《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何養亭局部。
- 圖 V-17 《明周府東書堂重摹唐模賜本蘭亭序及圖跋全卷》拓本，「謝滕」(左)「楊模」(中)與「庾蘊」(右)局部。
- 圖 V-18 清，禹之鼎，《城南雅集圖》，局部。
- 圖 V-19 清，方士庶、葉芳林，《九日行庵文讌圖》，局部。
- 圖 V-20 清，方士庶、葉芳林，《九日行庵文讌圖》，頭部局部。
- 圖 V-21 清，丁健、陳棻、闕嵐，《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何養亭」頭部局部。
- 圖 V-22 清，丁以誠，《鐵保像軸》，局部，1810 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取自楊新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明清肖像畫**》(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08)。
- 圖 V-23 清，郎世寧、王致誠等，《萬樹園賜宴圖》，局部，1755 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取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網頁，網址：<http://en.dpm.org.cn/dyx.html?path=tilegenerator/dest/files/image/8831/2011/0174/img0002.xml>，檢索日期：2018 年 2 月 18 日。
- 圖 V-24 清，郎世寧，《瑪瑞斫陣圖》，局部，1759 年，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取自王耀庭主編，《新視界：郎世寧與清宮西洋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7)，頁 74。
- 圖 V-25 明，謝環，《杏園雅集圖》，1437 年，36.7×240.7 公分，鎮江市博物館藏。取自楊涵主編，《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6 明代繪畫上》(上海：上海人民美術，1988)，頁 49。
- 圖 V-26 明，文徵明，《蘭亭修禊圖》，部分，1542 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 圖 V-27 清，丁健、陳棻、闕嵐，《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器用局部。
- 圖 V-28 清，王宸，《借園修禊圖》，1793 年，41.5×247.5 公分，南京博物院藏。
- 圖 V-29 清，王宸，《借園修禊圖》，局部。
- 圖 V-30 明，陸治，《元夜讌集圖卷》，1547 年，上海博物館藏。取自楊涵主編，《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7 明代繪畫中》(上海：上海人民美術，1989)，頁 120。
- 圖 V-31 清，徐承熙，《曾賓谷長壽寺後池修禊圖》，全圖及局部，1815 年，41.5×247.5 公分，清遠市

博物館藏。

圖 V-32 清，王宸，《借園修禊圖》，王文治題。

圖 V-33 宋，《定武蘭亭序》拓本，部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V-34 （左）《借園修禊圖》後王文治縮臨《定武蘭亭真本》局部。（右）畢沅收藏，《定武蘭亭真本》拓本，部分。

圖 V-35 （左）《借園修禊圖》後王文治縮臨《定武蘭亭真本》，局部。（中）畢沅收藏，《定武蘭亭真本》拓本，部分。（右）唐，《馮承素行書摹蘭亭序卷》，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V-36 《清拓穎上蘭亭序》，拓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取自故宮博物院編，《蘭亭圖典》，頁 270-271。

圖 V-37 （一）《借園修禊圖》拓本詩跋，楊摺跋，局部。（二）《借園修禊圖》拓本詩跋，王文治跋，局部。（三）《借園修禊圖》拓本詩跋，史雲虬跋，局部。（四）《借園修禊圖》拓本詩跋，莫允宣跋，局部。

圖 V-38 《清拓穎上蘭亭序》、《借園修禊圖》拓本詩跋，「感」字使用比較。

圖 V-39 （一）《清拓穎上蘭亭序》，局部，缺「在癸丑」三字。（二）畢沅收藏，《定武蘭亭真本》拓本，部分，具「在癸丑」三字。（三）《借園修禊圖》拓本詩跋，楊摺跋，局部。（四）《借園修禊圖》拓本詩跋，王文治跋，局部。

圖 V-40 （一）《清拓穎上蘭亭序》，局部，缺「在癸丑」三字。（二）畢沅收藏，《定武蘭亭真本》拓本，部分，具「在癸丑」三字。（三）《借園修禊圖》拓本詩跋，俞大猷跋，局部。（四）《借園修禊圖》拓本詩跋，王洽跋，局部。

圖 V-41 《借園修禊圖》拓本詩跋，劉錫嘏跋。

圖 V-42 明，《明拓明益王重刻大蘭亭圖卷》，拓本，1592 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VI-1 恭王府「沁秋亭」外觀及水道，2017 年 7 月 17 日筆者攝。

圖 VI-2 陳廷敬宅，流杯亭水道。取自每日頭條網站「東方古堡，皇城相府」，網址：<https://kknews.cc/zh-my/history/4vxmrex.html>，檢索日期：2018-11-1。

圖 VI-3 清，徐承熙，《曾賓谷長壽寺後池修禊圖》，1815 年，清遠市博物館藏。

圖 VI-4 首爾，昌德宮後苑之「玉流泉（又稱「玉流川）」，衣若芬攝。取自衣若芬，〈蘭亭流芳在朝鮮〉，收入故宮博物院編，《二零一一年蘭亭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頁 38。

圖 VI-5 朝鮮，劉淑，《修禊圖卷》，1853 年，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藏。取自장진아、전혜은編，《미술 속 도시, 도시 속 미술》（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2016），頁 152-153。

圖 VI-6 二十世紀初期漢陽南山一帶。A) 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藏，玻璃乾版，건판 28559。B) 果川市，國史編纂委員會藏，玻璃底片資料。取自장진아、전혜은編，《미술 속 도시, 도시 속 미술》，頁 151。

圖 VI-7 明，尤求，《修禊圖》，部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取自故宮博物院編，《蘭亭圖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頁 320-321。

圖 VI-8 明，沈時，《蘭亭修禊圖卷》，部分，1635 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取自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繪畫全集（十七）》，頁 216-217。

圖 VI-9 朝鮮，佚名，《蘭亭修禊圖》，屏風十曲，東山房藏。取自李源福，〈《蘭亭修禊》圖說〉，《空間》，178（1982.4），頁 29-30。

- 圖 VI-10 富岡鐵齋等六十人，《蘭亭印譜》，1913年，大阪，關西大學「內藤文庫」藏。取自陶德民主編，《大正癸丑蘭亭會への懷古と繼承：関西大学図書館内藤文庫所藏品を中心に》，頁 82。
- 圖 VI-11 山本竟山，《大正癸丑蘭亭會記念合作書帖》，1913年，個人藏。取自陶德民主編，《大正癸丑蘭亭會への懷古と繼承：関西大学図書館内藤文庫所藏品を中心に》，頁 88。
- 圖 VI-12 韓國慶州，「鮑石亭」址。取自韓國觀光公社網站，網址：http://big5chinese.visitkorea.or.kr/cht/ATT/3_2_view.jsp?cid=332395，檢索日期：2018-11-21。
- 圖 VI-13 朝鮮，佚名，《十老圖像圖卷》，1499年，龍仁，湖巖美術館藏。
- 圖 VI-14 A、B)朝鮮，佚名，《十老圖像圖卷》，「金博」、「吳惟敬」局部，與《明周府東書堂重摹唐模賜本蘭亭序及圖跋全卷》拓本，「謝滕」、「楊模」局部。
- 圖 VI-15 《蘭亭大觀》「蘭亭陳列目錄」，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一九七三年四月十日 至五月十三日。取自李棧編，《蘭亭大觀：蘭亭陳列品目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研究所文物館，1973），封面。
- 圖 VI-16 「民國第二癸丑修禊」請柬。取自陳小凌，〈暮春修禊韻事〉，《故宮文物月刊》，第 277 期（2006.4），頁 101。
- 圖 VI-17 臺北士林外雙溪故宮附近「流觴」石刻及張銀武拓之拓本。A) 取自盧宣妃，〈閑話當年故宮事——臺北故宮之初〉，收入蔡枚芬主編，《八徵耄念：國立故宮博物院八十年的點滴懷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6），頁 81。B) 取自陳小凌，〈暮春修禊韻事〉，《故宮文物月刊》，第 277 期（2006.4），頁 91。



表目錄

Ⅲ-表一 《紫檀雕山水八雁蘭亭八柱插屏》與「蘭亭八柱」內容與順序對照

V-表一 李亨特續蘭亭會參與者名單

V-表二 《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前後序、記之釋文

V-表三 《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題跋釋文

V-表四 《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題字者整理

V-表五 《借園修禊圖》之題跋者

V-表六 《借園修禊圖》題跋釋文





第一章 |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提出

王羲之（303-361）¹於東晉永和九年（353）上巳日，在浙江紹興蘭亭所舉辦的修禊之會，可說是東亞文人所共有的一段文化記憶。當年王羲之招集好友四十幾人，「羣賢畢至，少長咸集」，在山陰蘭亭修禊、引水流觴競詩，並由王羲之寫下《蘭亭序》，成為千古名蹟。當年王羲之雖未倩人以繪畫形式保留雅集風采，但透過記錄此雅集的名作——《蘭亭序》²之文章與書蹟，足讓後世藉以想像、追索王羲之及其友人的風華盛事。作為集會「紀念物」之《蘭亭序》，也正是王羲之雅集被視為「千古盛會」，一再受到後人追仿的主要因素。³王羲之的蘭亭會，在後世往往被稱為「蘭亭雅集」或「修禊會」，但「蘭亭會」似乎主要是唐人稱法，應是比較早期的稱呼；「蘭亭雅集」則可能是宋代才出現，明清時成為普遍用語；至於「修禊會」，也是明清常見的一種稱法。⁴總之不論使用「蘭亭會」、「蘭亭雅集」或「修禊會」來稱呼，都是指繼承王羲之三五三年在紹興蘭亭所舉辦之蘭亭會的雅集。⁵本文為了與王羲之當年的「蘭亭會」作區隔，行文中以「續蘭亭（修禊）會」，來指稱後代追憶王羲之的雅集。

王羲之的蘭亭會作為一個「集會」，後世追繼其作「續蘭亭會」、「續修禊會」者所在多有。一個集會的舉辦，包含參與者、活動設計、場地安排、紀念物的製作、集體期許等各方面，但長久以來即使宮廷內、外盛行修禊之事，王羲之蘭亭會所涉及的面向也不僅止於《蘭亭序》一物，但此事件在二十世紀之後，尤其是

¹ 本文之王羲之生卒年，採梁陶弘景《真誥》說法。相關討論見祁小春，《邁世之風：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頁370-276。

² 《蘭亭序》之書法與文章初無定名，另有《修禊帖》、《蘭亭集序》等稱。詳見祁小春，《邁世之風：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頁258-259討論。

³ 「千古盛會」語出明代薛岡〈報米仲詔繕部〉：「蘭亭修禊一燕遊恒事耳，第以右軍文章書法遂號千古盛會」。見《天爵堂文集》，卷十六，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未收書輯刊》，第25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頁628。

⁴ 唐人多稱「蘭亭會」之例，如孟浩然，〈江上寄山陰崔國輔少府〉，《孟浩然集》，卷三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四部叢刊景明本）；柳宗元，〈韓漳州書報徹上人亡因寄二絕〉，韓醇，《詒訓柳先生文集》，卷四十二，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⁵ 筆者搜尋「蘭亭雅集」之稱起於何時，發現很可能最早為北宋人所使用。例如文彥博（1006-1097）的〈耆老會詩〉有「蘭亭雅集誇修禊，洛社英遊忝序賓」之句。文彥博此詩頗為知名，後代不少文集均有收錄。至明清之後，「蘭亭雅集」已為普遍的稱呼。但由於本文考慮「雅集」之稱是後代稱法，而早期多以「蘭亭會」稱呼王羲之集會，故本文仍以早期稱法行文。文彥博，〈耆老會詩（富公第一，太師第二，共十二人）〉，《潞公文集》，卷七（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19上-下。

學界，卻以《蘭亭序》書蹟最受矚目，相關之蘭亭圖繪次之，對於與蘭亭會相關的修禊空間、衍生出之工藝品類等相關研究並不多見。即使有成果，也往往分屬在各門類的研究領域，甚少被統合起來進行了解。

藝術史學界向來著眼於王羲之個人書法成就及《蘭亭序》的討論，反應出王羲之蘭亭會所以受到中國歷代的重視，成為歷代宮廷內、外仿學之對象的主因，就是因為這個集會產出了重要的書法名品《蘭亭序》。《蘭亭序》以其文章、書法作為一個集會紀念物，不僅令後代觀者可藉以遙想西元三五三年之蘭亭會的風流絕代，同時作為「紀念物」的一流書蹟《蘭亭序》，也成為後來續蘭亭會所追求、超越的目標。後代續蘭亭會的「紀念物」製作，就書法本身可能無法與王羲之的表現相及，此時這些「紀念物」用了甚麼方式來取代、超越，即是一個值得觀察的現象。集會中之「物」的製作，與「紀念」的目的息息相關，續蘭亭會中，「物」之製作可能使用了各種材質與表現，「物」之使用也與集會希望如何紀念王羲之蘭亭會，或者他人日後如何看待、紀念該集會的考慮有關。因此對於了解後代續蘭亭會之「物」的製作，將可進一步幫助吾人了解這些群體如何透過續蘭亭會來塑造、紀念自己的群體，以及他們如何重新塑造蘭亭文化、參與蘭亭傳統。本研究，即企圖透過對十七、十八世紀之續蘭亭會的「紀念物」進行觀察，以「集會」之舉辦作為統合，試圖說明過去學界所忽略，清代續蘭亭會在蘭亭傳統中的重要性。

若要從「紀念物」來觀察清代續蘭亭會的創新之處，就必須透過「集會」的角度來統合這些續蘭亭會的表現，方可能看到各個集會如何選擇他們的「紀念物」，以及如何將之運用於集會之中。一個集會的舉辦，包含場地設計、活動安排、參與者的邀請與紀念物製作等細節，這些細節的選擇其實是圍繞在集會之規劃與期待下所產生，因此「紀念物」之製作也必須在集會的脈絡下來討論才有意義。過去藝術史學界不重視續蘭亭會之集會舉辦，對於參與者之身份、如何參與，或集會的場地安排、活動內容與集體期待等方面，均甚少討論。筆者認為造成續蘭亭會作為集會之研究闕如的原因，是由於藝術學門的研究，一直以來著重於對「重要藝術家」與「經典藝術品」的探討，透過這些個案的探討與累積，才逐漸架構起藝術史的整體面貌。加上藝術史領域為研究精確，往往區別門類、各自進行，因而有繪畫史、書法史、工藝史、建築史等專業區分。這樣的研究習慣行之有年，一直到「物質文化」與跨領域整合等觀念開始為藝術史學界採用來解決特定問題

之後，才開始在研究面貌上看到改變。⁶本研究，即擬透過集會的角度來統合續蘭亭會之各種表現，以檢視「紀念物」在其中被運作的狀況。例如就筆者對清代續蘭亭會之「紀念物」的觀察，發現後代用來追比王羲之之「物」的製作除書法、繪畫之外，曲水流觴的園林建構也應被當作一種「紀念物」之型態來看待。這些「紀念物」的製作正是本文的觀察重點。

整體而言，長久以來學界多將續蘭亭會相關研究，依各研究者的研究範疇，將之拆解到建築、園林、書法、繪畫、文學等各領域進行單項探討。亦將續蘭亭會視如一般文人雅集看待，並未針對其是否具有不同於其他雅集的特殊性及其文化作用進行探討。誠然，僅針對單一書法作品或蘭亭圖繪之品質與表現加以斟酌，在書法史或繪畫史上確實有其必要，但卻無法說明蘭亭紀念物在蘭亭傳統中的作用與意義。而過去不討論集會的蘭亭物品研究，也是造成今日學界對歷代續蘭亭會活動之認識僅留一籠統印象的根本原因。故筆者認為，從「集會」角度來探討清代續蘭亭會，將續蘭亭會之「紀念物」放入集會的脈絡中來觀察，將有助於深化蘭亭傳統與蘭亭文物之研究，並為此領域開出一條嶄新的路徑。

此外，據筆者觀察，王羲之蘭亭會之所以能超越歷代其他知名雅集，成為宮廷內、外所重視之集會典範的主要原因，在於蘭亭會作為一個集會，在「塑造群體」的功能上具有相當的優勢。而這個「塑造」的意義其實是附帶的，後代的續蘭亭會事實上帶有濃厚之慶祝、慶典（celebrating）的意味。亦即後代文人藉由續蘭亭會的舉辦，來追憶王羲之的蘭亭會，同時塑造自我群體。關於蘭亭會之塑造群體角度的討論，可從二方面來看。第一，王羲之蘭亭會在塑造群體的優勢，主要體現在其特殊性上。此特殊性有五點，分別為固定的舉辦日期（農曆三月三日 / 上巳）、儀式活動（修禊之儀）、獨特的場所設計（紹興蘭亭、曲水流觴之處）與詩文比競、「賢才群聚」的集會，以及紀念物的製作（《蘭亭序》書蹟）。將此五點統合起來，是為王羲之蘭亭會的整體面貌，亦作為續蘭亭會的辦理格套。擁有所屬群體，是歷代知識分子的普遍企求，上述五點蘭亭會之特殊性，在塑造群體的文化需求上可提供有效的作用，超越其他雅集。故後代所舉辦的續蘭亭會往往由此五點擷取部分，作為各自集會之辦理的憑藉，此可在清代宮廷內、外所舉辦之續蘭亭會的辦理上觀察到。第二，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

⁶ 關於藝術史領域之物質文化研究的最佳範式，可參閱 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1). 另外可參閱《新史學》，第 17 卷第 4 期（2006），「物質文化專號」及第 10 卷第 3 期（1999）的研究討論。

1930-2002) 所提出之社會場域 (champ)、資本 (capital)、慣習 (habitus) 等概念之關係與運作，也啟發本研究企圖進一步以塑造群體的角度來統合、觀察清代續蘭亭會之參與者的不同身份與階層，及其在各自舉辦之續蘭亭會中所展示之「紀念物」或其他物品。⁷ 透過這些運作，這些集會反應出不同群體之哪些不同的期待。簡而言之，筆者認為藉由塑造群體的角度，不僅可觀察續蘭亭會之舉辦與相關社會需求間的調整與互動，並有助於透過「紀念物」之製作，發掘清代續蘭亭會在蘭亭史上的重要性。

故本研究擬從上述王羲之蘭亭會利於塑造群體的五點優勢，如何作用於清代續蘭亭會的辦理上，作為觀察基礎，同時藉由布赫迪厄社會學理論的啟發，來考慮清代續蘭亭會之籌組與「紀念物」製作的意義。此方式，同時也意圖對過去學界將蘭亭相關研究放到各領域進行探討的研究方法，及認為蘭亭會僅作為一普遍之文人雅集的觀點，進行對話。

中國歷史上，王羲之的地位一直到唐太宗 (626-649 在位) 之後，才被賦予作為書聖的身分；王羲之的蘭亭會，也大致在唐代之後才被確立為雅集典範。唐代開始，宮廷中的續蘭亭會或修禊會，多在人工建造之流杯亭、流杯殿等流杯建構中進行，宮廷外的集會則可能在勝地林亭、私家園林亭子之中，或引控自然流水成一適合流杯的水渠之處。活動內容不論宮廷內、外，大抵均以飲酒賦詩為主，雖未必聚會於三月三日，也不一定特設賞罰，或有詩序、書法等紀念物之創作，但聚會之形成大抵是以一個群體塑造的共同期待為基礎，這也是蘭亭會受歷代人一再追仿、複製的重要因素。因此唐代，可說是王羲之蘭亭會傳統的奠基階段。

歷代行續蘭亭會者，也陸續加入了各時代或個人的關注焦點來豐富蘭亭傳統。如黃寬重對宋代續蘭亭會的研究發現，因朝廷重視文治，士人必須透過交遊網絡

⁷ 皮耶·布赫迪厄之相關研究如皮耶·布赫迪厄著，石武耕、李沅沅、陳羚芝譯，《藝術的法則：文學場域的生成與結構 (Les règles de l'art: genèse et structure du champ littéraire)》(臺北：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16)；皮耶·布赫迪厄著，劉暉譯，《區分：判斷力的社會批判 (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二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此書比較理想的翻譯，應為《秀異：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此翻譯較能彰顯作者的意旨，參見莊致嘉，〈與 BOURDIEU 相約巷仔口咖啡店：台灣人的階級品味如何？〉，「巷仔口社會學」網頁，網址：<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5/07/28/chuangchihchia/>，檢索日期：2017-11-28。)；朋尼維茲 (Patrice Bonnewitz) 著，孫智綺譯，林志明、尉遲秀校訂，《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 (Premieres lecons sur La sociologie de Pierre Bourdieu)》(臺北：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皮耶·布赫迪厄著，林明澤譯，〈藝術品味與文化資產 (Outline of a Theory of Art Perception)〉，收入 Jeffrey C. Alexander & Steven Seidman 主編，《文化與社會 (Culture and Society: Contemporary Debates)》(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第三刷)，頁 259-275。

拓廣人脈，加上復古成為當時文人的集體興趣，因此典籍、文物收藏風氣大盛，成為當時文人交流的資源，在上巳日的聚會中欣賞王羲之《蘭亭序》，是南宋中期仿蘭亭會的特色。⁸就此而言，在續蘭亭會中提供王羲之法書為眾人賞鑑，就不太可能是唐代續蘭亭會的重點。因王羲之及《蘭亭序》的地位在唐代才真正確立，且《蘭亭序》真蹟收藏在宮廷中，史傳之後隨唐太宗葬入昭陵，當時雖然也有宮中流出的拓本或摹本可供參考，但唐人基本上並不易見到品質精良的《蘭亭序》版本。⁹因此唐代續蘭亭會的相關記載，似乎並未出現鑑賞《蘭亭序》之各式摹本、臨本及拓本的活動。雖然如此，在宋代續蘭亭會中進行「古物鑑賞」的行為本身，卻是當時一般文人雅集經常出現的活動，並不因蘭亭聚會而特別存在。因此似乎也不能說這個改變對蘭亭傳統或蘭亭紀念物之製作產生影響，甚至在塑造群體上有特殊作用。

元代雖然也有續蘭亭會的舉辦，但似乎與過去沒有太大差別。如浙江地方官員劉仁本（?-1367）於至正二十年（1360）陰曆三月三日，在浙江餘姚雩詠亭舉辦的續蘭亭會，似乎是元代民間宮廷外部最為知名的續蘭亭會。當日劉仁本集四十二位「合甌越來會之士」，選擇與王羲之蘭亭會景觀相仿之處，由與會者補王羲之蘭亭會不成詩者之詩作，會中並有劉仁本作序。¹⁰這次雅集除了沒有書法紀念物的製作之外，幾乎所有內容均是仿效王羲之蘭亭會，劉仁本並無意在蘭亭傳統中展現特別的創造。

到了明代，在蘭亭傳統中所見到的最大發展，也許要算是「蘭亭圖繪」的多元表現。¹¹明代的蘭亭圖，除有大量根據傳宋李公麟《蘭亭修禊圖》拓本為藍本的製作（如趙原初《蘭亭圖卷》）之外，還有不少構圖新穎、修改自傳李本的蘭亭圖（如張宏《蘭亭圖軸》），及以當代續蘭亭會為描繪對象的作品（如吳彬《勺園禊褉圖》）（圖 I-1～圖 I-3）。這些豐富的表現雖在蘭亭傳統的發展上有值得重視之處，但絕大多數的蘭亭圖均與雅集的舉辦無關，亦即並非專為某次續蘭亭

⁸ 黃寬重，〈交游酬唱：南宋與元代士人的蘭亭雅集〉，收入包偉民、劉後濱主編，《唐宋歷史評論（第二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頁 217-220。另可參見陳一梅，《宋人關於〈蘭亭序〉的收藏與研究》（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1）。

⁹ 見榮新江，〈《蘭亭序》在西域〉，《國學學刊》，2011 年第 1 期，頁 69。感謝謝明良教授賜知此文，特此申謝。

¹⁰ 「合甌越來會之士」句，轉引自邱江寧、宋啟鳳，〈論元代“續蘭亭會”〉，《江蘇社會科學》，2013 年第 6 期，頁 187。另參閱全文研究，頁 185-190。相關研究另見黃寬重，〈交游酬唱：南宋與元代士人的蘭亭雅集〉，收入包偉民、劉後濱主編，《唐宋歷史評論（第二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頁 231-232。

¹¹ 相關研究參見王鈺雅，〈勺園與米萬鍾文化形象的形塑：《勺園圖》相關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第二章。

會而特別繪製，因此無法從集會「紀念物」之製作的角度來進行探討。其中，吳彬（活躍於明萬曆年間）為米萬鍾（1554 後-1631）所繪的《勺園祓禊圖》，以及米萬鍾在北京模擬王羲之山陰蘭亭之精髓所創造的「北地蘭亭」景觀，卻可說是藉修禊場合之改造，試圖超越王羲之蘭亭會的一種表現。這同時也是明代續蘭亭會加入蘭亭傳統中的一個嶄新創造。¹²

藉由現今之研究成果，可看到宋、元、明三代宮廷外部之續蘭亭會的大致面貌，但宋至明代宮廷內部關於修禊活動的記載，往往只出現流杯建構的描述，因此看來，宮廷中之蘭亭傳統的表現並未有太大改變。如宋代的崇福宮，留有「泛觴亭」遺址(圖 II-2)。¹³據記載，元代泰定帝(1323-1328 在位)在泰定元年(1324)曾至「流杯亭聽講」，顯示元代宮廷應也設有流杯亭。¹⁴另外，根據明代官員的紀錄，宮廷西苑中也設有「曲水流觴」之處。¹⁵大致看來，唐代以後宮廷內部之流杯聚宴至少在場地的設置上未見特殊變革，同時，關於宮廷流杯聚宴之紀錄十分有限，似乎顯示此三代宮廷中的蘭亭文化並無特別值得關注的新發展。

筆者考量目前關於宋、元、明三代宮廷內、外之續蘭亭會的研究成果，大致已經說明這段歷史中之蘭亭文化的發展狀況，在暫時沒有新材料可供進一步了解的情況下，可先擱筆於此。但當筆者將焦點移往清代，觀察宮廷內、外之蘭亭文化的發展後，發現在集會「紀念物」的製作及藉以塑造群體的運作上，似乎可見對蘭亭傳統加入新的調整與作用，因此值得特別留意。

若說唐代是王羲之蘭亭會傳統的奠基階段，那麼清代，則可視為藉蘭亭傳統中之「紀念物」製作以達塑造群體目的的積極作用階段。十七世紀之後，不論在宮廷內、外的續蘭亭會，均出現不同以往的發展並可見其時代新義。以清代宮廷而言，十七、十八世紀的清代宮廷設有多座流杯亭及曲水流觴之處，如位於北京紫禁城旁西苑的「流水音」流杯亭、承德避暑山莊中的「曲水荷香」等，為吾人提供一個重新檢視宮廷修禊活動的契機。然而過往研究多視流杯遺跡所屬位置，將之納入該區域脈絡進行討論。如位於避暑山莊中的兩座流杯亭，往往被附屬於

¹² 「北地蘭亭」景觀，就王鈺雅論文所研究，主要是「米萬鍾在藉由河岸的佈排或園中小徑的劃分，設計出一條自然蜿蜒且自動回流的水道」(頁 67)。相關研究參見王鈺雅，〈勺園與米萬鍾文化形象的形塑：《勺園圖》相關研究〉。

¹³ 常盤大定，〈崇福宮泛觴亭解說〉，常盤大定、關野貞，《支那文化史蹟·解說》，第 5 卷(京都：法藏館，1941)，頁 14-15。

¹⁴ 危素，《臨川吳文正公年譜》，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刻本)。

¹⁵ 如李賢，〈賜遊西苑記〉；韓雍，〈賜遊西苑記〉，收入蔣廷錫等編纂，《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考工典卷五十三，第 97 冊(臺北：文星書店，1964)，頁 553；554。

避暑山莊研究中被提出，但這些研究對於避暑山莊為何需要兩座流杯亭並未加以解釋。¹⁶由於這些研究通常試圖給予一個大的論述框架，來針對單一園林的整體構成進行討論，因此清代宮廷為何對流杯建構具有高度需求的這個提問往往未被重視，而逕被放在大的論述框架下被理解。此外，清代宮廷中的流杯亭，有些樣式並不同於以往中國所見的流杯建構（如「曲水荷香亭」），過去雖有學者提出這個觀察，但討論不多。至於如何使用這些流杯建構也甚少受論者關注，或通常僅以文人品味之學習來簡單解釋。¹⁷根據清初高士奇（1644-1703）《金鰲退食筆記》中提到西苑流杯亭時，言及「〔清聖祖〕常宴外藩于此。」又提到大學士馮溥（1609-1692）於康熙二十一年（1682）致仕時，清聖祖賜其遊覽西苑，並在流杯亭中「備肴核內酒，飲宴盡歡」。¹⁸單就高士奇的記載來看，滿州帝王在流杯亭所宴請的對象至少有二種身份，一為外藩，另為近臣，但以流杯亭來宴請可能不懂這些歷史典故的外藩，似乎是過去中國歷史所未見。透過對清宮流杯建構之使用記載的了解及實際觀察，可發現流杯亭作為清代宮廷回應王羲之蘭亭會及宮廷既有之修禊傳統的建構，確實有其不同以往的創造與使用。關於此點，目前學界尚未見深入討論。

王羲之蘭亭會傳統除在清代宮廷內部有新發展之外，在宮廷外部亦有值得觀察之處。清代士人舉辦續蘭亭會的活動在史料中十分常見，其中有些聚會雖以「修禊」、「上巳」為名，細看內容實與一般雅集差異無大，這樣的現象從唐代以來普遍可見。本文從「紀念物」的製作與塑造群體角度觀察清代宮廷外部的續蘭亭會，有機會發掘一些在清代社會需求下所出現，具有獨自之集會設計與期待的群體個案。如本文所選擇的兩個個案，分別為乾隆年間浙江紹興知府李亨特（?-1815）於蘭亭當地所舉辦的續蘭亭會，以及畢沅（1730-1797）幕僚劉錫嘏（乾隆34年〔1769〕進士）在湖北武昌借園所舉辦的續蘭亭會。正巧這兩個集會的參與成員是以幕府群體為主，幕府文化在清代有非常豐富的發展，透過對此二續蘭亭會的觀察與研究，除可幫助吾人理解蘭亭傳統在清代如何被加入當代的興趣加以調整之外，同時也可與清代幕府研究進行對話。

除了清代中國之續蘭亭會的研究以外，本文在結論中，也將針對十九、二十

¹⁶ 相關研究如 Stephen Hart Whiteman, "Creating the Kangxi Landscape: Bishu shanzhuang and the Mediation of Qing Imperial Identity" (Ph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2011), p.104, 175, 209.

¹⁷ 對清代特殊樣式之流杯建構的討論，目前討論最仔細並值得參考的研究，參見郭黛姮主編，《遠逝的輝煌：圓明園建築園林研究與保護》（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9）；白鈴安（Nancy Berliner）作，李紹毅譯，〈園林，曲水與書法〉，《紫禁城》，200期（2011.9），頁20-26

¹⁸ 引言出自高士奇，《金鰲退食筆記》（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上，頁13下-14上。

世紀所發生之蘭亭文化的表現進行初步討論。首先，十九、二十世紀的朝鮮及日本，也發生過兩次值得注意的續蘭亭會，分別是一八五三年在朝鮮，由金奭準（1831-1915）主辦的中人群體修禊雅集，以及一九一三年大正癸丑蘭亭會。此二修禊雅集的舉辦，可說也是緣於王羲之蘭亭會「物」之製作與塑造群體之傳統而來，因其異於中國的參與者、地域、空間及目的而值得進一步瞭解。透過此兩次聚會，亦可窺十九世紀之後的蘭亭文化傳統已然由東亞三國所共同承續，且日、韓二國亦有不同於中國的表現內涵。此外二十世紀後半葉的香港與臺灣，亦分別有蘭亭大展及續蘭亭會的舉辦。如一九七三癸丑年，香港中文大學舉辦了「蘭亭大觀」特展，此可用來與日本大正癸丑蘭亭會、昭和蘭亭會相互比較。同年，莊嚴先生（1899-1980）也在臺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舉辦了「民國第二癸丑修禊」。此「曲水流觴」之會在當年被視為民族復興基地的臺灣，尤其在具有中國傳統文化象徵的國立故宮博物院舉辦，格外有其深意，值得進一步了解。

總之，本研究擬以王羲之蘭亭會作為一個「集會」為觀察對象，並從集會之「紀念物」的製作與塑造群體的角度，來檢視清代十七、十八世紀宮廷內、外之續蘭亭會的發展。透過此研究，除能使過去一向籠統、朦朧之續蘭亭會的面貌變得清晰，並得以了解清代續蘭亭會發展在蘭亭傳統上的重要性。

第二節 研究回顧

目前學界對於王羲之蘭亭會的研究大抵分成數個領域，包含宗教、園林建築、集會、藝術史等，以下將分別討論。

首先，由於本文所討論的蘭亭會，是與修禊、祓禊有關的集會，因此對於修禊歷史發展，為本研究所必須了解，而關於此方面，勞榦、臺靜農的研究討論頗多。他們的研究大抵涉及上巳日之日期選擇、當日活動（如燕飲、踏青等）與修禊之宗教性轉移等方面，所討論的例子也多涉及上古時代帝王修禊的儀式。¹⁹ 透過這些研究，可了解早期的修禊之儀宗教意味濃厚，但宋代之後逐漸轉變成游春的活動。這樣的發展，有助於吾人思考王羲之蘭亭會在唐代以後的發展與修禊

¹⁹ 勞榦，〈上巳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29 期（1970），頁 245-247；臺靜農，〈祓除與王羲之蘭亭序〉，《臺大中文學報》，第 5 期（1992.6），頁 1；林恭祖，〈曲水流觴話上巳〉，《故宮文物月刊》，第 37 期（1986.4），頁 19-21；徐筱婷，〈從杜篤《祓禊賦》試觀先秦時期迷信思想及崇巫觀念——與出土文獻合證〉，《遼東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4 卷第 4 期（2012.8），頁 46-53；中村喬，〈中國の年中行事〉（東京：平凡社，1988）。

儀式是否仍有緊密關係。

王羲之的蘭亭會最為人所樂道者，除了《蘭亭序》書蹟之外，就是「曲水流觴」的雅趣了。但過去論者對於「曲水流觴」為何可在自然水域中舉行，卻又發展出流杯亭等流杯建構的形式問題，均未有進一步的解釋。由於清代宮廷中設有多座流杯亭，雖如康熙、乾隆所言，是以王羲之為追仿對象，但究竟這些流杯建構與王羲之「曲水流觴」之間的關係為何，是本文亟欲了解的課題。而關於中國曲水流觴的發展歷史，在建築、園林領域已有不少討論，所涉及的部分包含流杯亭、自然水流等流杯建構之建造與發展狀況概述。例如，周維權的《中國古典園林史》是較早全面討論流觴發展的研究，此書雖非專論，但作者將流觴曲水散置於歷代的園林發展中，針對文獻整理及考古資料的配合考察，為讀者描繪出流觴發展之大的歷史輪廓。²⁰而王其亨、官崑則針對流杯溝至流杯亭的發展史做了精簡、扼要的梳理。透過這些研究，可了解早期的修禊活動多在自然水域中舉行，但宮廷中則發展出人工的流杯建構。²¹此外，傅晶〈魏晉南北朝園林史研究〉，主要針對六朝園林史中的曲水流觴進行討論，文中涉及的材料甚為豐富，但作者討論王羲之蘭亭會的影響認為王羲之之後「禊事更趨清淡雅致」，此說法過於籠統，且從史料中也難以證明。²²此文反映出學界往往將帝王修禊與王羲之蘭亭會等修禊活動一併視之、解釋，卻未進一步梳理自然水域之修禊活動與流杯建構中之修禊活動二者間的關係，這也是本文第二章亟欲釐清的問題。²³

人工流杯建構的建造，往往與「亭」相結合，故也關係到「亭」樣式的發展與改變。與「亭」相關的研究，如高鈺明、覃力及劉致平，均屬於較精簡的介紹，但張玲〈唐亭的文化透視——以唐代詩文為重點的考察〉，是透過詩文來重建唐亭的樣貌。透過其研究發現，唐代亭子的規模頗大，甚至可供留宿而有桌、床、暖爐等傢俱陳設。這樣的形式，與宋代之後常見之較小型的亭子十分不同。²⁴

²⁰ 周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0）。

²¹ 王其亨、官崑，〈寧壽宮花園點睛之筆：禊賞亭索隱〉，單士元、于倬雲主編，《中國紫禁城學會論文集》，第1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7），頁302-305。

²² 傅晶，〈魏晉南北朝園林史研究〉（天津：天津大學建築學院博士論文，2003），第三章第三節「園林文會之風與曲水流觴」，頁153-180，尤其頁173的討論。

²³ 相同的情形，如高莉芬二〇〇二年在國科會報告〈儀式與象徵：六朝詩歌中歲時節日分析及其民俗文化意涵研究〉中提到，「在六朝詩人的反覆建構下，蘭亭上巳之會成為文人雅集的代名詞」，此結論亦十分籠統，不瞭解此說緣由為何？見高莉芬，〈儀式與象徵：六朝詩歌中歲時節日分析及其民俗文化意涵研究〉（國科會報告，2002）。

²⁴ 關於「亭」的研究，見張渝新，〈中國古建「亭」的發展演變淺析〉，《四川文物》，2002年第3期，頁10-20；高鈺明、覃力，《中國古亭》（臺北：南天書局，1992），頁20-21；劉致平，《中國建築類型及結構》（臺北：尚林出版社，1984），頁60；張玲，〈唐亭的文化透視——以唐代詩

這些研究除幫助吾人對於流杯亭的發展有一概觀，同時可藉以思考傳李公麟《蘭亭修禊圖》中之「蘭亭」形象是否與唐代亭的發展有關。

此外，曲水流觴的水道由於要運載酒杯，製作時流速、彎轉等均須考慮，但中國方面的研究鮮少涉及水流速度、水渠寬度、高度等狀況，日本與韓國學界則可見到較多的討論。如蔣根植〈慶州 鮑石亭 流觴曲水에 관한 流體科學的 考察〉，從流體力學的角度來考慮流杯亭建造時出入水道高低、彎轉角度的設計等問題。²⁵這個理解，有助於本文對早期宮廷之所以發展出人工流杯建構之需求的判斷。

在「曲水流觴」的研究上，最值得注意的，是白鈴安（Nancy Berliner）對清宮「禊賞亭」及曲水流觴傳統的研究。他在文中指出，乾隆皇帝的「禊賞亭」除仿效王羲之的蘭亭會之外，也結合了早期帝王流杯聚宴的傳統，這個解釋與筆者對歷史上「曲水流觴」之發展的觀察大致相符。但他另外提到，宋代流杯亭的人工水道具有「規整對稱的特性」，這與想像中的蘭亭景觀並不相同，並認為其「刻板的造型」，可能是回應修禊的儀式起源，並非與文人悠遊林間水濱相呼應。²⁶白鈴安對流杯亭的解釋仍有商榷的空間，畢竟早期的修禊多於自然水域舉行，並不見得有「刻板的」流杯建構之使用。而王羲之等的修禊雖在自然水域邊舉行，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來看仍具有宗教意義，並非純然是文人的悠遊活動。因此流杯亭的設計，不能僅以回應修禊儀式起源來加以解釋。不論如何，白鈴安在「曲水流觴」之議題的思考上，仍是最具啟發性者，

二〇〇〇年以前，藝術史領域對於王羲之集會的相關研究，幾乎僅聚焦於《蘭亭序》法書之上，對於蘭亭圖繪，向來都是討論《蘭亭序》或蘭亭會時才附帶一提。在書法史的研究方面，對於《蘭亭序》真偽的懷疑，早在清代末年的李文田（1834-1895）已經提出。但一九六〇年代，由於南京出土了王、謝家族墓誌，郭若沫（1892-1978）於是撰文指《蘭亭序》為「偽作」，繼而引起中國之「蘭亭論辯」，這個論辯的發生實與文化大革命息息相關。²⁷一九八八年，滄浪書社鑑

文為重點的考察〉（西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09）。

²⁵ 蔣根植，〈慶州 鮑石亭 流觴曲水에 관한 流體科學的 考察〉，《美術資料》，46，頁 103-104；關野貞，〈西遊雜信 上〉，收入關野博士紀念事業會編，《支那の建築と藝術》（東京：岩波書店，1939），頁 675-678；常盤大定，〈崇福宮泛觴亭解說〉，常盤大定、關野貞，《支那文化史蹟·解說》，第 5 卷（京都：法藏館，1941），頁 14-15；Yanchuan He（何炎泉），“The Winding Stream Banquet, Kyokusuien, in the Heian Period Garden,” pp. 1-15（未刊稿）。

²⁶ 白鈴安（Nancy Berliner）作，李紹毅譯，〈園林，曲水與書法〉，《紫禁城》，第 200 期（2011.9），頁 23。全文為頁 20-26。

²⁷ 文物出版社編，《蘭亭論辯》（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蘭亭論辯」事，另見劉濤，〈彭殤

於時隔三十年，學界對《蘭亭序》的研究已有新的進展，並考慮「蘭亭」成為東亞之共有的文化現象，因此在一九九九年舉辦了「蘭亭會議」，於二〇〇〇年出版了《蘭亭論集》，此論集尤以「下篇」值得注意。²⁸下篇中，如李慧聞、白謙慎之文，主要討論《蘭亭序》對明、清書家之作用。²⁹而曹寶麟〈《集王聖教》與《神龍蘭亭》之比勘〉，則可令吾人可重新思考王羲之書風與《蘭亭序》的風格問題。³⁰根據曹寶麟的比勘，似乎顯示《蘭亭序》書風不若《集王聖教序》之表現。此意見令筆者聯想到郭沫若、祁小春等對於《蘭亭序》書蹟非出自王羲之筆下的討論。祁小春在《邁世之風：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第四章，透過《蘭亭序》文章版本、流傳史料考證加以比對，試圖從文獻學的角度釐清此文為後人所造的問題。³¹祁小春與郭沫若的立場一致，祁文也未有新資料可供飲用來證明《蘭亭序》為後人所偽，因此論基本上未有新意。但祁小春與曹寶麟二文的意見，令筆者考慮到王羲之蘭亭會究竟於何時開始成為歷史典範的問題。然而，不論《蘭亭序》書蹟是否真出自王羲之，《蘭亭序》書蹟在書法史上的影響與地位卻是無庸置疑，不容抹滅的。

另外，因《蘭亭序》的影響廣大，宋代之後即可見到多種《蘭亭序》的版本，對《蘭亭序》版本的興趣與研究，也一直存在於歷史之中，甚至有「蘭亭學」之稱。對於《蘭亭序》的研究，可參考徐邦達、王連起及宋一梅的文章。其中，王連起的文章是針對現存《蘭亭序》各版本的狀況與版本比較與品質，提供一個全面的說明。而宋一梅則是從宋人對《蘭亭序》之收藏、研究的意見，來討論《蘭亭序》對宋代帖學發展的作用。³²

相較於《蘭亭序》在學界所受到的廣泛重視，蘭亭圖的研究相對少量。造成

可齊——王羲之與《蘭亭序》，收入陳變君主編，《蘭亭》（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102-105。

²⁸ 華人德、白謙慎主編，《蘭亭論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

²⁹ 李慧聞，〈董其昌所見所評唐臨摹本《蘭亭序》及其1618年贈人的一本《蘭亭》：關於鑑定學的一項個案研究〉；白謙慎，〈從八大山人臨《蘭亭序》論明末清初書法中的臨書觀念〉，收入華人德、白謙慎主編，《蘭亭論集》，頁430-461；462-472。

³⁰ 曹寶麟，〈《集王聖教》與《神龍蘭亭》之比勘〉，收入華人德、白謙慎主編，《蘭亭論集》，頁376-392。

³¹ 祁小春，《邁世之風：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頁251-330。

³² 徐邦達，〈王羲之《蘭亭序》臨本前後七種合考（一～六）〉，《書譜》，第44期（1982），頁66-75；第45期（1982），頁76-80；第46期（1982），頁66-71；第47期（1982），頁68-71；第48期（1982），頁76-80；第49期（1982），頁66-71；王連起，〈關於《蘭亭序》的若干問題〉，《書法叢刊》，第129期（2012），頁18-96；陳一梅，《宋人關於《蘭亭序》的收藏與研究》（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1）。

蘭亭圖較不受重視的最主要的原因，筆者認為可能由於常見的蘭亭圖大抵以傳李公麟《蘭亭修禊圖》為底本製作，外觀予人千篇一律之感，且多非出自名家手筆，故過去未在學界引起太多關注。若大致區分的話，蘭亭圖可粗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傳李公麟《蘭亭修禊圖》的相關拓本，目前所見最早的拓本均為明代製作；第二類為畫家手繪的蘭亭圖。畫家手繪蘭亭圖若依圖式、構圖來看，也可再區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忠實以傳李本為稿繪製，第二類是則由畫家自創的新構圖，第三類則是以第一類為底稿，另作調整者。關於拓本的部分，袁玉紅在一九九八年所發表的〈北京圖書館藏《蘭亭圖》拓本淺說〉，似乎是較早針對北京圖書館收藏之兩件蘭亭圖拓本的報導。一件為明代藩王製作的拓本，另一件為乾隆四十六年（1781），乾隆皇帝命人重摹明代拓本重刻者。³³之後雖然還有一些針對傳李公麟《蘭亭修禊圖》拓本的討論，但並未有太多新的意見。³⁴針對明代藩王製作之蘭亭圖拓本的研究工作，直到二〇〇七年王禕的〈明代藩府刻《蘭亭圖》卷及其變遷〉，才有更進一步的成果。王禕的研究主要是考訂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四種蘭亭圖拓本，分別為明代藩王製作的拓本三種及乾隆皇帝所製作者一種。此文對於這幾件拓本的考訂十分仔細，有助於學界了解傳李公麟《蘭亭修禊圖》在明代的製作狀況。³⁵此外，二〇〇四年五月，中國嘉德春季拍賣會，拍出了《欽定補刻明代端石蘭亭圖帖緯絲全卷》，此卷為乾隆皇帝以清宮重摹明代拓本所製作之蘭亭圖為底本的製作。二〇〇五年張瓊，〈《欽定補刻端石蘭亭圖緯絲》全卷考略〉一文，即討論了緯絲的製作技術及《欽定補刻端石蘭亭圖緯絲》全卷的製造工藝。³⁶張瓊根據史料判斷，認為此卷應以清內府所藏《補刻明代端石蘭亭圖帖》為底本織造，製作年代可能始於乾隆晚期，但依其裝裱形式、印章、製作品質優劣不均等細節判斷，推測此緯絲可能完成於嘉慶初年。大抵而言，上述研究主要以拓本為對象，版本考訂與版本間關係的釐清是主要研究重點，對於這些拓本與繪畫或集會之間的關係並未述及。但這些文章仍別具意義，畢竟過去學界並不清楚這些《蘭亭圖》拓本之間的關係。

二〇〇六年衣若芬所撰寫的〈俯仰之間——《蘭亭修禊圖》及其題跋初探〉，

³³ 袁玉紅，〈北京圖書館藏《蘭亭圖》拓本淺說〉，《北京圖書館館刊》，1998年第1期，頁94-96、60

³⁴ 如郭其程、普伍勝，〈乾隆時期刻石《蘭亭圖》拓本的內容與價值〉，《圖書與情報》，2001年第4期，頁80-81

³⁵ 王禕，〈明代藩府刻《蘭亭圖》卷及其變遷〉，《故宮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4期，頁142-155。

³⁶ 張瓊，〈《欽定補刻端石蘭亭圖緯絲》全卷考略：兼析清高宗時期的緯絲書法〉，《中國歷史文物》，2005年第6期，頁36-43。

可說是第一篇針對畫家手繪之《蘭亭圖》進行分析討論的文章。³⁷本文資料蒐羅廣博，並對蘭亭圖之圖繪與題跋內容加以分析，對於圖像的觀察也有提出前人未注意之處。如作者討論傳李公麟《蘭亭修禊圖》時，透過畫面觀察，提出王獻之參與蘭亭會時為幼童，但傳李本上所呈現的卻為成人形象等問題。固本文可說為蘭亭圖的研究奠定了一個初步基礎。之後，二〇一一年，由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舉辦的蘭亭大展所出版的《二零一一年蘭亭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有宋后楣、板倉聖哲、陳韻如、陶喻之、鍋島稻子、龜田和子等多篇與蘭亭繪畫相關的研究。³⁸這些論文分別處理了宋代、明代與清代的蘭亭圖，這些蘭亭圖大多是以傳李公麟《蘭亭修禊圖》為本所繪之作，但如宋后楣所研究的卓迪〈修禊圖〉或陳韻如文後所舉傳趙孟頫、文徵明之《蘭亭修禊圖》，則見創新之蘭亭圖式的使用。陳韻如研究，特別提出宋代已經出現三種蘭亭相關的圖繪形式，分別為「蕭翼賺蘭亭」故事、「蘭亭修禊」主題，以及，以山水景觀為發揮的作品。這個觀察，為日後蘭亭圖研究指出了一個方向。而板倉聖哲的研究，包含他的日文發表〈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蘭亭曲水宴図像の展開〉，主要處理中、日之「王羲之」典型相關的畫作與蘭亭主題的圖象（如《蕭翼賺蘭亭圖》與《蘭亭修禊圖》等），以及日本方面之蘭亭曲水宴圖象的表現。其研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指出在日本的非蘭亭主題繪畫中，也可見到對蘭亭圖式之援引，甚至探幽縮圖中也保留了中國之蘭亭圖的圖像。此外，鍋島稻子、龜田和子兩篇文章，分別針對一九一三年中、日兩地所舉辦之蘭亭紀念會，與德川幕府時期不同階層、派別的畫家如何透過蘭亭圖繪展現相異的政治目，進行討論。龜田和子另有與此相同主題之博士論文於同年發表。除《二零一一年蘭亭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的多篇研究之外，同年還有王鈴雅針對明代米萬鍾「勺園」相關之兩件修禊圖的碩士論文。³⁹故二〇一一

³⁷ 衣若芬，〈俯仰之間——《蘭亭修禊圖》及其題跋初探〉，《中國學術》，第 24 期（2006），頁 69-106。

³⁸ 故宮博物院編，《二零一一年蘭亭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所收錄的論文：陶喻之，〈歷代蘭亭圖刻帖源流考——以疑似翻刻南宋《鳳墅〈蘭亭圖〉》為主〉，頁 180-206；陳韻如，〈蘭亭修禊圖式的發源與演變——以臺北故宮藏品為中心〉，頁 214-226；宋后楣，〈卓迪與他的修禊圖〉，頁 227-232；板倉聖哲，〈東亞蘭亭曲水宴圖像之開展〉，頁 238-247；鍋島稻子，〈一九一三年蘭亭紀念會雜考〉，頁 115-119；龜田和子，〈《蘭亭圖》作為德川幕府時期（1615-1868）日本人對中國憧憬的象徵〉，頁 248-254。另外，板倉聖哲，〈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蘭亭曲水宴図像の展開〉，《美術史論叢》，第 29 期（2013），頁 1-25，在蘭亭圖象之調整及其與他類題材之結合的討論，極具參考價值。龜田和子研究另可參閱其博士論文，Kazuko Kameda-Madar, "Pictures of Social Networks: Transforming Visu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Orchid Pavilion Gathering in the Tokugawa Period (1615-1868)" (PhD diss.,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011).

³⁹ 王鈴雅，〈勺園與米萬鍾文化形象的形塑：《勺園圖》相關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

年可說是蘭亭圖繪研究產出極為豐盛的一年，至此時，學界對蘭亭圖的研究比起過去可說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不僅跨出只討論傳李公麟本的界線之外，也將視角擴及東亞之蘭亭圖的探討。⁴⁰

至於與此研討會配合辦理之北京故宮博物院的「蘭亭特展」，在展出蘭亭相關繪畫、書蹟之外，並有清宮中的蘭亭文物一同展出。過去，在中國的展出脈絡中，蘭亭文物向來不是蘭亭展的重點（詳見本文第六章討論）。而「蘭亭特展」多元並置各種文物的展出方式，尤其大量之清宮蘭亭藏品、工藝製品的公開，除打開吾人對蘭亭文化的視野，同時開啟了另一個與王羲之蘭亭會對話的可能。此次的展覽圖錄中，也有針對清代蘭亭工藝的討論及圖說，有助於吾人對這批清宮蘭亭文物有一基本瞭解。⁴¹雖然如此，這些研究甚少論及蘭亭文物製作與集會舉辦之間的關聯性，在這些研究中，文物多被放在文物本身的發展脈絡來檢視，而甚少從其可能作為一個集會紀念物的角度來思考。

除了藝術史之外，文學領域也參與了蘭亭傳統的討論。比較重要的著作，如鄭毓瑜探討王羲之〈蘭亭序〉文章和參與者詩文所體現之寓意；衣若芬討論了蘭亭圖之題跋所體現的幾個意涵；祁小春的研究則如前述是就《蘭亭序》文章表現與文獻記載狀況為討論焦點。⁴²此外，與王羲之本人及其蘭亭會舉辦作為焦點的討論雖然為數眾多，但多數是泛泛之談，其中以日本學界的成果值得注意。如石川忠久針對王羲之及其蘭亭會的討論，及森野繁夫對王羲之個人的研究等，均可幫助吾人對王羲之個人及蘭亭會舉辦當時之社會、政治狀況有一認識。⁴³這些研究大抵透過史料爬梳，藉由對當時政治背景的了解，試圖重建王羲之當年舉辦蘭亭會的原因及內容，並討論其交遊。

雖然本文處理的對象主要是清代續蘭亭會，但王羲之的重要性一直到唐初才被確立。因此，瞭解唐代帝王、文人對集會的興趣，甚至整體文人文化的發展，對於評估王羲之及其蘭亭會在唐代的地位，有其必要性。與唐代文人世界相關的

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⁴⁰ 日本學界對於日人畫家之蘭亭主題的畫作，已有相當成果，由於本文主要討論中國蘭亭圖研究狀況，故未特別針對日本的研究成果進行說明。

⁴¹ 故宮博物院編，《蘭亭圖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

⁴² 鄭毓瑜，〈由修禊事論蘭亭詩、蘭亭序「達」與「未達」的意義〉，《漢學研究》，第12卷第1期（1994.6），頁251-273；衣若芬，〈俯仰之間——《蘭亭修禊圖》及其題跋初探〉，《中國學術》，第24期（2006），頁78-106；祁小春，〈邁世之風：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第四章「蘭亭序問題——從文獻學的角度重新考察」，頁252-330。

⁴³ 石川忠久，〈王羲之と蘭亭の遊〉，《陶淵明とその時代》（東京：研文出版，1994）；森野繁夫，〈王羲之傳論〉（東京：白帝社，1997）。

研究，主要涉及唐代文人集會、科舉與集會中之詩文創作等討論，可參考池田溫、賈晉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傅璇琮、陳弱水、赤井益久等人研究。⁴⁴ 這些研究雖未直接討論唐代的續蘭亭會，但所涉及之唐代科舉或相關制度的發展，與文人交遊、集會大盛之間互相作用的討論，對本文了解唐代蘭亭文化之發展背景甚有幫助。此外，過去有論者將唐代曲江畔集會與續蘭亭會一併視之，透過余淑娟〈唐代曲江詩空間意涵研究〉，為唐代宮廷內、外在曲江集會提供了一個較深入的描繪，可藉以釐清唐時雖然在曲江岸舉行了很多雅集，如進士宴、修禊宴等，但這些集會的參與者、時間與目標都有不同的重點。透過曲江雅集的舉辦，可了解唐代帝王與文士如何藉由集會互動，促成文藝的高度發展。⁴⁵ 另外，唐代設有「上巳節」，其源起與辦理狀況，張勃《唐代節日研究》一書有詳細說明。⁴⁶ 上巳日成為一個國家「節日」，顯示此時對「上巳日」的關注程度比起從前提高許多，這樣的轉變，是否也說明著唐代續蘭亭會在唐代所受到的重視不同以往。除了對唐代文人世界、政治狀況的了解之外，唐太宗對王羲之之書史地位的建立具有關鍵作用，這在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一九八〇年的研究中，已有精闢的探討。⁴⁷ 總之，上述研究成果對於唐代文人文化的討論與對王羲之書法的觀點，可令本文對王羲之蘭亭會成為雅集典範與唐代續蘭亭會之舉辦的研究，有一評估基礎。

本文關於清代宮廷內部續蘭亭會的討論，將論及避暑山莊與圓明園中的流杯建構。對於清代避暑山莊，在學界一直有不少討論，如戴逸主編，《清史研究與

⁴⁴ 相關研究如池田溫著，孫曉林等譯，《唐研究論文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賈晉華，《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賈晉華譯，《初唐詩（*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陳弱水（Jo-shui Chen）著，郭英劍、徐承向譯，《柳宗元與唐代思想變遷（*Liu Tsung-yü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 773-819*）》（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10）；赤井益久，《中唐詩壇の研究》（東京：創文社，2004）；。

⁴⁵ 余淑娟，〈唐代曲江詩空間意涵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⁴⁶ 張勃，《唐代節日研究》（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13）。

⁴⁷ 雷德侯教授此文討論帝王的宮廷收藏在形塑藝術史的進程上所起的作用，並以唐太宗的書法收藏為其中一例，來討論宮廷藝術收藏作為政治工具的使用。見 Lothar Ledderose,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Imperial Art Collection in China," in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 43 (1978-79), pp. 33-46. 另可參見 Lothar Ledderose, "Chinese Calligraphy: Its Aesthetic Dimension and Social Function," *Orientalism*, 17:10 (1986.10), pp. 38-40; 神田喜一郎著，戴蘭村譯，〈中國書道史 7 隋·唐一〉，《書道全集 第 7 卷 隋·唐 I》（臺北：大陸書店，1989），頁 7-8；外山軍治著，戴蘭村譯，〈唐太宗與昭陵諸碑〉，《書道全集 第 7 卷 隋·唐 I》，頁 21-26。王獻之書風在南朝宋、齊二朝獲得很高的評價，至梁武帝之後，才開始稱揚王羲之、貶抑王獻之。見劉濤，〈王羲之與王獻之〉，收入劉濤主編，《中國書法全集·18·三國兩晉南北朝編》（北京：榮寶齋，1991），頁 21-22。

避暑山莊》即收入許多相關文章。⁴⁸這些文章大抵是針對史料爬梳說明避暑山莊的基本問題，或者就今日所見避暑山莊建設進行研究。但自「新清史」角度的提出，對於避暑山莊的研究有了與過去不同的角度。如二〇〇〇年所出版 Philippe Forêt 的 *Mapping Chengde: The Qing Landscape Enterprise*, 此書主要針對承德之歷史事件及其意義加以探討，並對承德包融多方景觀之文化狀況進行討論。之後，Cary Y. Liu 亦將其研究基礎放到「滿人統治」的大框架中，將避暑山莊放入「統治」系統中來看，而採「彙整 (Archiving)」之說法來闡釋避暑山莊中的多元景觀。至於二〇一一年 Stephen Hart Whiteman 的博士論文 “Creating the Kangxi Landscape: Bishu shanzhuang and the Mediation of Qing Imperial Identity,” 是以康熙時期之避暑山莊為研究對象，主要透過避暑山莊之建設來探討康熙早、晚期避暑山莊作用之異。相關研究另可參見馬雅貞對康熙《御製避暑山莊詩》的研究。⁴⁹

關於圓明園的研究，於中國學界亦累積了多年成果，近年比較重要的成果是新史料的出現及田野考察材料的出版。這些研究中筆者所特重者，是與流杯建構相關之討論。如端木泓所發現之〈1704 圓明園全圖〉，為記錄乾隆至道光年間圓明園整建變化的重要材料。郭黛姮帶領清華大學建築學院，針對圓明園建築、造景之歷史淵源與變遷進行探討，尤其書中對於圓明園流杯建構的考察，兼及文獻與實物考察，書中有許多田野資料與文獻發表，對本研究助益良多。⁵⁰而郭黛姮、賀艷，《圓明園的“記憶遺產”——樣式房圖檔》一書，則為這些流杯建構提供了更直接的一手史料與基礎研究成果。⁵¹此外，一直以來，對於圓明園中之「蘭亭八柱」的研究並不多見，早期楊宗榮、周紹良兩文介紹性質濃厚，但為「蘭亭八柱」提供了基本資料，讓後人得以繼續研究。⁵²此後直到二〇一一年，袁玉紅，〈國家圖書館藏《蘭亭八柱帖》之考析〉，提供了「蘭亭八柱」石柱拓本的新材

⁴⁸ 戴逸主編，《清史研究與避暑山莊》（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5）；另如張羽新，《避暑山莊的造園藝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等。

⁴⁹ Philippe Forêt, *Mapping Chengde: The Qing Landscape Enterpri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劉怡瑋 (Cary Y. Liu), “Archive of Power: The Qing Dynasty Imperial Garden-Palace at Rehe,” 《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28 期（2010），頁 43-66; Stephen Hart Whiteman, “Creating the Kangxi Landscape: Bishu shanzhuang and the Mediation of Qing Imperial Identity.” 馬雅貞，〈皇苑圖繪的新典範：康熙《御製避暑山莊詩》的製作及其意義〉，《故宮學術季刊》，第 32 卷第 2 期（2014 冬），頁 39-80。

⁵⁰ 端木泓，〈圓明園新證——乾隆朝圓明園全圖的發現與研究〉，頁 22-36；郭黛姮，《遠逝的輝煌：圓明園建築園林研究與保護》。

⁵¹ 郭黛姮、賀艷，《圓明園的“記憶遺產”——樣式房圖檔》（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⁵² 楊宗榮，〈蘭亭八柱帖〉，《文物參考資料》，1957 年第 1 期，頁 28；周紹良，〈蘭亭八柱近況〉，《書譜》，1979 年第 6 期，頁 40-41。

料，才讓此「八柱」的狀況有了稍進一步的了解。⁵³但截至目前為止，學界尚見對圓明園「蘭亭八柱」之製作討論的研究成果。

大抵而言，學界對於避暑山莊、圓明園這類大型園林的研究，除提供許多史料整理、田野調查的成果，也試圖將之視為一個整體進行解釋。但這些解釋並未就清宮之流杯亭、「蘭亭八柱」等蘭亭文化空間的建造，提出合理的說明。

本研究除了清代宮廷內部的續蘭亭會之外，宮廷外部的部分主要是關懷清代文人社群之續蘭亭會的發展。學界對於清代文人社群之續蘭亭會的討論，多散見於社群研究或雅集參與者之個別研究中。如康熙年間王士禛（1634-1711）、冒襄（1611-1693）之修禊活動可見李孝悌研究。⁵⁴乾隆年間劉錫嘏（乾隆三十四年〔1769〕進士）在武昌借園的上巳修禊會，有陳雅飛的系列討論。⁵⁵嘉慶年間曾燠（1759-1831）在廣州長壽寺的修禊會，可參見姜伯勤、李若晴研究。⁵⁶道光年間黃爵滋（1793-1853）主持之「江亭展禊」，則有新村容子的研究。⁵⁷十九世紀北京「顧祠修禊」，有王汎森與魏泉的研究。⁵⁸綜觀上述研究論及續蘭亭會之處，多側重於史料耙梳及學術風尚、時局變異等分析，但對於修禊集會本身之內容、行事則討論不多，甚至僅在該研究中佔一小篇幅。即使是藝術史領域的研究，在集會紀念品的風格表現之外，並未探討「紀念物」製作與集會之間的關係與作用。

除了以上所見，對中國各領域之蘭亭表現的研究之外，韓國與日本學者也有針對當地流杯建構、王羲之書蹟、蘭亭圖繪等方面的探討。尤其日本學界對於王羲之及其對日本所產生之各方影響，討論十分豐富，但針對集會本身的研究則顯得十分有限。韓國方面如柳玉暉發表於一九九七年的論文，是針對朝鮮宮廷畫員劉淑（1827-1873），在一八五三年為中人群體之續蘭亭會所畫的《修禊圖卷》進

⁵³ 袁玉紅，〈國家圖書館藏《蘭亭八柱帖》之考析〉，《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1年第2期，頁59-61。

⁵⁴ 李孝悌，〈冒辟疆與水繪園中的遺民世界〉、〈士大夫的逸樂：王士禛在揚州（1660-1665）〉，收入氏著，《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頁81-134、159-200。

⁵⁵ 陳雅飛，〈畢沅幕府書家群概論〉，頁28-37。

⁵⁶ 姜伯勤，〈清代長壽寺園林雅集與廣府文化及琴道：《曾賓谷先生長壽寺后池修禊圖》初探〉，《廣州文博》（2007），頁12-30；李若晴，〈山門流轉一滄桑——《曾賓谷長壽寺修禊圖》遞藏考〉，《新美術》，2011年第6期，頁43-52。

⁵⁷ 新村容子，〈1820-30年代北京の士大夫交流（4）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四日「江亭展禊」を中心として〉，《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第55期（2011.7），頁45-65。

⁵⁸ 王汎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國史儒林傳》與道光年間顧祠祭的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9本第1分（2008.3），頁63-93；魏泉，〈士林交游與風氣變遷：19世紀宣南的文人群體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魏泉，〈“顧祠修禊”與“道咸以降之學新”——十九世紀宣南士風與經世致用學風的興起〉，《清史研究》，2003年1月，頁69-79。

行研究。⁵⁹韓國二〇一六年《미술 속 도시, 도시 속 미술 (美術中之都市, 都市中之美術)》特展圖錄, 亦有數篇針對《修禊圖卷》的基礎研究可供參考。⁶⁰這幾個研究對於集會舉辦、參與者身分及圖象均有處理, 但對於圖象表現與中國蘭亭傳統之間的關係, 尚值得進一步考慮。至於一九一三於日本、中國二地所舉辦之蘭亭紀念會, 則有相關報導、研究及圖錄可幫助瞭解。⁶¹但這些討論基本上是立基於二十世紀初的中日交流史角度來檢視, 並非從蘭亭史的視角來觀察。

透過上述針對蘭亭傳統各領域研究的回顧, 可發現這些與王羲之蘭亭會及續蘭亭會相關的研究, 根據各學科的關懷, 將這些其中可能原本為某一集會所製造的物品, 切割到各領域進行研究。這樣的研究方法與知識累積確實有其必要, 但若以整個集會的進行來考慮這些研究的時候, 同時也顯得片段, 完全無法感受到這些文物製作或流杯建構, 是為了集會的需求而產生。誠然, 上述研究中有不少個例不見得出自某個續蘭亭會, 這一類的作品研究即不須從集會的角度來考慮。但由於筆者希望從整體集會的角度與「紀念物」之製作, 來考察後世續蘭亭會的表現, 以及這些表現是否參與、調整了既有之蘭亭傳統的那些部分, 以其重新了解蘭亭傳統在清代發展上的重要意義, 因此上述分屬各學科的研究成果, 即成為本文綜合理解清代續蘭亭會的基礎。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論文採「塑造群體」的角度來研究清代續蘭亭會, 主要是受到布赫迪厄社會學理論的啟發。⁶²布赫迪厄的論文有其主要的處理對象, 但其中論及文化品味與社會階層之間的關係, 以及階層慣習、教育等如何形成及如何作用的部分, 促使筆者重新思考王羲之蘭亭會之所以為後世熱愛的根本原因, 應是與其透過「紀

⁵⁹ 柳玉暻 (유옥경), 〈蕙山 劉淑의 〈修禊圖卷〉 研究〉, 頁 50-81; 〈修禊圖圖說〉, 收入 장진아、전혜은編, 《미술 속 도시, 도시 속 미술》, 頁 150-154。

⁶⁰ 〈결속의 미술〉、〈修禊圖〉圖說, 收入 장진아、전혜은編, 《미술 속 도시, 도시 속 미술》 (首爾: 國立中央博物館, 2016), 頁 150-154; 장진아, 〈修禊圖〉圖說, 收入同書, 頁 334。

⁶¹ 相關材料及研究如陶德民編, 《大正癸丑蘭亭會への懷古と繼承: 関西大学図書館内藤文庫所藏品を中心に》 (吹田: 関西大学東西學術研究所, 2013); 昭和蘭亭紀念會編, 《昭和蘭亭紀念展》; 陳振濂, 〈“蘭亭會”在中國與日本·1913〉、〈“蘭亭會”在中國與日本·1913 (續)〉, 收入氏著, 《維新: 近代日本藝術觀念的變遷——近代中日藝術史實比較研究》, 頁 150-153、154-157。

⁶² 本文所使用之相關研究, 參閱註 7。雖然筆者參考了布赫迪厄的法文翻譯著作, 但對於布赫迪厄理論的理解, 有不少都是透過朋尼維茲《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而來。

念物」之製作，可有效發揮「塑造群體」之功能性有關。

如同朋尼維茲歸納布赫迪厄對於攝影的研究曾經提到的：

一個所有人都可以從事的嗜好〔此指攝影〕，可以有不同的運用及不同的再現。……，不同的社群會賦予攝影這一文化實踐完全不同的價值及意義，並藉此表現他們的不同（區別）。從不從事攝影，以及攝影有甚麼意義，這些都可以顯示與他人的不同之處。⁶³



本文研究，即可說是在這個理解基礎上，開始反思清代續蘭亭會的運作。舉辦續蘭亭會者的身分，有宮廷中的滿州帝王，也有地方的父母官或官居正二品的總督等，他們在整個社會結構中各自屬於不同的社會階層，即使他們都參與了續蘭亭會的舉辦，卻有不同的作法。這個不同的作法及選擇，在蘭亭傳統上也產生了不同的價值及意義。透過這些不同之價值與意義的發生，即可作為這些續蘭亭會參與者與他者之間的區別。

如本文所討論之宮廷內、外的幾個個案，康熙皇帝選擇建造獨特樣式的「天趣蘭亭」流杯亭，乾隆皇帝選擇恢復漢式流杯亭樣式的作法，分別可見其選擇「要從事」與「不從事」的內容與意義。而如本文討論紹興知府李亨特選擇以當時流行之雅集圖繪，來修改傳李公麟《蘭亭修禊圖》圖式，作為描繪他自身所舉辦之續蘭亭會的《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以及劉錫嘏的《借園修禊圖》以拖尾的拓本詩跋，來標榜自身團體對於金石學術的權威性等，亦可見他們透過選擇「要從事」與「不從事」的「紀念物」製作，來區別自身與他者。透過這些個案藉由續蘭亭會的舉辦來塑造群體、鞏固群體的操作，反映出續蘭亭會作為一種文化活動，在不同社會階層間的運作狀態。

除了布赫迪厄社會學理論對本研究的啟發之外，由於本文所處理的對象是以「集會」的組織、活動作為統合，因此討論的範圍跨及園林建築、繪畫、器物等各領域，項目繁多。在個案討論上雖期待以實物觀察、風格分析作為起點，但如清代宮廷所建造之流杯亭，有的現已不存、有的經過整修，往往由於整修的細節並未公布，造成研究上的困難，不易重建。⁶⁴雖然本文所討論之建築實物有此限

⁶³ 朋尼維茲著，孫智綺譯，林志明、尉遲秀校訂，《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頁 136。朋尼維茲此處的說法，是針對布赫迪厄《一種平凡的藝術（*Un art moyen*）》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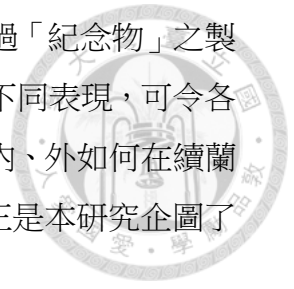
⁶⁴ 本文所討論之流杯建構（如北京潭柘寺流杯亭、避暑山莊「香遠益清亭」等），是否曾經過重

制，但因本文著眼於這些流杯建構如何被建造成這個樣式，並討論其可能的使用方法，故除透過田野調查了解建築實物現今面貌之外，還將參酌方志與當時的文獻史料加以輔助，以補充實物重建和歷時久遠的困難。此外，本文對宮廷內、外之流杯建構的研究，主要為回應續蘭亭會之「場地」選擇、活動安排的提問，故以流杯建構本身為目標，希望藉以了解續蘭亭會如何在此建構上進行活動，釐清該建構及相關活動在蘭亭傳統中的意義，而無意擴及其所處之整體園林或建築群的建造規劃討論、意義追究。同時如前文所述，許多目前的園林研究（如避暑山莊等），在未針對所有「組成單元」進行討論分析之前，即提出一個大架構試圖涵蓋、詮釋此園林建造的背後意義，這樣的作法可說只提供了一個巨大的假設，其基礎並不穩固。但若從王羲之蘭亭會之發展脈絡來考慮清代宮廷的多處流杯建構，則可讓吾人得以具體透過現存遺址及文獻，來進一步回顧、瞭解宮廷修禊雅集的傳統及其在十七、十八世紀的發展與改變。亦即對於流杯建構作為中國宮廷傳統的文化空間，在滿州宮廷如何被看待與使用，確實值得深究，此不僅有助於吾人重新思考王羲之蘭亭會（或所謂文人文化）在宮廷宴集裡如何作用，亦可協助吾人了解清代宮廷對蘭亭會傳統的理解與詮釋。此外，由於本研究聚焦於「集會」本身，因此雖然文中也將討論「蘭亭圖」，但僅以描繪實際續蘭亭會的蘭亭圖為討論對象，至於歷代蘭亭圖的發展歷史並非本文重點，故僅在需要時略作補充，不作深度整理。至於現今所留存之傳李公麟《蘭亭修禊圖》有多種石刻版本，本文討論所用之附圖，盡量使用目前所可見到之最早的明代版本。但由於明代版本不見得有刊登討論所需之細節，故筆者也會斟酌採用其他經筆者比較過，與明版屬同一系統之傳李公麟本作為本文討論比較使用。

至於清代宮廷之外的續蘭亭會，由李亨特、劉錫嘏等主導之集會所發展出值得觀察的新現象，是本文的研究重點。預期此部分之研究成果，除可與清代幕府研究進行對話之外，亦可修正過去對文人舉辦之續蘭亭會無甚新意的印象，並從中發掘其獨具之時代意義。同時也必須考慮，所有的雅集或多或少均帶有塑造群體的功能，在此情況下，為何續蘭亭會是本文所強調的重點，而非「西園雅集」、「壽蘇會」等其他集會？關於這個部分，以及對本文個案的整體評述，將在結論中詳加討論。

建、修復，若有修復其細節狀況等，僅有甚少（甚至於無）資料可供參考。比方田野調查中發現，避暑山莊「香遠益清」、「曲水荷香」兩座流杯亭並未特別圍圍、准予遊客進入，對照於紫禁城之「禊賞亭」明確禁止遊客進入的狀態，令筆者懷疑避暑山莊兩座流杯亭可能都曾經整修。但究竟是否整修、整修的狀況大致如何，不僅現場說明牌未加註明，相關研究亦無討論。

總而言之，筆者認為承繼自王羲之的續蘭亭會之舉辦，透過「紀念物」之製作，可有助於該群體之形象建立與文化操作。藉由文化操作的不同表現，可令各群體自我標榜，同時也產生與他者相互區別的作用。清代宮廷內、外如何在續蘭亭會上展示其文化操作，顯現其在蘭亭傳統發展上的重要性，正是本研究企圖了解的內容。





第二章| 王羲之蘭亭會作為「雅集」典範的確立



王羲之〈蘭亭序〉起始即言：「永和九年（353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¹此次集會目的，原是為了農曆三月之修禊活動而來。雖然修禊原即具有濃厚的宗教性質，但此集會在後代卻以作為文人風雅之雅集典範而深受重視，甚至影響及東亞韓、日二國。尤其王羲之蘭亭會因予人以「群體風流」的印象，這個印象，致使後代續蘭亭會追隨者，往往在追其風雅之外，也嚮往其「群體」意象。雖說王羲之蘭亭會作為文人雅集之典範，但綜觀歷代修禊集會的空間與活動，將發現後代續蘭亭會的舉辦，不見得與王羲之等列坐於山水間之曲水旁，執競詩罰酒、書法創作等事全然相同。以空間而言，如唐代白居易（772-846）與清代紅橋修禊有乘船遊覽，清代宮廷中的流杯亭則是於水臺盤上開鑿水道以行杯，縱使方式與王羲之蘭亭會不同，因修禊儀式必須臨水為之，故追繼王羲之蘭亭會而來的續蘭亭會，在舉辦場所的挑選上也必須臨水，並以戶外空間為主要活動場域。至於活動內容，後世的續蘭亭會往往也未必與王羲之蘭亭會全然一致，大抵多由王羲之蘭亭會中汲取部分活動為之。

過去學界對於續蘭亭會的研究，均未明確指出續蘭亭會與其所追隨之王羲之蘭亭會之間的異同，以及所追仿的究竟是甚麼內容，以至於吾人並不容易掌握王羲之之後的續蘭亭會在蘭亭史上的流變與意義。例如續蘭亭會的舉辦空間，為何可於自然山水之間，亦可在私家園林的流杯亭中，究竟此二種空間都是源自王羲之蘭亭會？或有其他來源？二者的意義又是否相同？關於空間的疑問過去一直未見解決，而過去論者也大抵認為多數續蘭亭會的活動與一般雅集差異不大，故續蘭亭會似乎徒留一個歷史名稱而無實質內涵，且難以看出時代的差異。確實，多數的續蘭亭會是如此，但是否仍有一些續蘭亭會，一方面追仿王羲之，同時融入時代特色，轉化成具有時代意義的續蘭亭會呢？

由於本研究希望釐清清代初中期之續蘭亭會的舉辦，究竟依循了王羲之蘭亭會的那些部分？是否有超出前人或轉折性的調整之處？據此，方可能進一步評估這些續蘭亭會在蘭亭史上的發展與意義。因此，本章擬先就王羲之之前的修禊儀式與活動方式進行瞭解，在此基礎上，除可理解王羲之蘭亭會的活動淵源，也纔

¹ 房玄齡等撰，《晉書》，卷八十（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540。此段文字與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引〈臨河序〉文字相同，見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等整理，《世說新語箋疏（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 630。

可能進一步討論王羲之蘭亭會何時、為什麼被確立為雅集活動之典範，以作為後面章節的評估基礎。



第一節 溯源：王羲之「蘭亭會」前之修禊活動與修禊場所

1 所謂「修禊」

王羲之蘭亭會原為修禊而舉，修禊一事並非王羲之所創，但在王羲之之前的面貌如何，是本節所欲處理的重點。「修禊」又有「祓禊」、「祓除」、「禊祭」、「禊祠」等稱，是古時臨水潔除不祥的一種儀式，此儀式一般在農曆三月上巳日（三月第一個巳日，又稱元巳）或三月三日舉行，屬於古代重數節日之一。²根據池田溫及勞榦研究，由於此節日的訂定同時使用了干支計算及以月日之數目字記日的二種系統，可知其在歷史早期是很重要的民俗節日。³

關於修禊之俗究竟起於何時，不少學者根據《周禮》、《史記》等記載，認為早在西周之前已有此風，⁴但勞榦以東漢薛漢（生卒年不詳）之《韓詩章句》提到，「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續魄，拂除不祥」為基礎，認為上巳風俗大抵可上溯至西元前六至八世紀的東周鄭國。⁵對於上巳修禊起於何時雖尚難定論，但可確定至晚在東周已經出現。東漢時，此禮儀被廣為施行，到了魏時才訂於三月三日，不拘泥於三月上巳日舉行。⁶因此，王羲之在永和九年「暮春之初」所舉行的蘭亭會，很可能是在西元三五三年的陰曆三月三日那天。⁷

² 除春禊之外，漢代另有秋禊。見王其亨、官崑，〈寧壽宮花園的點睛之筆：禊賞亭索隱〉，收入單士元、于倬雲編，《中國紫禁城學會論文集（第一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7），頁 297。

³ 池田溫著，孫曉林等譯，〈中國古代重數節日的形成〉，收入氏著，《唐研究論文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頁 365-385；勞榦，〈上巳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29 期（1970），頁 245-247。

⁴ 相關研究如臺靜農，〈祓除與王羲之蘭亭序〉，《臺大中文學報》，第 5 期（1992.6），頁 1；林恭祖，〈曲水流觴話上巳〉，《故宮文物月刊》，第 37 期（1986.4），頁 19-21。

⁵ 勞榦，〈上巳考〉，頁 253-254。

⁶ 臺靜農，〈祓除與王羲之蘭亭序〉，頁 2。

⁷ 見勞榦，〈上巳考〉，頁 247 的討論。

2 王羲之「蘭亭會」前之修禊活動與修禊場所

早期的修禊活動帶有濃厚的宗教性質，也有各種傳說與附，有的涉及后妃「祀先蠶」，有的關乎求子，這些並非本文重點，在此不予討論，但這些傳說或儀式大抵都與水有關，而祓除的儀式重點，即必須「臨水」為之。⁸《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除指出祓禊所具有的巫祭性質，「釁浴」據鄭玄注，是以「香薰草沐浴」，用以潔身。⁹東漢蔡邕（133-192）〈祓禊文〉言「自求多福，在洛之涘」¹⁰，也透露出在水際祓除以保個人福澤的追求。又，東晉徐廣（352-425）對修禊的解釋為：「三月上巳臨水祓除，謂之禊也。」¹¹綜合此三則文獻，「臨水」可說是祓禊之必要手段，即在三月初於附近水流中，以香草拂身，著衣「湔裙」¹²沐浴，趨吉避凶，也因此與修禊相關的活動幾乎都不離水際，帝王於修禊日乘舟於水上，最初應該也是為了祭獻。¹³六朝之後，祓禊的宗教性質逐漸被三月「游春」所稀釋，雖然如此，歷代仍可見到在三月祓除潔身的作法。¹⁴

根據《後漢書·禮儀志》記載，上巳日「官民皆潔於東流水上」，可見當時全國上下修禊盛況。但早期文獻所見之上巳修禊活動的記載，大抵多由上位者主導，如《史記·外戚世家·衛皇后》提到「武帝（西元前 141-87 年在位）祓霸（按：霸水）上還」¹⁵。另，唐修《晉書·禮志》提到上巳時言：

……。懷帝（306-311 在位）亦會天泉池（即天淵池）¹⁶，賦詩。陸機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為禊堂。」本水流杯飲酒，亦不言曲水。元帝（317-322 在位）又詔罷三日弄具。海西（海西公，即晉廢

⁸ 相關上巳日風俗討論，起見勞榦，〈上巳考〉，頁 243-262；徐筱婷，〈從杜篤《祓禊賦》試觀先秦時期迷信思想及崇巫觀念——與出土文獻合證〉，《遼東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4 卷第 4 期（2012.8），頁 46-53。

⁹ 勞榦，〈上巳考〉，頁 254-255；臺靜農，〈祓除與王羲之蘭亭序〉，頁 1-2。臺靜農文對於祓禊所具有之巫祭性質，有精簡的整理，見頁 2。

¹⁰ 蕭統撰，李善等註，《六臣注文選》，卷十六，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四部叢刊景宋本）。

¹¹ 此為《史記集解》引徐廣語。原文轉引自勞榦，〈上巳考〉，頁 251-252。

¹² 「湔裙」據勞榦文指出，是一種神聖的聚浴，必須著衣下水。此稱在唐代尚可見。見勞榦，〈上巳考〉，頁 255、257。

¹³ 沈約，《宋書》，卷十五，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乾隆〔1736-1795〕武英殿刻本）載：「《月令》，暮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曰：陽氣和暖，鮪魚時至，將取以薦寢廟，故因是乘舟禊于名川也。」另見勞榦，〈上巳考〉，頁 252。

¹⁴ 勞榦，〈上巳考〉，頁 256。關於後代的修禊之事，可以一五五八年仇雋的〈海陬上巳述〉所載為例，其文中提到「凡修禊，必擇國中勝所與流水相臨者，可以暢情滌垢。」可見此時的修禊除「暢情」之外，仍可有「滌垢」之意。仇雋，〈海陬上巳述〉，收入劉應鈞修，沈堯中纂，《（萬曆）嘉興府志 32 卷》，卷二十九，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刊本）。

¹⁵ 司馬遷，《史記》，卷四十九「衛皇后」條，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¹⁶ 此乃唐代為避諱而改。見王其亨、官嵬，〈寧壽宮花園的點睛之筆：禊賞亭索隱〉，頁 302。

帝，

365-371 在位) 於鍾山立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¹⁷



上述兩則記載提供了兩個訊息，第一，帝王在三月的修禊儀式中，往往帶領百官臨水燕飲，並賦詩、備「百戲之具」¹⁸等。第二，帝王修禊之處可如漢武帝在自然水域，也可在「禊堂」之類人工建物中。

關於第一點。修禊日要行燕飲、賦詩之事，在許多典籍裡均有記載，這也是王羲之蘭亭會的聚會重點，雖然《史記》未言明漢武帝祓禊時是否有邀請百官一同，或禊後聚宴，但不難推想武帝修禊時的場面浩大。雖然修禊與賦詩、燕飲之間的關係在學界尚未見討論，根據目前對先秦到漢之賓祭禮與詩賦關係的研究，筆者認為或可藉以理解修禊活動的內涵。¹⁹

修禊屬祭儀，祭祀過程需藉文辭以告神靈，而祭祀後享用食物或由君王賜飲，以及在帝王賜宴的場合賦詩作文，原本均為古禮之一環，故帝王、貴族的修禊會中常伴隨賦詩活動也就不難理解。修禊日燕飲、賦詩之舉，最初應為宗教需求，而後，逐漸加入讚頌帝王與政權的政治意義於其中。²⁰此外，修禊中的賦詩也有感懷、詠物、寫景等表現個人的內容，即如王羲之蘭亭會參與者的詩文所見。²¹總之在歷史發展中，修禊與燕飲、賦詩在王羲之之前，已經發展出於修禊活動中相互搭配的形式。

而蘭亭會知名的競詩罰酒其實在王羲之之前，也早已存在一般燕飲或文會之中。如西漢孔臧〈楊柳賦〉提到：

……。於是朋友同好，幾筵列行，論道飲燕，流川浮觴。穀核紛雜，賦詩斷章。合陳厥志，考以先王。賞恭罰慢，事有紀綱。洗觶酌樽，兕觥淒揚。

¹⁷ 房玄齡等撰，「禮志下」，《晉書》，卷二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671。

¹⁸ 蕭子顯，「禮志上」，《南齊書》，卷九（北京：中華書局，1972），頁 148-150。戲劇表演後來也成為修禊日的活動之一，如庾肩吾〈三日侍蘭亭曲水宴詩〉也有「百戲俱臨水」句。見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下）》（臺北：學海出版社，1984），頁 1985。

¹⁹ 相關討論詳見蔣曉光、許結，〈賓祭之禮與賦體文本的構建及演變〉，《中國社會科學》，2014 年第 5 期，頁 163-183；王秀臣，〈燕饗禮儀與春秋時代的賦詩風氣〉，《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3 期，頁 67-72；毛振華，〈《左傳》賦詩習俗的淵源與流變〉，《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3 卷第 1 期（2007.2），頁 97-101。

²⁰ 關於修禊之「應詔」、「侍遊」詩文的討論，見鄭毓瑜，〈由修禊事論蘭亭詩、蘭亭序「達」與「未達」的意義〉，《漢學研究》，第 12 卷第 1 期（1994.6），頁 257-259。

²¹ 鄭毓瑜，〈由修禊事論蘭亭詩、蘭亭序「達」與「未達」的意義〉，《漢學研究》，第 12 卷第 1 期（1994.6），頁 255-264。

飲不至醉，樂不及荒。威儀抑抑，動合典章。退坐分別，其樂難忘。……²²

孔臧明確指出，與朋友同好於柳樹下川流中浮觴燕飲並賦詩、討論篇章，視個人詩文（或儀態、或對經典的理解是否合宜）之工整或慢散，予以賞罰。²³文中雖未言名是否罰之以酒，但從「飲不至醉，樂不及荒」，行為符合綱紀典章的說法推測，孔臧聚會以酒作為懲罰之物的可能性很高。此外，西晉石崇（249-300）的聚宴亦有競詩罰酒之設：

……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²⁴

石崇的聚會是在音樂的鼓動下開始競賽賦詩，此次參加者有三十人，其中蘇紹最勝。或因此會的競賽手法頗為新穎，且有勝出者，使金谷之會不僅名聞當時，也成為日後雅集作詩不成者的賞罰依據，如「金谷酒數」，即典出唐代詩人李白（701-762）名句。²⁵雖然無論是金谷之會或孔臧的楊柳之會，均非藉由流觴之止來輪流作文，但這些聚會，都以酒來賞罰參與者的文采表現。於此可見作為王羲之蘭亭會常為人所論道的賦詩罰酒，在其之前已屬宴集的一種傳統，即在詩文創作中加入「遊戲」的成分，一則藉以獲得精神上的愉悅，另外也可突顯個人文才。²⁶

至於第二點帝王的修禊處所，如前文所述，可於「東流水上」之類的自然水域，也可在人工建物之中（或附屬於人工建物），但若要在流水中泛酒行觴，地點必須經過選擇，因一般自然水流的速度與環境極易使酒杯翻覆，難以行杯。經

²² 孔臧，〈楊柳賦〉，孔鮒，《孔叢子》，卷七，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四部叢刊景明翻宋本）。

²³ 目前研究孔臧〈楊柳賦〉之討論，均未針對「賞恭罰慢」予以解釋。如程彥霞，〈四言詩在兩漢的發展變化〉，《船山學刊》，2008年第4期，頁144；章滄授，〈千古詠柳第一篇——讀孔臧的〈楊柳賦〉〉，《古典文學知識》，1996年第6期，頁19-20。

²⁴ 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529。

²⁵ 金谷之會，見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頁529。「金谷酒數」出自李白〈春夜宴諸從弟桃園序〉「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見姚鉉，《唐文粹》，卷九十七，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四部叢刊景元翻宋小字本）。

²⁶ 關於此點，朱錦雄以「詩歌遊戲化」稱之，見朱錦雄，〈六朝「詩歌遊戲化」現象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另可參見李豐楙，〈嚴肅與遊戲：六朝詩人的兩種精神面向〉，收入衣若芬、劉苑如主編，《世變與創化：漢唐、唐宋轉換期之文藝現象》（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頁1-57。

選擇的地點即如經調整過的自然環境，或之前提到的曹魏「流杯石溝」與「禊堂」、北魏洛陽華林園中的「流觴池」等，這些均是可用以流杯的人工建物，且主要為園林設計的一部份。²⁷

修禊日的流杯燕飲在南朝多被稱為「曲水宴」，強調的正是於曲水旁從事燕飲。²⁸雖然以水流觴並非修禊時的專屬活動（如前述西漢孔臧的楊柳之會有「流川浮觴」），但修禊日確實經常與流觴相互結合，因此一般視流觴為修禊之活動並無不妥。「曲水」，則因關係到在後代被視為王羲之修禊會之精彩的「曲水流觴」，往往成為後世描述流觴之事的用語。必須留意的是，王羲之蘭亭會雖處於自然的外在環境，卻是從「清流激湍」，「引」出「流觴曲水」，來進行流杯的活動，其中的「引」字正是重點，²⁹由西晉時，於「天泉（淵）池南石溝引御溝水」，南北朝酈道元（約 472-527）描寫濟水流經歷城時也說，「引水為流杯池」，以及，東晉庾闡（生卒年不詳）〈三月三日臨曲水詩〉言「臨川疊曲流」，足知古人對流觴環境必須引流或疊石而成的概念十分清晰。³⁰模擬天然的曲水必須引流的原因，應是為了控制水流速度，而早期文獻所出現的「禊堂」，或歷代泛見之流杯渠（如 1603 年安徽滁州知府盧洪夏所建的「意在亭」外流觴曲水，圖 II-1）與流觴亭（如宋崇福宮「泛觴亭」或清紫禁城寧壽宮中的「禊賞亭」，圖 II-2、圖 III-27）等，廣設的原因之一，應該也是為了控制水流。³¹畢竟水流曲度、底面斜

²⁷ 見王其亨、官崑，〈寧壽宮花園點睛之筆：禊賞亭索隱〉，收入單士元、于倬雲主編，《中國紫禁城學會論文集》，第 1 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7），頁 302-305；傅晶，〈魏晉南北朝園林史研究〉（天津：天津大學建築學院博士論文，2003）第三章第三節「園林文會之風與曲水流觴」，頁 171-178。

²⁸ 此由南朝與修禊相關詩文標題可見一斑，可參考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上、中、下）》，目錄。西晉以前的修禊詩文多以節日名、日期或地點命名，如西晉張華〈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後園會詩〉、西晉阮脩〈上巳會詩〉（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上）》，頁 616-617、729）。東晉開始在標題中出現「曲水」二字，但甚為罕見，目前似乎僅見一例，即東晉庾闡〈三月三日臨曲水詩〉（遼欽立，同書，頁 873。）南朝之後則題名中多見「曲水」，如南朝齊謝朓〈侍宴華光殿曲水奉勅為皇太子作詩〉、南朝梁沈約〈三日侍鳳光殿曲水宴應制詩〉等（遼欽立，同書，頁 1421、1630。）另見高莉芬，〈儀式與象徵：歲時節日與六朝詩歌研究〉（日本「東亞漢學國際會議」論文），頁 4-5；傅晶，〈魏晉南北朝園林史研究〉（天津：天津大學建築學院博士論文，2003），頁 175。

²⁹ 關於「引」字的討論，見黃簡，〈重讀蘭亭序〉，《第五屆中國書法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 39-46；何炎泉，Yanchuan He（何炎泉），“The Winding Stream Banquet, Kyokusuien, in the Heian Period Garden,” pp. 3-4（Unpublished paper）。本研究，特別感謝何炎泉博士與筆者進行多次討論並賜予諸多意見。

³⁰ 房玄齡等撰，「禮志下」，《晉書》，卷二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671；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頁 873；酈道元，《水經注》，卷八，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另，唐張銑釋曲水詩曰：「曲水謂引水行酒杯」，見蕭統撰，李善等註，《六臣注文選》，卷二十，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四部叢刊景宋本）。

³¹ 清代禊賞亭圖版，參見程子衿主編，《紫禁城悅讀·乾隆花園》（北京：故宮出版社，2016），

度，必須考慮酒杯經蜿蜒流行後的速度，較適宜取杯飲酒，避免翻覆，因此這些「特殊」的曲水造型，其實有實用的考量於其中。³²

在自然水域邊修禊，當為修禊最原初的形式，由自然水源引出而成的曲水邊修禊，則為對自然水域的調整，出現的時間可能稍晚，而附屬於人工建物的流杯渠、亭是否很晚才出現呢？根據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卷九〈禮志〉之史臣曰：

馬融（79-166）〈梁冀西第賦〉云：「西北戌亥，玄石承輸；蝦蟇吐寫，庚辛之域，即曲水之象也。」今據禊為曲水事應在永壽（155-158）之前已有，祓除則不容在高后之後。³³

所謂「西北戌亥玄石承輸，蝦蟇吐寫庚辛（西方）之域」，是指此曲水乃以西位的蝦蟆嘴為入水處，經西北由黑石所承之出水口流出，入水、出水處位置相近。如此安排可見此曲水不僅有固定方位，水流也配置出水龍頭，馬融整段文字看來較像在描述一個位於「一定範圍」內——如流杯渠、流杯亭一類——之人工曲水建構的佈局，而非前文所討論，由自然河道引流而成，往往橫互在較大區域上的曲水道。馬融對此「曲水之象」的方位與形式之描述頗為確定，但吾人無法肯定梁冀西第曲水之設是否與修禊活動有關，但考慮東漢時修禊活動十分活躍，筆者認為後代常見之流杯渠、亭之類的建物，至晚在東漢桓帝（146-167 在位）之前已有規制。³⁴到了隋代，更發展出於流杯殿內布置著十分複雜而華麗的「漆渠九曲」。³⁵

流杯渠、亭之建構在中國的現存最早遺跡，為宋代崇福宮的「泛觴亭」（圖 II-2）。根據常盤大定（1870-1945）與關野貞（1868-1935）考察，泛觴亭水渠全長約十點六七公尺，入水處深度約十二點二公分，出水處約十三點一公分，兩處深度幾無差距，加上水盤上的渠道有九曲彎轉，若有效控制出水流量，酒杯在其

頁 33。

³² 蔣根植，〈慶州 鮑石亭 流觴曲水에 관한 流體科學的 考察〉，《美術資料》，第 46 期（1990.12），頁 101-110。

³³ 蕭子顯，「史臣曰：案禊與曲水，其義參差」條，《南齊書》，卷九，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南齊書》中所提及之〈梁冀西第賦〉，根據《後漢書·馬融傳》據應為〈大將軍西第頌〉，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1972。

³⁴ 中村喬「三月上巳」研究首先提到此文，但其並未就「曲水之象」的文字內容加以解釋，僅認為此記載雖可使曲水宴之始上溯至東漢，卻是有疑問的。唯其文中並未對此「疑問」多作說明。見中村喬，《中國の年中行事》（東京：平凡社，1988），頁 56-57。

³⁵ 南北朝後期，帝王的流杯建物往往妝點得十分奢靡、華麗。相關討論見王其亨、官崑，〈寧壽宮花園的點睛之筆：禊賞亭索隱〉，頁 303-304。

上行走的速度應該較為緩慢、穩當。³⁶這類水臺盤上的流杯渠，亦被納入宋代《營造法式》「作石制度」中（圖 II-3）。³⁷這種形式的流杯渠，也許不若王羲之之自然引流的環境來得風雅，卻因對稱、規整的形式更顯華麗莊重，具廟堂之氣。³⁸據此筆者認為，此類建物除須引流、挖鑿或堆積水道，水道的流速與製作必須考慮流觴需求，往往還需建造殿亭與之搭配，金錢與人力成本恐怕並非一般百姓可能負擔，故早期此種形式之修禊場所的營造，若非宮廷或權貴之家恐難成就。如馬融所描繪的「曲水之象」，應即東漢外戚出身之權臣梁冀（?-159）西第中的景象，而唐中宗（684、705-710 在位）女長寧公主（680 年代-8 世紀）宅、唐代宰相李德裕（787-850）的平泉山莊中，也均設有流杯亭。³⁹另外，六朝常見的曲水宴詩文，多是描寫宮殿中之人工修禊處所的燕飲，隱約透露這種修禊場所具有皇家專尚的特殊地位。⁴⁰這種華麗複雜之皇家氣度的展現，亦使這類人工修禊處所直到清代，仍為皇宮內苑之流杯亭的設計主流。⁴¹而不論是何種形式的流觴場所，至晚東漢時人已很清楚自然水流或人工建物均需經過設計與處理才可能成功泛觴，也才能讓藉流觴以燕飲、競賽賦詩的活動順利舉行。

³⁶ 關野貞，〈西遊雜信 上〉，收入關野博士紀念事業會編，《支那の建築と藝術》（東京：岩波書店，1939），頁 675-678；常盤大定，〈崇福宮泛觴亭解說〉，常盤大定、關野貞，《支那文化史蹟·解說》，第 5 卷（京都：法藏館，1941），頁 14-15；泛觴亭圖版見常盤大定、關野貞，《支那文化史蹟》，第 5 輯（京都：法藏館，1941），圖 17；蔣根植，〈慶州 鮑石亭 流觴曲水叫 關汗流體科學的 考察〉，頁 103-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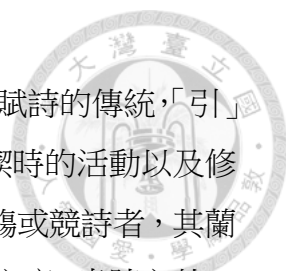
³⁷ 李誠，《營造法式》，卷三（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 13 上-下；卷十六，頁 16 下-17 下；卷二九，頁 14 上-15 下。

³⁸ 白鈴安（Nancy Berliner）曾指出這類人工水道具有「規整對稱的特性，與想像中的蘭亭曲水大相徑庭。」並認為其「刻板的造型」是在回應修禊的儀式起源，並非與文人悠遊林間水濱相呼應（頁 23）。白鈴安對於流杯亭的解釋，是目前所見的相關研究中最具啟發性者，但他文中因未對修禊之歷史發展進行考究，也未對流杯亭的發展予以說明，或許因此認為流杯亭之「刻板的造型」與修禊儀式有關。事實上進入宋代之後，上巳與清明幾已合併，游春的意義也遠大於修禊的儀式性（見勞榦，〈上巳考〉，頁 247-251），因此白鈴安的解釋仍有斟酌的空間。見白鈴安作，李紹毅譯，〈園林·曲水與書法〉，《紫禁城》，第 200 期（2011.9），頁 23。另外，根據梁思成《營造法式註釋（卷上）》（臺北：明文書局，1984）頁 78，宋代流杯渠的尺寸是「方一丈五尺」，換算成今日的長度單位，即是方四百六十點五公分。而「國字流杯渠」與「風字流杯渠」之尺寸似乎是一樣的，但「國字流杯渠」的渠道彎轉較多，同時渠道旁所能安置「寶相華」、「牡丹華」的位置也相對較多（見梁思成書頁 194 及圖 II-3）。「國字流杯渠」可安十二個寶相花、牡丹花，「風字流杯渠」則可安十個。由於此二流杯渠的樣式極為相似，筆者推測兩者真正的差異可能在於安置寶相花與牡丹花位的多寡，這些花位很可能即是參與流杯渠活動時可供坐的位置，亦即「國字流杯渠」可供十二人參與流杯活動，「風字流杯渠」可供十人參與。

³⁹ 見上官昭容，〈遊長寧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之十二，陳廷敬，《御選唐詩》，卷二十七，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李德裕，〈春暮思平泉雜詠二十首〉，《會昌一品集》，別集卷十（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 7 下。

⁴⁰ 詩文如南朝齊謝朓〈侍宴華光殿曲水奉勅為皇太子作詩〉、南朝梁沈約〈三日侍鳳光殿曲水宴應制詩〉等。見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頁 1421、1630。

⁴¹ 見本論文第四章討論。



綜上所述，王羲之蘭亭會之前的修禊活動，早已具有燕飲兼賦詩的傳統，「引」水流觴也在王羲之之前已經出現，因此王羲之與友人在蘭亭修禊時的活動以及修禊燕飲之場地布置，均非由王羲之首創。雖然王羲之非首倡流觴或競詩者，其蘭亭會卻令許多後世文人為之神往，此除關係到知名的《蘭亭序》文章、書蹟之外，很可能也因王羲之及其「群賢」友人在修禊會中，將當時文人好尚的詩文比競發揮得精采引人有關。

在修禊會中加入詩文比競的文人之戲，無疑強化了集會的玩樂性質與知交相契、文才相競的成分。約在王羲之蘭亭會前後，桓溫（312-373）所舉辦的三月三日會也有作詩不能者「罰酒三斗」的罰例。稍晚，王恭（360前-398）的「三日曲水集」，也看得出集會參與者對於宴會中的自我表現是否才思敏捷的焦慮。⁴²修禊日的聚宴似乎在王羲之時代，才開始加入文人競詩之戲，從桓溫與王羲之採用與西晉金谷會同樣「罰酒三斗」的規定看來，或許這兩個集會設計，均使用金谷會的模式加以調整。⁴³而王羲之在六朝如此重要的上巳節日，召集四十多人，以「曲水流觴」來進行「蘭亭」為題之「同題共作」的競賽，無疑為王羲之此會的精彩之處。⁴⁴加上此次諸多參與者大抵為東晉當時頂尖的士族名流，如謝安（320-385）、謝萬（320-361）屬「陳郡謝氏」，孫綽（314-371）為「太原孫氏」，庾友屬「潁川庾氏」，而王羲之一族更出自西晉以來興盛不衰的「琅琊王氏」。⁴⁵這些士族在東晉各方面的發展十分活躍，據蘇紹興研究，琅琊王氏所交往者「皆

⁴² 桓溫與王恭之例，參見朱錦雄，〈六朝「詩歌遊戲化」現象研究〉，頁 67-70 的討論。

⁴³ 根據《世說新語》「王羲之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顯然王羲之對金谷之會的評價不低。見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等整理，《世說新語箋疏（修訂本）》，頁 630。雖然石崇在歷史上所受評價不高，但若從《世說》對金谷會的記載、評價，以及金谷罰酒競文為歷代廣知，足見石崇此次聚會確實具有指標意義。而，即使王羲之當時確有與金谷會相競之意，並不影響王羲之蘭亭會在日後凌駕金谷會，成為雅集典範的地位。

⁴⁴ 上巳節在六朝之重要，透過與節日有關之詩文統計即可窺知。根據高莉芬統計遼欽立輯校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發現，與上巳節有關的詩文共九十四首，較數量居次之七夕足足多出三十三首。高莉芬，〈儀式與象徵：歲時節日與六朝詩歌研究〉（日本「東亞漢學國際會議」論文），收入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儀式與象徵：六朝詩歌中歲時節日分析及其民俗文化意涵研究〉（執行期間：2002年8月1日至2003年7月31日），附件二，頁3。王羲之會採「同題共作」的形式，見朱錦雄，〈六朝「詩歌遊戲化」現象研究〉，頁100的討論。雖然王羲之《蘭亭序》文章、書蹟的真偽早為歷史公案，但關於蘭亭詩，學界似乎大抵同意其非偽作，此可參考王連起的意見。見王連起，〈陸東之和他的蘭亭詩〉，《文物》，2010年第2期，頁77-86。

⁴⁵ 關於東晉士族之研究，可參閱蘇紹興，〈從〔世說新語〕的統計分析看兩晉士族〉、〈琅琊王氏之交遊與婚媾——兩晉南朝大士族——「個案」研究〉、〈東晉南朝王謝二族關係初探〉，收入氏著，《兩晉南朝的士族》（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頁57-137、139-190、191-219。

屬盛門」，尤其王羲之雖僅三品之官卻交遊廣闊，乃「得力於文化關係」，王羲之可說是當時王姓一族最傑出的文士。⁴⁶如此來看，王羲之西元三五三年於會稽山陰舉行的蘭亭之會，可說是由「群賢畢至，少長咸集」的參與者——一個「賢才群聚」的雅集——來展演文人彼此競詩、遊戲的一場盛會，想當時，必然盛況空前、博引眾人目光。而王羲之的蘭亭會，正是因此群體的組成、文人之戲十分迷人、舉行場地的特殊布置，加上《蘭亭序》書蹟的千載難得，在這些條件下，使王羲之蘭亭會有機會成為後世文會雅集的重要典範。

第二節 入唐，王羲之「蘭亭會」作為雅集典範的確立

承前文討論，可大致歸納出王羲之蘭亭會所具有的幾個特殊性，這些特殊性，應是其有機會成為後世雅集典範的重要因素。這幾個特殊性分別為：一，固定的舉辦日期；二，儀式活動；三，獨特的場所設計與詩文比競；四，「賢才群聚」的集會；五，紀念產品的製作。

首先，關於固定的舉辦日期（陰曆三月三日／上巳日），此可讓欲追仿者每年同日「固定」聚會，利於讓有意透過此集會來「塑造群體」者所使用。第二，修禊的儀式活動屬於一種古禮，到了後世雖然修禊的宗教性意味越來越低，甚至轉變成遊春性質，但修禊本身如三月三日一般，屬於每年固定時節可被重複進行的活動，也有助於塑造群體。同時帶有修禊意義的雅集，也是可與其他雅集作為區隔的特色。第三，蘭亭會「引」自然水源為「流觴曲水」供眾人宴飲、競詩雖非王羲之首倡，卻是因王羲之雅集而聞名後代，而這個場所的設計，正適合用來讓參與者比賽詩文創作的品質與速度。此外這個特別的場合設計，也與修禊儀式「務須臨水」的緣由有關，這也形成後世的續蘭亭會基本上必須在臨水處或戶外舉行，故，倘若有自名為續蘭亭會卻未在戶外或臨水處舉辦者，筆者認為應不能將之視為追續王羲之蘭亭會的雅集。第四，蘭亭會作為一個「賢才群聚」的集會，主要因此會之參與者均留下身分、姓名，可知這些參與者大抵為當時名流。推想當時名流群聚一起，如遊戲般地比競個人文學造詣，過程應至為精彩而在後世留下盛名，因此《蘭亭序》中所指出的「群賢畢至，少長咸集」，往往成為後世雅集所欽羨追慕的目標。至於最後一點，紀念產品的製作，主要是指王羲之蘭亭會

⁴⁶ 蘇紹興，〈琅琊王氏之交遊與婚媾——兩晉南朝大士族一「個案」研究〉，頁181-182；房玄齡等，〈謝安〉，《晉書》，卷七十九，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有《蘭亭序》文章及書蹟傳世，並有參與者的詩文創作流傳下來，這些紀念產品除可令參與者懷想當日情景、追索情誼，對後世來說更是足以想像、了解王羲之蘭亭會的重要憑藉。而王羲之的書聖地位及《蘭亭序》書蹟成為法書典範，與唐太宗的推崇關係密切，因此不難想像唐太宗之後，由於王羲之與《蘭亭序》的地位崇高，間接也助長了王羲之蘭亭會的名聲。本章第二節，即欲觀察入唐之後「續蘭亭會」之舉辦，是如何操作此五個特點。但首先，筆者將先討論唐前王羲之蘭亭會的歷史地位。

1 唐前文獻中的王羲之「蘭亭會」

王羲之的蘭亭會在當時與在後世看來，確實盛況空前，但透過史料耙梳發現，西元三五三年之後所舉辦的修禊會，似乎並未特別以王羲之蘭亭之聚為追隨對象，史料中僅見零星記載。這些記載即使寫了王羲之曾宴集蘭亭事，也似乎均非專指產出《蘭亭序》名作、為修禊而聚集的三五三年蘭亭之會。亦即，王羲之蘭亭會在當次聚會之後並未立即產生影響。

目前所見最早記載王羲之宴集蘭亭者，為與王羲之同時代之王隱（約 284-約 354）⁴⁷《晉書》：

王羲之初度江，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與孫綽、許詢、謝尚（按：謝安之誤）、支遁等，宴集於山陰之蘭亭。⁴⁸

王隱所記載的山陰蘭亭之宴，似乎並非特指西元三五三年的蘭亭修禊會，而王羲之三五一年任會稽內史後，與謝安、許詢（?-352 前）等經常於山陰聚遊則是確定之事。⁴⁹由於王隱未特別記載年代，所列的「許詢」也未出現在三五三年的蘭

⁴⁷ 關於王隱生卒年及其《晉書》成書年代考，可參閱曹書杰，〈王隱家世及其《晉書》〉，《史學史研究》，1995 年第 2 期，頁 23-30；宋志英，〈王隱《晉書》初探〉，《文獻》，2002 年第 3 期，頁 4-15。

⁴⁸ 引自李昉編，〈亭〉，《太平御覽》，卷一九四，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四部叢刊三編景宋本）。另見祁小春，《邁世之風：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頁 314 註 5 整理。關於王隱《晉書》的寫作年代，據研究，王隱《晉書》於西元三四〇年先完成一部份，之後又有增補，而書中所記載東晉穆帝（344-361 在位）中之後的事，則應為後人所增寫，而王羲之三五三年舉辦蘭亭修禊會時王隱未必還在世。關於王隱《晉書》完成年代，見曹書杰，〈王隱家世及其《晉書》〉，頁 29-30 的討論。

⁴⁹ 森野繁夫，《王羲之傳論》（東京：白帝社，1997），頁 76、223-228、234-235；蘇紹興，〈從

亭聚會之中，看來王隱《晉書》所載的，應為王羲之平日與同好相往來的紀錄。⁵⁰

王隱之後，王獻之（344-386）甥羊欣（370-442）〈筆陣圖〉載：「王羲之三十書《蘭亭序》。」⁵¹看似現存最早提到《蘭亭序》法書的史料記載，但據盧慧紋教授告知，此史料應為七、八世紀之作，故無法作為早期記載《蘭亭序》書蹟之文獻來考慮。而到了，南朝宋劉義慶（403-444）《世說新語·企羨》，則記錄了〈蘭亭序〉文章，指出「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南朝梁劉孝標（462-521）注此條引〈臨河序〉（〈蘭亭序〉別稱）文，並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滕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⁵²故至晚到劉注《世說》，歷史上才見到對王羲之蘭亭會較為清晰的記載。⁵³值得注意的是，對王羲之蘭亭修禊會之記載，在隋前目前似乎僅見此條，且這段時間中的歷史文獻，凡記載上已修禊相關詩文的，也似乎均未涉王羲之事。⁵⁴直到隋末唐初的王績（約585-644）〈三月三日賦（并序）〉，才見到王羲之蘭亭修禊會被書寫入詩文之中，而從此賦「若嫌鄭國桃花浦，為向山陰蘭葉亭。」之句看來，王羲之蘭亭會在隋末唐初，可能

[世說新語]的統計分析看兩晉士族》，頁110表十四之統計。另外史料也載，如王、謝二家子弟即經常相聚出遊。《晉書·謝安》提到：「（謝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314-366）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轉引自蘇紹興，《東晉南朝王謝二族關係初探》，頁197-198。此處所列許詢卒年，依據佐藤利行，〈王羲之の生活と思想—逸民の時期を中心に〉，《國語國文論集（安田女子大学）》，第15卷（1987.7），頁11考訂。王羲之與許詢等於山陰聚會的圖像，很可能與後世文獻中之「山陰圖」系統有關，這類作品的描繪重點可能是山水景觀，見陳韻如，〈蘭亭修禊圖式的發源與演變——以臺北故宮藏品為中心〉，收入故宮博物院編，《二零一一年蘭亭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頁215-216。⁵⁰關於蘭亭參與者的名單，最早的紀錄是唐代何延之的《蘭亭考》（據祁小春，《邁世之風：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頁315註8，約完成於開元年間），但僅記錄包含支遁、王操之等數個人名。後到了南宋才看到完整的四十一（或四十二）人的名單，其中施宿（1164-1222）《嘉泰會稽志》（1201年陸游序）承何延之《蘭亭考》，仍將支遁列入參與者名單，但桑世昌《蘭亭考》、張淏《雲谷雜記》（約1214年成書）則在修禊名單中刪除了支遁和王操之，並加入王獻之。但無論是哪個記載，均無提到許詢。關於蘭亭修禊會參與者名單討論，見衣若芬，〈俯仰之間：《蘭亭修禊圖》及其題跋初探〉，《中國學術》，第24期（2006），頁81-83。另外，據日本學者佐藤利行考證，蘭亭之會時，許詢已經去世，見佐藤利行，〈王羲之の生活と思想—逸民の時期を中心に〉，頁10-11。

⁵¹ 據李昉，《太平廣記》，卷二〇七，引羊欣〈筆陣圖〉，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民國景明嘉靖談愷刻本）。

⁵² 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等整理，《世說新語箋疏（修訂本）》，頁630。

⁵³ 根據祁小春整理，南朝齊臧榮緒（415-488）《晉書》也載有王羲之「作蘭亭宴集」，但文中並未指明是否即三五三年的蘭亭會，此很可能如王隱一般，僅泛指王羲之與同好於蘭亭聚遊。此外酈道元《水經注·漸江水注》：「蘭亭亦曰蘭上里，太守王羲之、謝安兄弟，數往造焉。」也是相同的情況。見祁小春，《邁世之風：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頁314，註5。

⁵⁴ 雖然南朝梁庾肩吾有〈三日侍蘭亭曲水宴詩〉，但此蘭亭應是當時都城建康的園林「蘭亭苑」，非浙江蘭亭，且從詩文中也讀不出有追仿王羲之蘭亭會之意。全詩見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下）》（臺北：學海出版社，1984），頁1984-1985。梁「蘭亭苑」，見羅喜全、姚亦鋒，〈六朝南京園林調查研究〉，《安徽農業科學》，第35卷第35期（2007），頁11470「表1」。

正開始成為一般修禊會或雅集聚會之仿效對象。⁵⁵



2 唐太宗作為王羲之及其蘭亭會地位抬升的推手

入唐之後，王羲之〈蘭亭序〉被收入蒐羅名詩名句以為作詩參考的類書系統中。唐初歐陽詢（557-641）主編的《藝文類聚·歲時部中》（624年成書）「三月三日」下，所錄「事類」及共約四十篇的相關詩文中，王羲之〈三日蘭亭詩序〉也被收入，但僅列入「詩序」之一則，且該書「事類」也未對王羲之蘭亭會多作說明，或收錄更多該次聚會者的詩文。⁵⁶與此相較，南朝梁簡文帝除詩序被收錄外，尚見其詩文數首，另外如南朝宋顏延之（384-456）、南朝梁沈約（441-513）等被收錄的詩文，均在一篇以上，因此就數量比較而言，王羲之蘭亭會仍只為「三月三日」的眾聚會之一。這樣的選擇當然可能關係到《藝文類聚》編者的品味，但也很可能顯示王羲之蘭亭會直到七世紀前四分之一時，仍非三月三日修禊傳統中特別重要的一件事，畢竟目前所能見到的初唐前之文獻中，提到王羲之之會的實在過少。至於同時被收入《藝文類聚》的孫綽〈三日蘭亭詩序〉，雖然一般認為其為王羲之蘭亭會之「後序」，被附在《蘭亭序》書蹟/拓本之後，但據近年研究，此文應非特為山陰蘭亭之會所寫，而很可能是為另一次於山陰南側長湖一帶之「南澗」所舉辦的修禊會所撰寫。⁵⁷無論如何，從隋末王績到唐初《藝文類

⁵⁵ 王績在隋煬帝大業四年（608）在京邑（今陝西西安），於修禊日見兩京貴族、三都麗人於昆明池、灊水之岸作祓穢、春遊之事。王績文中列舉不少歷史知名的修禊事，如潘尼、袁紹、杜篤、張華等，最末句才提到王羲之會。見王績著，韓理洲點校，〈三月三日賦（并序）〉，《王無功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33-40。

⁵⁶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四歲時部中（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10上-31上。與王羲之〈三日蘭亭詩序〉同時被收入的尚有另外三篇詩序，含孫綽同名之作及南朝齊王融、梁簡文帝（549-551在位）的〈三日曲水詩序〉。

⁵⁷ 過去從未有人針對孫綽〈蘭亭後序〉是否為王羲之蘭亭會所寫之事提出質疑，但據周燕的研究指出，孫綽此文雖在唐宋後被視為「蘭亭後序」，細就其內容及被刊載的狀況，作者認為孫綽此序並非為山陰蘭亭之聚所撰，而其標題中有「蘭亭」二字，則應是《藝文類聚》編纂時的疏忽。待徐堅（659-729）編《初學記》（據余嘉錫考為727年成書）時，將孫綽之序移至「事對」下之「南澗東堂」，以孫綽撰此聚會之所在的「南澗」，與晉廢帝之東堂小會相對。根據《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出，《初學記》之編纂原較《藝文類聚》來得精審，故《初學記》之記載概念當值得參考。詳見周燕，〈孫綽《三月三日蘭亭詩序》并非蘭亭後序〉，《勵耘學刊（文學卷）》，2012年第2期，頁10-25。關於《初學記》之成書年代討論，見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下）》（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16「初學記」條，頁808-810。此外，最晚五代前成書的韓鄂《歲華紀麗》一書，在「上巳」條下分別有「修禊之事」、「禊南澗」、「蘭亭會」等事例，其中「修禊之事」、「蘭亭會」乃指稱王羲之的蘭亭會，而對「禊南澗」之說明則為：「孫綽序以莫春之始，解禊南澗之濱也。」因此看來，似乎唐代以前一般認為孫綽之序非為王羲之蘭亭會所撰。韓鄂，《歲華紀麗》，卷一，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明萬曆〔1573-1620〕秘冊彙函本）。

聚》來看，此時王羲之山陰修禊之事較早前稍多見於文獻，且被收入《藝文類聚》成為作詩為文的範例。亦即直到此時，吾人方可略微感受到西元四世紀中的蘭亭會，開始被後世留意的跡象，但若要說此次聚會在唐初已成為雅集典範，尚言之過早。

唐太宗（626-649 在位）時期，王羲之的地位超越以往。唐太宗對王羲之《蘭亭序》的推崇，使王羲之書蹟廣泛受到關注，而產出此作的蘭亭修禊會，也獲得成為雅集典範的契機。關於唐太宗對王羲之在書史中之地位的建立，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於一九八〇年代已有精闢的討論。雷德侯提到，唐太宗不僅在唐修《晉書》中為王羲之立傳，稱其書法「盡善盡美」為其奠定作為「書聖」的地位，也四處徵集王羲之的書法作品，並以鈎摹等方式賜予臣子，又將之作為書法教育的材料。唐太宗獨尊王羲之之舉除使其長期在歷史上佔有重要位置，同時也壓抑了其他書風的發展。如王獻之在唐前的地位有時是高於王羲之的，二者的書風可說處於相互競爭的情況，但唐太宗之後，王獻之幾乎無法超越王羲之作為「書聖」的地位。⁵⁸貞觀二十二年（648）完成的《晉書》卷八十〈王羲之〉傳中，記載了永和九年的蘭亭會及〈蘭亭序〉文，此傳不僅述及王羲之的相關篇幅頗大，唐太宗為其所寫的史論，也是《晉書》中唯僅四篇有太宗史論的其中一篇。⁵⁹西元七世紀中，王羲之蘭亭會首次正式出現於正史，在唐太宗的全面推動下，《蘭亭序》書蹟成為書學典範，後世常見於傳李公麟《蘭亭修禊圖》拓本上的二首王羲之〈蘭亭詩〉之外（圖 II-4），王羲之其他〈蘭亭詩〉也盛傳於世。⁶⁰如唐初著名書家陸柬之（可能活動於唐高宗、武則天時代）即書有《五言蘭亭詩》（見《宋游似藏蘭亭本》，Chicago, The Field Museum 藏，圖 II-5），此外亦有

⁵⁸ 雷德侯教授此文討論帝王的宮廷收藏在形塑藝術史的進程上所起的作用，並以唐太宗的書法收藏為其中一例，來討論宮廷藝術收藏作為政治工具的使用。見 Lothar Ledderose,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Imperial Art Collection in China," in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43 (1978-79), pp. 33-46. 另可見 Lothar Ledderose, "Chinese Calligraphy: Its Aesthetic Dimension and Social Function," *Orientalism*, 17:10 (1986.10), pp. 38-40; 神田喜一郎著，戴蘭村譯，〈中國書道史 7 隋·唐一〉，《書道全集 第 7 卷 隋·唐 I》（臺北：大陸書店，1989），頁 7-8；? 著，戴蘭村譯，〈唐太宗與昭陵諸碑〉，《書道全集 第 7 卷 隋·唐 I》，頁 21-26。王獻之書風在南朝宋、齊二朝獲得很高的評價，至梁武帝之後，才開始稱揚王羲之、貶抑王獻之。見劉濤，〈王羲之與王獻之〉，收入劉濤主編，《中國書法全集·18》。

⁵⁹ 房玄齡等編撰，《晉書》，卷八十，列傳〈王羲之〉（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538-542。另見祁小春，《邁世之風：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頁 262。

⁶⁰ 此件《蘭亭修禊圖》拓本，原圖傳為宋代李公麟所繪。見佚名，〈《蘭亭修禊圖》圖版解說〉，王樹村主編，《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19 石刻線畫》（上海：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1988），頁「圖版解說」26。

不少選本在唐代流傳。⁶¹似乎正是在這種熱烈推崇王羲之的氣氛及《蘭亭序》書蹟備受矚目的情況下，產出此書蹟的蘭亭修禊會也隨之受到更多關注。



3 西元七世紀，王羲之蘭亭會成為宮廷內外雅集追仿的對象

唐太宗之後，王羲之三五三年的蘭亭會，較過去常出現於唐代文人的上巳修禊詩文中，可見蘭亭修禊會（及《蘭亭序》書蹟）逐漸深入唐代文人文化的各個層面，並成為文人燕飲雅集所欲追仿的重要典範。以下，將分別從宮廷外部與內部所舉辦的幾個續蘭亭會，來觀察唐人如何辦理此集會。

唐人對於蘭亭之會的追仿，首先可以唐初四傑之首的王勃（約 650-約 676）為例，他曾在上元二年（675）於雲門寺之山亭修禊。⁶²其〈三月上巳祓禊序〉（又名〈修禊雲門獻之山亭序〉）中以「況乎山陰舊地，王逸少之池亭；永興新交，許元度之風月？」來比擬自己與新交友人徜徉於煙霞山林之間，如許詢之風流的情景，並提到他們「攜旨酒，列芳筵，先祓禊於長洲，卻申交於促席。」的當日行事。⁶³由王勃序文看來，這次聚會應為幾位知心友人的山林文會，此會在山亭中舉行（即如王羲之有「蘭亭」般），有修禊儀式，亦可見場地中有水澤（長洲），並有燕飲及詩文創作，雖然看不出也有作詩比競之意，但此會欲追蘭亭知交相契的精神是顯然可見的，形式上也有與王羲之蘭亭會相應之處。⁶⁴尤其值得注意的

⁶¹ 關於陸東之書王羲之《蘭亭詩》傳世墨蹟本與寫本的問題，及陸東之《蘭亭詩》內容比後世常見之《蘭亭圖》上的王羲之詩文數量為多等各種相關問題，王連起有深入的討論。其〈陸東之和他的蘭亭詩〉頁 86 的結論大致轉引於此：「現行的《蘭亭詩》，只是當年右軍蘭亭宴集賦詩的一個選本，右軍《蘭亭詩》五言當為五首；游似本同桑世昌《蘭亭考》所記當是同一祖本，宋以前的著錄本同傳世的墨蹟本沒有任何直接關係，傳世墨蹟本當是宋高宗早年的臨本，所臨即是遊似刻本的底本。」王連起，〈陸東之和他的蘭亭詩〉，《文物》，2010 年第 2 期，頁 77-86。

⁶² 雲門寺為王獻之故宅，王羲之七世孫智永亦曾攜《蘭亭序》法書居此。見張元忭，《（萬曆）會稽縣志》卷十六禮書八（明萬曆刊本）「雲門廣孝寺」條。

⁶³ 王勃〈三月上巳祓禊序〉中出現的年代為「永淳二年」，但此年代應該有誤，見竺岳兵，〈王勃浙東行迹考〉，收入氏著，《唐詩之路唐代詩人行迹考》（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頁 21、23-25。另，王勃除〈三月上巳祓禊序〉外，〈上巳浮江宴序〉、〈山亭興序〉等，也都有提到王羲之蘭亭會。王勃，〈三月上巳祓禊序〉，收入董誥《全唐文》，卷一八一，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嘉慶內府刻本）；王勃，〈山亭興序〉、〈上巳浮江宴序〉，《王子安集》，卷四、卷五，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四部叢刊景明本）。

⁶⁴ 王勃似乎對王羲之蘭亭會有特殊的喜好，他曾多次在其詩文中提到該次聚會，如其知名的〈滕王閣并序〉：「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邱墟。」即以蘭亭盛會來比擬當日的餞別盛筵。見王勃撰，張遜業校，芥〔川〕煥點，《王勃集》，收入長澤規矩也編，《和刻本漢詩集成 唐詩》，第一輯（東京：古典研究會據延享四年（1747）京都唐本屋吉兵衛門刊本影印，1975），頁 18。

是，王勃為王績侄孫，對於王羲之蘭亭會的仰慕，似乎是這個家族的傳統。

此外，唐高宗調露二年（680），崔知賢、陳子昂（661-702）、高球、孫慎行等人在王明府（縣令）之林亭「申交契也」。據孫慎行詩序提到，當日諸人「列芳林而薦賞，控清洛以開筵。追李郭之佳遊，嗣裴王之故事。⁶⁵……於是愷佳宴，滌煩襟。沿杯曲水，折巾幽徑。流波度曲，自諧中散〔嵇康〕之弦；舞蝶成行，無忝季倫〔石崇〕之伎。」又，高球詩曰：「季倫園裏，逸少亭前。曲中舉白，談際生玄。」王明府林亭之會是在三月三日舉行，其中有亭榭、有引控洛水以流觴的曲水，也有詩文創作與詩序。參與者的作詩過程雖未有明顯的比較意味，但以分韻的方式進行實也帶有競賽之意。整體而言，雖然參與者詩文中也提到金谷園會等其他聚會，但此次聚會的舉辦日期、地點特徵與形式，基本上是仿效王羲之蘭亭會而來，並且也是親知相聚的雅集。⁶⁶

上述二個聚會都是由文人參與，他們選在三月三日，擇亭榭、曲水流觴之處所聚宴，整個過程不見得有修禊儀式與激烈的競賽，但均如王羲之蘭亭會般，參與者透過詩文及詩序創作來與知交相聚、交流。而參與者所追者，不論是許詢之風流或「李郭」、「裴王」之知交，其根本，可說就是對《蘭亭序》之「群賢畢至，少長咸集」的期待。亦即此二個集會，是以親知相惜之「賢才群聚」的雅集作為目標。這個「賢才群聚」，除可由旁觀者來定義，更重要的，應是參與者對自身雅集的期待。因此可見王羲之蘭亭會在七世紀最後四分之一的時刻，已經開始為文人群體所接受，並引以為雅集追仿的對象。

宮廷內部之續蘭亭會，則可以西元七〇〇年武則天（684-705 在位）於河南流杯亭聚宴群臣的集會為代表。此會在過去似乎從未被蘭亭會相關研究所討論，雖然該次活動所留下的資料極為有限，但此次聚會應該是一次值得重視的燕集事件，即使武則天原來並無豎立雅集典範的企圖，透過帝王的召集與參與，卻可讓王羲之蘭亭會更有機會成為一種典範，同時，武則天也可透過她對「王羲之」的推崇與仿學，塑造她個人的文化地位。此次聚會被記錄於北宋歐陽修（1007-1072）《集古錄跋尾》（1063 成書）卷六中：

⁶⁵ 「李郭」應指東漢郭太泰、李膺二人知交之故事，「裴王」則應指西晉裴楷與王戎（或王濟）之事。

⁶⁶ 崔知賢等，〈三月三日宴王明府山亭（序附六首）〉，蒲積中，《歲時雜詠》，卷十六，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配清文津閣四庫全書本）。

右《流杯亭侍宴詩》者，唐武后久視元年（700）幸臨汝湯，留宴群臣應制詩也。李嶠（644-713）序，殷仲容（633-703）書。開元十年（722）汝水壞亭，碑遂沉廢。至貞元（785-805）中，刺史陸長源（?-799）以為嶠之文、仲容之書，絕代之寶也，乃復立碑、造亭，又自為記，刻其碑陰。武氏亂唐，毒流天下，其遺跡宜為唐人所棄，而長源當時號稱賢者，乃獨區區於此何哉？然余今又錄之，蓋亦以仲容之書可惜，是以君子患乎多愛。⁶⁷

雖然群臣的應制詩文已經佚失，歐陽修這則記載仍透露出幾點重要訊息。第一，此次聚會之處為河南臨汝的流杯亭。根據前文討論，流杯亭原即皇家流觴賦詩之所，功能如同王羲之引「清流激湍」為「流觴曲水」一般。第二，參與者各自賦詩。雖不知是否分韻或有其他作詩規定，但在帝王前應制作詩，恐怕很難不全力以赴、與同儕相競。第三，由李嶠作詩序、殷仲容書，後刻成碑石以記此事。這次盛會除有聖曆（698）初為同鳳閣鸞台平章事、中宗景龍二年（708）為大學士的李嶠作詩序外，武則天並令當代書法名家殷仲容書寫詩序（可能也書寫了所有應制詩文），之後還立碑記事。雖然根據記載，當年武則天至流杯亭時應該並非三月，⁶⁸但綜合以上三點來看，與王羲之蘭亭會的主要活動均相呼應，不僅有亭、有曲水流觴，有燕飲賦詩、有詩序，還有產出法書，在紀念產品的部分，甚至增加了比起紙絹更可能長存的碑石，來記錄、流傳此次的君臣之會。雖然宮廷的上巳聚宴早有傳統，但根據武則天西元七〇〇年於汝州流杯亭所舉行之盛會的行事觀察，除了此會應非在三月三日舉行、沒有修禊儀式之外，王羲之蘭亭會所展示的處所與活動內容，以及紀念產品等，無一不被仿效。武則天模仿王羲之蘭亭會之完整度十分清晰，甚至可推測已經佚失了的應制詩文中，或許也提到過王羲之的蘭亭盛會。

雖然此次聚宴是由帝王舉辦，並非單純的文人雅集，但所參與者不乏如李嶠等文壇傑出之輩。今日學界雖對武則天的文學修養評價不高，但杜佑《通典》（801年成書）提到：「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技。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永淳之後，太后君臨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達，因循日久，浸以成

⁶⁷ 歐陽修，〈唐流杯亭侍宴詩〉，《歐陽文忠公集》，集古錄跋尾（1063成書）卷六，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四部叢刊景元本）。

⁶⁸ 《新唐書》載武則天是於久視元年「一月丁卯，如汝州溫湯」，當年似未再至汝州。見歐陽修，《新唐書》，卷四本紀第四，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風。」⁶⁹顯示武則天對詩文創作的支持既廣為官員知曉，精善詩文亦為進入官僚系統的重要條件，因此參加此次流杯亭侍宴者，應該均為當時引領宮廷文壇風騷的人物，故此聚宴實亦帶有文人雅集之性格。⁷⁰此外，武則天於久視元年流杯亭聚宴前不久的萬歲通天二年（697），甫從鳳閣侍郎王方慶（王羲之十代孫）手中獲得王羲之法書一卷及「王家累代祖父書蹟」（含王導、王洽、王獻之等）多卷。王方慶家藏王羲之法書原有「四十餘紙」，在貞觀十二年（638）幾全數獻予唐太宗，僅留一卷於其家，而武則天此次向王方慶訪求王羲之真跡後並未如唐太宗將之收入內府，反而在命人模寫後特於武成殿展示群臣，並將原跡「復賜方慶」。⁷¹此事不僅顯示武則天可能也如唐太宗般雅好王羲之書法，並四處蒐羅真跡，其「訪求」之舉與「復賜方慶」更是一場重要的政治表演。⁷²而「訪求二王書蹟」也可視為唐代帝王的一項傳統，如唐玄宗也曾「以中書令蕭嵩（?-749）為大學士」訪二王書。⁷³武則天向王方慶訪求二王書蹟三年後，在河南汝州溫湯流杯亭所召集的宴會，由其緊密追仿王羲之蘭亭會的形式、內容看來，亦可將之視為武則天「訪求右軍遺跡」的延續。⁷⁴武則天除追仿蘭亭會、訪求二王書蹟之

⁶⁹ 關於武則天在位期間的文學發展，詳見賈晉華，《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中篇第二章〈高宗武后時期三大修書學士詩人群：律詩定格和類書盛行〉，頁198-218（特別參閱頁198、202-203、213），杜佑《通典》引文出自卷15，轉引自該書頁213。另見周祖謨，〈武后時期之洛陽文學〉，《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1期，頁69-72；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賈晉華譯，《初唐詩（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頁319-338。

⁷⁰ 關於圍繞在武則天身邊的文人可參見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賈晉華譯，《初唐詩（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頁243-245。

⁷¹ 劉昫，〈王方慶傳〉，《舊唐書》，卷八十九：「則天以方慶家多書籍，嘗訪求右軍遺跡。方慶奏曰：『臣十代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以進之，唯有一卷見今存。又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並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以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則天御武成殿示群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為《寶章集》以敘其事，復賜方慶，當時甚以為榮。」《萬歲通天帖》相關研究，見啟功，〈《唐摹萬歲通天帖》書後〉，收入劉正成主編，《中國書法全集·18·三國兩晉南北朝編》，頁26-30。

⁷² 李慧淑，〈賢志、瑞文與奉華寶藏——南宋皇室女性之鑑藏品味與性別文化空間〉，《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0），頁1-8；Hui-shu Lee, *Empresses, Art and Agency in Song Dynasty China*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0), p. 13, 242 (footnote 34).

⁷³ 訪求到二王書蹟之後，帝王通常會下令製作拓本再分送太子、臣下，自唐代之後，這也成為一項悠久的帝王傳統。見池田溫著，孫曉林等譯，〈盛唐之集賢院〉，收入氏著，《唐研究論文選集》，頁221。

⁷⁴ 關於武則天、唐中宗時期對上巳節的重視，可以宋之問（約656-約712）與沈佺期（約656-約715）二人詩文推知。武則天至唐睿宗（684-690、710-712在位）時，知名詩人宋之問與沈佺期二人均曾被貶。二人被貶後都有以三月三日為題之詩文，回憶京城上巳節時的風光熱鬧。沈佺期在西元七〇六年所寫〈三日獨坐驩州思憶舊遊〉一詩，從首句「兩京多節物，三日最遨遊。」即可窺上巳當時京師的熱鬧非凡。而西元七一二二年宋之問被貶時所作的〈桂州三月三日〉，詩文前半段，主要是追憶其於武則天、唐中宗時參與歡宴，君臣一同作柏梁詩，宋之問尚受賜金帛的

外，也學王書。武則天自撰自書的《昇仙太子碑》(699年)，為松井如流(1900-1988)評為雖學王書但見個人性情之展現，於唐人中學王書者而言，頗為特殊。⁷⁵

整體來看，武則天重視王羲之的原因，應是受唐太宗推崇王書的態度與風氣所影響。武則天在唐太宗、唐高宗後登臨帝位，她在文化上「崇王」的展演，多少也有助於強化武則天之王位繼承的「合法性」。而武則天的流杯亭聚宴，不僅重新實踐了一次蘭亭會，也創造了屬於她個人的聚會產品，建立其文化形象。

透過上文所討論西元七、八世紀之間宮廷外部與內部之續蘭亭會的舉辦，可發現王羲之蘭亭會在唐代開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這一切，皆始自唐太宗。而時人不再拘泥於「三月三日」聚會與進行修禊儀式二事，也顯示王羲之的蘭亭修禊會已超越「修禊 / 上巳」框架，可作為一般文人集會的雅集典範。除舉辦日期與修禊儀式之外，也可見這些唐代的續蘭亭會，在地點及活動內容、紀念產品的製作上，亦並非對王羲之亦步亦趨的學習，而是順隨各集會之所需。這種靈活的運用，雖可視為王羲之蘭亭會可在後代廣為人所追仿的原因之一，但這些面貌不一的續蘭亭會，他們是否也具有共同、可以契合於王羲之蘭亭會的核心？筆者認為，這個核心就是「務須臨水」的場地條件，以及「賢才群聚」的參與者兩項。關於雅集參與者對「賢才群聚」之嚮往本節已經討論，以下，將針對「務須臨水」在唐代的現象進行說明。

4 「務須臨水」的場地條件

「務須臨水」的概念，淵源於王羲之蘭亭會本是修禊雅集，修禊必須在戶外臨水為之，故後世的續蘭亭會即使有室內的活動，往往也會搭配戶外的環境及臨

風光往事。詩中出現之「羽觴杯」、「暮春三月醉山陰」等詞句，均是呼應上巳與王羲之蘭亭會的用語。二詩全文見沈佺期、宋之問撰，陶敏、易淑瓊校注，《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上、下）》（北京：中華書局，2006），99-103、560-564；連波、查洪德校注，《沈佺期詩集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頁 172-175；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賈晉華譯，《初唐詩（*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頁 374-376。

⁷⁵ 唐太宗於貞觀十四年（640）「為真草書屏風示群臣，筆力遒勁，為一時之絕。」又貞觀十八年（644）「宴群臣於玄武門，作飛白書，賦詩。」見賈晉華，《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第二版）》，頁 18、21「表一 太宗朝宮廷詩人群文學活動及唱和作品編年表」。關於武則天的《昇仙太子碑》研究，見松井如流解說，《書跡名品叢刊 唐 則天武后 昇仙太子碑》（東京：二玄社，1974），頁 96-97；森鹿三著，戴蘭村譯，〈66、67 昇仙太子碑解說〉、〈68、69 昇仙太子碑碑陰解說〉，《書道全集 第 8 卷 唐 II》，頁 171-173。另見 Hui-shu Lee, *Empresses, Art and Agency in Song Dynasty China*, pp. 72-75.

水之處。入唐之後，「亭」在宮苑、園林等處大量出現，除顯示「亭」這個建築形式在唐代有獨特的發展外，透過唐代詩文中頗易見到與「流杯亭」相關的詩作，亦可窺王羲之蘭亭會的發生場所——「蘭亭」——已經深入人心，或也因此曲水流觴之事才會與「亭」之建築形式相連結。⁷⁶而到了唐代，流杯亭之類的流杯建構已不像早期只出現在權貴園林，（如前文提到唐代長寧公主、宰相李德裕宅均設有流杯亭），唐代文獻中，也可找到存在於地方、供人玩賞的流杯亭。⁷⁷權貴與一般人所使用的流杯亭，其差別可能只是規模、雕琢程度的差異而已。據研究，唐代亭子有的規模不小，多有牆壁、設窗牖，甚至可以住宿，此與北宋才普遍出現之「有頂無牆」小型亭子，並不相同。⁷⁸因此唐代亭子在聚宴、文會之功能上，實可提供多人同時進入使用，但當人數眾多或亭子不夠大時，也僅有部分人得以進入亭內，此由王維（約 699-約 761）〈奉和聖制上已於望春亭觀禊飲應制〉標題中之「觀」字即可窺知。⁷⁹

唐代進行曲水流觴之處，除可在流杯亭內，另有「水臺盤」一類的作法。如顏真卿上元元年（760）〈鮮于氏離堆記〉記述閬州新政（今四川南充）故京兆尹鮮于仲通（693-753）所開鑿之石堂提到：「堂北磐石之上，有九曲流杯池焉。懸源螭首，蹙噴鶴喙，醜渠股引，迺坐環溜。若有良朋，以傾醇酎。」⁸⁰說明石堂北面的磐石上有「九曲流杯池」，此池水之源乃由高懸之螭首急速噴出水柱，再由鶴嘴引流，眾人列坐其中時，水流環繞四周。這樣的流杯水渠設計與前文討論

⁷⁶ 紹興蘭亭在王羲之舉辦蘭亭會的時候，很可能並無亭子之設，明代方志即曾指出蘭亭並非亭子。見蕭良幹修《（萬曆）紹興府志》載：「按秦法十里一亭，亭者，猶今之鋪也。故有亭長，有亭侯，蘭亭、柯亭、楊亭、嵯亭皆此。右軍序稱會稽山陰之蘭亭，亦若云山陰之某里、某鋪爾，自是後人遂以蘭亭若為右軍遊宴之亭榭者，然非其本矣。」但，另據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漸江水》中載：「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曰蘭亭，亦曰蘭上里。太守王羲之、謝安兄弟，數往造焉。吳郡太守封蘭亭侯，蓋取此亭以為封號也。太守王廙之移亭在水中。晉司空何無忌之臨郡也，起亭于山椒，極高盡眺矣。亭宇雖壞，基陞尚存。」若照此記載，則王羲之蘭亭會時應已有蘭亭。但無論西元三五三年的蘭亭是否真有亭子，此「蘭亭」在歷史中早已成為具有「亭」之意象的一個文化地點。蕭良幹修，張元忭等纂，李能成點校，《萬曆《紹興府志》點校本》，卷九（寧波：寧波出版社，2012），頁 200-201。

⁷⁷ 如陸廣微《吳地記》（約成書於唐僖宗乾符三年〔876〕）載吳縣女墳湖附近有一座流杯亭，為「三月三日泛舟遊賞之處」。見陸廣微，《吳地記》，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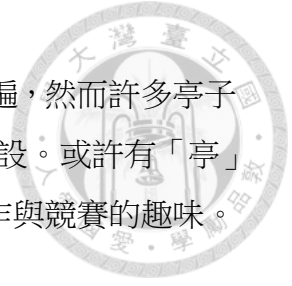
⁷⁸ 關於唐代「亭」之建築形式的討論，可參閱張渝新，〈中國古建「亭」的發展演變淺析〉，《四川文物》，2002 年第 3 期，頁 10-20；高鈐明、覃力，《中國古亭》（臺北：南天書局，1992），頁 20-21；劉致平，《中國建築類型及結構》（臺北：尚林出版社，1984），頁 60。

⁷⁹ 詩文見王維，〈奉和聖制上已於望春亭觀禊飲應制〉，《王摩詰文集》，卷四，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宋蜀本）。

⁸⁰ 四川省文物管理局編，《四川文物志》，上冊（成都：巴蜀書社，2005），頁 276-278。〈鮮于氏離堆記〉刻石拓本見，頁劉子瑞主編，《顏真卿書法全集》，第 2 卷（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9），頁 312-321。

東漢馬融〈梁冀西第賦〉中所見的「曲水之象」極為類似。

大抵而言，唐代的流杯亭與水臺盤一類的建築遠較過去普遍，然而許多亭子雖也用作上巳（或續蘭亭）聚會，但當中似乎不一定有水渠之設。或許有「亭」本身已足可象徵蘭亭曲水之會，即使無水渠，也不影響詩文創作與競賽的趣味。



5 王羲之蘭亭會在唐文化中的作用（成為雅集典範的外在條件）

九世紀最著名的續蘭亭會，可說是白居易（772-846）、劉禹錫（772-842）等在開成二年（837）於洛水之濱所參與的修禊聚會。白居易〈三月三日祓禊洛濱〉序文中，詳細記載了聚宴當日的行事：

開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價以人和歲稔，將禊於洛濱。前一日，啟留守裴令公。令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賓客蕭籍、……、四門博士談弘謨等一十五人，合宴於舟中。由斗亭，歷魏堤，抵津橋。登臨沂沿，自晨及暮。簪組交映，歌笑間發。前水嬉而後妓樂、左筆硯而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盡風光之賞，極遊泛之娛。美景良辰，賞心樂事，盡得於今日矣。若不記詠，謂洛無人。晉公首賦一章，鏗然玉振。顧謂四座，繼而和之。居易舉酒抽毫，奉十二韻以獻。席上作。⁸¹

從白居易與眾人的修禊活動中，可發現舟遊乃是上巳日的聚宴重點，舟遊除了在唐代上巳節是常見的遊樂形式之外，其古遠傳統，亦可接承自帝王在上巳日的水中獻祭，也為續蘭亭會「務須臨水」的一種形式。由白居易文，除可見上巳節在入唐以後逐漸脫離修禊的宗教意義，趨向遊樂的歡慶場合之外，從中所紀錄之九世紀文人的三月三日活動更屬難得。

如同白居易所參與之唐代的修禊集會，將王羲之蘭亭會「務須臨水」的意義擴張至舟遊一般，西元八世紀之後，王羲之蘭亭會所受到的關注，也逐漸顯露、擴散在文人生活之中。同時也因為時代需求，促成王羲之蘭亭會的影響面更為廣泛。以下，筆者將討論王羲之蘭亭會所以在唐代成為雅集典範的外在條件。

⁸¹ 此聚會相關研究甚夥，主要可參見平岡武夫，〈三月三日 上巳 洛濱修禊——白氏歲時記〉，《漢學研究》，第 16、17 號，頁 89-106。感謝學友楊雅菲在日本代尋此文。另可見土谷彰男，〈洛濱斗門考——白居易「三月三日祓禊洛濱」詩をめぐる〉，《中國詩文論叢》，第 33 集（2014.12），頁 207-220。白居易詩文全文轉引自平岡武夫文，頁 90。



5-1 詩文所見之王羲之蘭亭會的「化約」概念

在進入西元八世紀之後，王羲之的蘭亭會不僅較過去常見於唐人的上巳修禊詩文中，且被引用的範圍也躍出燕飲、文會之外，還擴及思念友人、贈別甚至酬贈墨錠等各類詩文中。因此，透過唐代詩文對王羲之蘭亭會的使用，可窺此會在七世紀之後逐漸受到重視的情況。

提及王羲之蘭亭會的上巳相關詩文，如以下數則：宋之問（約 656-712），〈桂州三月三日〉：「永和九年刺海郡，暮春三月醉山陰」；盧綸（748-約 799），〈上巳日陪齊相公花樓宴〉：「山陰興祓禊，此日乃為榮」；唐德宗（779-805 在位），〈三日書懷因示百僚〉：「流觴想蘭亭，捧劍得金人」；劉禹錫（772-842），〈三月三日與樂天及河南李尹奉陪裴令公泛洛禊〉：「洛下今修禊，羣賢勝會稽」。這些詩文，均在上巳相關主題上，提及王羲之蘭亭會。與記述友誼相關的詩文，則如孟浩然（689-740），〈江上寄山陰崔少府國輔〉，「不及蘭亭會，空吟祓禊詩」。以蘭亭會之意象作為贈別者，有李商隱（813-約 858），〈令狐八拾遺絢見招送裴十四歸華州〉：「蘭亭讌罷方回去，雪夜詩成道韞歸」等。⁸²雖然上述詩文有各自的脈絡與旨趣，但作者在詩文中均出現以「山陰」、「蘭亭」、「會稽」等詞遙指王羲之蘭亭會，來聯繫自身的主題。此外，李白（701-762），〈酬張司馬贈墨〉則是以友朋贈墨之事，扣至王羲之的蘭亭會。詩中提到，若攜此墨至蘭亭，當藉此墨助其為文。⁸³李白此詩可說是以文房之墨，指涉到會稽蘭亭會的二個產品，即〈蘭亭序〉之文章與法書，此用法顯得極為特殊。

大抵而言，王羲之蘭亭會進入八世紀之後，在文學典故中已見其被化約成幾組語彙、概念來使用。透過化約的方式，王羲之的蘭亭會被粹取出某些性質來描述友誼、宴會、雅集、文章與法書創作等，進而成為唐代文人作詩為文時慣用的典故。到唐代後期，這種化約的語詞更為豐富，如唐末韓鄂《歲華紀麗》「上巳」條下，可見到與王羲之蘭亭會相關者，有「時和氣清」、「修禊之事」、「蘭

⁸² 見李商隱，〈令狐八拾遺絢見招送裴十四歸華州〉，《李義山詩集》，卷五，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四部叢刊景明嘉靖本）。

⁸³ 李白詩全文如下：「上黨碧松煙，夷陵丹砂末。蘭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掇。黃頭奴子雙鴉鬢，錦囊養之懷袖間。今日贈予蘭亭去，興來洒筆會稽山。」見李白，〈酬張司馬贈墨〉，《李太白集》，卷十六，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宋刻本）。

亭會」、「永和之春癸丑之歲」等條。⁸⁴加上如前文所討論白居易在西元八三七年所參與的續蘭亭會，可見唐代中後期之三月三日聚宴、文會的活動內容，也更為多樣。綜上所言，除可窺王羲之蘭亭修禊的形象已廣泛深入唐代文人文化之中，成為文人雅集、文人生活所欲追仿的對象，同時可見唐人對三月三日修禊活動之看法的擴張與調整。

5-2 唐代文人文化對雅集典範的需求

除了詩文紀錄可徵王羲之蘭亭會在唐代廣為文人群體所接受、運用之外，唐代尚有二個現象也可看到王羲之蘭亭會在唐代文化中的作用，它們同時也是促成王羲之會在唐代受到重視的外在條件。第一，唐代詩文創作的高度發展、進士及第逐漸成為文人競相追逐的目標，與唐代宴聚、文會、雅集盛行息息相關，而對雅集之需求即可能促成雅集典範的產生。第二，唐代的上巳節已無太強的宗教意義，而以遊樂玩賞為尚，在全國熱衷過節的氣氛下與帝王對節日聚宴的興趣，上巳節成為唐代「三令節」之一，受到重視。

關於第一點，可先以唐中宗為例。武則天之後復位的唐中宗對詩文有高度興趣，在遊宴賦詩的活動上也格外投入，他在修文館學士建置之後（景龍二年〔708〕四月）兩年的三月三日，分別於梨園舉行遊宴（709）、於渭濱祓除（710）。⁸⁵據記載，中宗景龍四年的活動是於宮苑中臨渭亭聚宴，不僅行祓禊之禮，也特賜細柳圈予眾臣以辟癘氣。⁸⁶參與此次聚宴的韋嗣立、沈佺期（650-713）、張說（667-730）等均有相關詩文傳世，故此次聚會當也安排了競詩活動於其中。除了三月三日的燕飲之外，唐中宗還舉辦了許多宮廷宴會，在這些宴會中競詩通常是一項重要的活動。根據賈晉華研究，在武則天、唐中宗以詩歌為進士科的考試科目之後，「所有想要通過進士考試而進入仕途的文人，都必須首先將自己訓練

⁸⁴ 韓鄂，《歲華紀麗》，卷一，「上巳」條。雖然《歲華紀麗》的作者、成書年代都還有疑慮，然而書中之記載，應不至晚於五代，仍可視為記唐人時令的類書。
(<http://mail.scu.edu.tw/~ting6153/research/41.htm>)

⁸⁵ 賈晉華，《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第二版）》，上篇第二章〈《景龍文館記》與中宗朝文館學士詩人群〉，頁 42-43、53、60。唐中宗於景龍四年（景雲元年）年中駕崩，因此景龍時期的上巳節只舉辦二次。

⁸⁶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 7·中宗本紀》（楊家駱主編，《新校本舊唐書附索引一》〔臺北：鼎文書局，2000〕，頁 149）中對於景龍四年的上巳聚宴記載如下：「三月甲寅，幸臨渭亭修禊飲，賜羣官柳捲以辟惡。」另外，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卷 202·文藝傳中·李適》（北京：中華書局，1975）：「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圈辟癘。」，頁 5748。

成為詩人，其結果促使詩歌在知識階層迅速普及化」。在詩歌如此受到重視的時代，景龍宮廷的詩文創作可說是奠基在競爭之上，不僅講速度、重技巧，也有賞有罰。⁸⁷中宗朝之外，整個唐代詩文創作風氣的高漲，也可從天寶年後進士科雜文以詩賦考試為常態及當時文人盛行文會、聚宴之間的關係，來進行觀察。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籤》曾對唐代文會之盛提出一些看法：

唐時風習豪奢，如上元山棚，誕節舞馬，賜酺縱觀，萬眾同樂。更民間愛重節序，好修故事，綵縷達於王公，炬妝不廢俚賤。文人紀賞年華，概入歌詠。……。凡曹司休假，例得尋勝地讌樂，謂之旬假，每月有之。遇逢諸節，尤以晦日、上巳、重陽為重。……。所游地推曲江最勝。…。凡此三節，百官游讌，……。朝士詞人有賦，翼日即留傳京師。當時倡酬之多，詩篇之盛，此亦其一助也。

唐詞人自禁林外，節鎮幕府為盛。……。中葉後尤多。蓋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緣幕府，……。要視其主之好文何如，然後同調萃，唱和廣。……

唐朝士文會之盛，……。開元、天寶間，寧、薛諸王駙馬豪貴家，多好客，……。每宴集賦詩，主坐視簾中，詩之美者，賞百縑。……。⁸⁸

從上面這段引文，大致可歸納出唐代文人在休假、節日往往尋勝地聚宴；進入幕府也需要一展文才、參與聚會；而唐代豪貴更好與文士相交，並以「名馬金箔」贈予宴中詩文絕妙者。因詩文受到社會重視，故「朝士詞人有賦，翼日即留傳京

⁸⁷ 賈晉華，《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第二版）》，上篇第二章〈《景龍文館記》與中宗朝文館學士詩人群〉，頁 64-65；安東俊六，〈景龍宮廷文學の創作基盤〉，《中國文學論集》，3（1972.5），頁 23-24；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賈晉華譯，《初唐詩（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頁 247、269-270。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頁 418 指出武則天時「進士試雖還不是以詩賦為主，但對於進士的選拔，文詞已經佔有很重要的地位，文詞不佳，即使門第高，也不予錄取」。近體詩在武則天、唐中宗之後有了很大的發展，對整個文人階層、宮廷生活也造成巨大影響，不僅文人的養成須精熟詩文創作，天寶年間以詩賦取士成為固定格局的進士科，其功名從高宗、武則天時代「已為官僚所豔羨」，德宗「貞元（785-805）以後，進士的聲名益甚」，進士科的考試內容與唐代詩歌的繁榮發展繁榮，關係十分密切。見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頁 160-170、403-433。另可參見陳弱水（Jo-shui Chen）著，郭英劍、徐承向譯，《柳宗元與唐代思想變遷（Liu Tsung-yü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 773-819）》（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10），頁 15 對唐代文學創作的概略討論。

⁸⁸ （明）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二十七，收入周維德集校，《全明詩話》，五（濟南：齊魯書社，2005），頁 3781-3783。

師」。⁸⁹學者赤井益久對於大曆時期唐代文會興盛的研究也認為，唐代文人除了在侍宴應制的場合需要詩文能力外，根據胡震亨《唐音癸籤》及他對大曆年間浙江詩會的觀察，以文學作為入仕媒介之進士階層的出現，及為尋求取解（選送士子應進士第）而投遞詩文，或受辟召入地方幕僚機構的文人群，均是促使大曆時江南各地詩會形成的主要關鍵。在文會中即有機會獲得詩名，進而享受實質的利益。⁹⁰雖然赤井益久的討論時代是針對中唐，但應該也適用來概述高宗之後的文藝現象。⁹¹簡而言之，個人文才之絕妙與在文會聚宴中能否出色展現文學才智，是唐代文人尋找出路的關鍵，而這樣的聚會要求，與王羲之三五三年的蘭亭會遙相呼應，甚至華麗勝之，故裴度（765-839）的文人聚宴留下「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之句。「蘭亭」、「金谷」不止成為一種文會聚宴的典範，且時人亦有意識要超越之。

此外，大曆時期分別由鮑防（723-790）、顏真卿（709-784）主導的兩浙聯唱，除可作為唐代文人對文會需求之例，更可見王羲之蘭亭會之友朋詩聚比競，在西元八世紀成為浙江文人雅集典範之一側面。唐代宗大曆年間以浙東行軍司馬鮑防、嚴維（?-780）等為首的浙東聯唱（可能為763-770之時）⁹²，及顏真卿於西元七七三至七七七年間任湖州刺史時所主導的浙西聯唱，在須「同時同座」之聯句創作形式上有大規模的表現，因性質接近，在文學史中經常被一併討論。⁹³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鮑防、嚴維、吳筠（?-778）等三十六人的聚會，也是唐代蘭亭會之一例。此次聯唱的〈經蘭亭故池聯句〉提到：

⁸⁹ 權德輿〈吳尊師傳〉也提到：「……。（吳）筠尤善著述，在剡與越中文士為詩酒之會。所著歌篇，傳於京師。玄宗聞其名遣使徵之。……」可見當時凡詩賦能力佳者，其文名傳播亦速。轉引自赤井益久，《中唐詩壇の研究》（東京：創文社，2004），第三章〈大曆期の聯句と詩會〉，頁497。

⁹⁰ 赤井益久，《中唐詩壇の研究》，第三章〈大曆期の聯句と詩會〉，頁501-502。

⁹¹ 傅璇琮曾討論過唐代進士的詩酒文會，其《唐代科舉與文學》書中提到，進士考試結束後對及第者、落第者的宴集歡送，即「無疑是一種詩歌創作的盛會」，見頁423-424。陳弱水也提到「唐代的文人熱衷於相互結交或是組成小團體」，而活躍於文人團體的目的，乃是建立關係與聲名以獲取實際利益的手段，見陳弱水（Jo-shui Chen）著，郭英劍、徐承向譯，《柳宗元與唐代思想變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10），頁48-50。

⁹² 此年代推測見賈晉華，《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第二版）》，上篇第三章〈《大曆年浙東聯唱集》與浙東詩人群〉，頁75。

⁹³ 關於此二團體的研究，請參見賈晉華，《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第二版）》，上篇第三章〈《大曆年浙東聯唱集》與浙東詩人群〉、第四章〈《吳興集》與大曆浙西詩人群〉，頁73-85、86-101；赤井益久，《中唐詩壇の研究》，第三章〈大曆期の聯句と詩會〉，頁482-503；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賈晉華譯，《盛唐詩（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頁318-342；蔣寅，《大曆詩人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125-142。

曲水邀歡處，遺芳尚宛然。名從右軍出，山在古人前。蕪沒成塵跡，規模得大賢。湖心舟已並，村步騎仍連。賞是文辭會，歡同癸丑年。茂林無舊徑，修竹起新煙。宛是崇山下，仍依古道邊。院開新勝地，門占舊畬田。荒阪披蘭築，枯池帶墨穿。序成應唱道，杯得每推先。空見雲生岫，時聞鶴唳天。滑苔封石磴，密篠礙飛泉。事感人寰變，歸慚府服牽。寓時仍覩葉，歎逝更臨川。野興攀藤坐，幽情枕石眠。玩奇聊倚策，尋異稍移船。草露猶霑服，松風尚入弦。山遊頗同調，今古有多篇。⁹⁴

鮑防等三十多人聚會之時，似乎並非三月三日，但從內容看來，可知此會乃詩友特聚於蘭亭故池，以「歡同癸丑年」。雖然「曲水邀歡處」已成塵跡，但眾人仍搭船「尋異」，並有詩酒相伴。白居易西元八三七年在洛水之濱參與之修禊聚會中所出現的舟遊，於鮑防此會已經可見。而鮑防等三十六人以一人一句的形式創作聯句，除如王羲之蘭亭會般，參與者眾，聯句創作形式的競技成分濃厚，也富有眾人同樂的性質。⁹⁵此外，浙西聯唱對詩友聚會之崇尚，追求創作之如遊戲、相競技，從陸羽（733-？）〈水堂送諸文士戲贈潘丞聯句〉中之「會異永和年，才同建安作」一句，亦可窺其所嚮往。⁹⁶而浙西皎然（約 720-798？）〈蘭亭古石橋讚并序〉，也曾述及對王羲之「永和中蘭亭廢橋柱」之珍賞。⁹⁷可見此時對王羲之蘭亭會的追索除了雅集仿學之外，也包含對蘭亭遺跡的珍視與追尋。

總之，從兩浙聯句每每以「蘭亭」、「永和」來代稱王羲之蘭亭會，以及，除浙東、浙西文人群體對蘭亭會的興趣，可見當時兩浙文人對王羲之蘭亭會的欣

⁹⁴ 本文引自賈晉華，《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第二版）》，下篇第二章〈《大曆年浙東聯唱集》輯校〉，頁 358-359。關於此聯句之人數等相關討論見同書，頁 74-75。

⁹⁵ 這種遊戲詩中的表現，在浙西聯唱中更為清晰，文藝氣息亦更為濃厚。賈晉華的研究即指出，顏真卿所召集的公宴及小型集會眾多，這些聚會「突現了『以詩會友』的自覺意識和文人情趣。如《重聯句》中皇甫曾（?-785）所聯云：『詩書宛似陪康樂，少長還同宴永和。』」，且「詩會成為主要目的，而宴遊本身則退居次要地位」。因為聚會風格變得「清雅恬淡」，詩會中也時以茗茶代酒。見賈晉華，《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第二版）》，上篇第四章〈《吳興集》與大曆浙西詩人群〉，頁 94-95；關於遊戲詩的討論見同書頁 97-98。

⁹⁶ 《水堂送諸文士戲贈潘丞聯句》由顏真卿、潘述、皎然、陸羽等作。全詩見賈晉華，《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第二版）》，下篇第三章〈《吳興集》輯校〉，頁 378。

⁹⁷ 皎然〈蘭亭古石橋讚并序〉全文：「山陰有古卧石一枚，即晉永和中蘭亭廢橋柱也。大曆八年春，大理少卿盧公幼平承詔祭會稽山，攜至居士陸羽，因而得之。生好古者，與吾同志，故讚云：古橋石柱，亭亭殊類。渾璞璘玕，亂錢蒼翠。遺在蘭渚，遷於客位。雲狀未銷，水痕猶潰。在物頗重，則人無棄，石豈有心求人所貴？若瓊與玉，呈砥蘊異。如彼陸生，不文其器。此猶可轉，豈君同志？」見董誥，《全唐文》，卷九一七，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嘉慶內府刻本）；另見尹占華，〈大曆浙東和湖州文人集團的形成和詩歌創作〉，《文學遺產》，2000年第4期，頁 66 的討論。

羨之情與縷縷追索。而唐代文人對作詩為文之臨場表現的需求及雅集舉辦對「賢才群聚」的期待，可說是促成王羲之蘭亭會成為唐代文會之其一典範的外在條件。



5-3 唐代帝王的上巳百官聚宴

第二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唐代長安城南之勝概曲江池畔，在上巳節時總是遊人如織，帝王也經常於三月三日在此舉辦百官賜宴的活動，最盛期乃唐玄宗朝（712-756 在位）。⁹⁸根據康駢（唐僖宗乾符四年〔877〕進士及第）《劇談錄·曲江》載：

……都人遊翫，盛於中和、上巳之節。綵幄翠幃，匝於堤岸，鮮車健馬，比肩擊轂。上巳即賜宴臣僚，京兆府大陳筵席，長安、萬年兩縣以雄盛相較，錦繡珍玩，無所不施。百辟會於山亭，恩賜太常及教坊聲樂。池中備綵舟數隻，唯宰相、三使、北省官與翰林學士登焉。每歲傾動皇州，以為盛觀。……⁹⁹

由康駢之言，可見三月三日百官聚集曲江燕飲之盛況，而當時上巳節所留下的詩文數量頗眾，如王維（701？-761）、趙良器、白居易等分別有詩文傳世。¹⁰⁰玄宗時名相宋璟（663-737）曾於〈三月三日為百官謝賜宴表〉詩中提到：「洛水之會，囂呼不足紀也；永和之遊，僻陋不足追也。臣等生逢多幸，遇會聖明，賜與榮渥，逾溢涯分，詢於史策，超軼古今。」直以當今聖上之盛宴勝於王羲之「永和之遊」的「僻陋」。之後白居易〈上巳日恩賜曲江宴會即事〉中也有「共道升平樂，元和（唐獻宗年號，806-820）勝永和」之句。¹⁰¹可見王羲之蘭亭會在唐

⁹⁸ 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頁 305；宋德熹，〈長安之春——唐代曲江宴遊之風尚〉，《唐史識小：社會與文化的探索》（新北市：稻鄉出版社，2009），頁 306-309。

⁹⁹ 康駢，《劇談錄》（叢書集成初編本，第 2834 冊。北京：中華書局據津逮本影印，1991），頁 135。

¹⁰⁰ 見余淑娟，〈唐代曲江詩空間意涵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頁 52-54、「附錄一：唐代曲江詩作作品索引」（頁 175-182）；鄭和福，〈大都為水也風流——唐代曲江詩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頁 39-40；宋德熹，〈長安之春——唐代曲江宴遊之風尚〉，頁 307-309。

¹⁰¹ 宋璟，〈三月三日為百官謝賜宴表〉，收入董誥，《全唐文》，卷二〇七，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嘉慶內府刻本）；白居易，〈上巳日恩賜曲江宴會即事〉，《白氏長慶集》，卷十四，愛如

代除成為普遍之雅集典範外，也成為唐人聚會的比較對象。

綜而言之，唐代文人文化的興盛，可說是促成王羲之蘭亭會在此時成為雅集典範的重要條件。在唐代帝王對詩賦比競的高度興趣、唐代制度以詩賦取士、擇選上已節進入三令節的系統，以及社會上詩文創作風氣興盛、雅集聚宴活動頻繁等多方作用下，再考慮唐太宗以來對王羲之、《蘭亭序》法書的推崇，與唐人對蘭亭會之聚會形式的追仿等，可感受到唐代文人世界所瀰漫的一股文化氣息。在此氣息中可發現，對唐人而言，雅集宴聚之必須存在乃是相應於生活、事業經營之所需。王羲之的蘭亭會在此基礎上，提供了一個文雅聚宴的經典範本。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氣氛的需求下，蘭亭圖象也隨之出現。

6 西元九世紀，蘭亭圖象的出現

關於蘭亭圖象的出現，目前僅能藉由文獻記載想像一二。所見的三筆文獻資料均為九世紀所出，其中最早的記錄是唐代中期柳宗元（773-819）的詩文，另外兩筆分別出自張又新（或李群玉）與李頻之手。

柳宗元寫於唐順宗元和十一年（816）的〈韓漳州書報徹上人亡因寄二絕〉，是悼念好友靈徹上人的詩，其中第一段寫到：「早歲京華聽越吟，聞君江海分逾深。他時若寫蘭亭會，莫畫高僧支道林。」¹⁰²根據南宋韓醇的註釋：「王羲之嘗與桑門支遁游，蘭亭修禊遁亦與焉，故後人寫《修禊圖》，遁亦在其列。」柳宗元此即以王羲之與支遁的友誼來比擬自己與靈徹上人。而韓醇提到蘭亭修禊時支遁亦在其中，其所根據的史料應該是何延之《蘭亭記》，此記是目前所見較完整記錄蘭亭會參與者名單的史料中，時代最早的。¹⁰³《蘭亭記》名單所包含的支遁與王操之，到了南宋桑世昌《蘭亭考》、張淞《雲谷雜記》（約1214年成書）時已被刪除，並加入了王獻之。¹⁰⁴因此可以推測，九世紀剛發展出的蘭亭圖中，有一類是畫有支遁形象的，而此記錄應源自王隱《晉書》與何延之《蘭亭記》之記載。¹⁰⁵

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四部叢刊景日本翻宋大字本）。

¹⁰² 柳宗元，〈韓漳州書報徹上人亡因寄二絕〉，《河東先生集》，卷四十二，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宋刻本）。

¹⁰³ 劉孝標註《世說新語》僅列王羲之、孫統、謝滕三人。

¹⁰⁴ 見本章注50。

¹⁰⁵ 王羲之與支遁等之山陰聚會圖像，據陳韻如研究，很可能與後世文獻所見之「山陰圖」系統有關，描繪重點可能是山水景觀。見陳韻如，〈蘭亭修禊圖式的發源與演變——以臺北故宮藏品

此外，張又新（憲宗元和九年〔814〕進士及第，武宗會昌二年〔842〕為江州刺史）〈三月五日陪大夫泛長沙東湖〉（一作李群玉〔約813-約860〕詩）寫著：「上巳餘風景，芳辰集遠坳。綵舟浮泛蕩，繡轂下娉婷。棲樹迴葱蒨，笙歌轉杳冥。湖光迷翡翠，草色醉蜻蜓。鳥弄桐花日，魚翻穀雨萍。從今留勝會，誰看畫蘭亭。」乃以自己所參與的上巳會與王羲之蘭亭會相較，而此處所言之「畫蘭亭」，更是指出當時蘭亭圖象的存在。

至於第三則，李頻（?-876）的〈府試觀蘭亭圖〉一詩寫道：「往會人何處，遺蹤事可觀。林亭今日在，草木古春殘。筆想吟中駐，杯疑飲後乾。向青穿峻嶺，當白認回湍。月影牕間夜，湖光枕上寒。不知詩酒客，誰更慕前歡？」李頻此詩很清楚地指出府試時所見之《蘭亭圖》。詩文前幾句，主要感歎往日王羲之聚宴之處已成遺跡，但「筆想吟中駐，杯疑飲後乾」二句，應是描寫畫中人物飲完杯中酒後，駐筆思索詩句的畫面，「向青穿峻嶺，當白認回湍。」則是對畫中環境的描述。大致看來，李頻所見之《蘭亭圖》，應該是描繪雅集聚宴的情景，但只是透過文字，仍不易想像畫面所畫之聚會者人數以及呈現的細節。¹⁰⁶雖不知此畫作者何人，由李頻並未特別說明的情況來推測，此圖或許並非出自名家之手。李頻於大中八年（854）中進士，此前可能參與過幾次府試，因此李頻見到《蘭亭圖》的時間應該在西元九世紀中葉前後。¹⁰⁷而浙江地區自八世紀中以來聯唱、文會風氣甚盛，王羲之蘭亭會亦為詩人群體所追仿的對象，李頻詩末句「不知詩酒客，誰更慕前歡？」也說明了自己是蘭亭會的傾慕者，其態度應反應了當時一般文人（或者，至少是江南地區文人）對蘭亭雅集的觀感。

上述三條記載顯示，在唐代對王羲之法書、蘭亭會的推崇與仿效風氣大盛之後，西元九世紀時已可見到蘭亭圖象。圖象的產生，可說是相應於文化、社會發展之所需而來。而由此三則詩文的內容，及唐代中期八、九世紀之詩文對蘭亭會的普遍稱呼多為「蘭亭」的觀察看來，南宋韓醇所言之「《修禊圖》」，應為唐代之後對此主題圖繪的稱法，唐時對王羲之蘭亭圖繪的稱呼，比較可能是「蘭亭圖」。另外可供參考的是，郭若虛《圖畫見聞志》（1074年成書），記載五代畫家支仲元有《蕭翼賺蘭亭》圖，此似乎是現存畫史文獻中最早見到以「蘭亭」為

為中心》，頁215-216。

¹⁰⁶ 陳韻如，〈蘭亭修禊圖式的發源與演變——以臺北故宮藏品為中心〉，頁215對此圖的討論，認為該詩之敘述並未似乎並非描寫雅集活動，「或許謹交代了古代陳跡（蘭亭）與其所在的山水景觀」。

¹⁰⁷ 竺岳兵，〈王勃浙東行迹考〉，收入氏著，《唐詩之路唐代詩人行迹考》

題的畫作。稍晚的南唐顧德謙，也有《蕭翼說蘭亭故事》橫卷一件。就郭若虛的記載來看，五代、南唐時期，與王羲之蘭亭會有關的畫作是以「蘭亭」命名，此很可能是繼承自唐代以來的稱法。¹⁰⁸

至於九世紀所見的蘭亭圖象究竟繪有什麼內容，目前所能判斷的依據，僅李頻〈府試觀蘭亭圖〉的記述一則。而根據李頻詩文所描述：「筆想吟中駐，杯疑飲後乾。向青穿峻嶺，當白認回湍。」二句來看，與今日所見傳李公麟《蘭亭修禊圖》倒有幾分相仿。傳李公麟《蘭亭修禊圖》畫面中，可見到不少蘭亭會參與者正在創作詩文，如畫面中的王羲之右手握筆、左手持紙，即有「筆想吟中駐」的神態（圖 II-4）。而《蘭亭修禊圖》中酒醉了的庾蘊，身旁荷葉上有兩個翻覆了的酒杯，這也有如李頻所謂「杯疑飲後乾」之情景（圖 II-6）。至於「向青穿峻嶺，當白認回湍」所描寫的外在環境，在《蘭亭修禊圖》上亦有呈現。另外如前文所討論，唐代亭文化有高度發展，唐亭的規模較大，且亭中可擺放的物品也相對較多，此可以白居易〈宿東亭曉興〉詩為例。詩中提到：「温温土爐火，耿耿紗籠燭。獨抱一張琴，夜入東齋宿。」¹⁰⁹白居易的東亭中備有火爐、紗製燈籠，且可容身住宿，因此以「東齋」稱之。¹¹⁰透過白居易的描寫，吾人不難想像此亭之規模。而白居易東亭中之擺設，亦可用來對照傳李公麟《蘭亭修禊圖》的亭中布置。如圖 II-7 所見，《蘭亭修禊圖》的亭子規模大如小屋一般，亭邊設有卷簾，亭中備有大型桌、椅，王羲之後方似乎立有一座大屏風或牆屏，後方有小童升著爐火溫酒，除畫面所見區域，此亭右方尚有空間未被畫出。傳李公麟《蘭亭修禊圖》中，亭子的偌大空間，與唐代詩文所描述的唐亭形象實頗為相近。

雖然李頻〈府試觀蘭亭圖〉僅能提供吾人藉由文字來想像畫面，但透過此詩與傳李公麟《蘭亭修禊圖》畫面的呼應之處，以及傳李公麟本對亭子的描繪與唐亭形象的相契和，可推測傳李公麟《蘭亭修禊圖》被創作之時，很可能參考了早期描繪蘭亭會的相關圖像，並進行修改與調整，而這個早期的相關圖像，很可能與唐代蘭亭圖有關。

值得注意的是，李頻為睦州壽昌人，即屬今日浙江杭州建德市，此地域在當

¹⁰⁸ 郭若虛，《圖畫見聞志》（1074 年成書），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一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頁 473、479。

¹⁰⁹ 白居易，〈宿東亭曉興〉，《白氏長慶集》，卷五十一，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四部叢刊景日本翻宋大字本）。

¹¹⁰ 關於此詩與唐亭中之擺設討論，可參見張玲，〈唐亭的文化透視——以唐代詩文為重點的考察〉（西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09），頁 13-14。

時劃屬江南東道，應隸鎮海軍節度使管轄，故其參與府試的地點很可能在今日浙江、江蘇一帶。¹¹¹因此李頻在府試時所看到的「蘭亭圖」很可能是因地緣關係而出現，即王羲之蘭亭會在當時應以其作為地區榮耀之歷史而受到重視。



第三節 小結

本論文第二章，主要是討論王羲之蘭亭會成為後世雅集典範的時機與成因等問題。透過本章討論，可了解西元三五三年王羲之舉辦蘭亭會之前，蘭亭會經常為後人所稱善的「曲水流觴」與競技詩文，早已是文人、宮廷經常出現的聚會活動之一。很可能因王羲之的雅集極為精彩，並且留下千古名品《蘭亭序》，使後人幾乎只記得王羲之的蘭亭之會。王羲之可說是以《蘭亭序》作為「紀念物」的角色加入過去的修禊傳統，從而創造了新的蘭亭傳統。而這個記憶卻是在唐太宗的全力推動下，才使王羲之及其書法，以及《蘭亭序》之作與蘭亭會，真正形成一個典範，成為後人的記憶。而唐太宗對王羲之及其書蹟的喜好、推崇，以及唐代士人對於源出南方之蘭亭文化、蘭亭記憶的追索，很可能與唐初北人對南方「新文化」之興趣有關。¹¹²至於王羲之蘭亭會的幾個特殊性，如固定的舉辦日期、儀式活動、獨特的場所設計與詩文比競、「賢才群聚」的集會、紀念產品的製作等五項，雖非全然被納入、實踐於唐人所仿學的續蘭亭會中，但蘭亭會正是在這種彈性的操作下，才得以躍出「修禊 / 上巳」聚會的框架，有機會成為唐代一般文人雅集的典範。雖然如此，被認可的續蘭亭會仍有兩個條件是必須被遵循的：第一，「務須臨水」的場所要求；第二，參與者（或觀者）對「賢才群聚」之集會的期待。此兩點可說是王羲之蘭亭會得以為後代一再追仿的主要原因。在唐代熱衷於王羲之及其蘭亭會的整體氣氛下，描繪蘭亭會的圖象才開始出現，甚至在傳李公麟《蘭亭修禊圖》廣泛出現於明清之際，此畫題也成為一個畫史中的知名主題，並在明代中後期開始看到許多不同於傳李公麟本的新表現。¹¹³

王羲之蘭亭會在宋代與元代的表現，黃寬崇教授已有兩篇論文討論，明代續

¹¹¹ 劉聲波，《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唐代卷（上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頁 479-480。感謝游逸飛教授賜知此書。

¹¹² 參閱廖宜方，《唐代的歷史記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第六至八章，特別是頁 396-402。

¹¹³ 關於明代蘭亭圖象的討論，請參見王鈴雅，〈勺園與米萬鍾文化形象的形塑：《勺園圖》相關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第二章。

蘭亭會的研究，則可參考王鈴雅的論文，但對於清代續蘭亭會的狀況目前的研究仍屬闕如。¹¹⁴筆者企圖以清代之發展作為本論文的研究重點，而本章即是了解後世續蘭亭會之組成與運作條件，並為評估清代宮廷內、外之續蘭亭會的一個重要基礎。



¹¹⁴ 黃寬重，〈交游酬唱：南宋與元代士人的蘭亭雅集〉，收入包偉民、劉後濱主編，《唐宋歷史評論（第二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頁 212-235；黃寬重，〈以藝會友：南宋中期士人以〈蘭亭序〉為中心的品題與人際關係〉，《漢學研究》，第 35 卷第 3 期（2017.9），頁 173-211；王鈴雅，〈勺園與米萬鍾文化形象的形塑：《勺園圖》相關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第三章| 對群體感的營造：清初宮廷之蘭亭文化新象與追憶



清代宮廷中有許多座流杯建構。如位於北京紫禁城旁西苑的流杯亭「流水音」、紫禁城寧壽宮花園中的「禊賞亭」，位於承德避暑山莊的「曲水荷香」、「香遠益清」二亭，於海淀圓明園四十景中的「坐石臨流」景（即「蘭亭八柱亭」）及「寄情咸暢亭」、北京市郊潭柘寺行宮院內的「猗玗亭」，與靜宜園（現為香山公園）虛朗齋中的曲水流觴處等。這些流杯建構主要建設於康熙至乾隆年間，有的流杯亭尚存於世，亦有只剩流杯基座或僅可藉由繪畫、文獻記載來加以想像者，但整體來看，清代初中期的流杯建構數量之多，令人難以忽視。尤其啟人疑竇的是，滿清帝王的宮廷中為何需要一再於各處廣設流杯亭？是否帝王對於王羲之或流杯亭有特殊的見解或喜好？否則宮廷中，單單避暑山莊即設有兩座流杯亭，故筆者認為流杯亭在清初宮廷中被建造、使用及其文化意義十分值得深入探討。過去，從未有學者針對清宮中的這批流杯建構加以研究，以下筆者將分別就康熙、乾隆兩個時期進行討論，而雍正時期的表現由於是繼承康熙而來，因此將納入康熙時代一併觀察。¹

第一節 蘭亭傳統的新創造：康熙、雍正朝之「天趣蘭亭」

康熙時代的流杯亭，主要為西苑中的「曲澗浮花／流水音亭」，以及避暑山莊中的「曲水荷香亭」、「香遠益清亭」三座，目前這三座流杯亭均尚存原址，但西苑流杯亭因屬政事中心並未對外開放。從這三座流杯亭的存在，可發現康熙皇帝對於與王羲之蘭亭會之歷史相關的流杯亭，具有特殊喜好。但目前最早可見之康熙在流杯亭活動的相關記載，是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皇帝至河北遵化祭祀世祖章皇帝孝陵時，於當地湯泉流杯亭的紀錄。

1 康熙帝對流杯聚宴的興趣

根據康熙朝《遵化州志》，遵化湯泉是明萬曆四年（1576）由戚繼光（1528-1588）

¹ 有些研究指出清代修禊活動之俗「限於宮廷舉行」，但這些著作未引文獻為依據，筆者亦遍尋不著相關記載，故對此說法甚為懷疑。相關說法如于倬雲等，《乾隆皇帝的祕密花園》（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2），頁94。

所建，當時原有「官池」、「民池」之分，但入清之後將「官池」改為「禁池」專供帝王使用，而「王公大人祓濯，各有其區」。²目前並未見清代所載之湯泉流杯形式，但根據戚繼光之〈薊門湯泉記〉與《（乾隆）直隸遵化州志》中之「湯泉浴日圖」，當可藉以想像一二。〈薊門湯泉記〉提到：

……。乃命工下稻田鑿渠百餘武（案：半步為武），以遡其陞（案：水中之小塊陸地），折甃（案：以磚壘之）二尺，深二丈三尺，而出泥丈餘。……。泥盡粼粼，其泉濫出，仍甃之而實其底。塞以方寸之石於渠道，樹捷（案：豎立）以便重濬通竇，則毋勞折甃為也。加高三尺出地為防，可以俯飲而立翫之矣。其周七丈，衡二丈二尺，防面為石渠，可以浮太白。竇（案：穿通）其南北，中衡而對出。北出承以文石，歷歷如雨，建瓴（案：自屋頂往下瀉水）下而窒（案：阻遏）。其南則為水簾，臨池有亭如八卦及虛雷數九，顏曰「九新」，有題語焉。當雷為坎（案：坑穴），前竇承泉，左右竇以分之。北得寒泉為池，如半月，有橋，上為敕建觀音殿，前施檻垣如雉堞狀。南出石龍口如沫，北窒則如瀑布伏流，而西醜（案：疏導）為石渠，經序室左轉，而環石盤以觴，滿座勾折，復入於室，匏尊藏於室。人因泉應機而緩急之不待，入又隨流而給矣。觴亭下方，步欄三面，以列石碣，皆吟詠也。……³

戚繼光之文雖將湯泉與八卦亭（應即「觴亭」）及流經其中之流觴石渠的布置說明得頗為詳細，但若只透過文字也不容易理解。而將此文字描述對照於《（乾隆）直隸遵化州志》之「湯泉浴日圖」，以及今日遵化湯泉整修前照片，可大致猜測此流觴石渠所經之區域似乎頗大，除流經方池、八卦亭區域，且出入「序室」，酒尊即藏於此室之中，觴亭下方還刻有吟詠的詩文（圖 III-1、圖 III-2）。但現今遺址經整修後似乎無法盡窺原貌，且今日所見之此流杯亭並非具有八個角的八卦亭，而為六角亭，「湯泉浴日圖」中所見亦為六角亭。根據《（康熙）遵化州志》所載，此地將官池改為禁池後，「輪煥改觀，甲於天下」，因此康熙年間遵化湯池

² 鄭僑生修，〈湯泉記（舊志湯泉觴詠）〉，《（康熙）遵化州志》，卷二，愛如生中國方志庫（據清康熙間〔1661-1722〕修康熙鈔本）。《遵化州志》載完成於萬曆五年，但根據戚繼光子所整理之年表，戚繼光之〈薊門湯泉記〉實完成於萬曆四年。見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耑編》，卷十一，愛如生中國方志庫（據清道光〔1820-1850〕刻本）。

³ 戚繼光，〈薊門湯泉記〉，《止止堂集》，橫槊稿中，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光緒十四年〔1888〕山東書局刻本）。此版本「滿座勾折」之「座」字原為「壁」字，依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耑編》，卷十一，愛如生中國方志庫（據清道光〔1820-1850〕刻本）之「座」字較為合理改之。

應曾經過整修。⁴戚繼光將此流觴石渠與詩文吟詠放在一起，顯然建造當時，他很清楚湯泉之流杯建構是呼應於王羲之蘭亭會流杯觴咏之功能。這層意義，康熙皇帝也很清楚，康熙十七年至湯泉時即留有他與臣子共樂的詩文，〈溫泉流杯戲作〉：

曉霜早落滿池清，一氣涓涓愜勝情。偶坐浮杯幾暇日，君臣對景論平生。⁵

雖然遵化湯泉的帝王、臣子沐浴之處並不相同，但觴亭顯然是供眾人飲水酒、話家常之公共區域，而康熙皇帝即於此處與親近的臣子閒話生平。

康熙十七年之後，高士奇與康熙皇帝的詩文，分別記載了另外兩次康熙與臣子浮杯共樂的情景。首先是康熙十八年(己未, 1679)陰曆二月最後一日(晦日)，康熙與臣子在西苑流杯聚宴，事見高士奇〈己未二月晦日蒙恩賜宴西苑恭紀四首〉，其中第二、四首詩文提到：

淑景初晴後，佳辰上巳前。藻浮春水碧，花帶曉霞鮮。藉草沾香醕，臨流對綺筵。羽觴須盡醉，天語更頻傳。

遠勝東堂會(晉太和六年命羣臣于東堂臨流小會)，何殊曲水遊(南宋顏延之有〈三日賜讌曲水賦詩序〉)。早鶯啼太液，芳樹繞瀛洲。⁶

雖然高士奇全詩並未提到流杯亭，但他文中所使用的幾個文辭，如「上巳」、「東堂會」、「曲水遊」，均是出自與流觴聚宴相關之歷史典故，⁷而「臨流」、「羽觴」，也是描述流杯活動的經常用語。從高士奇的詩文看來，此次康熙皇帝賜宴西苑應該也有安排臨水泛杯，並且不論高士奇所提到的東堂之會或顏延之參與的曲水宴，都是古早帝王上巳聚宴的修禊典故，並非作為文人雅集典範之王羲之的蘭亭會。

⁴ 鄭僑生修，〈湯泉記(舊志湯泉觴咏)〉。

⁵ 清聖祖，〈溫泉流杯戲作〉，《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三十三(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2上-6下。

⁶ 高士奇，〈己未二月晦日蒙恩賜宴西苑恭紀四首〉，《金鼈退食筆記》(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上，頁4下-5下。

⁷ 「東堂會」、顏延之「曲水遊」典故，可參考如徐堅編，《初學記》，卷四，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光緒孔氏三十三萬卷堂本)。

誠如本論文第二章研究，漢代帝王常於上巳修禊，西晉帝王更經常在上巳日邀集臣子臨水聚宴，因此高士奇此處所選擇之流杯典故，是帝王宮廷的臨水修禊聚宴傳統，而非士人修禊流觴雅集的傳統。不過，宮廷傳統中的上巳修禊聚宴，後來不再拘泥於上巳日舉辦，甚至帶有如同士人群體聚會的「雅集」性質，則可說是王羲之蘭亭會出現後才發生的改變，而此兩個傳統在歷代中也一直是並存的，康熙皇帝對此應該有基本認識。也因此對康熙來說，宮廷修禊聚宴的傳統同時揉合王羲之蘭亭會的傳統，應該才是他更有興趣追繼的。至於高士奇，畢竟為人臣子，因此對他來說詩中提及君王臨水賜宴之典，似乎更合乎他作為臣子的身分。

康熙十八年陰曆三月十五日（望日），康熙又舉辦了另一次君臣聚宴。康熙皇帝的〈春日内苑賜宴詩并序〉提到，當日「賜內閣大臣及侍衛」於內苑宴飲、雅玩，「浮杯於西齋」。⁸「浮杯」一般只用於描述曲水流觴之類的活動，惟康熙此句中之「西齋」不知位於內苑何處？加上《清實錄》並未記載當日聚宴之事，因此無法得知確切地點。⁹那麼「西齋」是否可能即是西苑？遍查清宮對「西齋」的用法，似乎向來不用來指稱西苑，若康熙此詩「西齋」所指確實為西苑，那麼這個用法也算特例。不論如何，古來原本也有稱為「流杯池」的流杯建構，因此即使當時皇宮內苑尚未設置流杯亭，也並非無法流杯，宮中當時應該也有可用以浮杯聚宴之處。關於流杯池之使用方式，也許可以麟慶（1791-1846）《鴻雪因緣圖記》中之〈二牖修禊〉附圖藉以想像（圖 III-3）。¹⁰〈二牖修禊〉圖中，修禊會之參與者紛紛列坐岸邊，另有一艘船航至近岸處，上有僕侍將酒杯放置於水中，讓流水浮觴，再由岸上僕侍將酒杯撈上岸，送至參與者手中。宮廷中之流杯池的流觴方式應該也相去不遠。而藉由上文關於康熙於宮廷舉辦流杯聚宴的這兩則記載，可了解康熙皇帝本人對於藉由——與古代君臣泛杯聚宴、王羲之蘭亭會之文人雅集兩個傳統有關——的流觴活動，來與臣子共樂之事，確實頗具興致，故常於宮中設臨水之宴。¹¹

⁸ 清聖祖，〈春日内苑賜宴詩并序（己未三月，律應姑洗，望日之吉，賜內閣大臣及侍衛宴於內苑時，乃玩花於絳雪，玉樹含風，浮杯於西齋，金池漾月，飲酒樂甚，因率題四韻，以示羣臣。）〉：「春深內苑裏，珍席宴羣臣。蝶向雙檐舞，花飛複閣。和羹期上佐，調鼎協洪鈞。簫鼓歡無極，芳年醉此辰。」見清聖祖，〈春日内苑賜宴詩并序〉，《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三十四，頁2下-3上。

⁹ 查康熙十八年三月十五日（庚戌）《實錄》，並未記錄當日康熙與臣子聚宴之事。馬齊等修，《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八十，愛如生古典資料庫 明清實錄，「庚戌」條。

¹⁰ 二牖在清代北京東便門外，麟慶此次修禊，聚會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麟慶，〈二牖修禊〉，《鴻雪因緣圖記》，第一集（北京：線裝書局據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影印，2003），頁67-68。

¹¹ 明代西苑附近的兔兒山（又稱「小山子」、「兔山」）中也有一「九曲流觴」，入清後不知是否



2 西苑，「曲澗浮花」流杯亭

遵化湯泉的流杯亭是由明代改建而來，而康熙朝使用最頻繁的流杯亭，似乎是位於紫禁城旁西苑之淑清院一帶的流杯亭。¹²清聖祖為此流杯亭題額為「曲澗浮花」，清高宗另題為「流水音」。根據王曉芳研究，這座流杯亭之水臺盤由漢白玉石雕所構成，水流渠道深度約十五公分、寬約十公分。¹³由 Osvald Sirén 一九二、三〇年代所拍攝的圖版看來，此流杯亭的水臺盤，是由多方不規則大小的基石所排列組成，這個作法與避暑山莊等地的建造方式十分不同（圖 III-4）。另外吳空表示，乾隆二十一至二十三年（1756-1758）曾大幅整修西苑，雖然他認為流杯亭等地在當時應也曾經擴建，但所根據之檔案並無查得相關資料。¹⁴也許此流杯亭很可能大致維持了康熙建造當年的樣貌。《國朝宮史》、《日下舊聞考》中所描述之流杯亭一處如下：

（垣門）門東，巖壑窈窕，林樹深幽，有飛泉瀑布下注池中，流繞細渠，屈曲穿石間，中為流杯亭。¹⁵

韻古堂左側垣門，門東為流杯亭。（《國朝宮史》）〔臣等謹案〕垣門石刻聖祖仁皇帝御書流杯亭額曰「曲澗浮花」，皇上御書額曰「流水音」。聯曰：「積素墜枝全作雨，懸流落澗半成冰」。¹⁶

根據《國朝宮史》卷十五指出，對聯為「御筆」所書，此處所指當是乾隆書蹟。

關於這座流杯亭的建造時間，依高士奇（1644-1703）《金鰲退食筆記》所言推算，最晚在康熙二十年（1681）已經建成，或許此亭之建立就是為了滿足康熙皇帝喜歡與臣子一同浮杯的需求而來：

尚存。見于敏中等編纂，《日下舊聞考（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頁 667。另可見明臣遊西苑曲水流觴之記載，如李賢，〈賜遊西苑記〉；韓雍，〈賜遊西苑記〉，收入蔣廷錫等編纂，《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考工典卷五十三，第 97 冊（臺北：文星書店，1964），頁 553-554。


¹² 關於西苑流杯亭所在位置，見吳空，〈清代北京西苑的造園特色〉，收入于倬云、朱誠如主編，《中國紫禁城學會論文集（第二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頁 219-220。

¹³ 王曉芳，〈中南海流杯亭〉，《古建園林技術》，1986 年第 1 期，頁 28。

¹⁴ 吳空，〈乾隆皇帝修中南海問題初探（二）〉，《紫光閣》，1988 年第 7 期，頁 47。

¹⁵ 于敏中等修，《國朝宮史》，卷十五（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 5 下-6 上。

¹⁶ 于敏中等編纂，《日下舊聞考（一）》，頁 300-301。



本朝亭殿久不修治，己未（康熙 18 年）、庚申（康熙 19 年，1680）歲，上避暑瀛臺，余與張敦復（張英，1637-1708）學士寓直于無逸殿之東小室五楹。……。次年（應指康熙 20 年）改直廬為皇太子（案：允礽）避暑宮，即水碓陳列山石，雜植新篁，為清流激湍，茂林修竹，構亭于無逸殿舊址，曰流杯亭。風樵水檻，薨桷飛動，細渠屈曲，濺玉飛瓊。上題「曲澗浮花」四字，常宴外藩于此。大學士益都馮公（馮溥，1609-1692）致政將歸，賜遊西苑，中使鼓棹至流杯亭，備肴核內酒，飲宴盡歡。益都賦詩紀事，都下榮之。¹⁷

《金鰲退食筆記》除提供西苑流杯亭建造的時間之外，也為此亭之建造依據與使用，提供了三個重要訊息。第一，此流杯亭近處特別種植竹子、堆壘山石，以呼應王羲之〈蘭亭序〉所形容之蘭亭會的場所面貌；第二，康熙皇帝經常在此宴請外藩；第三，重要臣子亦為康熙皇帝邀請至流杯亭的對象。在現存文獻對清宮流杯亭之使用並無太多記載的情況下，高士奇對流杯亭的紀錄顯得格外重要。除高士奇之外，其他清代官員也有記載康熙常於流杯亭宴請大臣之事。如嚴繩孫（1623？-1702，康熙 18 年博學鴻儒）〈西苑侍直雜詩〉第十八首，有「頻賜流盃亭上宴，氊裘花外拜恩歸」句。¹⁸根據記載，嚴繩孫於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三年左右尚有官職在身，之後似乎已經辭官，因此他侍直的時間與高士奇相去不遠，此詩應該也完成於康熙二十三年前。¹⁹就此來看，康熙二十年左右完成西苑流杯亭之後，他頗常於此處一帶宴請外藩及重要臣子。

除了康熙皇帝之外，《國朝宮史》卷十五也收錄不少乾隆皇帝以西苑流杯亭為題之作，可惜《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雖可見到以「流杯亭」為主題的詩作，但康熙皇帝並未加注為那一座流杯亭而無法參考。就乾隆來說，清宮其他座流杯亭也未如西苑流杯亭般，讓他留下數量較多的詩文。因此看來不僅康熙經常在西苑流杯亭宴請外藩、近臣，乾隆皇帝也經常流連於此，故西苑流杯亭應是清宮之流杯亭中，帝王使用頻率最高者。《國朝宮史》所載之乾隆西苑流杯亭詩文中，

¹⁷ 高士奇，《金鰲退食筆記》，卷上，頁 12 上-14 上。

¹⁸ 嚴繩孫，〈西苑侍直雜詩〉，《秋水集》，卷六，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康熙兩青草堂刻本）。

¹⁹ 嚴繩孫資料，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網頁，「人名權威人物傳記資料查詢」系統，網址：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swweb/html_name/search.php，檢索日期：2018-6-1。

乾隆七年（1742）〈題瀛臺流杯亭瀑布水詩〉有「迴波能送酒，緩溜似調琴。信可蘭亭樂，依然濠濮心。」之句。乾隆十年（1745）〈淑清院流杯亭作〉詩，也有「流杯學蘭亭」一句。於此可知西苑流杯亭的建造與存在對乾隆來說，也如對康熙皇帝一般，都是以王羲之蘭亭會作為學習典範的。

康熙皇帝與西苑流杯亭有關的活動紀錄，最早有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十四日，賜將退休之大學士馮溥遊西苑的記載。²⁰馮溥本人在北京萬柳堂舉辦的修禊聚會在當時士人之間十分知名，甚至有「蘭亭會」的美稱，此次康熙恩賜馮溥單獨遊覽西苑對他來說，應是十分榮幸的恩寵。²¹根據毛奇齡（1629-1713），馮溥在西苑所遊之處「歷諸亭臺」，但不論高士奇或毛奇齡均特別提到馮溥在西苑流杯亭的活動，可見馮溥當年確實以其萬柳堂修禊名滿京師。

另一則記錄，是關於康熙在瀛臺宴請大臣之事。康熙二十一年（1681）六月四日因移駐瀛臺，欲仿效「《宋史》所載，賜諸臣於後苑賞花、釣魚」。²²此次聚宴應頗為盛大，可惜當日情景並未有其他記載，並且也無文獻說明此次聚宴地點是否也包含了流杯亭。但乾隆十一年，曾慎重仿效康熙此次瀛臺錫宴，舉辦了為期兩天的盛大宴會，其中地點即包含西苑流杯亭。關於此次賜宴記載較多，或許可幫助吾人瞭解清代帝王對於流杯亭之使用方式。

乾隆十一年陰曆八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在瀛臺「賜滿漢大臣翰林筵宴」於豐澤園。此次錫宴受恩參與者，有大學士等官員共一百七十六人。筵席結束後，「駕幸淑清院曲水流觴，設寶座，賦詩，並命從宴諸臣聯句」。結束之後，皇帝返宮，由宮殿監帶領諸大臣參觀瀛臺、淑清院等處，之後又停留在流杯亭賞賜賜果。隨後乾隆至勤政殿宮門內頒賜禮物給大臣官員，活動才正式結束。²³這次的盛宴有大臣也記錄了當時的狀況。如錢儀吉（1783-1850）〈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梁文莊公詩正（1697-1763）行狀〉提到：

……。（乾隆皇帝）八月召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諸臣，赴瀛臺賜宴，和御製詩四章，又仿柏梁體賦詩，又用唐臣李嶠〈甘露殿應制詩〉字分韻。

²⁰ 此紀年根據毛奇齡，〈文華殿大學士太子太傅兼刑部尚書易齋馮公年譜〉，《西河集》，卷一一五（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 23 上-下。

²¹ 「蘭亭會」之稱及相關研究，見鄭永華，〈清代萬柳堂及北京園林文化〉，《明清論叢》，第 13 輯（2014.1），頁 265-271。

²² 馬齊等修，《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一〇三，「己卯」條。

²³ 于敏中等修，《國朝宮史》，卷七（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 28 上-29 上。

宴畢，上憩流杯亭，命公等雜坐水石間，分牋聯句，既諭登舟遊覽如賞花釣魚故事。……²⁴



張廷玉〈冢子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若靄行略〉也提到當日「侍宴於含光殿（案：應為「涵元殿」之誤）²⁵」後，又「泛舟至流杯亭。諸臣即事聯句，各賚書牋縑帛、嘉魚珍果而歸。」²⁶張廷玉記錄乘船到流杯亭應該是誤記，根據《國朝宮史》、錢儀吉二則記載，應是君臣在流杯亭聯句之後才遊覽西苑，並非如張廷玉之印象。而錢儀吉特別提到乾隆皇帝轉至流杯亭後，命大臣等「雜坐水石間」，分紙聯句。就此活動安排看來，即如〈蘭亭序〉中所描述，參加王羲之蘭亭會者列坐於「崇山峻嶺，茂林脩竹」之間，而西苑流杯亭中之水渠及南海水域，正如「映帶左右」的清流一般。此次流杯亭君臣詩文，〈賜宴後憩流杯亭集臣工四十五人聯句用十一真韻〉，收入乾隆《御製詩集》。原本錫宴參與的臣子有一百七十六人，但至流杯亭參與聯句，僅四十五人，此人數可能是為了趨近王羲之蘭亭會四十一、二之人數而選。其中如乾隆「禊事學春辰，勝會方亭午」、「蘭亭思筆健」，均清楚指出此流杯亭宴集活動與王羲之蘭亭會之間的關係；通政使雷鋹（1697-1760）「樂聖笑兼嘖」，則描述因在流杯亭區域參與大臣僅四十五人，故可親近乾隆皇帝笑顏的情況。²⁷雷鋹的描述讓人想起同為臣子身分的高士奇，他的〈己未二月晦日蒙恩賜宴西苑恭紀四首〉，也有描述相同意見的「天語更頻傳」。此外，也令人聯想起康熙皇帝〈溫泉流杯戲作〉「偶坐浮杯幾暇日，君臣對景論平生」之句，刻意著重君臣於閒暇時，共同分享彼此對生命、日常之體會的私密感受。這些描述所意指的，是君臣於流杯亭聚宴時的特殊情景與情感。相較於其他建物的規模，流杯亭中較小而有限的空間使君臣之間益顯親近，即使臣子未必全進得了流杯亭，處在流杯亭附近區域亦是親近清光的一種親密體驗，也因為在聚宴輕鬆的氣氛下，聽到皇帝的殷勤言語，更顯聚宴之融洽與帝王、臣子間的親近情誼。而這種君臣間猶如親朋之間的親密感、群體感，應該正是康熙與乾隆皇帝欲藉流杯亭賜宴活動所特意塑造的。

²⁴ 王昶，〈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梁文莊公行狀〉，《春融堂集》，卷六十一，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嘉慶十二年塾南書舍刻本）。

²⁵ 根據《國朝宮史》應為「涵元殿」。見于敏中等修，《國朝宮史》，卷七，頁28上。

²⁶ 張廷玉，〈冢子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若靄行略〉，《澄懷園文存》，卷十五，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乾隆間刻澄懷園全集本）。

²⁷ 清高宗，〈賜宴後憩流杯亭集臣工四十五人聯句用十一真韻〉，《御製詩集 初集》，卷三十五（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5上、6下、7上。

就前文所討論，康熙、乾隆二位帝王其實十分理解王羲之蘭亭會深受歷代文人社群所嚮往的最根本原因，那就是基於〈蘭亭序〉「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所衍發出的文化意涵——對於「賢才群聚」的想像與期待。漢、晉帝王舉辦臨水聚宴時，王羲之蘭亭會的典範尚未形成，雖然君王共宴已可顯示君王對臣子的特殊禮遇，但一直到王羲之蘭亭會在唐代成為文人聚會之典範後，王羲之蘭亭會所塑造之「賢才群聚」的形象與活動才深植歷代文人心中。此外，固然歷代追王羲之所舉辦的續蘭亭會因人、因時、因地各有不同的目標或重點，例如據黃寬重研究，宋淳熙九年（1182）上巳日，朱熹（1130-1200）及友人聚會時，重點活動是一同觀賞包含《蘭亭序》書蹟在內的金石書畫；沈揆（1160 進士）與朋友的上巳聚會，重心則在於「賞景賦詩」；而宋元之際士人的續蘭亭會，也有南北各自不同的表現。²⁸雖然這些集會的舉行均有其各自的目的，但不可否認，這些聚會的源起，不論參與者是否真為同好或真屬同一個群體，他們一起進行續蘭亭會的這個舉動，在傳統對王羲之蘭亭會「賢才群聚」的認知框架下，對參與者自身或旁觀者雙方而言，應不難將自身／參與者置入「群賢畢至，少長咸集」——屬於同一群體、具有群體感——的這個脈絡傳統中來加以想像。而這個傳統的這層意涵，康熙與乾隆是知之甚詳的，尤其在康熙皇帝所建造之避暑山莊流杯亭的設計上，更凸顯出康熙更是基於文人趣味而非帝王傳統來理解流杯聚宴。

此外，康熙皇帝對於王羲之的喜愛，可能也與他對書法的興趣有關。康熙雖然書宗董其昌（1555-1636），對王字也相當推崇，康熙《御製詩文集》中即有多篇題寫王羲之書蹟的跋文。²⁹而將王羲之塑造成書聖的唐太宗，亦是康熙皇帝所景仰的統治者，康熙曾於〈書蘭亭帖後〉一文讚譽唐太宗雖「寄心翰墨」仍「無妨於治國理民之政」。³⁰因此，似乎康熙皇帝對於王羲之的喜好，多少也與他對唐太宗的景仰有關。

²⁸ 黃寬重，〈交游酬唱：南宋與元代士人的蘭亭雅集〉，收入包偉民、劉後濱主編，《唐宋歷史評論（第二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頁 219-220、223-232。

²⁹ 如清聖祖，〈倣二王書蹟〉，《清聖祖御製詩初集》，卷九，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 542 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頁 100；清聖祖，〈跋王羲之快雪時晴帖〉，《清聖祖御製文初集》，卷二十八，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 543 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頁 283。康熙皇帝之書風討論，見劉恒，《中國書法史（清代卷）》（南京：鳳凰教育出版社，2011 版），頁 50-55。

³⁰ 清聖祖，〈書蘭亭帖後〉，《清聖祖御製文初集》，卷二十九，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 543 冊，頁 291。

3 避暑山莊，「曲水荷香」、「香遠益清」流杯亭

康熙四十二年（1703）開始打造位於承德的避暑山莊（原為「熱河行宮」），康熙五十年（1711）「避暑山莊」正式定名，隨後又經乾隆皇帝繼續修建，直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才告完成。³¹避暑山莊中有兩座流杯亭，「曲水荷香亭」與「香遠益清（含澄景）亭」，分列於康熙皇帝《御製避暑山莊詩（並圖）》中的第十五、二十三景（圖 III-5、圖 III-6）。³²過去對於避暑山莊的研究雖然大致都有提及山莊裡的流杯建構，但相關研究並不多見。³³Stephen Hart Whiteman 在博士論文中雖有較大篇幅討論收錄於康熙與乾隆皇帝之《御製避暑山莊詩（並圖）》中的「曲水荷香」、「香遠益清」二圖，但其主要是透過張宗蒼（1686-1756）、勵宗萬（1705-1759）與錢維城（1720-1772）的同題之作，討論現已不存之王原祁（1642-1715）《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冊》（載於《石渠寶笈》）與沈喻繪之《御製避暑山莊詩（並圖）》木刻版畫間的關係，同時也認為流杯亭（文中以「曲水荷香」為例）等存在於湖區中的漢族傳統建築，反映出此區之建造脈絡應與文人致事生

³¹ Philippe Forêt, *Mapping Chengde: The Qing Landscape Enterpri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pp. 14. 另可參閱本書對避暑山莊之研究，作者從新清史的角度出發，認為避暑山莊之建立與設計，是作為滿州身分統治者之乾隆皇帝完成內亞、中原統治之洪業的重要一環。康熙時期對避暑山莊的建設，亦可參見馬雅貞，〈皇苑圖繪的新典範：康熙《御製避暑山莊詩》的製作及其意義〉，《故宮學術季刊》，第 32 卷第 2 期（2014.12），頁 42 的討論。

³² 清聖祖撰，揆敘等注，沈喻繪圖，馬國賢（Matteo Ripa）製圖，《御製避暑山莊詩（並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武英殿刊朱墨套印本），第 15、23 景。《御製避暑山莊詩（並圖）》有三個版本，分別為沈喻繪圖，朱圭（約 1644-1717）、梅裕鳳製圖，康熙五十二年（1713）滿文本（附木刻版畫）、漢文本（附馬國賢製作的銅板畫）及乾隆六年（1741）沈喻繪圖，朱圭、梅裕鳳製圖之漢文本三種。見宋兆霖主編，《匠心筆蘊：院藏明清版畫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5），頁 168-171。關於沈喻對《御製避暑山莊詩（並圖）》的參與，根據 Stephen Hart Whiteman 以避暑山莊為主題的研究中指出，馬國賢（1682-1745）紀錄此避暑山莊圖與沈喻有關之事，為當時人唯一的紀錄。見 Stephen Hart Whiteman, "Creating the Kangxi Landscape: Bishu shanzhuang and the Mediation of Qing Imperial Identity" (Ph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2011), pp. 174-175, 310; Basil Gray, "Lord Burlington and Father Pipa's Chinese Engravings," *The British Museum Quarterly*, 22, no. 1-2 (1960), p. 41. 另可參見韓琦，〈馬國賢與西方銅版印刷的傳入——從中西文獻看《御製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圖》的製作〉，《中國印刷》，2007 年第 11 期，頁 106-109。此外，乾隆六年重刊的避暑山莊圖，在最後一景「水流雲在」圖左下有「內務府司加一級臣沈喻恭畫，鴻臚寺序班加二級臣朱圭、梅裕鳳全恭鑄」之字。圖版見曲延鈞主編，《中國清代宮廷版畫》，第 6 冊（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2002），頁 483。（此書頁 482-483 所登原為「甫田叢樾」景，誤植為「水流雲在」景。）關於康熙五十二年與乾隆六年的木刻版究竟是否為同一版本，根據筆者在國立故宮博物院調件申請比較後認為，二者極其相似，但乾隆版本的印製品質較差，最主要的差別是有些同題畫頁的遠山輪廓角度不太相同，故筆者認為乾隆年間的版本很可能為乾隆年間根據沈喻、朱圭、梅裕鳳的版本所重刻。由於收藏有滿文本之國立故宮博物院尚未將此書製作成影像檔，故本文研究選用時代、表現均接近於滿文本的銅版畫作為討論對象。《御製避暑山莊詩（並圖）》的研究，請參閱馬雅貞，〈皇苑圖繪的新典範：康熙《御製避暑山莊詩》的製作及其意義〉，頁 39-80。

³³ 如 Philippe Forêt 的 *Mapping Chengde: The Qing Landscape Enterprise*，就沒討論到避暑山莊中之流杯亭。

活有關。³⁴大抵而言，以避暑山莊整體作為研究主題的著作，往往未針對單一景點的設置與意義進行探究，而企圖給予一個針對山莊的「整體」論述。

避暑山莊的二座流杯亭目前均位在平原區「萬樹園」、「試馬埭」附近，「曲水荷香亭」位在湖區如意湖西北沿岸附近，「香遠益清（含澄景）亭」則鄰近湖區澄湖東北沿岸（圖 III-7）。這兩座流杯亭的原始面貌，被重現在康熙、乾隆皇帝的《御製避暑山莊詩（並圖）》、《熱河志》等刊本、乾隆朝《熱河行宮全圖》（Library of Congress 藏），以及如冷枚《熱河行宮圖》（約 1708-1711，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 III-8），張若靄（1713-1746）、張宗蒼、勵宗萬、錢維城等所描繪的避暑山莊各景冊頁中。³⁵本文意在探討避暑山莊之流杯建構，因此繪畫作品方面，除冷枚、張若靄之工筆設色作品可顯示其目的之一，在於盡量傳達景物之「如實」面貌，因此可與《御製避暑山莊詩（並圖）》、《熱河行宮全圖》等版畫圖書一併觀之，其他繪畫作品因風格較為寫意，繪製重點並不在於呈現具體、準確之避暑山莊各景，故本文不作討論。³⁶

³⁴ Stephen Hart Whiteman, "Creating the Kangxi Landscape: Bishu shanzhuang and the Mediation of Qing Imperial Identity," p.104, 169-177. 另外，關於「避暑山莊詩」研究，請見馬雅貞，〈皇苑圖繪的新典範：康熙《御製避暑山莊詩》的製作及其意義〉，《故宮學術季刊》，第 32 卷第 2 期（2014 冬），頁 39-80。王原祁《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冊》記錄見梁詩正、張照等編撰，《石渠寶笈（初編）》（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十三，頁 13 下-30 上。

³⁵ 關於「避暑山莊詩圖」在康熙時代選了三十六景，後來乾隆又選了新的三十六景，成為知名之避暑山莊七十二景。《御製避暑山莊詩（並圖）》各版本，可參閱楊國鈞、杜江主編，《避暑山莊七十二景》（北京：地質出版社，1993）之「編輯說明」（無頁碼）。張若靄《避暑山莊圖並乾隆題詩冊》（乾隆年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參見何傳馨主編，《故宮書畫圖錄》，第 28 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頁 102-120；張宗蒼《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圖冊》（1752 年，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參見王耀庭主編，《故宮書畫圖錄》，第 25 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6），頁 98-109；勵宗萬《避暑山莊詩意圖冊》（1752 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參見朱誠如主編，《清史圖典·康熙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頁 134-137；錢維城《御製避暑山莊舊題三十六景詩》、《御製避暑山莊再題三十六景詩》（1752、1754 年，藏地不明），圖版參見楊國鈞、杜江主編，《避暑山莊七十二景》，頁 102-120。乾隆朝《熱河行宮全圖》雖然所繪景點大致正確，但卻出現一些細節錯誤，如「曲水荷香」西側標示了「蘋香汨」，但「蘋香汨」卻位在「香遠益清」以北。這些錯誤令人懷疑此圖是否出自宮廷所繪。圖版網址：<http://en.dpm.org.cn/dyx.html?path=/tilegenerator/dest/files/image/8831/2007/1390/img0011.xml>，檢索日期：2018-7-21。各版本之圖繪研究，可參見 Stephen Hart Whiteman, "Creating the Kangxi Landscape: Bishu shanzhuang and the Mediation of Qing Imperial Identity," pp. 138-177. 關於冷枚，《熱河行宮圖》定年，請參考馬雅貞，〈皇苑圖繪的新典範：康熙《御製避暑山莊詩》的製作及其意義〉，頁 42；袁森坡，〈清代口外行宮的由來與承德避暑山莊的發展過程〉，《清史論叢》，第二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297-305。

³⁶ 張若靄《避暑山莊圖並乾隆題詩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是以沈喻稿為本所繪。相關圖版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網頁，「書畫典藏資料檢索系統」，網址：<http://painting.npm.gov.tw/PaintingPage.aspx?dep=P&PaintingId=18960>、http://painting.npm.gov.tw/Painting_Page.aspx?dep=P&PaintingId=19001，檢索日期：2018-6-1。



3-1 「曲水荷香」、「香遠益清」二亭位所

首先，先了解一下康熙、乾隆宮廷對「曲水荷香」、「香遠益清」之景觀與位置的描述如下：

(一) 曲水荷香

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聖祖御製詩文》，〈熱河三十六景詩〉「曲水荷香(並序)」

碧溪清淺，隨石盤折，流為小池，藕花無數，綠葉高低。每新雨初過，平堤水足，落紅波面，貼貼如泛杯。蘭亭觴詠無此天趣。

荷氣參差遠益清，蘭亭曲水亦虛名。

八珍旨酒前賢戒，空設流觴金玉羹。³⁷

乾隆四十六年(1781)《欽定熱河志·行宮三》，卷二十七，「曲水荷香」亭南向在北山麓，奇石參差，鱗次瓦疊。澗水潺潺，隨石折為小沼。中植芙蕖，亭亭萬柄。翠蓋紅葩，自然香遠。

聖祖御題額曰「曲水荷香」。舊在「暖溜暄波」北，今移于此。(略)

(乾隆)御製詩〈曲水荷香恭和皇祖聖祖仁皇帝御製元韻(辛酉〔乾隆6年，1714〕)〉

當年睿志尚高清，非慕濂溪癖愛名。重憶瓊筵陪色笑，金匙常飽手調羹。

(乾隆)〈曲水荷香(壬申〔乾隆17年，1752〕)〉

鏡面鋪霞錦，芳飈習習輕。花常留待賞(每到山莊雖深秋亦有荷花)，香是遠來清。緗蓋迎秋直，珠囊帶露擎。楚人休製服，同此樂衢亨。³⁸

³⁷ 清聖祖，〈熱河三十六景詩〉，《清聖祖御製詩三集》，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542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頁260。

³⁸ 和珅等纂，《欽定熱河志》，卷二十八，收入曲延鈞主編，《中國清代宮廷版畫》，第7冊，頁569-570。

(二) 香遠益清

康熙五十一年《清聖祖御製詩文》，〈熱河三十六景詩〉「香遠益清（調柳梢青（並序）」

曲水之東，開涼軒。前後臨池，中植重臺、千葉諸名種。翠蓋凌波，朱房含露，流風冉冉，芳氣竟谷。

出水漣漪，香清益遠。不染偏奇，沙漠龍堆。青湖芳草，疑是誰知。移根各地參差，歸何處那分公私。樓起千層，荷占數頃，炎景相宜。³⁹

乾隆四十六年（1781）《欽定熱河志·行宮四》，卷二十八，「香遠益清」

萬樹園東南，金山之陰，構殿數重。曲沼漣漪，涼軒明淨。綠房紫葍，芳菲襲人。當雨過風來，生香遠挹，對之覺心境雙清。前殿五楹，聖祖御題額曰「香遠益清」。聯曰：「遠見波光來玉澗，近臨山翠入書窗」。後殿三楹，額曰：「紫浮」。稍西，置八楹，額曰：「依綠齋」。聯曰：「喬木拂窗連嶺翠，澄波映檻接天光」。齋左有亭，御題額曰：「含澄景」。(略)⁴⁰

根據《欽定熱河志》，「曲水荷香」原位在北山山腳、「暖溜暄波」北側，乾隆時移至現址，即今日所見文津閣以南的位置。康熙五十二年（1713）刊漢文本《御製避暑山莊詩（並圖）》中的「暖溜暄波」也寫到其位於「曲水之南」，隔一小土山才是「暖溜暄波」。⁴¹「香遠益清」則位在萬樹園東南方，金山以北的位置。若對照約完成於 1708-1711 年的冷枚《熱河行宮圖》，可清楚見到「香遠益清」，卻遍尋不著「曲水荷香」，此應與當時「曲水荷香」位在「暖溜暄波」北側，很可能在「暖溜暄波」北面的「澄觀齋」建築群中，就角度而言無法具體呈現於紙面（圖 III-8~圖 III-10）。而乾隆年間刊行之《欽定熱河志》中的〈避暑山莊總圖〉，即可見到已搬遷至文津閣南的「曲水荷香」及附近「千尺雪」、「玉琴軒」、「寧靜齋」等建築群（圖 III-11）。

《御製避暑山莊詩（並圖）》中的「曲水荷香」與「香遠益清」二景乍看起

³⁹ 清聖祖，〈熱河三十六景詩〉，《清聖祖御製詩三集》，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 542 冊，頁 262-263。

⁴⁰ 和珅等纂，《欽定熱河志》，卷二十八，收入曲延鈞主編，《中國清代宮廷版畫》，第 7 冊，頁 655-657。

⁴¹ 清聖祖撰，揆敘等注，沈喻繪圖，馬國賢（Matteo Ripa）製圖，《御製避暑山莊詩（並圖）》，第 19 景。

來非常相似，細究則有不同之處。《御製避暑山莊詩（並圖）》中的「曲水荷香」與「香遠益清」二景均有亭子，亭中有流水經過大小錯落的石塊之間（圖 III-5、圖 III-6B）。二景雖然左方或後方均有大片水域，但康熙年間位在「暖溜暄波」北側的「曲水荷香」，左側不可能如位在湖區岸邊的「香遠益清」，是帶有層層遠山的大片水域。因此筆者認為《御製避暑山莊詩（並圖）》的畫家，對於各景的外在環境是否被「如實」呈現並不那麼重視，但各景的建築配置則是他們表現的重點所在，這也是區別「曲水荷香」、「香遠益清」二景的最主要關鍵。⁴²

3-2 「曲水荷香」流杯亭

先看「曲水荷香」。《御製避暑山莊詩（並圖）》製稿當時，此景應仍位於「暖溜暄波」北側。根據圖 III-5，「曲水荷香」有一個單獨的院落，四周有迴廊，「曲水荷香亭」後方正對著一個帶有凸出平臺如涼殿般的建築（圖 III-5C）。此景後來搬遷至文津閣南後，附近搭配有其他建物，筆者二〇一七年至避暑山莊做田野調查時，約略測繪的建築分布即大致符合乾隆皇帝〈再題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有序〉中對「曲水荷香亭」鄰近「千尺雪」、「玉琴軒」、「寧靜齋」三處建築之地理位置的描述（圖 III-12、圖 III-13）。⁴³因此康熙年間製作的《御製避暑山莊詩（並圖）》上所呈現之「曲水荷香」景，應為康熙時期的景象，並非乾隆搬遷後的景觀。此外，《御製避暑山莊詩（並圖）》中對「曲水荷香」景的呈現面貌，直到乾隆六年（1741）刊行的《御製避暑山莊詩（並圖）》中仍被延續使用。⁴⁴乾隆皇帝重新打造的「曲水荷香」景，一直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欽定熱河志》及乾隆四十九年（1784）完成的《欽定四庫全書》所收之《欽定熱河志》，才見到新景觀的建設狀況（圖 III-14、15）。但事實上，避暑山莊「千尺雪」一景，動工於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十八年（1753）由錢維城所繪的《熱河千尺雪圖卷》（避暑山莊博物館藏，圖 III-16），可看到此區「玉琴軒」、「寧靜齋」等數棟建築物此時已建構完成，但「曲水荷香亭」的位置雖有一亭子，卻非重簷形式，不禁令人

⁴² 關於清代宮廷對於建築圖式的看中，可參考陳韻如，〈時間的形狀：〈清院畫十二月令圖〉研究〉，《故宮學術季刊》，第 22 卷第 4 期（2005 夏），頁 111-117 的討論。

⁴³ 「千尺雪」、「玉琴軒」、「寧靜齋」三處位置，見清高宗，〈再題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有序〉，《御製詩集》，二集卷三十三（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27 上、32 上-下；卷 50，頁 24 上-25 上。

⁴⁴ 清聖祖撰，清高宗依次和韻，揆敘、鄂爾泰等注，沈喻繪圖，朱圭、梅裕鳳製圖，《御製避暑山莊詩（並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六年〔1741〕武英殿刊朱墨套印本），第 15 景。

懷疑乾隆十八年時「曲水荷香」是否已經遷到此處。⁴⁵而根據乾隆二十八年(1763)陰曆七月一日油木作檔案記載：「傳旨千尺雪、曲水荷香亭內，現設鹿角寶座一張。著造辦處將藤子靠背起下，另補山木板。」⁴⁶因此可推測至晚在乾隆二十八年前，「曲水荷香亭」已搬遷到「千尺雪」西側，形成一個由多個水景組成的大型院落。而康熙年間製作的《御製避暑山莊詩(並圖)》所呈現之「曲水荷香」景及乾隆改建之後的樣貌，均可見有一類似涼殿的建築與流杯亭相搭配，即如乾隆年間的「曲水荷香亭」與「玉琴軒」(圖III-15「玉琴軒」景前方亦可見「曲水荷香」)。此一搭配形式，是清代宮廷流杯建構的典型樣貌，或許因流觴活動進行時需設置帝王觀看的處所，及準備食物、水酒之處，而有此設計。

在確定「曲水荷香」景點位置之後，關於此景之建造特色，康熙皇帝在御製詩中有特別說明。他提到此亭「碧溪清淺，隨石盤折，流為小池，藕花無數，綠葉高低。每新雨初過，平堤水足，落紅波面，貼貼如泛杯。蘭亭觴詠無此天趣。」故此流杯亭並非如明代前常見之挖鑿石渠的流杯建構，而是以大小石塊錯落布置亭基，讓水流盤折流通而過。之後曲澗流為小池，小池中種植許多蓮花，蓮葉高低錯落，一旦花瓣掉落水面即如泛杯一般。此設計讓康熙皇帝引以為傲，自認是避暑山莊流杯亭超越王羲之蘭亭觴詠之處，即文中所指「天趣」之所在。而此「天趣蘭亭」的形式在「曲水荷香」被搬遷到「千尺雪」一帶時，仍被乾隆保留，同時呈現在各個描繪「曲水荷香」的圖象作品中，此或許是源於乾隆對康熙的懷念(圖III-5、14、15)。此外，康熙皇帝詩文提到：「荷氣參差遠益清，蘭亭曲水亦虛名。八珍旨酒前賢戒，空設流觴金玉羹。」也說明了他創造「天趣蘭亭」的內涵意義。對康熙來說，荷花香氣以及花瓣落紅如泛杯的景象遠勝佳餚、美酒，何況前賢早已告誡須謹慎面對口腹之慾，因此康熙的流杯亭準備的是「金玉羹」，而非美酒。⁴⁷乾隆御製詩文「重憶瓊筵陪色笑，金匙常飽手調羹」之句，說的也是他在流杯池宴陪伴康熙皇帝，常有機會飲用羹湯的回憶。根據陳捷先，康熙甚少飲酒，即使在重大宴會場合也頂多喝一小杯，可知康熙對飲酒一事十分謹慎，

⁴⁵ 相關研究見劉愛東，〈《熱河千尺雪》圖卷與“千尺雪”〉，《文物春秋》，1992年第4期，頁94-96；朱蕾、王其亨，〈乾隆帝的“連鎖”園林——以“千尺雪”為例〉，《新建築》，2012年第6期，頁114；廖寶秀，〈清高宗盤山千尺雪茶舍初探〉，《輔仁歷史學報》，第14期(2003.6)，頁65-66。

⁴⁶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承德市文物局合編，〈二七八 乾隆二十八年油木作承做熱河活計檔(乾隆28年7月至9月)〉，《清宮熱河檔案(1)》(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3)，頁518。

⁴⁷ 康熙皇帝御製詩文的註解，參見清聖祖撰，清高宗依次和韻，揆敘、鄂爾泰等注，沈喻繪圖，朱圭、梅裕鳳製圖，《御製避暑山莊詩(並圖)》，第15景。

而康熙對美酒的態度即反映在他對流杯亭的設計上。⁴⁸



3-3 「香遠益清」流杯亭

相較於「曲水荷香」因曾搬遷，景觀有些變動之外，避暑山莊另一座包含有流杯亭的「香遠益清」景顯得較為單純。此流杯亭，乾隆題額為「含澄景」，因此常與「香遠益清亭」之名一併稱之。康熙御製詩文對「香遠益清」的說明為，「曲水之東，開涼軒。前後臨池，中植重臺、千葉諸名種。翠蓋凌波，朱房含露，流風冉冉，芳氣竟谷」。對照筆者在田野調查約略測繪的圖，及《御製避暑山莊詩（並圖）》、冷枚《熱河行宮圖》，位在流杯亭東側的就是「香遠益清」與「紫浮」兩幢建物，康熙當時「依綠齋」也已存在（圖 III-17、18、6、19）。根據康熙，「香遠益清」與「紫浮」前後均臨池，池中種有「數頃」重臺、千葉等多種知名荷花，令此區芬芳瀰漫。這些描述大致與今日所見吻合。但對照《熱河行宮圖》與《御製避暑山莊詩（並圖）》發現，《御製避暑山莊詩（並圖）》繪製當時「依綠齋」西側多了一個建物，而「紫浮」後方之五楹建築尚未建成，且不知殿名為何（比較圖 III-6D、9、17）。⁴⁹至於今日所見之「水車」位置，康熙當時為一高樓，可能是用來汲取「熱河泉」水的建築結構。⁵⁰

「香遠益清」的流杯亭，從康熙年間的圖象到乾隆六年的《御製避暑山莊詩（並圖）》，大抵均呈現同一樣貌，即亭中有大小石塊參差布置，流水在石塊間流過，但此景到了乾隆四十六年的《欽定熱河志》出現了一些改變。《欽定熱河志》

⁴⁸ 陳捷先，《康熙大帝：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皇帝》（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1），頁4討論到康熙文：「朕自幼不喜飲酒，然能飲而不飲。平日膳後或過年節筵宴之日，止小杯一杯。人有點酒不聞者，是天性不能飲也。如朕之能飲而不飲，始為誠不飲者。大抵嗜酒則心志為其所亂而昏昧，或致病疾，實非有益於人之物，故夏先后以旨酒為深戒也。」見清世宗纂，《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21下-22上。

⁴⁹ 關於「香遠益清」景中的建築群，可見前引乾隆四十六年《欽定熱河志·行宮四》中支說明。「紫浮」在乾隆皇帝時代頗受重視，此處內有「梵香室」佛堂。由《清宮熱河檔案》看來，「紫浮」中所供奉的佛像、所燃之香記載頗多，且此處之虎皮石城牆也經常看到整修紀錄。相關記載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承德市文物局合編，〈乾隆帝巡幸熱河等處應用藏香檔（乾隆三十一年七月至三十四年九月）〉、〈熱河殿座行宮等處歲修用過銀兩清冊（乾隆三十四年）〉，《清宮熱河檔案（2）》，頁9、10、153；〈乾隆四十五年熱河隨園造辦處承做活計檔（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七日至八月二十六日）〉，《清宮熱河檔案（4）》，頁542-543。

⁵⁰ 「熱河泉」為一高壓溫泉水泉，其位置與名稱，見袁森坡，〈清代口外行宮的由來與承德避暑山莊的發展過程〉，頁298。張羽新，《避暑山莊的造園藝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31、33曾提到，「暖溜暄波」原在「熱河泉」一帶，附近有涼殿「曲水荷香」，涼殿之後有「萍香汎」；康熙五十年（1711）將「暖溜暄波」移到平原區東北。若照張羽新說法，冷枚《熱河行宮圖》中所見之流杯亭即非「香遠益清」，而為「曲水荷香」。由於此說法僅出現在張氏書中，且其未說明是否有史料根據，筆者認為張氏此說應為個人的推測與誤解。

中的「香遠益清（含澄景）亭」被獨立畫在「依綠齋」前方，且不再呈現水流石間的景象（圖 III-20、圖 III-21）。⁵¹對照今日「香遠益清」景的流杯亭，確實並非康熙「天趣蘭亭」之面貌，流杯亭的基座上有著十分規整對稱的石渠水道，屬明代之前常見，在水臺盤上開鑿水道的漢人傳統流杯亭樣式，如宋代《營造法式》中所見（圖 II-3）。⁵²乾隆十九年（1754），曾在避暑山莊流杯亭，宴請原附屬於準噶爾部，前來投誠的都爾伯特親王三車〔策〕凌（指車凌、車凌烏巴什、車凌孟克三位蒙古貴族）等人。⁵³雖然乾隆〈御製流杯亭小宴都爾伯特親王策凌等〉原詩並未書明為避暑山莊那一座流杯亭，但根據詩文第一句「宛轉清流繞石渠」，明確提到此流杯亭之水渠是「宛轉」的「石渠」，據此推測，這次邀宴很可能是在已經整修完成的「香遠益清」流杯亭。⁵⁴也因此，「香遠益清」流杯亭的整修，很可能完成於乾隆十九年（1754）之前。

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乾隆皇帝對傳統流杯亭樣式的喜好，最令康熙皇帝感到自豪的「天趣蘭亭」流杯亭形式，從未出現於過去的蘭亭傳統中。⁵⁵此前康熙皇帝在西苑所建之「曲澗浮花」流杯亭，在題名上雖有「浮花」之意，與避暑山莊兩座流杯亭共享同樣的內涵與期待，但其面貌仍屬傳統漢式流杯建構，而康熙皇帝在避暑山莊所打造之「天趣蘭亭」新樣貌，則是蘭亭史上的嶄新創造。康熙皇帝的改變基礎除可能與其身為滿州皇帝，對於漢文化的改造較無包袱之外，很大部分應該也基於康熙皇帝對漢文化的理解與興趣而來。而將「浮花」的意象具體發展成「天趣蘭亭」，應是發生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第三次南巡之後。

⁵¹ 乾隆四十九年的《欽定四庫全書》所收《欽定熱河志》中「香遠益清」景圖象，與乾隆四十六年出刊的《欽定熱河志》為同稿。圖版見和珅等纂，《欽定熱河志》，卷二十八（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 31 上-下。

⁵² 今日的「香遠益清（含澄景）亭」水臺盤上的十六塊石塊，尺寸大致相同，但顏色並不均整。清宮建築石材一般使用漢白玉石（大理石），但顏色不均整、尺寸不一，加上此流杯水臺盤並未禁止遊人踏於其上，筆者認為此亭及「依綠齋」應該均經整修、重建。

⁵³ 都爾伯特投誠之事，參見馬汝珩、馬大正，〈論杜爾伯特三車凌維護國家統一的鬥爭〉，《清史研究集》，第 1 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1），頁 200-215。

⁵⁴ 清高宗，〈御製流杯亭小宴都爾伯特親王策凌等〉：「宛轉清流繞石渠，羽觴小宴歛康居。呼前手賜笑言接，喜可身循禮法初。荒略從來事杯飲，傾誠那解飾虛譽。裹蹠錦段頒中禁，滿載歸教艷拂廬。」收入于敏中、傅恆等編，《欽定皇輿西域圖志》（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十七，頁 12 下。此事另詳後文討論。

⁵⁵ 郭黛姮教授所主持的圓明園研究，已經注意到康熙皇帝在流杯亭建造上的創新之處，但未進一步予以解釋。見郭黛姮主編，《遠逝的輝煌：圓明園建築園林研究與保護》（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9），頁 226、227-229。

4 康熙帝的「天趣蘭亭」

康熙皇帝的「天趣蘭亭」，主要在王羲之於紹興蘭亭曲水流觴的典故、流杯亭傳統上，疊合以芙蕖荷香三者而來。如第二章所討論，王羲之曲水流觴與流杯亭，原本就屬於同一傳統的發展，但芙蕖荷香則應是源自「西湖十景」之「曲院風荷」的意象而來。此外，「香遠益清」景的定名與康熙對冉冉荷香的喜好，也與北宋理學家周敦頤（1017-1073）的〈愛蓮說〉有關。因此康熙皇帝設計的避暑山莊流杯亭，即在蘭亭曲水的形象上，疊合西湖「曲院風荷」的意象，及透過周敦頤〈愛蓮說〉所展現之另一層文學、理學的意涵而來。

4-1 理學的作用

「浮花」，可說是康熙皇帝對曲水流觴的新解，這個新解在他尚未南巡之前已經出現在西苑流杯建構的設計中，只是當時尚在概念層次。此概念的出現應與康熙皇帝之理學關懷有關。

理學在清聖祖時成為官方所支持的學術正統，不僅朱熹入祀孔廟，周敦頤的《太極圖說》也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納入科舉考試內容。⁵⁶康熙六十年（17212），康熙皇帝亦曾命年僅十一、二歲的乾隆，於避暑山莊之「觀蓮所」，背誦周敦頤〈愛蓮說〉並解說其義。⁵⁷「觀蓮所」之額由康熙皇帝所題，避暑山莊諸多景間也布置有大量名種荷花，於此可知康熙皇帝對荷花的深切喜愛。⁵⁸此喜愛除與荷

⁵⁶ 劉澇，〈康熙的文化政策〉，《融合——清廷文化的發展軌跡》（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頁 173-174；王鍾翰，〈康熙與理學〉，《歷史研究》，1994 年第 3 期，頁 116-122。另可參閱黃進興，〈清初政權意識形態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統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8 本 1 分（1987.3），頁 105-131；張素卿，〈清代漢學與左傳學：從「古義」到「新疏」的脈絡〉（臺北：里仁書局，2007）。

⁵⁷ 乾隆皇帝一七八七年提及背誦〈愛蓮說〉之事，原文：「余十一、二歲前讀《易》、《書》、《詩》三經，古文百餘篇，俱能成誦。時扈從皇祖來山莊，曾於「觀蓮所」命誦〈愛蓮說〉並陳義解，皇祖深喜之。今余年七十有七，荏苒時光已六十有五年，迴憶仰承恩眷之日，猶如目前云。」見清高宗，〈荷二首〉、〈遊獅子園〉，《御製詩集》，五集卷三十三，頁 12 上、五集卷九十一，頁 6 上-下。

⁵⁸ 康熙皇帝對荷花十分喜愛，西苑、避暑山莊等處均遍植荷花名種，如「觀蓮所」所植之荷花即是特別由教漢旗移植過來的「教漢蓮」。而「觀蓮所」一址不僅出現在避暑山莊，也設置在圓明園中，且有多個址名均與荷花有關，如避暑山莊的「冷香亭」（乾隆避暑山莊三十六景之十二）、圓明園之「濂溪樂處」等。避暑山莊與西苑之蓮花栽植，可參見和珅等纂，《欽定熱河志》，卷三十一（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 22 上-下；清高宗，〈觀蓮所詠事〉，《御製詩集》，餘集卷十四，頁 4 下-5 上；馬君蘭（Martina Siebert），〈愛蓮及藕：清代京城蓮藕管理機構的形成〉，網址：https://www.mpiwg-berlin.mpg.de/Presse-PDF/2014_10_17_PM_Schaefer_chn_Siebert.pdf，檢索日期：2018-06-20；張書敏，〈避暑山莊的教漢蓮〉，收入周金生主編，《承德文史文庫》，第二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頁 938-941。馬君蘭之研究頗值參考，可惜正式論文似乎尚

花之香遠益清或「浮花」景色宜人等外在形象有關之外，也關乎荷花在理學上的象徵意涵。而康熙皇帝對於荷花的喜好也影響及雍正、乾隆二位皇帝。如《石渠寶笈》載乾清宮藏有《世宗憲皇帝御書愛蓮說一卷》，此卷與內容較為嚴肅之《世宗憲皇帝御書魏徵十思疏一卷》上，均同鈐有「為君難」一印。根據馮爾康，「為君難」一詞，乃是雍正皇帝用以砥礪自身成為明君的座右銘。⁵⁹另據學者研究，雍正四年（1726），曾為圓明園「芰荷深處」製匾，並將〈愛蓮說〉「托裱成對聯，掛在床罩上」。乾隆皇帝顯然也很清楚雍正皇帝將圓明園此處命名為「芰荷深處」之因，故乾隆九年（1744）後，乾隆皇帝進一步將此更名為「濂溪樂處」，直指核心。⁶⁰另外，從乾隆個人之詩文集來看，「濂溪」、「愛蓮說」之詞，亦為乾隆頗常提及的文句。⁶¹就此而言，對雍正、乾隆兩位皇帝，甚至對康熙皇帝來說，周敦頤的〈愛蓮說〉確實意義非凡，此文不僅有文學、理學上意義，更與理想的為君理念息息相關。

研究清代理學的學者對於清代理學的分期各有所見，但大致認為順治至雍正三朝兼採漢學與宋學（理學），而康熙皇帝獨尊程朱理學，定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科舉考試的主要依據，此舉影響深遠；乾隆之後則漢學成為主流，宋學逐漸衰微。⁶²對理學有相當素養的康熙皇帝，曾提出「真假理學」之論，他認為「真理學」，是「行事皆與道理相符合」者，亦即必須言行合一，對帝王忠誠；而康熙皇帝對理學中之「誠」、「敬」的重視，反映其所重視的是理學之實用性及經世致用的精神，此外康熙皇帝對於文學的態度，亦是以「文以載道」為依歸。⁶³前文曾引馮爾康討論雍正皇帝之「為君難」內涵，根據其研究，雍正皇帝此座右銘所重視的，亦是君臣須相待以「誠」，具有「君臣一體、同心同德的道德準則」，

未出刊，因此不知他是否除經濟面的討論之外，也論及清代帝王對蓮花的喜好及相關問題。關於圓明園種植荷花之處所，見郭黛姪主編，《遠逝的輝煌：圓明園建築園林研究與保護》，如頁 13、14、269。

⁵⁹ 雍正皇帝書法作品記錄，見梁詩正、張照等編撰，《石渠寶笈（初編）》，卷二，頁 5 上。關於「為君難」之解釋，見馮爾康，〈從滿文硃批解讀雍正帝的「為君難」——以《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為論述資料〉，馮明珠主編，《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頁 350-355。

⁶⁰ 郭黛姪主編，《遠逝的輝煌：圓明園建築園林研究與保護》，頁 13-14。

⁶¹ 其提到「愛蓮說」相關詩文如一七五四〈荷〉、一七七一一〈晚荷二首〉，收入和珅、梁國治纂修，《欽定熱河志》（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94，頁 12 下、14 下。

⁶² 關於清初理學與康熙理學思想研究，參閱史革新，《清代理學史（上卷）》（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7），特別是頁 73-83、408-410。

⁶³ 史革新，《清代理學史（上卷）》，頁 78-83、408；王勝軍，〈康熙理學思想探析〉，《文史博覽》，2010 年第 2 期，頁 31-33。

以及臣子應具「有守有為，勇於任事」的態度。⁶⁴康熙皇帝對於「誠」學的堅持與理學有關，尤其是有關周敦頤所提出學說理論；⁶⁵而雍正皇帝在君臣之義上所重視的「誠」字，筆者認為也根植於康熙影響下，是來自周敦頤學說的影響。基於康熙皇帝對理學的重視，避暑山莊中的「曲水荷香」、「香遠益清」二景，可說是康熙結合王羲之蘭亭典故與理學精義所創造出的「理學景觀」。而清代帝王對於「君臣一體」的追求，也與流杯亭聚宴的目的相應。

理學作為景觀營造之基礎，最典型的例子，應屬朱熹〈武夷權歌〉及其隱居處所「武夷九曲」在獨尊朱子學之朝鮮時代（1392-1897）所發生的影響。在朝鮮，朱熹的隱所被「理學化」，然而這樣的情形並未發生在中國。⁶⁶也因此即使朱熹是康熙最為尊崇的理學家，康熙也未選擇朱熹的〈武夷權歌〉、「武夷九曲」，作為其宮廷「理學景觀」的表現基礎，而選擇了深具文學性，且常成為傳統藝術表現之題材的周敦頤〈愛蓮說〉，來建構其園林——「天趣蘭亭」——的布置。⁶⁷筆者認為，康熙皇帝之所以選擇周敦頤的〈愛蓮說〉，除與其對理學的高度興趣相關之外，應該也與他南巡時前往杭州，對「西湖十景」之「曲院風荷」的印象有關。⁶⁸

4-2 西湖「曲院風荷」意象的採用

「西湖十景」之一的「曲院風荷」，原名「麴院荷風」，新名為康熙皇帝第三次南巡時（康熙三十八年〔1699〕）所改。據汪利平研究，因戰亂與官方疏於整治，西湖在清初有大片面積「日益淤淺，雜草叢生」，康熙南巡時所見到的景象

⁶⁴ 馮爾康，〈從滿文硃批解讀雍正帝的「為君難」——以《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為論述資料〉，頁 351-352。

⁶⁵ 見王勝軍，〈康熙理學思想探析〉，頁 31、33 之討論。

⁶⁶ 衣若芬，〈宋代「武夷棹歌」中的地景空間與文化意蘊〉，《東華人文學報》，第 20 期（2012.1），頁 33-58；衣若芬，〈印刷出版與朝鮮「武夷九曲」文化意象的「理學化」建構〉，收入守謙、廖肇亨主編，《轉接與跨界：轉接與跨界——東亞文化意象之傳佈》（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 351-387。

⁶⁷ 朱熹的〈武夷權歌〉對朝鮮理學界影響甚鉅，不少理學家以其〈武夷權歌〉來建構個人的理學景觀。相關研究見衣若芬，〈朱熹〈武夷權歌〉與朝鮮理學家李退溪的次韻詩〉，收入王利民、武海軍主編，《第八屆宋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5），頁 532-539；衣若芬，〈遊觀與求道：朱熹〈武夷權歌〉與朝鮮士人的理解與續作〉，《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60 期（2015.1），頁 53-71。周敦頤愛蓮之主題在繪畫表現上之討論，如石守謙，《從風格到畫意——反思中國美術史》（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頁 211-213。

⁶⁸ 據學者研究，周敦頤〈愛蓮說〉可能與佛法有關，但在康熙皇帝的脈絡上，所取的應非〈愛蓮說〉與佛法的關係。相關研究見葉國良，〈周敦頤愛的是什麼蓮〉，《成大中文學報》，第 27 期（2009.12），頁 37-56。

雖已過整理，但仍與清初尤侗（1618-1704）所見之殘破面貌相去不遠。⁶⁹雖然如此，康熙皇帝對西湖的興趣以及他為「西湖十景」所題寫的詩文、碑銘，仍為西湖的重建帶來契機。根據汪利平研究，康熙第三次南巡對江南的態度，與之前擔心讓人以為他在游觀風景的想法丕異。此次遠行，他展現出更多對漢人士大夫文化的興趣，遊覽也成了他行程的目的之一。甚且，宋代以來並非具體景點的「西湖十景」，在康熙皇帝手書十景之名後，於地方官的運作下，才確立了十景的位置，並打造各個景點，於是西湖在入清之後首次被重新整理。康熙第四次南巡時，地方官員並曾為他特別在孤山上建造了西湖行宮。⁷⁰而西湖的水利整治以及全面翻修，則是到了雍正時代李衛（1687-1738）擔任浙江巡撫時，才為此投注相當心力。⁷¹

以「麴院荷風」更名「曲院風荷」為來說，作為南宋釀酒作坊的麴院原位西湖西岸，乾隆三十年（1765）成書的《湖山便覽》提到此處當時已為「一片平陸」，康熙三十八年時，可能因「麴院荷風」原址已經淤積，因此地方官員將「麴院荷風」移至蘇堤跨虹橋畔，重新造景。根據乾隆三十六年（1771）《欽定南巡盛典》之「曲院風荷」說明：

「曲院風荷」在跨虹橋西，宋時取金沙澗之水造麴以釀官酒，名麴院。中多荷花，稱「麴院荷風」。國朝因其舊址平臨湖面，環植芙蕖，引流疊石為盤曲之勢。聖祖仁皇帝親灑宸翰，改為「曲院風荷」，並構亭於跨虹橋之西。……

72

清聖祖之所以將「麴院」改成「曲院」，第一個原因可能是移地重建時，「引流疊石為盤曲之勢」，故康熙定名時將之更動為「曲院」。⁷³第二個更可能的因素，根

⁶⁹ 關於清初西湖的沒落，詳見汪利平，〈杭州景觀建設與清代文化政治〉，《新史學》，第6卷（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166-172。另見張筠，〈王原祁《西湖十景圖》研究——清宮正統派地景畫的產生及政治意涵〉（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東方藝術史組碩士論文，2014），頁40-50的討論。

⁷⁰ 汪利平，〈杭州景觀建設與清代文化政治〉，頁166-172。《浙江通志》載：「國朝康熙三十八年，聖祖仁皇帝南巡駐蹕西湖，御書十景，建亭勒石。雍正二年（1724）以西湖有關東南水利，特命督撫會勘，重加疏濬。」見沈翼機等撰，《浙江通志》，卷九（臺北：華文書局據乾隆元年〔1736〕刊本影印，1967），頁25上。

⁷¹ 汪利平，〈杭州景觀建設與清代文化政治〉，頁176-181。

⁷² 高晉等編撰，《欽定南巡盛典》，卷八十六（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10下-11上。

⁷³ 關於此點洪泉、唐慧超，〈曲院風荷變遷圖考〉，《北京林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4卷第3期（2015.9），頁37已經提出。洪泉、唐慧超引鄭澐修，邵晉涵纂，《（乾隆）杭州府志》

據乾隆南巡時之〈題西湖十景〉詩：「九里松旁曲院風，荷花開時映波紅。莫驚筆誤傳新謗，惡旨崇情大禹同。」⁷⁴乾隆顯然很了解康熙此處之改動是因其不喜美酒，故以「曲」字代「麴」，請眾人勿謗聖祖筆誤。

瞭解康熙對於西湖「曲院風荷」景之更動與新義的賦予，應有助於吾人理解康熙心目中理想的流杯建構。如前文引康熙〈曲水荷香（並序）〉中所言，他是「以漂浮於水面的荷花取代浮杯，以荷香取代酒香，並認為王羲之蘭亭會無此天趣，不過浪得虛名。顯然康熙皇帝認為經其改造過的蘭亭空間，乃是超越王羲之者。西湖改造過後之「曲院風荷」景，不僅有「引流疊石為盤曲之勢」，更遍植荷花，江南地方官員對「曲院風荷」的新建設，很可能給了康熙皇帝一個改造蘭亭傳統的啟發與契機。乾隆《欽定南巡盛典》中所繪「曲院風荷」一景，可清晰看到「引流疊石」的樣貌，雖然西湖景色在雍正時期已經浙江總督李衛大力整頓，但「曲院風荷」在康熙時已有新建設，也許雍正時更動不多，藉由《欽定南巡盛典》所載之「曲院風荷」，幫可想像康熙當年所見情景（圖 III-22）。⁷⁵

透過圖象比對，康熙三十八年所整治之「曲院風荷」樣貌，與數年後避暑山莊「曲水荷香」、「香遠益清」二景是有相類之處（比較圖 III-5、圖 III-6、圖 III-22）。康熙建造避暑山莊的流杯亭時，並非挖鑿石渠作為水道，而是在「引流」、「疊石」之上，加蓋一個亭子，並於四周遍植荷花。此即在西湖「曲院風荷」意象上，層疊了源自「蘭亭」的流杯亭意象，此外，又疊合了荷花遍植的四周景觀，此如前述，乃為呼應清代理學之「誠」學思想而來。避暑山莊流杯亭的「引流」、「疊石」，是否可能是來自紹興蘭亭或其他處所給予康熙皇帝的印象呢？如第三章所討論，紹興蘭亭在康熙十二年（1673）、三十五年（1696）均曾重新整建，但康熙六次南巡從未親臨紹興蘭亭當地，至於康熙其他所到之處，似乎也未見相關設置。故筆者認為，康熙在建造避暑山莊流杯亭時，最有可能是援引自他對西湖「曲院風荷」的印象而來。⁷⁶

（清乾隆刻本），卷 27，頁 4 上：「國朝康熙三十八年（1699），別構亭于跨虹橋之迤北。基址雖殊，而引流疊石，盤曲可觀。」說明此景。洪泉、唐慧超文頗值得參考，但其文有一錯誤是在頁 37 提到：「康熙三十八年，為迎聖駕南巡，浙江總督李衛極力恢復西湖名景古跡。」查康熙三十八年浙閩總督應為郭世隆（見李衛，《（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一〔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2 上），浙江總督是雍正皇帝特為李衛安排的職位，故此處作者可能誤擲李衛之名。

⁷⁴ 清高宗，〈題西湖十景〉之「曲院風荷」，高晉等編撰，《欽定南巡盛典》，卷二（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6 下。

⁷⁵ 洪泉、唐慧超，〈曲院風荷變遷圖考〉，頁 39。

⁷⁶ 過去學者往往認為清宮中的流杯亭是仿建自紹興蘭亭，但透過本文研究，筆者認為清宮中的流杯亭雖與王羲之在紹興蘭亭的典故有關，但清代帝王並非真正「仿建」自紹興蘭亭的曲水景觀。



5 康熙皇帝對群體塑造之期待與清宮流杯亭的使用

康熙朝的流杯建構在蘭亭史與宮廷史上，確實至為特殊，此除與康熙皇帝個人喜好有關之外，他是否也希望透過這些特殊的流杯建構，在宮廷不時舉辦的各類聚宴中，突顯出甚麼樣特別的聚會氣氛呢？流杯聚宴的形式與一般宮廷聚宴的形式、意涵，又是否有何相異之處？

5-1 清代宮廷的正式宴會

滿清宮廷中，經常有宗室宴、外藩宴、凱旋宴等宴會的舉辦。這些宴會的規模通常約百人上下，甚至有一、二千人參與的千叟宴之舉辦。⁷⁷這些宴會的辦理十分隆重，一般有儀仗、樂隊、宴桌、班次等規劃，有時也有樂舞、雜技、戲劇、煙火等活動安排。聚宴的儀軌、禮節規定繁多，何時向帝王禮敬、何時進膳、那些位等的大臣可受帝王親自賜酒等，均有定制。此外，宮廷聚宴多半也是在重要的殿所舉辦，如紫禁城乾清宮、圓明園正大光明殿、西苑紫光閣、避暑山莊萬樹園等處，因此可知一般宮廷宴會的形式為隆重、華麗的場合、賜宴豐盛，且參與者人數眾多。以姚文瀚畫乾隆二十五年（1761）紫光閣賜宴的場景安排來看，即可見帝王與參與臣子之間的距離遙遠，且因賜宴規矩嚴格、座位整然劃一，不難想見賜宴當時的氣氛應令臣子一則感到皇恩浩蕩、心懷喜悅，同時也不免誠惶誠恐、深怕逾矩（圖 III-23）。

這類宮廷宴飲規模宏大，但除了膳食水酒、樂舞表演之外，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陰曆正月十四日在乾清宮所舉辦的「昇平嘉宴」，也有君臣賦詩的安排。此「昇平嘉宴」創下了清代君臣共賦柏梁詩之首例。宴後康熙除將御製序文、「麗

相關研究如陳葆真，〈康熙和乾隆二帝的南巡及其對江南名勝和園林的繪製與仿建〉，《故宮學術季刊》，第 32 卷第 3 期（2015 春），頁 40、42、44、45。

⁷⁷ 關於清宮宴會的研究，可參考下列著作：何冠彪，〈昇平嘉宴——清朝內廷首次賜宴漢官始末〉，《故宮學術季刊》，第 16 卷第 3 期（1999 年春季號），頁 113-139；林家維，〈乾隆朝紫光閣賜宴圖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15 年第 4 期，頁 67-96；張小李，〈清宮上元節外藩宴與藩屬關係考論〉，《中國文化》，2014 年第 2 期，頁 80-95；吳空，〈宗室與宗室宴——西苑和清代宴儀之一〉，《紫光閣》，1997 年第 4 期，頁 48；吳空，〈凱旋宴——西苑和清代宴儀之二〉，《紫光閣》，1997 年第 5 期，頁 48；吳空，〈外藩和外藩宴——西苑和清代宴儀之三〉，《紫光閣》，1997 年第 6 期，頁 48；葉泉宏，〈乾隆千叟宴與清鮮宗藩關係〉，《韓國學報》，第 17 期（2002.6），頁 283-297。

日和風被萬方」柏梁詩刻碑之外，也將御序頒贈群臣。⁷⁸康熙所豎立之君臣此類宴會模式，也為雍正、乾隆繼承下來，雍正並以「泰交（案：上下同心）之雅會」來形容這個規模宏大的君臣聚會。⁷⁹整體來看，這類正式宮廷宴會中，帝王「展演」的性質濃厚，不僅要公開表達對於臣子的體恤，也欲呈現君臣和睦、上下一心的朝廷形象。⁸⁰而這種需要做詩為文的宴會，通常要「能詩者」方可參與，雖然一般漢臣應皆具備此能力，不過滿清於內廷賜宴漢官之事，卻是直到康熙二十一年的「昇平嘉宴」才開先例，此前內廷「止宴滿洲諸臣」。⁸¹對照於此，前文所述康熙十七年至湯泉時，留有他與臣子共樂的詩文〈溫泉流杯戲作〉，當時陪伴康熙的臣子不知為漢官或滿臣，但康熙十八年康熙與臣子在西苑流杯聚宴之事，高士奇有〈己未二月晦日蒙恩賜宴西苑恭紀四首〉記錄此事，可見康熙十八年的「賜宴西苑」是有漢官蒙恩受宴的。據此而言，雖然康熙二十一年前，在乾清宮等處所舉辦的大型正式宴會漢官不得參與，但清宮仍有舉辦漢官能夠參與的宴會，而這類宴會很可能就是如流杯亭賜宴一般，屬於小規模、不那麼正式的君臣之宴。

5-2 清宮流杯建構聚宴形式之重建

5-2-1 宴近臣

如前文所討論，曾任內閣中書並入直南書房的高士奇，其《金鰲退食筆記》記載康熙常在西苑流杯亭宴請外藩及臣子；曾任翰林院檢討的嚴繩孫侍直西苑時，也提到康熙「頻賜流盃亭上宴」。⁸²自康熙四十四年（1705）始至康熙過世，多年扈從康熙至避暑山莊的大臣張廷玉，也有〈扈從塞外蒙恩召入行宮泛舟觀荷徧覽諸勝賜宴於流杯亭恭紀二首〉。⁸³雖不知此詩撰寫年代，也不清楚賜宴的流杯

⁷⁸ 何冠彪，〈昇平嘉宴——清朝內廷首次賜宴漢官始末〉，頁 134。

⁷⁹ 何冠彪，〈昇平嘉宴——清朝內廷首次賜宴漢官始末〉，頁 139。

⁸⁰ 何冠彪，〈昇平嘉宴——清朝內廷首次賜宴漢官始末〉，頁 128-129。

⁸¹ 何冠彪，〈昇平嘉宴——清朝內廷首次賜宴漢官始末〉，頁 113、115。

⁸² 高士奇、嚴繩孫官職，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網頁，「人名權威人物傳記資料查詢」系統，網址：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 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檢索日期：2018-9-15。

⁸³ 張廷玉，〈扈從塞外蒙恩召入行宮泛舟觀荷徧覽諸勝賜宴於流杯亭恭紀二首〉，《欽定熱河志》，卷一百十（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 18 下-19 上。張廷玉扈從康熙赴避暑山莊事，見張廷玉撰，戴鴻義點校，《張廷玉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 7-14。

亭為何，但張廷玉的詩文為康熙在避暑山莊流杯亭賜宴近臣之事，留下重要紀錄。因此可推測康熙的流杯亭宴會所邀請的漢臣，應屬任職南書房、內閣或翰林院等與皇帝親近的官員，當然若有滿臣參與，想當然也是常在康熙身邊並擅長文辭的官員。至於清代外藩，主要指蒙古、回部、西藏等部，如前文所述，乾隆十九年（1754）曾在避暑山莊流杯亭（很可能為「香遠益清」亭），宴請都爾伯特三車凌等人。⁸⁴君王宴請眾臣於流杯建構共飲，原屬中國宮廷上已修禊的燕飲傳統，但在流杯建構宴請外藩，則似乎是清代首見。

清宮中的流杯亭，即使是地域面積稍大的「曲水荷香」亭，能夠容坐的空間仍很有限，當舉辦流杯聚宴時，場地可能如何安排？由於康熙朝可供參考的材料甚少，本文此處所做的推測與重建，將一併參酌乾隆時代的文獻記錄納入考慮。

首先，乾隆十一年瀛臺「賜滿漢大臣翰林筵宴」之後，在受邀參與的一百七十六位臣子中，邀請其中四十五位至西苑「曲澗浮花」流杯亭聯句。根據錢儀吉報導，當日乾隆在流杯亭中，並令各大臣「雜坐水石間」。⁸⁵此外，乾隆二十八年油木作檔案記載，「曲水荷香」流杯亭「現設鹿角寶座一張」，造辦處要將其藤子靠背換成山木板，可見此「鹿角寶座」應常設於亭中。⁸⁶「曲水荷香亭」的內部空間較大，亭正中央尚有較大石面可供放置御座，但根據前文推測，乾隆十九年前，「香遠益清」流杯亭應已修改成今日所見具有規整、對稱排列的水渠樣式，這個樣式的水渠是不可能於其上再加設寶座的，尤其此亭水道幾乎布滿亭內空間（圖III-18第10小圖）。因此「香遠益清亭」的寶座，很可能設在「依綠齋」南面的涼殿處（圖III-18第8小圖）。但同樣具有水渠的西苑流杯亭，則因水道主要布在亭正中，水道區域兩側尚有空間可容置帝王座椅，因此推測乾隆十一年流杯亭聯句時，乾隆寶座應很可能設於「曲澗浮花亭」中一側（圖III-4）。

帝王之外，臣子的座位又是如何安排呢？西苑「曲澗浮花」、避暑山莊「香遠益清」兩亭因空間有限，受邀臣子人數無法太多，如前述四十五人所參與的西苑流杯亭賦詩，很可能僅有少數幾人可與帝王一同坐於亭中，至於其他多數人，應如錢儀吉所描述，是雜坐於流杯亭外側的水石之間。但這個「雜坐」看似隨興，宮廷酒宴實不可能過於馬虎，筆者推測在詩宴之前，侍者很可能已經在水石之間預先放置鋪墊，供大臣入座。至於亭內空間較大的「曲水荷香亭」，則可以容納

⁸⁴ 關於清代外藩所指，見張小李，〈清宮上元節外藩宴與藩屬關係考論〉，頁80。

⁸⁵ 參見注24。

⁸⁶ 參見注46。

較多人數，至於其他無法入坐亭中者，必然也是雜坐於亭外水域附近。而流杯亭畢竟是為流杯而造，除帝王之外，其他參與者可以想見均是坐於鋪墊或矮椅之上，方能構得水中酒杯，即使所坐之處未臨水，必然也有侍者伺候水酒。



5-2-2 宴外藩

除了皇帝近臣有機會蒙恩至流杯亭與會，康熙皇帝開始，也常於西苑宴請外藩，由於尚未見康熙年間在流杯亭宴請外藩的記錄，因此可以乾隆年間宴請都爾伯特三車凌之事為例討論。三車凌因不滿準噶爾部的混亂，於乾隆十八年(1753)冬內遷投誠，其三千七百多戶的人數規模不僅在厄魯特蒙古各部投誠者中首見，之後也造成了其他部族投誠的效應，三車凌降清之事，對於清廷與準噶爾的戰事，無疑具有絕對性的幫助。⁸⁷而乾隆十九年於避暑山莊流杯亭宴請策凌等人，即應該年五月之事，當時乾隆不僅隆重地於萬樹園設宴五次款待三車凌，並「觀火戰」，甚至邀請他們至流杯亭小宴。⁸⁸根據楊伯達考證，三車凌的投誠以及受賜宴於萬樹園之事的重要性，正反映在乾隆命畫工繪製的巨幅作品《萬樹園賜宴圖》之上（畫幅 221.2x419.6cm，圖 III-24A）。⁸⁹此作完成後，還與另一幅《馬術圖》（原名為《郎世寧畫乾隆宴筵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一同張貼於避暑山莊中，常用於賞賜扈從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大臣台吉茶宴的「卷阿勝境殿」（勤政殿後殿）內，可知此二圖之製作，與乾隆對蒙、藏等區域的統略息息相關。⁹⁰

萬樹園的宴會，是人數眾多、禮節繁備的正式宴會，光車凌部屬就有一百多人。但除了萬樹園的大型宴會之外，乾隆還特別邀請車凌等人至流杯亭小宴，此事並未載在《實錄》等正史之中，僅被記錄在乾隆詩集，因此顯得彌足珍貴。乾隆所作〈御製流杯亭小宴都爾伯特親王策凌等〉詩如下：

宛轉清流繞石渠，羽觴小宴歛康居。呼前手賜笑言接，喜可身循禮法初。

⁸⁷ 馬汝珩、馬大正，〈論杜爾伯特三車凌維護國家統一的鬥爭〉，頁 205-207。

⁸⁸ 乾隆設宴於萬樹園之記載，見祁韻士，〈厄魯特要略四〉，《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二。轉引自馬汝珩、馬大正，〈論杜爾伯特三車凌維護國家統一的鬥爭〉，頁 207。另見楊伯達，〈《萬樹園賜宴圖》考析〉，收入氏著，《清代院畫》（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頁 182。

⁸⁹ 楊伯達，〈《萬樹園賜宴圖》考析〉，頁 178-210。據楊伯達考證，《萬樹園賜宴圖》完成於乾隆二十年（1755）。

⁹⁰ 關於《馬術圖》研究，參閱楊伯達，〈關於《馬術圖》題材的考訂〉，收入氏著，《清代院畫》，頁 211-225。此二幅巨型貼落的張貼位置，見楊伯達，〈《萬樹園賜宴圖》考析〉，頁 198-201。

荒略從來事杯飲，傾誠那解飾虛譽。裊蹠錦段頌中禁，滿載歸教艷拂廬。

91



此詩提到，乾隆以羽觴小宴來款待三車凌等人，乾隆在宴中一位位呼喚與宴者至其面前，親自「手賜」水酒，並可親近地笑言相接，「傾誠」相待。顯然，流杯亭因空間狹小，對於拉近人我之間的距離格外有效。而這座宴請車凌等人的流杯亭，依據前文，筆者認為應是帶有「石渠」的「香遠益清」流杯亭。相較於「曲水荷香亭」，屬於經康熙重新詮釋、賦予新貌的流杯形式，乾隆重新整修過的「香遠益清亭」，可說是回復古典漢人傳統的石渠流杯建構。

「香遠益清亭」本身的空間十分有限，因此與之相對的「依綠齋」、鄰近的「香遠益清」基址及水池，應該也是此次小宴的規畫空間。至於「紫浮」一處因供奉有佛像，筆者認為應屬乾隆私人領域，可能非屬此次小宴所用(圖 III-17)。⁹²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空間緊臨湖區，帶有十分濃厚的江南氣息，而流杯亭小宴相對於正式宴會來說，也屬於較為輕鬆的「漢式」場合。此次小宴受邀者可能有哪些人？萬樹園賜宴當時的準部一百多人，自然不可能全部受邀至流杯亭。根據楊伯達研究，五月辛卯受封親王、郡王等頭銜的準部高階官員共有十三位，出現在《萬樹園賜宴圖》與三車凌同列著清朝冠服者，則有十五人。⁹³ 畢竟流杯亭的空間有限，故筆者推測有幸參與流杯亭小宴者，很可能就是這十幾位準部高級官員，同時不難想見必定也有一些清廷高官陪侍左右(圖 III-24B、C)。此次聚宴，乾隆的寶座很可能是設在「依綠齋」的南面涼殿中，而三車凌等人的座位應該也在乾隆近側，至於其他高級官員，則可能「雜坐水石間」與流杯亭側，除可近觀「傳聞中」之曲水流觴的趣味，並感受未曾親臨過之漢人江南風光的氣息。也許此次小宴中，還安排有漢人的樂舞表演。不過，與流杯活動相聯結的詩文比競，自然不可能出現在此次的準部小宴中，然而仍很可能由乾隆自身及清廷官員「表演」臨流賦詩之精彩過程。乾隆此首〈御製流杯亭小宴都爾伯特親王策凌等〉詩，即很可能是在流杯小宴中完成。

乾隆選在「香遠益清」流杯亭宴請準部投誠部族，可能有下列考量。第一，透過流杯亭小巧精緻，饒富興味之空間設計，不僅利於拉攏乾隆與外藩之間的距

⁹¹ 清高宗，〈御製流杯亭小宴都爾伯特親王策凌等〉，收入于敏中、傅恒等編，《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三十七，頁 12 下。

⁹² 關於「紫浮」的空間性質，見注 49 討論。

⁹³ 關於人物比定及受封之事，見楊伯達，〈《萬樹園賜宴圖》考析〉，頁 194-195。

離，並且也與一般正式宴會的氣氛壤別。尤其萬樹園聚宴或至「卷阿勝境殿」茶宴，均為一般正式安排的盛大會面禮儀場合，而能夠獲邀參加「小宴」，必然是十分特殊的情況。乾隆對待三車凌等，不是如他對一般大臣般僅賜與禮物、手書，而是特別邀請他們至流杯亭小宴，如此盛情，當令三車凌等感受到清廷對他們所受到的格外禮遇，並更顯乾隆對其部族之至誠心意。第二，「香遠益清亭」的石渠流杯對漢人而言是極為熟悉的傳統，但對三車凌等從新疆而來的遠道之客來說，想必十分新奇有趣。乾隆特別以此「漢式」流杯亭宴請他們，除可彰顯大清作為一個來自塞北卻不僅放眼塞外，同時統理中原的偉大帝國，此宴之漢式品味的精緻氣氛，一定也令受邀的車凌等人感到受寵若驚。而流杯聚宴傳統上所帶有之「賢才群聚」的特色，同樣適合此次流杯小宴的群體塑造上。流杯亭小宴之前，很可能已有清廷官員向三車凌等說明王羲之蘭亭會的意涵，而三車凌等受邀賓客，決定脫離準噶爾、接受清廷的招撫，對清廷來說，無疑為「賢才」之表率，故可「滿載歸教艷拂廬」，成為塞外部族之典範。

整體而言，清宮的流杯亭賜宴，不論對皇帝身邊近臣或外藩來說，都應該是非常獨特的恩典。不僅因空間設計利於讓臣子、外藩親近龍顏，體會「偶坐浮杯幾暇日，君臣對景論平生」的輕鬆與親密感受，同時，王羲之蘭亭會之「賢才群聚」的特色，也將烘托清宮流杯聚宴之參與者的集體想像。而近臣與外藩之流杯小宴的最大差異，很可能即在於詩文比競的活動安排上。皇帝近臣的聚會中，詩文創作的競賽成分必然不低，尤其各臣子在君王面前必然戰戰兢兢，希望獲得肯定。而外藩的流杯小宴中，若有詩文比競，很可能是作為一種表演節目，表演者正是皇帝本身及其近臣。至於流杯亭所帶有的江南氣息，也可視為清帝對外藩宣揚國威的一種展示。總之，流杯亭在清代宮廷所出現的特殊發展，可說是千百年來蘭亭傳統的嶄新創造。

6 小結

大抵而言，可說也作為王羲之蘭亭會「紀念物」之康熙所主導的避暑山莊流杯亭，作為一個文化空間，乃同時疊合了王羲之蘭亭會之「亭」、「曲水流觴」的意象、西湖「曲院風荷」景觀，及荷花之理學象徵等三個層次。在此疊合設計下，原為三月春日舉行的修禊雅集，在康熙手中變成了夏日景觀，適合避暑山莊的「避

暑」形象，且以荷花浮水取代酒杯流觴，將流杯亭原作為飲酒之處，轉換成觀賞、品味芬芳的場景，並將王羲之在紹興蘭亭之「自然景觀」的曲水流觴，與人工打造之「流杯亭」，做了符合康熙心中之「天趣」的創造。這樣的改造之後，蘭亭會，轉變成不飲酒也能清賞參與的雅會，適合戒慎飲酒的康熙皇帝。整個改造過的「天趣蘭亭」，是基於滿州皇帝對傳統漢文化之理解與檢擇、疊合的結果，於是蘭亭傳統中的「曲水流觴」，在西元三五三年之後第一次出現改變的契機，塑造了新的蘭亭形象與意義，並且，只發生在清代宮廷之中，宮廷外部並無相同的作法。甚有意思的是，康熙皇帝在紫禁城——傳統漢人政治中心——所建造的西苑流杯亭，是採漢式流杯建構的石渠樣式；但在避暑山莊——統御塞外之政治中心，卻是營造由他個人所創造之「天趣蘭亭」的流杯亭形式。

康熙的「天趣蘭亭」到了乾隆時代，如「香遠益清亭」所見，似乎有回歸漢式流杯建構的傾向。乾隆的考量，應可與他在圓明園所建造之「蘭亭八柱」一併觀之，這個部分將在本章第二節進行討論。但從本節對於清宮使用流杯亭的討論看來，清代宮廷中的多座流杯亭，似乎是特別為帝王本身、近臣與外藩而設計的場所。在此處，不僅帝王可雅賞、休憩，更可作為恩賜近臣、外藩的特別空間。⁹⁴尤其流杯亭帶有王羲之蘭亭會「賢才群聚」的內涵，在流杯亭，不僅可「君臣對景論平生」，帝王對臣子（外藩亦為臣）更可「頻傳」「天語」，此舉當可有效拉近君臣間的距離，從而塑造一種君臣宛若同屬一個「群體」的情誼想像。而為臣子塑造這種君臣為同一群體的想像，應該即是康熙、乾隆等清代帝王所希望營造的「群體感」。

雍正四年（1726）之前，雍正皇帝在圓明園建造了一座流杯亭，此亭後來於乾隆九年（1744）與周邊其他建築，被納入「圓明園四十景」中的「坐石臨流」一景中（圖 III-25）。由《圓明園四十景圖詠》所見之流杯亭樣式，以及，據研究此處也栽有荷花，可知此亭採用與避暑山莊「曲水荷香」、「香遠益清」二景流杯亭樣式相同的設計，反映出雍正皇帝對流杯亭的想法乃是繼承自康熙皇帝而來。⁹⁵然而此景與「香遠益清」相仿，到了乾隆手中又被改造成「蘭亭八柱」。除了雍正之外，康熙第十三子胤祥（1686-1729）之子弘曉（1722-1778），有〈流

⁹⁴ 康熙與乾隆皇帝均有在流杯亭休憩、觀覽的詩文傳世，如康熙皇帝有〈流杯亭晚眺有懷〉，《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三十九（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 3 上；乾隆皇帝有〈題瀛臺流杯亭瀑布水〉，《御製詩集》，初集卷八（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 16 上-下。

⁹⁵ 圓明園流杯亭所栽種之植物種類，見郭黛姮主編，《遠逝的輝煌：圓明園建築園林研究與保護》，頁 270。

杯亭記〉提到：

流杯亭者，王考倣曲水之讌而爲之也。構亭于中，環以小山，蔭以叢灌，屈注爲流，疊石爲坐。每春、夏之交，風日清朗，公餘偶於此與諸文士觴詠賦詩，歲不過一二焉。雍正庚戌（8年，1730）之秋，因地震傾欹特甚，欲葺之而未果。迨至乾隆己未（4年，1739）春，予因作而新之，非徒以爲遊觀之所，將以繼棠陰桑梓之思也。退食之暇，偕一二知己列坐於此，淪茗以代漱醪，清吟以代歌吹，覺天機暢遂，俗慮都蠲。……⁹⁶

根據學者研究，胤祥所建之流杯亭原置於綺春園清夏齋中，名為「寄情咸暢」流杯亭，目前只剩基座展示於圓明園遺址中（圖 III-26A）。⁹⁷當時胤祥園林稱為交輝園，乾隆三十四年（1769）之後此園被收回併入圓明園，後才改名綺春園。由弘曉提到胤祥所建之流杯亭是「疊石爲坐」，筆者推測此亭營建之初，可能也是以康熙「天趣蘭亭」樣式為藍本建造，但乾隆四年重建之後改為石渠樣式的流杯亭。根據樣式房圖檔，此亭後來又改建，擴大流杯亭的面積超過一倍之多，並設寶座於面北的位置（圖 III-26B）。⁹⁸可能「寄情咸暢亭」原先的面積過小，又無可供搭配之涼殿，故後來擴建，以有更合適的空間擺放寶座。透過此平面圖，可為流杯亭中帝王（或主人）座位之陳設，提供重要訊息。而無論是雍正或胤祥的例子，均可見康熙對流杯亭之熱衷影響子孫甚鉅。尤其弘曉以茶代酒、以詩詞吟誦取代歌樂，這種流杯方式與精神，可說是繼承自其祖父康熙。

第二節 對蘭亭傳統的全面掌握：乾隆皇帝對蘭亭傳統的回歸與追憶

康熙之後的雍正皇帝，繼承了康熙所喜好的流杯風格，在圓明園也打造了一座「天趣蘭亭」風格之流杯亭，但到了乾隆皇帝，他對流杯亭的喜好卻與其父祖

⁹⁶ 弘曉，〈流杯亭記〉，《明善堂詩文集》，文集卷二，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刻本）。

⁹⁷ 「寄情咸暢亭」相關研究見郭黛姢、賀艷，《圓明園的“記憶遺產”——樣式房圖檔》（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頁 594、600-601。清夏齋相關研究參見同書，頁 589-601；張寶章，〈萼輝園和交輝園沿革初探〉，《圓明園》，2011 年第 11 期，頁 39-47，本文使用網路文章，網址：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908/14/32773547_685509485.shtml，檢索日期：2018-10-14。

⁹⁸ 根據郭黛姢、賀艷，《圓明園的“記憶遺產”——樣式房圖檔》，頁 600，圖 III-26B 所見之紅線繪製的部分，應為新建者，而流杯渠石塊以黑線繪製的部分，則是舊有面積。

輩不同，不論是經乾隆改造過的避暑山莊「香遠益清亭」、圓明園流杯亭，或乾隆時期重修之北京西郊潭柘寺的「猗玗亭」，和乾隆年間開始建造之寧壽宮花園中的「禊賞亭」，此四座流杯亭的共同特色，倒像是一種乾隆皇帝對蘭亭傳統的回歸——例如，將康熙之「天趣蘭亭」改回原本設有水臺盤、有石渠水道於亭中之流杯亭的傳統樣式。其中最特殊的，莫過於圓明園的「蘭亭八柱亭」，此亭雖可說是一種回歸漢式流杯亭的變形，卻也是繼康熙的「天趣蘭亭」之後，另一個蘭亭史上的嶄新創造。本節即針對乾隆皇帝對於蘭亭傳統的回歸與重新塑造，進行討論，以下將分乾隆皇帝的漢式流杯亭，與圓明園「蘭亭八柱亭」、清宮製作之「蘭亭」相關文物兩方面進行討論。

1 乾隆皇帝對蘭亭傳統的回歸：漢式流杯亭的建造

1-1 寧壽宮，「禊賞亭」

乾隆皇帝自乾隆三十六年（1771）起至四十一年（1776），為其「歸政」退居著手進行紫禁城東北角之寧壽宮的修繕、營建工程。⁹⁹寧壽宮區西北角的「寧壽宮花園（乾隆花園）」裡的第一個院落，有一個流杯建構，名為「禊賞亭」（圖 III-27）。¹⁰⁰「禊賞亭」和西苑流杯亭一樣，均是由漢白玉石堆砌而成，此亭下方為一須彌座式平台，結構除前方有向前凸出的方亭，內有挖鑿成「如意」樣式的石渠水道之外，後方緊接著一個長方形明間（圖 III-28）。此形式與避暑山莊之流杯建構的組成相仿。亦即，在避暑山莊，「曲水荷香亭」與「玉琴軒」為一組建物、「香遠益清亭」與「依綠齋」也為一組建物，這種流杯亭與涼殿互相搭配的「分離」形式，在寧壽宮可能因空間有限，因此流杯亭與涼殿合而為一。

根據北京故宮博物院網站，「禊賞亭」的石渠長二十七公尺，此外，筆者二〇一七年田野調查，「禊賞亭」東面入口尺寸，粗略估算約五百四十一公分。石渠深度約二十九公分，寬度約二十公分。亭中的水臺盤共由九塊石面組成，中間

⁹⁹ 關於乾隆花園的研究，參見 Nancy Berliner et al., *The emperor's private paradise: treasures from the Forbidden City* (Salem, Mass.: Peabody Essex Museum, 2010). 本書認為寧壽宮花園的建造，體現了乾隆皇帝對於傳統漢人文化的熱愛，在此園林的空間安排、建築、裝飾等，不僅展現乾隆對儒家、文人文化的崇尚以及他的佛教信仰，同時也可見到他對西方透視等文化的興趣。另外可參考程子衿主編，《乾隆花園》（北京：故宮出版社，2016）。

¹⁰⁰ 關於禊賞亭的研究，可參閱王其亨、官嵬，〈寧壽宮花園點睛之筆：禊賞亭索引〉，收入單士元、于倬云主編，《中國紫禁城學會論文集》，第一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7），頁 296-310；白鈴安（Nancy Berliner）作，李紹毅譯，〈園林，曲水與書法〉，《紫禁城》，第 200 期（2011.9），頁 20-26；李乾朗，〈禊賞亭〉，《紫禁城》，第 200 期，頁 27-29。王其亨、官嵬之文，認為「禊賞」意含乾隆期待「延長壽命」的想法。

那一面的石塊尺寸最大（見圖 III-28B 綠色線條標示處）。「禊賞亭」四周的漢白玉欄杆，刻成竹枝的造型，四周的屏欄則刻有竹紋圖案。根據圖 III-28B 推算，這些屏欄共有三十四屏，由正面望去左右兩側的竹紋圖案幾乎是對稱的，田野時所見，少數看似沒有對稱的屏欄，筆者推測可能是復原時放錯位置（圖 III-29）。由「禊賞亭」特別裝飾以竹枝、竹葉的刻石，可看出乾隆皇帝當時的設計，是為呼應王羲之《蘭亭序》「茂林脩竹」一語，亦可了解此亭之建造，乃有意追仿王羲之蘭亭會在浙江山陰修禊的外在空間。而此石渠的流水，是由藏於南側假山中的水井、水缸所供應（圖 III-30）。

「禊賞亭」後方明間中，現今仍可見有一黑漆雲龍屏門（圖 III-31）。根據 *The emperor's private paradise: treasures from the Forbidden City* 一書，此處原來放置有根雕家具三件，分別為一個單人座椅、一立几，以及一件臥床（圖 III-32）。Nancy Berliner 認為，此類座椅的使用，具有與佛、道之神職人員有關的象徵意義，士大夫也透過對根雕家具的使用，顯示他們對生活的態度。此外，乾隆皇帝也喜歡以此類家具說明他的內在修養，如他在郎世寧等繪的《乾隆帝歲朝圖》中，即坐在根雕坐椅上（圖 III-33）。¹⁰¹ 這套家具究竟是否為乾隆時所放置，已很難確認，不過據王子林研究，乾隆四十年（1775）寧壽宮工程活計，曾有「禊賞亭續添楠木條桌三張」¹⁰²的記載。雖不知道「禊賞亭」除了條桌之外還放置那些家具，但這樣看來，也許根木家具是後來的帝王所設。至於乾隆當時的擺設，透過文獻記錄及前文對避暑山莊、西苑等各處流杯建構之復原討論，吾人仍可大致推測流杯亭內側的明堂中，面向東面的正中位置，應有安置寶座一張，材質很可能也是楠木所製。¹⁰³ 周邊另設條桌三張，可能為供帝王書寫、作畫使用，也可能是用來準備水酒果品之用。

除了家具之外，《欽定日下舊聞考》中也記載著：「（禊賞）亭中恭刊御筆臨董其昌《蘭亭記》。」說明此亭中曾刻有乾隆臨寫董其昌的書蹟《蘭亭記》（即《蘭亭序》）。¹⁰⁴ 此文當時刻於何處，就今日「禊賞亭」所見，已無法確知。但或許目

¹⁰¹ 相關研究見 Nancy Berliner, "The Qianlong Garden in the Place of Tranquility and Longevity," in Nancy Berliner et al., *The emperor's private paradise: treasures from the Forbidden City*, p. 96.

¹⁰² 原文出自乾隆四十年五月二十四日《呈寧壽宮後三路估需工料銀兩清單》。轉引自王子林，〈乾隆太上皇宮寧壽宮營建考〉，《故宮學刊》，第七輯（2011.6），頁 131。

¹⁰³ 寧壽宮中的楠木裝潢甚為有名，和珅即曾於自宅仿寧壽宮製造楠木房屋而獲罪，因此筆者認為乾隆時期「禊賞亭」中的家具，很可能也都是楠木所製。和珅所造楠木屋舍，見張淑嫻，〈揚州匠意：寧壽宮花園內檐裝修〉，收入故宮博物院、柏林馬普學會科學史所編，《宮廷與地方：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技術交流》（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頁 149-150。

¹⁰⁴ 于敏中等撰，《欽定日下舊聞考》，卷十八（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 20 下。「恭刊」二

前黑漆雲龍屏門的位置，在乾隆當時正是刊刻著他所臨寫的董其昌書《蘭亭序》也說不定。而清宮中，不少刻書也都是刊刻在木屏之上（圖 III-34）。¹⁰⁵

乾隆皇帝曾有〈題禊賞亭〉寫到：

有石巉巖有竹攢，流觴亭裡石渠盤。他年遼待臨王帖，視昔由今正好觀。

106

由此詩內容提到修竹、石渠以及臨王羲之帖之事，以及「禊賞亭」的竹紋雕刻裝飾、「禊賞亭」當時還刻有的《御臨董其昌臨柳公權書蘭亭詩》來看，乾隆寧壽宮此亭之設置，是以王羲之蘭亭會為追仿對象。而作為乾隆退位後之居所的寧壽宮之所以有此流杯建構，除流杯亭從康熙皇帝開始，可說已被建立成清代宮廷之必要設計的傳統外，乾隆本身對王羲之與董其昌書法的喜好、對蘭亭會之風雅的青睞，應該也是他在寧壽宮建立「禊賞亭」的重要因素。由此觀之，「禊賞亭」建造當時所設想的主要功能，很可能是為乾隆個人歸政後雅好遣懷所設，乾隆皇帝或許也可在此與近臣一同流觴賦詩，但此處流杯聚會的宴請對象，並不包括外藩。¹⁰⁷可惜目前並無資料記載乾隆對「禊賞亭」之使用。

「禊賞亭」之流杯石渠的形式，並未採用康熙皇帝所創立之「天趣蘭亭」樣式，而是採取對稱、規整的漢式流杯石渠傳統。這個傳統至晚在宋代已經形成，如《營造法式》之「國字流杯渠」及崇福宮之「泛觴亭」所見（圖 II-2、圖 II-3）。乾隆採取漢式流杯亭的作法，不僅出現在避暑山莊「香遠益清亭」、寧壽宮「禊賞亭」，北京西郊潭柘寺的「猗環亭」也是相同概念的表現。

字之解，應為「恭刻」之意，劉璐之相關研究亦作此解，劉璐認為「禊賞亭」中所刻為《蘭亭序》。見劉璐，〈論乾隆皇帝的士人化傾向〉，收入氏著，《融合——清廷文化的發展軌跡》（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頁 398。查任道斌編著，《董其昌系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頁 26 提到董其昌臨寫之「穎上本」蘭亭序，即稱之為「蘭亭記」。

¹⁰⁵ 清宮中，不少刻書也都是刊刻在木屏之上，如寧壽宮「頤和軒」東牆上方，即有木刻乾隆所書《開惑論》（圖 III-34）。

¹⁰⁶ 清高宗，〈題禊賞亭〉，《御製詩集 五集》，卷六十九，頁 8 上。

¹⁰⁷ 雖然寧壽宮是作為乾隆歸政後的居所所設計，但嘉慶繼位後，乾隆實際仍居養心殿，他似乎也不常於此處活動。參見朱誠如，〈乾隆建儲與訓政述評〉，《故宮博物院院刊》，2000 年第 4 期，頁 7。

1-2 乾隆之流杯亭對漢式傳統的回歸

除了「禊賞亭」之外，乾隆還曾打造其他流杯建構。首先，位於北京西郊歷史悠久的潭柘寺也留有一座流杯亭。這座流杯亭位於潭柘寺東路，東路當時為帝王游山休息的行宮。因潭柘寺在文革期間遭受嚴重破壞，珍貴史料已經不存，故無法確認「猗玗亭」最早起建於何時。¹⁰⁸雖然如此，記錄麟慶一八四一至一八四五活動的《鴻雪因緣圖記》第三集所收之〈猗玗流觴〉載：

流杯亭在潭柘寺內，乾隆間重修，賜額曰：「猗玗清淨」。簷下琢石為渠，作蟠龍相對勢，引泉自東而西。……。隨飯延清閣，憩猗玗亭。因寺禁酒，乃淪菊茗就石渠，泛甌代觴，以償夙願。……。¹⁰⁹

此文尚有附圖（圖 III-35）。¹¹⁰透過麟慶說明，可知潭柘寺本來即有一座流杯亭，目前所見的「猗玗亭」應是乾隆年間所修，且此處因潭柘寺禁酒，故以茶代酒，「泛甌代觴」。而「猗玗亭」水臺盤所呈現的「蟠龍相對勢」，也有「龍虎」相對的說法，意指從流杯亭南、北不同方向望去，有龍形、虎形之別（圖 III-36）。但總之，「猗玗亭」是採取漢式石渠水道的方式建造。¹¹¹而「猗玗亭」由南往北望去，除後方階梯兩側種植有「金鑲玉竹」（龍鬚竹，康熙 37 年〔1696〕所賜）之外，階梯上方香爐後方目前設有「乾隆寶座」，若對照《鴻雪因緣圖記》，北區當時並未有其他房舍，推測此座應為後人所設（圖 III-35）。¹¹²倒是《鴻雪因緣圖記》流杯亭北面與今日相同，栽有一片竹林，此可能即康熙所賜之龍鬚竹。乾隆曾有〈猗玗亭〉詩提到：「引流何必浮觴效，豈是蘭亭修禊人。」¹¹³對乾隆而言，流杯亭的建構最直接聯想到的，就是王羲之蘭亭會的典故。

¹⁰⁸ 潭柘寺文革期間遭受破壞之事，為筆者二〇一七年七月十日在潭柘寺「大銅鍋」說明看板中所獲之訊息。

¹⁰⁹ 麟慶，〈猗玗流觴〉，《鴻雪因緣圖記》（北京：線裝書局，2003），第 3 集，頁 311-312。另見 Yun-chiu Mei, "The Pictorial Mapping and Imperialization of Epigraphic Landscap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Ph. 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2008, p. 180-181. 《鴻雪因緣圖記》第三集所記錄麟慶活動年代，以及《鴻雪因緣圖記》相關研究，請參閱梅韻秋，〈天下名勝的私家化：清代嘉、道年間自傳體紀遊圖譜的興起〉，《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41 期（2016.9），頁 312，及全文頁 303-370。

¹¹⁰ 根據梅韻秋研究，為《鴻雪因緣圖記》繪圖者，均為麟慶幕友。見梅韻秋，〈天下名勝的私家化：清代嘉、道年間自傳體紀遊圖譜的興起〉，頁 304，注 3。

¹¹¹ 筆者由此亭水臺盤面石材使用並不統一的情況看來，判斷此亭在二十世紀之後應經重修。

¹¹² 「金鑲玉竹」來源，見潭柘寺說明板。

¹¹³ 清高宗，〈猗玗亭〉，《御製詩集 三集》，卷三十五（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 9 下。

除潭柘寺「猗玗亭」之外，乾隆還曾在乾隆十年（1745），於香山行宮靜宜園虛朗齋建立「流觴曲水」。¹¹⁴虛朗齋為靜宜園中宮之主要建築，是帝王暫居此地時的居所。¹¹⁵乾隆關於虛朗齋的御製詩提到：「南為曲水，藤花垂蔓覆其上」¹¹⁶，根據學者對靜宜園的研究指出，「流觴曲水」上設有亭子。¹¹⁷看來虛朗齋之曲水上方的亭子可能以藤花垂架代之，或覆有籐花垂蔓。雖然清宮畫家如董邦達、張若澄均畫有《靜宜園二十八景圖》，可惜畫面上對虛朗齋的描繪無法清楚看到「流觴曲水」之處。¹¹⁸郭黛姮主持的圓明園研究專書曾指出寧壽宮花園、靜宜園、綺春園「三處的流杯渠圖案相同」。¹¹⁹雖然沒有清晰可供比對之靜宜園「流觴曲水」石渠，但「禊賞亭」與綺春園「寄情咸暢亭」的石渠布局確實十分相近，中心均形成一個如意形的水道，可說是以相同的基本圖樣來加以變化（圖 III-38）。

整體而言，乾隆年間完成之寧壽宮「禊賞亭」、靜宜園「流觴曲水」石渠、潭柘寺「猗玗亭」，及避暑山莊的「香遠益清亭」，均非以康熙創造之「天趣蘭亭」的流杯亭樣式所建，而採用如《營造法式》所示範之流杯亭的漢式流杯渠水道的樣式來建造。上文提到之幾座石渠樣式相仿的流杯建構中，以完成於乾隆四年之綺春園（交輝園）春夏齋「寄情咸暢亭」的時間最早，寧壽宮「禊賞亭」的建造則晚於「寄情咸暢亭」近四十年。雖然目前所流傳下來之春夏齋樣式雷圖檔大抵為嘉慶之後所製，但很可能此園建造之初亦是由雷氏家族所承造。¹²⁰雷氏家族負

¹¹⁴ 靜宜園相關研究見殷亮、王其亨，〈御園自是湖光好，山色還須讓靜宜——淺析香山靜宜園 28 景經營意向〉，《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9 卷第 6 期（2007 年 11 月），頁 556-559；袁長平，〈山水清音——品讀乾隆時期香山靜宜園理水之美〉，《中國園林》，2012 年第 8 期，頁 103-106。靜宜園在英法聯軍、八國聯軍時損毀甚多，虛朗齋現亦不存。

¹¹⁵ 殷亮、王其亨，〈御園自是湖光好，山色還須讓靜宜——淺析香山靜宜園 28 景經營意向〉，頁 557。

¹¹⁶ 清高宗，〈靜宜園二十八景詩〉之「虛朗齋」，《御製詩集 初集》，卷三十（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 18 下-19 上。另外，《欽定日下舊聞考》記錄：「虛朗齋前石渠為流觴曲水」。見于敏中等撰，《欽定日下舊聞考》，卷八十六（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 8 下。

¹¹⁷ 此論出自殷亮，〈宜靜原同明靜理，此山近接彼山青——清代皇家園林靜宜園、靜明園研究〉（天津：天津大學建築學院碩士論文，2006），頁 60。此頁並附有「中國國家圖書館，與 343-0646，靜宜園內中宮各殿座遊廊圖樣」，筆者並未親自調閱此圖，但圖樣上似乎可見曲水樣式的結構（圖 III-37）。

¹¹⁸ 董邦達《畫靜宜園二十八景》（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見故宮博物院編，《石渠寶笈特展·編纂篇》（北京：故宮出版社，2015），圖 17。張若澄《靜宜園二十八景圖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見北京，故宮博物院網站，網址：<http://en.dpm.org.cn/dyx.html?path=/tilegenerator/dest/files/image/8831/2008/0369/img0016.xml>，檢索日期：2018-7-21。

¹¹⁹ 郭黛姮主編，《遠逝的輝煌：圓明園建築園林研究與保護》，頁 229；張恩蔭，〈圓明園遺物考略〉，收入氏著，《圓明園變遷史探微》（北京：北京體育學院出版社，1993），頁 42。

¹²⁰ 春夏齋樣式雷圖檔繪製年代，見郭黛姮、賀艷，《圓明園的“記憶遺產”——樣式房圖檔》，頁 590、592-594、600。

責清宮多項大型建築、園林工程，故這幾座石渠樣式相近之流杯建構的設計底稿，很可能出自雷氏家族之手。值得注意的是，交輝園作為怡親王的宅院，位階必然低於乾隆的寧壽宮，但兩處竟使用了同樣的流杯亭圖樣底稿來建造。此現象或許有兩種可能的解釋，第一，流杯亭的石渠設計因必須考慮供水來源、供水水道設置及水流速度等專業問題，故由工匠直接向帝王建議石渠樣式，帝王對此也無太強烈的意見；第二，由工匠提出數種可運行之石渠樣式供帝王選擇，帝王仍有相當的參與度。關於這兩種解釋，依據乾隆對於宮廷藝術品項之製作的高度參與來推測，以後者的可能性為高。¹²¹筆者認為寧壽宮流杯亭建造之時，乾隆應指定了漢式石渠的大方向，但石渠的布局樣式基本上是由專業的匠工所提供，再由乾隆做選擇。因此位階不同的交輝園與寧壽宮之所以採取同樣之石渠樣式，很可能是基於流杯建構之設計包含複雜工法，故工匠所能提供的樣式有限，帝王也必須在此前提下接受有限的選擇方案。

此外，雖然目前甚少見到乾隆對流杯亭的使用紀錄，但對於那些人可使用流杯亭，仍可作一個約略推測。其中，作為乾隆歸政居處的寧壽宮如前文所言，很可能是為乾隆本人及其與近臣之聚宴所設。靜宜園之「流觴曲水」由於位於中宮，性質與寧壽宮花園有些相近，筆者認為規劃的使用對象或許也與寧壽宮相同。而作為行宮的潭柘寺，似乎不太可能用來宴請外藩，故使用對象的設定應該也相去不遠。相較於上述三處，紫禁城旁的西苑與避暑山莊中的流杯亭所設定的使用對象，則在乾隆皇帝及近臣之外，還包含外藩。雖然乾隆對於流杯亭的使用幾乎未見記載，但不難想像，乾隆皇帝所建的流杯亭除了是他個人的風雅興趣之外，他仍深諳繼承自王羲之蘭亭會的流杯亭具有「塑造群體」的功能，因此如前文所討論，乾隆十九年在避暑山莊宴請前來投誠的都爾伯特親王三車凌等，即是乾隆對流杯亭之使用的絕佳例證。

乾隆皇帝一如康熙皇帝，積極在宮廷中營建流杯建構的狀況，至少其中一個原因應是來自康熙的影響與乾隆對康熙的懷念，並且在他們手中，流杯亭其實帶有一種作為王羲之蘭亭會之「紀念物」的意義。雖然乾隆並非不了解流杯建構具有「塑造群體」的功能性，同時他也如此運用（如宴請三車凌等外藩），但乾隆對漢式流杯建構的回歸，似乎顯示他比康熙有更多對中國傳統文人生活的想像與期待，並有意追隨此傳統。這個期待，即如他對寧壽宮花園之設計所見。寧壽宮

¹²¹ 乾隆對工藝製品的積極參與，如余佩瑾，〈乾隆皇帝的古陶瓷鑑賞〉，收入余佩瑾主編，《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頁 29，注 63 所見。

花園雖包含了乾隆對西方文化的興趣，但同時也反映了乾隆對於文人生活的嚮往與對中國儒家、哲學的興趣。¹²²乾隆皇帝自幼即接受嚴格的漢學教育，對漢文化有深切的掌握與喜好，這些教育、薰陶對於滿州帝王的統治而言，具有極其深刻的意味。¹²³而乾隆不特別創造新的流杯亭樣式，選擇對漢式流杯樣式的回歸，其實也可放入這個脈絡來理解。或許對乾隆來說，王羲之的書法及蘭亭會原即屬於漢人傳統，故與此有關的流杯建構，必然也應該要回復漢式作法才是「正統」。亦即乾隆除可藉此對外顯示他的選擇代表他對漢學、漢文化、漢傳統的素養高度，就統治的意義而言，亦是一種宣示繼承「正統」的表現。至於再三於宮廷建設流杯亭對乾隆個人來說，則反應出他對王羲之蘭亭文化的濃厚興趣，這個興趣除顯示在流杯建構的多處營造之外，更可從「蘭亭八柱」的營建及乾隆宮廷與蘭亭主題相關之多樣文物的製作上看出。

2 乾隆皇帝對蘭亭文化的追憶：圓明園「蘭亭八柱亭」與乾隆朝「蘭亭」文物製作

雖然乾隆年間修整的流杯亭有回歸蘭亭傳統的趨勢，但乾隆四十四年(1779)完成的圓明園「蘭亭八柱亭」，卻是蘭亭史上過去未見的創造。而「蘭亭八柱亭」也不應僅由流杯亭的角度來看，反而，「蘭亭八柱亭」的意義更貼近碑帖、工藝的性質。

2-1 雍正年間的「流杯亭」到乾隆時期的「坐石臨流」景

圓明園四十景中原有「坐石臨流」景，其中的「流杯亭」，據研究是完成於雍正四年(1726)之前，雍正五年(1727)還曾命造辦處製作《彩漆小木船蓮花瓣葫蘆式托碟》於流杯亭使用。¹²⁴此亭原僅稱「流杯亭」，至乾隆年間才與「同

¹²² Nancy Berliner et al., *The emperor's private paradise: treasures from the Forbidden City*.

¹²³ 陳捷先，〈略論乾隆朝的文化政策〉，收入馮明珠主編，《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7)頁 217-229。

¹²⁴ 造辦處資料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二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雍正五年二月十一日，圓明園來帖內稱郎中海望奉上曰：著將《彩漆小木船蓮花瓣葫蘆式托碟》做幾件流杯亭用。」轉引自陳輝，〈年年上巳尋歡處，便是當時晉永和——《蘭亭八柱帖》帖石與清廷的曲水流觴亭〉，《中國書法》，2012年第1期，頁57。

樂園」一同併入「坐石臨流」景，成為圓明園四十景的第二十八景（圖 III-25）。¹²⁵ 圓明園這座流杯亭，原是一座三開重檐四方亭，下有疊石、流水經過，與避暑山莊康熙皇帝所造之「天趣蘭亭」形式相同。乾隆題此景為：

仄澗中濑泉奔匯，奇石峭列，為坻為碕，為嶼為奧。激波分注，潺潺鳴籟，
可以漱齒，可以泛觴。作亭據勝處，冷然山水清音。東為同樂園。
白石清泉帶碧蘿，曲流貼貼泛金荷。年年上巳尋歡處，便是當時晉永和。

由乾隆的詩文，可了解王羲之在東晉永和年所舉辦的蘭亭會，是「坐石臨流」流杯亭最主要的回應對象。John R. Finlay 在其博士論文討論乾隆將此景命名為「坐石臨流」，認為是取自王維（約 692-約 761）〈山居秋暝〉「清泉石上流」的典故。¹²⁶ 不過，乾隆其實對許多處所都使用過「坐石臨流」這個詞來加以形容，如〈再題千尺雪〉中有「坐石臨流契妙旨」，題清漪園（頤和園）中惠山八景的〈水樂亭〉，有「坐石臨流憶去年」等。¹²⁷ 此外，張玉書、陳廷敬等所編的辭典《御定佩文韻府》中亦無「坐石臨流」之典，可見不論「坐石」或「臨流」都是詩文中經常出現的一般用語。因此看來，乾隆以「坐石臨流」來命名包含有流杯亭、同樂園的這一景，與王維〈山居秋暝〉應該無關。毋寧說，乾隆是以「坐石臨流」字面最直接的意象，來呼應王羲之《蘭亭序》所形容之「清流激湍」的環境。¹²⁸

2-2 乾隆對《蘭亭八柱帖》的構想

乾隆四十四年將此流杯亭改建成八方重簷亭，內部改置八方石柱及一座石屏，此八方石柱上刻有與王羲之蘭亭會相關的《蘭亭序》、《蘭亭詩》，稱之為「蘭亭

¹²⁵ 郭黛姮主編，《遠逝的輝煌：圓明園建築園林研究與保護》，頁 15。

¹²⁶ John R. Finlay, "40 Views of the Yuanming yuan: Image and Ideology in a Qianlong Imperial Album of Poetry and Paintings."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2011, pp. 89-90.

¹²⁷ 清高宗，〈再題惠山園八景 水樂亭〉，《御製詩集 二集》，卷七十六（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 15 上；〈再題千尺雪〉，《御製詩集 四集》，卷八十八，頁 15 上-下。

¹²⁸ 此外，林煥盛在其碩士論文中認為〈清院畫十二月令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 III-40）「三月」畫幅左下方，是描繪圓明園中位於同樂園邊的曲水流觴景象，但作者並未說明畫上為何沒畫出亭子。見林煥盛，〈丁觀鵬的摹古繪畫與乾隆院畫新風格〉（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頁 100。筆者認為〈清院畫十二月令圖〉「三月」畫幅所呈現是否為圓明園流杯亭景觀尚有待進一步討論，但根據此畫以「月令」為描繪主題，畫上繪有諸多文人一同於曲水上流觴之景，也許更可能是三月應景的主題選擇。

八柱」(圖 III-39)。¹²⁹乾隆四十四年改建圓明園「坐石臨流」景時，已確定要在此景設立八根石柱刻上蘭亭相關詩文，故在圓明園「蘭亭八柱」建造同時，輯有《蘭亭八柱帖》，準備將此八帖刻上八柱。¹³⁰此帖的製作年代與「坐石臨流」景之整建，均完成於乾隆四十四年。《蘭亭八柱帖》的內容可以《皇朝通志》的記載作一瞭解：

御刻《蘭亭八柱帖》乾隆四十四年

臣等謹按，御刻《蘭亭八柱帖》，內前三冊為虞世南、褚遂良、馮承素模本。四冊為柳公權《書蘭亭詩》。五冊為戲鴻堂刻《柳公權書蘭亭詩》。六冊為御勅于敏中《補柳公權書蘭亭詩》。七冊為董其昌《倣柳公權書蘭亭詩》。八冊為御臨《董其昌倣柳公權書蘭亭詩》。卷首，御題五言排律一首。卷中，御題七言絕六首、七言律四首。御跋四。又于敏中恭和御製元韻七言律一首。¹³¹

故知乾隆選入刻帖的前四件為唐人摹《蘭亭序》帖、書《蘭亭詩》，後四件為明董其昌、清內府書家、乾隆皇帝臨寫《蘭亭詩》之作。¹³²乾隆皇帝為收藏此八件墨跡本，特命造辦處製作一《清紫檀木雕蘭亭修禊圖八柱帖插屏》，以八卦命名八個抽屜存放，抽屜外側之《插屏》屏心，還描繪有王羲之蘭亭會圖象，並有乾隆四十四年〈題蘭亭八柱冊〉詩一首(圖 III-41、III-表一)。¹³³就乾隆八柱墨跡的選擇來看，他認為足以代表蘭亭傳統的書蹟，應即王羲之書《蘭亭序》及柳公權書《蘭亭詩》。但乾隆之所以成此「八柱」，主要關鍵其實是內府所藏的柳公權《書蘭亭詩》。

¹²⁹ 郭黛姮主編，《遠逝的輝煌：圓明園建築園林研究與保護》，頁 228。

¹³⁰ 全帖圖版見程步濤編，《乾隆欽定傳世藏帖》(北京：昆侖出版社，2000)，第 6 冊。「蘭亭八柱」墨跡本，參見故宮出版社編，《蘭亭八柱》(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相關研究見許國平，〈蘭亭八柱帖〉，《紫禁城》，2011 年第 9 期，頁 72-74；袁玉紅，〈國家圖書館藏《蘭亭八柱帖》之考析〉，《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1 年第 2 期，頁 59-61；陳輝，〈年年上巳尋歡處，便是當時晉永和——《蘭亭八柱帖》帖石與清廷的曲水流觴亭〉，頁 55-62。

¹³¹ 嵇璜等奉敕撰，《皇朝通志》(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16，頁 15 上-15 下。

¹³² 關於此八卷墨跡本之著錄狀況與目前學術界的意見，參見許國平，〈蘭亭八柱帖〉，《紫禁城》，頁 72-74。徐邦達對柳公權卷意見，參見徐邦達，《古書畫偽訛考辨》，上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頁 127-132。

¹³³ 見王子林，〈清紫檀木雕蘭亭修禊圖八柱帖插屏〉解說，收入故宮博物院編，《蘭亭圖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頁 383-385。關於圖 III-41B，由於遍尋不著《清紫檀木雕蘭亭修禊圖八柱帖插屏》之背面圖板，故以《紫禁城》中所刊載的複製品廣告作為替代。圖版見〈蘭亭八柱詩插屏〉廣告，《紫禁城》，2014 年第 11 期。

首先，先看一下乾隆〈題蘭亭八柱冊（有序）〉：

自永和之修禊，觴詠初傳；迨貞觀之蒐珍，鈎摹迭出。惟《定武》馳聲籍甚，而闕文聚訟紛如。寢至翻刻失真，亦復操觚求似。顧善本之難覓，價鼎無慮百千；且好手之罕逢，名蹟或存什一。緊諫議寫其篇帙，波折又新；洎香光仿彼筆蹤，杼機獨運。

余既使舊卷之離而重合，因從幾暇再臨；尋復惜原本之剝而不完，詔付文臣遍補。於是四冊並教刻鵠，然而一編不外《戲鴻》。繼披柳蹟於《石渠》，兼集唐模於壁府。仍琬琰之咸列，俾甲乙以分函。允為藝苑聯珠，題曰蘭亭八柱。若承天之八山峻峙，極和布而為埏；譬畫卦之八體流形，奇偶比而依次。分詠已舉其要，彙吟更括其全。

賺來自蕭翼，舉出本元齡。真已堂堂佚，拓猶字字馨。誰知聯後壁，原賴弄前型（柳公權書《蘭亭詩》，惟於《戲鴻堂帖》見之。初不知其墨蹟已入內府，近閱《石渠寶笈·書》，始知其卷久列名書上等。《石渠寶笈》乃張照等所校定，而其昌所臨柳卷即藏照家，且戲鴻堂刻本亦照所深悉，乃柳卷無其昌題識，及卷後黃伯思諸跋未經刻入，皆其中之可疑者，照曾未一語及之，亦不免疎漏矣）。恰爾排八柱，居然承一亭。擎天徒夔語，特地示真形。摹固得骨髓（謂褚、虞、馮），書猶辟徑庭（謂柳。見董其昌臨帖自識語。散董其昌臨公權卷，初藏張照家，本屬全卷，後以四言詩并後序及五言詩析而為二，蓋照身後為人竊取也。及二卷先後入內府，經比較知其故，復令聯綴成卷，俾為完璧。名蹟流傳，離而為合，或默有呵護之者耶）。董臨傳聚散，於補惜凋零（戲鴻堂所刻柳詩，漫漶闕筆者多，去歲特命于敏中就邊旁補之）。殿以幾余筆，藝林嘉話聽。¹³⁴

乾隆的序與詩有兩個值得注意的部分。第一，可發現乾隆全文重點均放在柳公權《書蘭亭詩》上，並未特別討論今日廣受重視之虞世南、褚遂良與馮承素的《蘭亭序》摹本，甚至乾隆以「摹固得骨髓，書猶辟徑庭」，來區別虞、褚、馮本與柳公權書之地位。而乾隆之前對柳公權《書蘭亭詩》的認識主要是透過董其昌所刻的《戲鴻堂帖》，後來才發現《戲鴻堂帖》所根據之柳公權原蹟已收入內府，

¹³⁴ 清高宗，〈題蘭亭八柱冊（有序）〉，《御製詩集 四集》，卷五十六（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 23 下-25 上。

並被記載入《石渠寶笈》中。第二，董其昌《臨柳公權書蘭亭詩》原為張照（1691-1745）收藏，張照過世後為人將之一分為二，後在乾隆內府「聯綴成卷」之事，可說是乾隆決定創造「蘭亭八柱」的主要原因。關於此事，乾隆在董其昌《臨柳公權書蘭亭詩》的墨跡本題跋及《御製詩集》中，有詳細說明。¹³⁵

柳公權《書蘭亭詩》的內容，為王羲之蘭亭會參與者之五言、四言詩及詩序，根據乾隆三十五年（1770）跋董其昌《臨柳公權書蘭亭詩》，提到卷末原有董自跋，入張照家藏之後，「不知誰何割裂。以四言、五言詩分為二卷」（見圖III-42）。張照、高士奇、陳元龍跋被裝在四言詩卷尾，董跋則在五言詩卷後。四言詩卷較早被收入清內府，當乾隆後來收到五言詩卷之後，「億與舊藏有相類者，因出《石渠》臨卷校之」。乾隆發現兩卷紙幅尺寸一致，且與《戲鴻堂帖》所刊刻之柳公權《書蘭亭詩》「首尾次序」吻合，此外，兩卷均可見張照、高士奇的押縫章「上下相間」，可見此卷在張照家時「尚為全璧」。故乾隆感嘆：

夫物之顯晦離合，固有定數，二卷之離不知幾年，使非前後並入內府，則亦無由終合。乃余見而疑，疑而校，校而復合，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豈墨池片楮，實默有司其契者乎。……。董此書殊自矜貴，諸人藏跋亦極為寶重諦視之，果其用意之作。精神既注，其不終於掩晦，固宜彙使兩卷不離，則亦仍以尋常董蹟視之，豈暇為之詳悉審定。是則因有昔日之離，乃成今日之合，為墨禪軒增一因緣，庸渠非是卷之幸耶。既為訂易合裝並書以識異（圖III-42）。

接著，乾隆在三十六年（1771）暮春之跋又提到兩卷合璧之後，他曾臨寫數過。由於董其昌當初臨柳公權《書蘭亭詩》時，「專務規倣誠懸〔柳公權〕神韻」，對原文文字脫落的部分未加考證。乾隆因覺缺字「令讀者索解茫然」，至為可惜，因此他以馮惟訥（1513-1572）《古詩紀》詳加校對（見圖III-43）。之後，乾隆命于敏中製作《補戲鴻堂刻柳公權書蘭亭詩缺筆》，將戲鴻堂所刻柳公權《書蘭亭詩》缺筆之處，由于敏中「倣其意補足之」，所缺之字以董其昌《臨柳公權書蘭亭詩》為本，若臨本也缺字則仍依董臨本保留所缺之字句。¹³⁶至於乾隆自己所

¹³⁵ 乾隆題跋全文，見清高宗，〈題董其昌臨柳公權禊帖〉，《御製詩集 三集》，卷八十六（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 21 下-23 下；故宮出版社編，《蘭亭八柱》，「蘭亭八柱第七」冊。

¹³⁶ 乾隆跋于敏中《補柳公權書蘭亭詩》（「蘭亭八柱第六」）全文，見清高宗，〈命大學士于敏中

書之《臨董其昌倣柳公權書蘭亭詩》，則補上柳本、《古詩紀》所校對出之缺字。以圖 III-44 為例，將蘭亭第四至第八的孫綽四言詩段落相比較，常福《內府鈎填戲鴻堂刻柳公權書蘭亭詩原本》勾劃出柳公權《書蘭亭詩》缺損的「旋」、「冊」兩字（圖 III-44A、B、F）。于敏中，《補戲鴻堂刻柳公權書蘭亭詩缺筆》則有註解如下：「按此詩『旋』字原刻（按：指《戲鴻堂帖》）有闕筆。今補『瀨』，原作『潁』，依董臨本改。『激』字下董臨亦闕，仍存之。」（圖 III-44C、D）。至於乾隆《臨董其昌倣柳公權書蘭亭詩》，仍依董本將「潁」作「瀨」，但又依柳本、《古詩紀》，以董其昌書風，在「激」字下補上「湍」字。（圖 III-44E、A「激」字右下有「湍」小字、D）。因此乾隆臨本可說是以董臨本為基礎，又作了校訂的版本。

乾隆對於以柳公權《書蘭亭詩》為中心，有關蘭亭第四至第八柱的——，字句缺損；二，董其昌《臨柳公權書蘭亭詩》被分割為兩卷——之考證、校訂二事，十分重視。他曾在董其昌《臨柳公權書蘭亭詩》後跋指出，張照、高士奇等「皆稱鑑識精覈〔實〕者」，對於董臨本闕字之處「未置一語，是又不可解矣」。並稱自己「蓋余之所為闕疑，而亦不肯終於蓄疑。墨禪三昧，得毋以余為必求甚解乎。」（見圖 III-43）。有趣的是，乾隆面對這些作品時，其實並非以帝王之姿來看待，而是將自己視為一個「鑑識精實」的鑑藏家，因此乾隆十分投入這個考證、校訂的過程，並有意與張照、高士奇等相較勁，甚至自認超越張、高等人之上。也因此可知「蘭亭八柱」之所以形成一組作品，前三柱虞世南、褚遂良與馮承素的《蘭亭序》摹本，可說是乾隆為因應蘭亭傳統之「必須」所選入的，其實並非乾隆重點。¹³⁷而清宮所收之柳公權《書蘭亭詩》是海內孤本，加上乾隆所景仰、學習的董其昌不僅將柳本刻入《戲鴻堂帖》，還臨過柳本，加上董本又有字

補書柳公權蘭亭詩帖版缺書者詩以誌事》，《御製詩集 四集》，卷五十一（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 11 上-下。另可參見乾隆《內府鈎填戲鴻堂刻本》（「蘭亭八柱第五」）跋，清高宗，〈題戲鴻堂柳公權蘭亭詩帖〉，《御製詩集 四集》，卷五十一（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 10 下-11 上。

¹³⁷ 乾隆四十七年（1782）在〈再題蘭亭八柱冊疊舊作韻〉中也曾提到：「向因董其昌戲鴻堂刻有柳公權《書蘭亭詩》，字句多闕，因命于敏中補成全字本。初閱《戲鴻堂帖》時，意謂柳蹟久無存矣，嗣於《石渠寶笈》中得柳書《蘭亭詩》墨蹟，復得董其昌原本及余所臨董卷鈎摹勒石，然究非永和九年（353）原序，則復檢內府所藏虞世南、褚遂良、馮承素摹本，因並為鈎刻合成八冊，名曰蘭亭八柱云。」乾隆此詩再次肯定筆者此處所推測，乾隆是因柳公權、董其昌之《蘭亭詩》書蹟，而另外挑選《蘭亭序》摹本合組成八柱帖。全文見《御製詩集 四集》，卷八十八（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 26 上-下。另外，此三卷中乾隆選為「蘭亭第一」的虞世南摹本，亦是由董其昌「定為虞永興摹」，董其昌在乾隆心中之地位由此可窺。見梁詩正、張照等編撰，〈唐虞世南臨蘭亭帖一卷〉，《石渠寶笈》，卷四十二（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 5 上。

句缺漏、被一分为二的故事，這些複雜的版本問題所引起的鑑賞過程，其實才是乾隆欲藉由「蘭亭八柱」來加以紀念、宣告的重點。

乾隆這個考證、鑑賞的過程也為其臣子所明瞭。根據完成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清拓乾隆御題補刻明代端石蘭亭圖卷》上的乾隆諭旨，提到「從前內府摹刻《蘭亭八柱帖》，流傳名跡，頒示臣工，久為藝苑楷模。」¹³⁸由於《蘭亭八柱帖》曾「頒示臣工」，顯然為眾臣所知，故如〈千叟宴聯句用柏梁體（有序）〉中，護軍統領喀木齊布詩「書畫顧陸鍾王研」，即注有「內府鑄《三希堂帖》、……、《蘭亭八柱帖》，（乾隆皇帝）各有題識，鑒別精審」。¹³⁹〈萬壽恭紀五言律詩六十首（恭集御製詩句）〉中，也注有「御刻《三希堂》、《墨妙軒》、《蘭亭八柱》重考正」。¹⁴⁰此外，本論文第五章將討論之乾隆五十七年（1792）紹興知府李亨特的《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此圖前序李亨特也特別提到，「皇上南巡，過蘭亭製詩，近又諭刻『八柱蘭亭』」（見 V-表二）。顯然乾隆皇帝在《蘭亭八柱帖》所下的考訂功夫以及此「蘭亭八柱亭」的建造，為其眾臣所熟知。

乾隆為了收藏他精心設計的「蘭亭八柱」墨跡本，特別製作《清紫檀木雕蘭亭修禊圖八柱帖插屏》以貯存，但根據 III-表一，可發現《插屏》以八卦順序收藏的八卷墨跡本順序，與「蘭亭八柱」的順序正好相逆反，亦即乾隆《臨董其昌倣柳公權書蘭亭詩》為蘭亭第八柱，但在《插屏》櫃裡的原跡卻是收納在排序第一的「乾」卦抽屜中（圖 III-41）。關於這個逆反的原因，筆者推測在決定之初，應是以「八柱」順序為優先，乾隆先以主題、時代順序排列了虞世南、褚遂良、馮承素及柳公權，畢竟在蘭亭傳統中，《蘭亭序》的地位必然在《蘭亭詩》之前。之後常福、于敏中本均與柳公權《書蘭亭詩》有關，故列在柳公權之後。最後的第七、八柱，才排列作為「臨本」的董其昌與乾隆本。這個順序在排列同時，乾隆已構想到以八卦為順序的《插屏》櫃之製作，即如《題蘭亭八柱冊（有序）》提到此八柱「若承天之八山峻峙」，同時「譬畫卦之八體流形」，故在象徵「八山」的圓明園八根立柱之外，又以「八卦」為序的《插屏》收貯墨蹟本。而在《插屏》櫃上，作為帝王之卦象的「乾」卦正為第一位，此抽屜用來收藏乾隆《臨董其昌

¹³⁸ 慶桂纂修，〈御定補刻明代端石蘭亭圖帖〉，《國朝宮史續編》，卷九十五，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清嘉慶十一年〔1806〕內府鈔本）。

¹³⁹ 阿桂等纂修，〈千叟宴聯句用柏梁體（有序）〉，《八旬萬壽盛典》，卷三十一（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 11 下。

¹⁴⁰ 阿桂等纂修，〈萬壽恭紀五言律詩六十首（恭集御製詩句）〉，《八旬萬壽盛典》，卷一〇七，頁 9 下。

倣柳公權書蘭亭詩》，至於這組作品中最受乾隆重視的董其昌《臨柳公權書蘭亭詩》則為「坎」卦，存於第二個抽屜。除此之外，《清紫檀木雕蘭亭修禊圖八柱帖插屏》背面面板所選刻的乾隆詩文，分別來自第四、五、六柱，即與柳公權書、《戲鴻堂帖》刻本相關的內容（[III-表一](#)）。由這些安排與設計，可了解乾隆所構想之「蘭亭八柱」，是以柳公權、董其昌二人相關之各本《蘭亭詩》為重心。

2-3 圓明園中的「蘭亭八柱亭」

《蘭亭八柱帖》刻本完成的同年，乾隆一併進行圓明園「坐石臨流」景的改造。原本此景是重檐四方亭下有疊石、流水，但乾隆將之改換成八方亭，亭下易為八根石柱，一柱刻有一帖，亭中另放置一個正面刻有王羲之蘭亭會圖象的石屏，其背面有御題詩文。¹⁴¹

2-3-1 亭中之「蘭亭八柱」刻石

目前存放於北京中山公園「景自天成亭」中的「蘭亭八柱」，由漢白玉石刻製而成。其順序從入口右側開始為第一柱，依序繞亭一圈，因此入口左側為第八柱，石屏則置於亭正中央，但目前的排列方式不知是否即圓明園「蘭亭八柱亭」原本的擺放方式（[圖 III-39F](#)）。根據現存北京國家圖書館之八柱拓本尺寸丈量，每一柱均高三百二十六公分，寬五十公分。¹⁴²八柱的正面朝內，每柱上刻有一帖，正面不夠刻者，才移往左面上方繼續刻（[圖 III-39G](#)）。經比對中山公園「蘭亭八柱」上的字體與《蘭亭八柱帖》中之字體，二者確實尺寸相同。¹⁴³但柱上刻字的深度與字口呈現，若與乾隆用於製作拓本的石板刻字相較，則中山公園「八柱」上的刻字顯得較淺，字口相對也較不銳利，此可對照於寧壽宮樂壽堂、頤和軒遊廊牆上的《敬勝齋法帖》刻石（[圖 III-58](#)）。¹⁴⁴

乾隆以蘭亭詩文刻上石柱，再裝置到圓明園的八方亭中，在傳統並非創舉，

¹⁴¹ 端木泓，〈圓明園新證——乾隆朝圓明園全圖的發現與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1期，頁27；郭黛姪主編，《遠逝的輝煌：圓明園建築園林研究與保護》，頁228-229。

¹⁴² 袁玉紅，〈國家圖書館藏《蘭亭八柱帖》之考析〉，《圖書館理論與實踐》，頁60。

¹⁴³ 特別感謝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孫璐女士在尺寸丈量上的協助。

¹⁴⁴ 雖然「蘭亭八柱」石面磨損嚴重，但筆者挑選二者字體大小相當，且較無磨損之處比較。另外，目前的八根柱子以第七柱看來刻得較深，但同時，第七柱刻的是《蘭亭詩》，字體亦較大，故此處不用以比較。

如范仲淹（989-1052）〈岳陽樓記〉提到，慶曆四年（1044）重修岳陽樓時「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可知以詩文裝飾建物是極其平常之事。但一般而言，裝飾在建物上的詩文，仍會注意閱讀的可能性。相較於此，「蘭亭八柱」每一柱，都是從三公尺左右的高度開始刻石，由於每個字的尺寸很小（尤其是前三柱），最高處的文字幾乎難以閱讀，最低處亦須彎腰方可閱覽，那麼，為何乾隆要以此方式刻石呢（圖III-39G）？

筆者認為，透過實物觀察到之「蘭亭八柱」的刻字稍淺，與整柱由上至下以分段方式呈現原帖面貌，可了解乾隆將《蘭亭八柱帖》刻上石柱的意義，無非希望保留刻帖最原本的樣貌。而「八柱」上的刻帖雖然保持了原貌外觀，但其不易閱讀的狀況以及刻字不若《敬勝齋法帖》刻石般深刻，顯示安置於園明園「蘭亭八柱亭」的這些柱子裝飾意味濃厚，閱讀的功能性則不是乾隆的主要考量。¹⁴⁵此外，透過何炎泉研究，當時最精良的刻帖或墨跡本幾乎均為乾隆內府收藏，乾隆顯然也以此自豪，故乾隆皇帝對這個蘭亭文化空間的塑造重點，正是以其手邊為紀念「蘭亭會」所產生之各式最佳書蹟版本——「紀念物」，來裝飾這個他所創造的蘭亭空間。

2-3-2 「曲水流觴」石屏與疊合表現

圓明園「蘭亭八柱亭」除八柱之外，另有一座石屏。經筆者比對，此石屏上所刻之王羲之「曲水流觴景」¹⁴⁶圖像，與《清紫檀木雕蘭亭修禊圖八柱帖插屏》上的蘭亭圖為同一稿本。據楊宗榮、周紹良研究，此畫稿出自宮廷畫家賈全（1736-1795）之手（圖III-39D、圖III-41A）。¹⁴⁷由於石屏正面已經磨損嚴重，《插

¹⁴⁵ 雖然如梅韻秋研究指出，「蘭亭八柱」及其他清宮以刻帖裝飾宮中建築的作法（如「法帖廊」，或稱書條石），顯示了清宮對於帖學的推崇，但根據何炎泉研究，帖學與碑學在此時期尚未呈現壁壘分明的狀態。於此而言，筆者認為「蘭亭八柱」的討論，似乎不需特別用以討論乾隆宮廷對於帖學與碑學的態度。見 Yun-chiu Mei, "The Pictorial Mapping and Imperialization of Epigraphic Landscap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pp. 177-186. 根據何炎泉研究指出，乾隆五十六年（1791）參與《石渠寶笈》續編工作的阮元（1764-1849），也是日後提出碑學理論最重要的學者。透過阮元的見解，可瞭解在宮廷中見到精良的法書版本、作品對於其眼界與理論的建立深有影響。故此時期宮廷內、外對於帖學的態度說不上是針對碑學而言的「特別」推崇，應該說，帖學乃是當時書家認識傳統書寫方式與品質的重要憑藉。相關討論見何炎泉，〈乾隆朝後期之民間碑帖收藏與碑學關係初探〉，發表於「中國收藏與鑑定史國際研討會」（杭州：浙江大學，2016.11.11-12），頁 1-7（未刊稿）。

¹⁴⁶ 乾隆四十四年在石屏背面題寫：「令工圖『曲水流觴景』於石屏，題詩其上。」

¹⁴⁷ 據楊宗榮，〈蘭亭八柱帖〉，《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1期，頁28指出：「石屏的陽面，淺刻□全所畫的蘭亭修禊圖」。故由「□全」推測此圖出自宮廷畫家賈全之手。周紹良文見〈蘭亭

屏》又屬木雕製品，不易比對是否出自賈全之手，但楊、周二入當時應是觀察石屏原件，故筆者認為其意見當可接受。至於石屏背面，刻有乾隆三首詩文，分別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以乾隆九年（1744）題《圓明園四十景》「坐石臨流」景的詩文為首，說明「蘭亭八柱」與石屏之製作，由於考慮此詩為此亭「數典之組」，故刻於碑陰。第二首完成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暮春之時，講述「蘭亭八柱」的內容與製作。最後一首寫於乾隆五十年（1785），仍題此「八柱」成因，並註明此時于敏中「已成古人矣」。¹⁴⁸可見乾隆石屏背面的三首詩文，是依完成年代，順序補刻上石。

比較石屏與《清紫檀木雕蘭亭修禊圖八柱帖插屏》上的「曲水流觴景」（蘭亭圖），石屏正面圖像上方刻有乾隆御題〈蘭亭八柱冊（并序）〉全文，《插屏》則因面積較小，僅刻上〈蘭亭八柱冊（并序）〉之詩，序未刻入（圖 III-41C）。¹⁴⁹由於石屏表面殘損嚴重，加上目前中山公園的石屏外，尚有壓克力罩以保護原石，拍攝不易，筆者此處僅以兩個靠畫面右側的圖象細節進行比對說明。透過圖 III-45A 可看到石屏與《插屏》右上角，均有一個兩層樓臺，稍前方還有一個小亭；圖 III-45B 則是「蘭亭」中王羲之正在書寫《蘭亭序》的場面。石屏上的人物並未特別標示姓名，但《插屏》上則一一寫上蘭亭會參與者姓氏。如「蘭亭」中有王羲之、王羲之右側的王凝之、王羲之左側之桓偉及再左側的庾友等人。由此兩個細部，可確定石屏與《插屏》使用同一稿本。值得注意的是，賈全所繪之「曲水流觴景」圖稿設計，是疊合了傳統「蘭亭修禊」以及「西園雅集」圖式而來，如《插屏》中所呈現之孫綽正在題壁，而題壁原為「西園雅集」圖式中的重要母題（圖 III-46）。¹⁵⁰

關於清宮所出現之疊合「蘭亭修禊」及「西園雅集」圖式的作法，龜田和子有相關研究。根據龜田教授二〇一一年對日本蘭亭傳統的研究指出，明代《蘭亭

八柱近況》，《書譜》，1979年第6期，頁40-41。筆者二〇一一、二〇一七兩度前往中山公園勘查八柱、石屏，但現今因石屏陽面毀損嚴重，其上文字已不易閱讀。

¹⁴⁸ 第一首詩文內容為「白石清泉帶碧蘿，曲流貼貼泛金荷。年年上巳尋歡處，便是當時晉永和。（右甲子〔1744〕所題《圓明園四十景》之一。己亥春輯『蘭亭八柱』之冊。因就此亭易以石柱，而各刻一冊於柱，以永其傳。令工圖『曲水流觴景』於石屏，題詩其上。念此詩為斯亭數典之祖，並命刻於屏陰。此後或有所詠，將以次書之。己亥季秋月御識。）」。第二、三首詩文出處：清高宗，〈再題蘭亭八柱冊疊舊作韻〉，《御製詩集 四集》，卷八十八（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26上-下；清高宗，〈題蘭亭八柱再疊舊作韻〉，《御製詩集 五集》，卷十五，頁6上-下。《御製詩集》所收內容與石屏所刻，仍有部分字句相異。石屏碑陰全文，可參見郭鳳翕，《細說蘭亭八柱冊及八柱亭》（臺北：郭鳳翕，2000），頁73。

¹⁴⁹ 全詩內容見注 134。

¹⁵⁰ 由於「蘭亭八柱」石屏圖象不清晰，此處以《插屏》作為討論對象。

圖》與《西園雅集圖》及其他母題（如琴棋書畫）有混同表現的情況。但這些作品主要並非使用於高品質的作品中，而是被運用在較低階之職業畫家作坊的作品上，如十六世紀後半有「李在」款的《蘭亭圖》中，即有「題壁」等內容（圖 III-47）。¹⁵¹「題壁」是「西園雅集」圖中的主要母題之一，畫的是〈西園雅集圖記〉中所描寫：「唐巾深衣，昂首而題石者，為米元章〔米芾〕」，諸多傳稱於明代仇英名下的《西園雅集圖》，即可作為這個畫題的典型表現（圖 III-48）。¹⁵²於此似乎可說，民間畫坊對於蘭亭圖之圖象傳統——尤其是基於傳李公麟《蘭亭修禊圖》為基礎的圖式，比較不那麼嚴格遵從。龜田和子的研究除討論繪畫作品外，還提到「木版刊行物」（即工藝領域之畫樣圖譜）也有此表現，並舉出《程氏墨苑》中之〈竹林七賢〉，亦嵌入了蘭亭傳統的「流杯」圖象（圖 III-49）。¹⁵³

龜田和子的研究是以明代為重點，且主要是討論這些圖象傳入日本後所起的作用，基於其研究，筆者觀察了清代《欽定西清硯譜》所收之《宋薛紹彭蘭亭硯》與《宋綠端蘭亭硯》，其四周也刻了「題壁」、「彈琴」等非出自傳統「蘭亭修禊」母題之內容（圖 III-51）。因此似乎從明代開始，在工藝領域也許因為沒有背負繪畫傳統的圖式包袱，同時可能工藝製作者也與職業畫家共同分享著繪畫圖式、圖樣（圖譜），而得以躍出既有繪畫傳統圖式的框架，混合各式各樣的母題於同一畫面。故而雖然《欽定西清硯譜》認為這些硯臺為宋刻，但筆者認為均應明代之作。大抵來說，在明代，將其他主題疊合到蘭亭圖象上的作法，基本上只出現在民間畫師之繪畫或工藝表現上。¹⁵⁴其融合概念仍不出文人主題範疇（即西園雅集、

¹⁵¹ Kazuko Kameda-Madar, "Pictures of Social Networks: Transforming Visu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Orchid Pavilion Gathering in the Tokugawa Period (1615-1868)" (PhD diss.,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011), pp. 229-234. 因筆者無法尋得 III-47 之清楚圖版，故此處斷代意見是根據龜田教授的意見，見該論文頁 232。

¹⁵² 《西園雅集圖》的相關研究，參見衣若芬，〈一樁歷史公案——“西園雅集”〉，《赤壁漫遊與西園雅集》（北京：線裝書局，2001），頁 49-95；板倉聖哲，〈馬遠「西園雅集圖卷」（ネルソン・アトキンス美術館）の史的位置—虚構としての「西園雅集」とその絵画化をめぐる—〉，《美術史論叢》，第 16 卷（1999），頁 49-78；Ellen Johnston Laing, "Real or Ideal: The Problem of the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Western Garden' in Chinese Historical and Art Historical Records,"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88, No. 3 (1968), pp. 419-435.

¹⁵³ 〈竹林七賢〉畫面中另有彈琴、下棋等母題，龜田和子未就此另作說明。而《程氏墨苑》中的〈修禊圖〉則維持了「蘭亭圖」的圖象傳統，在此傳統中作圓形排列的處理，且未混入其他圖式（圖 III-50）。

¹⁵⁴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的蘭亭圖確實有比較多元的表現發展，但有一些作品也許不見得應該稱為「蘭亭圖」。如仇英《蘭亭圖》扇面上根本未見「流觴曲水」，主要出現了蘭亭的「母題」（亭子、羲之、鵝。圖 III-52）。原為描寫眾人雅集的蘭亭圖，變成主人（王羲之）自賞的情景，畫中沒有客人，只有童僕（備酒、磨墨、取琴），完全改變蘭亭眾人聚會的意義。此圖與一般「蘭亭修禊」圖式實有一段差距，反而接近「羲之觀鵝」的圖式表現，故筆者推測此畫名應為後人所命。實際上，這幅作品不取名為「蘭亭圖」也無妨，若是為某一位景仰王羲之的人所做的別號圖或隱

蘭亭雅集、琴棋書畫等)；融合的手法方面，若主題為「蘭亭修禊」，通常可見疊合到「蘭亭圖」上之其他母題或主題只佔畫面一小部分(如「題壁」)，因此尚可區分出所表現的主題究竟為「蘭亭會」或「西園雅集」、「竹林七賢」或其他。

如「蘭亭八柱」石屏與《清紫檀木雕蘭亭修禊圖八柱帖插屏》上所見，在「蘭亭」題材上混入「西園雅集」段落的作法，也出現在乾隆時代所製作之「蘭亭」相關工藝作品上。如有乾隆十二年(1747)款的《青玉蘭亭修禊圖山子》，其左側石面上刻有「蘭亭」二字、有流觴場景、亭中有人，背面也刻了乾隆御臨《蘭亭序》，很清楚是描寫王羲之蘭亭會的主題，但山子右側卻疊合了「西園雅集」圖式傳統的「題壁」母題(圖 III-54)¹⁵⁵。這種在「蘭亭」主題的工藝作品上疊入「西園雅集」圖象的作法，可視為清宮在工藝系統延續明代傳統的表現。但石屏與《插屏》上的表現，是將蘭亭會中的孫綽與西園雅集之米芾形象疊合，這可說是乾隆宮廷脈絡下所出現之蘭亭文化新解。亦即，之所以將孫綽與米芾形象交疊，很可能是因孫綽撰寫〈蘭亭後序〉，因此賦予他一個「書寫中」的形象。

雖然「疊合」在藝術史上也可說是尋常的表現方式，但從蘭亭傳統來觀察，清代宮廷的「疊合」運用，反映出帝王對蘭亭傳統的態度。如前文討論康熙皇帝之「天趣蘭亭」，也是一種疊合的表現。他的「天趣蘭亭」疊合了王羲之蘭亭會、西湖「曲院風荷」，及荷花之理學象徵等三個層次，將原本屬於飲酒的景觀，轉換成品聞花香、飲食羹湯的空間，一改深植於漢文化千年的蘭亭形象。而乾隆所主導製作的「曲水流觴景」石屏，如同前述，是一種不同主題的疊合表現，至於乾隆所創造的「蘭亭八柱亭」，則可視為疊合表現的一種變形。在乾隆手中，將各種蘭亭「紀念物」——象徵「蘭亭」的亭子，與蘭亭會之紀念產品《蘭亭序》、《蘭亭詩》(八柱)，以及後世追憶蘭亭會所創作之《蘭亭修禊圖》(石屏)——

居圖也並無不可。此外，筆者也觀察到張宏一六一六年所繪之《蘭亭圖卷》(北京：中國首都博物館藏)，此作並非混入「西園雅集」圖式，而是疊入歐陽修(1007-1072)〈醉翁亭記〉的內容(圖 III-53)。〈醉翁亭記〉中提到：「至於負者歌於途，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偃偻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喧嘩者，眾賓歡也。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其中圖 III-53C 段為此卷中段王羲之揮毫的場景，張宏除描繪亭子中眾人圍觀王羲之之外，亭前尚有「投壺」的活動描繪。加上此卷開端有僕役牽著馬匹遠道而來，原乘坐於馬匹上的人可能都已經下馬步行，這樣的描繪與〈醉翁亭記〉「負者歌於途」之段落的意象似乎也相有呼應。故筆者認為張宏《蘭亭圖卷》的製作應是疊合了〈醉翁亭記〉的內容而來，這樣的表現方式或許為此作之委託人的要求，或者另有特殊之製作原因，尚待進一步研究。關於明代蘭亭圖表現多元的討論，可參見王鈺雅，〈勺園與米萬鍾文化形象的形塑：《勺園圖》相關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第二章。

¹⁵⁵ 全圖及相關說明，參見許曉東，〈清青玉蘭亭修禊圖山子〉解說，收入故宮博物院編，《蘭亭圖典》，頁 368-369。

相互疊合、重組在「蘭亭八柱亭」中，過去這種組合方式（不包括亭子建物）只出現在如《明拓明益王重刻大蘭亭圖卷》（圖 III-55）之類的平面作品上。¹⁵⁶以《明拓明益王重刻大蘭亭圖卷》來說，此卷除刻有仿李公麟《流觴圖》之外，尚刻入定武《蘭亭序》三種、褚遂良摹《蘭亭序》、柳公權《蘭亭詩》、孫綽《蘭亭後序》等內容，蒐羅的意味濃厚。乾隆的「蘭亭八柱」，則是將這些平躺於紙卷上的組合，以疊合、重組的方式，在立體空間中重新塑造。就此而言，乾隆的「蘭亭八柱亭」在蘭亭文化傳統中來看，也是過去未見的創新形式。但相較於康熙對「曲水流觴」意象的修改，乾隆的作法如其「香遠益清亭」所見，倒比較像是他對漢式蘭亭傳統的回歸與呼應。乾隆顯然較康熙更重視蘭亭傳統的保持與繼承，因此他並不在此傳統上做太多外觀及內涵上的改造，就乾隆的「蘭亭八柱亭」而言，毋寧說是以蘭亭傳統為基礎所進行的組合創新。這樣的觀念與作法，在《清拓乾隆御題補刻明代端石蘭亭圖卷》亦可窺一斑。

2-3-3 乾隆宮廷所製作之「蘭亭」主題文物

乾隆在四十五年（1780）時，修改明代「蘭亭圖」舊刻，重新製作了一卷堪稱「最完整的」《清拓乾隆御題補刻明代端石蘭亭圖卷》（1781 完成）。這件作品的製作正好在「蘭亭八柱」完成的隔年。主因清宮於當年得到萬曆四十五年（1617）明益敬王朱常澆重刻最初由周憲王朱有燉（1379-1439）所刻之大卷《蘭亭圖》（一般以「潢南本」稱之）殘石十四段，乾隆「命內廷翰林詳悉校勘」¹⁵⁷，發現其中相較於朱有燉原刻已佚失頗多，故乾隆下令以內府收藏補刻《明代端石蘭亭圖帖》，並以濃、淡兩種墨色套印，製作工細、精美（圖 III-56）。其中傳李公麟《修禊圖》的部分，是由賈全以《明拓明益王重刻大蘭亭圖卷》為本，臨仿補刻。¹⁵⁸

¹⁵⁶ 全圖及相關說明，參見王禕，〈明拓明益王重刻大蘭亭圖卷〉解說，收入故宮博物院編，《蘭亭圖典》，頁 290-293。

¹⁵⁷ 清高宗，〈補刻明代端石蘭亭圖帖詩以誌事〉，《御製詩集 四集》，卷八十五（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 4 上。

¹⁵⁸ 根據袁玉紅〈北京圖書館藏《蘭亭圖》拓本淺說〉頁 95 說明所佚失及乾隆補刻的狀況為：「《定武蘭亭》三本已失存，李公麟《流觴圖》丟失三分之一，朱有燉的蘭亭諸說失一段，朱之藩跋洪武《流觴圖記》及趙孟頫十八跋全部失存。……將當時所存留的十四段刻石剖為二十八段，其刻與益藩原刻不相符的全部磨去，所趨的《定武本》依照《石渠寶笈》中所藏的宋拓摹補，《流觴圖》部分令畫院供奉大臣賈全臨仿，使各帖還其原貌。」本文收入《北京圖書館館刊》，1998 年第 1 期。另可參見清高宗，〈補刻明代端石蘭亭圖帖詩以誌事〉，頁 4 上-下。相關研究及圖版另可參見王禕，〈明代藩府刻《蘭亭圖》卷及其變遷〉，《故宮博物院院刊》，2007 年第 4 期，頁 142-155；王禕，〈清拓乾隆御題補刻明代端石蘭亭圖卷〉解說，收入故宮博物院編，《蘭亭圖典》，頁 298-301。

此外乾隆還增補了萬曆本所缺的朱之蕃（?-1624）跋，及乾隆諭旨、題詩，和大臣梁國治（1723-1786）等跋尾。¹⁵⁹

除此之外，乾隆還曾下令製作以《清拓乾隆御題補刻明代端石蘭亭圖卷》為底本之《欽定補刻端石蘭亭圖緙絲》全卷。這是清宮少見，以碑帖為藍本所製作的緙絲作品，十分難得。¹⁶⁰張瓊根據此卷記載在《石渠寶笈》第三編及其上帝王印章僅一方為乾隆之印，推測此卷製作年代很可能始於乾隆晚期，完成於嘉慶初年（圖 III-57）。¹⁶¹但筆者認為，依照乾隆從四十四年開始積極營造「蘭亭八柱」以及《清拓乾隆御題補刻明代端石蘭亭圖卷》來看，《欽定補刻端石蘭亭圖緙絲》也很可能製作於《清拓乾隆御題補刻明代端石蘭亭圖卷》完成的乾隆四十六年前後。而從《清拓乾隆御題補刻明代端石蘭亭圖卷》、《欽定補刻端石蘭亭圖緙絲》兩件作品的製作，完全依循傳李公麟《流觴圖》的圖象表現，並以明代重要刻本《明拓明益王重刻大蘭亭圖卷》為底本的作法，顯示乾隆皇帝在繪畫、書法傳統上，對於蘭亭傳統是採取尊重、模仿的態度。以此對照跨屬工藝領域的「蘭亭八柱」石屏與《清紫檀木雕蘭亭修禊圖八柱帖插屏》上，採取疊合「蘭亭」與「西園雅集」兩種圖象的作法，十分不同。但就乾隆在面對蘭亭傳統的大方向上而言，不論是採取尊重、模仿的態度或以疊合的方式表現，均屬於乾隆對蘭亭傳統之遵循與追憶的一種方式。

乾隆除了製作傳統上常見，與蘭亭會相關的品項（如刻帖、《蘭亭圖》）之外，也製作不少以「蘭亭」為主題的器物。¹⁶²如乾隆二年製作了《清乾隆蘭亭修禊圖御墨》五種（圖 III-59），墨的一面為《蘭亭修禊圖》，其上有傳李公麟《蘭亭修禊圖》中知名的「謝藤〔滕〕」形象（圖 V-17）。¹⁶³乾隆四年（1739），命廣東來的牙匠黃振效製作《雕象牙蘭亭修禊小插屏》。¹⁶⁴乾隆十九年（1754），製作《清乾隆款碧玉蘭亭序雙面插屏》。¹⁶⁵另如帶有乾隆四十七年題詩的《清乾隆題詩修

¹⁵⁹ 根據袁玉紅〈北京圖書館藏《蘭亭圖》拓本淺說〉頁 95-60，乾隆補刻本與所據版本仍有一些細微差別。另可參見王禕，〈明代藩府刻《蘭亭圖》卷及其變遷〉，頁 146，表一。

¹⁶⁰ 張瓊，〈欽定補刻端石蘭亭圖緙絲全卷考略——兼析清高宗時期的緙絲書法〉，《中國歷史文物》，2005 年第 6 期，頁 38。

¹⁶¹ 張瓊，〈欽定補刻端石蘭亭圖緙絲全卷考略——兼析清高宗時期的緙絲書法〉，頁 40。

¹⁶² 參見趙麗紅，〈以蘭亭為主題裝飾的內廷器物〉，故宮博物院編，《蘭亭圖典》，頁 340-343。

¹⁶³ 圖版及相關說明，參見林歡，〈清乾隆蘭亭修禊圖白御墨〉解說，收入故宮博物院編，《蘭亭圖典》，頁 351。

¹⁶⁴ 圖版及解說，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典藏 資料檢索系統」，網址：http://antiquities.npm.gov.tw/Utensils_Page.aspx?ItemId=614792，檢索日期：2018-9-30。

¹⁶⁵ 圖版及相關說明，參見許曉東，〈清乾隆款碧玉蘭亭記（序）雙面插屏〉解說，收入故宮博物院編，《蘭亭圖典》，頁 370-371。

禊圖端石硯》，以及不知製作年代的《清乾隆竹管蘭亭真賞紫毫筆》（圖 III-60）等。¹⁶⁶此外，乾隆還經常以自己所臨寫的各種《蘭亭序》版本，鐫刻於玉版冊上，如《清乾隆紫檀木嵌玉御臨蘭亭八柱帖第八柱》等（圖 III-61）。¹⁶⁷由這些作品，可發現乾隆對於蘭亭文物之製作的面向很廣，不論象牙、玉石、墨條、漆器等材質均有使用，硯台、筆、墨、插屏等文房用具更是「蘭亭」主題被運用的主要品項，顯見乾隆皇帝對此主題製品的興致高昂。並且，乾隆將此主題與文房生活相連結，也充分反應他對王羲之蘭亭會的認知，是在於此會與書法、詩文的連結之上。

其實以「蘭亭」為主題的器物製作，明代宮廷已經出現。¹⁶⁸但相較於明代宮廷多以「修禊」、「羲之愛鵝」之圖象作為器物的裝飾，乾隆朝的「蘭亭」器物表現形式顯然豐富許多。例如以「蘭亭真賞」為題製作「毛筆」，即寓含著書聖王羲之、法書名蹟《蘭亭序》的相關意象。握有這支毛筆的乾隆，也如同王羲之般，是具有掌握書法能力的一種象徵。而乾隆以《蘭亭八柱》墨蹟本、《蘭亭八柱帖》、「蘭亭八柱」刻石與《蘭亭八柱》玉冊，或者《清拓乾隆御題補刻明代端石蘭亭圖卷》與《欽定補刻端石蘭亭圖緋絲》等多種形式，重複同一主題內容之製作構想，則可見乾隆對「蘭亭」這個主題的文物，具有一個很大的想像空間，並且意圖藉由各種形式、材質具備的情況，來「窮盡」（甚至是一種「獨佔」的意義）、掌握這個主題的表現與詮釋。相較於乾隆畢生題寫多次的王羲之《快雪時晴帖》，似乎僅製作成一件工藝製品《玩鵝》玉器（乾隆命工將其縮臨《快雪時晴帖》刻於此器上），以及乾隆在《快雪時晴帖》前副頁上畫了《仿倪瓚山水》，又作《羲之觀鵝圖》等兩件延伸的作品之外，並未見到如「蘭亭八柱」般多元、豐富的創造發展。¹⁶⁹雖然《快雪時晴帖》與「蘭亭八柱」均與王羲之有關，但這樣的差異，顯示乾隆對於與「集會」有關的「蘭亭八柱」之看法，確實與純粹作為法書名蹟的《快雪時晴帖》，是有區別的。由於「蘭亭八柱」作為與蘭亭會相關的衍伸品，因此與此集會相關的文房用品、建築、碑帖等創造，成為乾隆皇帝追憶蘭亭的重

¹⁶⁶ 圖版及相關說明，參見林歡，〈清乾隆竹管蘭亭真賞紫毫筆〉解說，收入故宮博物院編，《蘭亭圖典》，頁 344-345。

¹⁶⁷ 圖版及相關說明，參見謝麗，〈清乾隆紫檀木嵌玉御臨蘭亭八柱帖第八柱〉解說，故宮博物院編，《蘭亭圖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頁 374-381。關於乾隆朝玉冊製作，請參見吳誦芬，〈乾隆朝玉冊成做機制研究〉，《故宮學術季刊》，第 33 卷第 4 期（2016.6），頁 33-70。

¹⁶⁸ 趙麗紅，〈以蘭亭為主題裝飾的內廷器物〉，頁 171。

¹⁶⁹ 關於《快雪時晴帖》研究，參見陳葆真，〈乾隆皇帝與《快雪時晴帖》〉，《故宮學術季刊》，第 27 卷第 2 期（2009.12），頁 127-192，特別是頁 136、140。

要憑藉，且必須「窮盡」，這個追憶方稱具足。



第三節 小結

透過本章對清初兩位帝王康熙與乾隆在清宮中對王羲之蘭亭文化的重塑，大致可發現兩位皇帝對於蘭亭的態度與認知並不完全一致。但在他們手中，不論流杯亭、「蘭亭八柱亭」及乾隆大量的蘭亭文物製作，其實都是屬於蘭亭「紀念物」的創造。

首先對康熙皇帝而言，王羲之蘭亭會對他最大的吸引力，無疑是透過一個精心設計的小空間，卻可以成為與臣子上下交心、塑造群體感之重要場域的特殊性。在此吸引力之下，康熙皇帝就其個人對漢文化的理解與想像，疊合了紹興蘭亭曲水流觴的典故、西湖「曲院風荷」意象與理學意涵，成就出蘭亭史上首見的「天趣蘭亭」流杯亭。蘭亭傳統所具有之「塑造群體」的功能，其實也深為乾隆皇帝所了解，例如他也曾在流杯亭宴請大臣、外藩。但相較於康熙皇帝，乾隆年間完成建造或改造的幾座流杯亭，如寧壽宮「禊賞亭」、避暑山莊「香遠益清亭」等，卻是採用如《營造法式》所示範之漢式流杯渠水道的樣式來建造。同時，乾隆的《蘭亭八柱帖》、「蘭亭八柱亭」之同題、多種品類之製作，不僅關係到乾隆個人所重視之鑑賞領域的校對、考訂，其「蘭亭八柱亭」也比較不具備君臣共宴的性質，而像是他個人收藏的展示空間。雖然在此空間中，乾隆很可能仍可與其近臣進行鑑賞的分享與討論，藉以延伸流杯亭原本就具有之「塑造群體」共感的性質，但也不難想像，這個十分具有漢式風格的亭子相對不適用於邀請外藩參與。

康熙皇帝與乾隆皇帝雖然都對流杯建構提出了各自的新見解，但是兩位帝王均無意將個人對於蘭亭傳統的見解宣傳到民間。例如康熙與乾隆均未強制將紹興蘭亭之「曲水流觴」改造成他們個人所喜歡的樣式，他們對地區的參與，主要是透過「御碑亭」的建造，關於此部分將在第四章詳細討論。此外，「蘭亭八柱亭」在圓明園中，並非位於正大光明殿、勤政殿、引見樓（接見外藩處所）等較為公開的理政區域；¹⁷⁰而以蘭亭為主題所製作之文房用具，更為乾隆手中之物，屬於其私人文房使用。

乾隆皇帝對於漢式傳統的回歸，並不僅出現在面對蘭亭傳統上。例如，他對

¹⁷⁰ 郭黛姮主編，《遠逝的輝煌：圓明園建築園林研究與保護》，頁 13-15、269。

於經康熙改過名稱之「西湖十景」的恢復舊名，以及編輯《四庫全書》時乾隆不採用「聖義」、「聖謨」等門來收清朝皇帝「御製」、「欽定」書籍，而採用《隋書·經籍志》體例，在各類書前，依照歷代帝王時代先後將清帝著作放入史列，也可說是一種對於傳統回歸的選擇。¹⁷¹究竟對乾隆而言，「傳統」意味著什麼？或許「傳統」至少有一個重要層次是意味著「正統」，同時「了解正統」，無疑也顯示了滿州皇帝對漢文化的理解深度。故而經董其昌及乾隆本人所鑑別過之《蘭亭序》、《蘭亭詩》版本，正是代表蘭亭傳統的正統。因此將「蘭亭八柱」嵌入象徵「蘭亭」的八方亭中對乾隆來說，無疑為他對王羲之蘭亭會最完美的詮釋與追憶。至於乾隆在其文房生活中塑造各式各樣之蘭亭器具（亦為蘭亭「紀念物」），亦可說是他對蘭亭傳統的一種全面掌握與追憶。

¹⁷¹ 陳金陵，《清代乾嘉文人與文化》，頁 175；張筠，〈王原祁《西湖十景圖》研究：清宮正統派地景畫的產生及政治意涵〉，頁 49、80-81。



第四章 | 清初地方之續蘭亭會與紹興蘭亭的狀況



在第三章瞭解十七、十八世紀清代宮廷內部之蘭亭文化的表現與創新之後，本章將討論清代帝王對紹興蘭亭的參與，以及十七世紀清代文人續蘭亭會的舉辦，和紹興蘭亭在十八世紀中期以前的面貌。紹興蘭亭作為西元三五三年王羲之修禊會的地點，千百年來一直是個知名的文化地標，但實際查閱文集或方志後發現，十七世紀的蘭亭似乎並不算是旅遊勝地，當地所舉辦的修禊會也記錄無多。十七世紀的紹興蘭亭在蘭亭史上似乎顯得有些沉寂，清初王士禛在揚州紅橋之修禊會所散發的光彩，可說遠遠覆蓋在紹興蘭亭之上。那麼紹興蘭亭在十八世紀末之前，是呈現甚麼面貌呢？

第一節 紹興蘭亭的重建

1 紹興蘭亭在入清之前的整修與地方榮耀的需求

入清之前，明代的紹興蘭亭曾經數次修整。¹根據嘉靖三十年（1551）許東望（嘉靖 17 年〔1538〕進士）所修《山陰縣志》，及萬曆十五年（1587）初刊、紹興知府蕭良幹（隆慶 5 年〔1571〕進士）主導編修的《紹興府志》，可考明代蘭亭在明中期後，應經三至四次整理。《山陰縣志》卷十一與《紹興府志》卷九「蘭亭」條下分載：

嘉靖戊申（1548），郡守沈啓移蘭亭曲水於天章寺之前。（寺前舊有蘭亭書院，置田千餘畝，以供遊覽。歲久侵□，嘉靖初，郡守南大吉曾修復，近皆圯，至郡守沈啓，又改創焉。）……。²

天章寺前，舊有蘭亭書院，嘉靖二十七年（1548），知府沈啓遂移蘭亭曲

¹ 關於明清至二十世紀的蘭亭整修、重建，可參考陳橋驛，〈蘭亭及其歷史文獻〉，《紹興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 年第 4 期，頁 1；喻革良編著，《聖地絕品·神游蘭亭》（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頁 10-19。盛鴻郎，〈蘭亭原址與蘭渚湖遺址考〉，收入鮑賢倫主編，《王羲之研究論文集：紀念《蘭亭集序》問世 1640 周年》（杭州：浙江美術學院社，1993），頁 139-150。

² 許東望修，張天復、柳文纂，《（嘉靖）山陰縣志》，卷十一，收入殷夢霞選編，《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續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據明嘉靖三十年〔1551〕刻本影印，2003），第 4 冊，頁 5 下。

水於其地，文待詔徵明（1470-1559）為作記，書丹勒石，今所謂蘭亭者是也。後寺被火，記石燬，亭亦就頹。萬曆初，山陰知縣徐貞明（?-1590）再修之，疏流砌石，覆亭九曲上。十二年（1584），（紹興）知府蕭良幹又加新焉，景物大增勝。³

根據《山陰縣志》，嘉靖二年（1523）任紹興知府的南大吉（1487-1541）曾整修過蘭亭書院，此次整修理應也包含蘭亭曲水的部分。⁴到了萬曆二十七年，知府沈啓（1490-1563，吳江人）將蘭亭曲水遷移至天章寺前的蘭亭書院，並請其蘇州同鄉文徵明（1470-1559，長洲人）為此重建工事作〈重修蘭亭記〉。⁵而後近四十年裡，移至天章寺前的蘭亭因遭祝融再度頹圮，又經徐貞明、蕭良幹進行兩次修整。透過嘉靖之後明代蘭亭的整理記錄，可瞭解距離紹興府城二十七里的蘭亭或因較為偏遠，即使作為歷史名勝仍人跡罕至，一段時日之後往往地毀亭壞、水道淤積，處於荒煙蔓草之中。⁶

³ 蕭良幹修，張元忭、孫鑛纂，李能成點校，《萬曆《紹興府志》點校本》（寧波：寧波出版社，2012），頁 203。

⁴ 南大吉任紹興知府的年代，見蕭良幹修，張元忭、孫鑛纂，李能成點校，《萬曆《紹興府志》點校本》，頁 525。

⁵ 文徵明〈重修蘭亭記〉提到：「紹興郡西南二十五里蘭渚之上，蘭亭在焉。郡守吳江沈侯省方出郊，得其故址於荒墟榛莽中。顧而嘆曰：『是晉王右軍修禊之地也，今禊帖傳天下，人知重之。而勝蹟蕪廢，守土者不當致意耶？』既三年，道融物敷，郡事攸理，乃訪求故實，稽遺起廢。時其羸誦，以次修舉，而蘭亭嗣葺焉。亭所在已非故處，壞且不存。而所謂清流激湍，亦已湮塞。乃翦葦決滄，尋其源而通之，行其流於故址左右，紆回暎帶，仿像其舊，而甃以文石，視舊加飭。闢其中為亭，榭棟輝奐，欄楯堅完，墨沼、鷺池，悉還舊觀。經始於戊申（1548）之七月，成於己酉（1549）之八月，不亟其工也。侯於是集僚友賓客而落之，以書抵余，俾紀其成。……」轉引自李郁周，〈談文徵明書《重修蘭亭記》〉，收入華人德、白謙慎主編，《蘭亭論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頁 421-422。李郁周文，對於重修蘭亭的起造月份，是根據文徵明著，陸曉冬點校，《莆田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頁 264 加以增補。關於此重修起造月份，《莆田集》載為「始於戊申之七月，成於己酉之八月」，但方志所見均為「始於戊申十月，成於己酉（1549）三月」，不知為何月份有此落差？目前最早收錄文徵明此文的方志為一五五一年刊的《（嘉靖）山陰縣志》，此時文徵明尚未過世，而《莆田集》則似由文徵明後人所刊（參考陸曉冬點校，《莆田集》，頁 6 說明），若再考慮方志所收文章可能為文徵明尚未修改過的文稿，以及完成於「己酉三月」較符合王羲之蘭亭會舉辦之時節，筆者認為此修整月份或以方志所錄為正確。見許東望修，張天復、柳文纂，《（嘉靖）山陰縣志》，卷十一，頁 5 下；蕭良幹修，張元忭、孫鑛纂，李能成點校，《萬曆《紹興府志》點校本》，頁 204；李亨特總裁，平恕等修，《紹興府志》，卷七十二（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據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本影印），第 7 冊，頁 1774。

⁶ 蘭亭距紹興府城的距離，萬曆及乾隆年編的《紹興府志》均作「二十七里」，但文徵明〈重修蘭亭記〉則寫為「二十五里」。此處依志書所載。見蕭良幹修，張元忭、孫鑛纂，李能成點校，《萬曆《紹興府志》點校本》，頁 200；李亨特總裁，平恕等修，《紹興府志》，卷七十二，第 7 冊，頁 1771。

上述關於蘭亭歷經崩毀、搬移、整修的記錄，雖僅呈現明中期以後的狀況，透露出的卻是當時所見的紹興蘭亭，已非東晉王羲之曲水流觴故址，而此實情亦為時人所悉。⁷雖然如此，「蘭亭」作為一個名勝，與其相關聯的詞彙、事物如「戒珠寺（王羲之故宅）」、「蘭亭序」、「雲門寺」（王獻之故宅）、「墨池」、「鵝池」等與「王羲之」或「蘭亭」相關者，在歷代的發展之下，也成為往來於紹興者的日常景觀。亦即這些蘭亭相關的詞彙，成為紹興地區一個個的地名，因此可說整個紹興府城，處處可見與王羲之修禊會這段歷史記憶相互聯結的地方。

例如，紹興西南的獨秀山，有「衛夫人碑」、「右軍墨池」。山陰當地有「蘭亭渡」、「蘭亭里」、以及緣起傳為蕭翼（唐太宗時人）獲取《蘭亭序》書蹟後至此說「不負此行矣」的「不負嶺」、唐代鮑防（722-790）等三十七人聯句「曲水追歡處，遺芳尚宛然」之地的「蘭亭古池」等。會稽則有與辨才故事相關的「靈汜橋」，傳說辨才（唐太宗時人）到靈汜橋嚴遷家赴宴，蕭翼才得以藉機取得《蘭亭序》。此外，載山還有傳為王羲之故居的「戒珠寺」、「墨池」及「題扇橋」（現存此橋為清道光 8 年〔1828〕重建）等（圖IV-1～圖IV-3）。而單就「墨池」，在紹興就不只一處，山陰之外，嵊縣獨秀山、載山戒珠寺等均可見之；「鵝池」則至少有三處，分別在山陰、載山與嵊縣金庭山。⁸這些因「蘭亭」故實與王羲之而存在於紹興的地名，不僅數量繁多，尤其有趣的是，部分地名其實是將傳說賦予真實地物而來，例如「不負嶺」、「靈汜橋」、「題扇橋」、「蘭亭古池」等，均屬此類。即在原初的故實或記載中，並未明確記錄發生處所，或已無法考得事蹟之處，在紹興，這些傳說卻因地名的確立宛若曾經發生的史實一般，居民日常於此間穿梭。這些與蘭亭、王羲之故實相關的地名，對紹興居民或往來於紹興者而言，並非僅是距離久遠的歷史故事，而是真實存在的生活空間。如此，不僅具體化了王羲之、蘭亭等相關傳說記載，透過方志的羅列、說明及詩文撰著，更成為地方

⁷ 文徵明〈重修蘭亭記〉中提到，蘭亭已非故地，參見注 5。另見清初全祖望（1705-1755）〈宋蘭亭石柱銘〉：「……（蘭亭）自劉宋以至趙宋，其興廢不知又幾度，顧不可考。若以天柱山之道按之，其去今亭三十里，而唐人蘭亭聯句詩已明言非故址。……」另可見李郁周、盛鴻郎研究。全祖望，〈宋蘭亭石柱銘〉，《結埼亭集》，卷二十四，收入《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縮印清同治十一年〔1872〕姚江借樹山房刊本，1965），頁 17 上；李郁周，〈談文徵明書《重修蘭亭記》〉，頁 423-424；盛鴻郎，〈蘭亭原址與蘭渚湖遺址考〉，收入鮑賢倫主編，《王羲之研究論集：紀念《蘭亭集序》問世 1640 周年》（杭州：浙江美術學院社，1993），頁 139-150。

⁸ 蕭良幹修，張元忭、孫鑛纂，李能成點校，《萬曆《紹興府志》點校本》，頁 7、122-123、184-187、191-192、211、227-229、399、434；李亨特總裁，平恕等修，《紹興府志》，卷八，第 1 冊，頁 167、248、226、269。關於「墨池」、「鵝池」之所在，另見王復禮編輯，毛奇齡校對，《御覽蘭亭志》（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 58 年〔1719〕陸廷燦刻本，原成於康熙 38 年〔1699〕），「疆域」頁 2 下-3 上。載山「題扇橋」重建年代，見張濟編撰，《蘭亭》（杭州：西泠印社，2001），頁 27。

塑造榮耀與認同的一種有效方式。

地名的稱呼，可能來自於當地古早的居民或父母官所命稱，而紹興地方官員對於地方認同與個人形象的塑造，還有更細緻、深刻的作法。以明代紹興知府蕭良幹為例，他除在政暇時修葺蘭亭、探訪雲門寺，「弔先賢之遺蹤，尋智永、辯才故處」，以及編輯《紹興府志》，將這些地名及命名原因加以記錄之外，其所撰〈郡齋石刻蘭亭序跋〉亦可供參考。⁹蕭良幹提到其郡齋中，立有明仁宗（1424-1425 在位）太子時期所獲之唐人墨本《蘭亭序》石刻。此唐人墨本《蘭亭序》被認為是褚遂良（596-658）臨本，經明仁宗賜予楊士奇（1364-1444）後寶藏於楊家。待蕭良幹任紹興知府時，取得楊家藏唐人《蘭亭序》，請趙士楨（1552-1611）「雙勾入石」，同時以趙士楨書王羲之蘭亭會諸賢之詩，一併「刻置郡齋，以為茲土之勝事。」蕭良幹所以特別重立《蘭亭序》石碑於郡齋，乃是因其感慨此「越中珍奇竟作塚中灰土」，因無法取回相傳隨葬於唐太宗墓中的《蘭亭序》真蹟置於紹興，因此期望透過此新立之《蘭亭序》石碑，得以「庶幾復舊觀」。蕭良幹戮力於尋找、重製王羲之《蘭亭序》書蹟，正為企圖恢復（同時也是建立）紹興榮耀的一種舉措。於蕭良幹的作為中，清楚可見主紹興者，往往將蘭亭興廢與蘭亭榮耀之建立視為己任。而紹興歷任地方官重視「蘭亭」、《蘭亭序》書蹟與王羲之諸事，也同時顯示地方官員深知透過對「蘭亭」有所建樹，可作為其在地方立足、建立威望的一種手段。此由沈啟、徐貞明、蕭良幹等重修蘭亭之事一再被記錄於後代方志、文集中的情況，即可看出。而如此的心情與維護蘭亭的責任，以及建立個人威望的方式，後來也在清代被延續下去。

因此可知「蘭亭」一地的保存與重建對紹興地區而言，是作為地方榮耀的一個必要存在，且不論對地方官員或當地仕紳均是如此。「蘭亭」此地究竟是否真為東晉遺蹟、流觴故址，已非重點，但地方官員必須「確立」其存在。明代中期之後，遊人少至蘭亭之其一原因，可能是地處偏遠，同時也反應出紹興蘭亭雖因王羲之蘭亭會聞名歷代，在蘭亭會深受文人喜愛之後，早已發展成不拘泥日期、地點與人數均可舉辦的集會，這樣的發展，使「蘭亭」一詞從實際地標，轉化成文人心中的一個抽象文化符碼，因此各地文士續蘭亭會之舉辦場所，即不是非紹興蘭亭不可。即如後文即將討論的，清代續蘭亭會的典範，已經不是在紹興蘭亭所舉辦者，而是由揚州紅橋等地之修禊活動所取代。

⁹ 蕭良幹，〈郡齋石刻蘭亭序跋〉，吳高增輯，《蘭亭志》，卷七，收入《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據清乾隆 17 年〔1752〕刻本影印，2006），第 35 冊，頁 221-222。



2 帝王參與及紹興蘭亭的振興

2-1 十七世紀，康熙皇帝的參與和皇帝近臣的主導

明末時節，根據著名文人張岱（1597-2680）記載，萬曆四十一年（1613）所親見的蘭亭已是「頽基荒砌」；歷經明清鼎革，紹興蘭亭只可能更形破敗。¹⁰ 乾隆十七年（1752）所刊行之《蘭亭志》記載，入清後蘭亭第一次修整，應是距離一六四四年明亡約三十年後的一六七三年（康熙 12 年）。¹¹ 此次整理因逢王羲之蘭亭會後第二十二個「癸丑」，於是紹興知府許宏勳（遼陽人，康熙 12 年任）投入重建，除其撰刻〈重建「蘭亭」序〉以說明「修復古蹟，守土之職也」，顯示其承續蕭良幹等前代紹興地方官員的心情與責任之外，並請康熙九年（1670）任戶科都給事中的浙江會稽人姜希轍（?-1698）撰〈重建蘭亭碑記〉，「勒之于石」，及知名遺民山陰人祁豸佳（1594-1683 後）題柱。¹²

2-1-1 清代蘭亭的第二次整修與《御覽蘭亭孤山志》的記載

清代蘭亭的第二次整修是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自此次整修開始至乾隆年末，蘭亭的整治，可說都是因帝王而起。以此次整理的時間而言，是在康熙第二次南巡（康熙 28 年〔1689〕）與第三次南巡（康熙 38 年〔1699〕）之間，原可能是為了康熙第三次南巡預作準備，但直到康熙第六次南巡（康熙 46 年〔1707〕）結束，康熙最接近紹興蘭亭的行程，僅在第二次南巡時至山陰禹陵祭拜（康熙 28 年 2 月 14〔壬子〕日），從未親臨蘭亭。¹³ 而康熙三十四年（1695）

¹⁰ 張岱著，夏咸淳輯校，《張岱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 91、201、207。見劉妍鑠，〈蘭亭：景觀、意義與明清之際紹興士人〉（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4），頁 16-17 的討論。

¹¹ 吳高增輯，《蘭亭志》，卷二，收入《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35 冊，頁 86。

¹² 許宏勳，〈重建「蘭亭」序〉，吳高增輯，《蘭亭志》，卷七，收入《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35 冊，頁 225-227。此外，姜希轍，〈重建蘭亭碑記〉提到：「……。亭成歲在癸丑，適同永和禊飲之年，時人異焉，屬轍紀其事而勒之于石。……」，收入李亨特總裁，平恕等修，《紹興府志》，卷七十二，第 7 冊，頁 1774。祁豸佳事，見王復禮編輯，毛奇齡校對，《蘭亭志》，「建置」頁 4 上。許宏勳資料見李亨特總裁，平恕等修，《紹興府志》，卷二十六，第 3 冊，頁 603。姜希轍傳，見趙爾巽等撰，楊家駱校，《清史稿》，卷二八二（臺北：鼎文書局，1981），頁 10166。

¹³ 康熙六次南巡的年代、日期，參見陳葆真，〈康熙和乾隆二帝的南巡及其對江南名勝和園林的繪製與仿建〉，《故宮學術季刊》，第 32 卷第 3 期（2015，春），頁 3-9。康熙第二次南巡曾親至禹陵祭拜，相關記載甚多，如《清實錄》，卷一三九，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壬子（14）日條下：「上親撰祭文，詣禹陵致祭，率扈從諸臣行三跪九叩禮。」查當日行事，並未有康熙至蘭亭的記錄，

起的蘭亭入清第二次整修，可見到清聖祖開始「參與」紹興蘭亭的建設，記錄此事最詳的，是康熙年間出版（有康熙三十八年孟夏毛奇齡跋），王復禮編、毛奇齡校對的《御覽蘭亭志》。此書合《御覽孤山志》為一套，因當年蘭亭、西湖二處均蒙康熙賜書勒石，建亭置御書碑。¹⁴目前似乎為海內孤本的王復禮編《御覽蘭亭志》，過去甚少見到討論，但此志的記載，主要是與康熙三十四年開始之整修的相關一手資料，就研究清初蘭亭歷史的角度而言，此本《御覽蘭亭志》相當值得重視。

根據《御覽孤山志》中所記錄，康熙三十三年（1695）米漢雯（生卒年不詳。米萬鍾〔1570-1628〕孫）與宋駿業（?-1713）於陰曆二月初一，有恭請皇帝「御書勒石蘭亭，以光文治事」。¹⁵康熙同意後，根據敖福合（康熙31年〔1692〕任）〈建亭立碑疏〉所言，康熙三十四年臘月（1696），杭州織造敖福合、刑部員外郎宋駿業，奉康熙之命，將完成於「癸酉春日（康熙32年〔1693〕）」之御書《蘭亭序》、臨董其昌《舞鶴賦》摹勒上石，並在紹興山陰、西湖孤山二處建亭以置刻石。之所以選擇杭州、紹興兩地進行此事，筆者認為可能因杭州織造衙門就在西湖附近，選擇擁有豐富之文化背景的西湖作為御書陳列處所，應有地緣考量。至於選擇紹興山陰，一則因江南三織造中，以杭州織造最接近紹興，關係應該頗為密切；同時，書聖王羲之蘭亭會的故址正位在紹興山陰，考量康熙皇帝喜歡書法，尤其尊崇董其昌，董其昌書風又是宗王羲之而來，故以紹興山陰為名目，敦請康熙「御書勒石蘭亭，以光文治事」，便十分順理成章。

工程開始於康熙三十五年二月，先「相度地形繪圖」，待九月初三，《舞鶴賦》勒石完成即置於孤山亭中，十月初八《蘭亭序》刻石完成後豎立於山陰，朱彝尊有〈頌御書大字蘭亭頌并序〉詠贊此事。¹⁶為謝皇恩，地方人士又拓了《蘭亭序》、

此後亦未見相關記載。見《清實錄》，卷一三九（北京：中華出版社，1986-），頁20上。另可見李亨特總裁，平恕等修，《紹興府志》，卷三十六，第4冊，頁27上-27下。關於康熙並未親至蘭亭之事，除可參考《清實錄》、《紹興府志》外，另可參照《欽定南巡盛典》卷八二。《欽定南巡盛典》中，對於清聖祖未至之處均特別說明，如浙江海塘區域「康熙年間聖祖均未巡幸」等。提到蘭亭之處則有：「至紹興府之南鎮、蘭亭二處，與禹陵相去不遠，從前聖祖未經臨幸該處。」的記錄。均見高晉等編，《欽定南巡盛典》，卷八二，收入紀昀等總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1983），第659冊，頁299。

¹⁴ 王復禮編，毛奇齡校，《御覽蘭亭孤山志》（天津圖書館藏康熙58年〔1719〕刻本。康熙三十八年〔1699〕孟夏毛奇齡跋）。此書最初完成於康熙三十五年，見毛奇齡，〈御覽蘭亭孤山二志跋〉，《御覽孤山志》，「藝文」頁64上-66下。但不知何故，似乎一直到約二十年後的康熙五十八年（1719）才正式出版，此時王復禮已七十五高齡。見陸廷燦，〈跋〉，《御覽孤山志》，「藝文」頁67上-下。

¹⁵ 王復禮編，毛奇齡校，《御覽蘭亭志》，「欽褒」頁31下。

¹⁶ 敖福合，〈建亭立碑疏〉，王復禮編，毛奇齡校，《御覽孤山志》，「藝文」頁27下-28上。雖然

《舞鶴賦》二碑，由宋駿業送入京師向皇帝覆命。¹⁷雖然透過毛奇齡跋，說明康熙書此二作，乃是「萬幾之暇偶書」，後為人所請才賜予紹興、杭州二地，但對照該跋稱「是時蘭亭、孤山諸名蹟，久已荒蕪」的說法，以及《御覽蘭亭孤山志》對西湖入清後修整的記載，可知蘭亭、西湖二地在清初的頹傾與正待興復重建。¹⁸或許康熙特書此二作置於蘭亭、西湖，一方面為回應臣子所請「以光文治」之事，同時，也有促進地方振興名勝之意圖於其中。因此康熙三十五年，蘭亭與西湖之刻石與御書碑亭的建立，實屬同一事件，而王復禮在書中，也刻畫了建立新亭之後的二地面貌（圖IV-4、圖IV-5）。

不著繪者的《西湖孤山圖》與朱其昌繪《蘭亭曲水圖》，畫面中的西湖放鶴亭與蘭亭御碑亭，在二十世紀均經過整修，但圖像中所呈現的位置與樣式和目前所見大抵相類，惟圖IV-4所見之康熙臨董其昌《舞鶴賦》刻石，呈現的是直立的樣式。實際上，《舞鶴賦》刻石的平面，是接近正方形（比較圖IV-4局部、圖IV-6）。於此而言，可知此志繪者並無意於細節呈現真實碑刻的外貌，表現的重點主要是放在畫出「御書碑」的存在。由於御書碑是為帝王的象徵，御書碑出現於西湖或蘭亭，意味著此二地的子民乃是為天之驕子，而帝王對地方的統治與恩寵，也同時意味著地方官員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視。

紹興蘭亭在此次整修之後，基本上已經完成清代紹興蘭亭的樣貌。很快地，康熙三十七年（1698）陰曆十一月，康熙又寫了《蘭亭》二大字匾，再度立碑於紹興，此事也被記載於《御覽蘭亭志》中。¹⁹至此，清代紹興蘭亭的幾幢主要建物已經完成，但若想了解康熙年間蘭亭地區整建後究竟是何面貌，必須再檢閱另兩個文獻。

教福合文中寫明刻石完成、立碑是在康熙三十五年九至十月的事，但《御覽蘭亭志》「欽褒」頁32下，又寫「康熙三十五年七月御書《蘭亭敘》勒石蘭渚」，很可能七月正式開工，或者是工作中的日程。朱彝尊文見，朱彝尊，〈頌御書大字蘭亭頌并序〉，《曝書亭集》，卷六十一，收入《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縮印清康熙本），頁1上-2下。

¹⁷ 教福合，〈建亭立碑疏〉，王復禮編，毛奇齡校，《御覽孤山志》，「藝文」頁27下-28上。筆者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典藏資料檢索系統中」查得〈清聖祖御筆蘭亭詩序軸〉，此軸尺寸408.1×209.1，與蘭亭御書碑本幅尺寸看似相近（圖IV-7C）。此外，蘭亭原碑與故宮收藏拓本上之印章，及本幅周圍所圍繞的螭龍紋也相一致（圖IV-7D、E）。因此筆者認為宋建業送入京師之拓本應即此件，但不知當時共拓有幾本，以及《舞鶴賦》拓本是否尚存於世。

¹⁸ 毛奇齡，〈御覽蘭亭孤山二志跋〉，《御覽孤山志》，「藝文」頁64上。西湖在清初的整修，見王復禮編，毛奇齡校，《御覽孤山志》，「建置」頁6下。關於清初西湖的沒落與乾隆、雍正年間李衛（1687-1738）擔任浙江巡撫時的重新建設，詳見汪利平，〈杭州景觀建設與清代文化政治〉，《新史學》，第6卷（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166-172。

¹⁹ 王復禮編，毛奇齡校，《御覽孤山志》，「建置」頁4下、「欽褒」頁32下。



2-1-2 康熙年間蘭亭地區整建後之面貌與康熙皇帝的「存在」

首先，根據乾隆十七年（1752），吳高增（1706-？）所編之《蘭亭志》記載：

……。我聖祖仁皇帝萬幾餘暇，留神翰墨，御書重頌，超軼醉本，又有「蘭亭」二大字，特允織造教福合所請，磨大石數丈，勒諸蘭亭，其大字懸之亭中，前疏方池，砌石積水，有「天下太平」四字。未免改易舊制，專祠祀右軍。祠前有鵝池、墨池。左有密室迴廊，清流碧沼。入門架以小橋，修篁茂樹，綠陰環遠，越東名勝，此地為最著。……²⁰

又，乾隆五十七年（1792）紹興知府李亨特刊行之《紹興府志》的記載：

康熙三十五年（1696）御書大字晉王羲之《蘭亭敘》，勒石，上覆以亭。……
康熙三十七年（1698）御書「蘭亭」二字，懸額正中。……²¹

（蘭亭）……。國朝康熙三十四年，奉勅重建。聖祖御書《蘭亭敘》，命織造部臣教福合、員外郎宋駿業等，勒石於蘭渚山天章寺側，上覆以亭。三十七年復御書「蘭亭」二大字懸之。其前疏為曲水，後為右軍祠，密室迴廊，清流碧沼。入門架以小橋，翠竹千竿，環繞左右，遊人至者，無虛日焉。……²²

若只見吳高增《蘭亭志》與李亨特《紹興府志》，很容易以為右軍祠堂與所謂「密室迴廊，清流碧沼」之處等，為康熙三十七年的建設，但對照王復禮編《御覽蘭亭志》，會發現蘭亭一地的建設、整理，基本上在康熙三十五年已經底定。因為《御覽蘭亭志》書中「勝蹟」的部分，載有「蘭渚山」、「蘭亭」、「新建碑亭」、「墨池」、「鵝池」、「曲水」、「蘭亭溪」、「蘭亭橋」、「右軍祠」等處，其中唯「新建碑亭」與「右軍祠」寫明為康熙所建。至於康熙三十七年書《蘭亭》匾後所建的碑亭，則未列入書中。由於王復禮編《御覽蘭亭志》最初完成於康熙三十五年，後

²⁰ 吳高增輯，《蘭亭志》，卷三，收入《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35冊，頁108-109。

²¹ 李亨特總裁，平恕等修，《紹興府志》，卷七十二，第1冊，頁13-14。

²² 李亨特總裁，平恕等修，《紹興府志》，卷七十二，第7冊，頁1771-1772。

經康熙指示修改後才正式出版，故書中對於三十七年《蘭亭》二字匾的記錄不多。²³

根據吳高增編的《蘭亭志》，康熙三十五、三十七年兩度賜書予蘭亭，是「特允織造敖福合所請」，但對照王復禮《御覽孤山志》的記載，康熙最初寫《蘭亭序》予蘭亭，卻是由米漢雯與宋駿業所請。²⁴此事由誰起頭恐怕已不易考證，但由康熙身邊的臣子所建言則是事實。如敖福合身任織造，當屬康熙身邊得其信任的臣子，他在浙江進行蘭亭的重建工作，可能也讓康熙對其印象深刻，故康熙隔年（康熙 38 年）第三次南巡時，賜予敖福合之御書中即有「蘭亭」二大字。²⁵而臣子建言之後，康熙從善如流，臣下也投其所好，致使有隨後一連串整治蘭亭及西湖建設之工程。因此，雖然此事以臣子所請而成，但很可能是臣子體察上意之後的結果，若要說此次整建為康熙意志之貫徹，其實也不為過。

從前文吳高增編《蘭亭志》、李亨特《紹興府志》的引文來看，蘭亭此兩次修整，可說是以御書碑亭為中心來安排周圍建設。關於康熙年間這兩次整修，可對照王復禮編《御覽蘭亭志》及吳高增編《蘭亭志》中的附圖，來進一步了解。

王復禮編《御覽蘭亭志》中之《蘭亭曲水圖》，似乎是目前清代所見，時代較早而細節清晰的蘭亭地志圖象，但《蘭亭曲水圖》中並無榜題標示，因此必須對照帶有榜題之吳高增編《蘭亭志》中的《復古曲水圖》及二十世紀初之照片、記載，來協助辨識。首先，筆者先以《復古曲水圖》為基礎，來確定《蘭亭曲水圖》各建築的名稱（比較圖IV-8、圖IV-9）。《蘭亭曲水圖》畫面近中心位置處，有一座方亭，方亭後方，左頁中間位置者，為康熙三十五年所建的御書碑亭。御書碑亭後方西北的位置，為當年新建的右軍祠堂。²⁶圖中右軍祠前方一小圓池，

²³ 康熙曾對王復禮初稿提供修改意見，見毛奇齡，〈御覽蘭亭孤山二志跋〉，《御覽孤山志》，「藝文」頁 64 上-66 下。故閱讀此書時，關於《蘭亭》二字匾的記載，即很像是康熙閱過之後，王復禮才增添記載於書中。

²⁴ 王復禮編，毛奇齡校，《御覽蘭亭志》，「欽褒」頁 31 下。

²⁵ 吳高增輯，《蘭亭志》，卷三，收入《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35 冊，頁 108；庫勒納等奉敕撰，《清代起居注——康熙朝》，第 13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頁 2048，康熙三十八年（1699）三月二十九日；莊吉發，〈翠華南幸·揚州寫真——盛清君臣眼中的揚州〉，收入馮明珠主編，《盛清社會與揚州研究：恭賀陳捷先教授八秩華誕論文集》（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頁 85。另外，關於織造與皇帝間之親近關係的討論，見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溢譯，《曹寅與康熙》（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²⁶ 吳高增輯《蘭亭志》說明右軍祠建於西北方位，對照《御覽蘭亭志》、《紹興府志》的說明，知其所指即御書碑亭後方。見吳高增輯，《蘭亭志》，卷二，收入《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35 冊，頁 87；王復禮編，毛奇齡校，《御覽蘭亭志》，頁 3 下；李亨特總裁，平恕等修，《紹興府志》，卷七十二，第 7 冊，頁 1771-1772。此外，對照紹興市蘭亭景區管理處印行的《書法聖地·蘭亭旅遊導覽冊》所繪製的今日地圖，御碑亭後方偏左，正是西北方位。

應即暗示有鵝池、墨池於此，《復古曲水圖》同位置之建築有榜題為「右軍祠」，「右軍祠」前有「墨池」。至於文獻「左有密室迴廊，清流碧沼」之句，從《蘭亭曲水圖》看來，指的似乎是位於右軍祠、御書碑亭、方亭左側的建物。這組建築在《復古曲水圖》中稱為「修禊所」，不但有長廊、也有池沼於其中，此建物若對照於吳高增編《蘭亭志》中另一幅《今蘭亭圖》，會更清楚（圖IV-10）。

清代的紹興蘭亭與明代此地有何不同呢？若以清代《御覽蘭亭志》之《蘭亭曲水圖》的布局，比對於明代萬曆年間蕭良幹編修之《紹興府志》中的〈蘭亭圖〉，可清楚看到明代紹興蘭亭中，有一個「蘭亭」，亭子之兩側有「洗墨池」、「浴鵝池」，「蘭亭」斜前方有一組建物，上面榜題寫著「竹裡行流」，前方則有曲水流觴（圖IV-11）。明代蘭亭整個組成結構，頗符合一般對紹興蘭亭——王羲之蘭亭會之舉辦場所——的想像，因為有個名為「蘭亭」的亭子，令蘭亭的地名名符其實。而清代，康熙三十五年之後的紹興蘭亭，是否也有名為「蘭亭」之亭子存在呢？從方志上看，不論《御覽蘭亭志》、《蘭亭志》或《紹興府志》，似乎均未明指「蘭亭」的方位，不禁令人懷疑可能並未有此一實際亭子的存在。而《蘭亭曲水圖》中之方亭，因《復古曲水圖》中同位置的方亭並無榜題，無法確認建築物名稱（圖IV-8、圖IV-9）。但乾隆三十一年（1766）刊的《南巡盛典》中之「蘭亭」圖象，此方亭即被榜題為「蘭亭」，至二十世紀初，又名為「流觴亭」（圖IV-12、圖IV-13）。這種對方亭無標示榜題，或榜題為「蘭亭」、「流觴亭」的狀況，筆者認為很可能是康熙時期此亭並未有特別的定名。如《御覽蘭亭志》所載，認為蘭亭並非提供「游宴之亭」，而是古代驛路上的一個休息設施。²⁷或許因此，康熙時代之紹興蘭亭雖有一方亭於此供休憩，但從未將之定名為「蘭亭」。至於乾隆時期才以「蘭亭」名之的狀況，其實很可能這僅是《南巡盛典》編輯為了彰顯此地名的相應作法。故《南巡盛典》上的「蘭亭」之名，才未被紹興當地延續使用，直到近代也才會被冠以「流觴亭」的別稱。

除了「流觴亭」之外，《復古曲水圖》中稱為「修禊所」的建築，在二十世紀初已變成王右軍祠堂（圖IV-8、圖IV-9、圖IV-14）。而原來康熙年間「右軍祠」位置的屋舍，一九三一年依西川寧目測所繪之《蘭亭平面圖》中仍有此處，但已無建物名稱（圖IV-8、圖IV-15）。

根據今日紹興蘭亭的景點說明，流觴亭建於康熙年間，一九八〇年曾經大幅

²⁷ 蘭亭非供「游宴之亭」的說法，如王復禮編，毛奇齡校，《御覽蘭亭志》，「勝蹟」頁2上。

修整；王右軍祠則建於康熙三十七年，同治六年（1867）曾經重修。顯然不論今日之流觴亭或王右軍祠，都初建於康熙年間。²⁸據此筆者推測，同治年間的大整修，很可能將原位於御書碑亭後方的右軍祠，搬遷到原稱「修禊所」的這組建築中（即今日之王右軍祠），並由主導整修的山陰知縣楊恩澍（生卒年不明）於此豎立一《墨池》碑，即將原在右軍祠中之墨池也移至此組建築之意（圖IV-16）。若對照圖IV-8下圖，今日紹興蘭亭御書碑亭斜後方之建築（康熙時代之右軍祠）前方尚有一方池，應即康熙時代遺留之墨池所改建。故很可能同治年間的整修，形成了今日所見之紹興蘭亭的布局（圖IV-8）。

除此之外，康熙三十五至三十七年的建設，還包括存放御書《蘭亭》刻石的碑亭，及水池與重新疏濬的曲水。此《蘭亭》碑亭在《御覽蘭亭志》附圖中，尚未被畫出，但在吳高增編《蘭亭志》之《今蘭亭圖》、《復古曲水圖》中，均有出現（圖IV-9、圖IV-10、圖IV-17、圖IV-8）。

雖然圖繪未必反映真實、正確的建築尺寸，康熙三十五至三十七年所建設的紹興蘭亭，從《御覽蘭亭志》之《蘭亭曲水圖》畫面所呈現的，仍有值得吾人留意的訊息（圖IV-8上圖）。《蘭亭曲水圖》中，雖可見到後來作為流觴亭的方亭建物，但蘭亭後方一幢更高大、佔地面積更廣的建築，卻是清代帝王的御書碑亭。實際上若對照圖IV-8下圖，會發現流觴亭與「御碑亭」的佔地面積相去不遠，不過「御碑亭」的高度確實高於流觴亭。御碑亭在《蘭亭曲水圖》被特別強調、放大的表現方式，顯示對作者王復禮及地區畫家來說，「御碑亭」存在紹興，是一件必須被特別看見的事情。

此外，御碑亭中康熙所書寫的《蘭亭序》亦頗值得注意。若以常理來推敲，既然此書寫有所本，又是要放在《蘭亭序》產出之地，書寫者比較可能的作法，似乎是以臨仿王羲之的風格來表現《蘭亭序》。尤其在帝王書寫《蘭亭序》的傳統中，一直以來，大抵都是緊密跟隨王羲之《蘭亭序》書風來臨仿。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清拓《安素軒石刻》宋高宗（1127-1162在位）臨寫的《蘭亭序》，即可說是帝王書寫《蘭亭序》的典型作法。相較於王羲之《蘭亭序》的全幅高度約二十五公分（此處以《定武蘭亭序》為例），每個字體尺寸約二至三公分，宋高宗臨本全幅高度約三十三公分，字體尺寸與王羲之原字差異不大。而宋高宗對《蘭

²⁸ 同治六年的整修由山陰知縣楊恩澍主導，此整修年代見楊恩澍題王右軍祠中之《墨池》碑紀年而來。但不知為何蘭亭地區的景點說明，指王右軍祠為同治八年（1869）重修？此外喻革良編著，《聖地絕品·神游蘭亭》，頁13也指整修年代為同治八年。而現今王右軍祠中的墨華亭，則是一九一四年才整修，見同書，頁15。

亭序》的臨仿，也採亦步亦趨的風格表現（比較圖IV-18、圖IV-19）。但是，康熙皇帝被鐫刻於紹興之《蘭亭序》書法，卻非以來自王羲之風神流暢之書法風格來臨寫、追仿，而是以康熙個人較為雄渾、近乎方正結體的擘窠大字，來重新詮釋王羲之名作。另以尺寸來說，康熙書《蘭亭序》每字約有十幾公分高，遠大於王羲之《蘭亭序》的字蹟（圖IV-20）。

2-1-3 康熙皇帝對紹興蘭亭的「參與」和「介入」

康熙皇帝此舉，可對照《御覽蘭亭志》的說法來理解：

該臣等議得書法為文治所關，皇上宸翰，超前邁古，諸美畢臻。所有御書大字《蘭亭序》，又為歷代希覲，自應摹刻會稽，永昭萬禩。²⁹

對康熙臣子而言，康熙的書法「超前邁古，諸美畢臻」，且「大字《蘭亭序》，又為歷代希覲」，故康熙三十二年所書寫的《蘭亭序》，被刻上一整塊十六噸重的石塊上，在這次整修中，豎立於紹興蘭亭最高的一座碑亭之中。此外，當年還特別建造了右軍祠以奉祀王羲之。這兩件事雖由地區（杭州織造叅福合）與中央（刑部員外郎宋駿業）大臣合作促成，但他們應是體察上意，故可視為是康熙對地方建設的一種「參與」與「介入」。康熙「參與」的部分是，康熙為王羲之建立祠堂，此舉昭示清廷對法書這項漢文化的敬重，以及滿州帝國透過提升書法地位「以光文治」的期待。「介入」的部分，則是紹興蘭亭一向以王羲之及其蘭亭會為核心，康熙的御臨大字《蘭亭序》及龐大的御碑亭建築卻有奪人之勢，甚至讓王復禮等地方人士特別在志書上「放大」了康熙於紹興蘭亭的存在。就此看來，至少在康熙時代的紹興地區，康熙御書碑及御碑亭的地位，實有凌駕王羲之《蘭亭序》及紹興蘭亭之勢。

雖然康熙對紹興地方建設的「參與」與「介入」也具有振興地方的意圖，但此時康熙對蘭亭傳統真正核心的改造，是藉由展示其個人雄厚的書法根柢及設立右軍祠的權力，向天下昭告其對「王羲之」形象與對天下「文治」之掌控資格。尤其過去的紹興蘭亭並未設置王羲之祠堂，康熙之命，在繼承唐太宗以下歷代帝

²⁹ 王復禮編，毛奇齡校，《御覽孤山志》，「建置」頁4下、「欽褒」頁32上。

王對王羲之尊崇的態度之外，同時也昭示了「紹興蘭亭」作為蘭亭史事之正統遺蹟。³⁰就此脈絡看來，清初王羲之的書聖地位及紹興蘭亭之立於蘭亭正統，似乎可說是透過清代帝王之認證、支持而予以確立。

康熙皇帝面對蘭亭傳統的調整，大抵可分兩階段來看。第一階段是康熙三十五至三十七年的這次改建，此時，康熙皇帝對紹興蘭亭整修的參與，主要是著眼於書法與文治的連結之上。第二階段，如同第三章已經討論，康熙在避暑山莊創造出「天趣蘭亭」紀念物的新面貌，這個創造則改變了蘭亭傳統中之「曲水流觴」與漢式「流杯亭」的意象及內涵。

2-2 「塑造群體」之運作：十八世紀，在地菁英與地方官員聯手打造「復古蘭亭」

乾隆十三年（1748），紹興知府杜甲（乾隆 13 年任）、鄭肇奎（乾隆 15 年〔1750〕任）為因應乾隆十六年（1751，辛未）第一次南巡將訪蘭亭，而整建蘭亭。乾隆臨幸紹興蘭亭隔年，由吳高增編、杜甲序之《蘭亭志》，在乾隆十七年（1752），正式出版。此是王復禮編《御覽蘭亭志》之後，清代第二本蘭亭專志。乾隆十六年帝王臨幸紹興蘭亭，乃是此地入清之後的第二榮景。也猶如《蘭亭志》所描述，當地人士的心情是「生此地與仕此土者，何其幸也！」。³¹

2-2-1 藉由「塑造群體」以凝結在地精英及地方官員之共識

此次地方重建蘭亭之事，主要基於在地菁英與地方官員的努力，而非由「織造」之類與皇帝關係緊密的高官所負責。就在地菁英而言，乾隆初期，以《蘭亭志》主導者吳高增（嘉興歲貢生，曾任邯鄲知縣）為中心的文人社群，即曾於紹興蘭亭舉辦續修禊會。如乾隆八年（1743）吳高增與其師桑調元（雍正 11 年〔1733〕進士）等在此禊飲賦詩。³²當次參與者除吳高增、桑調元之外，尚有貢生周京、

³⁰ 王復禮編，毛奇齡校，《御覽蘭亭志》，「奏疏」頁 1 下指出：「（蘭亭）雖屢經興廢，代致褒揚，然未有賜額建祠如今日者」。

³¹ 吳高增輯，《蘭亭志》，卷二，收入《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35 冊，頁 83。

³² 相關詩文見吳高增輯，〈癸亥暮春隨弼甫師倍侍諸丈暨同人偕弟高峻禊飲賦詩以清流激湍映帶左右為韻〉，《蘭亭志》，卷九，收入《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35 冊，頁 264-269。吳高增、桑調元簡介，見阮元，《兩浙輶軒錄補遺》，卷六，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嘉慶刻本），「吳高增」條；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卷二十六，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道光十年刻本），

舉人朱嵩齡（桑調元好友、朱彝尊從子）、恩貢生盧存心（1717-1796）、舉人許椿、諸生劉鳴玉、舉人吳高峻（吳高增弟）共八人。此八人均為一時名士，除具有諸生、舉人等資格外，有些人後來也曾任縣令，且籍貫均出浙江錢唐、嘉興、山陰等鄰近地區，故可將之視為以桑調元為首的在地菁英社群。³³這批地方菁英，也時常於蘭亭遊覽、聚會或修禊，相關詩文均被收入吳高增輯《蘭亭志》之卷九、卷十「藝文」中。透過這些菁英分子經常集會蘭亭、歌頌蘭亭，且由吳高增為之整理詩文刊刻出版，可見他們對在地勝景的支持與目標一致的緊密程度。吳高增等人，可說是一群以紹興蘭亭為活動中心的團體，透過在蘭亭舉行修禊等活動，他們彼此交流著對地區的期許及個人的詩文創作。王羲之蘭亭會所帶有之「塑造群體」的特質，在這群紹興地方群體的運作上，顯然產生了積極效用。日後這批菁英分子也積極參與地方事務，主導紹興蘭亭在乾隆時期的整修方向，他們與地方官員攜手，重新打造地方榮光。

蘭亭地位的復興與地方官員的推動也密切相關，乾隆十三年（1748）擔任紹興知府的杜甲，可說是此波重塑紹興蘭亭地位之首位重要執行者。杜甲曾於雍正十三年（1735）任河北遵化知州，他對於康熙曾數次赴遵化溫泉、於當地流杯亭與臣子共飲之事，應十分清楚，因此對康熙之於流杯亭的喜好，必定也了然於心。³⁴當他轉任紹興知府時，即開始與地方菁英一同攜手，從事重建紹興蘭亭聲望之事。乾隆十三年陰曆潤七月六日，紹興知府杜甲主持之秋禊會，於蘭亭舉行，此次聚會有吳高增為序、李凱（1693-1761）跋，並由吳高增輯為〈蘭亭修禊詩〉。³⁵據吳高增之序，當日所邀者乃「諸博士及弟子員」，參與者如吳高增（當年43歲）、吳高峻兄弟其時已為壯年，且具歲貢生、舉人身分，已富社會聲望。

頁「桑調元」條。關於桑調元在詩學上的位置，可參考蔣寅評述，蔣寅提到桑調元雖然不太為人重視，但「他與查為仁（1693-1749），都應該被視為乾隆初期傳播性靈概念的詩人」，並很可能影響及袁枚，因此不難想見桑調元在當時浙江應有一定的影響力。見蔣寅，〈“神韻”與“性靈”的消長——康、乾之際詩學觀念嬗變之跡〉，《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頁23-24、26。

³³ 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卷二十五，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道光十年刻本），「周京」條；嵇曾筠，《（雍正）浙江通志》，卷一四四（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41下「朱嵩齡」條；阮元，《兩浙輶軒錄補遺》，卷二十二，「盧存心」條；穆彰阿，《（嘉慶）大清一統志》，卷二八八，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四部叢刊續編景舊鈔本），「許椿」條；阮元，《兩浙輶軒錄補遺》，卷二十八，「劉鳴玉」條；潘衍桐，《兩浙輶軒續錄》，卷六，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光緒刻本），「吳高峻」條

³⁴ 劉清原纂，傅修績纂修，《直隸遵化州志》，卷十四（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乾隆59年〔1794〕刊本），頁15上。康熙有〈溫泉流杯戲作〉詩曰：「曉霜早落滿地清，一氣涓涓愜勝晴。偶坐浮杯幾暇日，君臣對景論平生。」見劉清原纂，傅修績纂修，《直隸遵化州志》，卷二，頁21下。

³⁵ 詩文見吳高增，〈蘭亭秋禊詩（有序）〉，吳高增輯，《蘭亭志》，卷九，收入《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35冊，頁291-292（所輯全部詩文見頁291-316）。

其他參與者也包含終生布衣、被稱為「越中三子」之一的童鈺（1721-1782，當年 28 歲。另一名「越中三子」劉鳴玉〔生卒年不詳〕也同集此會）。因此看來，杜甲所邀者除博士、生員外，還包括地方名流。³⁶另依詩文所見，與會者為二十六人，續和者有十七人，共四十三人，此人數當為符合王羲之蘭亭會之四十一、四十二人之數而特為之。³⁷參與者的籍貫除知府杜甲來自揚州，餘均出自浙江；續和者則除滿州正白旗的舒瞻（乾隆 14 年〔1749〕任山陰縣令）、河南寧陵的張元文、江蘇高郵的沈業富（1732-1807）等三人非屬浙江籍，餘十四人均為浙江人士。³⁸屬浙江籍的三十九人中，又以同屬紹興府治理的山陰、會稽二縣參與人數最多，共二十人，越半數。故此次以杜甲為首的續蘭亭會，毫無疑問是以前在地菁英為主要組成對象，或者說，作為地方官員的杜甲，有意識地將地方菁英結集一起，以利政事進行。反觀在地菁英，應也期待在風雅談笑之間與地方官員建立關係，以利地方整建之推動。如此次與會的吳高增、陸振宗（生卒年不詳），均在乾隆十五年（1750）參與了杜甲所開始的蘭亭修整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杜甲邀集 吳高增等在地菁英 於乾隆十三年在蘭亭舉辦續蘭亭會，可說是為乾隆南巡即將展開地方建設前的準備工作。杜甲在紹興任官，王羲之蘭亭正為紹興重要史蹟，康熙皇帝曾於此立下御碑亭，乾隆皇帝又即將前來，紹興正是百事待興之際。作為地方官員的杜甲深知政事之推動，若能得地方仕紳出手相助必定事半功倍，故此續蘭亭會之舉辦，有拉攏地方菁英的實質目的。顯然杜甲也很清楚王羲之蘭亭會所具有之「塑造群體」的特質，因此杜甲的 秋禊會刻意集四十三人成〈蘭亭修禊詩〉，並且有序、有跋，整個形式密切模仿王羲之的蘭亭會。杜甲的心意也為參與者所了解，故 吳高增序提到：「太守之逸興不減右軍，而諸賢之陪侍亦幾及永和之盛。」直將杜甲比為王羲之，將參與之地方菁英目為蘭亭會之群賢。由此來看，杜甲的續蘭亭會至少就此團體自身的角度而言，是為一次「賢才群聚」的雅集。而在此雅集中，因可藉以蒐集各方對地區建設之意見、凝聚共識，爾後這群官民也聯手打造紹興榮景，所以這次續蘭亭會之舉辦，也確實「塑造」了以杜甲為首之官民合作的「群體」組織。

³⁶ 阮元，《兩浙輶軒錄補遺》，卷三十三，「童鈺」條；卷二十，「李凱」條。童鈺與劉鳴玉應屬此會中較年輕一輩，或許此二人其時尚未被冠以「越中三子」之稱，但應已富文名。

³⁷ 李凱跋中有「合清商於四十二篇」之句，看似賦詩人數為四十二，卻非實際所載之詩文數量。筆者推測此處李凱說法應只是為了與王羲之蘭亭會相續而為之。李凱跋見吳高增，〈蘭亭秋禊詩（有序）〉，吳高增輯，《蘭亭志》，卷九，收入《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35 冊，頁 315。

³⁸ 舒瞻任山陰縣令，見徐元梅修，朱文翰纂，《（嘉慶）山陰縣志》，卷九，愛如生中國方志庫（據民國二十五年〔1936〕紹興縣修志委員會校刊鉛印本）。



2-2-2 「復古蘭亭」之打造

乾隆十三年杜甲的續蘭亭會之後，杜甲及鄭肇奎（接續杜甲於乾隆 15 年任紹興知府）兩位知府於乾隆十五年開始，因準備乾隆南巡，意欲恢復蘭亭舊觀，時謂之「復古蘭亭」。但此恢復蘭亭舊觀之倡議，實為在地菁英的積極建議。³⁹

《蘭亭志》卷二〈蘭亭圖說〉中，附有山陰畫家陸振宗所繪《古蘭亭圖》、《今蘭亭圖》、《復古曲水圖》三幅蘭亭圖，文中除將陸振宗相比於歷代蘭亭圖作者外，並依序說明紹興蘭亭入清之後的修整意見及改造面貌。⁴⁰首先，與清代整修最無關係者，即是第一幅《古蘭亭圖》，為文中所謂「晉賢袂褱圖也」。此畫係陸振宗仿文徵明所作之「修褱舊圖」而來，應是作為紹興歷史榮耀與舊觀記憶，而特意繪入（圖IV-21）。⁴¹根據〈蘭亭圖說〉指出，當時「世所臨摹皆文徵明本」，冒襄（1611-1693）水繪園修褱時，也曾出其所收藏之文徵明《蘭亭修褱圖記》卷與眾人同觀，足見當時文徵明《蘭亭圖》之聲名，遠遠超越傳李公麟《蘭亭圖》石刻本的狀況。⁴²

目前傳稱文徵明所繪《蘭亭圖》中，確實有與傳李公麟本構圖相類者，而不論是傳稱文徵明的這類作品或《蘭亭志》中的這幅《古蘭亭圖》，其圖式、佈局，均是以世傳李公麟《蘭亭修褱圖》石刻為本（圖IV-6、圖IV-22）。以《古蘭亭圖》與傳李公麟本相比較，二作均是以橫卷形式布置一曲流橫互畫幅，開端有王羲之於蘭亭中提筆的場面，惟李公麟本之蘭亭位在水中，《古蘭亭圖》者則立於陸地（圖IV-23）。曲流上有浮杯，沿岸則有文人列坐，或沈思賦詩、或因酒醉手舞足蹈，並有小童送酒、收杯。兩作除佈局雷同之外，畫中人物更清楚可見《古蘭亭圖》源於李公麟本之造型。如手舞足蹈者是由楊模形象而來，右腳豎直、右手置於膝上之坐姿，亦如李公麟本之王獻之形象（圖IV-24、圖IV-25）。有趣的

³⁹ 吳高增輯，《蘭亭志》卷十二，收入《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35 冊，頁 92-96；李亨特總裁，平恕等修，《紹興府志》，卷二十六，第 3 冊，頁 23 下。

⁴⁰ 吳高增輯，《蘭亭志》，卷二，收入《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35 冊，頁 74-75。另外，陸振宗之發跡，可能與受吳高增之賞識有關，見李亨特總裁，平恕等修，《紹興府志》，卷七十，第 6 冊，頁 13 下-14 上。

⁴¹ 吳高增輯，《蘭亭志》，卷二，收入《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35 冊，頁 75、80。

⁴² 吳高增輯，《蘭亭志》，卷二，收入《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 35 冊，頁 75。冒襄相關討論見李孝悌，〈士大夫的逸樂：王士禛在揚州（1660-1665）〉，收入氏著，《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初版二刷），頁 172，另詳本章第二節討論。

是，《古蘭亭圖》之曲水兩旁的文人數量為四十三人（不包含坐於蘭亭中之王羲之），此數正合於杜甲乾隆十三年之秋禊會中的撰詩文者，不知是否為陸振宗刻意為之。⁴³

《古蘭亭圖》之外，《蘭亭志》中的其他兩幅作品，《今蘭亭圖》與《復古曲水圖》，纔是與清代紹興蘭亭景觀相關的圖作，前文已進行部分討論（圖IV-10、圖IV-9）。《今蘭亭圖》所繪，為《蘭亭志》中所謂「按照近製，迺今之蘭亭也」，因此所呈現的，應為康熙三十七年整治完成後的面貌。⁴⁴《復古曲水圖》則是所謂「曲水新圖」，為經桑調元、周京、朱嵩齡等建議「復古」，因應乾隆南巡而改建的新面貌。⁴⁵細觀《今蘭亭圖》與《復古曲水圖》，此兩作最大的差異，即是前景的曲水。以下，先引《蘭亭志》中之《復古曲水圖》的說明輔助理解：

此曲水新圖也。杯浮曲水，左右流之，昔賢高致蘊藉，千古後，乃改築方池，壘石為清書四字，水流是間，非永和舊製。予嘗從桑弢甫師〔調元〕、周穆門〔京〕、朱予齋〔嵩齡〕、盧敬甫〔存心，約1691-?〕三先生暨鄉先生輩，遊咏於斯，言及曲水非故蹟，白觀察葉公，以復古為請。己巳肇秋（乾隆14年〔1749〕），太守杜公〔甲〕率諸廣文及弟子員，秋禊倡和，沈君有「堦前疊石定須刪」之句，杜公韙之會。⁴⁶是冬，皇上允督撫大臣所請，將於辛未春（乾隆16年〔1751〕）巡幸江浙。有司脩葺名勝，〔吳〕高增奉委同陸子辛厓〔振宗〕繪圖以進，杜公議復舊觀，適調任杭州，未即舉行。今鄭使君〔肇奎〕來領是邦，以復古為事，仍命辛厓繪圖。公指畫周詳，宛然永和曲水，茂林修竹風景，而濡毫內史，栩栩欲出。予〔吳高增〕因為新曲水賦，仍以「惠風和暢，清流映帶」為韻，寄呈觀察太守諸公，并寄政弢甫師、敬甫先生。⁴⁷時周、朱二先生已墓前宿草矣，惜不見蘭亭之舊觀也。⁴⁸

⁴³ 歷來對王羲之蘭亭會的參與者，各有四十一或四十二人之說，從未有四十三位的說法。見衣若芬，〈俯仰之間：《蘭亭修禊圖》及其題跋初探〉，《中國學術》，第24期（2006），頁81-83。

⁴⁴ 吳高增輯，《蘭亭志》，卷二，收入《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35冊，頁86。

⁴⁵ 吳高增輯，《蘭亭志》，卷二，收入《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35冊，頁92。

⁴⁶ 該次聚會詩文，見吳高增輯，《蘭亭志》，卷十，收入《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35冊，頁291-316。沈其錫（生卒年不詳）詩文，見頁304。

⁴⁷ 吳高增，〈流觴曲水賦〉，收入吳高增輯，《蘭亭志》，卷二，收入《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35冊，頁87-89。

⁴⁸ 吳高增輯，《蘭亭志》，卷二，收入《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35冊，頁92-93。

根據說明及《今蘭亭圖》所見，康熙年間整修時，是築一方池（圖IV-26以紅線框起處），「壘石爲清書四字」，即《蘭亭志》另一處所說的「曲水疊石，成『天下太平』四字形」。⁴⁹圖IV-26上彎流的水道，可能就是以石頭疊起成文字、又成曲水的區域，但畫面上無法看出此四字形，且曲道完全未見水流的描寫、平靜無波，使《今蘭亭圖》上的曲水看來頗為平靜，徒具形式一般。

或許因為康熙年間之整建人工痕跡明顯，未獲當地菁英認同，纔有「水流其中，殊失天然之趣」的說法，及沈其錫詩「階前壘石定須刪」之句、吳高增〈隨杜使君秋禊議濬曲水〉等詩文，由此不難見出地方菁英對於刪改康熙年間之方池曲水的熱烈意見。⁵⁰後來在這群地方菁英的推動下，前後兩任紹興知府杜甲、鄭肇奎，投入蘭亭「復古」的重建工事。杜甲任上，由吳高增、陸振宗負責古蹟考察、各景繪圖。杜甲調任至杭州後，由鄭肇奎接續此事。鄭肇奎考蘭亭古蹟、重濬蘭亭曲水，更以地方菁英意見為依歸，將曲水疊石成「天下太平」四字悉數除去，另修整屋舍以供乾隆巡幸遊憩之用。⁵¹《蘭亭志》所收陸振宗繪「曲水新圖」（即《復古曲水圖》），展示的是經杜甲、鄭肇奎改建後之復古蘭亭的面貌。此圖與《今蘭亭圖》最大的不同，就是曲水位置已不見方池，而由大小不等的石頭，區隔出曲水彎道（圖IV-27）。整個曲水附近區域相較於康熙年間整修的樸素樣貌，多了許多大型疊石以豐富空間，此外，畫家還特意將曲水彎轉處的水流，畫得有如漩渦一般（圖IV-28）。這些佈置均顯示整建者與畫家想強調的，毋寧是復古蘭亭的「天然之趣」。由此來看，吳高增所編之《蘭亭志》，亦可說是他身邊這群地方菁英成功參與恢復蘭亭舊觀之重要歷史記錄。同時，透過《蘭亭志》書中詩文一再提及蘭亭當地之「御筆」、「宸翰」，亦不難想像吳高增及其社群成員對清代帝王的存在是深具意識。吳高增與杜甲等入積極投入紹興蘭亭重建之事，除希望榮耀地方之外，或許也期待可如王復禮般受到帝王的青睞，以增抬個人地位。⁵²

乾隆皇帝終於在一七五一年陰曆三月八日到了紹興蘭亭，觀賞到紹興菁英與

⁴⁹ 吳高增輯，《蘭亭志》，卷二，收入《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35冊，頁75。

⁵⁰ 「水流其中，殊失天然之趣」，出自吳高增輯，《蘭亭志》，卷二，收入《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35冊，頁75。吳高增，〈隨杜使君秋禊議濬曲水〉，吳高增輯，《蘭亭志》，卷九，收入《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35冊，頁279-280。其他相關詩文見同書，頁280-281。

⁵¹ 吳高增輯，《蘭亭志》，卷二，收入《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35冊，頁75、92-93；卷三，頁108-110；卷十，頁304。

⁵² 吳高增，〈蘭亭修禊詩（有序）〉、〈隨杜使君秋禊議濬曲水〉，吳高增輯，《蘭亭志》，收入《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35冊，卷十，頁291-292；卷九，頁279；相關詩文、跋，見卷十，頁292-316。

官員精心營造的「復古蘭亭」，但乾隆對此並未表示意見。⁵³倒是當日乾隆在蘭亭揮毫〈蘭亭即事〉詩，群臣恭和，吳高增等也「幸獲瞻仰」，隨後此詩被刻在康熙御書《蘭亭序》刻石碑陰（圖IV-29、圖IV-7）。⁵⁴似乎對乾隆來說，紹興蘭亭的「復古」新貌並不重要，畢竟那如何都已非蘭亭舊觀，但在此地如同他的祖父康熙一般，留下帝王的書法與詩文，展現其對漢人傳統文學、藝術的根基，豎立帝王致力於文治的形象，方為此行最重要的事。而對紹興當地人來說，皇帝能夠親臨紹興蘭亭，毋寧是此地入清之後最為榮耀的時刻，積極參與復古蘭亭之重建的吳高增等人，也立刻於乾隆南巡隔年（1752）出版《蘭亭志》。書中不僅刊印了由「歲貢生候選訓導」吳文煒恭摹康熙三十七年御書「蘭亭」二字，也刊載〈御製蘭亭即事〉之恭和詩文、蘭亭圖說、王羲之傳、禊帖等相關史料，其中最值得參考的，當屬書中所收清人續蘭亭會、蘭亭遊覽之相關詩文。透過此書編纂，可清楚看到在地方菁英的積極建議、參與下，紹興知府如何與地方菁英合作，重新打造蘭亭盛景。⁵⁵

雖然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中的紹興地區，分別因康熙欽賜御書及乾隆第一次南巡將至，熱熱烈烈地完成了兩次蘭亭的改造。康熙三十五年左右進行的修整，可謂為紹興蘭亭在清代恢復聲名的第一次頂點；乾隆十五年的那次，則是恢復蘭亭榮耀的第二高峰。但作為一知名的文化空間，在歷史長河中，「蘭亭」一詞早已轉變成一種文化標籤，續修禊會的舉辦也不需要一定在蘭亭。因此在清代唯一親臨蘭亭的帝王——乾隆——離去之後，紹興蘭亭似乎又歸於沈寂，如同康熙年整修之前的狀態一般，而難以與揚州、西湖等地之修禊活動相抗衡。

⁵³ 乾隆至紹興蘭亭的日子，根據《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三八四（乾隆16年3月上，8日），頁48下所記錄。

⁵⁴ 群臣恭和詩篇與吳高增等「幸獲瞻仰」之事，見吳高增輯，《蘭亭志》，收入《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第35冊，卷首，頁23-42；卷一，頁46。乾隆此次南巡，相關蘭亭的詩文共有三篇，分別為〈蘭亭即事〉、〈蘭亭恭詠〉與〈蘭亭禊詠〉，收入清高宗，《御製詩集》（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二集，卷二十五，頁19上-下。其中〈蘭亭即事〉註明「時三月八日」，但碑上並未寫明日期，其他二作很可能也完成於同日。

⁵⁵ 梅爾清書中已提到王羲之蘭亭會與「官方精英」之間關係密切的觀察。見梅爾清（Tobie Meyer-Fong）著，朱修春譯，《清初揚州文化（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頁67。

第二節 紹興蘭亭的狀況

清代文人、士大夫們所舉辦之續蘭亭會在史料中尋常可見，這些記錄在文集集中的集會雖以「修禊」、「上巳」為名，從文字史料對集會實際之運作狀況的記述看來，內容卻似乎與一般雅集差異無大。通常在續蘭亭會中，有唱和王羲之蘭亭會詩文之舉，或觀看《蘭亭序》書蹟、蘭亭圖繪等活動，這樣的內容大抵延續過往一般文人聚會相互唱和詩文、欣賞藝術收藏之例操作。清代的續蘭亭會在康熙初年已見先聲，進入十八、十九世紀之後，文人社群間行續蘭亭會者更是所在多有。不過，雖然紹興蘭亭在十七、十八世紀均有因帝王而起之大幅整修，但入清之後的十七世紀開始，作為王羲之蘭亭會遺蹟的紹興蘭亭，並非江南地區最受矚目之續蘭亭會舉辦地點。

1 十七世紀後半葉，南北續蘭亭會之舉辦

1-1 王士禛的紅橋修禊

清代初年，甚至可說是整個清代最為知名的修禊活動，應該可以康熙初年，王士禛（1634-1711）於揚州所主持的紅橋修禊為首。跨身藝文、政治兩界的王士禛，當時正於揚州擔任推官，雖然他年僅二十七，已具文名，王士禛於康熙元年（1662）及康熙三年（1664）在紅橋所舉辦的兩次修禊會，除在歷史上極為知名之外，亦是促成揚州「紅橋」從僅為方志上所標列的地名，轉變成當時重要之文化景點的契機。時至今日，紅橋早已是知名的歷史古蹟，由此可見王士禛本人及其紅橋修禊，在文化史上所具有的特殊意義。⁵⁶

「紅橋」因王士禛而聞名的情況，也與「蘭亭」因王羲之而名的情況相仿，但王士禛當年在紅橋所進行的修禊會，與王羲之蘭亭會的活動其實並無太多相似之處，兩次紅橋修禊也非於該年上巳日舉辦。目前所見一九七三年重建的「大紅橋」，已非當年王士禛修禊會時的樣貌，但紅橋下的寬廣水道，若對照一七九五年初刻的《揚州畫舫錄》，看來變動不大，大致可藉以想像清初紅橋水域之面貌

⁵⁶ 見梅爾清著，朱修春譯，《清初揚州文化》，頁 55-56、62。關於王士禛在紅橋所舉辦的續修禊會，梅爾清的著作已有細緻的討論，見其著作第二章「紅橋：人物與意義」。另可見李孝悌，〈士大夫的逸樂〉，〈士大夫的逸樂：王士禛在揚州（1660-1665）〉，頁 173-175。王士禛至揚州的年紀，見惠棟，《漁洋山人自撰年譜注補》，卷上，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紅豆齋刻本），頁 17 上。

(圖IV-30、圖IV-31)。⁵⁷倘若當日有水上流觴，可能如第三章所討論，與麟慶《鴻雪因緣圖記》之〈二插修禊〉一般作法(圖III-3)。雖然王羲之的蘭亭會有曲水流觴、臨水修禊、詩文競作、書法創作等多項活動，王士禛在紅橋的續修禊會，是以賦詩唱和為主，即便眾人一起唱和的過程多少帶有「競爭」之意，相較於王羲之蘭亭會「詩不成，罰酒三巨觥」的規定，王士禛的集會顯得較為輕鬆，雖然如此，王士禛舉辦的紅橋修禊，仍是將古典雅集典範的王羲之蘭亭會視為追隨的目標。⁵⁸

根據朱則傑研究，王士禛第一次紅橋修禊可能在康熙元年陰曆六月中旬舉行，第二次則在康熙四年三月初九，均非三月三日。⁵⁹梅爾清(Tobie Meyer-Fong)進一步指出，雖然王士禛舉辦修禊的日子不見得在春天，但他卻有意識讓世人記憶他的紅橋修禊是在春天舉行，讓他的集會能夠與王羲之蘭亭會連上關係，呼應於此典範。此外，王士禛也透過紅橋修禊的活動，積極強調自己與當時極具聲望之詩人作家，如林古渡(1580-1660)、杜濬(1611-1687)等長輩的親近密切。⁶⁰如梅爾清所言，王士禛的操作使紅橋修禊對參與者而言，「是一種共享價值與文化行動的表演，使得『集團內』的男性精英與社會的其他人員區別開來」。⁶¹換言之，王士禛之所以積極塑造紅橋修禊與蘭亭修禊之間的歷史連結，即因王士禛深知王羲之蘭亭會在集會傳統上的典範意義，此典範意義尤其適宜作用在「塑造群體」上。⁶²

值得注意的是，綜觀清代之續修禊會，不難發現王士禛紅橋修禊有取代紹興蘭亭，成為清代舉辦續修禊會之典範的情形。紅橋在王士禛之後，另有兩次修禊也經常被提起，分別為康熙二十七年(1688)孔尚任(1648-1718)與友人在紅橋的泛舟修禊，及被視為王士禛追隨者的盧見曾(1690-1768)，在乾隆二十年(1755)、二十二年(1757)舉辦的紅橋修禊。盧見曾的兩次聚會尤以第二次為

⁵⁷ 見梅爾清著，朱修春譯，《清初揚州文化》，頁56，注釋4說明。關於「紅橋」與「虹橋」之別，請見同書頁55的討論。感謝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生余玉琦協助拍攝揚州紅橋影像。

⁵⁸ 「詩不成，罰酒三巨觥」引文見桑世昌集，《蘭亭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據知不足齋叢書本排印)，頁7。

⁵⁹ 朱則傑，〈王士禛“紅橋修禊”考辨——兼談結社、集會、唱和三者之關係〉，《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7卷第1期(2015.1)，頁52-53。但梅爾清在《清初揚州文化》，一書中已有提到這個狀況，見梅爾清著，朱修春譯，《清初揚州文化》，頁65-68的討論。

⁶⁰ 相關討論見梅爾清著，朱修春譯，《清初揚州文化》，頁65-77。

⁶¹ 轉引自梅爾清著，朱修春譯，《清初揚州文化》，頁38-39。

⁶² 梅爾清書中已提到王羲之蘭亭會與「官方精英」之間關係密切的觀察。見梅爾清著，朱修春譯，《清初揚州文化》，頁67。

盛，據說追隨唱和者達七千餘人，並由李勉（1691-1755）繪《紅橋覽勝圖》，可惜此作未留存於世。⁶³ 王士禛的修禊活動目前看來是以賦詩唱和為主，且其修禊詩文甚受後人推崇。此外，若考慮王士禛載其紅橋修禊事的〈紅橋遊記〉所錄，他的紅橋之遊，一般會搭乘小船至紅橋，再「捨舟而陸」四處觀覽，那麼王士禛的紅橋修禊很可能也包含這些部分。⁶⁴ 進一步考慮孔尚任的修禊記載，透過其〈三月三日泛舟紅橋修禊〉、〈三月四日清明再泛舟紅橋〉等相關修禊紅橋或紅橋遊覽的詩句，以及孔尚任〈紅橋修禊序〉提到，「士女祓禊者咸泛舟紅橋，橋下之水若不勝載焉」，他亦「往來逐隊」，欣賞兩岸樹色風光的景象，那麼「泛舟紅橋」，應即紅橋修禊的重頭戲。⁶⁵ 至於紅橋修禊的水酒，或許可由兩岸成列的酒館取得，或許不需如王羲之蘭亭會般另外準備，因此這也可說是紅橋修禊的地域特色。⁶⁶ 雖然孔尚任〈三月三日泛舟紅橋修禊〉有「楊柳江城日未曛，蘭亭禊事共諸君」之句，可知孔尚任的修禊會名義上是追蘭亭的傳統，但其實更是繼王士禛之修禊典範而來。⁶⁷ 至於盧見曾的修禊，就其當時所作詩文內容來看，除飲酒賦詩外，也不離泛舟、遊覽等前人行事。⁶⁸ 紅橋所在位置為揚州西北域，此處除河川之外，附近並有保障湖，原本即是水鄉景色，而李斗《揚州畫舫錄》中也提到紅橋附近往來船隻眾多，因此「泛舟」，是此地遊覽的主要方式，紅橋修禊中有舟行、觀覽亦可說是此城市風貌之尋常。⁶⁹

整體來看，王士禛之例的特殊之處，是他將王羲之蘭亭會最重要的「書法」紀念品，轉換成「詩作」，亦即，這是種「典範轉移」的過程。王羲之蘭亭會最著名的紀念創作《蘭亭序》，在王士禛手中被轉換成詩文創造，且王士禛的詩文一樣萬古流芳，成為後人追尋仿學的典範。如康熙元年王士禛第一次紅橋修禊時

⁶³ 關於王士禛紅橋修禊的影響，見梅爾清著，朱修春譯，《清初揚州文化》，頁 51、77-83；胡遂、唐藝濤，〈紅橋修禊與清代士人之心態流變〉，《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9 卷第 1 期（2015.1），頁 87-89。李勉繪圖、孔尚任與盧見曾續修禊會的記載，見李斗撰，汪北平、涂雨公點校，《揚州畫舫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232、228-229、241-242。

⁶⁴ 惠棟，《漁洋山人自撰年譜注補》，卷上，頁 22 上-22 下。關於王士禛紅橋修禊唱和之情形，可參考朱則傑，〈王士禛“紅橋修禊”考辨——兼談結社、集會、唱和三者之關係〉，頁 53-55。

⁶⁵ 孔尚任，〈三月三日泛舟紅橋修禊〉、〈三月四日清明再泛舟紅橋〉，《湖海集》，卷四（清康熙間介安堂刻本），頁 13 下-14 上；〈紅橋修禊序〉，《湖海集》，卷九，頁 1 上-2 上。

⁶⁶ 孔尚任，〈三月三日泛舟紅橋修禊〉有「楊柳江城日未曛，蘭亭禊事共諸君。酒家只傍橋紅處，詩舫偏迎袖翠群。」見《湖海集》，卷四，頁 13 下。關於揚州紅橋兩岸的風光，見梅爾清著，朱修春譯，《清初揚州文化》，頁 58-59。

⁶⁷ 梅爾清透過分析孔尚任的〈傍花村尋梅記〉，即指出孔尚任將王士禛在紅橋的集會視為紅橋史上之轉折點。見梅爾清著，朱修春譯，《清初揚州文化》，頁 55，注 2。另，孔尚任，〈傍花村尋梅記〉，《湖海集》，卷八，頁 31 上-下。

⁶⁸ 見李斗撰，汪北平、涂雨公點校，《揚州畫舫錄》，頁 228-229。

⁶⁹ 如李斗撰，汪北平、涂雨公點校，《揚州畫舫錄》，頁 251-253。

作〈浣溪沙〉三首，其中「北郭清溪一帶流，紅橋風物眼中秋，綠楊城郭是揚州。」一句，宛若揚州城之代言，追和者眾。雖然如此，若從蘭亭會的歷史來看，即使在王士禛手上詩文積極取代書法，成為另一種續蘭亭會知名的紀念產物，但「詩文」仍屬傳統蘭亭文化中的一個尋常活動，並非創舉，故筆者並未將王士禛紅橋修禊視為清代續蘭亭會之嶄新創造。

1-2 冒襄之水繪園修禊

除紅橋修禊之外，康熙四年（1665）冒襄在水繪園所舉行的修禊會，也是清初頗為知名的一次續修禊會。冒襄位於如皋（今江蘇南通）的水繪園，有洗鉢池、小浯溪等水道會於其中，此園在順治年間（1644-1661）已是知名的文化場域。關於康熙四年上巳的水繪園修禊，李孝悌已有詳細討論。此次修禊，是一場知交間的私人盛會，王士禛、陳維崧（1625-1682）、邵潛（1581-1665）等八人，參與此會。⁷⁰會中有詩文、備美酒，是基本的，但更讓參與者心醉的，恐怕是宴飲、絲竹、戲曲、歌妓、泛舟洗鉢池等的「狂歡」安排。⁷¹此次修禊，對場所的布置更是精緻脫俗，如王士禛所記錄，「漏下二鼓，以紅碧琉璃數十枚，或置山巔，或置水涯，高下低昂，晶熒閃爍，與人影相凌亂」。⁷²如此精美的空間布置，似是其他修禊會所未見，但這樣的空間陳設與活動內容，其實是冒襄水繪園聚會的尋常模式。⁷³值得注意的是，此會中，冒襄以其收藏的文徵明《蘭亭修禊圖記》卷，與眾人同觀。根據冒襄記載：

枕煙亭几上有文待詔《蘭亭修禊圖記》一卷，卷素朱黹碧隱，茂林修竹，
罽□（案：上四+下歷）嫵娟，展玩如與王、庾諸子弟捉麈面談。⁷⁴

冒襄收藏的這件《蘭亭修禊圖記》，見其描述，應為圖畫、題記均備的作品。在

⁷⁰ 李孝悌，〈士大夫的逸樂：王士禛在揚州（1660-1665）〉，頁 170-173。此次修禊相關記載，見陳維崧，〈水繪園修禊詩序〉，《陳迦陵文集》，卷一，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四部叢刊景清本）。

⁷¹ 「狂歡」的形容，出自李孝悌。見李孝悌，〈士大夫的逸樂：王士禛在揚州（1660-1665）〉，頁 171。

⁷² 轉引自李孝悌，〈士大夫的逸樂：王士禛在揚州（1660-1665）〉，頁 172。

⁷³ 李孝悌提到，如此次水繪園修禊的活動內容，平時即以不同的組合方式在此園中舉行。見李孝悌，〈冒辟疆與水繪園中的遺民世界〉，頁 96。

⁷⁴ 轉引自李孝悌，〈士大夫的逸樂：王士禛在揚州（1660-1665）〉，頁 172。

修禊會中出示《蘭亭序》書蹟或相關畫作與眾人同賞，本也是續蘭亭會中常見的一個節目，但入清之後，文徵明的蘭亭書蹟或圖繪，似乎在文人圈中頗為知名。如清代《蘭亭序》專家王文治，也曾為潘蓮巢（生卒年不詳）摹文徵明的《蘭亭圖》題跋寫到：

蘭亭之遊，古人勝事也。《蘭亭》之敘，古今聖書也。唐宋以還，善書者多臨《蘭亭》，善畫者亦喜畫蘭亭。然書與畫，往往不能合璧，好事者惜之。文待詔有《蘭亭圖》，山水幽深，人物工妙，乃其用意之作。獨怪待詔工書，而傳色之後，悒於揮毫。茲蓮巢取而摹之，參用董法，幾有出藍之奇。余復戲臨褚本《蘭亭》於尾以足之。以畫法言，則文當畏董，以書法言，則褚可助歐。一時寄興之作，聊以博鑒古家哂之云爾。⁷⁵

雖然目前無法確定冒襄及王文治所見的文徵明作品面貌，但傳世確實有不少繫於文徵明名下的《蘭亭圖》，如北京故宮博物院的《蘭亭修禊圖卷》、遼寧省博物館藏《祝允明書蘭亭序文徵明補圖卷》、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蘭亭修禊圖軸》等，而拍賣場中，亦可見為數不少之文徵明款的《蘭亭修禊圖》手卷與扇面（圖IV-32～圖IV-36）。這些作品品質參差，絕大多數均為偽作，但也足以彰顯文徵明的蘭亭圖在晚明之後大受歡迎的現象。

1-3 馮溥之北京萬柳堂的修禊會

除南方之外，清初北方亦有續修禊會的舉辦。康熙年間，北京最知名的修禊活動，應屬文華殿大學士馮溥（1609-1691）在其私宅萬柳堂，所舉辦的修禊會，當時可謂盛況空前。⁷⁶

康熙十八年（1679）首開博學鴻詞科，陰曆三月二十日「試畢揭曉」後，馮溥與應試者三十二人修禊於廣渠門內的萬柳堂，毛奇齡（1629-1713）、朱彝尊

⁷⁵ 王文治撰，劉奕點校，〈蘭亭圖跋〉，《王文治詩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頁666。

⁷⁶ 清代提到馮溥續蘭亭會之文集甚夥，且內容也大抵會提到王羲之蘭亭會，如戴璐，〈東城〉，《藤陰雜記》，卷六，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嘉慶石鼓齋刻本）；李調元，〈萬柳堂四首〉，《童山集》，卷三十二，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乾隆刻函海道光五年增修本）。相關研究見鄭永華，〈清代萬柳堂與北京園林文化〉，《明清論叢》，第13輯（2014.1），頁267-269。

(1629-1709)、陳維崧等均為座上賓。⁷⁷根據馮溥當時與之後的文集記錄，萬柳堂在馮溥時代，占地約一頃多，其內楊柳高聳連綿，故名「萬柳」，而此地本即原隰積水處，園中闢有蓮塘、花嶼，也是一適合修禊臨水之地。⁷⁸馮溥萬柳堂的修禊集會，乃當時文化界盛事，在許多文人心中留下了難以忘懷的記憶。甚至馮溥退休之際康熙皇帝還特別賜遊西苑，並於「曲澗浮花」流杯亭休憩。馮溥召集博學鴻詞科應試者相聚修禊，必然也是肯定王羲之蘭亭會所具有之「塑造群體」的特質，故欲藉由盛大之續蘭亭會的舉辦，號召「賢才群聚」。此除可攏絡這批早已聞名海內的飽學之士，並可藉以昇抬馮溥自身在文化與政治上之地位。此後，繼馮溥召開的修禊集會也不少見。如乾隆十七年(1752)，李薦青(生卒年不詳)於拈花庵(即萬柳堂後來的名稱)所主持的修禊活動，當時有二十二人一同與會，會後除彙編詩文集之外，並請石星源(約1696-?)繪《萬柳堂修禊圖》。⁷⁹另外，由黃爵滋(1793-1873)、汪喜孫(1786-1848)等六人所主持，道光十六年(1836)陰曆四月四日，在北京陶然亭召開的「江亭展禊」，也是具有承續馮溥萬柳堂修禊之意的一次聚會。⁸⁰

大抵而言，除前文所討論之南方的紅橋修禊、水繪園修禊，或北京的萬柳堂修禊之外，在文人文集中也泛泛可見文人相招修禊的記錄。因此可知入清之後的十七世紀如同過往一樣，文人社群對於王羲之的蘭亭修禊仍十分嚮往，但所進行的活動，亦未溢出過往的修禊安排或有其他新的活動設計。例如王士禛的紅橋修

⁷⁷ 見陳維崧，〈萬柳堂修禊倡和詩序〉，《陳檢討四六》，卷八（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13下-16上；毛奇齡，《制科雜錄》，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昭代叢書本），「自發榜後二日尚未授職，益都師復修禊于萬柳堂」條；王嗣槐，〈萬柳堂修禊詩序〉，《桂山堂詩文選》，文選卷一，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康熙青筠閣刻本）。

⁷⁸ 黃爵滋提到此次聚會地點在崇文門外，可能只是略指應在廣渠門內之萬柳堂的方向。見黃爵滋，《儂屏書屋初集年記》（臺北：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據清道光刻本影印，1968），頁286。萬柳堂的位置，見孫冬虎，〈元清兩代北京萬柳堂園林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21卷第2輯（2006.4），頁37。關於萬柳堂環境的記載，見黃鈞宰，〈拈花寺〉，《金壺七墨》，金壺浪墨卷六，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同治十二年刻本）；李稻暉，〈上已萬柳堂讌集同諸君和相國馮夫子韻二首〉，《梅會詩選》，一集卷五，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乾隆三十二年寸碧山堂刻本）；劉大櫟，〈遊萬柳堂記〉，《海峰文集》，卷五，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刻本）。

⁷⁹ 李薦青修禊相關記載，見陳康祺，《郎潛紀聞》，卷八，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光緒刻本）；樂鈞，〈萬柳堂脩禊圖一百韻為槐亭題（并序）〉，《青芝山館詩集》，卷二，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嘉慶二十二年刻後印本）。其他修禊於萬柳堂者，如劉嗣綰，〈閏上巳邀同人萬柳堂修禊〉，《尚絅堂集》，卷四十三，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道光樹園刻本）。關於馮溥續修禊會之影響，見鄭永華，〈清代萬柳堂與北京園林文化〉，頁269-271。

⁸⁰ 相關研究見新村容子，〈1820-30年代北京的士大夫交流（4）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四日「江亭展禊」を中心として〉，《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第55期（2011.7），頁45-65。感謝東京大學博士課程楊雅琪女士代尋此文！

禊雖在清初名滿大江南北，往往被視為清代續修禊會的代表，但其活動如唱和詩文、舟行攬勝，早在唐代白居易、劉禹錫等於開成二年（837）洛水之濱所參與的修禊聚會中已見先聲。⁸¹這種現象或可說是歷史長流之中，各種文人雅集裡所安排的活動，如作詩為文、彈琴、下棋、同觀書畫，或登舟遊覽、宴飲、聽戲等，已交互揉合，可隨意選擇、搭配的結果。而修禊在長久的發展過程中，即便不在三月三日舉辦、沒有修禊儀式、無「曲水」供流觴，只要集會主唱者提議該次聚會為修禊，大抵也不會有人反對。但修禊會的舉辦，仍有一個千年不變的條件，可說是修禊雅集的主要特色之一，即「務須臨水」的這個條件。修禊古俗，原本就不能離水為之，也因此不論在公共場所或私人園林舉行續修禊會，即使會中並無修禊儀式，仍需挑選一個鄰近水域、伴有戶外的空間處所，此乃是辦理續修禊會的最基本條件，而這也是王士禛選擇紅橋，冒襄、馮溥分別在以水色知名的私人園林中，舉辦續修禊會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續修禊會對於文人社群「塑造群體」與典範化主辦者的這兩個功能上，也特別有作用。因此如王士禛、冒襄與馮溥等主人，均與該次修禊齊名，這也是文人社群經常以修禊為名目聚會的因素之一。

2 十八世紀，紹興蘭亭的沒落

雖然康熙年間以帝王為首，對於紹興蘭亭的重建可謂用心，但就作為續修禊會之地點的地位而言，實無法與王士禛的紅橋修禊相抗衡，甚至杭州西湖後來也成為江南文人舉辦續修禊會的另一個選擇。如乾隆十一年（1747）潤三月三日，杭州知府鄂敏（又名：鄂樂舜，？-1756）「擬蘭亭」於西湖畔。⁸²此次續蘭亭會的參與者有八十一名，包含金農（1687-1763）、丁敬（1695-1765）、厲鶚（1692-1752）等知名藝術家、文人。其中鄂敏與舒瞻（字雲亭）均為滿人，王緯則為漢軍鑲黃旗人，其他參與者則以浙江當地文人、僧侶、官員為主，此外亦有數人來自外地。這次雅集的記載並不多見，但續修禊會之後，鄂敏曾彙刊眾人詩文為《西湖修禊

⁸¹ 李孝悌，〈冒辟疆與水繪園中的遺民世界〉、〈士大夫的逸樂：王士禛在揚州（1660-1665）〉，收入氏著，《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頁 81-134、159-200；平岡武夫，〈三月三日 上巳 洛濱修禊——白氏歲時記〉，《漢學研究》，第 16、17 號（1978），頁 89-106。感謝學友楊雅璠在日本代尋此文。另可見土谷彰男，〈洛漕斗門考——白居易「三月三日祓禊洛濱」詩をめぐって〉，《中國詩文論叢》，第 33 集（2014.12），頁 207-220。

⁸² 見鄂敏，〈序〉；周京，〈後序〉，王其煌標點，《西湖修禊詩》，收入王國平主編，《詩詞曲賦及楹聯專輯》（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頁 630；649。

詩》，鄂敏自為序，周京（1677-1749）為之撰後序，並由主持杭州聖因寺等寺院之僧人明中（1717-1767）為集會繪圖，此作似乎亦不存於世。⁸³此次鄂敏所召集的續蘭亭會，除日期仿效王羲之蘭亭會之外，亦「效蘭亭體，賦四言五言」，當然也水酒無缺。⁸⁴根據孫陳典、汪臺等人詩文，集會者亦有泛舟西湖之遊。⁸⁵

除鄂敏的續蘭亭會之外，尚有其他修禊西湖的記載。如錢陳群（1686-1774）曾有詩提到，「即今上苑天中賞，憶昨西湖修禊嬉」；王文治（1730-1802）也曾於乾隆四十三年（1778）上巳後一日，與袁枚等補修禊於西湖。⁸⁶此外，阮元（1764-1849）有〈癸丑（乾隆 58 年〔1793〕）立夏後七日桑大雲柯以西湖修禊詩見示率成律句報之〉詩，是回應於桑庭樞（桑調元〔約 1695-1771〕孫）的西湖修禊詩。⁸⁷如此看來，作為公共休閒空間的「西湖」與「揚州紅橋」相同，均為十七、十八世紀清代文人社群所喜愛的集會場所。對照於此，在紹興蘭亭舉辦的續修禊會則甚少見到史料記載，顯示出紹興蘭亭在十七、十八世紀的沒落。似乎，僅剩下地方仕紳會於此地舉行集會了。

揚州紅橋有清初全國知名文人王士禛加持，杭州西湖則有林逋、蘇軾等歷代名人作為其文化標籤，與此相較，蘭亭除以西元四世紀王羲之蘭亭會最為出名之外，就未再出現聲勢可相比擬的人事可供記憶、追尋。加上蘭亭地處偏遠，也很可能是造成遊人少至的原因之一。⁸⁸雖然吳高增《蘭亭志》言及康熙御書碑亭建立之後，「遊人過客觴咏於茂林修竹之間，殆無虛日矣」，但不難想像這也是一種修辭的描述。就此來看，清代帝王在紹興蘭亭整修之參與，對蘭亭的地位並未有

⁸³ 事見吳振棫，《養古齋叢錄》，卷七，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光緒刻本），「蘭亭之會」條下。周京資料見王兵，〈明清文士周京生平及其入清後游幕考〉，《成大歷史學報》，第 50 號（2016.6），頁 130-131。

⁸⁴ 鄂敏等撰，王其煌標點，《西湖修禊詩》，收入王國平主編，《詩詞曲賦及楹聯專輯》，頁 631。

⁸⁵ 孫陳典、汪臺詩文，見鄂敏等撰，王其煌標點，《西湖修禊詩》，收入王國平主編，《詩詞曲賦及楹聯專輯》，頁 632-633、635。

⁸⁶ 錢陳群，〈恭和御製午日奉皇太后圓明園觀競渡元韻〉，《香樹齋詩文集》，卷十八，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乾隆刻本）；王文治，〈上巳後一日同袁簡齋前輩吳西冷布衣暨諸子補脩禊於半舫齋得之字〉，收入王文治著，劉奕點校，《王文治詩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頁 313。

⁸⁷ 桑庭樞原詩應完成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阮元，〈癸丑立夏後七日桑大雲柯以西湖修禊詩見示率成律句報之〉，《兩浙輶軒錄》，卷三十七，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嘉慶刻本）。

⁸⁸ 清代余攀〈敬瞻新建蘭亭記〉提到他遊覽康熙年新整修的蘭亭，由「邵鎮署」（應為紹興官署）出發，需「舟行二十餘里，山行尚八、九里。」這個路程若按今日尺寸換算，清代一里為今日五百七十六公尺，即舟行約十一點五二公里（約中山高速公路「基隆交流道」至「高架道路汐止端」路程），再步行四點五至五公里（約「五堵交流道」至「汐止交流道」路程）。余攀〈敬瞻新建蘭亭記〉，王復禮編，毛奇齡校，《御覽孤山志》，「藝文」頁 44 下；吳承洛，《中國度量衡史》（上海：上海書店，1984）；中華民國交通部國道高速公路局網頁，「交流道、服務區里程一覽表」，網址：<http://www.freeway.gov.tw/Publish.aspx?cnid=1906&p=4617>，檢索日期：2017-11-20。

積極提昇的作用。或許對士人社群而言，滿州帝王再如何嫻熟漢文化、如何尊崇王羲之，終究不過是局外人（outsider）。



第三節 小結

康熙初年的十七世紀中期開始，地方士人的修禊會於各地都有舉辦，但王士禛在揚州的紅橋修禊是此間最知名者，可謂為清代續修禊會的代表。但不論是紅橋修禊、冒襄的水繪園修禊、馮溥在北京的萬柳堂修禊，或者後來的西湖修禊，從蘭亭傳統的角度來看，均未見富有時代新義的修禊活動。然而透過前文討論，可了解這些主持人或參與者，均深切體認到王羲之蘭亭會作為雅集典範，在「塑造群體」與典範化主持者這兩件事情上，具有實質作用。除此之外，相較於紅橋、西湖等地，作為王羲之蘭亭會之正統史蹟的紹興蘭亭，明顯處於沒落的境遇。

十七世紀下半葉的康熙十二年，紹興蘭亭第一次整修當時，僅可說是許宏勳做為地方官員必須克盡己則，保守地方榮耀之蘭亭遺蹟的舉動。此作法乃延續自明代紹興官員的治理態度。然而此時的紹興蘭亭並不受文人社群所重，在這裡所舉辦的續蘭亭會史料記載無多，故蘭亭作為知名歷史勝景，實際僅存在於詩文與追想之中。

紹興蘭亭在入清後第一次達到聲譽頂點，是由皇帝身邊的近臣所主導。而錢塘人王復禮所編纂的《御覽蘭亭孤山志》之觀眾設定，毋寧說是以康熙皇帝為主要對象，並非針對地方官員或在地菁英社群。雖然王復禮無官職在身，與主掌此事之高官敖福合等似乎也無任何關係，但王復禮的書，卻具有相當濃厚之官方立場。《御覽蘭亭孤山志》中，不僅「奏疏」中有王復禮進呈此書的說明，「欽褒」所收之〈今上諭令碑亭祠堂議〉，也將此次蘭亭改建之細節詳加記載，但行文、用語極似公文奏摺所見，讀來感覺此文是直接抄錄自公文記錄。此外還有敖福合的〈建亭立碑疏〉與毛奇齡〈御覽蘭亭孤山二志跋〉，分別記述此次建設過程及王復禮受康熙嘉勉的狀況。⁸⁹而《御覽蘭亭志》中收入「藝文」的文章，清人除余攀、林雲銘（順治十五年〔1658〕進士）各收一篇之外，僅剩王復禮個人之文，且數量共有五篇達全書之冠。值得注意的是，書中對於蘭亭當地其他

⁸⁹ 王復禮編，毛奇齡校，《御覽蘭亭志》，「奏疏」頁1上-下；「欽褒」頁31下-32下；敖福合，〈建亭立碑疏〉，《御覽孤山志》，「藝文」頁27下-28上；毛奇齡，〈御覽蘭亭孤山二志跋〉，《御覽孤山志》，「藝文」頁64上-66下。。

人或其他社群的修禊唱和詩文，完全沒有收載。⁹⁰因此十分清晰，王復禮撰寫此書的目的就是針對帝王個人。至於 敖福合等主事官員，他們體察上意、熱切執行蘭亭重建工程，似乎也並非基於如同父母官般保守茲土的心情，而是希望獲得帝王的賞識與讚譽。倒是如王復禮所指出，「(歷代蘭亭)雖屢經興廢，代致褒揚，然未有賜額建祠如今日者」，顯示康熙對於蘭亭似乎有相當大的興趣，而此興趣可能不僅止為了彰顯其文治之功。如同第三章所討論，康熙本人還在宮廷中創造了「天趣蘭亭」流杯亭，顯見康熙對王羲之蘭亭會之文化傳統的深切喜好。⁹¹

第二波紹興蘭亭聲望復興的歷史高峰，是由地方官員與在地菁英所共同成就，他們不僅進行續蘭亭會，也熱烈合作「復古蘭亭」之建設。不論在地官員如杜甲、鄭肇奎，或菁英社群的領導者吳高增、桑調元等，即使他們並未表明所以推動、投入蘭亭改建的原因，就筆者觀察，這些執行者其實也都熟悉王羲之蘭亭會之典範意義。由於對於蘭亭會在「塑造群體」與典範化主持者的作用明瞭於心，因此他們攜手投入蘭亭建設，除可振興地區之外，也各自獲取當代及歷史的定位。地方官員對蘭亭勝景之建設，是蘭亭地方官員一直以來的傳統，但就在地菁英吳高增編《蘭亭志》的目的而言，卻與王復禮大不相同。《蘭亭志》的觀眾設定是以地方菁英為出發，因此書中將社群之續蘭亭會等相關活動，及參與蘭亭復興之歷史作為，紛紛編寫入《蘭亭志》中，以獲取群體共鳴。當然，由書中對康熙、乾隆之熱烈讚譽，也不難看出編者希冀吸引帝王目光的心意。不論如何，透過積極參與蘭亭建設與《蘭亭志》的編寫，對吳高增與杜甲塑造他們社群的群體感、典範化其個人而言，都是深具意義的。

此外，誠如前文所言，大多數的續修禊會早已成為文人聚會的一個理由，對於續蘭亭會該如何把握其原始內涵或精神，多不在後續者的考慮範圍之內，或許因此，後世遠追王羲之的續修禊會通常與一般文人雅集差異不大。進一步來考慮，若文化遺產通常無法離開原始發生地於異地存活，一旦離開，很可能轉變成徒具形式的表象仿作。以此來思考續蘭亭會為何可以不在紹興舉辦（但須臨水）、不拘泥舉辦日期，也不限定一定要從事哪些活動，卻依舊令各地士人熱烈參與。那麼這種續蘭亭會，是否也成了徒具形式的模仿呢？確實，只因襲前人，並僅作為一種集會之名目的續蘭亭會，並不容易於歷史中引人注目。但從反面來看，也正是因為續蘭亭會可以移地舉辦、可以加入參與者喜歡的活動形式，當一個傳統可

⁹⁰ 王復禮編，毛奇齡校，《御覽蘭亭志》，「目錄」頁7下-10下。

⁹¹ 王復禮編，毛奇齡校，《御覽蘭亭志》，「奏疏」頁1下。

以被有意識地重新塑造、加入新元素使之活化之後，危機的另一面正是轉機之所在。而這也是本論文企圖在清代宮廷內外，找到為王羲之蘭亭會注入源源活水之續蘭亭會的成功案例，藉以探究一個長遠的傳統如何歷久而彌新。

雖然十七世紀後半至十八世紀前期的續修禊會，似乎未見時代新意，但到了十八世紀晚期，有兩個清代宮廷外部的修禊集會值得特別留意。分別為紹興知府李亨特（?-1815）在紹興蘭亭舉辦的續修禊會，及畢沅（1730-1797）幕僚劉錫嘏（乾隆 34 年〔1769〕進士）之武昌借園修禊。這兩個集會，一個在紹興蘭亭當地舉行，一個遠在武昌舉辦，但兩者均有加入參與者的特殊興趣，這個興趣與清代流行的雅集圖繪與金石學術息息相關。他們藉由活水之傾注，活化蘭亭傳統的作為，同時也具有回應時代新風尚之表現。這兩個個案，將在下一章進行討論。

第五章 | 塑造群體之實踐：宮廷外部續蘭亭會之傳統重塑與意義

雖然輔佐官員之幕賓的設置，很早就有，但清代幕府的存在，可謂為清代官場文化中非常具代表性的一種現象。這些幕賓群體，不僅於官場上有所作用，更有不少幕賓為當時的知名學者，對於清代金石考據學、史學、地理學等方面，都有非常卓越的建樹。¹本章將處理兩個十八世紀末的續蘭亭會，分別為乾隆五十七年（1792）紹興知府李亨特邀集幕賓，於紹興蘭亭舉辦的續蘭亭會，以及乾隆五十八年（1793）畢沅（1730-1797）幕賓劉錫嘏（乾隆三十四年〔1769〕進士）在武昌所舉行之借園修禊。這兩個續修禊會，均是以幕賓成員為主要參與者，但因主持人的身分不同，以及參與者對蘭亭傳統的興趣各異，而有非常不同的表現，此尤其特別顯示在這兩個群體的蘭亭「紀念物」上。本章預期透過對此二宮廷外部幕賓群體之續蘭亭會的討論，進一步了解清代早期幕僚組織參與蘭亭傳統的其一面貌，及作用於群體塑造的方式。

第一節 乾隆五十七年（1792）紹興知府李亨特於紹興蘭亭舉辦的續蘭亭會

如前一章所述，經過明末動亂之後的紹興蘭亭，在康熙、乾隆的兩次整修期間，分別為此地注入了活水，由於整建工程與帝王相關，從而創造了紹興蘭亭在入清之後的兩次光榮時刻。但隨著一七五一年乾隆的離去，蘭亭似乎又回歸清靜的日常，並未因此成為清代續蘭亭會的熱門場地。這樣的景況一直到李亨特上任為紹興知府之後，方才造就了紹興蘭亭的另一次榮耀。

紹興知府李亨特（?-1815，監生）為漢軍正藍旗人，以監生捐布政使理問（從六品），他於乾隆五十五年（1790）任職紹興，五十七年又調杭州府知府。²李亨特於政治史上所獲得之評價頗為低劣，但在文化上仍有其建樹，例如，他在紹興知府任上著力於蘭亭聲望之重建即是一例。李亨特之祖父李宏（?-1771）、

¹ 關於清代幕僚文化的研究頗眾，可參閱如陳金陵，《清代乾嘉文人與文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尚小明，《學人游幕與清代學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全增嘏，〈清代幕僚制度論〉，《思想與文化月刊》，第31期（1944），頁29-35；全增嘏，〈清代幕僚制度論（續）〉，《思想與文化月刊》，第32期（1944），頁35-43。

² 李亨特任官資料，參見 V-表一「出處」。

父親李奉翰(?-1799)及他本人,最初均是靠捐納作官。李亨特在離開紹興官職後,於嘉慶九年(1804)繼其祖父、父親擔任東河總督統理河事,但相較於其長輩的優良名聲,李亨特曾遭流放三次,此次數居清代遭流放官員中之首,《清史稿》更以「貪侈隕績,忝祖父矣」給予惡評。³固然靠捐納踏入仕途者未必毫無建樹,但普遍而言,捐納者多為士人所輕,這種社會氛圍李亨特應了然於心。或許一方面對自己出身敏感,同時李亨特個人對於藝文可能也有特殊愛好,或僅為追逐風流,總之,他在擔任紹興知府期間,除積極與當時名士如袁枚(1716-1797)、錢泳(1759-1844)等往來,也投入金石、古蹟修護之事。⁴特別的是,李亨特藉由紹興蘭亭這個享有歷史盛名的古蹟及蘭亭會傳統,塑造其個人之文化身份、塑造以他為中心的群體共感,並欲達將自我典範化的目的,當然,這也是提增其政治聲望的有效手段。以下,筆者將從李亨特的續蘭亭會,來檢視他如何藉由集會的舉辦、圖象的製作與方志的編輯,以達「塑造」之功。

1 李亨特的續蘭亭會

乾隆五十七年(1792)三月上巳,李亨特在紹興蘭亭召集了一次隆重的續蘭亭會,共邀集二十一位幕賓、友人參與此會(V-表一)。會後特請丁健、陳栻(均生卒年不詳)、闕嵐(約1756-1844)繪《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畫後並附有李亨特前序與姚興潔(1756-1819)之記,徐嵩為該會所寫的后序,收錄到李亨特主導的《紹興府志》(乾隆五十七年刊行)中,並未以書寫的方式跋入該畫卷後。⁵李亨特的作法,簡而言之,即是藉由圖象與文字二種形式、透過畫卷與書

³ 周軒,〈一生流放三次的河督李亨特〉,《紫禁城》,1993年第4期,頁36-38;趙爾巽,《清史稿》,列傳一百十二「李宏」條(民國十七年〔1928〕清史館本),頁10859;列傳一百十三,頁最後[論]。

⁴ 作為當時藝文圈標誌性的人物的袁枚,參加過王士禛的揚州紅橋修禊,李亨特與其關係頗佳,袁枚留有數篇與李亨特相關的詩文,如〈重修錢武肅王廟記(代杭州李太守作)〉等。見袁枚,〈重修錢武肅王廟記(代杭州李太守作)〉,《小倉山房集》(清乾隆刻增修本),外集卷8,頁15上-18上。書法家錢泳原為畢沅幕賓,他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轉至李亨特處參與《(乾隆)紹興府志》編纂工作。見盧慧紋,〈碑與帖的交會——錢泳《攀雲閣帖》在清代書史中的意義〉,《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31期(2011.9),頁210。李亨特投入金石、古蹟維護之事,如其尋舊拓本重刻《會稽碑》,或修冗、增建嘉靖三十九年(1560)重建之錢塘表忠觀等事。見阮元,〈秦會稽石刻〉,《兩浙金石志》,卷一,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道光四年〔1824〕李樞刻本);阮元,〈重修表忠觀記〉,《學經室集》三集卷四,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四部叢刊景清道光〔1821-1850〕本),表忠觀即供奉錢武肅王,由李亨特請袁枚代筆書記,顯見他對此事之慎重。

⁵ 徐嵩後序亦收入其《玉山閣古文選》卷四中。見朱則杰、盧高媛,《履園叢話》“蘭亭”條與李亨特“續蘭亭修禊”考論,《浙江學刊》,2015年第5期,頁107。

籍二種載體，來記念整個集會的舉辦（圖 V-1、V-表二）。⁶此卷引首「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為乾隆朝大學士梁師正（1697-1763）子梁同書（1723-1815）於一七九二年所書（V-表三、V-表四）。梁同書當時書名甚高，與劉墉（1719-1805）、王文治（1730-1802）並稱於時，李亨特應是特請其書寫引首。⁷此卷的裝裱上，另有兩個簽條，一為某癸丑年梁氏所題，名字以下殘破無法辨識；另一為二十世紀書畫家鄧春澍（1884-1954）於一九三二年所書，內容與梁同書所題相同，均為作品名稱。其中，梁氏簽條很可能受李亨特所託，寫於一七九三的癸丑年。引首之後為畫面本幅，尺寸高六十九公分，長三百六十九公分，為高頭大卷，畫上主題描寫的是李亨特等在紹興蘭亭的續修禊會。畫中人物以數組分布於山水松竹、川流亭子之間，青綠設色飽滿清淨，雖然用色還算收斂，但幾個深著艷麗石青色上衣的僮僕，彷彿畫龍點睛一般，使此續蘭亭會散發出一種低調的奢華感。本幅後端之拖尾有三十三人題跋，略去二十世紀題跋者鄧春澍不論，題跋年代分別落於一七九二至一八一二年之間（V-表三、V-表四）。題字者如慶桂（1737-1816）、黃易（1744-1802）、趙翼（1727-1814）、吳錫麒（1746-1818）等多未參與此會，但其身分主要為知名文士與中央高級官員。整個雅集的舉辦及《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的製作，可說是李亨特精心策畫的結果，十分值得詳細探究。首先，筆者將先從李亨特續蘭亭會的舉辦開始討論。

根據《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李亨特、徐嵩的前後序與姚興潔的記錄，主因正在編輯《紹興府志》，李亨特延攬了許多幕友前來紹興，而舉辦了這次的續蘭亭會（見 V-表二）。不難想像此時的紹興人才濟濟，一片文藝氣息。或許因此，讓李亨特聯想到王羲之當年與多位或具有官銜或深富文名的好友，於紹興蘭亭舉辦的集會盛事，加上此地正為紹興，因此邀集其幕客，同時特別延請了當時的文壇祭酒袁枚，前來山陰共此盛會。⁸袁枚的出現，無疑是這個續蘭亭會中最閃耀的一顆文壇巨星，李亨特的安排，毋寧是希望藉由袁枚的出現，可以照亮他個人及以其為中心的幕賓群體。李亨特雖出身官場，卻是靠捐納而來，能夠透過與文壇領袖的交結來提增其文化身分，對李亨特而言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操作。

⁶ 李亨特續蘭亭會相關研究，見朱則杰、盧高媛，〈《履園叢話》“蘭亭”條與李亨特“續蘭亭修禊”考論〉，頁 105-110。本文主要試圖釐清此集會舉行的年代，並考證姚興潔身分，但對於畫面分析與此圖之製作意圖，並未多述。筆者為進行《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之研究課題，曾親赴中國藏家處觀覽原蹟，對於藏家之慷慨協助，筆者特別於此致謝。

⁷ 梁同書傳，參見 V-表四。

⁸ 王羲之蘭亭會參與者名錄，見桑世昌輯，《蘭亭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據知不足齋叢書本排印），頁 2-7。

除此之外，既然此續蘭亭會是在王羲之蘭亭會的發生地——紹興蘭亭——舉行，從蘭亭會、蘭亭的歷史，來定義自身的續蘭亭會，也是李亨特所注意到的事。李亨特自敘中，因此特別記載了紹興蘭亭當地曾發生過之重要事蹟。李亨特提到：

大歷（766-779）中，吳均等三十七人經蘭亭故地聯句，不甚傳。明陳鶴（？-1560）與荆川尋蘭亭舊約，與會者亦未顯。嘉靖（1522-1566）間，郡守沈啓（1490-1563）修蘭亭，文徵明（1470-1559）記之，而稷事未舉。國朝聖祖仁皇帝臨幸，御書大字「蘭亭」，貞珉載勒，星雲爛如。皇上南巡，過蘭亭製詩，近又諭刻「八柱蘭亭」，蓋於斯為盛矣。（見 V-表二）

根據李亨特序，紹興蘭亭自王羲之之後，只有唐人聯句之會及明代「尋蘭亭舊約」兩次續蘭亭會值得被記載，此外如沈啓雖整修蘭亭，卻未有修禊會的舉辦。入清之後，康熙於三十幾年御書刻碑、乾隆於十六年（1751）親赴蘭亭，以及乾隆四十四年（1779）下令御刻《蘭亭八柱帖》，並將圓明園「坐石臨流」景修建成「蘭亭八柱亭」之事，則是李亨特所留心之處。⁹對他而言，追繼清代帝王對於蘭亭文化之興趣與實踐的傳統，恐怕比遠續西元三五三年的王羲之蘭亭會，來得實際且重要。尤其李亨特自敘中提到，王羲之當年「時事多故，臨文感慨，情見乎辭」，而今日「天下太平，年穀時熟」，因此李亨特個人「賞心暢懷，有遠過於永和者」。在李亨特筆下，「天下太平」，儼然成為讓李亨特足以超越王羲之蘭亭會的重要憑藉。

大抵而言，舉辦續蘭亭會一事，不僅讓李亨特可將自己安插入文人傳統的歷史之中，更可令其將自己標誌到清代帝王的文化版圖上。有趣的是，上面這段引文，李亨特可能有三處錯誤。第一，參加唐大曆年間三十七人聯句者並非「吳均」，而為「吳筠（?-778）」，此錯誤除出現在拖尾題跋中，《紹興府志》重載時亦未修正，此可能是編輯為免揭李亨特之誤而將錯就錯；¹⁰第二，與陳霍尋蘭亭舊

⁹ 嵇璜等奉敕撰，〈御刻《蘭亭八柱帖》（乾隆四十四年）〉，《皇朝通志》（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一六，頁15上-15下。

¹⁰ 大曆聯句之會，參見賈晉華，《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下篇第二章〈《大曆年浙東聯唱集》輯校〉，頁358-359。《紹興府志》未改別字之處，見李亨特總裁，平恕等修，《（乾隆）紹興府志》，卷七十二，頁1774。

約者，很可能是「荊州」太史，而非「荊川」此人；¹¹第三，清聖祖從未親臨紹興蘭亭。第三個錯誤，很可能是李亨特刻意為之，欲藉聖祖之「臨幸」以揚顯紹興之名，但前兩個錯誤，卻顯示了捐納出身的李亨特究竟對文史典故不甚透徹，或者，也可能是作為其政事、文章之操作、代筆之幕僚群的失察。

2 李亨特的續蘭亭圖：《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

除了舉辦續蘭亭會這件事本身對李亨特來說深具意義之外，續蘭亭圖的繪製，也是另一個經過斟酌的設計。以下，筆者將透過李亨特續蘭亭圖之圖式傳統的選擇、畫面布局，與請託題跋三個部分，來討論李亨特如何透過此卷畫作，來幫助他形塑個人、塑造群體。

《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本幅畫面尾端，有三則題識，分別為：「丹陽丁健寫照。」、「乾隆壬子暮春長洲陳栻補山水。是圖越七旬乃成。」與「小龍眠山人闕嵐補人物、竹樹。」可知此作是由三位畫家合作完成（圖 V-1）。目前吾人對此三位畫家認識不多，闕嵐因居安徽樅陽鎮龍眠山麓故號「小龍眠山人」，此號或也蘊含效仿李公麟之意，由其當時已有人冒名仿作的情形看來，闕嵐名氣應該不小。¹²史載陳栻書法、山水均學自代表清朝宮廷書畫藝術正統的董其昌，雖然陳栻作品並不多見，但從他一七九〇年的《西江吟月圖》（藏處不明）後方三十多位題跋者與《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題跋者有數人重複的情況看來，陳栻在李亨特、徐嵩、袁枚等人的交遊圈中，應該頗為活躍。¹³至於主寫照的丁健雖查無相關資料，但不難想像受李亨特特別囑咐之人定非等閒之輩，尤其從此作之

¹¹ 陳宦，〈與荊川太史約修蘭亭舊約書〉，張元忭，《（萬曆）紹興府志》，卷九，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明萬曆刻本）。但據經版本校對的蕭良幹修，張元忭、孫鑛纂，李能成點校，《萬曆《紹興府志》點校本》（寧波：寧波出版社，2012），頁 204，此條是寫為陳宦，〈與荊州太史約修蘭亭舊約書〉。不知何者為是？

¹² 闕嵐傳，見彭蘊璣，《歷代畫史彙傳》，卷五十九，頁 12 上：「闕嵐，字文山，號晴峯，桐城人。工山水、花鳥、人物；沈道寬，〈闕雲山墓誌銘〉，繆荃孫纂錄，《續碑傳集（五）》，卷八十四，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 119 冊，頁 740-741。冒名仿作之事，見王闓運，《（光緒）湘潭縣志》（清光緒十五年〔1889〕刻本），卷八，列傳二三六，無頁碼「郭縉修」條。

¹³ 陳栻傳，見彭蘊璣，《歷代畫史彙傳》（清道光〔1820-1850〕刻本），卷十四，頁 12 上-12 下：「陳栻，字經南，號斗泉，吳人。畫宗北苑，書仿南宮，以文學翰墨知名於時。（同上〔《墨香居畫識》〕）；馮桂芬，《（同治）蘇州府志》（清光緒九年〔1883〕刊本），卷一一〇，頁 23 下：「陳栻，字景南，吳縣楓橋人。書法、山水，俱宗董香光。間亦寫佛像及仕女，有名於時。（《墨林今話》）」。《西江吟月圖》是為李承列（生卒年不明）所繪肖像，畫面布置猶如行樂圖一般。圖版參見雅昌藝術網（下載網址：<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0013560461/>），檢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12 日。同時為《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與《西江吟月圖》題跋者為徐嵩、袁枚、錢伯坳、張問陶，其中徐嵩與袁枚均參與了李亨特的續修禊會。

面容寫真的極佳品質即可看出。¹⁴簡而言之，《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的三位畫家，可說是一時之選。



2-1 雅集圖之圖式傳統的運用

《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的描繪細緻、設色精美，保存也相當完好，十分難得，而此作之製作，結合了傳宋李公麟《蘭亭修禊圖》，及清代《城南雅集圖》、《九日行庵文讌圖》之類雅集圖的兩種圖式傳統。首先十分值得注意的是，此卷似乎為清代繪作時人續蘭亭會之作品中，少見以傳李公麟《蘭亭修禊圖》為藍本所畫之作，十八世紀當時很可能有部分描繪續蘭亭會的畫作，是透過相同的圖式來佈局。¹⁵長卷畫面上，有一橫互彎轉的水道流行其間，水流兩側安排著或坐或立的幾群人物，亭子則一改傳李公麟本位於畫面開端的位置，移至畫面末端（比較圖 V-1、圖 IV-29）。雖然亭子的位置有所更動，但這並非清代畫家的創舉，明人所繪的蘭亭圖中，已可見以相同方式改動傳李公麟本的作法。¹⁶《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除基本圖式是以傳李公麟蘭亭圖為藍圖之外，畫中人物亦使用傳李公麟本之格套修改而來。如畫面中段的兩個人物形象，分別引用了「王獻之」與「孫統」的姿態（圖 V-2）。雖然如此，李亨特續蘭亭圖上，群像之成組布置的圖式與強調被繪者各個獨特面貌的寫照風格，卻屬清初以來常見之雅集圖作風。如禹之鼎（1647-1716）描繪康熙二十一年（1682）王士禛、汪懋麟（1640-1688）等五人聚會的《城南雅集圖》（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或乾隆八年（1743）揚州馬曰琯（1687-1755）、馬曰璐（1697-1766）兄弟請方士庶（1693-1751）、葉芳林（生卒年不詳）合繪之《九日行庵文讌圖》所見（圖 V-3、圖 V-4）。¹⁷亦即，雖然傳

¹⁴ 此作過去一直以為已經佚失，二〇一〇年才出現於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的春季拍賣會中。

¹⁵ 清人所繪續蘭亭圖的樣式，可以本章第二節《借園修禊圖》與第六章第一節所討論之《曾賓谷長壽寺後池修禊圖》為代表（圖 V-28、圖 VI-3）。

¹⁶ 如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傳為明代畫家仇英（約 1494-1552）所作的《修禊圖卷》所見，水中亭子已被移到畫面尾段。雖然此作當非仇英所作，但就風格看來很可能為晚明民間畫坊所為。圖版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故宮書畫圖錄（十八）》（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9），頁 399-400。

¹⁷ 《城南雅集圖》相關研究，請參閱毛文芳，《圖成行樂：明清文人畫像題詠析論》（臺北：談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2008），頁 495-499。《九日行庵文讌圖》相關研究，請參閱 Ginger Chengchi Hsü, *A Bushel of Pearls: Painting for Sale in Eighteenth-Century Yangchow*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32-41; Wai-kam Ho et al., *Eight Dynasties of Chinese Painting: The Collections of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Kansas City, and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Cleveland, OH.: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1980), pp. 372-376; Richard Vinograd, *Boundaries of the Self:*

李公麟本也有畫面人物兩兩呼應的安排，但幾乎所有人物是被均等分布於橫長的畫面中，且主要都採坐姿，變化不大。而《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則如《城南雅集圖》或《九日行庵文讌圖》般，以數人為一組，每組有一些共同在進行的活動。惟相較於《九日行庵文讌圖》的活動有吟詩、採花、奏樂、賞畫等多項一般雅集之行事，《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之分群活動，大抵圍繞在「曲水流觴」的這件事情上（圖 V-1）。¹⁸

2-2 《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之畫面布局

根據姚興潔的拖尾題記，此次續蘭亭會的參與者，除袁枚及其弟子張培為特別邀請的上賓之外，其餘均為「太守賓客」，也就是李亨特的幕友群。姚興潔同時自卷首開始，記述了畫面上的參與者姓氏。

一人扶杖而來，白鬚飄蕭，老而雄傑氣者，為袁簡齋太史，隨行者為太史弟子張香巖。又二人，一人遙指左顧者，為李松巢，與松巢對立，手拈髭而褒如者，徐上亭。又一人，倚石上執杯者，王燕山。長松插雲，下坐二

人，一人抱膝坐，豐容廣顙為史少岡，一人跂脚坐，為平寬夫宮詹。稍東，頎身瘦骨，俯而觀泉者，陳斗泉。流泉之左，松根之下，臥而引盃者，何養亭。又一人，坐翠竹深處，握管而沉吟者，郭恕堂。一人左手按地坐，小童捧酒卮立於旁，為闕文山。又一人兩手自擁，盤屈而坐者，丁嘯谷。又二人坐，一人立，坐而執書者，為徐鐵谷，一手指書若辨難者，為朱九榆，立而俯視者，侯繼蘇。又二人對立，一人指右者，為徐閻齋，其叉手若微笑者，為秋槎。又二人，一人坐亭隅彈琴，為錢梅溪，一人坐而聽者，為張茶園。其端坐亭中，右顧若領琴韻者，主人李曉園太守。膝下圓頤廣額，眉目秀異，緋衣總角，蘭玉光潔，可五六歲者，為公子善祺也。

Chinese Portraits, 160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69-71; 高居翰 (James Cahill) 著，夏春梅等譯，《江岸送別：明代初期與中期繪畫（1368-1580）》（Parting at the Shore: Chinese Painting of the Early and Middle-Ming Dynasty）（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頁 30-31；吳誦芬，〈謝環《杏園雅集圖》研究〉（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¹⁸ Ginger Chengchi Hsü, *A Bushel of Pearls: Painting for Sale in Eighteenth-Century Yangchow*, p. 32.

對照圖 V-6 畫面分群的標示，畫面最前段的主角，就是七十七歲的袁枚（號簡齋），其由弟子張培（字香巖）相伴而來，兩人為一組。畫面中段所出現，是李亨特的幕賓群。袁枚、張培之後，為李松巢與徐上亨二人一組。之後王燕山獨自倚石。史少岡、平恕（字寬夫，？-1804）二人併坐。接下來分別為觀泉者畫家陳棡（號斗泉，《紹興府志》總校）、松下舉杯者何養亭、獨坐握筆者郭恕堂，與坐於雙松之間的畫家闕嵐（字文山）。闕嵐左方有四人一群，分別為畫家丁健（字嘯谷）、徐鐵谷、朱九榆、侯繼蘇，一同觀卷。此四人左前側，為製後序的徐嵩（號閭齋，《紹興府志》總修）與撰記的姚興潔（秋槎，《紹興府志》總理）。畫卷後段位於亭子中者，共有四位主要人物，分別為彈琴者錢泳（號梅溪，《紹興府志》分修）、聽琴者張棊園（疑其為桐城文人張曾徽），以及續蘭亭會主人李亨特、李善祺父子。¹⁹

將畫卷分成三段來看畫家群的人物安排發現，畫家將集會中最重要的參與者，分置於卷首及卷尾，李亨特的幕賓，則主要出現在畫面中段。當時名重一時的袁枚及其弟子張培，被畫在卷首，當觀者一展開手卷，立刻可看到這位李亨特別邀請的嘉賓，正拄著長杖，與手中持扇的弟子，前來赴會（圖 V-7）。袁枚與李奉翰、李亨特父子似乎頗有交情，袁枚《隨園詩話補遺》，曾論及李奉翰對人才的愛惜並錄其詩文二則；²⁰《小倉山房集》中所收之〈重修錢武肅王廟記〉一文，則是袁枚代李亨特所作。²¹此外，《隨園詩話補遺》中也以「政聲卓越，而于文翰之事，謙讓不遑」，對李亨特的為官施政、詩文翰墨給予佳譽。²²袁枚與李氏父子的交誼透過流傳至今的書信亦可窺一二，如袁枚受李亨特邀請題跋於《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之覆信，即可見袁枚與李亨特之情誼濃厚。²³袁枚信中提到，

¹⁹ 關於此畫上二十一位參與者姓名，能考證出來者十分有限，但據姚興潔所言，除袁枚、張培外，「餘皆太守賓客」，因此如朱則杰、盧高媛，即根據《紹興府志》編輯者名單如史達善、朱叔鴻、侯烈，以推測為史少岡、朱九榆、侯繼蘇三人。但筆者遍查史籍、資料庫，發現史達善與朱叔鴻字號均非少岡、九榆，至於侯烈則尚未查得，因此對史少岡、朱九榆與侯繼蘇身分，仍然無法確定。見朱則杰、盧高媛，〈《履園叢話》“蘭亭”條與李亨特“續蘭亭修禊”考論〉，頁 109。感謝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楊肅毓先生賜知張棊園訊息。此外，本文曾發表於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學生論文討論會，特別感謝楊先生就其對清代幕府研究之經驗，給予本文諸多建議與回應。

²⁰ 袁枚，《隨園詩話補遺》，卷四第十五條，收入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第 3 冊，頁 632。

²¹ 袁枚，〈重修錢武肅王廟記（代杭州李太守作）〉，《小倉山房集》，外集卷八，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乾隆刻增修本）。文中寫明李太守即李亨特。

²² 袁枚，《隨園詩話補遺》，卷七第二十三條，收入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第 3 冊，頁 718。

²³ 王英志，〈袁枚集外尺牘考釋〉，《中州學刊》，2013 年第 10 期，頁 153-155。中收錄了〈賀李香林（李奉翰字）河帥調河東〉一信，及袁枚覆李亨特邀《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跋之信。

對於自己被畫在卷首之事，感到「圖形遭際之隆，何修得此！」並特為李亨特破例作「五排一章」為書圖跋。據袁枚言，此種文體「六十之後，久不作矣」。²⁴因此看來李亨特與袁枚當非泛泛之交，甚至可以想像在此次續蘭亭會中，袁枚的出現必如眾星拱月，與李亨特二人同時作為此次聚會的主角。

另一群重要的參與者，為畫卷末端的亭子中人（圖 V-8）。分別為錢泳、張綦園、李亨特及李善祺，而此亭子，應即意指「蘭亭」。錢泳入李亨特幕前，原為畢沅任湖廣總督時的幕賓，他於乾隆五十二年（1787）入畢沅幕中，曾參與《中州金石志》、《經訓堂帖》等工作，乾隆五十六年（1791）轉至李亨特之幕，協助《紹興府志》的編纂。²⁵錢泳入李亨特幕府前，已是全國知名的士人，加上畢沅幕府在當時聲望頗高，錢泳的到來毋寧替李亨特幕府增添無上光彩。²⁶根據盧慧紋研究，乾隆五十年（1785）錢泳將轉摹自明末清初學者徐樹丕（1596-1683）雙鉤之《熹平石經》殘字刻石後，「拓數百本」流傳各地，使錢泳聲名大噪。翁方綱（1733-1818）於乾隆五十三年（1788）將錢氏及他處摹得之《熹平石經》，勒石於南昌府學尊經閣，此事為當時文人社群所廣知。李亨特於乾隆五十七年四月，也摹錢泳本與黃易藏本於紹興府學尊經閣中，此尊經閣舊名「稽古閣」，為前一年由李亨特重建、更名，故李亨特此舉似有仿效翁方綱之意，及追逐主流文人如黃易等癡迷於《熹平石經》之風潮。²⁷而由《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將錢泳畫入亭子中，與李亨特親近共處一處的安排，即知李亨特對錢泳之看重。

錢泳前方側耳傾聽的老者張綦園，筆者疑其為桐城文人張曾徽，可能也為李亨特的幕客，或為其摯友，故可與李亨特一同被畫入亭子。張綦園側身、微微低頭傾聽錢泳彈琴的身影，與以四分之三側面端坐撫鬚、神色嚴肅的李亨特相較而言，顯得頗為謙恭。

²⁴ 王英志，〈袁枚集外尺牘考釋〉，頁 155。

²⁵ 〔？〕穎編，錢泳校訂，《梅溪先生年譜》，收入陳祖武選，《乾嘉名儒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第 10 冊，頁 362，乾隆五十一年條下；頁 366-367，乾隆五十六年條下；盧慧紋，〈碑與帖的交會——錢泳《攀雲閣帖》在清代書史中的意義〉，《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31 期（2011.9），頁 210（205-276）；陳雅飛，〈畢沅幕府書家群概論〉，《中國美術學院學報》，2012 年第 2 期，頁 32。

²⁶ 關於畢沅幕府的聲望，見尚小明，《學人游幕與清代學術》，頁 94-109。

²⁷ 盧慧紋，〈碑與帖的交會——錢泳《攀雲閣帖》在清代書史中的意義〉，頁 209-210；張玉芳，〈黃易與東漢熹平石經〉，收入故宮博物院編，《黃易與金石學論集》，頁 114；錢泰吉，《甘泉鄉人稿》（清同治 11 年〔1872〕刻，光緒 11 年〔1885〕增修本），卷七，頁 10 下；李亨特總裁，平恕等修，《（乾隆）紹興府志》，卷二十、七十五，頁 514、1844-1845。另，沈津，《翁方綱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頁 258，此處之「金匱華氏」應為「金匱錢氏」。

李亨特是整卷《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所出現的人物中，最正襟危坐者，這樣的姿態，相較於其他人或斜坐（如朱九榆）、或醉躺（如何養亭）、或雙手抱胸（如丁健）、或手背身後俯首看溪流（如陳栻），看起來格外嚴肅、莊重，這樣的姿態，應是為呈現李亨特為人嚴謹、為政兢業的形象所設計。至於俯身趴在李亨特左膝之上、身著紅衣的李善祺，眉清目秀，雖年僅五、六，卻不似一般圖繪中所出現的稚子多為頑皮玩樂之態，畫面上的李善祺顯得安靜端莊、「老成持重」。²⁸特別的是，李善祺手中還持有一朵蘭花，這朵蘭花的持法，很像描繪文人畫像中的持花姿態，如《九日行庵文謙圖》中持菊的厲鶚（1692-1752）般，僅以兩三根手指輕巧細緻地輕拈著花，全然不似一般畫面上的小兒稚子，多以整手抓握方式，把持具有祥瑞之意的植物（圖 V-9、圖 V-10、圖 V-11）。畫家所以讓李善祺手中持蘭，除可能呼應於蘭亭之會外，應更有意藉「謝庭蘭玉」的典故，以讚喻李亨特之子未來將光耀門楣。畫家顯然有意藉由李善祺的形象，顯示李亨特之治家謹嚴，為《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作記的姚興潔也十分清楚畫家的這層用意，故以「蘭玉光潔」來描述李善祺（見 V-表二）。而李亨特讓李善祺參與此續蘭亭會，如同王羲之讓未滿十歲的王獻之參加其蘭亭會一般，此舉除可見李亨特追仿王羲之蘭亭會的心意，同時顯示李亨特對幼子長大成才的深切期許。李氏父子二人同時出現於續蘭亭會中，無異於對觀者宣告李亨特正是如王羲之般，作為雅集的主人，且李亨特其人，也如王羲之兼具官員、文士的身分，李亨特雅集，則是作為蘭亭會這個典範傳統的繼承者。

討論完《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之卷首、卷尾的人物安排，最後來看此圖中段的十五個人物，描繪的是李亨特的幕賓。此幕賓群體，自袁枚、張培之後，以兩兩成組、或個人、或數人一群的方式，被畫家參差布置於畫面上（圖 V-6）。首先，李松巢與徐上亭二人，李松巢左手指向袁枚的方向，指示袁枚正往盛會而來。之後的王燕山，雙手交叉於身前，獨自倚石，酒杯置於石上。隨後史少岡、平恕二人悠閒併坐巨松之下。接下來有幾個被獨立描繪的角色。被畫成正在觀泉的畫家陳栻，本身就擅長山水繪畫，因此畫中此處的安排看來頗有道理。之後有松下倒臥舉杯、手倚樹根的何養亭，後方獨坐、手中握筆的郭恕堂，以及坐在雙松之間的畫家闕嵐。此四人周邊有時搭配小童自水中取酒，或執壺、送酒，而郭

²⁸ 描繪小兒的畫作，除了課子之類題材中的小孩會顯得比較莊重、安靜之外，一般多以活潑頑皮的情態為主要表現，相關圖版可參考劉芳如、葛婉章執行編輯，《嬰戲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0）。

怨堂座前置硯、紙，手中執筆的形象，主要是上承傳李公麟《蘭亭修禊圖》的表現而來（如傳李公麟本中之「謝萬」，圖 V-12）。傳李公麟本中，有不少參與者的位子附近均擺設有硯台、毛筆及紙卷，以表現參與者正在構思詩文的形象。

《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上酒醉如何養亭，或小童送酒的安排，都是畫家有意讓觀者回想起傳李公麟本蘭亭圖的作法。之後，再往畫面左側看去，闕嵐左方有四人一群，分別為丁健、徐鐵谷、朱九榆與侯繼蘇。此四人為一群組，但其後三者正一同觀看徐鐵谷手中的紙卷，這種手中執卷共觀的設計，也是為了呼應李公麟的《蘭亭修禊圖》。雖然傳李公麟本中，並未真有數人一起覽卷的畫面，但如王玄之展卷望向王彬之，王彬之右手伸出面帶笑容，似乎兩人正在隔席討論的情景，即是《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此四人之設計的本源（圖 V-13）。四人左前側，為徐嵩與姚興潔。徐嵩左手半舉、手心朝上，姚興潔雙手交疊身前，二人似乎正一邊相談、邁開腳步，而左旁有小童一手捧硯、一手執拂塵，隨侍在側。

此中段之幕賓群的描繪，另有數點值得留意。首先，《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的群組安排，除兩人一組、數人一組之外，還有幾個是單獨活動的人物交錯於其中。雖然此圖的群組分布，是使用如《城南雅集圖》或《九日行庵文讌圖》之類雅集圖的格套模式，但就這些雅集圖至少以二人為一組，鮮少在畫面上出現單人的表現而言，《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中段的群組組合方式，顯得變化較大。此圖特別安排多位「單人」活動於雅集圖中的作法，應與此本之另一圖式來源——傳李公麟《蘭亭修禊圖》——有關。傳統的《蘭亭修禊圖》中，除有畫中人兩兩相應的安排外，有幾個角色以特別的姿態，獨立突出於畫面上。這些姿態後來成為描繪人物的格套，廣受歷代畫家所認識、運用，因此當其他作品出現這些形象時，很容易被辨識出其源出傳李公麟本，即如圖 V-2 所見。²⁹而傳李公麟本上的「王獻之」，也正以獨自的身影出現在畫卷上（圖 V-14）。

第二，《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中段的幕賓描繪，透過畫面安排，可窺其個人在李亨特幕賓群體中之地位高下，其中尤以史少岡、平恕二人最值得注意。史少岡與平恕二人，翹腳並肩坐於三株老松之下，另一株老松更從左前方往右後方向，斜上史少岡與平恕頭頂，四株巨大松樹在兩人頂上交織成一個巨大華蓋（圖 V-15）。纏繞在此四棵松樹枝上的藤蔓，是以石綠點染而成，石綠晶亮的色彩，

²⁹ 另一使用傳李公麟蘭亭圖之例，見石守謙對（傳）南宋馬和之《桃園圖卷》的討論。參見石守謙，《移動的桃花源——東亞世界中的山水畫》（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 66-67。

將松葉華蓋點綴得更為富麗。這個富麗的松樹華蓋，將幾乎是以正面面對觀者、姿態悠閒卻不失莊重的史少岡與平恕二人，框架起來，加上此景正為畫面正中心處，因此讓史、平二人所在位置成為卷首、卷尾之外，另一個重心。透過畫家的精心安排，觀者不難察覺到此二人在李亨特幕賓群體中的特殊地位。而自平恕身後左側伸出，以石青點葉而成形似灌木的樹，其樹頂又往平恕頭上伸長，於是更加強了平恕的重要性。平恕是乾隆壬辰進士（乾隆 37 年，1772），曾於乾隆四十五年（1780）擔任會試同考官，也曾於乾隆五十三年（1788）以侍讀學士身分擔任鄉試考官，日後並於嘉慶三年（1798）以內閣學士身分任江蘇學院。³⁰雖不清楚平恕何時入李亨特之幕，但平恕在進入李亨特幕府之前應該已具有進士身分，且已開始擔任考選系統的官員，這樣的出身與經歷，無疑為李亨特幕府中之佼佼者。而其在《紹興府志》編輯表中之列名，是在眾知縣所屬的「監修」之後，即「總修」之職，此職由平恕與徐嵩一同擔任。而史少岡的身分雖查無資料，但比對《紹興府志》的編輯參與名單，唯一姓史者即史達善，因此筆者推測史少岡很可能即史達善。史少岡於李亨特幕府中之地位雖無文字史料可供參考，但從《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的畫面安排看來，史少岡應頗受李亨特器重。

第三，這件作品雖是以傳李公麟蘭亭圖為採用的其一圖式，但並未使用傳李本中極度酒醉的人物形象。《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中酒醉最甚者，應即何養亭，但他頂多眼皮微低、臥地舉杯，雖醉酒仍斯文安靜，並未出現如李本中之「謝藤〔滕〕」、「楊模」二者之手舞足蹈，或如「庾蘊」醉至需人攙扶的形貌（圖 V-16、圖 V-17）。有趣的是，傳李公麟蘭亭圖中的這三人形象在畫史中頗為知名，幾乎可說即李公麟此卷之代表形象，雖然如此，《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的畫家卻不使用這些格套。究其根本，應是李亨特及其畫家群並不想將這些過度酒醉的形象，套用到自己的幕賓群體中，因此刻意避開傳李公麟本中的醉酒人物格套，但仍畫上了點到為止的酒醉者何養亭，以呼應王羲之蘭亭會之曲水流觴、作詩不成罰酒三觥的文藝傳統。此外，相較於《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上酒醉之態者僅何養亭，及勉強可能也有醉酒之意的王燕山，此卷上多數人物所進行之事，主要與書卷有關，甚至是一群人共同進行。如郭恕堂、徐鐵谷、侯繼蘇、朱九榆四人，

³⁰ 平恕在教育、考選系統中之相關任職，見法式善，《清秘述聞》，卷八，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嘉慶四年〔1799〕刻本），頁 15 上；卷九，頁 10 下；卷十二，頁 5 上；卷十六，頁 13 上、頁 14 下。及王家相，《清秘述聞續》，卷一，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光緒十四年〔1888〕刻本），頁 4 下；卷九，頁 3 上。關於「同考官」之職務說明，見馮建民，〈清代鄉、會試考官的地域分佈狀況研究——基於《清秘述聞》的統計〉，《教育學術月刊》，2011 年第 11 期，頁 78。

而史少岡右旁的小童手上也捧著一紙卷。因此可見《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的畫家——並且應該也包含贊助者李亨特——在設計此卷上，很有意識地選擇、強化了傳李公麟本中展卷、構思詩文的人物形象，以形塑李亨特幕賓群體的善文性格。



2-2-1 寫照的「寫實」風格

《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的畫家，除使用傳李公麟《蘭亭修禊圖》與清代《城南雅集圖》、《九日行庵文讌圖》之類雅集圖所使用的圖式傳統，兩相結合，作為畫面布局、人物分群的基礎之外，就畫上人物寫照的風格而言，則是採用如《城南雅集圖》與《九日行庵文讌圖》之類作品的「寫實」手法來繪製。如《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上所見，畫上的每一個人都有鮮明、獨特的外貌，不難想像認識的人一看此畫，應很容易辨識出畫中各個人物。但此畫寫照手法，與時代相近之《城南雅集圖》、《九日行庵文讌圖》的最大不同，主要在於負責寫照之畫家丁健的描繪手法，屬於非常西式的作風，這可說是《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之人物寫照的最大特色，也很可能是「續蘭亭圖」在十八世紀的新發展。

首先，相較於《城南雅集圖》中的人物，多以正面或近乎正面的角度朝向觀者，《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上的人物，鮮少出現正面前看的臉部角度。禹之鼎約畫與一六八二年的《城南雅集圖》中，畫面五人都是以幾乎正面的臉部角度朝向畫外，這樣的作法，使身體不朝正前方的角度，在與頭部相銜接時，顯得尷尬、不自然（如圖 V-18）。一七四三年，葉芳林寫像的《九日行庵文讌圖》，已增加較多的非正面臉部描寫角度，並可見頭部角度隨著身體轉動、配合的結構。如圖 V-19 上的三個人，身體分別朝向不同方向，頭部也順著身體的方向隨之變動。不過，葉芳林對頭部的塑形仍顯得平面，這主要是因為畫家在描繪臉部時，雖然也有陰影的使用，但陰影僅作為基本五官的界線描繪，如圖 V-20 上眼皮張眼凹陷處、眼袋下方的陰影，與鼻子兩側的陰影，以及法令紋的部分，而鮮少使用多層次的陰影暈染、交疊，來協助塑造臉部的凹凸結構。但在《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上，除平恕的頭部角度最接近正面之外，其餘每個人物的頭部均多少有角度傾側，且個人的傾側角度是跟隨身體的轉向而變化（圖 V-15）。

其次，丁健對人物頭部之凹凸結構的塑形描寫，清楚可見到來自西方影響的痕跡。如圖 V-21 中的陳栻，其頭部外廓的勾描線條與上眼瞼的下緣線條，並非

使用濃淡一致的墨線來勾畫，而有深淺之別，以暗示光影照耀下，不同角度的變化。此外，雖然不很強烈，但仍可判斷出陳栻頭部有一主要光源，來自右上方，因此其臉部的陰影主要出現在左半部，此尤以鼻樑左側富有層次變化的陰影區最為清晰。而鼻翼右側的亮面處，也有兩個些微不同的塊面，以區別鼻部銜接臉頰之處內部的骨骼變化。此外，陳栻挑眉造成的額頭皺紋與骨骼，畫家也細緻地分成幾個小塊面，來畫出此部分的結構。至於陳栻左臉接近耳朵的地方，尤其可看到畫家不是輕易以簡單的線條或一兩個亮、暗面，來做出這部分的結構變化，而是以數道深淺不一的墨染、亮面配合，層層形塑出臉部側面的肌肉轉變（配合圖 V-21 面部塑形說明）。除陳栻之外，畫面上的何養亭頭部塑形也很精采，尤其何養亭耳朵下方一道較深的墨線，暗示著下頷骨邊緣的結構，而下巴至頸部的光影變化，描繪得尤其細緻。總之，《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上所見到的塑形概念，並非中國傳統的作法，而是對西方人物寫生技巧有一定了解之後的表現，尤其丁健寫照之風，與宮廷畫家郎世寧、王致誠等西方傳教士的手法，十分接近。

北京宮廷對於西方傳教士的接受與西方繪畫風格的採用，早為學界所悉，但丁健之流的地方畫家，是否有機會習得與宮廷相類的西方畫法，在近年的研究中，也獲致肯定的答案。根據研究，江南地區，如杭州、南京等地，自晚明開始即有西方傳教士於此帶入西方畫法，進入清代，此處仍留有繪製洋畫的傳統，如杭州丁允泰（生卒年不詳）、揚州張恕（生卒年不詳）等，均為清初擅長西法的中國畫家，因此這些地區畫家雖然從未進入宮廷，卻有機會在地方習得與宮廷風尚雷同的表現手法。³¹丁健所以擅長西洋寫照之法，想必與此地方傳統密切相關。值得注意的是，同樣學習西法，每位畫家的表現及所習得的技巧卻不盡相同，此由《城南雅集圖》、《九日行庵文讌圖》中同樣有西法痕跡，但畫家之細節表現卻如上文所比較，與《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仍有很大的差異。而丁健的畫法，擅長以烘染、細緻的細節處理，來呈現皮膚下肌肉、骨骼的存在，這種手法雖在某些江南畫家的作品上也可看到，如嘉慶十五年（1810）江蘇畫家丁以誠所畫《鐵保像軸》，其人物臉部暗面以暈染來處理細部變化的手法、臉部與頸部交接部分的分塊方式，即與丁健的繪畫概念頗為相近（圖 V-22）。³²但同時，丁健的畫風

³¹ 見張燁，《洋風姑蘇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頁 185-188 討論。另見石守謙，《山鳴谷應——中國山水畫和觀眾的歷史》（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頁 324-326。

³² 雖然一般認為丁以誠的寫真手法乃淵源於「波臣派」家學，但此圖細節卻可見丁以誠對於骨骼、肌肉的描繪興趣，因此筆者推測其除波臣派家學外，應該也習得江南地區可接觸到的其他西洋畫法。《鐵保像軸》解說見楊新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明清肖像畫》（香港：商

與清宮郎世寧等傳教士的繪畫技巧十分近似，如王致誠、郎世寧等合作的《萬樹園賜宴圖》，或郎世寧繪《瑪瑞斫陣圖》，其上對人物肌肉、骨骼之細緻變化的重視，與丁健在《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所使用的塑形概念幾相一致（圖 V-23、圖 V-24，比較於圖 V-21）。³³因此，李亨特所處的江南地區擅長於西法的畫家其實不少，風格表現也各自相異，但李亨特的選擇應該有其考量，或許他正是希望藉由丁健所擅長與宮廷西洋畫風相近的風格，令其續蘭亭圖能更成功達成追仿宮廷之文化氣息的目標。

2-2-2 雅集圖傳統之文字記錄的搭配

《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除了人物群組、寫像風格，使用了《城南雅集圖》與《九日行庵文讌圖》之類雅集圖的圖式、製作傳統之外，在雅集文字記錄與雅集圖繪製的「成套」組成上，這三件作品也採同樣的作法。《城南雅集圖》有汪懋麟所撰〈城南山莊畫像記〉，記載五人情誼與描述畫面人物安排；《九日行庵文讌圖》也有全祖望（1705-1755）為之序、厲鶚（1692-1752）為之作記；《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有前後序及記。³⁴不論汪懋麟、厲鶚或姚興潔，在描述畫面人物安排的記述方式上，均採用傅米芾（1051-1107）〈西園雅集圖記〉的格式。³⁵即由畫首至畫面末端的順序，一一說明人物分組與從事活動的描述手法，來寫作該雅集的記錄，錢泳也在其《履園叢話》中提到這個傳統。³⁶簡而言之，形塑雅集是有一套既定的格套可供運作的，這套格套包含雅集圖的製作，以及記錄雅集

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08），頁 204。

³³ 《萬樹園賜宴圖》研究，見楊伯達，〈《萬樹園賜宴圖》考析〉，《清代院畫》（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頁 178-210。《瑪瑞斫陣圖》研究，見王靜靈，〈柏林收藏的紫光閣功臣像及其相關作品新論〉，《故宮學術季刊》，第 34 卷第 1 期（2016），頁 171-179；劉宇珍，〈瑪瑞斫陣圖〉解說，何傳馨主編，《神筆丹青：郎世寧來華三百年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5），頁 160。

³⁴ 汪懋麟，〈城南山莊畫像記〉，《百尺梧桐閣集》，卷三，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世美堂刻康熙四十年〔1701〕續刻本影印，1997），第 241 冊，頁 739；全祖望，〈九日行庵文讌圖序〉，《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五，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嘉慶十六年〔1811〕刻本）；厲鶚，〈九日行庵文讌圖記〉，《樊榭山房集》，卷六，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四部叢刊景清振綺堂本）。

³⁵ 關於〈西園雅集圖記〉的研究，見 Ellen Johnston Laing, "Real or Ideal: The Problem of the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Western Garden" in Chinese Historical and Art Historical Records,"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8:3 (1968), pp. 426-427, 428-430; 衣若芬，〈一樁歷史的公案——「西園雅集」〉，《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10 期（1997.3），頁 10-16。

³⁶ 錢泳撰，孟斐校點，〈蘭亭〉，《履園叢話（下）》（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328。

舉辦之「記」的撰寫，而圖、「記」二者，是相互搭配而成的。當然，形塑雅集更講究者，還有前後序的撰作。而這一組「成套」的雅集辦理、塑造手法，早在明英宗正統二年（1437）的杏園雅集中，已見先聲。

過去學者已經指出，《九日行庵文讌圖》的繪製，是基於明代謝環（約1380-1452 後）的《杏園雅集圖》（圖 V-25）而來，但《杏園雅集圖》所描繪的是京城裡最高級官員的集會。³⁷杏園雅集的舉辦除留下雅集圖之外，參與者楊士奇（1365-1444）、贊助者楊榮（1371-1440）也分別有前、後序以記其事並描述畫面。此雅集雖無特別撰寫的「記」，但一般「記」中所載的內容，已被楊榮寫入〈杏園雅集圖後序〉中。³⁸更進一步，杏園雅集採用文章與圖象結合記錄集會的方式，應可上溯至《西園雅集圖》的製作傳統，惟傅米芾〈西園雅集圖記〉恐怕是元代之後的作品。³⁹由此看來，《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所上溯的傳統十分清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選擇描繪中央高級官員之雅集的繪畫，作為自己之雅集繪畫的圖式來源，對於身為地方官員的李亨特來說別具意義。雖然吾人無法確定李亨特或丁健、陳棡、闕嵐等，是否親眼見過《九日行庵文讌圖》或《杏園雅集圖》，但《杏園雅集圖》或《九日行庵文讌圖》之製作方式，在十八世紀中期的江南，應屬常見的雅集圖作法。如乾隆三年（1738）葉芳林所繪的《復園嘉會圖》，就是一件同樣以「奕奕有神」的手法描繪集會參與者，並配合有序、記的一整套集會表現的製作，贊助者蔣誦先（生卒年不明）並非官場中人，顯見這類雅集圖之廣為人知。⁴⁰至於《杏園雅集圖》，除有版畫行世（1560 年代出版，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更有不少仿學之作，如明代呂紀、呂文英之《竹園壽集圖》

³⁷ 《杏園雅集圖》當時正為揚州二馬兄弟的收藏，詳見下列二書的討論。Ginger Chengchi Hsü, *A Bushel of Pearls: Painting for Sale in Eighteenth-Century Yangchow*, pp. 38-41; 高居翰著，夏春梅等譯，《江岸送別：明代初期與中期繪畫（1368-1580）》，頁 30-31。並見全祖望，〈明杏園雅集圖（今歸嶧谷）〉，《鮚埼亭集外編》，卷三。楊士奇與楊榮的前、後序，見吳誦芬，〈謝環《杏園雅集圖》研究〉，頁 30-32。相關研究另見 Maxwell K. Hearn, "An Early Ming Example of Multiples: Two Versions of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Apricot Garden," in Judith G. Smith and Wen C. Fong, eds., *Issues of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Painting*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9), pp. 221-256.

³⁸ 根據研究，楊士奇及楊榮都曾題寫過《西園雅集圖》，雖不知道題字的確切年代，但很可能在一四三七年杏園雅集舉辦之前，他們已經知道《西園雅集圖》與〈圖記〉的存在。相關研究見 Ellen Johnston Laing, "Real or Ideal: The Problem of the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Western Garden,'" p. 428.

³⁹ 衣若芬，〈一樁歷史的公案——「西園雅集」〉，頁 10-16。

⁴⁰ 此圖見葉廷琯（1792-1869）之記載，葉廷琯文中並提及《九日行庵文讌圖》，顯見此二作之相類，也為十九世紀之江南文化圈所知。見葉廷琯，〈復園嘉會圖〉，《鷗陂漁話》，卷三，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同治九年〔1870〕刻本）。另外，梁章鉅（1775-1849）也曾在其文集中提到《九日行庵文讌圖》。梁章鉅，〈小玲瓏山館〉，《浪跡叢談》，卷二，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刻本）。

(1499 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等，這些作品頗常為明清文集所提及，不難想像《杏園雅集圖》知名的程度。⁴¹因此，如《杏園雅集圖》般，以「寫實」的肖像手法描繪集會參與者面容，並配合以分組方式安排畫面的繪畫傳統，當屬十八世紀中之人物畫家所熟悉、擅長的一種集會圖繪模式，且這類雅集圖之贊助者身分，也不僅只限於官員。

簡而言之，李亨特《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的圖式傳統，是揉合傳李公麟蘭亭圖與《杏園雅集圖》、《九日行庵文讌圖》之類的雅集圖式而來，但以帶有西方繪畫人像觀念的寫像技法來畫續蘭亭會參與者面容的方式，則很可能是十八世紀的新作法。《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同時使用兩種圖式，應各有其用意。以傳李公麟本圖式來說，當是希望令觀者一望可知此會是以密切追仿王羲之蘭亭會為目標，但這層用意能否成功，取決於觀者是否具備王羲之蘭亭會及傳李公麟蘭亭圖的知識，才能理解李亨特之選擇的意涵。只不過傳李公麟本在當時應該不算難得一見，因為至少浙江地區在乾隆十七年(1752)所出版之吳高增輯《蘭亭志》中，即載有淵源於李公麟本的《古蘭亭圖》(圖 III-27)。因此，即使李亨特本身沒有相關收藏，也很容易取得這個圖式，但也因此顯示使用這個圖式雖有限定觀者的用意，卻不易產生「專屬」於李亨特的效果。至於使用清代《城南雅集圖》、《九日行庵文讌圖》之類雅集圖式，則可見身處於十八世紀之李亨特對當時繪畫風潮——尤其是對宮廷西洋畫風——的興趣。他除了希望從《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上，讓人看到其知古、崇古的一面，同時，他也期待跟隨時代與宮廷的腳步，使用當時最風行的雅集圖式、寫實風格來形塑他自己的雅集，吸引觀者的目光，此畫之寫像如實，即受到卷後多位題跋者的關注。此外，以青綠作為蘭亭圖背景，在明中期後如文徵明、沈時(活動於明末清初)等畫家名下的蘭亭圖相關作品中已見先聲(如圖 V-26)。⁴²但這些作品均非以時人之續蘭亭會為描繪對象，入清之後的續蘭亭圖似乎也不常見以青綠色彩來表現。而《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畫家，以具有仙境山水、盛世氣象之青綠風格來繪製蘭亭聚會，應有將紹興

⁴¹ 《杏園雅集圖》版畫，見 Maxwell K. Hearn, "An Early Ming Example of Multiples: Two Versions of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Apricot Garden," p. 224-225. 《竹園壽集圖》圖版，見楊新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明清繪畫》(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4)，頁 20-21。清人曾記錄《杏園雅集圖》、《竹園壽集圖》者，如錢維喬，《(乾隆)鄞縣志》，卷二十七，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刻本)，頁??。

⁴² 沈時《蘭亭修禊圖卷》，繪於一六三五年，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圖版見圖 VI-8。

蘭亭比擬成非凡之境的意圖。即如李亨特前序中所言：「今天下太平，年穀時熟，予承恩命，來守茲土，方春和時，周視郊原，田疇繡錯，饁餉相繼，木之欣欣，泉之涓涓，所以賞心暢懷，有遠過於永和者。」李亨特及續蘭亭會之參與者，即如身處仙境中的盛世中人。



2-3 《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之題跋討論

李亨特在紹興蘭亭仿王羲之舉行續蘭亭會，除由旗下幕客一同參與之外，還特別邀請袁枚作為嘉賓，集會結束後，又請畫家完成一幅經仔細斟酌設計過的續蘭亭圖。李亨特的這些用心，全為卷後題跋者所理解。《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後拖尾，共有三十三人題寫了三十六則跋文，扣除最後一位題跋者，民國年間的鄧春澍，由李亨特邀請而題跋者，主要是活躍於乾隆末至嘉慶中晚期的文士及大、小官員，所查得曾登進士第者有十四人，幾達半數之多（參見 V-表四）。李亨特幕賓群中，被授予題跋資格者僅三人，即姚興潔、徐嵩與平恕，顯見此三位在李氏幕賓群體之地位。三十二位乾隆、嘉慶年問題跋者中，僅四位曾參與李亨特的續蘭亭會，亦即絕大多數題跋者，乃應李亨特之邀而特別參與。題跋者中屬高級官員者，如歷任軍機大臣、刑部尚書等職的慶桂（1737-1816），與時任浙江鹽運使的阿林保（1746-1809）。此外如梁同書，除有官職在身，更是當時的書法大家。而如趙翼，為當時知名的歷史學者，桂馥（1736-1805），為著名之考據學者，吳錫麒以詩和駢文著稱，黃易則為著名金石學者。綜觀《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受邀題跋者身分、來歷，無疑可為李亨特此作錦上添花。

李亨特續蘭亭會的參與者因作為其幕賓，而有機會（或受其命）參與他的雅集，但他們卻不是李亨特所真正屬意的題跋者，由 V-表四的名單與題跋者身分看來，李亨特最心儀的題跋者，是能夠為其增添光彩、提升地位的人。眾題跋者為李亨特續蘭亭圖題跋的時間，依有落款年代的跋來看，主要集中於三個時段。分別為續蘭亭會舉辦、圖成的乾隆五十七年（之後的五十九年另有阿林保、黃易、祝雲棟三跋）、嘉慶二至三年（1797-1798。另，嘉慶四年、八年〔1803〕，有張問陶、錢維喬二跋），以及嘉慶十七年（1812）。

乾隆五十七至五十九年間，李亨特續蘭亭會剛舉辦完，作品也完成不久，於此之際邀請眾人題跋，理所當然。當時任知府的李亨特，品秩為從四品，而其所邀之人除部分為與會者如袁枚、徐嵩等，也有官階高於李亨特的高級官員，如當

時任駐防將軍（從一品）的慶桂與鹽運使（從三品）的阿林保，此外，還有著名學者黃易等。甚至李亨特若離開治地，也帶著《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隨身同行，如祝雲棟即題寫於山東任城，顯見李亨特對此卷之厚愛。之後，乾隆六十年（1795）李亨特任雲南迤西道，因助剿苗事有功，賞戴孔雀翎，這在當時是極大的光榮。嘉慶二年（1797），李亨特又協佐平苗、猓有功，加按察使（正三品）銜。嘉慶三年（1798），調廣西右江道。⁴³因此乾隆六十年至嘉慶三年這段期間，可說是李亨特進入官場初次倍極榮耀的時刻，此時受邀題跋者如雲南永平知縣桂馥、雲南知府史致光，均與李亨特為雲南地區的官員。此外如沈榮錦、沈維城、汪庚等三人雖不明其身分，也未完全留下題跋年代，但依此數人落款位置偏紙面下方，字體偏小，以及落款處以「治晚」或「屬吏」自稱，此三人很可能為李亨特在雲南時期的幕賓。⁴⁴王子音（生卒年不詳）跋中有「猶幸獲依宇下」句，推測其也為李亨特幕賓，且由王子音題字所占篇幅明顯大於前三人，王子音在李亨特幕中應列高位。嘉慶四年（1799）陰曆三月，李亨特因丁父憂未任官職，書法大家張問陶（1764-1814）當時正值壯年，嘉慶四年時甫由四川回到北京，因此十二月張問陶題跋當時，李亨特應正在北京府邸。⁴⁵此後直到嘉慶八年李亨特擔任江蘇按察使後，僅見錢維喬一則跋文。筆者推測，嘉慶四年至八年間僅見二則題跋，可能與李亨特嘉慶四至六年（1799-1801）丁父憂，暫離官場又重返官職不久有關。自此後一直到續蘭亭會舉辦滿二十年的嘉慶十七年，才又見另一波多人題跋。

李亨特於嘉慶七年返回官場，九年（1804）即獲擢為河東河道總督（正二品），但十一年（1806）、十四年（1809）因罪發往伊犁、熱河，十五年（1810）年底雖復為河東河道總督，但李亨特自十六年（1811）開始至十九年（1814）被革職發往黑龍江期間，官運並不順遂，期間唯十七年仍在河東河道總督任上時，堪稱平順，且此年正好為續蘭亭會滿二十年之際，故李亨特在此年出此卷與人共賞，留下不少題跋。嘉慶十七年題跋者，如雲南道監察御史韓鼎晉（1760-1831）雖

⁴³ 東方學會編，〈李亨特〉，《國史列傳（二）》，卷四十四，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36冊，頁595-602。

⁴⁴ 可能也題於此時的許惇，為曾任湖南巡撫的許松佑（1693-1764）之子。作為名門之後，當是受李亨特之邀而書跋。

⁴⁵ 根據卷後邵秉華（生卒年不詳）嘉慶十七年跋寫到其父親邵晉涵（1743-1796，官至侍讀學士）「於乾隆癸丑〔1793〕謁公京邸，至今蒙公眷念。」，見V-表三。而嘉慶十九年調查李亨特是否貪瀆時，即先籍沒其「在京家產」，因知李亨特在北京一直都有自己的宅邸。見東方學會編，〈李亨特〉，《國史列傳（二）》，卷四十四，頁599-600。

然為從五品官職，但當時正奉命巡視山東漕務，此任務與李亨特關係密切，或許因此李亨特特出此圖請其觀覽並題字。⁴⁶韓鼎晉跋的位置並未落在跋尾後端，而題寫在前段跋尾空白處，雖然字體僅蠅頭大小，但從其題跋位置可知李亨特對其之看重。此外，山東兗州鎮總兵（正二品）陳廣寧（？-1814）、侍讀學士邵晉涵（1743-1796）子邵秉華，也受邀題跋。至於沒有落款年代的方保升、徐國楠與熊方受（三人均生卒年不詳）身分，方保升跋中寫到「披圖歷歷見吾友」，他的輩分應與乾隆五十七年參與續蘭亭會的人相當，而徐國楠寫到「我本部下民，今居屬僚後」，當為李亨特其時重要幕僚。熊方受跋在徐國楠下方，二跋均蠅頭小字，據其所題內容，不僅將李亨特父、祖均為河督的家世點出，並特別稱讚李善祺，加上他提到座主為邵晉涵，故熊方受題跋年代可能與邵秉華同時。

李亨特邀請這些人參與題跋書寫，並一起裝裱在《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上，使題跋者與出現在畫面上之續蘭亭會的參與者，看來猶如同屬一個群體，這種群體感應即李亨特所企圖塑造的。李亨特的這層用意，為題跋者所明瞭，因此所有題跋內容讀來，多為阿諛奉承之作，也大致均點到李亨特雅集用心經營之處。

題跋者們所注意到的幾個面向，大抵如下。首先，多數題跋者都恭維李亨特是一位賢能而具文才的地方官員，並述其神態，如「股肱郡守重循良」（錢伯垞〔1738-1812〕跋）、「惟具謫仙才，能續修禊事」（沈維城〔生卒年不詳〕跋）、「公之眉宇如紫芝」（錢維喬〔生卒年不詳〕跋）等。其次，稱讚李亨特之幕賓乃才子群賢，即如王羲之蘭亭會參與者一般，如錢開仕（生卒年不詳）跋「賓從多才太守賢」，或錢維喬寫到「大抵才皆出公下」。再者，袁枚的參與，果然讓李亨特塑造自我及群體形象的構想如虎添翼，不少題跋者均指出袁枚特來山陰，參與李亨特續蘭亭會之事，如王子音（生卒年不詳）、顧光旭（1731-1797）、錢伯垞、李庭敬等人之跋。在這些描述中，袁枚與李亨特共受矚目，同為此會之主角。此外，李亨特所邀的題跋者，均了解蘭亭會的傳統與歷史，因此也是有能力讀懂《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的人，如邵秉華特別提到元代劉仁本有續蘭亭會，顯然其對蘭亭歷史是有了解的。而李亨特攜幼子舉辦此會，原即有繼承王羲之、王獻之之意，此構想也為趙翼等人所理解。趙翼提到，「會稽有蘭亭，久屬王右軍。誰敢冒不韙，欲來作替人。曉園〔李亨特字〕風雅宗，忽作茲郡守。似天將此亭，

⁴⁶ 李桓輯，〈韓鼎晉〉，《國朝耆獻類徵初編（二十一）》，卷一〇九，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147冊，頁534。

鄭重付其手。」直接將李亨特比為王羲之。韓鼎晉則逕以「逸少攜兒對舞筵」來形容李亨特父子。對於李善祺，除袁枚、韓鼎晉等特別提到之外，題寫於嘉慶年間的熊方受，亦指出當時已經成年的李善祺，「而今攀桂早凌雲（熙臺孝廉庚午〔嘉慶 15 年，1810〕舉於京兆試，即圖上所繪垂髫公子也。）」遠遠呼應十幾、二十年前題跋者對李善祺之厚望。由於受邀題跋者極了解李亨特父子欲以王羲之、王獻之為效仿對象，故眾人均竭盡心力推崇父子二人。

除此之外，對於《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畫作本身的讚譽，也是眾題跋者所特重的。如袁枚以畫上人物「個個忽將活」，來形容丁健的寫照功力，或黃易提到「卷裡看來多舊雨」、顧禮琥（生卒年不詳）跋「舊中半面曾相似」等，可見觀者均可一一指認畫中熟識的朋友，這些題跋無疑深受畫家描繪能力的吸引。而跋者如阿林保、李廷敬、顧禮琥、方保升等，使用集《蘭亭序》字來作詩文、書跋之舉，也屬蘭亭會傳統中的作法。另外，顧禮琥、熊方受二人跋，均提到李亨特父李奉翰與蘭亭會相關的活動，如在河南作上巳詩，或修整山東浣筆泉後，於當地「觴詠成集」之事。於此而言，李亨特舉辦續蘭亭會除有繼王羲之蘭亭會傳統之意外，同時也有追仿其父的心意。

就《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的題跋者身分與題跋內容看來，這些人的參與無疑均為李亨特所精挑細選，即如王子音所言，「凡從游與未從游者，各有歌詠，大都一時能聲士」。這些題跋者的出現，無疑提增了李亨特個人及此會、此卷之聲譽。雖然這些題跋者大多未曾與會，題跋年代也大致分屬三個時期，題跋者之間、題跋者和與會者之間，不見得均為舊識，但這群題跋者與續修禊會的參與者，透過同時出現在《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卷上，以及盛讚李亨特集會的文字內容，尤其數則跋文提到無法躬逢盛會的遺憾（如慶桂、顧光旭等人跋），凡此種種，均予觀者續蘭亭會參與者和題跋者，宛若同屬一個群體的印象。這種印象，正是李亨特透過圖像、題跋所欲塑造者。

2-4 李亨特續蘭亭會之其他問題

除了從上面所討論之《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所使用的圖式傳統，畫面布局，與題跋等部分，可看到李亨特別緻的用意之外，此次集會尚有三點特殊之處。第一，雖然李亨特此次集會是遠繼王羲之蘭亭盛事，且有意彰顯、強化李亨特個人及其幕賓的文化色彩，卻沒有觀覽《蘭亭序》書蹟、拓本的相關活動。雖然觀

覽書蹟、拓本並非續蘭亭會中必然的安排，但在十八世紀金石考據學風正盛之時，能夠提供拓本或相關收藏與集會者同觀，是當時的雅集風尚。⁴⁷能夠判別好的書蹟版本，進而獲得、收藏與欣賞，這幾件事所指向的，是收藏者或雅集舉辦者之學術、鑑藏與掌握相關知識的能力及藝術品味，同時也反映了可能必須的財力。於此顯示，李亨特本人及其幕賓對於蘭亭相關學問，似乎興趣不高或者能力有限。李亨特選擇以圖繪和書寫序、記的方式，來呈現他們的蘭亭品味與知識，而非拓本的欣賞與鑑別，即可看出以李亨特為首的群體並不長於金石考據。

第二，此次雅集真確的行事內容雖無文字記載可供追想，但從《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上看來，文墨之事雖是其想強調之處，但畫中人物也並非各個全力以赴，加上題跋也未有人提到雅集中有詩文競比，雅集結束也僅有圖作、題記、前後序，卻無詩集刊行，或將眾人詩文謄寫於畫上，就此看來李亨特續蘭亭會的詩文寫作應僅為點綴，而這可能與李亨特恐怕不擅文辭有關。有趣的是，袁枚《隨園詩畫》雖載李亨特「政聲卓越，而于文翰之事，謙讓不遑」，但《批本隨園詩畫》卻對此說嗤之以鼻。⁴⁸論者雖對《批本隨園詩畫》的成書與內容有不同意見，但《批本》對袁枚此條的評述內容，若對照李亨特續蘭亭會不特為翰墨之事來看，倒似有幾分真實，或者說，李亨特可能具備基本的文字能力，但仍難登大雅之堂。⁴⁹那麼李亨特的續蘭亭會究竟是甚麼樣的活動呢？從《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眾人徜徉於舒適華美的青綠山水之間，流露出的閒散氣息，以及集會中使用可能價值不菲的青銅香爐、碎器大壺等器具看來，李亨特的雅集，應是帶有閒適輕鬆又富貴享樂之官員性質的雅集，而蘭亭的文化意義終究僅作為一種外觀披飾（圖 V-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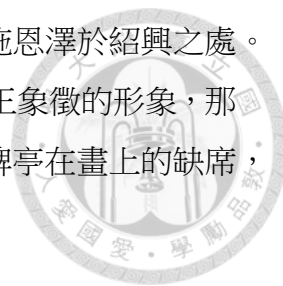
第三，李亨特此次續蘭亭會的舉辦地點為紹興蘭亭，如同前一章所討論，紹興蘭亭在康熙、乾隆年間都曾經過整修，對清人而言最重要的新建設，應該就是「御書碑亭」（圖 IV-7）。令人驚訝的是，對於皇帝、宮廷如此敏感的李亨特，卻

⁴⁷ 如知名學者翁方綱的壽蘇會，大抵均會出示蘇東坡《天際烏雲帖》、宋槧《施顧註東坡詩》殘本、蘇東坡等相關文人像，與眾人同觀並祭拜，甚至還曾以黃易之嵩洛訪碑記錄《嵩洛訪碑圖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與觀眾同賞。相關研究見衣若芬，〈時間·物質·記憶——清代壽蘇會之文化圖景〉，《長江學術》，2016年第4期，頁60；石守謙，《山鳴谷應——中國山水畫和觀眾的歷史》，頁327。

⁴⁸ 袁枚，《隨園詩話補遺》，卷七第二十三條，收入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第3冊，頁718。

⁴⁹ 論者對於《批本隨園詩畫》之意見，可參見羅惠予，〈淺談《批本隨園詩畫》〉，《中國韻文學刊》，1999年第2期，頁76-78。《批本》對袁枚此條的批評為：「李曉園名亨特，即李翰之子，與余為至戚。字且不多識，何有於詩？此亦由賄囑而來者。可笑！」見佚名，《批本隨園詩畫》，收入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第3冊，頁832。

無意在畫面上指示出這座亭子的存在，甚或任何足以暗示帝王施恩澤於紹興之處。關於此點，似乎是李亨特的刻意忽略。因為此畫上一旦出現帝王象徵的形象，那麼作為雅集主人的李亨特勢必成為帝王以下第二人。因此御書碑亭在畫上的缺席，很可能是李亨特為了凸顯自己身分、地位的一個選擇。



3 李亨特《(乾隆)紹興府志》的刊行

清代幕府制度十分發達，由幕賓學者所參與的方志編纂也較前代數量為多，且水準突出，由李亨特主導編修之《(乾隆)紹興府志》，亦是匯集眾幕賓之力而成。⁵⁰李亨特主導之《(乾隆)紹興府志》，蒐羅過往紹興相關方志、史料，所載資料甚多，與蘭亭會地區歷史相關之條目，也有超出萬曆十五年（1587）刊行之《紹興府志》的範圍，如「蘭渚」、「蘭亭渡」條，即未出現於《(萬曆)紹興府志》中。⁵¹《(乾隆)紹興府志》之部分條目的編纂上，內容篇幅亦較《(萬曆)紹興府志》為多，卷秩也超越康熙年間所編纂的《紹興府志》，於此可見李亨特編纂《(乾隆)紹興府志》有廣蒐前代資料，超越前人的企圖。⁵²李亨特在舉辦續蘭亭會的同一年，刊行了《(乾隆)紹興府志》，並將此次蘭亭聚會以「新增事實」之標題，列於〈古蹟志二·蘭亭〉條下，於乾隆十六年臨幸紹興蘭亭的記載之後，相較於此，康熙五十八年刊的《紹興府志》「蘭亭」條下，完全未提及康熙立碑之事。⁵³李亨特以個人之舉，作為上承清代帝王行事的說明，可見得李亨特舉辦續蘭亭會之政治考量的一面。而透過將自己的活動寫入史書的作法，其實也是一種「塑造」的過程與方式。

雖然如前文所述，李亨特本身並非學者出身的官員，對於當時主流學術——金石考據學——並未有太多參與，但《(乾隆)紹興府志》仍以七十五、七十六

⁵⁰ 陳金陵，《清代乾嘉文人與文化》，頁 101-105；喬治忠、李金華，〈畢沅幕府修史在乾隆時期史學發展中的地位〉，頁 131-137；王記錄，〈清代史館修史、幕府修史及私家修史的互動〉，《史學史研究》，2007 年第 2 期，頁 48-56。

⁵¹ 李亨特總裁，平恕等修，《(乾隆)紹興府志》，卷六，頁 166，卷八，頁 269；蕭良幹修，張元忭、孫鑛纂，李能成點校，《萬曆《紹興府志》點校本》（寧波：寧波出版社，2012），頁 181、190-191。

⁵² 李亨特之《(乾隆)紹興府志》共八十卷，俞卿修，周徐彩纂，《紹興府志》，共六十卷（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據康熙五十八年〔1719〕刊本影印，1983）。此外，根據〈重修紹興府志略例〉指出，「金石」卷乃是補康熙舊志之缺，見同書，第一冊，頁 6。

⁵³ 李亨特總裁，平恕等修，《(乾隆)紹興府志》，卷七十二，頁 1774-1775。康熙《紹興府志》僅提到：「國朝康熙十二年癸丑，知府許弘勳重建，今復舊觀。」見俞卿修，周徐彩纂，《紹興府志》，卷九，頁 835。

兩卷篇幅的「金石志」，來收羅地方的金石碑刻，這些記載中，多次提到李亨特對某碑的參與。例如《（乾隆）紹興府志》卷七十五錄當時頗為知名的《秦會稽刻石》，文後載：「乾隆五十七年四月知府李亨特，以申屠氏本重勒，仍置閣下，即今尊經閣也。」以及《漢熹平石經摹本》條下寫到乾隆五十七年四月李亨特摹勒置尊經閣之事。⁵⁴在方志中蒐羅、記錄當地金石碑刻，於十八世紀的方志編纂上頗為尋常，以知名學人幕府——畢沅幕府——所主導的《（乾隆）西安府志》為例，雖然其中也包含兩卷「金石志」，但除載碑石相關事記之外，並未特別提到《（乾隆）西安府志》之推手畢沅。⁵⁵相較於此，李亨特在《（乾隆）紹興府志》的編纂上，顯然很用心於讓讀者看到他的存在，即如同他在《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之圖象與題跋的操作一般。而對比於知名學人幕府所纂修的重要方志或金石志，《（乾隆）紹興府志》之「金石志」所獲評價不高，道光年間編錄《越中金石志》的杜春生（生卒年不詳）即指出，《（乾隆）紹興府志》雖「標金石之目」但「所載存佚均登，按籍以求，十無一二。」⁵⁶除此之外，就編纂日程而言，《（乾隆）西安府志》編纂始末耗時三至四年，但李亨特在〈重修紹興府志序〉中提到，他至紹興兩年之後才著手修志，即正式開始修史應為乾隆五十七年初左右，然此〈序〉完成於五十七年九月，而全書有八十卷之多，看來李亨特幕僚的修史速度甚快。⁵⁷

《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與《（乾隆）紹興府志》是不同性質的製作，但對李亨特而言，似乎從五十七年初編纂《（乾隆）紹興府志》開始，李亨特就積極在紹興——以擁有行政特權的方式——展現他的影響力。因此三月舉辦續蘭亭會、四月重勒《秦會稽刻石》與《漢熹平石經摹本》於府學尊經閣中，九月《（乾隆）紹興府志》完成，種種活動與建樹，無疑都是李亨特透過其身為紹興知府而有能力「採取／獨佔」，並以之塑造自我文化、政治形象的積極方式。⁵⁸尤其地

⁵⁴ 李亨特總裁，平恕等修，《（乾隆）紹興府志》，卷七十五，頁 1837、1845。關於《秦會稽刻石》另可參見注 4。

⁵⁵ 舒其紳等修，嚴長明等纂，《（乾隆）西安府志》，卷七十二，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乾隆〔1736-1795〕刊本）。此志聲譽頗高，見王記錄，〈清代史館修史、幕府修史及私家修史的互動〉，頁 51-52。

⁵⁶ 杜春生此評論及二書，《（乾隆）紹興府志》之外，還包括《（嘉泰）會稽志》。杜春生編錄，〈凡例〉，《越中金石記》，收入國家圖書館出版社輯，《地方金石志彙編》，第 43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據清道光十年〔1830〕詹波館刻本，2011），頁 525。

⁵⁷ 《（乾隆）西安府志》編纂時間的推測，根據畢沅撰序而來。見畢沅，〈序〉，舒其紳等修，嚴長明等纂，《（乾隆）西安府志》。

⁵⁸ 此處筆者認為李亨特對紹興文化事業之「擁有特權」及以「採取／獨佔」的方式操作，以及李亨特透過與其他群體之不同選擇，以塑造他自身及其群體與他者之間的「區別」、或「差異」，

方官員將自身成就、對地方的貢獻，與碑刻結合、載入志書，可說是令其個人功業得以流傳不朽的手段。



4 小結

綜上所言，李亨特透過追仿雅集典範——王羲之蘭亭會——的舉措，與「紀念物」《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的製作，來經營自己及其幕賓群的文化形象。他採用帶有盛世象徵之青綠山水來描繪紹興蘭亭，並以具有西方觀念、與北京宮廷相近的寫實技法與藝術品味，來刻畫參與者。此舉不僅令識者觀畫，可指出參與者姓名，亦使參與者之容貌存之千古，更令熟知宮廷文化風尚者容易將二者產生連結。李亨特更進一步，邀請地位身分卓越者來參與題跋，加以讚譽其個人及幕賓。就這些努力看來，對於塑造團體之共感，以及典範化李亨特個人來說，確實會產生一定的效果，畢竟所有的與會者都被「寫實地」框架、凝結在同一畫面上。而題跋者除回應李亨特的需求，跋文題寫入畫卷之後，也很容易被視為李亨特群體之一員，或至少，是支持李亨特群體的一種表達。除此之外，李亨特透過方志的編纂，將自己的續蘭亭會編入歷史之中，此舉無疑更是將李亨特自身之續蘭亭會更加典範化的積極作法。地方官員如李亨特，對紹興蘭亭之整建或投入文化活動，不僅意在連結自己與地方歷史、名人（王羲之）的各種關係，更重要，是可建立現實世界中的各種網絡，強化個人不僅止於地方官員的菁英特質。而李亨特於乾隆五十七年在紹興地區所進行的文化事業，雖有意藉由在王羲之蘭亭會故地辦理續蘭亭會（猶如「獨佔」一般）、選擇與宮廷品味相近之畫風、精挑續蘭亭會的參與者與圖卷題跋者，作為自己和其他群體之「區別」，但同時，他辦理續蘭亭會、使用傳李公麟蘭亭圖及十八世紀雅集圖式，和編輯地方志、蒐載地方金石等事上，又是一種「從流」、「逐眾」的作法，而其所從所逐者，正以當時熱衷於金石考據之學人與幕府為目標。透過李亨特之例，可見十八世紀末之官員在塑造自我及所屬群體的複雜操作。

李亨特的續蘭亭會，作為乾隆年間紹興地區的最後一件盛事，在當時可推測應引起不小的迴響，甚至在地方及中央都應獲致相當的關注。但很可能由於李亨

是受 Pierre Bourdieu 之文化理論的啟發。見 Pierre Bourdieu,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 pp. 234-237.

特在嘉慶中期官運不佳，其子李善祺也受父親牽累，被查出「母喪百日內，狹比優伶」而被懲辦，因此除續蘭亭會參與者之外，在當時文人文集中似乎顯少見到相關記載。⁵⁹透過本節研究，以李亨特及其幕府之續蘭亭會為例，除可見王羲之蘭亭傳統在十八世紀末地方官員、幕府手中的一種展現方式，並見李亨特如何透過續蘭亭會的舉辦及相關文化事業的搭配，成功獲得官員世界及文人、學者社群的目光的過程。

第二節 乾隆五十八年（1793）畢沅幕賓劉錫嘏之武昌借園修禊會

清代中期最知名的幕府，如朱筠（1729-1781）、畢沅（1730-1797）、阮元（1764-1849）等家，均以學術聞名。這幾個幕府不僅幕主學術成就、政治地位崇高，旗下幕客也多由各學術領域的學人所組成，對於推動清代金石考據、碑學、歷史、地理等學問的發展助益頗大，故學者常以「學人幕府」稱之，向來也備受論者關注。⁶⁰本節所要討論的續蘭亭會，是畢沅幕友劉錫嘏（1745-？）在武昌所舉行的借園修禊會，雖然當次修禊的主持人為劉錫嘏，但參加者主要為畢沅幕友、朋友與家人，因此可將其視為畢沅幕府之文化活動來加以觀察。

1 劉錫嘏與畢沅

劉錫嘏，為乾隆三十四年（1769）進士，於乾隆三十九年會試以翰林院編修任廣西考官，乾隆四十年（1775）考選山西道御史，故人稱「劉觀察」。乾隆四十六年（1781）任江蘇淮徐河庫道，隔年調補江蘇淮徐道，可見其精擅於河道事務。⁶¹雖無明確記載劉錫嘏何年入畢沅幕府，但劉錫嘏於乾隆五十四年（1789）任河北督糧道，同年被革職，後因畢沅上奏而留湖北差遣，故劉錫嘏應自五十四年革職後即成為畢沅幕賓。

⁵⁹ 如錢泳算是少數在自己文集中記錄李亨特續蘭亭會者，但其身分也為李氏幕賓。見錢泳撰，孟斐校點，〈蘭亭〉，《履園叢話（下）》，頁328。李善祺之事，見東方學會編，〈李亨特〉，《國史列傳（二）》，卷四十四，頁599。

⁶⁰ 尚小明，《學人游幕與清代學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張俊嶺，《朱筠、畢沅、阮元三家幕府與乾嘉碑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

⁶¹ 法式善，《清秘述聞》，卷七，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嘉慶四年〔1799〕刻本）；黃叔瓚，《國朝御史題名》，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光緒〔1875-1908〕刻本）；福趾，《戶部漕運全書》，卷四十二漕運河道，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光緒刻本）；王先謙，《東華續錄（乾隆朝）》，乾隆九十三、九十六，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光緒十年〔1884〕長沙王氏刻本）。另見 V-表五。

關於畢沅幕府的組成與成就已有不少討論，如尚小明、張俊嶺二人，主要從清代幕府之設立與學術成就等較為全面的觀點，來討論畢沅幕府在十八世紀的地位；陳雅飛側重於畢沅及其幕客群，對金石碑刻藝術的興趣與藝術表現；侯米玲則以畢沅、畢瀧兄弟之書畫收藏作為研究中心。⁶²大抵而言，目前學界對於畢沅及其幕府已有相當認識。畢沅幕府一般被分成三期討論，分別為乾隆三十八年（1773）至五十年（1785）畢沅擔任陝西巡撫（從二品）期間、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三年畢沅擔任河南巡撫期間，以及乾隆五十三年至嘉慶二年（1797）畢沅擔任湖廣總督（正二品）期間。此三期中，尤以第一期的文化表現最為出色，主因當時政事安定，畢沅得有較充裕的時間與幕友群一起投入校勘、出版、訪碑、整理等學術工作。到了河南時期，畢沅在此任官僅三、四年，遭逢河患又久日不雨，加上不少幕友離開，畢沅幕府此階段的學術工作與文會唱酬也相對減少。到了湖北時期，正值乾隆末年，各地民變頻傳，如幕中學者章學誠（1738-1801）所言，此時「武備不遑文事」，曾經入幕的錢泳在《履園叢話》中也提到，畢沅在陝西、河南均作的壽蘇會，「迨總督兩湖之後，荊州水災既罷，苗疆兵事又來，遂不復能作此會矣。」⁶³。畢沅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時，曾因未防範白蓮教亂而降任山東巡撫，雖然在隔年畢沅又復任湖廣總督，但不難看出畢沅這個時期之為政艱難。嘉慶二年（1797）平白蓮教亂，畢沅終沒於辰州大營。⁶⁴

雖然畢沅的幕賓群頗以學術知名，但畢沅身為封疆大臣，政事領域必然是他的主要工作。劉錫嘏作為畢沅湖廣總督期間的幕賓，在畢沅刊印、校勘書籍的文化事業上似乎很少看到他的具體建樹，目前僅見其曾協助畢沅自訂《靈巖山人詩集》（乾隆 58 年成書）之校訂。⁶⁵但依史料中所爬梳出的有限記載看來，劉錫嘏似乎是畢沅政治事務上的助手。根據鄂輝（?-1798）《平苗紀略》，乾隆六十年

⁶² 尚小明，《學人游幕與清代學術》，頁 94-109；張俊嶺，《朱筠、畢沅、阮元三家幕府與乾嘉碑學》，頁 72-125、200-202；陳雅飛，〈畢沅、畢瀧家世生平考〉，《歷史檔案》，2011 年第 3 期，頁 51-59；陳雅飛，〈畢沅書畫收藏芻議（上、下）〉，《榮寶齋》，2011 年第 5、7 期，頁 220-233、224-235；陳雅飛，〈太倉藏家畢瀧初探（上、下）〉，《收藏家》，2011 年第 2、3 期，頁 19-27、25-32；陳雅飛，〈科場·幕府·經訓堂——畢沅與王文治的翰墨緣（上、下）〉，《典藏古美術》，第 223、224 期（2011），頁 186-193、244-253；陳雅飛，〈畢沅幕府書家群概論〉，頁 28-37；侯米玲，〈畢沅與畢瀧的書畫船〉，《史物論壇》，第 13 期（2011），頁 25-63。其他相關研究如喬治忠、李金華，〈畢沅幕府修史在乾隆時期史學發展中的地位〉，頁 131-137；莫家良，〈畢沅幕府書蹟管窺〉，《書法叢刊》，2011 年第 4 期，頁 66-85。

⁶³ 錢泳撰，孟斐校點，《履園叢話（下）》，頁 415。

⁶⁴ 尚小明，《學人游幕與清代學術》，頁 94-104；張俊嶺，《朱筠、畢沅、阮元三家幕府與乾嘉碑學》，頁 72-125、78-85。章學誠所言，原出其〈上朱中堂世叔書〉，轉引自尚小明書，頁 104。

⁶⁵ 劉錫嘏參與《靈巖山人詩集》校訂工作之事，見李金華，〈畢沅及其幕府的史學成就〉（天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論文，2010），頁 263。

二月二十八日，畢沅上奏常德等處糧餉、火藥事宜，並提到將徵調幾位幹練的官員協助工作，其中即提到，「並聞原任湖北糧道劉錫嘏，現在武昌，頗肯奮勉出力，亦一併帶往，留於常德驅策，以收臂指之助。」⁶⁶三月二十八日，畢沅又奏平苗佈署進度，再次提到「臣率同帶來之原任湖北糧道劉錫嘏、安陸府同知鄭成基，悉心籌畫，盡力催趲。」⁶⁷劉錫嘏此時為畢沅入幕之賓，畢沅「並聞」二字，應只是修辭。督糧道一職，負責的是各省的漕運事務，屬漕運總督管理。據研究，此職負責之事繁多費力，須統理一省之漕糧徵收、驗收、起運、營造漕船等事，甚至統領該省漕軍。⁶⁸雖然劉錫嘏任湖北督糧道未滿一年，但其對河道治理與漕運事務應算嫻熟，過去的工作經驗也有相當的積累，由其總責事物諸多、經驗豐富看來，應是一名具實幹又負責的人才。畢沅招其入幕，可能主要欲藉助其政事才能，以為輔佐。

劉錫嘏除擅長政事之外，書畫、收藏亦均有涉略。書畫史籍如《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國朝書家筆錄》、《清畫家詩史》等，均載劉錫嘏精通書法，「書由唐人兼宋四家」，也擅長墨梅，「法張天瓶（張照，1691-1745）筆」（見 V-表五）。此外，《四庫全書總目》提到所收之明萬曆刊《文苑英華》一千卷，為「御史劉錫嘏家藏本」，此本「校正頗詳，在活字版《太平御覽》之上」。⁶⁹劉錫嘏曾任御史之職，乾隆三十七年（1772）開始採訪遺書，三十八年（1773）開四庫館，劉錫嘏於乾隆三十四年登進士第後任職於北京，並曾參與《四庫全書》之出版工作，如此說來，劉錫嘏正好趕上採訪遺書的時刻，此《文苑英華》出自其家，應無疑問。⁷⁰另外，劉錫嘏個人也有書畫收藏，常請友人為其題跋。⁷¹因此畢沅在

⁶⁶ 鄂輝，《平苗紀略》，卷三，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嘉慶武英殿活字本）。據劉錫嘏、王文治在《借園修禊圖》後跋看來，劉錫嘏因「時將北上」，有「預修禊事之舉」（見 V-表五）。又，王文治《楚遊三草》有詩名〈劉純齋觀察將之京師蓬心〔王宸〕為作《春江送別圖》且係以詩次運〉，以及劉錫嘏友人吳翌鳳（1742-1819）於乾隆五十八年所寫的〈秋日雜感三十首〉，其中一首有如下註記：「劉純齋觀察書來云，今歲上巳三舉修禊之會。與者自王蓬心太守、王夢樓〔王文治〕侍講外三十餘人，以不得鄙人入座為嫌嗣。純齋以需次入都，久不得其息耗矣。」王文治詩與此詩均完成於劉錫嘏癸丑續蘭亭會前後，因此可知乾隆五十八年劉錫嘏曾離開武昌赴北京，但不久可能即返回畢沅幕中。王文治〈劉純齋觀察將之京師蓬心〔王宸〕為作《春江送別圖》且係以詩次運〉，《楚遊三草》，收入劉奕點校，《王文治詩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頁 492；吳翌鳳，〈秋日雜感三十首〉，《與稽齋叢稿·廬雲小錄》，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嘉慶〔1796-1820〕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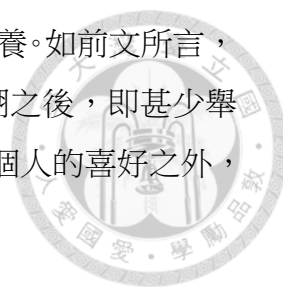
⁶⁷ 鄂輝，《平苗紀略》，卷十二。

⁶⁸ 稽果煌，〈漕運千秋（下）〉，《交通與運輸》，1998 年第 3 期，頁 45。

⁶⁹ 永瑤，《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六，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乾隆〔1736-1795〕武英殿刻本）。

⁷⁰ 《四庫全書》編輯相關討論，見李常慶，《四庫全書出版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頁 7-8、13-19。

湖廣總督任期中所倚重的劉錫嘏，不僅有政治才能，也富藝文修養。如前文所言，畢沅幕下的文藝唱酬之會原本頗為尋常，但畢沅至武昌統兩湖之後，即甚少舉辦。⁷²劉錫嘏在畢沅幕府主持了三次的續蘭亭會，除可能為他個人的喜好之外，或亦是以其個人名義代替畢沅以招攬幕友之意。



2 劉錫嘏之借園修禊與王宸所繪《借園修禊圖》

自乾隆五十七年（1792）起，劉錫嘏在武昌畢沅幕下，共舉辦過三次續蘭亭會，分別為乾隆五十七年（辛亥）、五十八（壬子，1793），與五十九年（癸丑，1794），地點均在借園（見 V-表六，孫雲桂〔生卒年不詳〕跋）。根據目前藏於南京博物院的《借園修禊圖》引首，由畢沅好友、當時正在武昌畢沅署中作客的王文治（1730-1802）題為「借園修禊第三圖」，以及劉嗣綰（1762-1821）寫於乾隆五十七年的〈家純齋觀察招同人修禊借園屬王春波〔王霖，生卒年不詳〕補圖即用原韻題卷後〉看來，劉錫嘏三次續修禊會應均有倩人作畫，但目前似乎僅「第三圖」傳世（見圖 V-28、V-表六）。⁷³

乾隆五十九年，正為王羲之蘭亭會後第二十四個癸丑年，可說是蘭亭史上每六十年的重要時刻，劉錫嘏因將赴北京，提早於二月二十日舉行續蘭亭會，並由王原祁（1642-1715）曾孫王宸（1720-1797）繪《借園修禊圖》以為紀念。⁷⁴王宸字紫凝，號蓬心，為乾隆二十五年（1760）舉人，曾任知府，此時正為畢沅幕客（見 V-表五）。王宸於繪事有家學淵源，也是典型的文人畫家，不論官階高低，就其文人出身而言，與畢沅、劉錫嘏、王文治等是屬於相同的社會階層。此

⁷¹ 如王文治，〈為劉純齋觀察題柴門流水畫卷〉，劉奕點校，《王文治詩文集》，頁 420

⁷² 畢沅曾舉辦的重要雅集研究，見朱則杰，〈畢沅“官閣消寒會”與嚴長明《官閣消寒集》〉，《甘肅社會科學》，2013 年第 6 期，頁 165-168；朱則杰，〈畢沅“蘇文忠公生日設祀”集會唱和考論〉，《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13 卷第 2 期（2014.3），頁 84-89；陳雅飛，〈畢沅書畫收藏芻議（上、下）〉，頁 224-235。

⁷³ 據《歷代畫史彙傳》：「王霖，字春波，江寧人。國學生。善山水、人物、花卉。（《莫愁湖志》）。」見彭蘊璠，《歷代畫史彙傳》，卷二十九（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道光刻本影印）。劉嗣綰，〈家純齋觀察招同人修禊借園屬王春波補圖即用原韻題卷後〉，《尚綱堂集》，詩集卷十三《楚游集上》（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道光刻本影印）。王文治是否曾入畢沅幕府，恐怕難以論斷，雖有部分論者將王文治直接列為畢沅幕賓，但檢視同年登第之畢沅、王文治詩文，推敲二人往來狀態，筆者認為王文治乾隆五十四年、五十七年赴楚，可能作客性質較高。認為王文治曾入畢沅幕府者，如尚小明，《學人游幕與清代學術》，頁 270。治於王平《探花風雅夢樓詩——王文治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一書正文，雖推測畢沅可能曾邀王文治入幕，但全文及文後〈王文治年表〉則以「客」畢沅署敘述。見頁 36-41、231-234。

⁷⁴ 劉錫嘏將赴北京之事，參見注 66。

外，王宸所擅長的筆墨表現，亦為清初以來宮廷最具代表性的繪畫風格。劉錫嘏特請王宸作圖，而非找如丁健、闕嵐之類繪畫技巧精熟的職業畫家操筆，即可看到劉錫嘏一群的喜好取向。王宸所繪的「借園修禊第三圖」，是以典型的王家筆墨來描繪這個續修禊會。畫面上，有數棟建築布置於蒼鬱的山谷之間，山谷中林木蒼勁，草皮青青，一片春意盎然。山谷左側，則為一片留白的廣大水域。畫面中段的圍牆，直接將畫面區隔成左、右兩個區塊，這在一般畫面上並不常見，此圍牆的存在應有借園之實景考慮。圍牆旁高樹正開著許多紅花，數群人物或散步、或交談於屋舍、園林之間（見圖 V-28、圖 V-29）。根據畫後孫雲桂跋，提到借園「依山面城，花事頗盛」，二月時「園桃爛然」，劉錫嘏未免春事即將消逝，故有此會（見 V-表六）。由畫面上看來，借園左側臨水，所在位置背山，前方應即武昌，而畫上點點紅花即象徵著借園裡盛開的朵朵桃花，王宸繪作此圖，應有考慮借園當時的景觀。

2-1 《借園修禊圖》之圖式使用與王文治縮臨《定武蘭亭真本》

王宸畫《借園修禊圖》的圖式來源，並未如李亨特一般，使用傳李公麟《蘭亭修禊圖》，而是採用如陸治《元夜宴集圖卷》之傳統文人雅集圖式（圖 V-30）。畫中人物既無水邊修禊，亦無揮毫、飲酒之舉，因此若無文字訊息，觀者無法得知所畫內容為續蘭亭會。以傳統雅集圖式作為修禊會繪畫的基本框架，似乎是清代畫家描繪當代續修禊會的典型手法，如一八一五年徐承熙所繪，曾燠（1760-1831）及其幕賓之續修禊會的《曾賓谷長壽寺後池修禊圖》所見（圖 V-31）。但《曾賓谷長壽寺後池修禊圖》左側，尚描繪有坐於水邊樹下的一群人，暗示著與「修禊」相關的主題，右側屋中也有人正在執筆，因此雖然使用傳統雅集圖式，仍可與「蘭亭會」作一連結。⁷⁵相較於此，《借園修禊圖》則完全未在畫面中透露此為續蘭亭會，當然也無法被辨識出畫上所繪人物身分。或許對劉錫嘏等與會者而言，這件畫作的重點，是以正統派文人筆墨來記錄群體聚會本身，因此畫面上出現了多少人或是否顯示為續蘭亭會，甚至畫中人是否可被識別，並非他們所

⁷⁵ 曾燠為乾隆四十年（1775）進士。此圖相關研究，見姜伯勤，〈清代長壽寺園林雅集與廣府文化及琴道——《曾賓谷先生長壽寺后池修禊圖》初探〉，《廣州文博》（2007），頁 12-30；李若晴，〈山門流轉一滄桑——《曾賓谷長壽寺修禊圖》遞藏考〉，《新美術》，2011 年第 6 期，頁 43-51。

在意，而王家筆墨的風格使用，很可能比畫面內容更為重要。⁷⁶

《借園修禊圖》本幅後端，預留了一大段空白，空白處的界欄內，有王文治「仿宋人縮本」，臨寫《定武蘭亭真本》（現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全文於其中（圖 V-32）。⁷⁷王文治縮臨《蘭亭序》最後寫到：

靈巖山人所收《定武蘭亭》是柯九思家藏，殆稀世之珍也。癸丑春（1793）適純齋觀察有預脩禊事之舉，蓬心繪圖工妙特勝。尾有餘紙，因仿宋人縮本臨之。夢樓王文治。（V-表六）

靈巖山人為畢沅號，王文治此處所抄臨的，正是畢沅收藏之元代柯九思（1290-1343）家藏拓本，這個拓本在當時頗為知名（圖 V-33）。《定武蘭亭真本》上，目前還可見有王文治在前綾為畢沅所題寫的「定武蘭亭真本。元柯九思舊藏今歸經訓堂畢氏。」以及王文治後跋。⁷⁸王文治為《蘭亭序》的版本專家，他在查瑩（1743-？，號映山，乾隆三十一年〔1766〕進士，時任湖北學政）收藏之吳炳本《蘭亭序》拓本（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跋，曾提到「余所見《楔帖》，不可枚舉，即『定武』一類，已不下百餘本」。⁷⁹另外，王文治在畢沅《定武蘭亭真本》後跋也寫到：

……。余從事於《蘭亭》者三十年，從事於《定武》者二十餘年，年近六

⁷⁶ 關於清初正統派畫家之繪畫淵源與風格象徵意義，參見方聞，〈董其昌與正宗派繪畫理論〉，《故宮季刊》，第2卷（1968），頁1-34。

⁷⁷ 《定武蘭亭真本》研究，可參閱張光賓，〈定武蘭亭真蹟〉，《故宮文物月刊》，第25期（1985.4），頁29-35；何傳馨，〈故宮藏《定武蘭亭真本》（柯九思舊藏本）即相關問題〉，收入華人德、白謙慎主編，《蘭亭論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頁331-339；王連起，〈關於《蘭亭序》的若干問題〉，《書法叢刊》，第129期（2012），頁30-31、34-35。

⁷⁸ 見國立故宮博物院「大汗的世紀」網頁，網址：<https://theme.npm.edu.tw/khan/Article.aspx?s No=03009172>，檢索日期：2017-11-20。

⁷⁹ 王文治之吳炳本跋，見王文治，〈定武蘭亭〉，《快雨堂題跋》，卷一，收入劉奕點校，《王文治詩文集》，頁566。吳炳本圖版，見東京國立博物館等編集，《特別展 書聖王羲之》（東京：每日新聞社等，2013），頁128-129。王連起認為造成此本在清代聲名顯赫，即因王文治的長題所致，見王連起，〈關於《蘭亭序》的若干問題〉，頁32。王文治題寫過許多與《蘭亭序》相關的版本，見其《快雨堂題跋》，卷一，《王文治詩文集》，頁563-571。此外，關於畢沅等藏家收藏及王文治書評地位，與《蘭亭序》在清代所受到的重視，可參見下列討論：何炎泉，〈陳淮的書畫收藏與嘉慶皇帝的《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故宮學術季刊》，第32卷第3期（2015.3），頁148-150；劉恒，〈清代書家與《蘭亭序》〉，收入華人德、白謙慎主編，《蘭亭論集》，頁476-479。查瑩任官資料，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共同製作，「明清檔案人名權威資料查詢」網頁（下載網址：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檢索日期：2018年2月18日。

旬，始粗有入處。昨於查映山學使處，見元吳炳藏本，旋又獲見靈巖山人此本。……。歲在癸丑暮春之初，丹徒王文治觀並并。⁸⁰



於此可知，王文治對《蘭亭序》各版本之認識深廣。而畢沅與查瑩特請王文治為其藏品鑑定品評之舉，除顯示王文治對《蘭亭序》的意見所受之重視，同時也反映出畢沅、查瑩等人的收藏眼光。

王文治親見清代兩個重要《蘭亭序》拓本的年代，碰巧都在乾隆五十八年癸丑春天，不難想見此刻王文治內心之激動。由此來看《借園修禊圖》於本幅後請王文治縮臨《定武蘭亭真本》，可說是不二人選，甚至王文治很可能才是此次聚會的真正主角，即如李亨特續蘭亭會中的袁枚一般。而此選擇，不僅可彰顯劉錫嘏幕主畢沅之收藏眼界，同時暗示著畢沅及其幕下群體對碑帖、金石材料之名蹟的第一手掌握，畢沅及其幕賓群體所具有的「文化資本」，是其他幕府所不易做到的。而王文治於《借園修禊圖》末寫著：「尾有餘紙，因仿宋人縮本臨之」，應為自謙之詞。筆者認為，劉錫嘏在此次續蘭亭會舉辦之前，應已計畫於畫後將委請王文治縮臨畢沅收藏之《定武蘭亭真本》，因此畫末界欄當為作畫前已請人勾畫，如此王宸才可能準確預留餘地。而王文治的縮臨，可能為顧及文字的可讀性，及毛筆書寫無法全然展現墨拓殘損與石面裂紋，因此《定武蘭亭真本》上「湍」、「帶」、「右」、「流」、「天」之五字缺損，王文治均未表現（圖 V-34）。但如《真本》上的重大缺殘，如第一行所缺的「會」字，與第二五行「今之視昔」以下墨蹟本中之塗抹痕跡，王文治均留有空白，以顯示其縮臨有本（圖 V-35）。

2-2 《借園修禊圖》之題跋討論

王宸所繪《借園修禊圖》因未使用傳李公麟《蘭亭修禊圖》圖式，或於圖中繪出與續蘭亭會相關的活動，而使其作為修禊圖的辨識度不高，但此畫後方的拖尾卻別出心裁，充分展現畢沅幕府對於金石碑刻的高度興趣，與對《蘭亭序》版本、知識的第一手掌握。此卷拖尾，應該才是這件作品真正的主角。《借園修禊圖》拖尾可分兩部分來討論。第一，孫雲桂與陳崇本（生卒年不詳）以毛筆題寫的跋文；第二，以拓本形式表現之續修禊會參與者跋。後者尤其值得注意。

⁸⁰ 末句於《快雨堂題跋》中修改為「癸丑暮春之初，記於靈巖山館」。見王文治，〈定武蘭亭 又〉，《快雨堂題跋》，卷一，收入劉奕點校，《王文治詩文集》，頁 566-567。



2-2-1 借園修禊之原委及《潁上蘭亭序》的使用

首先，就孫雲桂與陳崇本二跋討論。此二跋分別被裝裱於拓本詩跋前、後二端。孫雲桂為畢沅幕賓，根據孫氏跋文，其文乃應劉錫嘏之請而以為記。孫雲桂題跋如下：

純齋觀察劉公寓江夏之借園，園依山面城，花事頗盛。每值暮春，輒集名流張文謙，續晉人蘭亭之遊，辛、壬之歲（1791、1792），凡兩舉矣。今歲適屆癸丑（1793），二月中旬，園桃爛然，公慮春事之將闌也，以月之廿日，先期修禊，各取《稷敘》字為詩。與斯會者益盛，誠有如王逸少所謂群賢至、少長集者。以余辛歲曾有記，屬余再引其端，爰舉觴而稱曰：天地無終窮，今古無終窮，人之倏往來於其中者，亦憧憧擾擾而無終窮。夫大化嬗而春秋移，人事遷而老少變，歲月寢馳，果堪把玩耶！逸少俯仰之間，頓成陳迹。臨文興歎，不能自己，可謂深於情而能發於言者已。……曾氏子於暮春，有欣契之興，無感慨之詞，其殆由迹而窮其本歟！觀察之詩，卒章曰：雖然盛絲竹聽取曲，將終傷離惜別，猶有情隨事遷之思乎！余弗文弗能集稷敘為歌詩，輒申其旨，而進一解於公。公達人，當不至以余言為河漢焉爾！是日與會者三十一人，又九齡童子二人，畢嵩珠、陳鏗。長洲後學孫雲桂識。（V-表六）

雖然此次續蘭亭會無前、後序之撰寫，但孫雲桂此記猶如序跋一般，說明了此會原委。孫雲桂提到，劉錫嘏曾舉辦三次續蘭亭會，並提到此次與會者較往年為多，或因劉錫嘏即將離幕，故此會似亦帶有送行之意。⁸¹另外，眾參與者各取《蘭亭序》之字為詩。隨後孫雲桂呼應劉錫嘏跋詩，有星移物換，世事更迭，聚散無常之歎。文末記錄了此次參與者連同二童子，共三十三人。

由孫雲桂此記，無法確定他當日是否與會，但顯然此文撰寫於劉錫嘏詩跋之

⁸¹ 劉錫嘏此次應至北京尋找機會，因此會中離情依依。但若就「明清檔案人名權威資料查詢」整理，他在湖北聽候差遣自乾隆五十四年至嘉慶三年（1798）看來，劉錫嘏不久之後應即返回畢沅官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共同製作，「明清檔案人名權威資料查詢」網頁（下載網址：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檢索日期：2018年2月18日。

後，亦即應是續修禊會後才寫。記中所提到的與會人數，與緊接孫雲桂跋後的拓本跋詩人數，有些微參差。計拓本跋詩者有三十五人，或許其中有數人不及與會，事後才補跋詩文。雖然可能這幾個人是會後補入，但他們應該也屬畢沅畢賓，為同一群體，故受邀請。而拓本跋詩之製作是依何而來，則須藉由陳崇本跋進一步了解。

陳崇本（乾隆四十年〔1775〕進士）為名收藏家陳准（1731-1810，乾隆五十七年任江西巡撫）之子，為明末四公子陳貞慧與侯方域的後代，其家在文學與收藏方面甚有積累（見 V-表五）。⁸²陳准與王文治在北京即相識，陳准之弟陳濂（生卒年不詳）與王文治為兒女親家，王文治曾以「所謂交且厚」形容兩家情誼，而陳准與畢沅亦相識。⁸³陳准曾於乾隆五十一至五十六年（1786-1791）任湖北布政使，劉錫嘏可能與他也早就熟識。⁸⁴陳崇本跋如下：

涼秋一雨牕無塵，橫圖卻展思暮春。春風吹向借園裏，脩竹牆根護流水。
興來何地無山陰，觴詠群賢會於此。王翁七十紛文藻，畢家英物桓靈寶。
（秋帆尚書哲嗣嵩珠，九齡能詩，亦與斯會。）作畫人多山水心，分題字
集蘭亭草。我來鄂渚非癸年，開圖俯仰追昔緣。詩才減盡天衣縫，書格裁
將絹本篇。（圖中題句，皆以重摹《穎上蘭亭》字，剪綴成之。「穎上刻」，
乃唐臨絹本也。）亦知光景奔輪速，誰滌塵襟漢江綠。名士搏沙聚散多，
尚書墳草徑秋宿。春明門外踏春頻，訪藥豐臺醉幾巡。先生星鬢今何似，
老我蓬萊後到人。純齋老前輩屬題，即求雅教，侍陳崇本初稿。（V-表六）

此跋有兩個重點。第一，陳崇本以王羲之蘭亭會之「群賢畢至」，來褒譽劉錫嘏續蘭亭會的參與者及畢沅九歲幼子，而武昌雖非山陰，但興起之時，武昌亦可作山陰。續蘭亭會在王羲之之後的發展，早已是處處可為山陰，雖然畢沅幕賓不像李亨特因主紹興而可展現其對此歷史名蹟的「佔有」，**但他們將武昌作山陰的作**

⁸² 關於陳准的家世與收藏研究，見何炎泉，〈陳准的書畫收藏與嘉慶皇帝的《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頁 139-179。

⁸³ 王文治，〈唐人書律藏經真蹟〉，《快雨堂題跋》，卷三，收入劉奕點校，《王文治詩文集》，頁 595；畢沅，〈題陳望之中丞寫照即送之任黔陽〉（辛亥）、〈題陳葯洲中丞廬山觀瀑圖〉（壬子），卷三十九《香草吟》，收入楊焄點校，《畢沅詩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頁 945、945。

⁸⁴ 陳准任官資料，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共同製作，「明清檔案人名權威資料查詢」網頁（下載網址：<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scgi/ttsquery?0:17900103:mctauc:TM%3D%B3%AF%B2a>），檢索日期：2018年2月18日。

法，仍在蘭亭會傳統之中。第二，與會者集《蘭亭序》文字為詩，且跋中所見的題字並非作者親自書寫，而是以重新摹刻《穎上蘭亭序》後，依個人詩文需要，重新剪裱而成的大型製作。

陳崇本對於劉錫嘏此會，重新製作《穎上蘭亭序》以剪裱個人詩文的說明，十分重要。清代金石學因被認為可以「證經典之同異，正諸史之謬訛」作為考據學之輔助，而受到重視。⁸⁵但同時，乾嘉時期的金石學也逐漸以其藝術性，受到文人群體看重，並影響及書畫、篆刻領域。⁸⁶知名幕府如朱筠、畢沅與阮元等，在金石、考據學領域均有相當之建樹。當時學者對於古代碑刻興趣濃厚，往往在遇到難得的石刻拓本後，重新拓印存之或摹刻上石，如前文提到錢泳轉摹《熹平石經》殘字刻石後，「拓數百本」於各地流傳，為李亨特、翁方綱摹刻於府學之事。⁸⁷而穎上本《蘭亭序》在明末、清代十分知名，論者認為主要起因於明代董其昌（1555-1636）跋此本曾言：「余得此本，以校各帖所刻，皆在其下。當是米南宮（米芾）所摹入石者，其筆法類似爾。」⁸⁸雖然董其昌給與「穎上本」高度評價，但此石殘甚，共缺二十九字，據王連起研究認為此本僅為「隨意的臨本」，可能為宋高宗（1127-1162 在位）所書（圖 V-36，北京，故宮博物院藏）。⁸⁹雖然如此，《穎上蘭亭序》在清代之地位是無庸置疑的，王文治曾言「昔推《定武》，今崇《穎上》，無疑為「穎上本」在當時文人心中之看法作一注解，並且，也間接說明了劉錫嘏續蘭亭會選擇重現此兩版本的原因。⁹⁰對劉錫嘏與畢沅幕賓群體而言，以當時頗負盛名之《穎上蘭亭序》上文字，代眾人親跋，必是此次續蘭亭

⁸⁵ 所引為李遇孫《金石學錄》中語，轉引自潘勝強，〈清代金石學研究領域的拓展及其原因探析〉，《陰山學刊》，第 29 卷第 3 期（2016.1），頁 76。另可參閱朱劍心，《金石學》，收入《民國叢書（第五編）》（上海：上海書店據商務印書館 1940 年版影印，1996），第 86 冊，頁 4-12 對「金石學之價值」的討論。

⁸⁶ 清代黃易（1744-1802）在金石學及藝術上的相關作為頗具代表性，而他與畢沅、阮元等幕府亦往來密切。相關研究如，石守謙，《山鳴谷應：中國山水畫和觀眾的歷史》（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頁 326-331；曾藍瑩，〈遺跡探尋與記憶重塑：從黃易《嵩洛訪碑圖》冊談起〉、〈媒介與信息：武氏祠的再發現與清代的文化生產〉，收入故宮博物院編，《黃易與金石學論集》（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頁 76-91、257-273，其中頁 265 提到，「黃易據稱是畢沅的弟子」；朱琪，〈黃易的家世、生平與金石學貢獻〉，頁 358-371。

⁸⁷ 清代《熹平石經》的發現與重製，在當時為一盛事，且與黃易關係密切。見張玉芳，〈黃易與東漢熹平石經〉，頁 114。對於臺大歷史系教授許雅惠提醒清代重刻碑石乃十分普遍之事，特此申謝。

⁸⁸ 引文見董其昌，《容齋集別集》，卷二。轉引自王連起，〈關於《蘭亭序》的若干問題〉，頁 39。

⁸⁹ 關於《穎上蘭亭序》之研究，見王連起，〈關於《蘭亭序》的若干問題〉，頁 39-40。清人對「穎上本」的看法，可參見黃汝婷，〈清人王澐《蘭亭》研究譚論——以王澐相關題跋為中心〉，《中國書法》，第 314 期（2017.9），頁 59-61。本文用來比較的《穎上蘭亭序》，為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

⁹⁰ 王文治，〈穎上蘭亭〉，《快雨堂題跋》，卷一，收入劉奕點校，《王文治詩文集》，頁 571。

會中特別設計的活動，甚且是否為王文治所建議，倒也未必無此可能。雖然目前無法確定劉錫嘏所使用的《穎上蘭亭序》出自何人收藏，但此次集會中，很可能備有《定武蘭亭真本》與《穎上蘭亭序》與眾同觀，這在當時，必為盛事一椿，也定非尋常之續蘭亭會所可能為之。⁹¹



2-2-2 《借園修禊圖》之拓本詩跋

在確定劉錫嘏續蘭亭會參與者，是以《穎上蘭亭序》作為詩文依據之後，即可進入第二類以拓本形式為表現之跋文部分的討論。《借園修禊圖》之拓本詩跋，共有三十五人參與，目前查得此三十五人身分，確定為畢沅幕賓者十人、畢沅家眾三人、畢沅友人一人，另有兩人劉瀛、劉灝與劉錫嘏均籍鮑邱，或為其家眾，扣除此十六位，雖尚有十九人無法確認身分，但絕大多數應該均為畢沅幕賓（見 V-表五）。而此次與會者如王宸、方正澍、史善長等，都是畢沅幕中知名的幕賓，如畢沅曾選方正澍詩入《吳會英才集》，畢沅過世後，史善長著有《弇山畢公年譜》。此外嚴觀，為畢沅名幕嚴長明（1731-1787）子，嚴長明在陝西時期已入畢沅之幕，嚴觀自小耳濡目染，隨後也成為畢沅幕賓，曾助《湖北金石詩》之搜訪、刊行。⁹²

此三十五人詩文形式有五言、七言詩及詞，可能因須以《穎上蘭亭序》所存之字為依據，內容實差異不大，讀來幾乎大致呼應王羲之《蘭亭序》文意（見 V-表六）。透過比對，《借園修禊圖》之拓本詩跋確實出自《穎上蘭亭序》用字，只是《蘭亭序》原文畢竟僅有二百多字，要合乎三十五人詩文使用，勢必於「穎上本」刻石後，拓印多本，以供剪輯重複出現之文字，再視個人詩文所需重新剪裱。因此如圖 V-37 所見，《蘭亭序》僅出現一次的「是」字，在不同人詩文中重複出現，因每次拓印狀況各異，故每個「是」筆畫粗細、墨色濃淡亦有分別。但若同一字在《蘭亭序》中出現數次，那麼剪裱時，製作者亦搭配使用。如「感」字在《蘭亭序》中共有三字，楊搢跋中共出現四次「感」字，而剪裱時使用了原

⁹¹ 王文治《快雨堂題跋》中之〈穎上蘭亭〉則，此拓原為巴慰祖（1744-1793）所藏，後入汪穀（1754-1821）之手，並為其刻入《試硯齋帖》（汪谷穀，湯澤山摹刻）中。雖未查得畢沅是否也收藏有「穎上本」或其對此本之意見，但依當時這群文人之間緊密的程度，畢沅幕府或劉錫嘏等要獲得此拓本，應非難事。王文治，〈穎上蘭亭〉，《快雨堂題跋》，卷一，收入劉奕點校，《王文治詩文集》，頁 570-571。

⁹² 張俊嶺，《朱筠、畢沅、阮元三家幕府與乾嘉碑學》，頁 84。

《蘭亭序》中的兩種「感」字寫法（圖 V-38）。一般來說，書家寫字務求通篇重複之字，以相異的寫法來表現，求取變化，但楊摺跋中四個「感」字，並未見從《蘭亭序》僅有之三字加以取用、搭配的企圖。故筆者認為，《借園修禊圖》之拓本詩跋的剪裱，可能由工匠所決定，劉錫嘏、王文治等善書者並未參與。雖然如此，仍不難想見工匠剪綴此三十五人詩文之工作繁複、細節冗雜，若非經驗豐富的刻工，恐怕也無法受到劉錫嘏等委託。此外，「穎上本」為一殘本，共缺二十九字，故如王羲之《蘭亭序》中僅出現過一次的「在」、「癸」、「丑」三字，於「穎上本」中實已缺佚，跋者與工匠從《穎上蘭亭序》中應無法取得這些字來運用。但實際比對《借園修禊圖》拓本詩跋卻發現，此三字仍出現在詩跋當中（圖 V-39、圖 V-40）。顯然為顧及詩文寫作之需，《借園修禊圖》拓本詩跋在以「穎上本」重新摹刻上石時，同時借用其他版本的《蘭亭序》，補其缺佚。最後，待工匠將全數詩文剪裱完成後，再由書家以泥金書寫作者籍貫、姓名，並加註釋。整體而言，劉錫嘏等對此《借園修禊圖》之拖尾的設計與期待甚為講究，且此工序可能不輸於翁方綱等重刻碑石之舉。

雖然《借園修禊圖》拓本詩跋的製作頗為繁複、執行工匠應該也是經過挑選，但若細究其拓印成果，實非屬上乘。以圖 V-37 為例，每個「是」字的細節，字口未必完全清晰，有些邊角、筆畫為墨色暈黑，顯見水分控制不佳。而如圖 V-37（二）之「是」字，筆畫周圍黑地墨色並不一致，顯示撲墨不夠均勻。這兩種情況在整卷拖尾中很容易見到。《借園修禊圖》拓本詩跋製作品質之良莠不齊，對十八世紀熟悉金石碑拓的文人而言，應很容易發現。但由於此拓本詩跋製作之構想，與蘭亭會為詩不成罰酒的設計一樣，均可視為文人之戲，因此倒也無須過度計較。但相較於繪畫之容易入眼，碑拓僅見黑白二色，究竟當時文人對於碑拓之欣賞與講究為何？

關於此點，白謙慎的研究已有清楚分析。⁹³乾嘉時期訪碑風氣大盛，金石學者或藏家對拓工有高度需求，甚至許多文人、學者也精擅椎拓之法，此種人物在畢沅府中應該不難尋得。時人眼中之佳拓，做工精緻，在質感、墨色等方面要求均高，此可以十九世紀知名金石藏家、學者陳介祺（1813-1884）與吳大澂（1835-1902）書信內容，窺知清代金石拓本之收藏、鑑別傳統中，對精拓之追求。陳介祺一八七三、一八七八兩封給吳大澂的信中分別寫到：

⁹³ 見白謙慎，《吳大澂和他的拓工》（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頁 90-101 討論。



沙南侯獲奢望一二十紙，敦煌、倉頡、石門頌諸漢刻均望洗剔，以綿料厚紙，先撲墨，後拭墨，精拓之。水用芟膠去礬。……

《孟鼎》求手自精拓，薄紙佳（大更佳），墨本以下半字審拓，多見筆畫為要。⁹⁴

對講究的藏家來說，根據所拓物件不同性質，使用的紙張也必須區別，但所謂精拓，必是使用「先撲後拭」之法來製作，且以能清晰見到筆畫為要。能夠看清筆畫除在文字學上有意義之外，拓本之用筆及精神，與書法表現、審美也息息相關。關於此點，《借園修禊圖》的拖尾詩跋，即表現得不夠精到。十九世紀時，已不易找到願意花費心力以此方式進行椎拓者，但乾嘉年間，尤其對畢沅、劉錫嘏等人而言，好拓手應該不難覓得，他們對於精拓也有需求。⁹⁵如畢沅《山左金石志》中，即提到透過「洗石精拓」之〈北海相景君碑〉拓本，來與《隸釋》校勘，發現雖然碑刻甚殘，但經此製作之拓本，「不辨者十數字而已」。⁹⁶由於金石學的發展與考據學密切相關，精拓對於治學的幫助甚大，也因此追求精拓不只是為了審美考量，還與當時的學術需求有關。而對這批金石考據學者、藏家來說，拓本除椎拓手法務須要求以外，裝裱的形式也必經審慎考慮，如何處要留下空白以寫釋文、考據等，均甚考究。⁹⁷這種情況，也出現在《借園修禊圖》的拖尾詩跋中。由於該卷拖尾注釋為剪裱之後才以毛筆書寫上去，剪裱當時，待注釋之處即須預留空位，空位大小，工匠必須事先計算，否則恐怕全篇注釋字體尺寸無法統一，也怕所留位置不夠書寫，但如劉錫嘏所跋詩文，為眾詩跋中注釋最多者，看來卻控制得十分妥貼，猶如剪裱、書寫一次完成，而非分次處理（圖 V-41）。此外，根據不同拓片的顏色，雖可分為「烏金拓」、「蟬翼拓」、或濃淡相間的「鑲拓」等，不論墨色如何、是否拓得精到，能夠拓得「乾淨」，是最基本的要求。⁹⁸所謂「乾淨」，應該即指用墨勻淨，但若以此來檢視《借園修禊圖》拓本詩跋，即

⁹⁴ 轉引自白謙慎，《吳大澂和他的拓工》，頁 24、31。

⁹⁵ 十九世紀好拓工難尋之討論，見白謙慎，《吳大澂和他的拓工》，頁 45-49、81。根據白謙慎研究，追求精拓的風氣，起於乾嘉時期。見同書，頁 90。

⁹⁶ 畢沅，〈北海相景君碑〉，《山左金石志》，卷七，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嘉慶刻本）。

⁹⁷ 此見吳大澂一八八六年寫給尹元鼎之信。見白謙慎，《吳大澂和他的拓工》，頁 62-66。

⁹⁸ 見吳大澂書信：「僕人極老實，拓雖不精，尚屬乾淨」。見白謙慎，《吳大澂和他的拓工》，頁 46。

可知此詩跋之製作可能時間甚短，施工求速，故無法採用需耗時才能達到勻淨的手法。

此外，《借園修禊圖》後的拖尾詩跋，因是以石刻（或木刻）拓本的方式將眾人題跋剪綴於上，相較於以毛筆直接題寫的質感，具有十分濃厚的物質性特質，使觀者很容易產生如親自手摩古拓一般的感受。尤其當時常見之王羲之《蘭亭序》的裝裱，多如圖 V-42 《明拓明益王重刻大蘭亭圖卷》所見，於《蘭亭序》拓本（或墨蹟）前後，附有柳公權《書蘭亭書》、孫綽〈後序〉、米芾跋、宋高宗御札、朱有燾書《蘭亭序》考訂文字及跋、趙孟頫《蘭亭》跋等多項內容，因此展開時，往往看到一段或長或短的墨拓書蹟。⁹⁹一般所見的蘭亭圖，通常伴有書畫家手書之《蘭亭序》一篇，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文徵明《蘭亭修禊圖卷》等作所見。¹⁰⁰總之，種種上述《蘭亭序》或蘭亭圖裝裱上所具備的基本元素、面貌——或說，予人的深刻印象，俱成為《借園修禊圖》製作上的參考來源。這也正是劉錫嘏等欲給《借園修禊圖》之觀者的印象，亦即有意將《借園修禊圖》塑造如一般所見王羲之《蘭亭序》墨蹟或拓本予人以「古香」的視覺效果與感受。¹⁰¹

上述關於拓本之種種效果及製作過程，需要蘭亭相關的知識與高度興趣作為基礎，而這正是畢沅幕僚長年投入金石學領域的鮮明特色。故可推測在此製作過程中如文人之戲，亦如文人知識之實踐，參與者必然對此構想展現出濃厚的興趣及參與感，在眾人的集體投入下，進而塑造出畢沅幕賓的集體記憶與共感。尤其此作拖尾題跋人數雖眾，卻僅陳崇本一人可謂為「圈外人」，不屬畢沅幕賓群體。陳崇本之所以有幸獲觀此作，很可能與其父陳淮亦為名收藏家，對蘭亭知識也知之甚詳有關。而當陳崇本參與此作題跋，其對劉錫嘏續蘭亭會的支持，也使這位圈外人「獲准」進入圈內。總之，《借園修禊圖》題跋者以集會參與者為主要對象的作法，更形強化了《借園修禊圖》的私密性質——僅屬於一個特定群體所共有的集體記憶與創造。

2-2-3 《借園修禊圖》之其他問題

⁹⁹ 《明拓明益王重刻大蘭亭圖卷》圖版解說，見故宮博物院編，《蘭亭圖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頁 291。

¹⁰⁰ 文徵明等相關圖版，見故宮博物院編，《蘭亭圖典》，頁 310-311、320-321、330-331 等。

¹⁰¹ 「古香襲人」之形容出自黃易。根據白謙慎研究，此描述應是就「拓本所呈現出由漫漶所造成的濃淡層次」而言。白謙慎，《吳大澂和他的拓工》，頁 92-93、98-99。

關於《借園修禊圖》還有兩個小問題可稍作討論。第一，劉錫嘏友人吳翌鳳於癸丑隔年，曾獲觀《借園修禊圖》。據其標題〈癸丑上巳，劉純齋觀察重修禊事于借園，同集者三十一人，各集右軍《蘭亭序》中字為詩。王蓬心太守繪圖，夢樓侍講臨禊帖于幀首，極一時之盛。時余適客章門，未與其會。明年春來，鄂公子褒海出圖觀之，振觸往事，仍填滿江紅調一闕，志之卷尾〉，得知吳翌鳳曾於癸丑隔年，乾隆五十九年春（甲寅），獲「鄂公子褒海出圖觀之」，並以一闕詞「志之卷尾」。¹⁰²「鄂公子褒海」究竟為何人，目前無法確定，不知是否為湖廣總督畢沅之子的敬稱？畢沅三子雖名「鄂珠」，但乾隆五十九年鄂珠僅為三歲稚兒，如何可能展卷予吳翌鳳觀之。而從吳翌鳳《與稽齋叢稿》看來，其與劉錫嘏的親熟度實高於畢沅，若考慮此點，那麼「鄂公子褒海」是否為劉錫嘏後輩？日後，當此人身分若得確定，當可更進一步釐清《借園修禊圖》之主人為畢沅或是劉錫嘏。¹⁰³

第二，雖然畢沅並未列入《借園修禊圖》後之拓本詩跋中，但癸丑當年，畢沅文集卻收有一首〈集蘭亭禊帖字題劉純齋觀察寓園修禊圖〉。¹⁰⁴筆者認為，劉錫嘏於同年中，不太可能舉辦兩次續修禊會，且從文獻中也未見二次集會的記錄，尤其如吳翌鳳與其熟悉至此，劉錫嘏舉辦的三次雅集，吳氏文集中均曾載記，但也未提到同年二度修禊之事。總之，雖無法確定畢沅究竟是否出席，他確實有詩文與眾人相唱和。但畢沅之出席與否及其詩文為何無人提及？筆者推測有下列兩種可能。首先，因乾隆末年，民變、兵災四起，畢沅在乾隆五十九年甚至曾被短暫貶為山東巡撫，世事紊亂，致使畢沅及其幕賓不希望將其詩文一併收入《借園修禊圖》拓本詩跋當中，予人以畢沅耽於逸樂的印象。其次，若如前文推測，《借園修禊圖》共有二卷，那麼畢沅詩文很可能由其親手書題於目前未見之另本《借園修禊圖》上。無論如何，畢沅對此次續蘭亭會是知之甚詳的。另外根據畢沅詩題，劉錫嘏的修禊會是於「寓園」舉行，而非「借園」，劉錫嘏與畢沅如此熟悉，畢沅此處定非筆誤。劉嗣綰《尚絅堂集》中，收入寫於一七九一年劉錫嘏第一次

¹⁰² 吳翌鳳，〈滿江紅〉，《與稽齋叢稿》曼香詞上，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嘉慶〔1796-1820〕刻本）。

¹⁰³ 此外，目前所見之《借園修禊圖》拖尾並未見吳翌鳳所述之跋。此有兩個可能，第一，現存此卷在重新裝裱時，吳氏之跋遭人裁去。另一可能為，《借園修禊圖》當時或許製作成兩本（拖尾拓本詩跋則可能製作成數十本，供眾人收藏），一本由劉錫嘏收存，另一本藏之畢沅處。若考慮「鄂公子」之稱較可能針對畢沅之子，那麼現藏南京博物院者應為劉錫嘏藏本，有吳翌鳳題跋之卷，則可能為畢沅藏本。

¹⁰⁴ 畢沅，〈集蘭亭禊帖字題劉純齋觀察寓園修禊圖〉，卷三十九《香草吟》，收入楊焄點校，《畢沅詩集》，頁954-955。

於借園舉辦續蘭亭會的詩文，此詩首句即為「借得閒園為餞春」，此句倒是對此疑問提供了一個可能的解釋。¹⁰⁵孫雲桂跋曾言「純齋觀察劉公寓江夏之借園」，劉錫嘏為河北鮑邱人，因依畢沅幕下借寓於武昌，而劉錫嘏所借之園，可能原名即畢沅所謂「寓園」，由於是借寓於此，故劉錫嘏稱其為「借園」。此事應為畢沅幕賓群體所悉，故眾人所題詩文，均名此為「借園」。

綜上所言，劉錫嘏主持的續蘭亭會，即便日期不在上巳，地點不在山陰，但畢沅幕賓透過精心策劃之《借園修禊圖》的繪畫、王文治縮臨《定武蘭亭真本》，及剪裱製作之拖尾詩跋等複雜設計，來展現這個群體對於王羲之蘭亭會非僅流於形式上的模仿，而是內涵上的理解與追隨。此舉，毋寧突顯畢沅幕賓群體對於金石考據學問的熟悉與投入，故其續蘭亭會，有能力將王羲之蘭亭會傳統，融入清代當時學術風氣之中，從而塑造了蘭亭史上續蘭亭會的一種嶄新而富時代意義的表現形式。與此同時，劉錫嘏等畢沅幕賓亦透過此重塑蘭亭傳統的舉措，來塑造這個群體區別於其他團體，更有能力展現對一手金石材料之掌握與運用的形象，同時在實踐當下，也形塑了畢沅幕賓的群體認同與共感。

第三節 小結

透過本章所討論之乾隆末年兩個幕府群體的續蘭亭會，可發現不同幕主、賓客所組成性質相異的幕府群體，對於續蘭亭會的期待與作法各自不同，對蘭亭「紀念物」之想法與製作亦各有所重。李亨特之群體與劉錫嘏、畢沅群體對續蘭亭會的操作手法，即截然相異。尤其，李亨特靠捐納出身，其教育背景、養成及薰陶的過程，不僅與畢沅、劉錫嘏相異，甚至大概也和其幕賓差距甚遠。在此情況下，其所統理的幕府之文化資本，顯然弱於畢沅之幕，也因此文化事業上的表現與競爭，也會各有所重。

就李亨特幕府與畢沅幕府之續蘭亭會的比較而言，二者在續蘭亭會之日期的選擇（均為「上巳」）、舉行地點務須臨水，及完成一創作成品等數件事上，均承襲自王羲之蘭亭會。但在透過「紀念物」之製作以追仿「群賢畢至」上，李亨特特別藉由袁枚及拖尾題跋之高官名人的參與，以壯大聲勢、引人目光，進而塑造

¹⁰⁵ 劉嗣綰，〈家純齋觀察招同人修禊借園屬王春波補圖即用原韻題卷後〉。

其自身與群體之文化形象。劉錫嘏、畢沅之群體，雖然與袁枚亦相熟識，身邊亦不乏高官顯要，但他們的續蘭亭會所邀請的主角，乃是作為同好、好友的王文治，而不委請外人錦上添花。就此而言，畢沅幕賓群體所展現之自我認同與自信，遠高於李亨特群體。而就「紀念物」——續蘭亭會圖繪——的製作而言，李亨特使用傳李公麟《蘭亭修禊圖》與十八世紀流行之雅集圖，作為其續蘭亭會的圖式來源，並請職業名家以相近於宮廷的西洋畫法仔細描摹與會者面容，令觀者可一一指認，宛若將所有參與者框架在一畫面上，亟欲說明此為一仿效王羲之蘭亭會的「群體」。相較於此，畢沅幕賓則不在乎自身及同僚形象是否可被「看見」，文人畫家王宸所繪的畫作固然具有紀念意義，但對畢沅幕賓群體而言，拖尾處的拓本詩跋恐怕才更是他們的群體寫照。在此拓本詩跋中，不僅每位參與者均有能力使用《蘭亭序》僅二百多字重新構思文詞，且此拓本詩跋的製作使用了知名版本——《穎上蘭亭序》——為基礎，又倩巧匠以繁複的工序剪裱眾人詩跋，畫作後方還有王文治縮臨之畢沅收藏《定武蘭亭真本》。畢沅群體在續蘭亭會中的精緻表現，突顯出他們在清代的學術地位及藝術鑑藏知識之高下，就此而言，李亨特及其幕賓群體遠遠無法與之相較。雖然如此，李亨特群體之續蘭亭會，仍有反映十八世紀之時代特色的新作法。如其以西法描繪參與者之圖繪風格的選擇，以及結合圖卷與方志，共同運作其個人之文化、政治聲望，並凝聚、提升其幕僚群體的操作。對李亨特來說，他的目的是希望藉由其文化資本，換取社會、經濟資本，而畢沅群體，則似乎較無此意圖。

總而言之，透過上文討論可發現，兩個幕賓群體雖均透過續蘭亭會的舉辦，藉由「紀念物」之製作來塑造群體及主持者自身之文化形象（劉錫嘏、畢沅者，則未有太強烈之塑造主持人之意味）。李亨特在這場續蘭亭會的舉辦、蘭亭圖與《（乾隆）紹興府志》之製作中所隱含的政途謀算，極為突顯意欲塑造、突出個人之舉，使其群體予人一種以李亨特為首之感。反觀劉錫嘏的借園修禊，參與者以畢沅友人、家人與幕賓為主，他們的學術品味與文化喜好相同，且在整個集會的紀念成品中，劉錫嘏與畢沅也未有特別突出之感（劉跋寫在跋詩後方，畢沅詩文甚至並未刻入），透過拖尾拓本跋詩，更清晰地令觀者見到屬於一個特定群體的整體文化形象。但不論如何，這兩個幕府群體的續蘭亭會，均可見到以十八世紀學術、藝術風潮為基礎的新表現，從而也肯定了王羲之蘭亭會傳統在「塑造群體」上的絕佳效力。就蘭亭史的發展而言，十八世紀可謂為蘭亭傳統之重塑典範的重要里程。

第六章 | 結論



王羲之蘭亭會聞名歷史，同時也是藝術史及文化史中非常重要而成功的一個典範。這個典範，不僅產出王羲之的書法名作《蘭亭序》，同時建立了供後世一再追仿的雅集模型。這個雅集模型包含固定的聚會日期、「賢才群聚」的參與者、「曲水流觴」之場所，以及詩文比競、修禊儀式之活動設計與「紀念物」的製作。透過這些特色的運作，在集會之「塑造群體」的需求上提供實質效益。雖然在歷史長河的發展中，續蘭亭會之舉辦除「務須臨水」的條件及「賢才群聚」的期待通常被繼承下來之外，其他細節多依據不同群體而有相應其需求的作法。經筆者觀察，凡經續蘭亭會主持人或參與者精心設計、導入活水的續蘭亭會，往往也透過「紀念物」之製作來參與蘭亭傳統的重塑，並滿足該群體「塑造群體」之需求。這樣的群體，正是本文主要觀察的對象。

除了本文所討論之十七至十八世紀宮廷內、外部蘭亭文化的表現之外，十九世紀的中國仍然可見續蘭亭會的舉辦。值得注意的是，王羲之蘭亭會的魅力不僅吸引中國本地的追隨者，鄰近東亞地區的韓國與日本，也有續蘭亭會的辦理。本章在結論之前半部分，將先簡單說明清代中晚期宮廷外部之續蘭亭會的狀況，以及韓國在朝鮮哲宗四年(1853)由金奭準所主持之修禊會、日本大正二年(1913)之「癸丑蘭亭會」，最後才為本研究進行總結討論。

第一節 中國十九世紀之續蘭亭會的發展列舉

十九世紀清代宮廷內部的流杯建構，似乎未如康熙、乾隆時期般蓬勃發展，但也並非完全停止營造。例如光緒十八年(1892)，慈禧太后於頤和園中之諧趣園重修了一座「蘭亭」，但此座「蘭亭」並未有流杯等相關建設，單純為一座亭子，亭中放置著乾隆御書〈尋詩徑〉石碑，對照過去康熙、乾隆對蘭亭傳統的作為，差異甚鉅。¹此外，與宮廷相關的流杯亭在北京恭王府及醇親王墳亦可見到。北京恭王府中的「沁秋亭」是一座流杯亭，雖然恭王府曾在乾隆時代為和坤府邸，

¹ 參閱中國園林博物館網頁，「園林瑰寶：方寸山水話諧趣（上）」，網址：<http://www.gardensmuseum.cn/cn/1-2-2a-more.aspx?ID=2200&type=a>，檢索日期：2018-11-1；周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0），頁432-433；茹遂初，《頤和園》（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06），頁52。

但據研究，這座流杯亭很可能是同治五年（1866）恭親王奕訢（1833-1898）居住時所修造（圖 VI-1）。²至於醇親王奕譞（1840-1891）之墓，一般俗稱「七王墳」，此墓大約完成於光緒十三年（1887），其中的陽宅建築中也修有一座流杯亭。³於此似乎可以理解，自從康熙皇帝在宮廷建立了「流杯亭」的傳統之後，其後代子孫亦不時承續康熙的興致，在自家宅院中也建造流杯亭。除此之外，康熙皇帝近臣陳廷敬（1638-1712）建造於康熙年間之私宅「午亭山村」（位於山西晉城），也有一座與恭王府「沁秋亭」水道相仿的流杯亭（圖 VI-2）。⁴對於這些與宮廷相關之流杯亭的建造與使用，尚待進一步研究。

除與宮廷相關的流杯亭仍繼續被建造之外，清宮外部的續蘭亭會也依然是文人社群所喜好的活動。以下將列舉兩個宮廷外部之續蘭亭會稍作介紹，分別為曾燠（1760-1831）及黃爵滋（1793-1853）等在廣州、北京所舉辦的續修禊會。

首先，嘉慶二十年（1815）三月三日，廣東布政使曾燠在廣州長壽寺，集其幕僚、友人共十一人，一同修禊。⁵曾燠曾在揚州主持題襟館，可見其對詩文雅聚之熱衷。此次續蘭亭會有徐承熙（生卒年不詳）繪《曾賓谷長壽寺後池修禊圖》傳世，雖然圖後王崇熙（生卒年不詳）跋提到「雅集羅群賢」、劉彬華（嘉慶六年〔1801〕進士）也有「古蘭若即今蘭亭」等呼應王羲之會的用語，但曾燠之序末卻特別注釋「昔在揚州紅橋修禊，距今二十年矣」（圖 VI-3）。⁶於此來看，王羲之蘭亭會並非不再是後人追隨的典範，但紅橋修禊顯然對曾燠雅集的參與者來說，也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可說是清代蘭亭發展中一個極富時代意義的現象。但由於王士禛之紅橋修禊的「紀念物」是詩文創作，這個作法原本即存在於蘭亭傳統中，因此由一個更高的視角來檢視的話，王士禛之續蘭亭會並沒有為此傳統帶來新意。

² 耿威、王其亨，〈樣式雷圖檔中的恭王府花園〉，《中國園林》，2010年第9期，頁65。

³ 侯志雲，〈風雨七王墳〉，《北京日報》，2009年6月21日。轉引自北京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網頁，網址：<http://www.bjdfz.gov.cn/ShowNewsLevel3.jsp?NewsID=1502>，檢索日期：2018-11-1；

王心白、紀偉，〈醇親王墓碑亭修繕和特點淺析〉，《古建園林技術》，2001年第3期，頁35-39；

⁴ 莫賽，〈淺析皇城相府官宅建築的傳統文化內涵〉，《山西建築》，2009年第7期，頁43-44；張廣善，〈淺議午亭山村〉，《文物世界》，2002年第2期，頁68-72。

⁵ 相關研究見李若晴，〈山門流轉一滄桑——曾賓谷長壽寺修禊圖遞藏考〉，《新美術》，2011年第6期，2011年第6期，頁43-52；姜伯勤，〈清代長壽寺園林雅集與廣府文化及琴道——《曾賓谷先生長壽寺后池修禊圖》初探〉，《廣州文博》（廣州：廣州市文物博物館學會，2007），頁12-30；侯冬，〈曾燠幕府雅集與乾嘉之際文人心態〉，《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9卷第6期（2012.11），頁77-84。

⁶ 姜伯勤，〈清代長壽寺園林雅集與廣府文化及琴道——《曾賓谷先生長壽寺后池修禊圖》初探〉，頁16。

就「紀念物」之製作來看，徐承熙的《曾賓谷長壽寺後池修禊圖》並未使用傳李公麟《蘭亭修禊圖》的圖式來修改，所採用的是如第五章所討論，陸治《元夜宴集圖卷》之類的傳統文人雅集圖式（圖 V-30）。即畫上有文人在屋舍中進行書寫、彈琴、欣賞器物等活動，屋外也有數人坐在林裡談天。但此圖若無文字記述以表明活動主旨，觀者單看圖象本身，應無法猜測所描寫為修禊雅集。透過姜伯勤研究指出，當日確實有二人彈琴，故畫上描繪著鼓琴者，此或可說即曾燠之續蘭亭會想要特別紀念之處。⁷而為圖後書序、跋之曾燠、趙塵、胡森等人，均特別提及此次修禊會中彈奏古琴之事，甚至分析兩位演奏者之琴藝特色。⁸於此而言，曾燠在長壽寺所舉辦的修禊可說是古琴同好的一個雅集，透過王羲之蘭亭會原本即帶有之塑造群體的特色，試圖框架出曾燠和幕僚、友人雅好琴音之群體共感。雖然如此，《曾賓谷長壽寺後池修禊圖》使用傳統文人雅集圖式的作法，並非此集會之特殊創造，而作為古琴同好之集會的特色若無文字說明，也無法透過「紀念物」被有效彰顯。因此筆者認為，曾燠之續蘭亭會並未在蘭亭傳統中塑造出新意。

另一個續蘭亭會之例，是道光十六年（1836）鴻臚寺卿黃爵滋（1793-1853）及戶部員外郎陳慶鏞（1795-1858）等，在北京陶然亭所舉行的「江亭展禊」。⁹嘉慶、道光年間，士人之間的小型雅集數量眾多，以北京而言，宣南一帶的詩社即十分活躍。道光十六年由黃爵滋、陳慶鏞等所發起的江亭展禊，可謂為一時之盛。江亭展禊是由中央官員鴻臚寺卿黃爵滋、葉紹本（嘉慶六年〔1801〕進士），翰林院編修徐寶善（1790-1838）、黃琮（嘉慶六年〔1801〕進士），戶部員外郎陳慶鏞、汪喜孫（1786-1848）等六人發起。由發起人各邀請七人，共四十八人擬王羲之蘭亭會之數，一同參與陰曆四月四日於陶然亭（即江亭）所舉辦的續修禊會。與會者有不少是當年三月參與京城會試恩科的舉人。

此次活動有梅曾亮（1786-1865）、丁晏（1794-1875）序，另有陳慶鏞作後序。陳慶鏞的〈丙申四月四日江亭展禊後序〉中記錄了所有參與者姓名，並由戶

⁷ 姜伯勤，〈清代長壽寺園林雅集與廣府文化及琴道——《曾賓谷先生長壽寺后池修禊圖》初探〉，頁 18。

⁸ 見姜伯勤，〈清代長壽寺園林雅集與廣府文化及琴道——《曾賓谷先生長壽寺后池修禊圖》初探〉，頁 18-21 之討論。

⁹ 相關研究參見新村容子，〈1820~30 年代北京の士大夫交流（4）：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四日「江亭展禊」を中心として〉，《岡山大學文學部紀要》，第 55 號（2011），頁 45-65；羅檢秋，〈嘉道年間京師士人的修禊雅集與經世意識的覺醒〉，收入鄭大華、鄒小站主編，《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國》（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05），頁 292-306。

部主事溫肇江（1779-1842）繪圖紀念此事，可惜畫作似乎已不存於世。¹⁰此次續蘭亭會中，眾人除有詩詞唱和之外，更一同觀賞發起人之一的汪喜孫家藏宋刻《禊帖》。根據參與者姚燮（1805-1864）所言，汪喜孫「以宋搨《蘭亭卷》，後書同人詩文，藏棗花寺」。¹¹在特別收藏的《蘭亭序》拓本後，寫上一同參與此會者之詩文，這個作法與劉錫嘏等製作《借園修禊圖》的構思極為接近，但也不出宋代以來加入賞鑑文化之續蘭亭會的舉辦模式。而根據陳慶鏞後序指出，江亭展禊的舉辦「並非上巳，蓋不以其時、地之美，唯其人也。……。夫良時勝地往往而有，獨人才之聚為難耳。」¹²因知江亭展禊乃緣於王羲之蘭亭會的特色——「賢才群聚」——而舉辦。或許因恩科考試在三月，許多此次被邀集的參與者均需應試，故延至四月舉辦，而北京也非紹興蘭亭，故陳慶鏞後序首先排除了時間與地點之重要性，以呼應蘭亭會之「賢才群聚」的概念，是為江亭展禊的殊勝所在。據新村容子研究，認為「江亭展禊」舉辦背後實有政治目的，即這群以黃爵滋為首的士人群體，對於鴉片煙抱持著嚴格禁止的態度，並聯結士人議論時政，企圖對中央政策造成影響，以達救國濟世之目的。¹³於此而言，十九世紀宮廷外部的續蘭亭會似乎有一個新的發展方向，即透過「塑造群體」以針砭時弊。但實際上，藉由社群以針砭時弊在十九世紀的中國來說，並非僅出現在續蘭亭會中，毋寧說這是當時文人群體因應時政的普遍作法。

不論以上所列舉之曾燠在廣州長壽寺所舉辦的續修禊會，或黃爵滋在北京的江亭展禊，雖然都有藉續蘭亭會之舉辦，在詩文雅趣的消遣外，達「塑造群體」之目的，但這兩個群體之續蘭亭會的實際運作尚需進一步了解。而就其之「紀念物」製作，至少就曾燠之例來看，並未有創新之處。此外，清代仍有不少續蘭亭會繼續舉辦。如道光七、八兩年（1827-1828）的三月三日，廣西思恩府知府李彥章（1794-1836）均召集「賓僚、諸生」三百三十三人，於廣西榕園修禊。¹⁴

¹⁰ 相關文獻收入黃爵滋，《僊屏書屋初集年記》（臺北：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頁286-291；陳慶鏞，〈丙申四月四日江亭展禊後序〉，《籀經堂類藁》，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587冊，頁552。

¹¹ 姚燮，〈徐編修師及葉（紹本）黃（爵滋）兩鴻臚黃編修（式琮）汪（喜孫）陳（慶鏞）兩戶部招同人四十二人江亭展禊賦詩得五言二章〉，《復莊詩問》，卷十，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道光〔1821-1850〕姚氏刻大梅山館集本）。

¹² 陳慶鏞，〈丙申四月四日江亭展禊後序〉，頁552。

¹³ 參閱新村容子，〈《アヘン戦争の起源—黃爵滋と彼のネットワーク》〉（東京：汲古書院，2014）；唐屹軒，〈新村容子，〈《アヘン戦争の起源—黃爵滋と彼のネットワーク》〉書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8期（2015.6），頁231-237。

¹⁴ 羅檢秋，〈嘉道年間京師士人的修禊雅集與經世意識的覺醒〉，收入鄭大華、鄒小站主編，《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國》（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05），頁302。另見李彥章，〈榕園修禊石刻〉、

道光二十四年（1844）起至同治十二年（1873）止，由張穆（1805-1849）、何紹基（1799-1873）所倡議之「顧祠修禊」，每年上巳與重九前後、顧炎武（1613-1682）生辰，均舉行祭祀活動，會中也曾製作《顧祠秋禊圖》與《顧祠春禊圖》等圖，可惜兩作似乎也已不存。¹⁵由此來看，雖然清代各種雅集的形式眾多，追仿王羲之續蘭亭會的舉辦仍為數不少，可察覺到這個主題在士人群體心中佔有一定地位。同時，這些續蘭亭會是否有與之搭配的「紀念物」製作，「紀念物」之表現為何，該雅集是否有意識對蘭亭傳統進行調整，這些問題均尚待討論。但筆者從這些集會之有限記載及相關研究來推測，十九世紀中國的續蘭亭會似乎不再對蘭亭傳統的調整產生興趣，也因此續蘭亭會的舉辦與一般雅集相去無多，從而顯示王羲之蘭亭會之影響趨於沒落。

第二節 東亞「塑造群體」之傳統延續：

十九、二十世紀韓國與日本之續蘭亭會

除了中國之外，王羲之蘭亭會的傳統也影響及東亞的韓國與日本，在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兩國均有與中國學界、書法界相呼應之續蘭亭會的舉辦。此兩國之續蘭亭會，正好可用以對照發生在中國者，並突顯出王羲之蘭亭會作為東亞

〈榕園修禊後遊石刻〉，《榕園文鈔》，卷二，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8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250；李彥章，〈題《榕園修禊圖》並示蘇生文溪（芝杰）〉，《榕園詩鈔》，卷上，收入同叢書，頁419。除榕園之外，李彥章還曾於石畫園、桂林小西湖、拓園等處舉行過多次的修禊會。見李彥章，〈上巳日偕家兄招陳恭甫（壽祺）、趙毅士（在田）、二編修高兩農舍人（澍然）、陸萊臧司馬（我嵩）、葉芸卿太守（敬昌）、沈夢塘孝廉（學淵）、翁惠農大令（吉士）、汪子芸上舍（惠生）、謝碩甫茂才（宗本）、劉薇卿明經（萃奎）同集石畫園修禊因賦四詩〉、〈自題湖西秋禊圖〉，《榕園詩鈔》，卷下，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84冊，頁425、437。

¹⁵ 相關研究見王汎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國史儒林傳》與道光年間顧祠祭的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9本第1分（2008.3），頁63-93；魏泉，〈士林交游與風氣變遷：19世紀宣南的文人群體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魏泉，〈“顧祠修禊”與“道咸以降之學新”——十九世紀宣南士風與經世致用學風的興起〉，《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頁69-79。此社群之所以將祭祀訂在上巳與重九，應與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分屬春、秋兩季，而修禊原本就有春禊與秋禊的傳統有關。「顧祠修禊」的參與者不僅人數眾多，還有數位朝鮮使臣曾特來祭拜。根據《顧先生祠會祭題名第一卷子》（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光緒年間〔1875-1908〕刊本）載，咸豐十一年（1861）三月二十八日條：有朝鮮使臣朴珪壽（1807-1877。朴趾源〔1737-1805〕之孫）「求謁祠，特設一祭」。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條：「朝鮮進賀正使朴珪壽再到京師，與副使成彝鎬（1817-1895）、書狀官姜文馨（1831-？）同來謁祠。兩度特別請求謁祠的朴珪壽（1807-1877），是《熱河日記》作者朴趾源（1737-1805）之孫，他也是促成朝鮮近代化的重要推手。朴珪壽之相關研究如趙景達，〈朝鮮における実学から開化への思想的転回—朴珪寿を中心に〉，《歴史学研究》，第678期（1995.11），頁12-22；胡佩佩〈朴珪壽與清朝“顧祠修禊”文人的尺牘交流研究〉《河北科技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5卷第1期（2016.3），頁57-62。

共享之傳統的狀況。以下，我將針對兩個個案進行初步討論，希望藉此窺探東亞兩國對蘭亭傳統之接受與運用的其一面貌。



1 韓國：朝鮮哲宗四年（1853）金奭準主持之修禊會

十八世紀開始，朝鮮中人階層的詩社頗為流行。他們舉行聚會的場所多在較具經濟力的詩社盟主別墅、風光明媚之處，並以中國知名文會為模仿對象。¹⁶畫家劉淑（1827-1873）本身也是碧梧社成員，並常為詩社集會作圖紀念。朝鮮時代所舉辦的續蘭亭會所在多有，甚至朝鮮正祖（1776-1800 在位）也曾於一七九三年，王羲之蘭亭會第二十四次還曆的三月癸丑日（20 日），集致仕老臣與宮廷官員，於昌德宮後苑「玉流泉」，「仿蘭亭禊會」（圖 VI-4）。¹⁷

劉淑的《修禊圖卷》是以金奭準（1831-1915）為主召的雅集所製作之作品（圖 VI-5）。這次聚會在一八五三年三月三日舉行，當時是為了紀念王羲之蘭亭會第二十五次還曆及「玉溪社」一七九三年詩會六十周年（亦為還曆紀念）而召開。¹⁸此次共有三十名閭巷文人參與這次在漢陽（今日首爾）南山腳下「老人亭」所舉行的聚會，隨後又轉往崔必聞之山莊繼續此會。¹⁹根據柳玉暉對參與者背景、地位之考察，這些人分別為漢學、清學（如劉淑）、倭學、天文地理等科出身，基本上均屬中人階層。²⁰似乎可以說，這群文人之所以聚在一起舉行雅集，除他們的階層相同之外，他們也共同分享著對異國文化與東亞知識的興趣。而聚會的場所老人亭，是當時漢陽地區知名的風景遊賞區，參加此會的羅崎（1828-1894）記載此次聚會即提到「南山之下南潤之濱」。²¹二〇一六年《미술 속 도시, 도시 속

¹⁶ 柳玉暉（유옥경），〈蕙山 劉淑의 〈修禊圖卷〉 研究〉，《미술자료》，59（1997），頁 59-60。關於朝鮮的中人階層，可參閱下列研究：安輝濬，〈朝鮮時代的畫員〉，《故宮博物院院刊》，2012 年第 6 期，頁 21、26-27；韋旭昇，《韓國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 404-406。

¹⁷ 相關研究見衣若芬，〈蘭亭流芳在朝鮮〉，收入故宮博物院編，《二零一一年蘭亭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頁 36-40；申相燮，〈우리나라의 流觴曲水宴 遺構（曲水渠）에 관한 基礎研究〉，《韓國庭苑協會誌》，第 15 卷第 1 期（1996.6），頁 135-136。

¹⁸ 〈결속의 미술〉、〈修禊圖〉圖說，收入장진아、전혜은編，《미술 속 도시, 도시 속 미술》（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2016），頁 150。

¹⁹ 〈결속의 미술〉，頁 150。

²⁰ 柳玉暉，〈蕙山 劉淑의 〈修禊圖卷〉 研究〉，頁 69。

²¹ 〈결속의 미술〉，頁 150。根據此書說明提到，「老人亭」由趙萬永（1776-1846）年所建，為當時漢陽地區知名的遊賞處所。

미술 (美術中之都市, 都市中之美術)》展覽圖錄, 特別舉出二十世紀初所拍攝之南山照片作為《修禊圖卷》之對照。照片中可見到前景為首爾市的南山上, 山丘、水流邊樹立有幾個樓亭, 其中方形基座的亭子就是老人亭 (圖 VI-6)。對照《修禊圖卷》末段畫有參與者坐在小丘上, 往下望去則有屋頂, 此景之描繪很可能出自實景考量 (圖 VI-5D)。²²由此可知此次雅集所挑選的修禊場所如王羲之紹興蘭亭一般, 也是風景優美且有溪流經過之地。

這次南山「老人亭」修禊會的三十名參與者, 各自賦詩於特為此集會所製作之「物」——《修禊圖卷》——的拖尾, 卷後還有朴鳴朝作序、卞鍾運(1790-1866)跋、金奭準及拜觀者如李尚迪(1804-1865)等之題。²³這些題詩絕大多數都提到了王羲之的蘭亭會與「賢才群聚」、曲水流觴之內容, 倒並未特別提到《蘭亭序》書蹟。似乎對這群朝鮮文人來說, 王羲之蘭亭會最為人所懷念的, 正是一群擁有共同興趣之同好, 一起在風光明媚處「列坐觴詠, 聊以消憂」。²⁴至於《蘭亭序》書蹟之所以不是此會重點, 主要的原因應是朝鮮當地並不容易獲觀任何製作精謹之《蘭亭序》法帖。甚且朝鮮時代的書風崇尚趙孟頫, 因此雖然這群中人也知道王羲之書蹟, 但對《蘭亭序》並未產生特別的情感。²⁵不論如何, 金奭準之修禊會, 毫無疑問是為追繼王羲之蘭亭會所舉辦, 此與清代中國的續蘭亭會除追仿王羲之以外, 往往也有追憶清初王士禛之紅橋修禊的狀況大不相同。

根據《修禊圖卷》後金奭準題識指出:「阮堂公(金正喜, 1786-1856)嘗許追題, 奄損館舍, 惜未及更請。以曾所書贈『書畫同心處』五子〔字〕, 暨古藍田琦(1825-1854, 古藍為其號)書『清人誦』為軸頭。蓋嘗與古藍經始此會, 阻隔泉臺, 竟未得從事於斯也。」²⁶金奭準為朝鮮金石學者金正喜弟子, 應往來密切, 但因金正喜於一八五六年過世, 未及於拖尾題字, 故金奭準以過去金正喜所贈之「書畫同心處」裝裱於此卷之前。另一位作為經營藥鋪的中人, 同時也身兼畫家及作為碧梧社成員的田琦, 最初應與金奭準共同策劃此次修禊會, 但因田

²² 〈결속의 미술〉, 頁 150。

²³ 題跋詩文內容見〈修禊圖〉題跋釋文, 收入장진아、전혜은編, 《미술 속 도시, 도시 속 미술》, 頁 335-340。

²⁴ 此出自羅岐之句。引自〈修禊圖〉題跋釋文, 收入장진아、전혜은編, 《미술 속 도시, 도시 속 미술》, 頁 337。

²⁵ 見衣若芬, 〈蘭亭流芳在朝鮮〉, 頁 40-41、46。衣若芬頁 46 提到:「包括韓濩(1543-1605)在內的朝鮮書法家都不曾親炙右軍真蹟, 所臨摹的法帖也有商榷餘地。」韓濩為朝鮮時代「上追晉唐古意, 著重學習王羲之, 參以顏真卿」的著名書家, 見衣文頁 40。

²⁶ 引自〈修禊圖〉題跋釋文, 收入장진아、전혜은編, 《미술 속 도시, 도시 속 미술》, 頁 339。

琦過世，金奭準只好以其所書「清人詘」書蹟，與金正喜書一同裝裱於卷首。²⁷其中田琦「清人詘」之書法頗值得注意，「詘」字為屈服、折服之意，田琦所寫的「清人詘」，有向滿州統治之中國挑戰的意味。雖不知田琦最初書寫「清人詘」的脈絡為何，但金奭準特將此書裝裱於《修禊圖卷》之首，顯見金奭準有意藉由自己所舉辦之續蘭亭會，甚至以自己所屬之群體表現（如此次雅集中之詩文創作與集會圖象），來與清人相較量之意。

此次參與集會的文人並非全屬同一詩社，他們分別來自碧梧社、斐然詩社、六橋詩社等。²⁸但由於他們同屬中人階層，對於日本、中國之相關知識，應該有著相近的理解與興趣。因此這些同好擇三月三日齊聚南山舉行修禊之會，應也有標誌此社群之特殊學問取向與關懷的背後意圖，同時透過他們對這些異國文化、知識的掌握，以與其他群體相區隔。與此同時，可見到王羲之蘭亭會所具有之「塑造群體」功能在朝鮮產生作用之一例。此外，《修禊圖卷》之風格表現亦反映出金奭準等用以區別他者的作法。

首先，劉淑繪《修禊圖卷》所採取的圖式，是源自中國明代中晚期常見之「蘭亭修禊圖」。如明代尤求、魏居敬、沈時等人的作品，均可見眾多文人圍繞著亭子席地而坐，亭中有一大桌案，案上擺設書籍、文物，亭子旁側還有一道溪流往後方延伸（比較圖 VI-5、圖 VI-7 與圖 VI-8）。²⁹採同一圖式之蘭亭圖在明代似乎版本甚多，可見當時製作數量不少，推測應有部分作品在當時或後來透過使節往來進入朝鮮。金奭準等中人階層原本就可說是朝鮮中，對清、日文化最了解的一群人，他們很可能掌握了以此圖式表現的明代蘭亭圖，並藉以作為自身之續蘭亭會的繪畫參考。但為何劉淑不以更具蘭亭傳統象徵之傳李公麟《蘭亭修禊圖》作為其描繪藍本呢？朝鮮畫家對傳李公麟本其實是有一定之熟悉度的，如一七二一年佚名畫家所繪的《蘭亭修禊圖》，就是以傳李本作為基本圖式（圖 VI-9、圖 IV-22）。³⁰在尚未對此提問進一步研究的同時，筆者推測，或許一方面因沈時之類

²⁷ 田琦身分見〈修禊圖〉圖說，收入장진아、전혜은編，《미술 속 도시, 도시 속 미술》，頁 153。

²⁸ 柳玉暎，〈蕙山 劉淑의 〈修禊圖卷〉 研究〉，頁 69-71。

²⁹ 衣若芬研究已提到劉淑作品與明代修禊圖之間的關係。見衣若芬，〈蘭亭流芳在朝鮮〉，頁 43-44。魏居敬一六〇六年之《蘭亭修禊圖》（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圖版，參見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九）》（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津 7-0400。

³⁰ 相關研究見李源福，〈《蘭亭修禊》圖說〉，《空間》，178（1982.4），頁 29-30。據源福研究，此作共有十屏，畫面的部分為八屏，左右另有二屏與《蘭亭修禊》無關，左屏寫著朝鮮修禊活動參與者的九人名稱、官職，右屏則上端有契會圖、下端為該契會的說明。八屏描寫《蘭亭修禊》的畫面上方有行書《蘭亭序》和詩句。具李源福表示，十屏上的所有書法均為同一個書蹟。

的蘭亭圖式在當時朝鮮中人社群有一定知名度，故採用此圖式可令同階層之觀者一望而知所據典故，並且也能有機會以此圖式區別於僅知傳李公麟本者。另一方面，劉淑《修禊圖卷》如同李亨特之《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般，是採肖像式畫法來描寫參與人物，其目的必然有記錄雅集之意，並令觀者得以輕易認出畫面中人（圖 V-1）。就此目的來說，傳李公麟本中不少人物是背對或側對觀者，並不利於劉淑的表現意圖。

劉淑《修禊圖卷》的精細寫照，是此卷極值得注意的表現方式。劉淑原本就是以寫照知名的宮廷畫員，在繪此修禊圖的前一年，他受命為朝鮮哲宗（1849-1863 在位）繪製御真。³¹劉淑之寫實技巧在《修禊圖卷》的表現即可見一斑。如《修禊圖卷》亭子外桌案右側戴有眼鏡、臉上有鬍鬚、抽菸者，可能是此次集會中最年長的卞鍾運；卞鍾運右前方，趴在地上作畫，以背影正對觀者的，應該就是劉淑本人（圖 VI-5C、B）。³²劉淑對畫中每一個人的臉部特徵均仔細描寫，比方有些參與者臉上有斑等，均被畫出。此外劉淑對畫面景物的描繪，也應是經過實景考察後，修改既有圖式而來，如畫中亭子下方畫有墊高石塊及門板，這些細節似乎是以老人亭為參考的修改結果。

大抵來說，劉淑在《修禊圖卷》上的寫實表現與清代十八世紀末李亨特群體之《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的製作態度，非常相近。同時，可能也是朝鮮時代少見以寫實手法描寫當代續蘭亭會參與者，再結合入蘭亭圖的嶄新形式。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劉淑畫的是在朝鮮舉辦的續蘭亭會，但他卻將此會嵌入中國蘭亭圖的傳統圖式中，這種跨國之融合表現十分特殊，在畫面上也構成一種現實與想像結合的蘭亭文化空間，為蘭亭傳統提供了一個改變的契機。

2 日本：大正二年（1913）癸丑蘭亭會

二〇一一年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舉辦的「蘭亭特展」、「蘭亭珍拓展」，可說是二十一世紀後在中國所舉辦最盛大之蘭亭文化展覽。但此次奠基於清宮收藏的跨領域展出概念，如書法、繪畫、碑帖、器物等均在展出範圍的作法，早於一九一三年日本舉辦的蘭亭紀念展已見先聲。進入二十世紀，第一個大型蘭亭展是由日本藝文界所發起的一九一三年大正癸丑蘭亭會，分別在京都、東京均有活動。這

³¹ 〈결속의 미술〉，頁 150。

³² 柳玉暉，〈蕙山 劉淑의 〈修禊圖卷〉 研究〉，頁 77-80；〈결속의 미술〉，頁 151。

次的癸丑蘭亭會，其實正是為了慶祝王羲之蘭亭會的第二十六次還曆。

以京都為例，當時活動分成「展覽會」（4月12、13日）與「脩祭」（4月13日）二部分。於京都府立圖書館展覽會中所展出之文物，有些精品是出自因辛亥革命避往日本之羅振玉（1866-1940）的收藏。展出除《蘭亭序》各種版本、臨摹本以外，甚至包含王羲之其他傳稱書蹟的各類作品、日本畫家所繪王羲之相關故事之畫作、「墨拓蘭亭圖卷」、硯臺等。東京地區的展覽（4月3日）在日本橋俱樂部樓上舉行，則還包含韓國流杯建構「鮑石亭遺址」與「宋代流杯渠」照片，此乃作為曲水流觴之用的流杯建構第一次在展覽會場受到關注。³³而此紀念會除公開展覽外，另一重要活動是在南禪寺天授庵舉行的「脩祭」。脩祭中，除特別備有長尾兩山（1864-1942）事先從紹興蘭亭所獲之「蘭亭清水」與王羲之牌位拓本外，還有祭祀王羲之的活動及眾人獻上個人詩文。此外，亦發行明信片以誌此事，更有篆刻家共同完成之《蘭亭印譜》，與多位書家一同創作之《記念合作書帖（寄せ書き）》等紀念物之製作（圖 VI-10、圖 VI-11）。其中，《記念合作書帖》中，山本竟山（1863-1934）特別說明是「用蘭渚水磨康熙丁亥（1707）製墨」臨寫《游丞相舊藏海內第一定武本》（圖 VI-11）。³⁴單從山本竟山使用代表中國浙江紹興蘭亭的「蘭渚水」，以及象徵歲月久遠之二百多年前的中國製墨，來臨寫宋代宰相游似（?-1252）收藏之定武蘭亭本之舉措來看，已包含太多意義於其中，除顯示日本書家對於千年前之王羲之及《蘭亭序》書蹟的高度景仰外，也展現他們極其希望擁以蘭亭會發生地之物，來狀其親近、熟稔王羲之蘭亭會的心境。而特地赴中國浙江紹興取「蘭亭之水」回日本之作法，可說是二十世紀初日本藝文界尊崇王羲之蘭亭會傳統的一種表達。同時「蘭亭之水」在天授庵的使用，可說也是「曲水流觴」的象徵。

整體而言，此活動因特地至中國浙江祭拜王羲之，並取蘭亭清水、王羲之牌

³³ 東京、京都展覽及目錄請見須羽源一，〈大正癸丑の京都蘭亭會について〉（本文原載於1913年4月20日《大阪朝日新聞》），收入陶德民主編，《大正癸丑蘭亭會への懷古と繼承：関西大学図書館内藤文庫所蔵品を中心に》（京都：關西大學出版部，2013），頁169-174、182-186。京都展品出自羅振玉收藏，見陳振濂，〈“蘭亭會”在中國與日本·1913（續）〉，收入氏著，《維新：近代日本藝術觀念的變遷——近代中日藝術史實比較研究》（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頁157。

³⁴ 杉村邦彦，〈論考 大正癸丑の蘭亭會とその歴史的意義〉；須羽源一，〈大正癸丑の京都蘭亭會について〉（本文原載於1913年4月20日《大阪朝日新聞》），收入陶德民主編，《大正癸丑蘭亭會への懷古と繼承：関西大学図書館内藤文庫所蔵品を中心に》，頁14-15；176。相關圖版另見同書，圖76、109、120。此外，關於取紹興蘭亭曲水至日本一事，似乎不僅出現在此次脩祭中，富岡鐵齋在大正癸丑三月三日所畫的《蘭亭真景圖》（個人藏），當時用來繪畫的蘭亭清水，是由山本竟山所贈（見陶德民主編，同書，圖119、頁125〈圖版解說〉）。

位拓本送至京都而顯其隆重。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的蘭亭展覽會盡其所能地蒐羅各式蘭亭相關展品，使此展出顯得廣博、多元，此一則可將《蘭亭序》書蹟與蘭亭會之相關知識展現出來，多元展現的蘭亭知識，也更趨近於王羲之蘭亭會的「整體」面貌；第二，這樣的展示觀念是全新新穎的，反應了二十世紀初日本接受西方影響的痕跡。³⁵若從蘭亭傳統的調整與創新來考慮，那麼大正癸丑蘭亭會的展覽方式，其實可被視為一種「紀念物」之概念的呈現。即透過展覽，來紀念蘭亭會，而展覽本身就是一種創造。這樣的「紀念物」概念，毋寧說在蘭亭傳統中是獨樹一格的，從未出現於過去之續蘭亭會中，因而值得特別關注，並可將之視為大正癸丑蘭亭會超越中國十九世紀續蘭亭會之處。尤其此次展覽，其中一些精品出自羅振玉收藏，羅振玉作為金石學者，其對於《蘭亭序》的態度，也繼承著一如劉錫嘏所屬之畢沅幕僚群體對於金石碑刻的興趣。或許羅振玉的態度，也影響了日本當時共同參與蘭亭紀念會的主辦者。因此從這次大正蘭亭展出物的選品來看，亦可說反映了中國金石考據學在日本新式展覽中所產生的作用。

一九一三年日本的蘭亭紀念活動之企劃、執行與期待，可說是這群參與者以衷心於王羲之、蘭亭會之群體塑造為基礎，發展而來。以京都癸丑蘭亭會之倡議者而言，此二十八人的身份，主要為內藤湖南、富岡鐵齋（1837-1924）等京阪地區的中國學者、漢詩詩人、書畫家及財界、醫界等各領域人士，這些人乃是精於漢學、中國詩文並愛好書畫作品的文人雅士，他們可說是當時日本最精通中國文化的一群知識分子，同時也是「賢才群聚」的寫照。³⁶這些倡議者不僅對於王羲之、蘭亭修禊會、《蘭亭序》書蹟、相關繪畫等傳統非常熟悉且傾倒，甚至為了紀念王羲之蘭亭會特別相聚一堂，彼此間必然分享著一種相知相惜的情感與認同。此種情感與認同，即如撰寫王羲之祭文的鈴木虎雄（1878-1963）於五言古詩〈天授庵曲水集詩〉中所提到：「……。人居天地間。倏忽若掣電。歡笑能幾時。撫事多愁悶。且須共優游。才藻擿霞綺。……」³⁷這種在群體間分享著共同的興趣與認同，製作紀念集體之「紀念物」，甚至藉以區別他者的態度，正是王羲之蘭亭會所以為歷代人所一再追仿的主要原因。對內藤湖南等人來說，他們可

³⁵ 相關研究見王正華，〈呈現「中國」：晚清參與 1904 年美國聖路易萬國博覽會之研究〉，收入黃克武主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 445-471；佐藤道信著，林暉鈞譯，〈近代日本の「美術」と「美術史」〉，《現代美術學報》，第 30 期（2015.11），頁 13-52。

³⁶ 杉村邦彥，〈論考 大正癸丑の蘭亭會とその歴史的意義〉，頁 15。

³⁷ 轉引自神田喜一郎，〈大正癸丑の蘭亭會〉，頁 165。

能也認為這個群體中的人物是全日本最精懂中國文化的一群人。一九一三年日本大正癸丑蘭亭紀念會之所以能如此隆重、盛大的舉行，無非就是由這群對特定異國知識擁有高度文化熱情的知識人所支撐。尤其當年他們透過媒體報導、公開被塑造出的「群體」印象，除可積極展現這群參與者共享、甚至是獨佔王羲之及蘭亭會之文化傳統的期待，也強化了他們藉由對異文化之共同興趣（甚至是作為專家的身分），而結成群體的印象。

雖然當年中國方面，西泠印社也有相應舉辦的蘭亭紀念會，但此紀念會之舉辦，卻是配合西泠印社籌備十年後的正式成立大會所召開。³⁸此次紀念會參加者僅約百人，現場雖設置王羲之畫像卻未有祭祀儀式，此外也僅搬來一王羲之蘭亭會同年的「永和九年（353）古覽」，未如京都天授庵之「脩祭」，特別取來紹興蘭亭之物坐鎮現場。³⁹故此會除規模小於日本者甚多，也未展現如日人亟欲親近紹興蘭亭的態度。更重要的是，西泠印社「會中陳列名書古畫、多至三四百種，皆藏家精品」。⁴⁰雖不清楚展出品項，似乎只是一般古書畫收藏的展示，並未如日本的展覽分類，均圍繞在王羲之、蘭亭會這兩個主題來籌備，顯示日人以一種新式之展覽態度來辦理的作法。就此而言，可說是中日雙方差距最大的部分。再就中日雙方對「塑造群體」的期待來看，也許西泠印社舉辦蘭亭紀念會，並未對此帶有太多預期成果，畢竟當年的重點活動——西泠印社成立大會本身，已可藉以標榜自身，蘭亭紀念會不過是這個成立活動中的點綴而已。

3 小結（兼述二十世紀後半，香港與臺灣之蘭亭文化展現）

綜而言之，十九世紀朝鮮與二十世紀初日本所舉辦的續蘭亭會，除反映出他

³⁸ 陳振濂，〈“蘭亭會”在中國與日本·1913〉，收入氏著，《維新：近代日本藝術觀念的變遷——近代中日藝術史實比較研究》，頁 152-153。

³⁹ 西泠印社參加者約百人上下，即使當天展出之藏家收藏「名書古畫」有「三四百種」之多，有幸見到這些收藏的人卻可能不到百人。相較於此，京都、大阪的公開展覽會不僅有展出目錄的公開、報紙報導等相與配合，從當時的文獻上可知日本的蘭亭紀念會規模遠遠超出中國西泠印社甚多。若說日本東京、京都的蘭亭紀念會是屬於當時日本國內的大型文化盛事，西泠印社僅可說是地區文化社團的小規模活動。相關討論可參閱杉村邦彥，〈論考 大正癸丑の蘭亭会とその歴史の意義〉；須羽源一，〈大正癸丑の京都蘭亭會について〉，收入陶德民主編，《大正癸丑蘭亭會への懷古と繼承：関西大学図書館内藤文庫所蔵品を中心に》，頁 11-23；169-189。陳振濂，〈“蘭亭會”在中國與日本·1913（續）〉，頁 154-155。另外，「永和九年古覽」的記載，出自河井荃廬，〈西泠印社修禊紀盛〉，轉引自陳振濂，〈“蘭亭會”在中國與日本·1913（續）〉，頁 154-155。

⁴⁰ 河井荃廬，〈西泠印社修禊紀盛〉，轉引自陳振濂，〈“蘭亭會”在中國與日本·1913（續）〉，頁 155。

們與中國文人社群同樣期待透過「紀念物」之製作以達「塑造群體」的目標，並可見到朝鮮、日本的個案，與時代稍早之清代宮廷內、外的蘭亭傳統重塑活動，有不同的表現焦點。一方面，參與韓國及日本之續蘭亭會的藝文人士，均有繼承中華，甚至與中國相較文化高低的企圖。另一方面，韓、日兩國的續蘭亭會，也都有將中國物品或概念「疊合」到當地創造的作法。以劉淑創作《修禊圖卷》而言，他在畫面上疊合朝鮮之「現實集會」與中國蘭亭圖式，即是將外來文化在地化的一個作法。日本大正癸丑蘭亭會，在南禪寺天授庵祭祀王羲之時採用蘭亭之水，在展覽會中除展示王羲之作品外，也展出日人所臨寫的《蘭亭序》書蹟、日人所繪的蘭亭圖，這些均可說是一種疊合之在地化的表現方式。除此之外，大正癸丑蘭亭會的展覽除如上述，反映出清代金石學者對碑刻的興趣，這種將各種蘭亭相關物品一同展示的方式，也與乾隆皇帝在宮廷中製作流杯建構、各式蘭亭相關文房用品的作法，似相彷彿。由於內藤湖南、富岡鐵齋等，與二十世紀初流亡日本的學者羅振玉、王國維（1877-1927）往來密切，羅、王二人對於清代宮廷內、外之蘭亭文化的發展應不乏基本掌握，這些掌握或許也成為這批日人之蘭亭知識的來源。⁴¹但是，雖然大正癸丑蘭亭會的展覽「方式」與乾隆皇帝看來相似，兩者的內涵仍有差異。日本在明治時期大量接受西方觀念，對於展覽會的理解有別於中國。大正癸丑蘭亭會將各種蘭亭相關文物放在一起展示，顯示策展者希望藉由這樣的統合陳列來展示、說明蘭亭文化。但對乾隆皇帝來說，他大量製作蘭亭文物的作法，則是傳統收藏觀的影響。不過，不論朝鮮金奩準續蘭亭會中的《修禊圖卷》或日本大正癸丑蘭亭會之豐富多元的展出形式，韓、日雙方文人均在原屬於中國的傳統上注入在地活水，為源出中國之蘭亭傳統帶來嶄新的刺激，發展出新面貌。

擴大到東亞地區綜觀蘭亭傳統的歷史發展，可發現中國的蘭亭文化很早就影響及韓國、日本兩地。如現存於韓國慶州的「鮑石亭」流杯建構遺址，推測約建於統一新羅時代（668-901），當時王在宮廷中與臣子一同流杯行樂（圖 VI-12）。⁴²朝鮮時代的文人也經常舉辦續蘭亭會，如朴趾源即曾於「癸丑春，倣蘭亭故事，

⁴¹ 羅振玉等在日本的活動研究，如古原宏伸，〈近八十年來的中國繪畫史研究的回顧〉，《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1992），頁 541-551；陳振濂，〈西泠印社的掌故、羅振玉亡命日本及與長尾甲、河井荃廬的交往〉，收入氏著，《維新：近代日本藝術觀念的變遷——近代中日藝術史實比較研究》，頁 134-137；劉曉路，〈富岡鐵齋晚年的五方落款印——兼談其與羅振玉、吳昌碩的印緣〉。《美術觀察》，第 1 期（1997），頁 67-69。

⁴² 申相燮，〈우리나라의 流觴曲水宴 遺構（曲水渠）에 관한 基礎研究〉，頁 135。

流觴賦詩」。⁴³而日本對曲水宴最早的記載，出自《日本書紀》的古墳時代（約3世紀中-7世紀頃）。其中提到顯宗天皇（約485-487在位）元年（約485）三月上巳，「幸後苑，曲水宴」；二年的記載則是，「幸後苑，曲水宴。是時，喜集公卿、大夫、臣、連、國造、伴造為宴。群臣頻稱萬歲」。⁴⁴於此簡短記載推測，早期日本的曲水宴，與本文第二章所討論中國魏晉南北朝常見之君臣曲水宴形式相類，但日本似乎是以「聚宴」為主要目的，未有賦詩之舉。此後直到奈良時代（710-794）聖武天皇神龜五年（約728），在《續日本紀》中才看到加入「令賦曲水之詩」的形式。⁴⁵日本遣唐使至中國始自貞觀四年（630），唐宮廷外部的續蘭亭會在七世紀時已經可見，而西元七、八世紀之交，武則天也舉行過流杯之會。因此日本奈良時代在曲水宴中加入賦詩的活動，很可能是受到唐朝蘭亭文化影響的結果。⁴⁶

以上筆者對韓國、日本兩地之續蘭亭會個案的研究，僅在初步階段，對於此二地之蘭亭傳統發展的了解，尚待更進一步處理。尤其日本上巳日的活動與當地之神道信仰相結合，甚至三月三日女兒節可能也與這一系列的傳統發展有關。⁴⁷此外奈良時代許多貴族庭園中有「遣水（曲水）」之設，這些庭園設計與實際使用等各方面，都值得進一步思考王羲之蘭亭會之傳統進入日本所產生的影響，以及日本如何加入在地角度加以修改、調整。⁴⁸此外，日本大量製作的「蘭亭圖」，

⁴³ 朴珪壽，〈花木歌。寄安義金得禹。并序〉，《璵齋先生集》，卷一，「한국고전종합 DB」網頁，網址：[http://db.itkc.or.kr/dir/item?itemId=BT#/dir/node?dataId=ITKC_BT_0632A_0020_010_0240&solrQ=query%E2%80%A0%E8%8A%B1%E6%9C%A8%E6%AD%8C\\$solr_sortField%E2%80%A0EA%B7%B8%EB%A3%B9%EC%A0%95%EB%A0%AC_s%20EC%9E%90%EB%A3%8CID_s\\$solr_sortOrder%E2%80%A0\\$solr_secId%E2%80%A0BT_AA\\$solr_toalCount%E2%80%A01\\$solr_curPos%E2%80%A0\\$solr_solrId%E2%80%A0GS_ITKC_BT_0632A_0020_010_0240](http://db.itkc.or.kr/dir/item?itemId=BT#/dir/node?dataId=ITKC_BT_0632A_0020_010_0240&solrQ=query%E2%80%A0%E8%8A%B1%E6%9C%A8%E6%AD%8C$solr_sortField%E2%80%A0EA%B7%B8%EB%A3%B9%EC%A0%95%EB%A0%AC_s%20EC%9E%90%EB%A3%8CID_s$solr_sortOrder%E2%80%A0$solr_secId%E2%80%A0BT_AA$solr_toalCount%E2%80%A01$solr_curPos%E2%80%A0$solr_solrId%E2%80%A0GS_ITKC_BT_0632A_0020_010_0240)，檢索日期：2017-12-16。

⁴⁴ 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書紀（上）》，卷十五（東京：岩波書店，1967），頁520、523。

⁴⁵ 黑板勝美編，《續日本紀》，卷十（東京：吉川弘文館，2004），頁112。

⁴⁶ 中根金作，〈曲水考〉，《造園雜誌》，第49卷第4期（1986），頁246-254；高橋靜豪著，王君德譯，〈有關蘭亭“曲水”之宴在日本的概況〉，《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頁50-52；李心純，〈從中國古代的上巳節到日本的雛祭〉，《日本學刊》，1996年第2期，頁113-125。

⁴⁷ 相關研究如寺本慧達，〈袷袂に就て（上、中、下）〉，《六條學報》，第212、214、215號（1919.7、9、10），頁496-507、622-632、689-708；倉林正次，〈袷祭考—上巳宴とその周辺—〉，《國學院大學日本文化研究紀要》，第19輯（1966.9），頁73-119；李心純，〈從中國古代的上巳節到日本的雛祭〉，頁113-125；高橋靜豪著，王君德譯，〈有關蘭亭“曲水”之宴在日本的概況〉，頁50-52；劉曉峰，〈上巳節與日本的女兒節〉，《東亞的時間——歲時文化的比較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352-364；江亞玉，〈日本女兒節的源流與演變〉，《人文社會科學學刊》，第1期（2009.12），頁193-206；Kazuko Kameda-Madar, “Pictures of Social Networks: Transforming Visu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Orchid Pavilion Gathering in the Tokugawa Period (1615-1868)” (PhD diss.,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100), pp.372-397.

⁴⁸ 相關研究如中根金作，〈曲水考〉，《造園雜誌》，第49卷第4期（1986），頁246-254；荒木伸介，〈史跡の整備と活用—毛越寺庭園遣水と曲水宴—〉，《日本歷史》，第477號（1988.2），頁

雖然近年頗受學界關注，但這些蘭亭圖在製作當時是否也伴隨有相關集會之舉辦，這些集會「紀念物」之製作與集會本身的安排有何當地特色，與中國又有何異同等問題，尚待探究。⁴⁹至於韓國的部分，修禊在中國原本就有春禊、秋禊之別，韓國的耆老會甚為盛行，聚會時間一般在陰曆三月三日與九月九日，兩者似乎有結合的趨向。⁵⁰甚至這個結合可能還揉合了中國的耆老會傳統，如唐代白居易（772-846）「香山九老」、宋代文彥博（1006-1097）的「真率會」等。⁵¹以此來考慮的話，朝鮮一四九九年佚名畫家所繪的《十老圖像圖卷》，即可說是將「耆老圖」與傳李公麟《蘭亭修禊圖》進行「疊合」表現（圖 VI-13、圖 VI-14）。⁵²也因此，蘭亭傳統在韓國是否曾與耆老會等集會相結合，結合之後的形式與內涵為何，都值得進一步思考。總而言之，透過對日本、韓國兩地之續蘭亭會的研究，將可了解王羲之蘭亭會如何進入東亞兩國，以及如何在當地發生變異的過程。透過此探究，方可掌握蘭亭傳統在東亞所開展出之新面貌。

一九一三年大正癸丑蘭亭紀念會的六十年之後，一九七三年又逢癸丑（即王羲之蘭亭會第二十七次還曆），在王羲之蘭亭會之「起源地」——當時作為中國文化象徵的香港與臺灣，才首次見到大型蘭亭特展及修禊盛會的舉辦。在香港，主要是香港中文大學所舉辦的特展，透過現存《蘭亭大觀》目錄發現，當年特展幾乎只聚焦於《蘭亭序》書蹟的「墨拓」、「法書真蹟」、「影本」上，另搭配少數蘭亭圖之「名畫真蹟」，總數二百五十九件的展品中，繪畫僅佔八件，但並未有蘭亭文物之展示（圖 VI-15）。⁵³就此而言，與日本大正癸丑蘭亭紀念會的設計十分不同。這種只聚焦於「書法」品項的展示概念，似乎顯示策展單位雖以「癸丑

96-105；吉田惠二，〈日本古代庭園遺跡と曲水宴〉，《國學院雜誌》，第 100 卷第 11 號（1999.11），頁 110-119。

⁴⁹ 日本蘭亭圖相關研究如板倉聖哲，〈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蘭亭曲水宴圖像の展開〉，《美術史論叢》，第 29 卷（2013），頁 1-25；Kazuko Kameda-Madar（龜田和子），“Pictures of Social Networks: Transforming Visu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Orchid Pavilion Gathering in the Tokugawa Period (1615-1868).” 此外龜田和子在《〈蘭亭圖〉作為德川幕府時期（1615-1868）日本人對中國憧憬的象徵》，收入故宮博物院編，《二零一一年蘭亭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52，即舉出一八一九年富澤町鯉一郎所舉辦的曲水宴，此次宴會後有「當代曲水宴圖」之製作。

⁵⁰ 關於韓國耆老會的舉辦時間，見 Hwi-joon, Ahn（安輝濬），“Literary Gatherings and their Paintings in Korea,” in *Seoul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vol. 8, p. 93.

⁵¹ 相關研究如 Hwi-joon, Ahn（安輝濬），“Literary Gatherings and their Paintings in Korea,” p. 85-106.

⁵² 此卷之製作原因，參見申景濬，〈十老契軸後敘〉，《旅菴遺稿》卷之五，韓國古典綜合 DB（據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木活字本），頁 17 上-18 上。

⁵³ 李棧編，《蘭亭大觀：蘭亭陳列品目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研究所文物館，1973）。另可參見陶德民主編，《大正癸丑蘭亭會への懷古と継承：関西大学図書館内藤文庫所蔵品を中心に》，頁 130，圖 144-146 陶德民、袁晨、龜井拓圖版解說。

年」作為展覽號召，但癸丑當年所舉辦的「集會」本身或整體蘭亭文化的發展，並非此展覽想了解、展示的對象，展覽本身只對名蹟《蘭亭序》有興趣。這種現象也反映出日後吾人對於王羲之蘭亭會往往僅存一雅集「故事」的印象，而整個蘭亭傳統的研究，似乎也僅與書法史或繪畫史有關。

臺灣的部分，是莊嚴先生（1899-1980）一九七三年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舉辦的「民國第二癸丑修禊」。這次修禊應不算公開活動，受邀者以其藝文界友人為主，並且也無相應的展覽配合舉辦（圖 VI-16）。⁵⁴此次請柬上的邀請文倒頗值得注意：

本年歲在癸丑三月三日（陽曆四月五日）上巳嘉辰，為永和九年第二十七度。外雙溪山陰曲水瀠洄，猶有前人「流觴」石刻（新名為流水音），吾人生千載後欣逢此日。爰訂是日下午在流水音舉行修禊雅集（圖 VI-16）。

首先，莊嚴指出故宮附近的「曲水」邊，有前人留下的「流觴」石刻（圖 VI-17）。此石刻書者署名「九峰」，但吾人並不識其人，也不知刻於何年月。據故宮退休員工吳哲夫等人回憶，今日故宮「後樂園」中原有一棟日式建築，可能為日治時期公務人員住所。考量日本知識分子對王羲之「曲水流觴」之典故應知之甚詳，推測此「流觴」石刻很可能為日人所留下。⁵⁵雖然無法確知此石刻究竟為何人所製，有趣的是，莊嚴將之重新命名為「流水音」，與第三章所討論康熙皇帝在西苑所造之「曲澗浮花」流杯亭同名（「流水音」額為乾隆皇帝所題）。⁵⁶於此可見對主辦者莊嚴來說，位於臺北士林外雙溪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宛如存在於北京之清代故宮的象徵。而「此次修禊的所有器物酒肴限用中國產品」⁵⁷，更突顯了這次活動的舉辦初衷、活動安排乃至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場地選擇，均可說是「中華文化在臺灣」的具體展現，亦反映了主辦者緬懷故土的情感。而這次陰曆三月三日正好為陽曆的四月五日，合上巳、清明為游春節日如第二章所討論，是古來

⁵⁴ 陳小凌，〈暮春修禊韻事〉，《故宮文物月刊》，第 277 期（2006.4），頁 100-107。陳小凌文中提到，莊靈一九六三年在臺中霧峰北溝已舉辦過一次「中外文友脩禊雅集」。討論及當時照片，見同文頁 91-92。

⁵⁵ 盧宣妃，〈閑話當年故宮事——臺北故宮之初〉，收入蔡枚芬主編，《八徵耄念：國立故宮博物院八十年的點滴懷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6），頁 81。

⁵⁶ 參見陶德民主編，《大正癸丑蘭亭會への懷古と繼承：関西大学図書館内藤文庫所蔵品を中心に》，頁 130，圖 149-150 陶德民、亀井拓圖版解說。

⁵⁷ 陳小凌，〈暮春修禊韻事〉，頁 105。

的傳統，莊嚴顯然非常清楚這個上巳節日的意涵。

相較於一九七三年香港之蘭亭展以《蘭亭序》書蹟為展出重點，日本同一年在東京等地所舉辦的「昭和蘭亭展」，同時展出各種《蘭亭序》版本並有相關繪畫、器物等項目展示。⁵⁸此除顯示這次展覽會承續著一九一三年以來，日本藝文界對王羲之蘭亭會的高度興趣之外，同時也見到日本不同於香港的展覽會概念。從一九一三到一九七三相距六十年，香港對於蘭亭展的展出內容仍獨鍾於書蹟與少數繪畫作品，未擴展至器物等其他領域，從蘭亭傳統的脈絡來看，香港的展覽實難與日本一九一三年以來之蘭亭展覽構想相比擬。至於臺灣的續蘭亭會，並沒有相應展覽的規劃，雅集本身則是藝文好友的群聚場面。雖然將臺灣比作北京／中國的象徵性作法，濃烈地展現臺灣作為「反攻復國基地」的時代背景，就此角度而言，莊嚴在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舉辦的續蘭亭會，似乎也為此傳統加入了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一些新意。但若從延續蘭亭傳統的重要性來考慮，不論香港或臺灣的蘭亭展演，都難以超越一九一三年的日本蘭亭紀念會。

第三節 結論整合

透過本研究，筆者認為王羲之集會之所以在後代雅集發展中具有重要意義，是由於這個集會產製出千古名蹟《蘭亭序》，並以「賢才群聚」作為號召，透過集會中之特殊文化活動（如「曲水流觴」、賦詩比試等）、紀念物之製作等內容，為後世續蘭亭會的舉辦建立了一個參考模式。本論文以十七世紀後半至十八世紀之宮廷內、外續蘭亭會為研究對象，主要是想了解清代續蘭亭會在王羲之集會的參考模式下，如何透過「物」的製作，完成「塑造群體」的目標，進而了解這些調整與改變，在蘭亭傳統的延續上發揮了甚麼樣的重要性。

本文以第二章為始，梳理「曲水流觴」及修禊活動之早期現象，並討論王羲之蘭亭會如何在唐代成為歷史典範，以及唐代已可見到蘭亭會所具有之「塑造群體」的特色。有此基礎，方能評估清代續蘭亭會的發展。透過本章研究，了解到過去從未被釐清的自然水域與流杯建構中之流杯形式兩者間的關係，原是出自同一本源。亦即上巳日的修禊活動最初是在自然水域中舉行，之後有流杯建構的產生實是因應權貴之需。而不論在自然水域或流杯建構中修禊，如何「引」水流杯

⁵⁸ 昭和蘭亭紀念會的舉辦，可參考西川寧等編集，《昭和蘭亭紀念展圖錄》（東京：二玄社，1973）。

都是必須斟酌的要點。因此過去論者認為在工整之流杯建構中聚宴，比不上王羲之在自然空間中修禊的優雅，此看法除將王羲之蘭亭會視為修禊活動之始，誤以為流杯建構是改造自王羲之蘭亭會以外，同時忽略唐代以來宮廷內部之流杯聚宴除為追慕王羲之蘭亭會之風雅，其實也繼承了上古以來宮廷之流杯活動的傳統。此點的釐清，是本文的貢獻之一。

本文第三章是以清宮內部之流杯建構與「紀念物」的製作為中心，探討康熙、乾隆兩位皇帝如何透過流杯亭的建造及使用，來塑造帝王與臣子（外藩）間之群體感。文中所討論，不論康熙皇帝所創造之「天趣蘭亭」流杯亭，或乾隆皇帝的「蘭亭八柱亭」、「禊賞亭」等回歸漢式流杯亭的建造，甚至乾隆皇帝之大量蘭亭文物的製作，其實都可視為「紀念物」的一種形式。但這個「紀念物」並非對某次宮廷續蘭亭會的紀念，而是對王羲之蘭亭會的整體追憶。亦即康熙、乾隆兩位皇帝透過宮中流杯亭的建造，一則傳達他們各自對蘭亭文化的理解與詮釋，另則藉由流杯亭之設，塑造他們與臣子之間的群體感。透過宮廷中續蘭亭會的舉辦，可讓近臣或身分特殊的外藩享受到帝王的親密眷顧，帝王同時以此親密感籠絡臣下。對於那些受到帝王特別邀請的臣子來說，這種恩寵也是他們用來與未受邀者相區別的方式。「受邀」本身，即可令這些受邀者轉換成其文化、社會等資本的累積。

以「塑造群體」的期待來評估清代帝王的續蘭亭會，看似是一個假議題，畢竟對帝王來說，任何臣子、外藩都不可能與其同屬一個群體。但帝王實際是在明白這個「假裝」的前提下進行「塑造」之實踐，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帝王究竟想塑造出甚麼樣的群體形象？不論康熙或乾隆皇帝，他們藉由流杯亭的空間以及王羲之蘭亭會這個深受歷代文人景仰的雅集活動來宴請近臣，應是想將帝王周圍的這群重要臣子及帝王個人，塑造成文人群體的形象。在此形象下，帝王本身的漢學教養與藝文修養均可被強化出來。而宴請外藩，則應是想在此淵源於漢人的文化空間中，展現滿州宮廷對中國的統治成就及滿州帝王優越的文化教養，同時令受邀的外藩有機會參與、觀賞這個精緻的文化演出，進而感受到帝王的恩寵，及如與帝王同屬一個「跨族群」之群體的想像。所以十七、十八世紀滿州宮廷中的蘭亭文化作為，在蘭亭傳統中所展現出的重要意義，即是將這個原屬於漢人文士、宮廷的傳統，改造、調整外觀之後，成為滿州帝王用來展示他們自身漢學涵養的文化空間。同時，這個漢人的傳統文化，也被他們挪為己用，作為自身文化傳統般，來向外藩展示。這個作法在蘭亭傳統中是從所未見，具有重要意義的。

對清代宮廷內部的了解之後，本文第四、五章，將焦點轉往宮廷外部，檢視同時期地方所發生之續蘭亭會的發展。首先，第四章先回顧紹興蘭亭在清初康熙、乾隆兩位帝王時期的整修狀況，以及地方官員與地區菁英如何透過續蘭亭會的舉辦以「塑造群體」，聯手恢復地方榮耀的過程。同時也討論紹興蘭亭雖有帝王加持，卻仍趨於黯淡的狀態。紹興蘭亭雖作為王羲之蘭亭會的原初地點，顯然難以和清初之後成為續蘭亭會之熱鬧景點的揚州紅橋、杭州西湖等地相抗衡。而紅橋與西湖的崛起，也意味著蘭亭傳統並不因地舉辦而有限制，反而可為更多人於各地追隨。

至於本文第五章，筆者挑選了兩個成功透過續蘭亭會之「紀念物」的製作，以達「塑造群體」期待的地方社群。分別為紹興知府李亨特在浙江蘭亭當地所主導的續蘭亭會，以及畢沅幕僚劉錫嘏於湖北武昌所主持的借園修禊，這兩個集會都是由幕僚團體所舉辦。這兩個集會對蘭亭傳統的調整，主要是呈現在「紀念物」的製作上，亦即他們所採取的「紀念」方式有別於過去的蘭亭傳統。王羲之蘭亭會因產出《蘭亭序》名蹟而為後代一再追仿，這個可供後代續蘭亭會進行「調整」之「紀念物」製作，可用以展現不同的文化趣味與社群品味。這個調整的過程與趣味的創造，同時可藉以展現該群體之文化資本（如收藏、畫家資源等）、學術興趣，突顯該群體的特殊性格，因此也利於作用在「塑造群體」上。

首先，雖然肖像式的雅集圖繪在明末以來蔚為風潮，卻鮮少見到以肖像式手法描繪當代所舉辦之續蘭亭會者。李亨特的《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在傳李公麟《蘭亭修禊圖》的圖式使用之外，加入肖像式的描寫方式來描繪集會參與者形象，是對蘭亭傳統的一個調整。這個調整，是結合當代流行之雅集圖與傳統蘭亭圖式而來。此調整的好處，是利於透過展現熟悉度、可識別的肖像式描繪，將群體中之個人，凝結、框架到蘭亭圖的圖式上，為參與者提供同屬一個群體的「具體」感知。因此這樣的繪畫風格，可為李亨特之文化象徵的操作帶來安全感。此外，李亨特還藉由《（乾隆）紹興府志》的編纂，將自己的續蘭亭會編入歷史，使成為地方值得記憶的一個事件。這樣的操作方式，似乎也未出現於過去的蘭亭傳統中。總之，李亨特除因地利之便，特別在蘭亭當地舉辦雅集之外，也藉由《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與《（乾隆）紹興府志》的製作，來標榜自己的群體及誇示個人功業。

至於劉錫嘏所屬之畢沅群體的續修禊會，其《借園修禊圖》後之拓本詩跋，是這件「紀念物」最特殊的製作。在拖尾的拓本詩跋中，劉錫嘏等展示了他們的

金石收藏，以及對金石知識與運用的興趣。過去的續蘭亭會多以「詩文集」作為紀念，如鄂敏彙刊眾人詩文為《西湖修禊詩》。⁵⁹但畢沅幕僚卻重新摹刻《穎上蘭亭序》，再剪裱成拓本的形式，來刊載他們的詩文創作。同時，以此拓本形式，來模擬一般《蘭亭序》或「蘭亭圖」長卷予人的印象。此拓本詩跋之複雜的製作工程，在蘭亭傳統上顯得十分特殊，似乎在此前不易見到。劉錫嘏等對蘭亭傳統作此調整，尤其利於在十八世紀金石考據學盛行之際，來標榜此社群對金石學的高度興趣與權威性。並且，畢竟並非所有群體進行續蘭亭會時，均可提出重要《蘭亭序》藏品供眾人賞鑑。劉錫嘏的續蘭亭會中不僅有王文治臨寫畢沅收藏的《定武蘭亭真本》，《借園修禊圖》後的拓本詩跋還特別使用知名之《穎上蘭亭序》來進行製作。這樣的收藏品質與文化展演，遠非李亨特群體所能操作。對畢沅群體來說，他們掌握了品質精緻的藏品、共享了彼此對蘭亭學的知識，以及作為金石考據學的權威身分，這些都有助於深厚他們的文化資本，也是李亨特群體所難望項背的。

進一步由「集會」的角度來統合，李亨特與劉錫嘏借續蘭亭會來塑造群體，有其各自不同的作法與期待。首先，李亨特群體原屬不擅文史者，但他仍可利用蘭亭會傳統所具有的文化資產，來塑造他自己。例如在《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上，李亨特群體被描繪為沉浸於詩文創作中的情景，是利用王羲之蘭亭會的文名及傳李公麟《蘭亭修禊圖》的圖式傳統，來修改、創造自我群體形象。而作為地方官的李亨特，在紹興蘭亭故地舉辦續蘭亭會、重建蘭亭聲望，甚至將自己的蘭亭會寫入志書的作法，則是以「紹興地方官員之蘭亭作為」模式為學習對象。即如第四章所討論，紹興地方官員在明代開始就可見到他們以恢復地方榮耀為己任，對於紹興蘭亭的整修積極參與。而清代吳高增等在乾隆年間將自己的續蘭亭會與地方官員對紹興的建樹寫入《蘭亭志》的作法，除為榮耀地方之外，也是以蘭亭傳統作為塑造地方仕紳形象的憑藉。因此，紹興地區之官員與仕紳在面對王羲之蘭亭會的史事上，似乎可見到一個獨屬於當地之蘭亭傳統的產生。李亨特可說是在這個地方傳統上，同時運用王羲之蘭亭會之名望及蘭亭圖圖式來進一步自我包裝，達成塑造自己、塑造群體的期待。

至於劉錫嘏所屬的畢沅群體，則可見到以金石考據學加入蘭亭傳統以達自我塑造的作法。《蘭亭序》從宋代開始因有書蹟、勾摹與拓本等多種版本的出現，

⁵⁹ 鄂敏等撰，王其煌標點，《西湖修禊詩》，收入王國平主編，《詩詞曲賦及楹聯專輯》（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頁 629-649。

故有「蘭亭學」之形成。蘭亭學到了清代成為金石考據學中的一環，金石考據學正是畢沅群體所擅長者。此群體不僅擁有品質精良的《蘭亭序》收藏，他們之中如畢沅、王文治等，可說為當時中國一流金石學者的代表，因此劉錫嘏的續蘭亭會，是運用這個群體的學術專長來參與蘭亭傳統的改造。

除此之外，王羲之蘭亭會中有小童王獻之的加入，此除作為「賢才群聚」的一個面向，同時利於用來塑造參與續蘭亭會中的小兒。如李亨特的作法，是將其子李善祺以老成持重的形象展示於《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上，而畢沅九歲幼子畢嵩珠及另一同齡陳鏗在劉錫嘏的集會中，卻是以「能詩」的聲名出現在《借園修禊圖》的拓本跋詩中。雙方所塑造出的小兒形象十分不同，卻顯示王羲之蘭亭會的傳統，亦可藉由小兒的出現，來塑造主辦者及其群體的一個面向。總之，不論是以紹興當地所形成之「蘭亭傳統作為」或以「蘭亭學」來運作續蘭亭會，以及透過對「紀念物」的製作來調整蘭亭傳統，均可見到王羲之蘭亭會在「塑造群體」上的優勢。

雖然筆者提出續蘭亭會有助於塑造群體，但值得反思的是，所有的集會其實都具備這個功能，就此說來如何能看出續蘭亭會在塑造群體上有其優勢？首先，續蘭亭會因承繼王羲之而來，因此有上文已經指出的五點特殊性。這五項特點形同集會舉辦的框架（或格套），可讓後世辦理續蘭亭會者有所依歸。亦即，即便主辦者對蘭亭傳統沒有太多理解，亦可在形式上學得幾分，但對此傳統熟悉者，則可進一步在傳統上追求變異。因此這五點並非全為後代續蘭亭會嚴格依循，後繼者往往從中選擇一二使用於自身辦理的續蘭亭會。但其中，與場地選擇有關的「務須臨水」以及對「賢才群聚」之期待，可說是所有續蘭亭會均遵循的兩個要件。

與續蘭亭會同樣具有固定框架可供參考的雅集，可以「壽蘇會」為例。由清代宋荦（1634-1714）於康熙三十九年（1700）首次舉辦的壽蘇會，通常在固定的日期（蘇軾生日），展示蘇軾作品、後人作品（如蘇軾畫像、蘇軾詩文集等），及蘇軾喜愛的食品，這些物品大抵為後來的壽蘇會所繼承。⁶⁰雖然壽蘇會也具有既定框架，可說同樣利於群體塑造，但它與續蘭亭會仍有不同之處。第一，壽蘇

⁶⁰ 參閱衣若芬，〈時間·物質·記憶——清代壽蘇會之文化圖景〉，《長江學術》，2016年第4期，頁64-66，另可參閱全文討論（頁57-69）。日本壽蘇會的舉辦，可參見池澤滋子，《日本的赤壁會和壽蘇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陳振濂，〈“壽蘇會”與“赤壁會”：再談長尾甲〉，收入氏著，《維新：近代日本藝術觀念的變遷——近代中日藝術史實比較研究》，頁126-129。

會是清代才出現的雅集，其之所以形成框架，很可能也是受到具有長久發展歷史之續蘭亭會所啟發。第二，壽蘇會之類的文人雅集，舉辦門檻很高，通常是熟悉蘇軾作品的文人才有興趣也才有能力舉辦。尤其這類集會往往需備有蘇軾作品、蘇軾畫像等物，非一般文人所能獲得，當然就此主題來說，也不是宮廷所會舉辦者。⁶¹相較於此，續蘭亭會的接受者範圍擴大很多，上至帝王，下至高低階文人均可舉辦，具有商人身分的收藏家馬曰琯（1687-1755）、馬曰璐（1701-1761）兄弟，也曾在乾隆八年（1743）舉辦過修禊會。⁶²此外，續蘭亭會的舉辦雖有一定框架可供參考，但除「務須臨水」須被「嚴格」遵循之外，其他內容均可視集會需求加以調整，這也是造成續蘭亭會的舉辦會有其「形似」王羲之蘭亭會的部分，同時又可離開紹興蘭亭遺址，展現各群體獨特風格的主要因素。不過，續蘭亭會的舉辦看似容易，但能否成功塑造群體，得視舉辦者如何理解蘭亭傳統、如何調整或修改這個傳統而定。如本文所討論李亨特、畢沅群體之例，比起當代其他續蘭亭會，顯然可被視為成功達到塑造群體目的的具體實例，但兩者的精采度仍各自有別。

此外，如「金谷會」或「西園雅集」等知名集會，雖然也有文人追仿，但這類雅集並不像續蘭亭會有標準可供依循、框架，因此舉辦時自由度很高。當一個雅集沒有太多限制的時候，也意味著雅集的個性與目標不易彰顯。因此這類雅集即使命名不同，往往形式相仿，難以梳理出各自特色。過去當吾人對續蘭亭會的理解不多時，也經常將續蘭亭會視如這類雅集一般。至於如「九老會」、「耆老會」之類的集會，因帶有敬老之意，可為宮廷接受，故清代宮廷即有「千叟宴」之舉辦。⁶³這類雅集雖也具有塑造群體的功能，但以「千叟宴」來說，重點應在尊賢敬老，而非群體營造，因此尚需視各例不同，再予討論。

總之筆者認為，續蘭亭會之所以為各階層人所樂於追仿，主要與王羲之作為書聖之身分、《蘭亭序》做為經典作品、曲水流觴展現之文人趣味，及蘭亭會向以文士風流之印象存於後世的想像有關。亦即王羲之的蘭亭會不僅有人、事、時、地、物具體可追，歷代一再加入蘭亭傳統之文化展演，也豐厚了這個集會的歷史記憶，令後世參與者產生宛若屬於這個傳統、這個群體之一員的想像。如同本章

⁶¹ 衣若芬文即提到有些文人為了辦理壽蘇會，還得向人商借必須之文物。見衣若芬，〈時間·物質·記憶——清代壽蘇會之文化圖景〉，頁 65。

⁶² 見丁家桐、朱福娃，〈揚州八怪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頁 151-152。

⁶³ 相關研究如葉泉宏，〈乾隆千叟宴與清鮮宗藩關係（1785）〉，《韓國學報》，第 17 期（2002.6），頁 283-297。

所列舉之韓、日、臺三地的十九、二十世紀以來的續蘭亭會，正好都是王羲之西元三五三年蘭亭會之後的還曆紀念，亦即這些續蘭亭會均帶有「慶祝」的意義於其中。參加者透過還曆時節來舉辦續蘭亭會，用以追憶、參與這個遠古的傳統。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續蘭亭會對「紀念物」之製作，藉由當代繪畫風潮或學術興趣以調整蘭亭傳統的作法，在「紀念」的意義與續蘭亭會之「塑造群體」功能上，不同以往的續蘭亭會，而具有相當之特殊性，值得吾人重新看待。同時在此傳統上，不論是建造一座特別的流杯亭、製作一張不同以往的蘭亭圖或拓本詩跋，都是一種用來區別他者、塑造自我的方式。必須將這些「紀念物」放到集會的脈絡來看，才能發掘其特殊性。

藝術史的研究中，偉大藝術家與經典藝術品的討論，向來是此學科主要的研究進路。若以此角度來看，研究重點通常放在藝術家個人之養成背景、藝術風格的展現與對後代的作用上，以及藝術品的風格分析與其繼承之風格、相關影響等方面的追索與解釋。但本文以「集會」作為統合的角度來觀察清代續蘭亭會，重視的是參與者如何操作、修改、參與蘭亭傳統。因此研究焦點是放在續蘭亭會被如何設計，參與者如何改造蘭亭紀念物，以及這樣的改造如何與其他當代需求（如清宮宴請外藩）、風潮（如使用西法繪製的雅集圖）或學術思潮（如金石考據學）相結合。亦即本文將續蘭亭會之空間設計、活動安排及紀念物的創造等，視為一個有機的結構性組合，在此結構性組合上，每個環節均有其意義，必須放在一起觀察，才能看出這個集會的設計與期待，並在蘭亭傳統的脈絡中來評估其重要性。也因此，以集會作為續蘭亭會研究的統合角度，可說是從一個結構性組合的觀察與解釋來進行分析，其目標不同於聚焦在單一藝術家或藝術品的個案研究上。

本文從「集會」的角度，透過對「紀念物」與「塑造群體」之運作觀察出發，不僅回應了清代宮廷為何需要製作多座流杯亭的提問，也釐清自然水域之修禊與流杯建構之修禊源流的問題，同時也與園林建築史、清代幕僚研究、金石考據研究等領域進行對話。最重要的，是本研究試圖說明以往不受重視之清代續蘭亭會，在蘭亭傳統發展上的重要性。這樣的成果，是過去僅將焦點放在王羲之蘭亭會、《蘭亭序》書蹟或相關圖繪的研究方式所難以取代。筆者認為，若以此研究角度來重新檢視歷史中之蘭亭傳統的表現，或許可重新發掘歷代蘭亭文化的新意義與重要性。就此預期成果而言，是值得期待的。



參考文獻



傳統文獻

于敏中等編

《欽定日下舊聞考》，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日下舊聞考（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1。

《國朝宮史》，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于敏中、傅恒等編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承德市文物局合編

《清宮熱河檔案（1）》，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 2003。

《清宮熱河檔案（2）》，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 2003。

《清宮熱河檔案（4）》，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 200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二冊，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文徵明著，陸曉冬點校

《甫田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

申景濬

《旅菴遺稿》，韓國古典綜合 DB（據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木活字本）。

孔尚任

《湖海集》（清康熙間介安堂刻本）。

孔鮒

《孔叢子》，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四部叢刊景明翻宋本）。

文彥博

《潞公文集》，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毛奇齡

《西河集》，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制科雜錄》，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昭代叢書本）。

王文治著，劉奕點校

《王文治詩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4。

王先謙

《東華續錄（乾隆朝）》，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光緒十年〔1884〕長沙王氏刻本）。

王勃

《王子安集》，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四部叢刊景明本）。

王勃撰，張遜業校，芥〔川〕煥點

《王勃集》，收入長澤規矩也編，《和刻本漢詩集成 唐詩》，第一輯（東京：古典研究會據延享四年（1747）京都唐本屋吉兵衛門刊本影印，1975）。

王昶



- 《春融堂集》，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嘉慶十二年塾南書舍刻本）。
- 王家相
- 《清秘述聞續》，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光緒十四年〔1888〕刻本）。
- 王復禮編，毛奇齡校
- 《御覽蘭亭孤山志》（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 58 年〔1719〕陸廷燦刻本，原成於康熙 38 年〔1699〕）。
- 王嗣槐
- 《桂山堂詩文選》，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康熙青筠閣刻本）。
- 王溥
- 《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5。
- 王維
- 《王摩詰文集》，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宋蜀本）。
- 王績著，韓理洲點校
- 《王無功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王闖運
- 《（光緒）湘潭縣志》（清光緒十五年〔1889〕刻本）。
- 司馬遷
- 《史記》，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 四川省文物管理局編
- 《四川文物志》，成都：巴蜀書社 2005。
- 弘曉
- 《明善堂詩文集》，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刻本）。
- 永瑤
- 《四庫全書總目》，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乾隆〔1736-1795〕武英殿刻本）。
- 白居易
- 《白氏長慶集》，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四部叢刊景日本翻宋大字本）。
- 全祖望
- 《鮚埼亭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縮印清同治十一年〔1872〕姚江借樹山房刊本，1965）。
- 《鮚埼亭集外編》，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嘉慶十六年〔1811〕刻本）
- 危素
- 《臨川吳文正公年譜》，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刻本）。
- 朱彝尊
- 《曝書亭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縮印清康熙本）。
- 吳承洛
- 《中國度量衡史》，上海：上海書店 1984。
- 吳振棫
- 《養古齋叢錄》，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光緒刻本）。
- 吳高增輯，
- 《蘭亭志》，收入《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據清乾隆 17 年〔1752〕刻本影印），2006），第 35 冊。
- 吳翌鳳
- 《與稽齋叢稿·廬雲小錄》，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嘉慶〔1796-1820〕刻本）。



李白

《李太白集》，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宋刻本）。

李斗撰，汪北平、涂雨公點校

《揚州畫舫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

李亨特總裁，平恕等修

《紹興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據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本影印）。

李昉編

《太平御覽》，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四部叢刊三編景宋本）。

李彥章

《榕園文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58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李桓輯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二十一）》，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 147 冊。

李商隱

《李義山詩集》，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四部叢刊景明嘉靖本）。

李誠

《營造法式》，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李德裕

《會昌一品集》，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李稻塈

《梅會詩選》，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乾隆三十二年寸碧山堂刻本）。

李衛

《（雍正）浙江通志》，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李調元

《童山集》，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乾隆刻函海道光五年增修本）。

杜春生編錄

《越中金石記》，收入國家圖書館出版社輯，《地方金石志彙編》，第 43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據清道光十年〔1830〕詹波館刻本 2011。

汪懋麟

《百尺梧桐閣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世美堂刻康熙四十年〔1701〕續刻本影印，第 241 冊，台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 1997。

沈佺期、宋之問撰，陶敏、易淑瓊校注

《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上、下）》，北京：中華書局 2006。

沈約

《宋書》，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乾隆〔1736-1795〕武英殿刻本。

沈翼機等撰

《浙江通志》，臺北：華文書局據乾隆元年〔1736〕刊本影印，1967。

阮元

《兩浙金石志》，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道光四年〔1824〕李樸刻本。

《兩浙輶軒錄》，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嘉慶刻本。

《擘經室集》，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四部叢刊景清道光〔1821-1850〕本。

和珅、梁國治纂修

《欽定熱河志》，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孟浩然

《孟浩然集》，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四部叢刊景明本。

房玄齡等

《晉書》，北京：中華書局 1997。

《晉書》，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東方學會編

《國史列傳（二）》，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 36 冊。

法式善

《清秘述聞》，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嘉慶四年〔1799〕刻本。

阿桂等纂修

《八旬萬壽盛典》，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姚鉉

《唐文粹》，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四部叢刊景元翻宋小字本。

姚燮

《復莊詩問》，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道光〔1821-1850〕姚氏刻大梅山館集本。

胡震亨

《唐音癸籤》，收入周維德集校，《全明詩話》，濟南：齊魯書社 2005。

庫勒納等奉敕撰

《清代起居注——康熙朝》，第 13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

孫陳典、汪臺詩文，見鄂敏等撰，王其煌標點

《西湖修禊詩》，收入王國平主編，《西湖詩詞曲賦及楹聯專輯》，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徐元梅修，朱文翰纂

《（嘉慶）山陰縣志》，愛如生中國方志庫，據民國二十五年〔1936〕紹興縣修志委員會校刊鉛印本。

徐堅編

《初學記》，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光緒孔氏三十三萬卷堂本。

桑世昌輯

《蘭亭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據知不足齋叢書本排印。

袁枚

《小倉山房集》，清乾隆刻增修本。

《隨園詩話補遺》，收入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3，第 3 冊。

馬齊等修

《清聖祖仁皇帝實錄》，愛如生古典資料庫 明清實錄。

高士奇

《金黿退食筆記》，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高晉等編

《欽定南巡盛典》，收入紀昀等總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1983，第 659 冊。

康駢

《劇談錄》（叢書集成初編本），第 2834 冊，北京：中華書局據津逮本影印，1991。

張元忭



- 《(萬曆)紹興府志》，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明萬曆刻本。
- 張廷玉
- 《欽定熱河志》，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 《澄懷園文存》，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乾隆間刻澄懷園全集本。
- 張廷玉撰，戴鴻義點校
- 《張廷玉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2。
- 張岱著、夏咸淳輯校，
- 《張岱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張維屏
- 《國朝詩人徵略》，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道光十年刻本。
- 戚祚國
- 《戚少保年譜耆編》，愛如生中國方志庫，據清道光〔1820-1850〕刻本。
- 戚繼光
- 《止止堂集》，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光緒十四年〔1888〕山東書局刻本。
- 梁章鉅
- 《浪跡叢談》，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刻本。
- 梁詩正、張照等編撰
- 《石渠寶笈(初編)》，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清世宗纂
- 《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清高宗
- 《御製詩集 二集》，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 《御製詩集 三集》，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 《御製詩集 五集》，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 《御製詩集 四集》，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 《御製詩集 初集》，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 《御製詩集 餘集》，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 清聖祖
- 《清聖祖御製文初集》，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 543 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 《清聖祖御製詩三集》，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 542 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 《清聖祖御製詩初集》，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 542 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 清聖祖撰，清高宗依次和韻，揆敘、鄂爾泰等注，沈喻繪圖，朱圭、梅裕鳳製圖
- 《御製避暑山莊詩(並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六年〔1741〕武英殿刊朱墨套印本。
- 清聖祖撰，揆敘等注，沈喻繪圖，馬國賢(Matteo Ripa)製圖
- 《御製避暑山莊詩(並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武英殿刊朱墨



套印本。

畢沅

《山左金石志》，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嘉慶刻本。

《香草吟》，收入楊焄點校，《畢沅詩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

許東望修，張天復、柳文纂

《(嘉靖)山陰縣志》，收入殷夢霞選編，《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續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據明嘉靖三十年〔1551〕刻本影印，2003，第4冊。

連波、查洪德校注

《沈佺期詩集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郭若虛

《圖畫見聞志》，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一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

陳廷敬

《御選唐詩》，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陳康祺

《郎潛紀聞》，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光緒刻本。

陳維崧

《陳迦陵文集》，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四部叢刊景清本。

《陳檢討四六》，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陳慶鏞

《籀經堂類藁》，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587冊。

陸廣微

《吳地記》，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黃叔璥

《國朝御史題名》，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光緒〔1875-1908〕刻本。

黃鈞宰

《金壺七墨》，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黃爵滋

2002 《僊屏書屋初集年記》(臺北：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頁286-291。

黑板勝美編

2004 《續日本紀》，東京：吉川弘文館。

嵇曾筠

《(雍正)浙江通志》，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嵇璜等奉敕撰

《皇朝通志》，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彭蘊璠

《歷代畫史彙傳》，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道光刻本影印。

惠棟

《漁洋山人自撰年譜注補》，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紅豆齋刻本。

舒其紳等修，嚴長明等纂



《(乾隆)西安府志》，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乾隆〔1736-1795〕刊本。
鄂敏等撰，王其煌標點

《西湖修禊詩》，收入王國平主編，《詩詞曲賦及楹聯專輯》，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鄂輝

《平苗紀略》，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嘉慶武英殿活字本。
馮桂芬

《(同治)蘇州府志》，清光緒九年〔1883〕刊本。

黃爵茲

《僊屏書屋初集年記》，臺北：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據清道光刻本影印，1968。

葉廷琯

《鷗陂漁話》，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同治九年〔1870〕刻本。

董誥

《全唐文》，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嘉慶內府刻本。

福趾

《戶部漕運全書》，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光緒刻本。

蒲積中

《歲時雜詠》，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配清文津閣四庫全書本。

趙爾巽

《清史稿》，民國十七年〔1928〕清史館本。

趙爾巽等撰，楊家駱校

《清史稿》，臺北：鼎文書局，1981。

劉大櫚

《海峰文集》，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刻本。

劉奕點校

《王文治詩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

劉清原纂，傅修續纂修

《直隸遵化州志》，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乾隆59年〔1794〕刊本。

劉嗣綰

《尚綱堂集》，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道光大樹園刻本。

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等整理

《世說新語箋疏（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

《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劉應鈞修，沈堯中纂

《(萬曆)嘉興府志》，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刊本。

厲鶚

《樊榭山房集》，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四部叢刊景清振綺堂本。

慶桂纂修

《國朝宮史續編》，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清嘉慶十一年〔1806〕內府鈔本。

樂鈞

《青芝山館詩集》，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嘉慶二十二年刻後印本。



歐陽修

《新唐書》，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歐陽文忠公集》，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四部叢刊景元本。

歐陽詢

《藝文類聚》，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潘衍桐

《兩浙輶軒續錄》，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光緒刻本。

蔣廷錫等編纂

《古今圖書集成》，第 97 冊，臺北：文星書店 1964。

鄭僑生修

《(康熙) 遵化州志》，愛如生中國方志庫，據清康熙間〔1661-1722〕修康熙鈔本。

鄭澐修，邵晉涵纂

《(乾隆) 杭州府志》，清乾隆刻本。

穆彰阿

《(嘉慶) 大清一統志》，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四部叢刊續編景舊鈔本。

蕭子顯

《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南齊書》，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蕭良幹修，張元忭、孫鑛纂，李能成點校

《萬曆《紹興府志》點校本》，寧波：寧波出版社，2012。

蕭統撰，李善等註

《六臣注文選》，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四部叢刊景宋本。

錢泳撰，孟斐校點

《履園叢話(下)》，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錢泰吉

《甘泉鄉人稿》，清同治 11 年〔1872〕刻，光緒 11 年〔1885〕增修本。

錢陳群

《香樹齋詩文集》，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乾隆刻本。

錢維喬

《(乾隆) 鄞縣志》，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刻本。

戴璐

《藤陰雜記》，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嘉慶石鼓齋刻本。

繆荃孫纂錄

《續碑傳集(五)》，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

薛岡

《天爵堂文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25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韓鄂

《歲華紀麗》，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明萬曆〔1573-1620〕秘冊彙函本。

韓醇

《詒訓柳先生文集》，1177 年，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新編外集末韓氏後。

嚴繩孫

《秋水集》，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康熙兩青草堂刻本。

酈道元

《水經注》，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

麟慶

《鴻雪因緣圖記》，第一集，北京：線裝書局，據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影印，2003。

《鴻雪因緣圖記》，第三集，北京：線裝書局，據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影印，2003。



近人論著

中文

〔？〕穎編，錢泳校訂

2006 《梅溪先生年譜》，收入陳祖武選，《乾嘉名儒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第 10 冊。

丁家桐、朱福炷

1993 《揚州八怪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151-152。

于倬雲等

2012 《乾隆皇帝的祕密花園》，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尹占華

2000 〈大歷浙東和湖州文人集團的形成和詩歌創作〉，《文學遺產》，第 4 期，頁 65-73。

文物出版社編

1977 《蘭亭論辨》，北京：文物出版社。

方聞

1968 〈董其昌與正宗派繪畫理論〉，《故宮季刊》，第 2 卷，頁 1-34。

毛文芳

2008 《圖成行樂：明清文人畫像題詠析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

毛振華

2007 〈《左傳》賦詩習俗的淵源與流變〉，《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3 卷第 1 期，頁 97-101。

王子林

2011 〈乾隆太上皇宮寧壽宮營建考〉，《故宮學刊》，第七輯，頁 122-143。

2011 〈清紫檀木雕蘭亭修禊圖八柱帖插屏〉解說，收入故宮博物院編，《蘭亭圖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頁 383-385。

王心白、紀偉

2001 〈醇親王墓碑亭修繕和特點淺析〉，《古建園林技術》，第 3 期，頁 35-39。

王平

- 2006 《探花風雅夢樓詩——王文治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
- 王正華
- 2003 〈呈現「中國」：晚清參與 1904 年美國聖路易萬國博覽會之研究〉，收入黃克武主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王汎森
- 2008 〈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國史儒林傳》與道光年間顧祠祭的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9 本第 1 分，頁 63-93。
- 王兵
- 2016 〈明清文士周京生平及其入清後游幕考〉，《成大歷史學報》，第 50 號，頁 121-152。
- 王秀臣
- 2005 〈燕饗禮儀與春秋時代的賦詩風氣〉，《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 期，頁 67-72。
- 王其亨、官嵬
- 1997 〈寧壽宮花園的點睛之筆：楔賞亭索隱〉，收入單士元、于倬雲編，《中國紫禁城學會論文集（第一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頁 296-310。
- 王英志
- 2013 〈袁枚集外尺牘考釋〉，《中州學刊》，第 10 期，頁 151-155。
- 王記錄
- 2007 〈清代史館修史、幕府修史及私家修史的互動〉，《史學史研究》，第 2 期，頁 48-56。
- 王連起
- 2010 〈陸東之和他的蘭亭詩〉，《文物》，第 2 期，頁 77-86。
- 2012 〈關於《蘭亭序》的若干問題〉，《書法叢刊》，第 129 期，頁 18-96。
- 王勝軍
- 2010 〈康熙理學思想探析〉，《文史博覽》，第 2 期，頁 31-33。
- 王鈴雅
- 2011 〈勺園與米萬鍾文化形象的形塑：《勺園圖》相關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禕
- 2007 〈明代藩府刻《蘭亭圖》卷及其變遷〉，《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4 期，頁 142-155。
- 王曉芳
- 1986 〈中南海流杯亭〉，《古建園林技術》，第 1 期，頁 28。
- 王靜靈
- 2016 〈柏林收藏的紫光閣功臣像及其相關作品新論〉，《故宮學術季刊》，第 34 卷第 1 期，頁 153-214。
- 王鍾翰
- 1994 〈康熙與理學〉，《歷史研究》，第 3 期，頁 116-122。
- 古原宏伸
- 1992 〈近八十年來的中國繪畫史研究的回顧〉，《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頁 541-551。
- 史革新
- 2007 《清代理學史（上卷）》，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
-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溫治溢譯



- 2012 《曹寅與康熙》，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白鈴安 (Nancy Berliner) 作，李紹毅譯
- 2011 〈園林，曲水與書法〉，《紫禁城》，200 期，頁 20-26。
- 白謙慎
- 2000 〈從八大山人臨《蘭亭序》論明末清初書法中的臨書觀念〉，收入華人德、白謙慎主編，《蘭亭論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頁 462-472。
- 2013 《吳大澂和他的拓工》，北京：海豚出版社。
- 皮耶·布赫迪厄 (Pierre Bourdieu) 著，石武耕、李沅沅、陳羚芝譯
- 2016 《藝術的法則：文學場域的生成與結構 (*Les règles de l'art: genèse et structure du champ littéraire*)》，臺北：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 皮耶·布赫迪厄 (Pierre Bourdieu) 著，林明澤譯
- 1999 〈藝術品味與文化資產 (Outline of a Theory of Art Perception)〉，收入 Jeffrey C. Alexander & Steven Seidman 主《文化與社會 (*Culture and Society: Contemporary Debates*)》，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頁 259-275。
- 皮耶·布赫迪厄 (Pierre Bourdieu) 著，劉暉譯
- 2017 《區分：判斷力的社會批判 (*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二冊)》，北京：商務印書館。
- 石守謙
- 2010 《從風格到畫意——反思中國美術史》，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2017 《山鳴谷應：中國山水畫和觀眾的歷史》，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石守謙、葛婉章主編
- 2001 《大汗的世紀：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 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著，賈晉華譯
- 2005 《盛唐詩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頁 318-342。
- 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著，賈晉華譯
- 2007 《初唐詩 (*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全增嘏
- 1944 〈清代幕僚制度論 (續)〉，《思想與文化月刊》，第 32 期，頁 35-43。
- 1944 〈清代幕僚制度論〉，《思想與文化月刊》，第 31 期，頁 29-35。
- 安輝濬
- 2012 〈朝鮮時代的畫員〉，《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6 期，頁 6-27。
- 曲延鈞主編
- 2002 《中國清代宮廷版畫》，第 6 冊 (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頁 483)。
- 朱則杰
- 2013 〈畢沅“官閣消寒會”與嚴長明《官閣消寒集》〉，《甘肅社會科學》，第 6 期，頁 165-168。
- 2014 〈畢沅“蘇文忠公生日設祀”集會唱和考論〉，《江南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13 卷第 2 期，頁 84-89。
- 2015 〈王士禛“紅橋修禊”考辨——兼談結社、集會、唱和三者之關係〉，《江蘇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第 17 卷第 1 期，頁 51-58。
- 朱則杰、盧高媛

- 2015 〈《履園叢話》“蘭亭”條與李亨特“續蘭亭修禊”考論〉，《浙江學刊》，第5期，頁107。
- 朱琪
- 2012 〈黃易的家世、生平與金石學貢獻〉，收入故宮博物院編，《黃易與金石學論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頁350-371。
- 朱誠如
- 2000 〈乾隆建儲與訓政述評〉，《故宮博物院院刊》，第4期，頁1-11。
- 朱誠如主編
- 2002 《清史圖典·康熙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 朱劍心
- 1996 《金石學》，收入《民國叢書（第五編）》（上海：上海書店據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影印，第86冊。
- 朱錦雄
- 2013 〈六朝「詩歌遊戲化」現象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朱蕾、王其亨
- 2012 〈乾隆帝的“連鎖”園林——以“千尺雪”為例〉，《新建築》，第6期，頁113-116。
- 江亞玉
- 2009 〈日本女兒節的源流與演變〉，《人文社會科學學刊》，第1期，頁193-206。
- 池田溫著，孫曉林等譯
- 1999 《唐研究論文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池澤滋子
- 2006 《日本的赤壁會和壽蘇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衣若芬
- 2001 〈一椿歷史公案——「西園雅集」〉，《赤壁漫遊與西園雅集》，北京：線裝書局，頁49-95。
- 2006 〈俯仰之間：《蘭亭修禊圖》及其題跋初探〉，《中國學術》，第24期，頁81-83。
- 2012 〈宋代「武夷棹歌」中的地景空間與文化意蘊〉，《東華人文學報》，第20期，頁33-58
- 2014 〈蘭亭流芳在朝鮮〉，收入故宮博物院編，《二零一一年蘭亭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故宮出版社，頁36-40。
- 2015 〈印刷出版與朝鮮「武夷九曲」文化意象的「理學化」建構，收入守謙、廖肇亨主編，《轉接與跨界：轉接與跨界——東亞文化意象之傳佈》，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351-387。
- 2015 〈朱熹〈武夷權歌〉與朝鮮理學家李退溪的次韻詩〉，收入王利民、武海軍主編，《第八屆宋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頁532-539。
- 2015 〈遊觀與求道：朱熹〈武夷權歌〉與朝鮮士人的理解與續作〉，《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0期，頁53-71。
- 2016 〈時間·物質·記憶——清代壽蘇會之文化圖景〉，《長江學術》，2016年第4期，頁57-69。
- 佐藤道信著，林暉鈞譯
- 2015 〈近代日本の「美術」と「美術史」〉，《現代美術學報》，第30期，頁13-52。
- 何炎泉
- 2015 〈陳淮的書畫收藏與嘉慶皇帝的《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故宮學術季刊》，第32卷第3期，頁139-179。
- 2016 〈乾隆朝後期之民間碑帖收藏與碑學關係初探〉，發表於「中國收藏與鑑定史國際研討會」（杭州：浙江大學，2016.11.11-12），頁1-7（未刊稿）。
- 何冠彪

- 1999 〈昇平嘉宴——清朝內廷首次賜宴漢官始末〉，《故宮學術季刊》，第 16 卷第 3 期，頁 113-139。
- 何傳馨
2000 〈故宮藏《定武蘭亭真本》(柯九思舊藏本)及相關問題〉，收入華人德、白謙慎主編，《蘭亭論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頁 331-339。
- 余淑娟
1999 〈唐代曲江詩空間意涵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余佩瑾
2012 〈乾隆皇帝的古陶瓷鑑賞〉，收入余佩瑾主編，《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頁 14-40。
- 余嘉錫
2007 《四庫提要辨證》，北京：中華書局。
- 宋兆霖主編
2015 《匠心筆蘊：院藏明清版畫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5。
- 宋志英
2002 〈王隱《晉書》初探〉，《文獻》，第 3 期，頁 4-15。
- 宋德熹
2009 〈長安之春——唐代曲江宴遊之風尚〉，《唐史識小：社會與文化的探索》，新北市：稻鄉出版社，頁 289-321。
- 李心純
1996 〈從中國古代的上巳節到日本的雛祭〉，《日本學刊》，第 2 期，頁 113-125。
- 李孝悌
2015 《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李金華
2010 〈畢沅及其幕府的史學成就〉，天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論文。
- 李若晴
2011 〈山門流轉一滄桑——《曾賓谷長壽寺修禊圖》遞藏考〉，《新美術》，第 6 期，頁 43-51。
- 李郁周
2000 〈談文徵明書《重修蘭亭記》〉，收入華人德、白謙慎主編，《蘭亭論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頁 420-429。
- 李乾朗
2011 〈禊賞亭〉，《紫禁城》，200 期，頁 27-29。
- 李常慶
2008 《四庫全書出版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頁 7-8、13-19。
- 李棧編
1973 《蘭亭大觀：蘭亭陳列品目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研究所文物館。
- 李源福
1982 〈《蘭亭修禊》圖說〉，《空間》，178，頁 29-30。
- 李慧聞
2000 〈董其昌所見所評唐臨摹本《蘭亭序》及其 1618 年贈人的一本《蘭亭》：關於鑑定學的一項個案研究〉，收入華人德、白謙慎主編，《蘭亭論集》，頁 430-461。
- 李慧漱
2010 〈賢志、瑞文與奉華寶藏——南宋皇室女性之鑑藏品味與性別文化空間〉，《文藝紹興——

南宋藝術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頁 1-8。

李豐楙

2000 〈嚴肅與遊戲：六朝詩人的兩種精神面向〉，收入衣若芬、劉苑如主編，《世變與創化：漢唐、唐宋轉換期之文藝現象》，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頁 1-57。

汪利平

2012 〈杭州景觀建設與清代文化政治〉，《新史學》，第 6 卷，北京：中華書局，頁 166-172。

沈津

2002 《翁方綱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頁 258。

尚小明

1999 《學人游幕與清代學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周祖譔

1991 〈武后時期之洛陽文學〉，《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 期，頁 69-72。

周軒

1993 〈一生流放三次的河督李亨特〉，《紫禁城》，第 4 期，頁 36-38。

周紹良

1979 〈蘭亭八柱近況〉，《書譜》，第 6 期，頁 40-41。

周維權

1990 《中國古典園林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0。

周燕

2012 〈孫綽《三月三日蘭亭詩序》并非蘭亭後序〉，《勵耘學刊（文學卷）》，第 2 期，頁 10-25。

吳空

1988 〈乾隆皇帝修中南海問題初探（二）〉，《紫光閣》，第 7 期，頁 47。

1997 〈宗室與宗室宴——西苑和清代宴儀之一〉，《紫光閣》，第 4 期，頁 48。

1997 〈凱旋宴——西苑和清代宴儀之二〉，《紫光閣》，第 5 期，頁 48。

1997 〈外藩和外藩宴——西苑和清代宴儀之三〉，《紫光閣》，第 6 期，頁 48。

2002 〈清代北京西苑的造園特色〉，收入于倬云、朱誠如主編，《中國紫禁城學會論文集（第二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頁 217-221。

吳誦芬

2002 〈謝環《杏園雅集圖》研究〉，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6 〈乾隆朝玉冊成做機制研究〉，《故宮學術季刊》，第 33 卷第 4 期，頁 33-70。

朋尼維茲（Patrice Bonnewitz）著，孫智綺譯，林志明、尉遲秀校訂

2015 《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Premieres lecons sur La sociologie de Pierre Bourdieu*）》，臺北：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明隆主編

2007 《回家真好：2007 新店市粗坑里花蟲季文化節》，臺北：新店市粗坑里辦公室。

林家維

2015 〈乾隆朝紫光閣賜宴圖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4 期，頁 67-96。

林恭祖

1986 〈曲水流觴話上巳〉，《故宮文物月刊》，第 37 期，頁 19-21

林煥盛

1994 〈丁觀鵬的摹古繪畫與乾隆院畫新風格〉，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歡

- 2011 〈清乾隆竹管蘭亭真賞紫毫筆〉解說，收入故宮博物院編，《蘭亭圖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頁 344-345。
- 2011 〈清乾隆蘭亭修禊圖白御墨〉解說，收入故宮博物院編，《蘭亭圖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頁 351。

祁小春

- 2007 《邁世之風：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竺岳兵

- 2004 《唐詩之路唐代詩人行迹考》，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邱江寧、宋啟鳳

- 2013 〈論元代“續蘭亭會”〉，《江蘇社會科學》，第 6 期，頁 185-190。

侯冬

- 2012 〈曾燠幕府雅集與乾嘉之際文人心態〉，《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9 卷第 6 期，頁 77-84。

侯米玲

- 2011 〈畢沅與畢瀧的書畫船〉，《史物論壇》，第 13 期，頁 25-63。

侯志雲

- 〈風雨七王墳〉，《北京日報》，2009 年 6 月 21 日。北京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網頁，網址：<http://www.bjdfz.gov.cn/ShowNewsLevel3.jsp?NewsID=1502>，檢索日期：2018-11-1。

姜伯勤

- 2007 〈清代長壽寺園林雅集與廣府文化及琴道——《曾賓谷先生長壽寺后池修禊圖》初探〉，《廣州文博》，頁 12-30。

故宮出版社編

- 2012 《蘭亭八柱》，北京：故宮出版社。

故宮博物院編

- 2011 《蘭亭圖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 2015 《石渠寶笈特展·編纂篇》，北京：故宮出版社。

洪泉、唐慧超

- 2015 〈曲院風荷變遷圖考〉，《北京林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4 卷第 3 期，頁 34-41。

胡佩佩

- 2016 〈朴珪壽與清朝“顧祠修禊”文人的尺牘交流研究〉，《河北科技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5 卷第 1 期，頁 57-62。

胡遂、唐藝溱

- 2015 〈紅橋修禊與清代士人之心態流變〉，《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9 卷第 1 期，頁 86-91。

韋旭昇

- 2008 《韓國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馬君蘭 (Martina Siebert)

- 〈愛蓮及藕：清代京城蓮藕管理機構的形成〉，網址：https://www.mpiwg-berlin.mpg.de/Presse-PDF/2014_10_17_PM_Schaefer_chn_Siebert.pdf，檢索日期：2018-06-20



唐屹軒

- 2015 〈新村容子，《アヘン戦争の起源——黃爵滋と彼のネットワーク》〉書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88 期，頁 231-237。

孫冬虎

- 2006 〈元清兩代北京萬柳堂園林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 21 卷第 2 輯，頁 35-39。

徐邦達

- 1982 〈王羲之《蘭亭序》臨本前後七種合考（一～六）〉，《書譜》，第 44 期，頁 66-75；第 45 期，頁 76-80；第 46 期，頁 66-71；第 47 期，頁 68-71；第 48 期，頁 76-80；第 49 期，頁 66-71。

- 1984 《古書畫偽訛考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徐筱婷

- 2012 〈從杜篤《袞襖賦》試觀先秦時期迷信思想及崇巫觀念——與出土文獻合證〉，《遼東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4 卷第 4 期，頁 46-53。

殷亮、王其亨

- 2006 〈宜靜原同明靜理，此山近接彼山青——清代皇家園林靜宜園、靜明園研究〉，天津：天津大學建築學院碩士論文。

- 2007 〈御園自是湖光好，山色還須讓靜宜——淺析香山靜宜園 28 景經營意向〉，《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9 卷第 6 期，頁 556-559。

神田喜一郎著，戴蘭村譯

- 1989 〈中國書道史 7 隋·唐一〉，《書道全集 第 7 卷 隋·唐 I》，臺北：大陸書店。

耿威、王其亨

- 2010 〈樣式雷圖檔中的恭王府花園〉，《中國園林》，第 9 期，頁 64-67。

茹遂初

- 2006 《頤和園》，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

袁玉紅

- 1998 〈北京圖書館藏《蘭亭圖》拓本淺說〉，《北京圖書館館刊》，第 1 期，頁 94-60。

- 2011 〈國家圖書館藏《蘭亭八柱帖》之考析〉，《圖書館理論與實踐》，第 2 期，頁 59-61。

袁長平

- 2012 〈山水清音——品讀乾隆時期香山靜宜園理水之美〉，《中國園林》，第 8 期，頁 103-106。

袁森坡

- 1980 〈清代口外行宮的由來與承德避暑山莊的發展過程〉，《清史論叢》，第二輯，北京：中華書局，頁 286-319。

馬汝珩、馬大正

- 1981 〈論杜爾伯特三車凌維護國家統一的鬥爭〉，《清史研究集》，第 1 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頁 200-215。

馬雅貞

- 2014 〈皇苑圖繪的新典範：康熙《御製避暑山莊詩》的製作及其意義〉，《故宮學術季刊》，第 32 卷第 2 期，頁 39-80。

高居翰（James Cahill）著，夏春梅等譯

- 1997 《江岸送別：明代初期與中期繪畫（1368-1580）》（Parting at the Shore：Chinese Painting of

the Early and Middle-Ming Dynaty)》，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 30-31。

高莉芬

2002 〈儀式與象徵：歲時節日與六朝詩歌研究〉（日本「東亞漢學國際會議」論文），收入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儀式與象徵：六朝詩歌中歲時節日分析及其民俗文化意涵研究〉（執行期間：2002 年 8 月 1 日至 2003 年 7 月 31 日）。

高鈺明、覃力

1992 《中國古亭》，臺北：南天書局。

高橋靜豪著，王君德譯

2009 〈有關蘭亭“曲水”之宴在日本的概況〉，《紹興文理學院學報》，第 1 期，頁 50-52。

張小李

2014 〈清宮上元節外藩宴與藩屬關係考論〉，《中國文化》，2014 年第 2 期，頁 80-95。

張玉芳

2012 〈黃易與東漢熹平石經〉，收入故宮博物院編，《黃易與金石學論集》，頁 109-116。

張光賓

1985 〈定武蘭亭真蹟〉，《故宮文物月刊》，第 25 期，頁 29-35。

張羽新

1991 《避暑山莊的造園藝術》，北京：文物出版社。

張俊嶺

2014 《朱筠、畢沅、阮元三家幕府與乾嘉碑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張勃

2013 《唐代節日研究》，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

張玲

2009 〈唐亭的文化透視——以唐代詩文為重點的考察〉，西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頁 13-14。

張恩蔭

1993 《圓明園變遷史探微》，北京：北京體育學院。

張淑嫻

2010 〈揚州匠意：寧壽宮花園內檐裝修〉，收入故宮博物院、柏林馬普學會科學史所編，《宮廷與地方：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技術交流》，北京：紫禁城出版社，頁 123-168。

張書敏

1998 〈避暑山莊的菽漢蓮〉，收入周金生主編，《承德文史文庫》，第二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張素卿

2007 《清代漢學與左傳學：從「古義」到「新疏」的脈絡》，臺北：里仁書局。

張渝新

2002 〈中國古建「亭」的發展演變淺析〉，《四川文物》，第 3 期，頁 10-20

張筠

2014 〈王原祁《西湖十景圖》研究——清宮正統派地景畫的產生及政治意涵〉，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東方藝術史組碩士論文。

張廣善

2002 〈淺議午亭山村〉，《文物世界》，第 2 期，頁 68-72。

張燁



- 2012 《洋風姑蘇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
- 張濟編撰
- 2001 《蘭亭》，杭州：西泠印社。
- 張瓊
- 2005 〈《欽定補刻端石蘭亭圖緯絲》全卷考略：兼析清高宗時期的緯絲書法〉，《中國歷史文物》，第 6 期，頁 36-43。
- 張寶章
- 2011 〈萼輝園和交輝園沿革初探〉，《圓明園》，第 11 期，頁 39-47。
- 曹書杰
- 1995 〈王隱家世及其《晉書》〉，《史學史研究》，第 2 期，頁 23-30。
- 曹寶麟
- 2000 〈《集王聖教》與《神龍蘭亭》之比勘〉，收入華人德、白謙慎主編，《蘭亭論集》，頁 376-392。
- 梁思成
- 1984 《營造法式註釋（卷上）》，臺北：明文書局。
- 梅爾清 (Tobie Meyer-Fong) 著，朱修春譯
- 2004 《清初揚州文化 (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梅韻秋
- 2016 〈天下名勝的私家化：清代嘉、道年間自傳體紀遊圖譜的興起〉，《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41 期，頁 303-370。
- 盛鴻郎
- 1993 〈蘭亭原址與蘭渚湖遺址考〉，收入鮑賢倫主編，《王羲之研究論文集：紀念《蘭亭集序》問世 1640 周年》，杭州：浙江美術學院社，頁 139-150。
- 章滄授
- 1996 〈千古詠柳第一篇——讀孔臧的《楊柳賦》〉，《古典文學知識》，第 6 期，頁 19-20。
- 莊吉發
- 2011 〈翠華南幸·揚州寫真——盛清君臣眼中的揚州〉，收入馮明珠主編，《盛清社會與揚州研究：恭賀陳捷先教授八秩華誕論文集》，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 177-225。
- 莊致嘉
- 〈與 BOURDIEU 相約巷仔口咖啡店：台灣人的階級品味如何？〉，「巷仔口社會學」網頁，網址：<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5/07/28/chuangchihchia/>，檢索日期：2017-11-28。
- 莫家良
- 2011 〈畢沅幕府書蹟管窺〉，《書法叢刊》，第 4 期，頁 66-85。
- 莫賽
- 2009 〈淺析皇城相府官宅建築的傳統文化內涵〉，《山西建築》，第 7 期，頁 43-44。
- 許國平
- 2011 〈蘭亭八柱帖〉，《紫禁城》，第 9 期，頁 72-74。
- 許曉東
- 2011 〈清青玉蘭亭修禊圖山子〉解說，收入故宮博物院編，《蘭亭圖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頁 368-369。
- 2011 〈清乾隆款碧玉蘭亭記（序）雙面插屏〉解說，收入故宮博物院編，《蘭亭圖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頁 370-371。



郭其程、普伍勝

2001 〈乾隆時期刻石《蘭亭圖》拓本的內容與價值〉，《圖書與情報》，第4期，頁80-81。

郭鳳翕

2000 《細說蘭亭八柱冊及八柱亭》，臺北：郭鳳翕。

郭黛姮、賀艷

2010 《圓明園的“記憶遺產”——樣式房圖檔》，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郭黛姮主編

2009 《遠逝的輝煌：圓明園建築園林研究與保護》，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陳一梅

2011 《宋人關於《蘭亭序》的收藏與研究》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

陳小凌

2006 〈暮春修禊韻事〉，《故宮文物月刊》，第277期，頁100-107。

陳金陵

2001 《清代乾嘉文人與文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陳弱水 (Jo-shui Chen) 著，郭英劍、徐承向譯

2010 《柳宗元與唐代思想變遷 (Liu Tsung-yü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 773-819)》，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陳振濂

2006 《維新：近代日本藝術觀念的變遷——近代中日藝術史實比較研究》，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陳捷先

2007 〈略論乾隆朝的文化政策〉，收入馮明珠主編，《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頁217-229。

2011 《康熙大帝：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皇帝》，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陳雅飛

2011 〈太倉藏家畢瀧初探（上、下）〉，《收藏家》，第2、3期，頁19-27、25-32。

2011 〈科場·幕府·經訓堂——畢沅與王文治的翰墨緣（上、下）〉，《典藏古美術》，第223、224期，頁186-193、244-253。

2011 〈畢沅、畢瀧家世生平考〉，《歷史檔案》，第3期，頁51-59。

2011 〈畢沅書畫收藏芻議（上、下）〉，《榮寶齋》，第5、7期，頁220-233、224-235。

2011 〈畢沅幕府書家群概論〉，《中國美術學院學報》，第2期，頁28-37。

陳葆真

2009 〈乾隆皇帝與《快雪時晴帖》〉，《故宮學術季刊》，第27卷第2期，頁127-192。

2015 〈康熙和乾隆二帝的南巡及其對江南名勝和園林的繪製與仿建〉，《故宮學術季刊》，第32卷第3期，頁1-62。

陳輝

2012 〈年年上巳尋歡處，便是當時晉永和——《蘭亭八柱帖》帖石與清廷的曲水流觴亭〉，《中國書法》，第1期，頁57。

陳橋驛

1985 〈蘭亭及其歷史文獻〉，《紹興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頁1-4。

陳韻如

2005 〈時間的形狀：〈清院畫十二月令圖〉研究〉，《故宮學術季刊》，第22卷第4期，頁103-139。

2014 〈蘭亭修禊圖式的發源與演變——以臺北故宮藏品為中心〉，收入故宮博物院編，《二零一一年蘭亭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故宮出版社，頁 214-226。

傅晶

2003 〈魏晉南北朝園林史研究〉，天津：天津大學建築學院博士論文，2003。

傅璇琮

1986 《唐代科舉與文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勞榦

1970 〈上巳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29 期，頁 245-247

喬治忠、李金華

2010 〈畢沅幕府修史在乾隆時期史學發展中的地位〉，《求是學刊》，第 3 卷第 1 期，頁 131-137。

喻革良編著

2013 《聖地絕品·神游蘭亭》，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

曾藍瑩

2012 〈遺跡探尋與記憶重塑：從黃易《嵩洛訪碑圖》冊談起〉、〈媒介與信息：武氏祠的再發現與清代的文化生產〉，收入故宮博物院編，《黃易與金石學論集》，北京：故宮出版社，頁 76-91、257-273。

森鹿三著，戴蘭村譯

1957 〈66、67 昇仙太子碑解說〉、〈68、69 昇仙太子碑碑陰解說〉，《書道全集 第 8 卷 唐 II》，頁 171-173。

程子衿主編

2016 《紫禁城悅讀·乾隆花園》，北京：故宮出版社。

程步濤編

2000 《乾隆欽定傳世藏帖》，北京：昆侖出版社。

程彥霞

2008 〈四言詩在兩漢的發展變化〉，《船山學刊》，第 4 期，頁 144。

華人德、白謙慎

2000 《蘭亭論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

遼欽立

1985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上、中、下）》，臺北：學海出版社。

馮建民

2011 〈清代鄉、會試考官的地域分佈狀況研究——基於《清秘述聞》的統計〉，《教育學術月刊》，第 11 期，頁 77-80。

馮爾康

2009 〈從滿文硃批解讀雍正帝的「為君難」——以《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為論述資料〉，收入馮明珠主編，《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頁 350-355。

黃汝婷

2017 〈清人王澐《蘭亭》研究論——以王澐相關題跋為中心〉，《中國書法》，第 314 期，頁 58-62。

黃進興

1987 〈清初政權意識形態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統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58 本 1 分，頁 105-131。

黃寬重

2016 〈交游酬唱：南宋與元代士人的蘭亭雅集〉，收入包偉民、劉後濱主編，《唐宋歷史評論（第二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212-235。

2017 〈以藝會友：南宋中期士人以〈蘭亭序〉為中心的品題與人際關係〉，《漢學研究》，第 35 卷第 3 期，頁 173-211。

黃簡

2002 〈重讀蘭亭序〉，《第五屆中國書法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39-46。

楊伯達

1993 〈《萬樹園賜宴圖》考析〉，收入氏著，《清代院畫》，北京：紫禁城出版社，頁 178-210。

1993 〈關於《馬術圖》題材的考訂〉，收入氏著，《清代院畫》，北京：紫禁城出版社，頁 211-225。

楊宗榮

1957 〈蘭亭八柱帖〉，《文物參考資料》，第 1 期，頁 28。

楊國鈞、杜江主編

1993 《避暑山莊七十二景》，北京：地質出版社。

楊雅婷

2008 〈盛世縮影——唐代曲江研究〉，臺中：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楊新主編

1994 《故宮博物院藏明清繪畫》，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8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明清肖像畫》，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頁 204。

葉泉宏

2002 〈乾隆千叟宴與清鮮宗藩關係（1785）〉，《韓國學報》，第 17 期，頁 283-297。

葉國良

2009 〈周敦頤愛的是什麼蓮〉，《成大中文學報》，第 27 期，頁 37-56。

賈晉華

2015 《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蔡新江

2011 〈《蘭亭序》在西域〉，《國學學刊》，2011 年第 1 期，頁 65-71。

廖宜方

2011 《唐代的歷史記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廖寶秀

2003 〈清高宗盤山千尺雪茶舍初探〉，《輔仁歷史學報》，第 14 期，頁 53-119。

端木泓

2009 〈圓明園新證——乾隆朝圓明園全圖的發現與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1 期，頁 27。

臺靜農

1992 〈袪除與王羲之蘭亭序〉，《臺大中文學報》，第 5 期，頁 1

趙麗紅

2011 〈以蘭亭為主題裝飾的內廷器物〉，故宮博物院編，《蘭亭圖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頁 340-343。

劉子瑞主編

2009 《顏真卿書法全集》，第 2 卷，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劉宇珍

- 2015 〈瑪瑙斫陣圖〉解說，何傳馨主編，《神筆丹青：郎世寧來華三百年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頁 160。

劉妍鑠

- 2014 〈蘭亭：景觀、意義與明清之際紹興士人〉，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劉芳如、葛婉章執行編輯

- 1990 《嬰戲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劉恒

- 2000 〈清代書家與《蘭亭序》〉，收入華人德、白謙慎主編，《蘭亭論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頁 473-485。

- 2011 《中國書法史（清代卷）》，南京：鳳凰教育出版社。

劉致平

- 1984 《中國建築類型及結構》，臺北：尚林出版社。

劉愛東

- 1992 〈《熱河千尺雪》圖卷與“千尺雪”〉，《文物春秋》，第 4 期，頁 94-96。

劉曉峰

- 2007 〈上巳節與日本的女兒節〉，《東亞的時間——歲時文化的比較研究》，北京：中華書局，頁 352-364。

劉曉路

- 1997 〈富岡鐵齋晚年的五方落款——印兼談其與羅振玉、吳昌碩的印緣〉，《美術觀察》，第 1 期，頁 67-69。

劉潞

- 2009 《融合——清廷文化的發展軌跡》，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劉濤

- 1991 〈王羲之與王獻之〉，收入劉濤主編，《中國書法全集·18·三國兩晉南北朝編》，北京：榮寶齋，頁 21-22。

- 2011 〈彭彊可齊——王羲之與《蘭亭序》〉，收入陳燮君主編，《蘭亭》，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61-110。

劉聲波

- 2012 《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唐代卷（上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頁 479-480。

潘勝強

- 2016 〈清代金石學研究領域的拓展及其原因探析〉，《陰山學刊》，第 29 卷第 3 期，頁 76-80。

稽果煌

- 1998 〈漕運千秋（下）〉，《交通與運輸》，第 3 期，頁 45-46。

蔣寅

- 2007 《大曆詩人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2012 〈“神韻”與“性靈”的消長——康、乾之際詩學觀念嬗變之跡〉，《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 期，頁 23-24、26。

蔣曉光、許結

- 2014 〈賓祭之禮與賦體文本的構建及演變〉，《中國社會科學》，第 5 期，頁 163-183。

鄭永華

- 2014 〈清代萬柳堂及北京園林文化〉，《明清論叢》，第 13 輯，頁 265-271。



鄭和福

2010 〈大都為水也風流——唐代曲江詩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鄭毓瑜

1994 〈由修禊事論蘭亭詩、蘭亭序「達」與「未達」的意義〉，《漢學研究》，第 12 卷第 1 期，頁 255-264。

盧宣妃

2006 〈閑話當年故宮事——臺北故宮之初〉，收入蔡枚芬主編，《八徵耄念：國立故宮博物院八十年的點滴懷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頁 77-84。

盧慧紋

2011 〈碑與帖的交會——錢泳《攀雲閣帖》在清代書史中的意義〉，《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31 期，頁 205-276。

2011 〈從神機到人文：盛唐到北宋的草書之變〉，《故宮學術季刊》，第 28 卷第 4 期，頁 1-58。

2014 〈唐至宋的六朝書史觀之變：以王羲之〈樂毅論〉在宋代的摹刻及變貌為例〉，《故宮學術季刊》，第 31 卷第 3 期，頁 1-56。

謝麗

2011 〈清乾隆紫檀木嵌玉御臨蘭亭八柱帖第八柱〉，故宮博物院編，《蘭亭圖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頁 374-381。

韓琦

2007 〈馬國賢與西方銅版印刷的傳入——從中西文獻看《御製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圖》的製作〉，《中國印刷》，第 11 期，頁 106-109。

魏泉

2003 〈“顧祠修禊”與“道咸以降之學新”——十九世紀宣南士風與經世致用學風的興起〉，《清史研究》，第 1 期，頁 69-79。

2008 《士林交游與風氣變遷：19 世紀宣南的文人群體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羅喜全、姚亦鋒

2007 〈六朝南京園林調查研究〉，《安徽農業科學》，第 35 卷第 35 期，頁 11470-11471+11505。

羅惠予

1999 〈淺談《批本隨園詩畫》〉，《中國韻文學刊》，第 2 期，頁 76-78。

羅檢秋

2005 〈嘉道年間京師士人的修禊雅集與經世意識的覺醒〉，收入鄭大華、鄒小站主編，《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國》，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頁 292-306。

蘇紹興

1987 〈從〔世說新語〕的統計分析看兩晉士族〉、〈瑯琊王氏之交遊與婚媾——兩晉南朝大士族一「個案」研究〉、〈東晉南朝王謝二族關係初探〉，收入氏著，《兩晉南朝的士族》，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頁 57-137、139-190、191-219。

日文

土谷彰男

2014 〈洛漕斗門考——白居易「三月三日祓禊洛濱」詩をめぐる〉，《中國詩文論叢》，第 33 集，頁 207-220。



中村喬

1988 《中國の年中行事》，東京：平凡社。

中根金作

1986 〈曲水考〉，《造園雜誌》，第 49 卷第 4 期，頁 246-254。

平岡武夫

1978 〈三月三日 上巳 洛濱修禊——白氏歲時記〉，《漢學研究》，第 16、17 號，頁 89-106。

安東俊六

1972 〈景龍宮廷文學の創作基盤〉，《中國文學論集》，3，頁 23-24。

伊藤伸

1973 〈昭和蘭亭記念會記〉，收入昭和蘭亭記念會編，《昭和蘭亭記念展圖錄》，東京：昭和蘭亭記念會、五島美術館，頁 254-257。

吉田恵二

1919 〈日本古代庭園遺跡と曲水宴〉，《國學院雜誌》，第 100 卷第 11 號，頁 110-119。

寺本慧達

1919 〈袷に就て(上)(中)(下)〉，《六條學報》，第 212 號，第 214 號，第 215 號，頁 496-507，頁 622-632，頁 689-708。

西川寧等編集

1973 《昭和蘭亭記念展圖錄》，東京：二玄社。

坂本太郎等校注

1967 《日本書紀(上)》，東京：岩波書店。

赤井益久

2004 《中唐詩壇の研究》，東京：創文社。

杉村邦彦

2013 〈論考 大正癸丑の蘭亭会とその歴史的意義〉，收入陶徳民主編，《大正癸丑蘭亭会への懐古と継承：関西大学図書館内藤文庫所蔵品を中心に》，京都：關西大學出版部。

佐藤利行

1987 〈王羲之の生活と思想—逸民の時期を中心に—〉，《国語国文論集(安田女子大学)》，第 15 卷，頁 1-14。

松井如流解説

1974 《書跡名品叢刊 唐 則天武后 昇仙太子碑》，東京：二玄社，頁 96-97。

東京国立博物館等編集

2013 《特別展 書聖王羲之》，東京：毎日新聞社等，頁 128-129。

板倉聖哲

2013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蘭亭曲水宴図像の展開〉，《美術史論叢》，第 29 卷，頁 1-25。

倉林正次

1966 〈禊祭考—上巳宴とその周辺—〉，《國學院大學日本文化研究紀要》，第 19 輯，頁 73-119。

神田喜一郎

2013 〈大正癸丑の蘭亭会〉，收入陶徳民主編，《大正癸丑蘭亭会への懐古と継承：関西大学図書館内藤文庫所蔵品を中心に》，京都：關西大學出版部。

荒木伸介

1988 〈史跡の整備と活用—毛越寺庭園遣水と曲水宴—〉，《日本歴史》，第 477 號，頁 96-105。



常盤大定

- 1941 〈崇福宮泛觴亭解說〉，收在常盤大定、關野貞，《支那文化史蹟・解說》，第5卷，京都：法藏館，頁14-15。

常盤大定、關野貞

- 1941 《支那文化史蹟》，第5輯，京都：法藏館。

陶德民主編

- 2013 《大正癸丑蘭亭會への懷古と繼承：関西大学図書館内藤文庫所藏品を中心に》，京都：關西大學出版部。

須羽源一

- 2013 〈大正癸丑の京都蘭亭會について〉（本文原載於1913年4月20日《大阪朝日新聞》），收入陶德民主編《大正癸丑蘭亭會への懷古と繼承：関西大学図書館内藤文庫所藏品を中心に》。

森野繁夫

- 1997 《王羲之傳論》，東京：白帝社，頁76、223-228、234-235。

新村容子

- 2011 〈1820~30年代北京の士大夫交流（4）：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四日「江亭展襖」を中心として〉，《岡山大學文學部紀要》，第55號，頁45-65。

趙景達

- 1995 〈朝鮮における実学から開化への思想的転回—朴珪寿を中心に〉，《歴史学研究》，第678期，頁12-22。
2014 〈《アヘン戦争の起源—黃爵滋と彼のネットワーク》〉，東京：汲古書院。

關野貞

- 1939 〈西遊雜信 上〉，收入關野博士紀念事業會編，《支那の建築と藝術》，東京：岩波書店，頁675-678。

藪田貫、陶德民編著

- 2015 《泊園書院と大正蘭亭會百周年》，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

韓文

장진아、전혜은編

- 2016 《미술 속 도시, 도시 속 미술》，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頁150-154。

柳玉暉（유옥경）

- 1997 〈蕙山 劉淑의 〈修禊圖卷〉 研究〉，《미술자료》，59，頁50-81。

申相燮

- 1996 〈우리나라의 流觴曲水宴 遺構（曲水渠）에 관한 基礎研究〉，《韓國庭苑協會誌》，第15卷第1期，頁133-141。

蔣根植

- 1990 〈慶州 鮑石亭 流觴曲水에 관한 流體科學的考察〉，《美術資料》，46，頁101-110。

英文



- Berliner, Nancy
2010 "The Qianlong Garden in the Place of Tranquility and Longevity," in Nancy Berliner et al., *The emperor's private paradise: treasures from the Forbidden City*.
- Berliner, Nancy et al.
2010 *The emperor's private paradise: treasures from the Forbidden City*, Salem, Mass.: Peabody Essex Museum.
- Bourdieu, Pierre
1993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Clunas, Craig
1991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Finlay, John R.
2011 "'40 Views of the Yuanming yuan': Image and Ideology in a Qianlong Imperial Album of Poetry and Paintings."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 Forêt, Philippe
2000 *Mapping Chengde: The Qing Landscape Enterpri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Gray, Basil
1960 "Lord Burlington and Father Pipa's Chinese Engravings," *The British Museum Quarterly*, 22, pp. 40-43.
- He, Yanchiuan (何炎泉)
"The Winding Stream Banquet, Kyokusuien, in the Heian Period Garden," pp. 1-15 (unpublished).
- Hearn, Maxwell K.
1999 "An Early Ming Example of Multiples: Two Versions of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Apricot Garden," in Judith G. Smith and Wen C. Fong, eds., *Issues of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Painting*,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pp. 221-256.
- Ho, Wai-kam et al.
1980 *Eight Dynasties of Chinese Painting: The Collections of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Kansas City, and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Cleveland, OH.: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pp. 372-376.
- Hsü, Ginger Chengchi
2001 *A Bushel of Pearls: Painting for Sale in Eighteenth-Century Yangchow*,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wi-joon, Ahn (安輝濬),
"Literary Gatherings and their Paintings in Korea," in *Seoul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vol. 8, p.85-106.
- Kameda-Madar, Kazuko (亀田和子)
2011 "Pictures of Social Networks: Transforming Visu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Orchid Pavilion Gathering in the Tokugawa Period (1615-1868)." PhD diss.,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 Laing, Ellen Johnston
1968 "Real or Ideal: The Problem of the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Western Garden" in Chinese Historical and Art Historical Records,"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8:3, pp. 419-435.

Ledderose, Lothar

1978-79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Imperial Art Collection in China," in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43, pp. 33-46.

1986 "Chinese Calligraphy: Its Aesthetic Dimension and Social Function," *Oriental Art*, 17:10, pp. 38-40.

Lee, Hui-shu

2010 *Empresses, Art and Agency in Song Dynasty China*,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Mei, Yun-ch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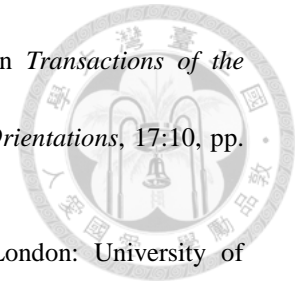
2008 "The Pictorial Mapping and Imperialization of Epigraphic Landscap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Ph. 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Vinograd, Richard

1992 *Boundaries of the Self: Chinese Portraits, 160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hiteman, Stephen Hart

2011 "Creating the Kangxi Landscape: Bishu shanzhuang and the Mediation of Qing Imperial Identity," Ph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附 表



III-表一 《紫檀雕山水八屨蘭亭八柱插屏》與「蘭亭八柱」內容與順序對照

《紫檀雕山水八屨蘭亭八柱插屏》抽屨順序	內容	蘭亭八柱順序	乾隆題跋年代
乾	乾隆，《臨董其昌倣柳公權書蘭亭詩》 引首：乾隆題「進參堅異」	第八柱	·乾隆 43 年(戊戌, 1778) 六月中澣
坎	董其昌，《臨柳公權書蘭亭詩》	第七柱	·乾隆 35 年(庚寅, 1770) 新正月中澣 ·乾隆 36 年(辛卯, 1771) 暮春之初 ·乾隆 43 年(戊戌, 1778) 仲夏下澣
艮	于敏中，《補戲鴻堂刻柳公權書蘭亭詩缺筆》 引首：乾隆題「俾還舊觀」	第六柱	·乾隆 43 年(戊戌, 1778) 季夏上澣 *此詩被刻入《清紫檀木雕蘭亭修禊圖八柱帖插屏》背面
震	常福，《內府鈎填戲鴻堂刻柳公權書蘭亭詩原本》 引首：乾隆題「真面可追」	第五柱	·乾隆 43 年(戊戌, 1778) 季夏上澣 *此詩被刻入《清紫檀木雕蘭亭修禊圖八柱帖插屏》背面
巽	柳公權，《書蘭亭詩》 引首：乾隆題「筆諫遺型」	第四柱	·乾隆 44 年(己亥, 1779) 暮春月上澣 *此詩被刻入《清紫檀木雕蘭亭修禊圖八柱帖插屏》背面
離	馮承素，《摹蘭亭序》 引首：乾隆題「晉唐心印」	第三柱	·乾隆 37 年(己亥, 1772) 暮春月中澣

坤	褚遂良，《摹蘭亭序》	第二柱	· 無紀年二跋
兌	虞世南，《摹蘭亭序》	第一柱	· 乾隆 12 年(戊戌, 1747) 上巳 · 乾隆 44 年(己亥, 1779) 暮春之初〈題蘭亭八柱冊 (并序)〉 · 無紀年

V-表一 李亨特續蘭亭會參與者名單



說明：

本表所列人名，依姚興潔〈記〉所列順序列表。

序	人名	身分	出處
1	袁枚 (1716-1797)	字子才，號簡齋、隨園老人，浙江錢塘人。乾隆四年 (1739) 進士。官至陝西知縣。後卜居江寧小倉山，築隨園。詩主性靈，一反王士禛主神韻，影響甚鉅。撰《小倉山房詩文集》、《隨園詩話》等。	· 蔡冠洛編纂，《清代七百名名傳(三)》，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 196 冊，頁 369-370。 · 王英志，〈前言〉，收入王英志點校主編，《袁枚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第 1 冊，頁 1-2。
2	張培 (生卒年不詳)	字香巖，江蘇上元人 (今南京)。撰《香巖詩存》。	· 徐世昌，《晚晴移詩匯》，卷一二四 (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民國退耕堂刻本影印)。
3	李松巢 (生卒年不詳)	尚未查得相關資料。	
4	徐上亭 (生卒年不詳)	尚未查得相關資料。	
5	王燕山 (生卒年不詳)	查字、號為燕山者，僅得王冊一人。王冊，號燕山、小摩詰，北京人。工詩書。但無法確定王燕山即此王冊。	· 李放纂輯，《皇清書史(一)》，卷十六，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 83 冊，頁 564。
6	史少岡 (生卒年不詳)	尚未查得相關資料。	
7	平恕 (?-1804)	字寬夫，浙江山陰人。乾隆三十七年 (1772) 進士。乾隆朝，曾任四庫館纂修行走、會試同考官、廣東學政、翰林院侍讀學士、鄉試正考官、詹事府少詹事等職。嘉慶朝，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江蘇學政等職，官至戶部左侍郎。撰《留春書屋詩集》。	· 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徵初編(二十)》，卷一一〇，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 146 冊，頁 799-801。 · 東方學會編，《國史列傳(三)》，卷七十三，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 37 冊，頁 656-657。 · 朱汝珍輯，《詞林輯略》，卷四，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 16 冊，頁 208。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名權威檔人物傳記資料庫網頁，檢索日期：2019-1-15。

8	陳栻（生卒年不詳）	字涇南，號斗泉，江蘇吳縣人。以文學、翰墨知名。書畫均學董其昌（1555-1636），有名於當時，詩畫亦受袁枚賞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震鈞輯，《國朝書人輯略》，卷六，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 85 冊，頁 428-429。 · 馮金伯撰，《墨香居畫室》，卷三，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 72 冊，頁 101-102。 · 蔣寶齡撰，蔣苕生續，《墨林今話》，卷八，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 73 冊，頁 139。
9	何養亭（生卒年不詳）	尚未查得相關資料。	
10	郭恕堂（生卒年不詳）	尚未查得相關資料。	
11	闕嵐（約 1756-1844）	字文山，號晴峰，安徽桐城人。工山水、花鳥、人物。《墨香居畫室》載：「其繪事之妙，見賞於奇大方伯，故久在吳門署中。」奇大方伯為蘇州巡撫奇豐額（滿州正白旗人），奇豐額於乾隆五十六年至六十年之間，三次擔任蘇州巡撫，闕嵐為其幕友。 ¹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馮金伯撰，《墨香居畫室》，卷三，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 72 冊，頁 310。 · 蔣寶齡撰，蔣苕生續，《墨林今話》，卷八，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 73 冊，頁 236-237。 · 李玉棻，《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卷三，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 74 冊，頁 470-471。 · 沈道寬，《闕雯山墓誌銘》，繆荃孫纂錄，《續碑傳集（五）》，卷八十四，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 119 冊，頁 740-742。 · 寶鎮輯，《國朝書畫家筆錄》，卷三，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 82 冊，頁 332。 · 彭蘊臻，《歷代畫史彙傳》，卷五九，頁 12 上。 · 王闈運，《（光緒）湘潭縣志》（清光緒十五年刻本），卷八，無頁碼。
12	丁健（生卒年不詳）	字嘯谷	尚未查得相關資料。
13	徐鐵谷（生卒年不詳）	尚未查得相關資料。	
14	朱九榆（生卒年不詳）	尚未查得相關資料。	
15	侯繼蘇（生卒年不詳）	尚未查得相關資料。	
16	徐嵩（又名徐鏘慶，乾隆五十一年〔1786〕舉人）	為官更名為鏘慶，號閔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吳會英才集》，卷 21 · 見 V-表四。

¹ 馮桂芬，《（同治）蘇州府志》，卷二十二（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光緒九年刊本影印）。

17	姚興潔 (1756-1819)	字或號秋槎。見 V-表四。	· 朱則杰、盧高媛，〈《履園叢話》“蘭亭”條與李亨特“續蘭亭修禊”考論〉，《浙江學刊》，2015 年第 5 期，頁 109-110。
18	錢泳 (1759-1844)	字立群，號梅溪、臺僊，江蘇無錫（金匱）人。官候選府經歷。工書，擅鉤摹。曾為畢沅幕客，為畢沅刻《經訓堂帖》，又自臨漢碑刻《攀雲閣帖》，所製鉤刻碑帖繁多，影響深遠。	· 李放纂輯，《皇清書史（一）》，卷十一，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 83 冊，頁 357-362。
19	張棻園（生卒年不詳）	疑為桐城文人張曾徽。廩貢生。著有《棻園詩鈔》。	· 廖大聞，〈《道光》續修桐城縣志〉，卷七、二十一，愛如生中國方志庫（據清道光七年修十四年刻本）。
20	李亨特（?-1815）	見 V-表四。	· 李亨特總裁，平恕等修，《紹興府志》，卷二六（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據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本影印），第 3 冊，頁 604。 · 東方學會編，《國史列傳（二）》，卷四十四，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台北：明文書局，1985），第 36 冊，頁 595-602。 · 趙爾巽，《清史稿》，列傳一百十二「李宏」條（民國十七年〔1928〕清史館本），頁 10859。
21	李善祺（生卒年不詳）	尚未查得相關資料。	



V-表二 《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前後序、記之釋文



說明：

李亨特〈前序〉、徐嵩〈後序〉、姚興潔〈記〉，均收入李亨特總裁之《紹興府志》(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本)中。¹但《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卷上拖尾缺徐嵩之文，《紹興府志》所謂李亨特〈前序〉者，即為畫卷上〈自敘〉。以下所錄李亨特、姚興潔二文以圖卷所書寫者為主，《紹興府志》中文句有異之處，標示於注釋中。徐嵩〈後序〉則錄自《紹興府志》。

李亨特，〈前序〉：

禊，古禮也。禊者，絜也。韓詩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二水之間，執蘭祓除招魂。²巳者，止也。祈介，祉也。周公有羽觴之詩，秦昭有河曲之會，³元嘉有樂游之詔，永明有芳林之燕，保定有馬射之儀，延年元長、子山之徒，爭發為文，而修禊之事，唯蘭亭尤著。蘭亭者，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與太原孫綽、陳留謝安及其子獻之輩，四十二人修禊地也。右軍人品既高，自書所為《蘭亭集敘》，筆墨絕倫，自唐以來，臨摹寢廣，至今士大夫所稱《蘭亭禊帖》者也。大歷(766-779)中，吳均等三十七人經蘭亭故地聯句，不甚傳。明陳鶴與荆川尋蘭亭舊約，與會者亦未顯。嘉靖(1522-1566)間，郡守沈啓修蘭亭，文徵明記之，而禊事未舉。國朝聖祖仁皇帝臨幸，御書大字「蘭亭」，貞珉載勒，星雲爛如。皇上南巡，過蘭亭製詩，近又諭刻「八柱蘭亭」，蓋於斯為盛矣。壬子(1792)春，予承乏紹興，既與都人士習，時方輯志，乘諸君子惠然肯顧，袁簡齋太史年近八十，不遠千里而來，蓋予雖未敢心希右軍，而賓客之歡，文字之樂，方之古人，未遑多讓。獨右軍當日，時事多故，臨文感慨，情見乎辭。今天下太平，年穀時熟，予承恩命，來守茲土，方春和時，周視郊原，田疇繡錯，饁餉相繼，木之欣欣，泉之涓涓，所以賞心暢懷，有遠過於永和者。是又遭際之盛，竊與同會諸君子有厚幸焉，因倩工畫者繪為圖，且自為敘。乾隆五十七年壬子歲七月，鐵嶺李亨特撰。

徐嵩，〈後序〉：

夫暇譽既洽，簪紱與林泉並尊，昇平可絃，擊轅與韶濩不別，是以小雅好仁。高山動其嚮道，學記務本先河，導其原委，匪必盟結。松石錮癖煙霞，挫廉木石之區，高揖雲鶴之表。山陰縣西，天柱峰側，句踐故壤，蘭渚舊田，過江之人如雲，南渡之馬若電。洎乎聖代鸞路，時□頻增，奎章屢眷，宸矚，金璽灑壁，文成蛟

¹ 李亨特總裁，平恕等修，《紹興府志》卷七二(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據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本影印)，第7冊，頁1774-1775。(以下簡標成：《紹興府志》，第7冊。)

² 《紹興府志》，第7冊，頁1774，為「執蘭招魂」。

³ 《紹興府志》，第7冊，頁1774，為「秦有河曲之會」。

龍，豐碑插天，字逼星漢，巖壑含澤，耆童歡游。太守李公，乃以壬子三月，會賓從，行禊飲禮也。釁絮之俗，取義於水。元巳之祉，於辰為蛇，園花始濃，陂草猶淺，叢篠抽翠，絲羽嚶鳴，布席列坐，即羽觴之緣。流飛澗透林類，金神之奉劍，爰訪古事諷前規。元嘉丙申之日（434年），⁴鐘石畢陳，永和癸丑之歲（353年），彭殤繫感。其時群黨不靖，蒼生在憂，誦美實誇清譚，奚補豈若遭際。□唐合氣光嶽，百獸率舞，上應玉衡之星，八風從律，齊吹嶰谷之管，優游仁壽之寓。同躋春臺之樂者也，則有倉山老人，吳會多士，詠饋言志，風舞蕩情。太守乃開照春之堂，掃蓬萊之閣，流虹跨海，輕霞襲衣，獻醕既成，圖畫斯作，文藻富麗，敢媿元長之綴辭，歌咏有由，無慚孫綽之後序云爾。

姚興潔，〈記〉：

乾隆壬子歲三月，紹興太守李公作續蘭亭禊飲會，繪圖一卷。與會者，二十有一人焉。一人扶杖而來，白鬚飄蕭，老而雄傑氣者，⁵為袁簡齋太史，隨行者為太史弟子張香巖。又二人，一人遙指左顧者，⁶為李松巢，與松巢對立，手拈髭而褒如者，徐上亭。又一人，倚石上執杯者，王燕山。長松插雲，下坐二人，一人抱膝坐，豐容廣頰為史少岡，一人跂脚坐，為平寬夫宮詹。稍東，頽身瘦骨，俯而觀泉者，陳斗泉。流泉之左，松根之下，臥而引盃者，何養亭。又一人，坐翠竹深處，⁷握管而沉吟者，郭恕堂。一人左手按地坐，小童捧酒卮立於旁，為闕文山。又一人兩手自擁，盤屈而坐者，丁嘯谷。又二人坐，一人立，坐而執書者，為徐鐵谷，⁸一手指書若辨難者，為朱九榆，立而俯視者，侯繼蘇。又二人對立，一人指右者，為徐閔齋，其叉手若微笑者，為秋槎。⁹又二人，一人坐亭隅彈琴，為錢梅溪，一人坐而聽者，為張菜園。其端坐亭中，右顧若領琴韻者，¹⁰主人李曉園太守。¹¹膝下圓頤廣額，眉目秀異，緋衣總角，蘭玉光潔，可五六歲者，¹²為公子善祺也。袁太史，名枚，錢塘人，時年七十有七歲，¹³與其徒由金陵再渡江而東，將之天臺過會稽，故與予會。餘皆太守賓客，方輯越志，多士雲集。作畫者即丁君，闕君斗泉為補山水云。圖成於是歲六月。秋槎姚興潔識。

⁴ 此指南朝元嘉十一年，宋文帝舉行的禊飲會。見蕭統編，李善注，《文選（附考異）》（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9），下冊，頁1150-1151。

⁵ 《紹興府志》，第7冊，頁1775，為「老而有雄傑氣者」。

⁶ 《紹興府志》，第7冊，頁1775，為「一人遙指太史左顧者」。

⁷ 《紹興府志》，第7冊，頁1775，為「翠竹深處」。

⁸ 《紹興府志》，第7冊，頁1775，為「徐鐵谷」。

⁹ 《紹興府志》，第7冊，頁1775，為「一人叉手若微笑者，為姚秋槎」。

¹⁰ 《紹興府志》，第7冊，頁1775，為「左顧若領琴韻者」。

¹¹ 《紹興府志》，第7冊，頁1775，為「主人李曉園」。

¹² 《紹興府志》，第7冊，頁1775，為「緋衣總角可五六歲者」。

¹³ 《紹興府志》，第7冊，頁1775，為「時年七十有七」。

V-表三 《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題跋釋文

位置	序	題跋者	題跋年代	題跋釋文
引首		梁同書 (1723-1815)	乾隆五十七年(1792)	會稽太守蘭亭修禊圖。 王子九秋為曉園老公祖屬題。錢唐治弟梁同書。
簽條		梁氏	某癸丑年 (可能為乾隆五十八年〔1793〕)	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梁溪錢(以下殘)
簽條		鄧春澍 (1884-1954)	民國二十一年(1932)	
拖尾	1	李亨特 (?-1815)	乾隆五十七年(1792)	
	2	姚興潔 (1756-1819)	乾隆五十七年(1792)	
	3	袁枚(1716-1797)	推測題寫於乾隆五十七年(1792) ¹	為愛山陰道，袁絲作越遊，良辰逢上巳，太守集名流，追溯蘭亭勝，重將禊事修，呼僮多載酒，戒役勿鳴騶，賓從皆蕭散，登臨各自由，雲生麾扇指，花落把衣兜，山頂知誰立，松根有客謳，鳥知人意樂，竹學柳枝柔，綈裘風前捧，茶杯樹底收，三春好烟景，七日小勾留。(枚在山陰小住七日。) 觴咏連宵集，峰巒各處搜，高吟孫綽賦，借坐李膺舟。(遊天台蒙公以坐船相送。) 一路蒼頭送，千山翠藹稠，藍橋尋玉洞，班竹上青樓，回首都如夢，前歡不可求，忽傳芳訊到，摹出畫圖幽，寫景王摩詰，描形顧虎頭，風人皆鮑謝，才子半應劉，個個呼將活，校校筆似抽，都兒扶杖履，稚子弄箕裘，繞膝看僧達，前身認鄴侯。(謂公子善祺。) 蘭香歌采采，琴響聽悠悠，韻事傳將遍，人間說未休，遙知讀畫者，想殺一千秋。 五排二十四韻，題應曉園太守教。隨園老人袁枚。

¹ 此推測依據袁枚回覆李亨特邀跋之信件時間而來。袁枚回覆日期為陰曆十月十五日，雖未書寫年代，但就其跋位置緊接李亨特、姚興潔後，袁枚跋應題寫於李、姚同年。見王英志，〈袁枚集外尺牘考釋〉，《中州學刊》，2013年第10期，頁155。

4	慶桂(1737-1816)	推測題寫於乾隆五十七年(1792) ²	從未山陰道上過，披圖空自費吟哦，琴樽如見重修禊，觴詠休誇晉永和。 太守而今情最暢，右軍當日感偏多，惟予不得躬逢盛，遙企南雲喚奈何。題應曉園老世臺屬。聽泉慶桂。
5	徐嵩(又名徐鏐慶,乾隆51年〔1786〕舉人)	乾隆五十七年(1792)	東風吹綠蘭渚田，種蘭人去三千年。蘭亭遺事久寂寞，空餘稊帖爭流傳。右軍風流古無比，自製雄文書繭楮。臨河一敘萬手摹，名士如雲過江水。曉園太守今羲之，賓從遨遊盛一時。蓬萊高閣醉潑墨，幸免罰酒先成詩。倉山老人七十七，氣吐虹霓揮健筆。明歲還逢癸丑年，展圖應憶重三日。乾隆五十七年壬子歲，曉園三兄大人續舉蘭亭修禊，圖成敬題，即請鑒正。閻齋徐嵩。
6	平恕(?-1804)	推測題寫於乾隆五十七年(1792) ³	文章太守謫仙人，內史高風意最親，天付溪山追勝賞，地宜觴詠答芳辰，攜來賓從行春暇，翦取湖波寫影真，感慨何須論今昔，當時陳迹又重新。 百尺鵝谿拓境寬，惠風千里入憑欄，爭看繭紙揮柔翰，依舊危亭帶激湍，古會稽原山水窟，小蓬萊擅離騷壇，獨慚列坐群賢次，江左風流讓謝安。曉園老公祖大人命題，即請誨正。治弟平恕拜稿。
7	顧光旭(1731-1797)	乾隆五十七年(1793.1)	永和人去不可追，展卷卻覩袁子才，子才今年七十七，欲上四萬八千丈，之天台道經會稽謁太守，太守留與群賢偕，三月三日修禊事，惠風和暢來入懷，行住坐臥任蕭散，琴書筆硯相安排，二十二人各意態，太守覓句琴聲諧，琴聲響入竹林去，曲水自送流觴迴，古來絕勝稱此會，恨我不得相追陪。侯繼蘇、徐閻齋彼二子者焉取裁？(徐、侯皆從余遊者)。何幸亦集於此哉，我昨孤山探早梅，量移太守杭州來，兒童竹馬喧長街，太守入坐坡仙之古署，我得把臂初歷階，欲訂癸丑暮春約，散仙妄擬登蓬萊，何由更踐圖中苔，農桑學校龔黃培，治行第一明堂開，佇(竚)看飛下鳳皇詔，乘風為鼓山陰棹。 題續蘭亭修禊圖，為曉園太守之屬，即以就正。

² 此推測乃依據題跋位置及前後題跋者落款年代判斷。

³ 推測理由同注 2。

				梁溪弟顧光旭拜稿。時王子冬月廿七日書於吳江舟次。
8	阿林保 (1746-1809)	乾隆五十九年(1794)		清遊暢幽抱，觴詠娛同群，山水坐懷古，風日時當春，契言得所會，一一咸能文，湍流與茂竹，昔賢跡豈陳，大地暫形寄，欣然樂足云，相期託趣永，盛事在斯人。曉園太守世長三兄屬世弟阿林保集稷帖字。時甲寅暮春之初。
9	周蘇(生卒年不詳)			仰撥芳蘭俯素波(蘭亭集徐豐之四言詩句)，茫茫古意自摩挲，畫圖不見開生面，為是追尋晉永和。 枉渚輕瀾迹未荒，興公序裡溯羲唐，越游去歲匆匆甚，未抵披圖見詠觴。曉園公祖大人屬題，嘉禾治弟周蘇。
10	錢伯垞 (1738-1812)	乾隆五十七年(1792-3)		昔年內史風流地，今見先生賓從來，遂使雲山增氣象，即看魚鳥絕嫌猜，中天正洽薰弦化，華國端須大雅才，從此新圖照千古，永和風日漫低徊。 股肱郡守重循良，恰向閒中愛景光，山水有情留勝概，雲天此日煥文章，行春別釀蒼生雨，好土同登選佛場，偏是謝公墩上客。(袁簡齋先生。)飄然鬚髮邇壺觴。王子仲冬曉園先生命題，晉陵錢伯垞。
11	韓鼎晉 (1760-1831)	嘉慶十七年(1812)		流觴又集永和賢，御李任城望儼然。修稷事驚千載後，披圖人感廿年前。醉翁好客開新宴，逸少攜兒對舞筵。卻恨浣花溪上士(按：客點去)，此身未結畫中緣。嘉慶壬申孟春，曉園大人命題，即請誨正。長壽韓鼎晉拜稿。
12	祝雲棟(乾隆36年[1771]進士)	乾隆五十九年(1794)		有蘭亭長(曉園刻印曰蘭亭長)，與古人期，雖述亦作，為盛於斯，寄情觴詠，俯仰所之，春風在坐，大哉隨時。其一。 氣和日朗，山靜水幽，品類自定，萬事咸修，會此契合，興言暢遊，引其懷趣，天地同流。其二。 既遇盛世，況集群賢，大文序列，騁固齋遷，今者初晤，覽迹欣然，若得左右，樂以永年。其三。 甲寅仲冬，曉園三兄道過任城，出所制續蘭亭修稷圖。見其遭逢景運，文章政事具有淵源，所至時雍民和，延攬髦俊，暇日抗懷，昔賢即景，寫懷宛然。風浴詠歸，天地同流氣象。讀其所自敘，

				今之視昔，為何如耶？爰集帖字為四言三章，即請郢政。柳村愚弟祝雲棟。
13	李廷敬（?-1806）			<p>宇內此亭古，群遊仰昔賢，今當修稷日，俯視永和年，峻極林間領，清虛水外天，時和斯可樂，觴詠一欣然。</p> <p>合作蘭亭長（有此圖章），遊當極盛時，靜聽流水曲，會與大賢期，騁目情無盡，臨人惠可知，山林間俯仰，古趣寄天隨，一老遊山至（簡齋先生），諸賢託興臨，觴流期永日，風詠坐清陰，地不崇蘭若，人咸類竹林，將觀修稷者，作敘又於今。集稷帖字三首以應曉園三兄大人雅屬，即請教削。味莊弟廷敬。</p>
14	黃易（1744-1802）	乾隆五十九年（1794-5）		<p>勝地欣逢風雅主，溪上飛花，又見群賢聚。冰雪詩成重作敘，山川人物皆千古。卷裡看來多舊雨，恨我無因，一棹山陰去。今喜坡公湖上住，吳謳越唱添新句。調鳳棲梧，乾隆甲寅臘月寄請曉園公祖大人按正。治舊吏黃易呈本。</p>
15	錢開仕（乾隆 54 年〔1789〕進士）	嘉慶三年（1798）		<p>壺觴列坐興陶然，賓從多才太守賢。想見行春追勝景，風流何減永和年。古亭稷事我曾修，風雨連江一葉舟。今日披圖牽舊夢，廿年踪跡記前遊。己亥（1779 年）暮春歸自餘姚獨游蘭亭，遇大風雨。戊午三月曉園老伯大人命題，愚姪錢開仕拜稿。</p>
16	顧禮琥（生卒年不詳）			<p>曲水重逢上巳辰，會稽太守正行春。若從漢晉論疆域，應使吳儂作子民。</p> <p>賓客一時同御李，文章自昔早推袁。名公風雅承平盛，從此蘭亭屬曉園。</p> <p>桃花浪靖記追陪，子舍蘭亭好句裁。王子春，（尚書在豫作上巳詩，有「子舍蘭亭修稷事」之句。正刺史與群賢高會時也。）料得羽觴攜舊典，定教東晰補南陔。</p> <p>更喜羲之得獻之，髫年也愛握蘭枝。憑將一稷留清白，讓水廉泉事事宜。</p> <p>白雪新詞共唱酬，風生坐嘯擬曹劉。就中半面曾相識，徐孺陳蕃並勝流。（調徐閩齋、陳斗泉二子。）</p> <p>恰攜行卷過燕齊，宦蹟分明悟雪泥。好景山陰忘不得，臥游恍到子猷磯。</p>
17				

				<p>里言六載句，恭請曉園刺史大人鈞教。吳門顧禮琥拜稿。</p> <p>惠流合境自欣然，古迹同游為引年。水曲有亭娛老少，春山無地不絲絃。清風在昔觀群詠，峻品當今快九遷。知己感懷因世契，相隨可得晤諸賢。</p> <p>適見轉運阿公集稷帖五古，謹仿為之得七律一章，並呈晒政。禮琥又稿。</p>
18	吳錫麒 (1746-1818)	推測題於嘉慶年初 ⁴		<p>茂林修竹來惠風，古人高會今人同。今人妙得古人趣，不待流水彈枯桐。右軍千載呼欲起，天門龍跳精神通。崇山圍繞一亭古，暖護蘭草雲濛濛。竟煩太守作亭長，文采照耀江山雄。群賢多是過江至，三日不醒酡顏紅。君不見李伯時，君不見趙千里，蘭亭觴詠各有圖，一一追摹得其似何如。眼中之人圖更工，傳神只在阿堵中。即今又歷幾上巳，對之何異山陰逢。惜我未得草屨從，題詩願乞醉五斗，飛夢遠尋蘭渚東。曉園廉使公祖大人教正，舊治弟吳錫麒打稿。</p>
19	錢維喬 (1739-1806)	嘉慶八年 (1803)		<p>昔年謁公武林城，莎廳琴鶴清風生。今年見公蘭亭曲，舊蹟新題粲珠玉。公之眉宇如紫芝，披圖颯爽猶識之。揭來三吳秉節鉞，秋霜冬日民就治。古人才大無不有，豈以勛名束身手。安石園池勝集多，少文山水頤懷久。頗聞澤國藏菑蒲，春霖一振禽厥渠。(述公近政。)能芟稂莠護苗黍，寧不輿頌歌來蘇。猶於燕寢耽風雅，修竹茂林長在把。卷中我略識數人，大抵材皆出公下。我於名地乃少緣，未及泛觴曲水邊。童而趨庭長游宦，剡溪如夢徒茫然。千四百年韻事傳，後賢何必非前賢。但今蒼生被霖雨，即是青鬢為神仙。展公此畫幽情起，六月涼颺拂窗几。且從高枕臥羲皇，袞繡他時觀之子。</p> <p>曉園廉使大人以曩繪《續蘭亭修稷圖》屬題，率賦長句一首，即請誨正。時嘉慶癸亥仲夏，部民錢維喬。</p>
20	趙翼(1727-1814)	嘉慶八年 (1803) ⁵		<p>洛陽履道里，本是楊憑宅。一落白傅手，遂獨擅勝蹟。午橋中令墅，後歸張師亮。至今綠野堂，</p>

⁴ 根據跋文「即今又歷幾上巳」句推測。

				人只說裴相。惟有謝公墩，介甫偶戲爭。千秋兩安石，竟共佔令名。由來人與地，輕重兩相繫。或積後來薪，或附先馳驥。會稽有蘭亭，久屬王右軍。誰敢冒不韙，欲來作替人。曉園風雅宗，忽作茲郡守。似天將此亭，鄭重付其手。果然清興廢，上巳集賓友。一時盛事傳，不數晉癸丑。即今已遷官，曳履凌星辰。行看益展布，迴豎鐘鼎動。名流行樂地，草木皆垂芬。此亭舊遊迹，便繼稷帖文。縱未遽突過，亦當與平分。題奉曉園廉使大人即正。陽湖治弟趙翼。
	21	桂馥(1736-1805)	嘉慶二年(1797)	蘭亭修禊已千年，又到清和三月天。浚會若無閒(按：賢點去)太守，誰將圖畫續前賢。祇應解帶換青山，難得竹林半日閒。多事會稽王內史，猶留繭紙在人間。披圖認得兩三人，萬里相看倍有神。且喜隨園猶未老，杖頭長掛十分春。曉園廉使大人命題。嘉慶丁巳六月，桂馥書於滇南。
	22	史致光(1752-1828)	嘉慶二年(1797)	永和亭子幾經年，觴詠幽情此地偏。感慨底須因寄託，鶯花依舊暮春天。叨陪光霽點蒼隅，香篆微熏展稷圖。繪得溪山無限好，卻教夢到賀家湖。丁巳冬仲，奉曉園廉使大人命題，山陰史致光。
	23		嘉慶三年(1798)	楚雄道中率題前二絕句，戊春花朝又得五律一首，并書於後。巖壑留遺蹟，披圖羨勝游。一春宜上巳，千載此清流。愛竹緣蒼逕，簪花到白頭。(謂簡齋前輩。)從知舊五馬，猶憶谷鳴騶。致光又題。
	24	沈榮錦(生卒年不詳)		千巖萬壑望中收，自古能詩此地遊。觴詠不妨徵舊事，鼠須蠶繭逞風流。調露六君聯勝侶，開成十五會良辰。何如典郡推仙李，直續蘭亭廿四人。題請曉園廉使公祖大人鈞誨。治晚沈榮錦拜稿。
	25	沈維城(生卒年不詳)		昔我過隨園，披圖動詩思。(丁未春〔1787〕，於隨園金石藏中得見《蘭亭石刻圖卷》。)望古

⁵ 根據趙翼《甌北集》確定此詩年代為嘉慶癸亥。趙翼，〈李曉園廉使舊守會稽修蘭亭故事宴集賓友作禊游圖今來索題為補書數語〉，《甌北集》，收入曹光甫點校，《趙翼全集》，第六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頁923。

				景前賢，高風誰堪嗣。惟具謫仙才，能續修禊事。觴詠足千秋，後先無二致。我若從公游，也應添位置。著我此圖中，臨流拼一醉。曉園廉使公祖大人命題，治晚沈維城呈本。
26	許惇（生卒年不詳）			采蘭始騷人，會稽亭子獨。群賢修禊事，右軍曠芳躅。其序與其書，重其人如玉。觴詠寫幽情，志足追風浴。遐哉古之人，勝游待茲續。賓從亦名流，清風舊修竹。雨過苔無塵，琴橫韻流屋。江南老畫師，妙繪不勝讀。我亦志園亭，苦為作吏。展卷許幽尋，神游在尺幅。曉園廉使大人命題《續蘭亭修禊圖》，書請誨正。許惇。
27	汪庚（嘉慶3年〔1801〕進士）	嘉慶三年（1798）		未廁兒童竹馬迎，謳歌久徹越王城。何緣琴鶴攜天末，妙畫先親侍講名。（侍講山舟師大書幀首。）尚書清節寇三江，展觀公行離此邦。不羨凌煙圖紫閣，早從騷雅入無雙。永和千四百餘春，戟府曾為列坐人。（自晉永和迄今千四百四十一年，閱廿五，癸丑是歲，譚古愚師禊飲鏡心亭，庚叨陪入坐，有圖有序入石。）它日流傳肥瘦本，西湖志外譜名臣。嘉慶三年重九前一日，恭題曉園廉訪大人《續蘭亭修禊圖》後，屬吏舊記。汪庚。
28	王子音（生卒年不詳）	嘉慶三年（1798）		曉園廉使大人《續蘭亭修禊圖》書後。 廉使李曉園先生前守會稽，乾隆五十七年王子上巳之辰，攜公子，集嘉賓長少二十二人踵武右軍修禊事於蘭亭。既圖成卷，梁山舟侍講書端曰：《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 先生自敘，識圖者姚秋槎，凡從游與未從游者，各有歌辭，大都一時能聲士。袁簡齋太史負時名，特重從金陵渡江來會，實首倡焉敘，所謂賓客之歡，文字之樂，視右軍何如？況今天下太平，年穀時熟，方春和時，田疇繡錯，饁餉相繼，木之欣欣，泉之涓涓，所以敘其游觀者，視永和又何如？蓋先生仰承世德，為國賢臣，志浴沂風詠久矣，節鉞所臨，宣天和而勤民事，適守會稽，欣逢上巳，遂有蘭亭之游。自永和癸丑訖今一千四百四十年，得先生與右軍輝映，豈僅續修禊事也與哉！今者萬里天南，不獨蒼山洱海，到處蘭亭，覃布仁暄，四時春日，推此以往，勳業煥雲

				霞，文章垂竹帛，皆可作是圖、是卷觀也。子音不得從諸君子，後列次圖中，猶幸獲依宇下，受卷讀之，得於心而不能已於言也，謹書以志，景行云爾。嘉慶三年戊午九秋乙亥日王子音書。
	29	張問陶 (1764-1814)	嘉慶四年 (1800)	重拾《臨河序》一篇，依然觴詠暮春天。官閒也受林泉福，地勝長留翰墨緣。列坐無言仍彥會，杖藜習客似飛仙。任人指點談今昔，內史風流太守賢。修竹崇山一寫真，臨流賓從盡傳神。(按：點去「盡傳神」三字，後改作「各超塵」。)即看少長同清興，不用丹書補晉人。懷古自然宜我輩，遊春無礙是官身。披圖已後隨園叟，敢道題箋筆有神。嘉慶己未臘月廿一日，為曉園先生題於京師。船山張問陶。 「盡傳神」三字易作「各超塵」，避韻複也。臘月廿七日，老船又記。
	30	陳廣寧 (?-1814)	嘉慶十七年 (1812)	繼美後千載，披圖又廿年。(圖作於壬子春，今二十一稔矣。)蘭亭春欲暮，棠舍樹猶鮮。觴詠多名彥，風流勝昔賢。龍門數行記(吾師一記足冠諸詠)，直共右軍傳。 立雪程門晚，扶輿少箇人。許留新翰墨，好挹舊音塵。曲水襟懷遠，廬山面目真。千岩與萬壑，振觸故鄉春。嘉慶壬申春仲，曉園老夫子大人命題并正。受業陳廣寧拜稿。
	31	方保升(嘉慶 13		地以崇蘭盛，亭因曲水修。昔年稽故迹，永日暢同遊。靜契隨時足，相知託興幽。曾無絃管列，長與寄風流。
	32	年〔1808〕進士)		觴詠娛群坐，春和茂竹林。諸賢欣有得，一老惠然臨。天趣生懷抱，人文集古今。大觀期後會，斯樂在山陰。集稷帖八十字，應曉園大人命題即請教正。桐山方保升拜稿。 世人高會亦常有，逸少山陰傳不朽。世間筆墨空雲烟，蘭亭繭紙垂千年。誰與繼者稱米顛，西園雅集招群賢。東坡而下人十六，公麟圖畫俱天然。永和元豐兩名士，文采風流長已矣。揭來韻事見替人，始識蟠根有仙李。會稽太守風骨張，政聲嘖嘖如龔黃。探尋禹穴快搜討，經過曲水神飛揚。時值惠風正和暢，鑑湖春色新醅香。修竹

				娟娟媚晴旭，崇蘭馥馥含芬芳。平原賓客一時盛，三月三日飛羽觴。坐花醉月酌大斗，分牋劈韻收奚囊。恨不早年御元禮，得廁末座登詞場。閒情更覓寫生手，披圖歷歷見吾友。張君宛爾露吟肩（棗園），姚子儼然開笑口（秋槎）。太息故人多遠遑，就中更有隨園叟。蒼松翠柏每傾心，白鶴青天已回首。其餘貌得神與俱，伯時妙筆差不殊。此圖此會足千古，使我欲語心踟躕。茅齋藏有蘭亭卷，列敘時人似此無。方保升再呈稿。
33	徐國楠（乾隆 58 年〔1793〕進士）	嘉慶十七年（1812）		今日河東帥，當年會稽守。有樹皆甘棠，無山不峴首。公餘清興來，勝蹟選林藪。采采流水蓬蓬春，曠懷永和歲癸丑。誰謂今賢讓昔賢，鶴鳴在陰鶯求友。此亭此會足千古，圖寫龍眠白描手。翛然亭中人，召杜稱父母。我本部下民，今居屬僚後。葵藿傾夙心，粉榆碑在口。展圖披惠風，恍在茂林修竹之左右。壬申暮春曉園制府大人命題，徐國楠呈稿。
34	熊方受（乾隆 58 年〔1790〕進士）	推測題寫於嘉慶十七年（1812） ⁶		鼓吹旌旗擁八驪，卻攜圖畫示風流。（公方按部兗州，出此卷命題。）爭題繭紙雲烟滿，如見蘭亭水竹幽。上巳節重修楔事，長庚星本應仙儔。就中況有隨園叟，千里扶筇作勝游。河壩三世誦清芬，（宮保公、尚書公相繼秉鉞東河。）吐握延才海內聞。胸有千秋情灑落，面剛一識意殷勤。（方受座主邵二雲〔邵晉涵，1743-1796〕先生初謁公即承款洽，頃復拳拳於次君子峰副車。）泉修浣筆懷前輩，（當日香林尚書重修浣筆泉，觴詠成集。）湍記流觴續右軍。最喜卷中幼公子，而今攀桂早凌雲。（熙臺孝廉庚午〔1810〕舉於京兆試，即圖上所繪垂髮公子也。）曉園河督大人鈞誨。熊方受謹題。
35	邵秉華（生卒年不詳）	嘉慶十七年（1812）		蘭亭留勝蹟，後會媿前賢。觴詠名流集，溪山淑景鮮。古歡懷樾蔭，雅抱記廉泉。憶昔趨庭日，曾吟舊雨篇。（先學士〔邵晉涵〕於乾隆癸丑〔1793〕謁公京邸，至今蒙公眷念。）未遂蓬萊謁，（府署有蓬萊閣。）欣瞻寶繪新。圖經搜越絕，（公重修紹興府志。）文采憶蘭津。早作千

⁶ 根據其跋言座主為邵晉涵，因此推測此跋年代與邵晉涵子邵秉華同時。

				<p>年調，常深萬戶春。名篇同稷序，豈似治師人。 （元劉仁本治師餘姚，合吳越名士於秘圖山分韻賦詩，效蘭亭故事，繪圖刻石尚存餘姚縣學。） 嘉慶壬申題應曉園河帥大人命，餘姚邵秉華呈稿。</p>
36	鄧春澍 (1884-1954)	民國二十一年(1932)	<p>千古蘭亭序，風流說永和。吾儕前歲繼，太守昔年過。圖繪慚予陋，詩篇羨客多。後先傳韻事，展卷益摩挲。（按：原字寫錯，點去）民國歲己巳（1929）上巳之辰，澍與海上鳴社所集吳會十八同人會於會稽蘭亭，作修稷之舉。俯仰流連者，竟日銜觴，賦詩各有佳作，澍更工繪《蘭亭續稷》兩卷以誌稷飲之盛。越三載，壬申（1932）九秋十有八日，蒞滬，謁閻公甘園先生（名培棠，1865-1942），獲觀所藏。是卷具見先輩流風，不亞吾儕，而各為寫真於圖中，尤屬難能而可貴。題詠畫屬名流，畫法宋元，神情雋逸。觀賞既久，適郁君葆青（名錫璜，1881-1941）處，又值鳴社雅集之期，爰攜就同人共獲鑑覽，歎為絕藝至寶，而賡同調云。</p> <p>武進白雲溪上人鄧春澍拜觀並題識於春申送旅。</p>	

（感謝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簡欣晨協助表格製作。）

V-表四 《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題字者整理

位置	序	題字者	題字年代	身分	身分出處
引首		梁同書 (1723-1815)	乾隆五十七年(1792)	字元穎，號山舟，浙江錢塘人。大學士梁師正(1697-1763)子。乾隆十二年(1747)舉人，乾隆十七年(1752)賜進士。乾隆二十三年(1758)官至侍講。嘉慶十二年(1807)，加侍講學士銜。當時墓誌多為其手書。其時與劉墉(1719-1805)、王文治(1730-1802)並稱，日本、琉球人亦知其名。著有《頻羅庵集》等。	· 李玉棻，《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卷三，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台北：明文書局，1985)，第74冊，頁408。 · 蔡冠洛編纂，《清代七百名名人傳(三)》，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196冊，頁370-371。
簽條		梁氏	某癸丑年 (可能為乾隆五十八年〔1793〕)		
簽條		鄧春澍 (1884-1954)	民國二十一年(1932)	江蘇武進人。書畫家。	
拖尾	1	李亨特 (?-1815)	乾隆五十七年(1792)	正藍旗漢軍人。祖父李宏(?-1771)官至江南河道總督，父李奉翰(?-1799)官至兩江總督。李亨特，監生，捐布政使理問。乾隆四十二年(1777)發河東河工效力，歷任補山東兗州通判等職。乾隆五十五年(1790)任浙江紹興府知府，五十七年(1792)調任杭州府知府。乾隆六十年(1795)，任雲南迤西道，助剿苗事有功，賞	·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列傳(三)》，卷一一二，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91冊，頁561。 · 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徵初編(二九)》，卷一七八，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155冊，頁186-196。 · 東方學會編，《國史列傳(二)》，卷四十四，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36冊，頁595-602。 · 汪胡禎、無慰祖輯，《清代河臣傳》，卷二，收入周

				<p>戴孔雀翎（《大清會典》）。嘉慶二年（1797），佐平苗、猓，加按察使銜。嘉慶三年（1798），調廣西右江道。嘉慶七年（1802），授江蘇按察使。嘉慶十一年（1806），因向下屬強行派捐等事，發往伊犁。十三年（1808）釋回。嘉慶十四年（1809）一月，因荷花塘壩工決堤事，第二次被流放往熱河，七月旋即釋回，授坐糧廳主事。嘉慶十六年（1811）任河東河道總督。嘉慶十八年（1813）九月，因沁河、黃河水患，河南睢州氾濫，李亨特被革職，留河工處效力。又因微山河等處淤淺事，及李亨特革職期間並未常留工地，反而歸返山東濟寧住處，仍使用河道總督儀制等事，嘉慶十九年（1814），下令沒收其北京、山東寓所家產。並先枷號半年，之後發往黑龍江，此為李亨特第三次被流放。嘉慶二十年（1815），李亨特病故於黑龍江。</p>	<p>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56冊，頁114。 ·周軒，〈一生流放三次的河督李亨特〉，《紫禁城》，1993年第4期，頁36-38。</p>
	2	姚興潔 (1756-1819)	乾隆五十七年(1792)	<p>李亨特幕僚。 字濂溪、號（或字）香南等，安徽桐城人。官至湖南辰沅道。</p>	<p>·朱則杰、盧高媛，〈《履園叢話》“蘭亭”條與李亨特“續蘭亭修禊”考論〉，《浙江學刊》，2015年第5期，頁109-110。姚興潔生卒年，</p>

					乃根據此文頁 109 所載而來。
	3	袁枚 (1716-1797)		見 V-表一。	
	4	慶桂 (1737-1816)		字樹齋，滿洲鑲黃旗人。大學士尹繼善 (1694-1771) 子。歷任軍機大臣、刑部尚書、內大臣、文淵閣大學士並總理刑部、太子太保等職銜。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平廓爾喀 (尼泊爾，廓爾喀之役為乾隆「十全武功」之一)，慶桂因值軍機處，為十五功臣之一，圖形於紫光閣，並由乾隆皇帝親自為其製贊。當年十二月，至浙江赴浙江調查案件。	<p>·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表十六軍機大臣年表一、列傳一二八 (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民國十七年 [1928] 清史館本影印)。</p> <p>· 李元度，〈尹文端公事略 (子文恪公慶桂)〉，《國朝先正事略》，卷十六 (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同治刻本影印)。</p>
	5	徐嵩 (又名徐鑠慶，乾隆 51 年 [1786] 舉人)	乾隆五十七年 (1792)	李亨特幕僚。乾隆五十一年 (1786) 舉人。曾任湖北蘄州知州、湖北崇陽縣知縣等職。著有《玉山閣詩鈔》、《玉山閣詩古文集》等。	<p>·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名權威檔人物傳記資料庫網頁，檢索日期：2019-1-15。</p>
	6	平恕 (? -1804)		李亨特幕僚。見 V-表一。	<p>·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名權威檔人物傳記資料庫網頁，檢索日期：2019-1-15。</p>
	7	顧光旭 (1731-1797)	乾隆五十七年 (1793.1)	字華暘，號響泉、晴沙，江蘇無錫人。乾隆十七年 (1752) 進士。官至四川按察使。乾隆四十一年，於四川總理糧餉。在官素有佳譽，積勞乞歸之後，四川士人	<p>· 蔡冠洛編纂，《清代七百名人傳 (一)》，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 194 冊，頁 185-187。</p> <p>· 李放纂輯，《皇清書史 (二)》，卷二十七，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p>

				尚為其立生祠。有《響泉集》。《國朝書畫家筆錄》載：「學術純正。……致仕歸主講東林十餘年，士林仰如山斗。」《皇清書史》載：「書法出入《蘭亭》、《聖教》，尤為人所寶貴。」	第 84 冊，頁 372。 · 竇鎮輯，《國朝書畫家筆錄》，卷二，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 82 冊，頁 185。
	8	(舒穆祿)阿林保 (1746-1809)	乾隆五十九年(1794)	字雨窗，號適園，時任浙江鹽運使。曾任江西按察使、安徽巡撫、兩江總督等職。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名權威檔人物傳記資料庫網頁，檢索日期：2019-1-15。
	9	周蘇		尚未查得相關資料。	
	10	錢伯坻 (1738-1812)	乾隆五十七年(1792-3)	字魯斯，號漁陂、樸射山樵，江蘇陽湖人。錢維城(1720-1772，乾隆十年〔1745〕一甲一名，官至刑部侍郎)從子。 ¹ 國子監生。以法書聞名。善古文，精於考證。	· 震鈞輯，《國朝書人輯略》，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 85 冊，頁 463-465。 · 李玉棻，《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卷三，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台北：明文書局，1985)，第 74 冊，頁 403。 · 李放纂輯，《皇清書史(一)》，卷十一，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 83 冊，頁 356-357。 · 包世臣，《錢魯斯傳》，《小倦遊閣集》，卷九(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小倦遊閣鈔本影印)。
	11	韓鼎晉 (1760-1831)	嘉慶十七年(1812)	字峙霍，號樹屏，四川長壽人。乾隆六十年(1795)進士。官至工部侍郎。嘉慶十六年時，任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漕御史)。	·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列傳(四)》，卷一四一，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 92 冊，頁 11294-11295。 · 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徵

¹ 關於錢維城作為乾隆皇帝之文化顧問、詞臣畫家的討論，見馮明珠，〈玉皇案吏王者師——論介乾隆皇帝的文化顧問〉，收入，頁 249、256 (總頁 241-2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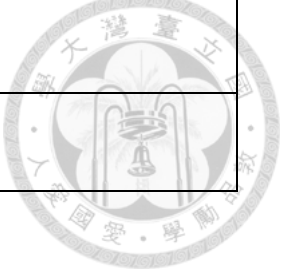
					初編(二一)》，卷一〇九，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147冊，頁533-549。 ·朱汝珍輯，《詞林輯略》，卷四，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16冊，頁238。 ·徐宗幹，《(道光)濟寧直隸州志》卷六之三(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咸豐九年刻本影印)。
	12	祝雲棟(生卒年不詳)	乾隆五十九年(1794)	字留村。乾隆三十六年〔1771〕進士。曾任天津巡漕御史、陝西道監察御史、山東萊州府知府等職。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名權威檔人物傳記資料庫網頁，檢索日期：2019-1-15。
	13	李廷敬(?-1806)		字寧圃，號味莊，直隸滄州人。乾隆四十年(1775)進士。曾任江蘇布政使、江蘇按察使，官至江蘇蘇松太道。有《平遠山房詩鈔》。	·馮桂芬，《(同治)蘇州府志》，卷二十二(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光緒九年刊本影印)。 ·陶樾，《國朝畿輔詩傳》，卷四十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道光十九年紅豆樹館刻本影印)。 ·王昶，《湖海詩傳》，卷三十三(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嘉慶刻本影印)。
	14	黃易(1744-1802)	乾隆五十九年(1794-5)	字小松，號秋盦。官山東運河同知。著有《岱巖訪古日記》、《小蓬萊閣碑目》、《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小蓬萊閣詩鈔》等。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名權威檔人物傳記資料庫網頁，檢索日期：2019-1-15。
	15	錢開仕(生卒年不詳)	嘉慶三年(1798)	字補之，號漆林，浙江嘉興人。錢陳群	·朱汝珍輯，《詞林輯略》，卷四，收入周駿富輯，《清

				(1686-1774, 官至刑部左侍郎) 孫。乾隆五十四年 (1789) 進士, 散館授檢討。	代傳記叢刊, 第 16 冊, 頁 232。
	16	顧禮琥(生卒年不詳)		字西金, 江蘇吳縣人。乾隆五十年嘗以進士授職。官至河南上北河同知。為名幕。	· 李桓輯,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三八)》, 卷一七八, 收入周駿富輯, 《清代傳記叢刊》, 第 257 冊, 頁 583-586。
	17				
	18	吳錫麒 (1746-1818)		字聖徵, 號穀人, 浙江錢塘人。乾隆四十年 (1775) 進士。嘉慶六年 (1801) 任國子監祭酒。後至揚州主講安定樂儀書院。工書擅詩。吳鼎 (1755-1821) 嘉慶三年 (1798) 輯《八家四六文抄》, 收袁枚、孫星衍、洪亮吉、曾燠、吳錫麒等八人文章, 稱「駢文八家」。有《正味齋全集》。	· 寶鎮輯, 《國朝書畫家筆錄》, 卷二, 收入周駿富輯, 《清代傳記叢刊》, 第 82 冊, 頁 241。 · 李玉棻,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 卷三, 收入周駿富輯, 《清代傳記叢刊》(台北: 明文書局, 1985), 第 74 冊, 頁 422-423。 · 蔡冠洛編纂, 《清代七百名人傳(三)》, 收入周駿富輯, 《清代傳記叢刊》, 第 196 冊, 頁 366。
	19	錢維喬 (1739-1806)	嘉慶八年 (1803)	字樹參、竹初, 號曙川, 江蘇武進人。錢維城弟。乾隆二十七年 (1762) 舉人, 官鄆縣知縣。乾隆五十三年 (1788) 入浙江顧小韓署中。工山水。有《竹初未定稿》。	· 李濬之編輯, 《清畫家詩史(二)》, 卷丁下, 收入周駿富輯, 《清代傳記叢刊》, 第 76 冊, 頁 226-227。 · 馮金伯, 《墨香居畫室》, 卷四, 收入周駿富輯, 《清代傳記叢刊》, 第 72 冊, 頁 158-159。 · 寶鎮輯, 《國朝書畫家筆錄》, 卷二, 收入周駿富輯, 《清代傳記叢刊》, 第 82 冊, 頁 193。
	20	趙翼(1727-1814)	嘉慶八年 (1803)	字雲松, 號甌北, 江蘇陽湖人。乾隆十九年 (1754) 中明通榜, 授內閣中書, 入直軍機	· 朱汝珍輯, 《詞林輯略》, 卷四, 收入周駿富輯, 《清代傳記叢刊》, 第 16 冊, 頁 193。

				處，大學士傅恆（1720-1770）、汪由敦（1692-1758）尤其看重。乾隆二十六年（1761）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並曾多次擔任鄉試、會試同考官。官至貴州貴西道，並曾助平臺灣林爽文亂。後辭官主講於安定書院，與袁枚、蔣士銓齊名。尤其精通史學。撰《廿二史劄記》、《陔餘叢考》、《簷曝雜記》等。	· 李放纂輯，《皇清書史（二）》，卷二十五，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84冊，頁277。 · 蔡冠洛編纂，《清代七百名名人傳（三）》，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196冊，頁375-376。
	21	桂馥（1736-1805）	嘉慶二年（1797）	字冬卉，號未谷、老苔，山東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進士。嘉慶元年（1796年），官雲南永平縣知縣。《墨林今話》載：「學問該博，邃於金石考據之學。」甚受翁方綱（1733-1818）、阮元（1764-1849）推崇。工篆刻，漢隸尤為時重。撰《說文證義》、《扎樸》、《晚學齋集》等。	· 蔣寶齡撰，蔣莖生續，《墨林今話》，卷十，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73冊，頁225-226。 · 李玉棻，《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卷三，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台北：明文書局，1985），第74冊，頁444-445。
	22	史致光（?-1828）	嘉慶二年（1797）	字葆甫，號漁村，浙江山陰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狀元。官至福建巡撫、雲南總督。嘉慶元年（1796）時，任雲南府知府。	· 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徵初編（二一）》，卷一〇六，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147冊，頁251-267。 · 朱汝珍輯，《詞林輯略》，卷四，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16冊，頁227。
	23				
	24	沈榮錦（生卒年不詳）		尚未查得相關資料。	

	25	沈維城(生卒年不詳)		尚未查得相關資料。	
	26	許惇(生卒年不詳)		乾隆朝湖南巡撫許松佶(1693-1764)子。	
	27	汪庚(生卒年不詳)	嘉慶三年(1798)	字上章，號艾塘，安徽全椒人。嘉慶六年(1801)進士。散館授編修。	<p>· 朱汝珍輯，《詞林輯略》，卷五，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16冊，頁251。</p> <p>· 毛慶善編，《胡海詩人小傳》，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24冊，頁745。</p>
	28	王子音(生卒年不詳)	嘉慶三年(1798)	江西武寧人。乾隆年間，官河北饒陽縣知縣。擅真書。著有《宦拾錄》。	· 李放纂輯，《皇清書史(一)》，卷十六，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83冊，頁573。
	29	張問陶(1764-1814)		<p>字柳門、樂祖，號仲冶、船山等，四川遂甯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進士。以禮部郎中，出為山東省萊州府知府。嘉慶皇帝曾詔選三十人書扇、再選十二人書養心殿屏，張問陶均中選。</p> <p>工詩，善書畫，詩文尤其為袁枚推崇。《清代七百名名人傳》載：「論者謂有清二百年來，蜀中詩人以問陶為最。」撰《船山詩文集》。</p>	<p>· 蔣寶齡撰，蔣莖生續，《墨林今話》，卷八，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73冊，頁224-225。</p> <p>· 朱汝珍輯，《詞林輯略》，卷四，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16冊，頁234。</p> <p>· 寶鎮輯，《國朝書畫家筆錄》，卷二，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82冊，頁247。</p> <p>· 李玉棻，《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卷三，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台北：明文書局，1985)，第74冊，頁445-446。</p> <p>· 蔡冠洛編纂，《清代七百名名人傳(三)》，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196冊，頁370。</p> <p>· 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徵</p>

					初編(三六),卷二四四,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162冊,頁809-831。
30	陳廣寧 (?-1814)	嘉慶十七年 (1812)	浙江山陰人。嘉慶十六年(1811),官山東兗州鎮總兵,後官至雲南騰越鎮總兵。著有《壽雪山房詩稿》。《皇清書史(一)》引錢泳《履園叢話》:「文章詞翰、金石圖書,無不研究。」	· 東方學會編,《國史列傳(三)》,卷六十,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37冊,《國史列傳》,頁895。 · 東方學會編,《墨林今話》,卷八十,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37冊,頁895-898。 · 李放纂輯,《皇清書史(一)》,卷八,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83冊,頁267。	
31	方保升(生卒年不詳)		字玉班,號損齋,安徽桐城人。嘉慶十三年(1808)進士。	· 朱汝珍輯,《詞林輯略》,卷五,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16冊,頁270。	
32					
33	徐國楠(生卒年不詳)	嘉慶十七年 (1812)	乾隆五十八年(1793)癸丑科二甲進士。有官至湖廣京畿道御史、山東運河兵備道。		
34	熊方受(生卒年不詳)		字介茲,號定庵、夢菴,廣西永康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進士,官至山東兗沂曹濟道,降東昌府知府。撰《夢菴詩鈔》、《偶園詩草》。	· 朱汝珍輯,《詞林輯略》,卷四,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16冊,頁234。 · 李玉棻,《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卷三,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台北:明文書局,1985),第74冊,頁444。 · 李放纂輯,《皇清書史(一)》,卷一,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83冊,頁43。	
35	邵秉華(生卒年不詳)	嘉慶十七年	為清代著名學者、藏書		

		詳)	(1812)	家 邵晉涵(1743-1796， 官至侍讀學士)之子。	
	36	鄧春澍 (1884-1954)		江蘇武進人。書畫家。	

V-表五 《借園修禊圖》之題跋者



位置	序	題字者	身分、著作	身分出處
引首		王文治 (1730-1802)	畢沅友人，曾客畢沅署。字禹卿，號夢樓。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名權威檔人物傳記資料庫網頁，檢索日期：2019-1-15。
畫面 末端		王文治	乾隆二十五年（1706）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主講杭州鎮江書院等職。著有《夢樓詩集》等。	
拖尾 題字		孫雲桂（生卒年不詳）	畢沅幕賓。 號香（薌）泉，江蘇長洲人。候選布政司理問。撰《妙香閣詩文稿》。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二七七（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民國景十通本影印）。 ·尚小明，《學人游幕與清代學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頁 275。
拖尾 拓本	1	梁溪 楊搢（生卒年不詳）	畢沅幕賓。 字蘊山，江蘇無錫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應已入畢沅幕。與王文治、王宸、史善長、嚴觀同在畢沅官署。 字蘊山。監生。撰《祛邪紀略》（嘉慶乙亥刊本）。	·丁紹儀，《國朝詞綜補》，卷十九（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光緒刻前五十八卷本影印）。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二十四（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民國吳興叢書本影印）。 ·張慧劍，《明清江蘇文人年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1264。
	2	京江 王文治		
	3	婁東 王宸 (1720-1797)	畢沅幕賓。 字紫凝，號蓬心等，太倉人，王原祁（1642-1715）曾孫。工詩，擅長山水。乾隆二十五年（1760）舉人。乾隆四十八年（1783），為湖南永州府知府。罷官後為畢沅幕客，「館之武昌，專令作畫，一時傳為雅談。」（載《畫林新詠》）。撰《蓬心詩	·劉瑗，《國朝畫徵補錄》，卷上（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道光刻本影印）。 ·張慧劍，《明清江蘇文人年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1264、1287。 ·李玉棻，《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卷三，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台北：明文書局，1985），第 74 冊，頁 412-413。 ·竇鎮輯，《國朝書畫家筆錄》，卷三，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 82 冊，頁 204。 ·竇鎮輯，《國朝書畫家筆錄》，卷一，收入

		鈔》。畫法宗黃公望，與王昱、王愷等併稱「小四王」。	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 79 冊，頁 457。 · 蔣寶齡撰，蔣萑生續，《墨林今話》，卷四，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 73 冊，頁 105-106。
4	山陰 俞大猷（生卒年不詳）	字鶴雲。乾隆三十七年（1772）進士及第，授編修。曾任荊州知府。	· 阮元，《兩浙輶軒錄》，卷三十二（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嘉慶刻本影印）。
5	婁東 畢溥（生卒年不詳）	畢沅從弟。 字逢原，號竹濤。廩貢生。工書法，深入趙、董之室。	· 震鈞，《國朝書人輯略》，卷七（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光緒 34 年〔1908〕刻本影印）。 · 李玉棻，《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卷三，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 74 冊，頁 415。
6	秣陵 方正澍（生卒年不詳） 江南歙縣	畢沅幕賓。 字子雲，諸生。袁枚弟子。撰《伴香閣詩》。畢沅曾合選方正澍、洪亮吉、黃景仁等八人之詩，為《吳會英才集》。	· 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卷三十三（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道光 10 年〔1830〕刻本影印）。 · 張紹南，《孫淵如先生年譜》，卷上（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光緒刻藕香零拾本影印）。 · 王昶，《蒲褐山房詩話》（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稿本影印）。 · 張慧劍，《明清江蘇文人年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1251。
7	婁東 沈增（生卒年不詳）	江蘇太倉	尚未查得相關資料。
8	錫山 王洽（生卒年不詳）	江蘇無錫	尚未查得相關資料。
9	樵李 沈冕柱（生卒年不詳）		尚未查得相關資料。
10	陽羨 史雲虬（生卒年不詳）		尚未查得相關資料。
11	廣川 莫允宣（生卒年不詳）	字是卿。乾隆四十三年（1778）進士。曾任雲南曲靖府知府、乾隆五十二年（1787）丁未科會試刑部主事。	· 法式善，《清秘述聞》卷十六（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嘉慶 4 年〔1799〕刻本影印）。 · 陶樞，《國朝畿輔詩傳》，卷四十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道光 19 年〔1839〕紅豆樹館刻本影印）。

12	梁溪 顧鯤（生卒年不詳）		尚未查得相關資料。
13	津門 程大中（生卒年不詳）	字拳時，號是菴。湖北應城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進士，曾任蘄州學正。撰《四書逸箋》、《在山堂集》、《甲乙存稿》等。其中《四書逸箋》被收入《四庫全書》，經《四庫全書總目》標示為「湖南巡撫採進本」。	· 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卷三十七（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道光十年〔1830〕刻本影印）。 · 永瑤，《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六（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影印）。
14	秣陵 周斯才（生卒年不詳）	號夢溪。嘉慶年間任馬邊廳同知。撰刊《嘉慶馬邊廳志》。	· 王培荀，《聽雨樓隨筆》，卷三（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道光 25 年〔1845〕刻本影印）。 · 丁仁，《八千卷樓書目》，卷七（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民國本影印）。
15	吳門 陳鏗（生卒年不詳）	當時為「九齡童子」。	尚未查得相關資料。
16	金沙 于鈐（生卒年不詳）		尚未查得相關資料。
17	婁東 王思濟（生卒年不詳）		尚未查得相關資料。
18	吳門 陸模孫（生卒年不詳）	畢沅幕賓。 字或號為遠亭。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進士。	· 汪學金，《靜厓詩稿》後稿卷五（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乾隆刻嘉慶增修本影印）。 · 李金華，〈畢沅及其幕府的史學成就〉（天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論文，2010），頁 263。
19	吳門 張琦（生卒年不詳）	畢沅幕賓。 字映山。	· 袁枚，《隨園詩話》，卷十一（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乾隆 14 年〔1749〕刻本影印）。 · 畢沅，〈由襄陽之濟南道中雜書寄別王太守蓬心兼示幕中諸友〉，《靈巖山人詩集》卷四十（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嘉慶 4 年〔1799〕經訓堂刻本影印）。
20	吳門 畢蘭慶（生	畢沅長孫。	· 王昶，〈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廣總

	卒年不詳)		督贈太子太保畢公沅神道碑》，收入錢儀吉，《碑傳集》，七十三（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道光刻本影印）。
21	吳門 畢嵩珠 (1785-?)	畢沅次子，當時為「九齡童子」。	· 王昶，〈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廣總督贈太子太保畢公沅神道碑》，收入錢儀吉，《碑傳集》，七十三（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道光刻本影印）。
22	吳江 史善長（生卒年不詳）	畢沅幕賓。 字誦芬，號赤崖。諸生。 撰《弇山畢公年譜》、《青溪書院志》、《秋樹讀書樓遺集》等。	· 馮桂芬，《（同治）蘇州府志》，卷一〇七、卷一三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光緒九年〔1883〕刊本影印）。 ·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二六四（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民國景十通本影印）。 · 張慧劍，《明清江蘇文人年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1260。
23	吳江 顧蔡（生卒年不詳）		尚未查得相關資料。
24	婁東 王慶孫（生卒年不詳）	嘉慶三年（1798）舉人。 曾任溧陽教諭。	· 馮桂芬，《（同治）蘇州府志》，卷六十五選舉志「舉人」（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光緒 9 年〔1883〕刊本影印）。
25	梁溪 孫爾齡（生卒年不詳）	疑為廣西巡撫孫永清（1732-1790）子。	· 王昶，〈兵部侍郎廣西巡撫孫君永清墓誌銘〉，收入錢儀吉，《碑傳集》，卷七十三（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道光刻本影印）。
26	吳門 張問簪（生卒年不詳）	洪亮吉，《北江詩話》載：「張上舍問簪，詩如秋棠作花，淒豔欲絕。」	· 洪亮吉，《北江詩話》卷一（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光緒授經堂刻洪北江全集本影印）。
27	秣陵 嚴觀（生卒年不詳）	畢沅幕賓。 字子進。諸生。與其父嚴長明（1731-1787）同為畢沅幕賓。撰《江寧金石記》、《湖北金石詩》、《元和郡縣補志》等。	· 丁紹儀，《國朝詞綜補》，卷十六（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光緒刻前五十八卷本影印）。 ·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 卷二六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民國景十通本影印）。 · 張慧劍，《明清江蘇文人年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1192、1251。
28	吳門 張挺（生卒年不詳）		尚未查得相關資料。
29	吳門 顧張思（生	疑其字懷祖，為諸生。	· 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卷五十三（北

	卒年不詳)	撰《越游小草》者。	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道光十年刻本影印)。
30	樵李 吳文溥 (生卒年不詳)	字博如，號澹川。恩貢生。撰《南野堂集》。《群雅集》載：「澹川學有本源，尤精韜略西，諸侯爭延為上客。其詩推陳出新，一空凡響。」	· 阮元，《兩浙輶軒錄》，卷三十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嘉慶刻本影印)。
31	津門 王昭 (生卒年不詳)		尚未查得相關資料。
32	鮑邱 劉錫嘏 (1745-?)	畢沅幕賓。字純齋，號拙存，晚號茶仙。河北通州人。乾隆三十四年(1769)進士。曾任湖北督糧道，官至江蘇淮徐道。工墨梅。撰《十硯齋集》、《快晴小築詞》。	· 李玉棻，《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卷三，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74冊，頁419-420。 · 孫爾準，〈誥授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等處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黎齋府君行狀〉，《泰雲堂集》，文集卷二(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道光刻本影印)。 · 楊芳燦，〈劉茶僊快晴小築詞序(劉觀察錫嘏晚號茶僊歿後其婿孫太史爾準刻其詞集屬余為序)〉，《芙蓉山館全集》，文鈔卷五(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清光緒十七年活字印本影印)。 · 寶鎮輯，《國朝書畫家筆錄》，卷二，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82冊，頁195-196。 · 李澹之編輯，《清畫家詩史(二)》，丁下，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76冊，頁263-264。 · 盛叔清輯，《清代畫史增編》，卷二十二，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78冊，頁447。 ·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二八一(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據民國景十通本影印)。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共同製作，「明清檔案人名權威資料查詢」網頁(下載網址：

			<p>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swweb/html_name/search.php)，檢索日期：2018年2月18日。</p> <p>· 陳雅飛，〈畢沅幕府書家群概論〉，《新美術》（中國美術學院學報），2012年第2期，頁34。</p>
	33	鮑邱 劉瀛（生卒年不詳）	<p>疑為劉錫嘏家人。</p> <p>尚未查得相關資料。</p>
	34	鮑邱 劉灝（生卒年不詳）	<p>疑為劉錫嘏家人。</p> <p>尚未查得相關資料。</p>
	35	真州 夏之勳（生卒年不詳）	<p>字銘旃，號芳原，江西人。《墨林今話》載：「酷嗜今石文字，藏弄碑版、書畫、彝鼎甚多。善篆隸書及設色花卉。」亦工詩。</p> <p>· 震鈞輯，《國朝書人輯略》，卷七，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85冊，頁532-533。</p> <p>· 蔣寶齡撰，蔣萑生續，《墨林今話》，卷九，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73冊，頁253。</p> <p>· 盛叔清，《清代畫史增編》，卷三十二，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78冊，頁669。</p>
拖尾題字		陳崇本（生卒年不詳）	<p>字伯恭，號榕園、弢園，河南商邱人，陳淮（1731-1810，字望之，號藥洲，乾隆五十七年〔1792〕任江西巡撫）子。乾隆四十年（1775）進士。官至宗人府府丞。</p> <p>· 陶湘編，《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二，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32冊，頁165。</p> <p>· 李放纂輯，《皇清書史（一）》，卷八，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83冊，頁261。</p> <p>· 何炎泉，〈陳淮的書畫收藏與嘉慶皇帝的《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故宮學術季刊》，第32卷第3期（2015年春季號），頁142。</p>

V-表六 《借園修禊圖》題跋釋文

位置	序	題跋者	題跋年代	題跋釋文
引首		王文治 (1730-1802)	乾隆五十八年(1793) ¹	借園修禊第三圖。家蓬心為純齋大兄作。文治題。
畫面 末端		王文治	乾隆五十八年(1793)	<p>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p> <p>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攬者，亦將有感於斯文。</p> <p>靈巖山人所收定武蘭亭是柯九思家藏，殆稀世之珍也。癸丑春(1793)適純齋觀察有預脩禊事之舉，蓬心繪圖工妙特勝。尾有餘紙，因仿宋人縮本臨之。夢樓王文治。</p>
拖尾 題字		孫雲桂(生卒年不詳)	乾隆五十八年(1793)	<p>純齋觀察劉公寓江夏之借園，園依山面城，花事頗盛。每值暮春，輒集名流張文謙，續晉人蘭亭之遊，辛、壬之歲(1791、1792)，凡兩舉矣。今歲適屆癸丑(1793)，二月中旬，園桃爛然，公慮春事之將闌也，以月之廿日，先期修禊，各取《禊敘》字為詩。與斯會者益盛，誠有如王逸少所謂群賢至、少長集者。以余辛歲曾有記，屬余再引其端，爰舉觴而稱曰：天地無終窮，今古</p>

¹ 王文治引首並未書寫年代，但推測應與王文治縮臨畢沅藏《定武蘭亭真本》同時。

				<p>無終窮，人之條往來於其中者，亦憧憧擾擾而無終窮。夫大化嬗而春秋移，人事遷而老少變，歲月寢馳，果堪把玩耶！逸少俯仰之間，頓成陳迹。臨文興歎，不能自己，可謂深於情而能發於言者已。雖然古之達人，又何嘗沾沾于是也哉！蓋修短隨化有已不得而主之者，即有不隨化而修短天亦不得而主之者，既天不得而主之，則修短於外者，皆其迹耳！不揣其本而求其迹，雖工於感慨無益也！曾氏子於暮春，有欣契之興，無感慨之詞，其殆由迹而窮其本歟！觀察之詩，卒章曰：雖然盛絲竹聽取曲，將終傷離惜別，猶有情隨事遷之思乎！余弗文弗能集契敘為歌詩，輒申其旨，而進一解於公。公達人，當不至以余言為河漢焉爾！是日與會者三十一人，又九齡童子二人，畢嵩珠、陳鏗。長洲後學孫雲桂識。</p>
拖尾拓本跋詩	1	梁溪 楊搢（生卒年不詳）	乾隆五十八年（1793） ²	<p>在昔永和之年，清流畢集。至今脩契之事，盛會已虛，臨水曲以相將，仰山陰其可及，嗟夫異地，慨不同時。</p> <p>觀察幽抱天和，盛懷日朗，娛情觴詠，靜寄林亭，有時氣引崇蘭，群言自契盡日，風生脩竹，大化齊觀于暮之春，亦有此樂。諸賢快其合坐，大作因之述懷，向之興感有由，期以言情為至，無虛此日，咸集斯文。</p> <p>今猶癸丑歲，同是暮春初。覽古每嗟若，及時咸樂與。詠懷自有記，水竹常相於。豈以斯文在，期將此會虛。</p> <p>斯事亦陳迹，清風引後賢。暫遊欣有竹，靜坐契無弦。流攬在今日，情懷猶少年。相將快相得，遇合不期然。</p> <p>契合此時流，古人同信脩。暢然隨地足，快若與天遊。盛會因之集，言懷不取幽。樂群斯已矣，興感亦無由。</p> <p>興感每終古，放懷當及今。風生亭以外，日在山之陰。列坐幽蘭室，靜言脩竹林。此閒期自得，時亦取咸臨。</p> <p>臨觴隨水曲，品竹引風清。或可娛斯目，能無敘此情。寄懷同一致，觀化喻群生。感激流年驛，</p>

² 「拖尾拓本」中之所有書寫年代，推測均應為乾隆五十八年，以下不再注解。

			<p>猶將契老彭。</p> <p>宙合或之寄，天隨知所崇。無懷遊化日，不惠仰和風。此會暫得遇，異時期與同。古人言豈妄，相信有初終。</p> <p>寄迹欣初會，言情記故知。清虛猶取竹，流浪不悲絲。向喻形骸外，終能左右之。又因斯暢敘，一為述當時。</p> <p>當年得所託，今又此相將。流水隨時激，春山引興長。樂遊知未倦，世故可無嘗。極目風之會，欣然盡一觴。</p>
2	京江 王文治	乾隆五十八年（1793）	<p>是年當癸丑，此地豈山陰。所寄同蘭若，諸賢盛竹林。遷流知自昔，述作在於今。況有古人迹，閒時暫一臨。</p> <p>歲歲春長在，欣欣水自流。林陰山若暮，地曲領生幽。已興雖人引，今懷豈昔遊。當風一觀攬，隨事有天遊。</p>
3	婁東 王宸（1720-1797）	乾隆五十八年（1793）	<p>脩契集群賢，時當癸丑年。老懷亦樂矣，盛會又欣然。流攬若隨地，興觀自信天。竹幽蘭亦靜，列坐得無遷。</p> <p>契事欣群集，諸賢盡在斯。寄懷同古昔，記迹快當時。躁氣今無矣，幽耆老得之。悟言當日永，風詠樂天隨。</p>
4	山陰 俞大猷（乾隆 37 年〔1772〕進士）	乾隆五十八年（1793）	<p>不異山陰會，猶然癸丑年。放懷遊詠地，朗日惠風天。靜得蘭同契，情將歲與遷。興言今視昔，列坐盡群賢。</p> <p>故事崇脩契，欣懷及暮春。臨流僧不倦，隨遇豈無因。集目山林樂，群由少長人。寄情絲又竹，幽抱此時陳。</p>
5	婁東 畢溥（生卒年不詳）	乾隆五十八年（1793）	<p>會當臨丑歲，今昔事相同。竹靜得春氣，蘭清懷古風。詠觴幽興暢，述作大文崇。欣遇時賢盛，遊觀樂未終。</p>
6	秣陵 方正澍（生卒年不詳）	乾隆五十八年（1793）	<p>雖寄人閒迹，能遊世外天。亭林猶昔地，會合又今年。為樂日初永，因時期暫遷。自斯之盛事，群目大夫賢。</p> <p>短述雖無取，諸賢妄聽之。斯懷當自放，萬古以為期。豈有今殊昔，相將竹與絲。臨風陳一曲，或遇至人知。</p> <p>天陰將暮矣，遷坐豈無由。快悟清和品，欣隨管</p>

			<p>樂流。引觴言昔昔，映室竹脩脩。大致齊生死，斯人可與遊。</p> <p>幽蘭陳內外，清詠聽初終。寄靜亭陰坐，稽時歲次同。一生嗟浪迹，九老契清風。所慨當斯會，和弦少惠崇。</p>
7	婁東 沈增（生卒年不詳）	乾隆五十八年（1793）	<p>禊集相將故事脩，娛情觴詠足觀遊。林亭盡日春陰暮，竹靜風清人自幽。</p>
8	錫山 王洽（生卒年不詳）	乾隆五十八年（1793）	<p>永和已陳迹，癸丑同昔年。人樂古無死，水流今亦遷。詠觴欣盛會，敘述仰群賢。此日觀懷抱，斯文信在天。脩禊及今日，興懷盛昔年。山林不終老，情事隨與遷。曲水帶幽室，春風引後賢。因時同俯仰，遇合信由天。放浪今猶是，因人感少年。言隨流水騁，坐聽茂林遷。寄興懷終古，臨文慨昔賢。欣然期後會，同此暮春天。</p>
9	樵李 沈昇柱（生卒年不詳）	乾隆五十八年（1793）	<p>盛會今猶昔，娛情欣在斯。無言感春日，有記及清時。遇合因人契，脩為以歲期。和風引虛室，此地快相隨。俯仰欣所遇，諸賢足取斯。興懷得于己，為樂當及時。浪迹臨流合，幽情與古期。春亭集脩禊，觀化信天隨。</p>
10	陽羨 史雲虬（生卒年不詳）	乾隆五十八年（1793）	<p>大化流無盡，斯遊迹已陳。快當風詠會，猶是昔年春。蘭氣靜臨水，竹陰清及人。取懷期自足，悲樂亦相因。又。寄記或有在，興懷亦取諸，林亭觀靜趣。水竹映清虛，迹已隨時合。春猶及暮初，欣然事觴詠。覓此一相於。</p>
11	廣川 莫允宣（乾隆 43 年〔1778〕進士）	乾隆五十八年（1793）	<p>在昔蘭亭禊，山陰快集賢。茂林脩竹地。朗日惠風天，左右娛觴詠。情懷舍管弦，浪遊及斯會，癸丑又今年。記迹春將暮，興懷樂有群。信脩同此歲，俯仰感斯文。盛事今相與，幽情向所欣。一觴能自足，喻得古人之。世事無殊異，林亭契所知。放懷終古外，流攬暮春時。坐有清風引，遊當永日隨。蘭言故相合，靜室可為期。覓快得于己，不知迹是陳。崇山欣映室，曲水暢流春。遇日期無盡，臨文喻後因。視今猶視昔，一為敘時人。</p>
12	梁溪 顧鯤（生卒年不詳）	乾隆五十八年（1793）	<p>癸丑暮春日，樂遊今昔同。觀察斯文長，虛懷契惠風。列坐一室閒，遊目宇宙外。山氣足清幽，林陰時映帶。幽人氣若蘭，盡日風在竹。諸賢或惠然，一觴又一曲。興感既無盡，盛會當有由。</p>

			欣言永和和人，亦同此樂不。
13	津門 程大中（乾隆 22 年〔1757〕進士）	乾隆五十八年（1793）	此會之修禊，稽年癸丑同。林亭欣永日，少長樂春風。水帶流觴曲，山當列坐崇。遊情天地外，觀化悟初終。蘭氣今同昔，春風感少年。人猶流水集，事及歲時遷。有抱懷初地，無言向暮天。斯遊仰觀察，清興引群賢。
14	秣陵 周斯才（生卒年不詳）	乾隆五十八年（1793）	蘭亭修禊，永和之九。今此盛會，歲敘一丑。既有峻嶺，亦有修林。群賢畢集，無殊山陰。和風其惠，流水其清。仰觀俯察，今古同情。世既之異，事亦終古。懷抱既託，斯文相與。大化無盡，彭殤同情。悟言脩短，樂觀無生。形骸可放，興感相於。及此不樂，時日其虛。古人為昔，觴詠在今。同遊作述，盛地猶臨。靜躁趣舍，一視其人。後之觀者，咸喻暮春。
15	吳門 陳鏗（生卒年不詳）	乾隆五十八年（1793）	竹放清陰蘭已崇，春亭暢敘快和風。欣將時事稽于古，也有臨流日不同。
16	金沙 于鈐（生卒年不詳）	乾隆五十八年（1793）	盛會人文集，風流契昔賢。述懷觴引暢，騁目坐為遷。幽領抱春氣，清湍流暮天。所欣山水樂，攬取自今年。 春風欣列坐，群仰大夫賢。蘭竹欣其茂，歲時慨又遷。樂遊因得地，暨合亦由天。相契及今日，臨流若昔年。
17	婁東 王思濟（生卒年不詳）	乾隆五十八年（1793）	觀察足清抱，年年禊會脩。諸賢今極盛，斯地昔僧遊。坐列山林靜，亭臨水竹幽。同娛春日永，欣遇豈無由。 作者畢能事，風流暢一時。猶然觴與詠，不在竹和絲。觀化得幽契，言懷及後期。記情形迹外，此樂少人知。
18	吳門 陸模孫（乾隆 12 年〔1787〕進士）	乾隆五十八年（1793）	觴詠亭林契昔賢，臨風極目每欣然。觀山聽水娛今日，感事懷人又一年。坐引清幽因有竹，言隨興致合無弦。斯遊不異當時盛，歲次相同迹未遷。 作述興懷與古遊，大夫為樂集清流。隨時每感春將老，得地猶期事可脩。蘭茂室同山氣靜，竹虛亭帶水風幽。因嗟後會殊今昔，寄慨臨觴不自由。
19	吳門 張琦（生卒年不詳）	乾隆五十八年（1793）	盛會日初永，風流迹為陳。山亭得古趣，竹舍帶長春。靜契無生故，期脩不死因。此懷咸未喻，

			流浪慨斯人。
20	吳門 畢蘭慶（生卒年不詳）	乾隆五十八年（1793）	盛會集群賢，遊觀俯仰遷。雖殊曲水敘，若合永和年。列坐陳觴詠，幽懷舍管絃。時清人自樂，流攬及春天。
21	吳門 畢高珠（1785-?）	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少相隨樂事崇，春觴暢敘坐當風。于今不異山陰盛，歲次人文一一同。 七言
22	吳江 史善長（生卒年不詳）	乾隆五十八年（1793）	春流曲抱，翫陳觴合坐，向時亭右。稷集不因今昔異，況是癸年臨丑。靜記山林，賢懷觀察，信矣人文茂。清和天氣，此閒欣感隨取。 暢引世外幽娛，同群盛事，永日蘭風後。激竹悲絲殊未倦，朗詠悟齊諸有。自以虛生，猶然浪迹，得一嗟知九。樂遊之暮，寄言斯會能文。（調寄百字令）
23	吳江 顧蔡（生卒年不詳）	乾隆五十八年（1793）	竹林脩盛事，靜寄樂其天。觴詠觀幽抱，風期契昔賢。當春娛永日，隨遇感流年。時地雖殊異，臨文每慨然。 詠懷有知己，記迹在山林。天宇不殊昔，風流得至今。崇蘭欣契合，幽竹帶清陰。文會同人集，相於稷日臨。
24	婁東 王慶孫（乾隆3年〔1798〕進士）	乾隆五十八年（1793）	昔人盛事今人有，地不山陰年癸丑。于此會群賢，和風引管弦。時之春日暮，懷抱欣然遇。知己暢幽情，悟言蘭室清。（其一） 曲水流觴隨寄託，天清氣朗欣氣若。視聽亦之幽，相將稷事脩。蘭言知不異，遊目當其地。今古一于斯，臨風暢所之。（其二） 脩竹幽蘭齊暢茂，清流在左山當右。不盡古今觴，清閒引興長。風和春在抱，感慨春將老。隨遇得其天，因觀萬化遷。（其三） 世殊事異隨遷矣，古人寄慨因流水。俯仰及時娛，興懷有是夫。長言同短引，列敘終無盡。少長會斯文，風流信不群。（其四）（調寄菩薩蠻）
25	梁溪 孫爾齡（生卒年不詳）	乾隆五十八年（1793）	不是山陰脩稷事，會當癸丑暮春時。林幽日永同陳迹，蘭靜風清與古期。列坐群賢欣可矣，臨流自昔慨于斯。一觴一詠終無盡，放浪形骸寄所之。
26	吳門 張問簪（生卒年不詳）	乾隆五十八年（1793）	猶然癸歲春將暮，又是風清氣朗時。此日能無觴亦詠，當年不取竹和絲。山因騁目情同寄，亭可臨流迹自隨。每得大賢為敘述，古今盛事若相

			<p>期。</p> <p>坐次在人隨老少，林亭快攬足時賢，可知清抱同蘭者，又得虛懷若竹然。地合盛流脩盛集。時方春水映春天。臨風不有觀遊作，娛樂將因歲敘遷。</p>
27	秣陵 嚴觀（生卒年不詳）	乾隆五十八年（1793）	<p>為有斯文在，清流盛所崇。每因今日集，大得昔人風。山靜林於茂，地幽蘭若同。和弦臨水次，古曲聽初終。</p> <p>靜向春山坐，情隨歲敘遷。放懷臨樂地，虛抱仰時賢。文會暢終日。清娛及暮天，咸將幽興記，風詠合當年。</p>
28	吳門 張挺（生卒年不詳）	乾隆五十八年（1793）	<p>昔賢盛文會，風流今在斯。歲次亦之癸，所異遷其期。清言娛永日，可無竹與絲。放情山水閒，樂哉信及時。</p>
29	吳門 顧張思（生卒年不詳）	乾隆五十八年（1793）	<p>在昔遊稽山，流觀靜娛目。脩亭茂崇蘭，合坐帶幽竹。時敘一以遷，有懷記水曲。大夫述古人，文會無虛歲。引觴合諸賢，攬懷得清氣。為樂及少年，臨風慨異地。寄言作者林，斯詠可錄未。</p>
30	樵李 吳文溥（生卒年不詳）	乾隆五十八年（1793）	<p>寄形在宇內，隨遇得所欣。當春暢萬類，清詠契同群。</p> <p>幽懷知若蘭，虛抱靜于竹。大化自無為，至樂在知足。</p> <p>臨觴興未已，老至常慨然。相與永今日，為樂及少年。</p> <p>流攬天地閒，放情山水外。風日固無殊，古今同此會。</p>
31	津門 王昭（生卒年不詳）	乾隆五十八年（1793）	<p>契事今猶昔，放懷初與終。況當人地盛，又遇歲時同。遊覽未之暮，靜觀得所崇。欣欣隨大化，俯仰契春風。</p> <p>盛迹懷觴詠，春風又一年。觀山情有寄，臨水坐因遷。竹室敘幽抱，蘭亭攬昔賢。群言述無作，集古合天然。</p> <p>相與次幽詠，流風竹引絲。斯文無異也，興感信同之。幽趣靜時得，虛懷悟後知。一言足聽取，歲歲以為期。</p> <p>故故與人事，欣欣作浪遊。形骸稽異地，年歲感春流。有喻知隨遇，相期在信脩。言將及今日，娛樂豈無由。</p>

	32 鮑邱 劉錫嘏 (1745-?)	乾隆五十八年 (1793)	<p>又是稽山會，之同癸丑春。引觴欣此日，臨水悟初因。豈以遊將倦，斯之迹未陳。今年知盛集，敘坐得風人。(列坐諸賢多前兩次未及與者)</p> <p>寄暢遊初地，興懷記昔賢。猶然永和歲，及此暮春天。感極嘗觀化，情幽或聽弦。蘭言自欣快，俯仰述當年。(與蘊山〔楊摺字〕別九年矣)</p> <p>昔日同今日，春遊又一時。放懷山與水，得趣竹將絲。地以情遷矣，年嗟老及之。欣然此亭古，歲歲樂于斯。</p> <p>此會豈嘗有，無言歲不同。林陰帶湍水，竹外坐清風。攬古脩春楔，能文錄惠崇。(詩僧鐵舟上年坐中客也，今在西冷。)雖然盛絲管，聽取曲將終。(時將北上，明年此會後來者，當有感於斯文。)</p>
	33 鮑邱 劉瀛 (生卒年不詳)	乾隆五十八年 (1793)	<p>盛事今猶癸丑歲，風流豈異永和年。管弦相與欣斯會，懷抱終期記昔賢。娛目每臨脩楔地，寄情嘗及暮春天。蘭亭僧述當時興，此集因之信快然。</p> <p>人生騁興雖無己，陳迹於斯又一年。竹引清風懷樂事，山臨曲水集群賢。遊觀有記嘗隨地，會合相因或信天。極目娛情殊未倦，況當觴詠自欣然。</p>
	34 鮑邱 劉灝 (生卒年不詳)	乾隆五十八年 (1793)	<p>向日僧遊地，興懷又暮春。無殊癸丑歲，又集永和人。風詠情猶昔，山林迹為陳。所欣遇諸老，記契有蘭因。</p> <p>為有山亭古，遊觀亦快然。清陰帶脩竹，流水激幽弦。是日春風靜，因懷歲事遷。引觴能不倦，興詠次群賢。</p>
	35 真州 夏之勳 (生卒年不詳)	乾隆五十八年 (1793)	<p>豈信蘭亭迹未遷，盛陳觴詠暮春天。不因此地得幽趣，為仰斯文引後賢。時敘欣同癸丑歲，風流猶及永和年。也知古曲無能和，會向山林聽管弦。</p> <p>每因盛會記幽抱，況有時流品地崇。情事不由今日異，風懷當與古人同。臨觴水次天將暮，品竹亭陰曲未終。期與諸賢錄諸作，欣然一室坐春風。</p>
拖尾題字	陳崇本 (乾隆 40 年 (1775) 進士)	嘉慶二年 (1797) 畢	<p>涼秋一雨牕無塵，橫圖卻展思暮春。春風吹向借園裏，脩竹牆根護流水。興來何地無山陰，觴詠</p>

			<p>沅過世後³ 群賢會於此。王翁七十紛文藻，畢家英物桓靈寶。(秋帆尚書哲嗣嵩珠，九齡能詩，亦與斯會。)作畫人多山水心，分題字集蘭亭草。我來鄂渚非癸年，開圖俯仰追昔緣。詩才滅盡天衣縫，書格裁將絹本篇。(圖中題句，皆以重摹《穎上蘭亭》字，剪綴成之。「穎上刻」，乃唐臨絹本也。)亦知光景奔輪速，誰滌塵襟漢江綠。名士搏沙聚散多，尚書墳草徑秋宿。春明門外踏春頻，訪藥豐臺醉幾巡。先生星鬢今何似，老我蓬萊後到人。純齋老前輩屬題，即求雅教，侍陳崇本初稿。</p>
--	--	--	--

(感謝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柯輝煌協助表格製作。)

³ 因陳跋中有「尚書墳草徑秋宿」句，知此跋題於畢沅過世之後。



圖 版



圖 I-1 明，趙原初，《蘭亭圖卷》，部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I-2 明，張宏，《蘭亭圖卷》，部分，1616年，北京，中國首都博物館藏。



圖 I-3 明，吳彬，《勺園袞襖圖》，部分，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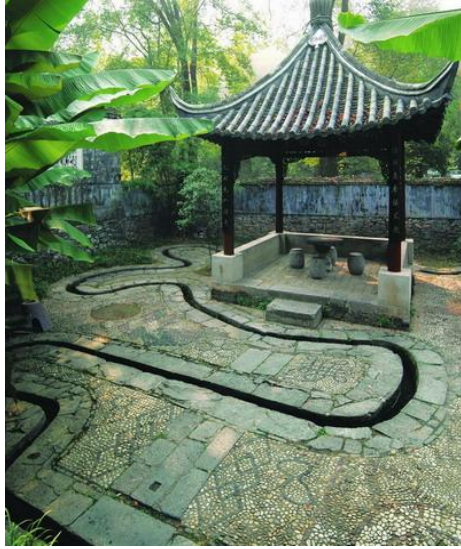


圖 II-1 1603 年安徽滁州知府盧洪夏建「意在亭」，已經多次整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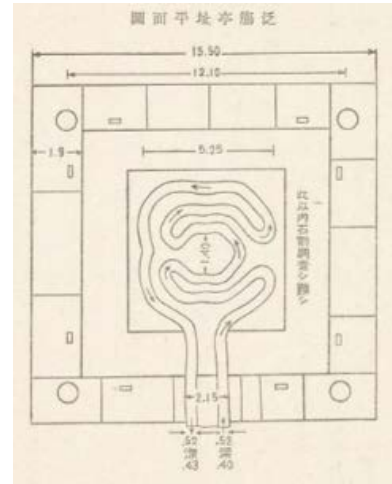


圖 II-2 宋，崇福宮之「泛觴亭」遺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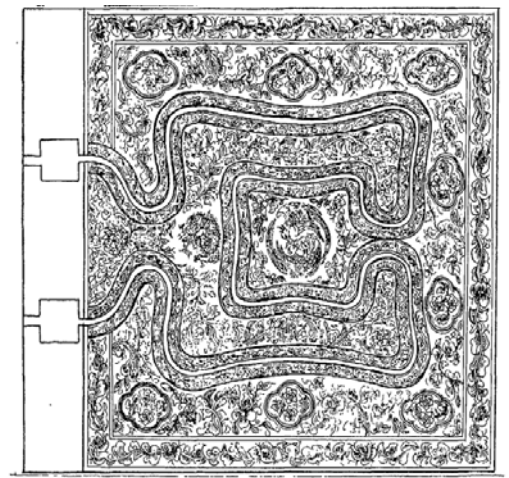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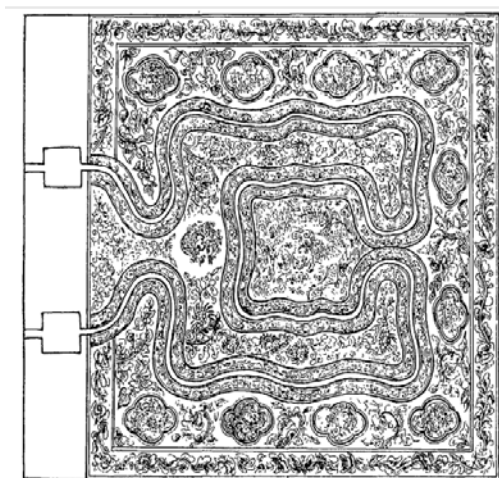


圖 II-3 宋，《營造法式》之「國字流杯渠」(左)與「風字流杯渠」(右)。



圖 II-4 明，《明拓明益王重刻大蘭亭圖卷》拓本，「王羲之」部分，1592 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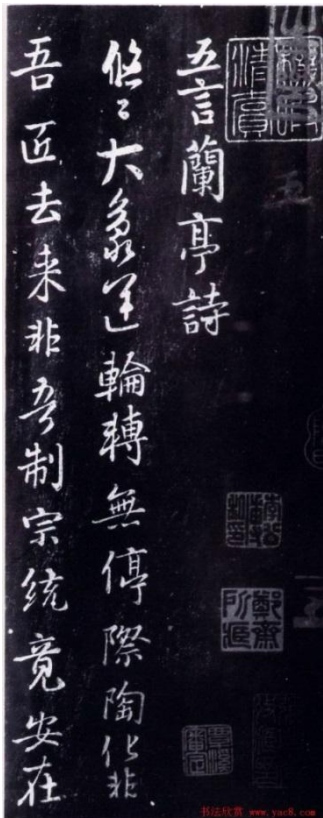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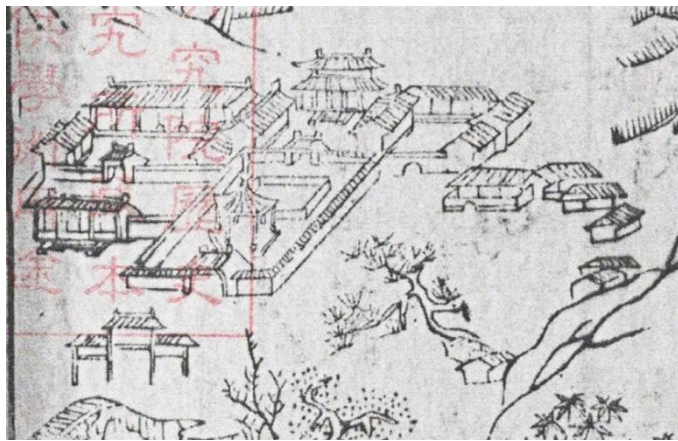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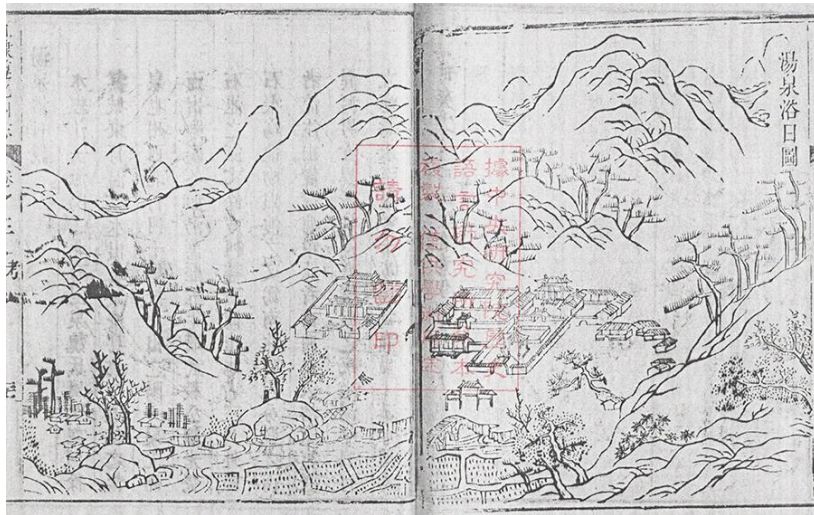
圖 II-5 宋，游似本《五言蘭亭詩》，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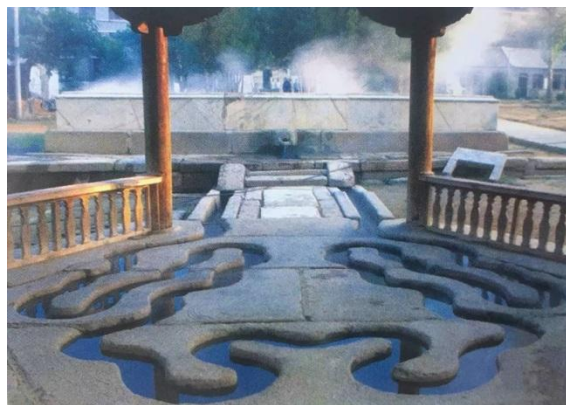
圖 II-6 明，《明拓明益王重刻大蘭亭圖卷》拓本，「庾蘊」部分。



圖 II-7 明，《明拓明益王重刻大蘭亭圖卷》拓本，「亭」部分。



圖III-1 清，《(乾隆)直隸遵化州志》中之「湯泉浴日圖」，1794年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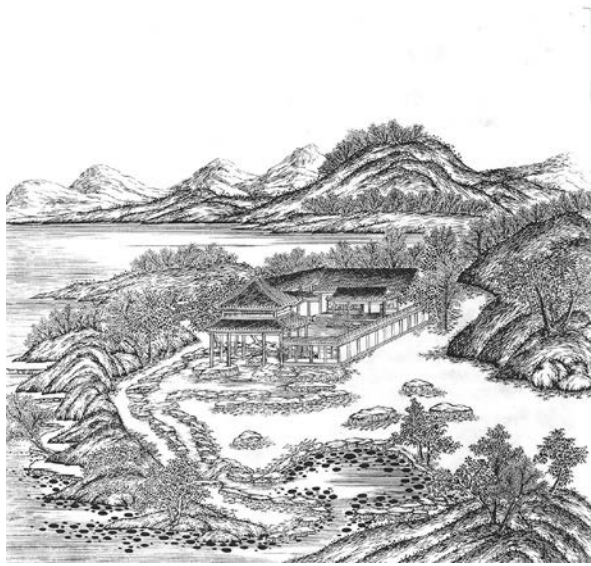
圖III-2 遵化湯泉，流杯亭。



圖Ⅲ-3 清，麟慶，《鴻雪因緣圖記》，第一集，〈二廂修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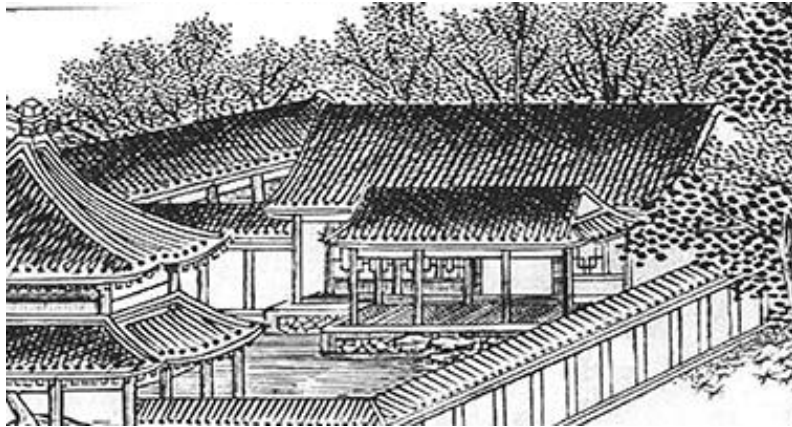
圖Ⅲ-4 清，西苑，「曲澗浮花」流杯亭（上圖額：「流水音」）。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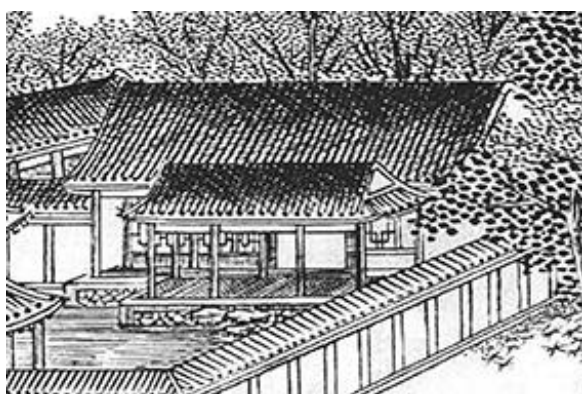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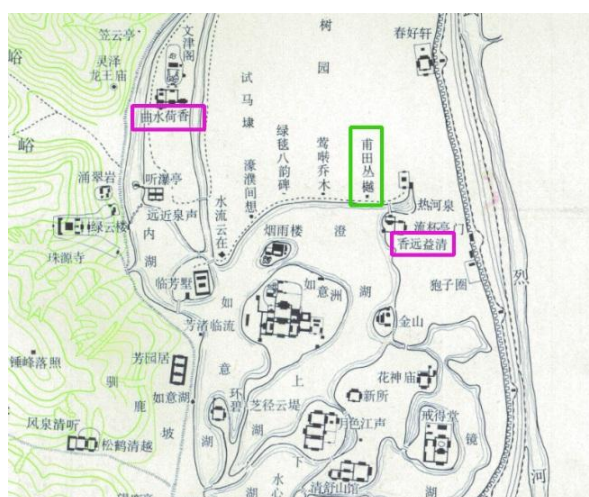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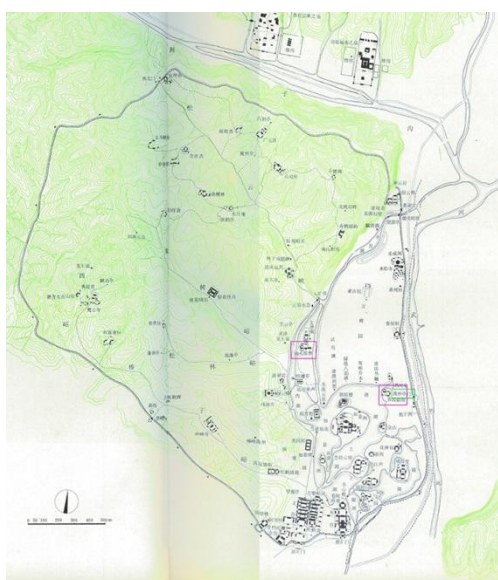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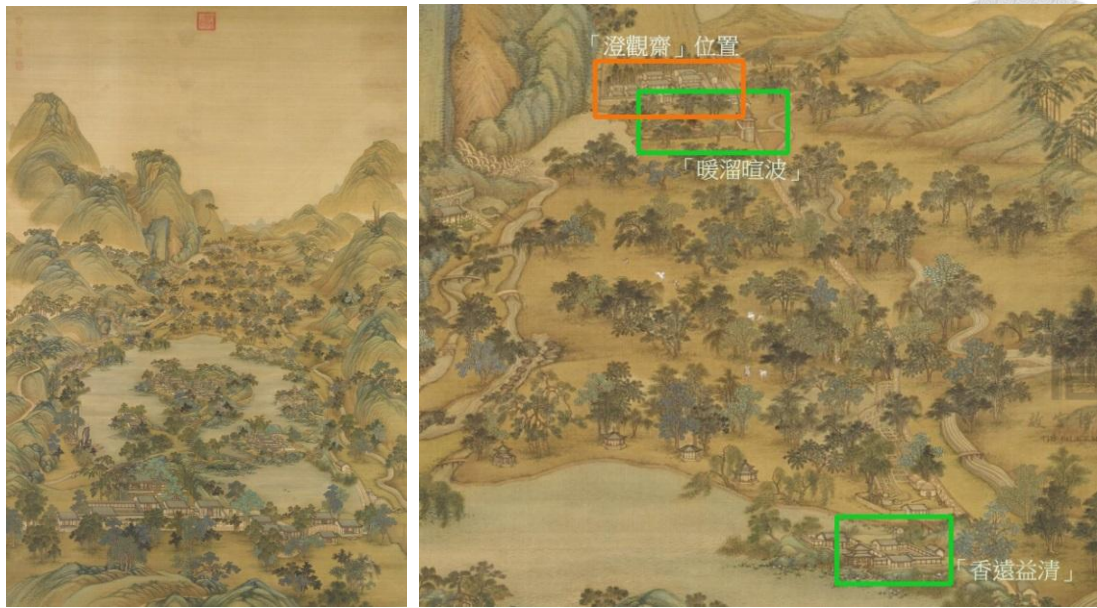
圖III-5 清聖祖撰，沈喻繪圖，馬國賢製圖，《御製避暑山莊詩（並圖）》第十五景「曲水荷香」，1713年。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康熙年間武英殿刊朱墨套印本，銅版畫。



圖III-6 清聖祖撰，沈喻繪圖，馬國賢製圖，《御製避暑山莊詩（並圖）》第二十三景「香遠益清」，171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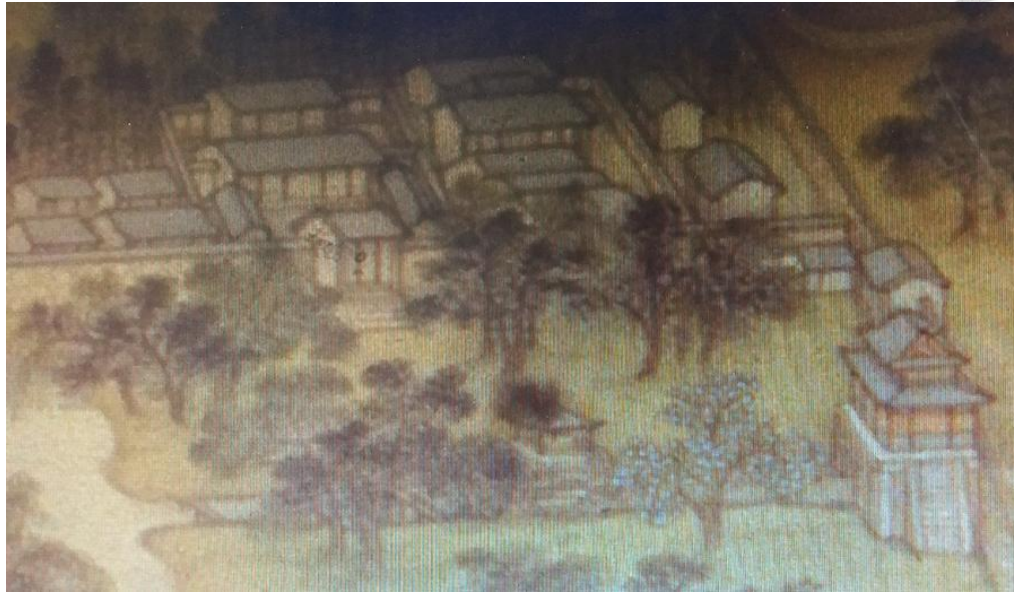
圖III-7 「乾隆時期避暑山莊與外八廟平面圖」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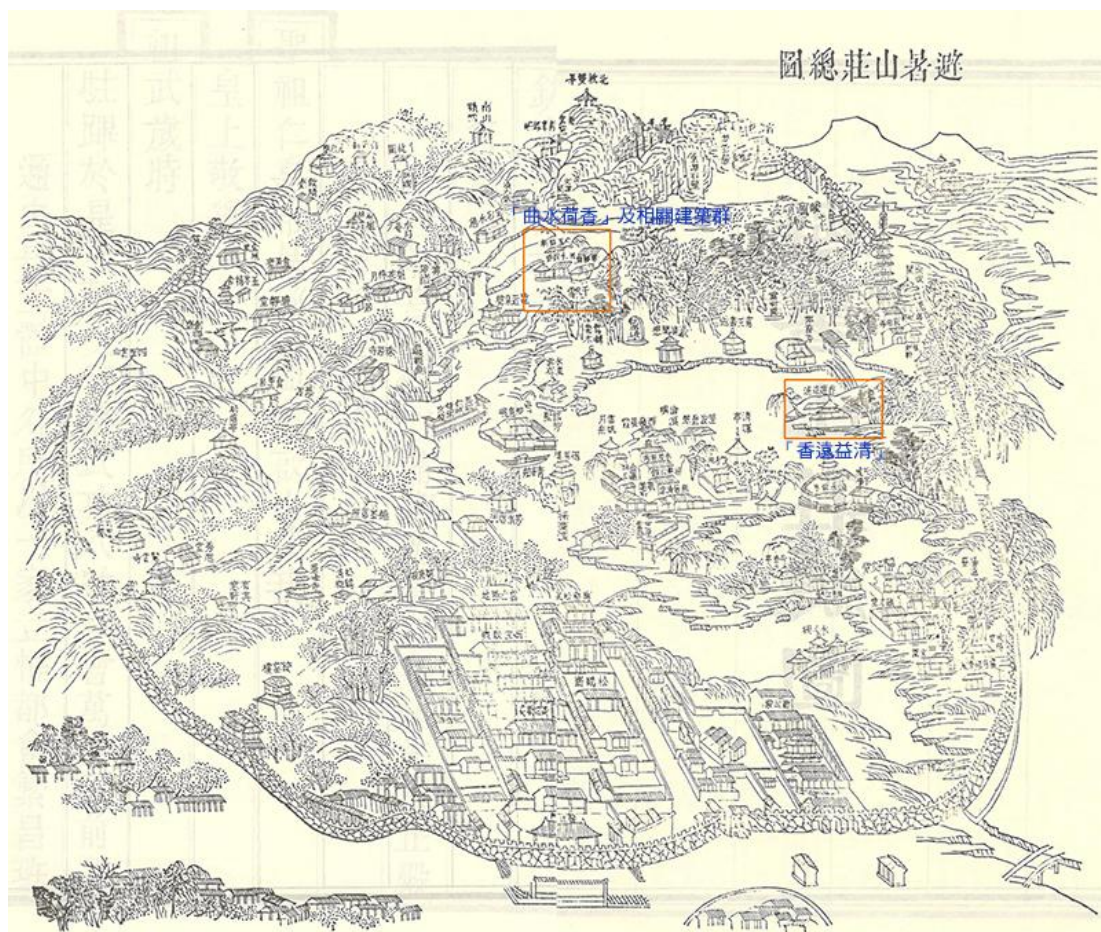
圖Ⅲ-8 清，冷枚，《熱河行宮圖》（又名《避暑山莊圖》），約 1708-1711 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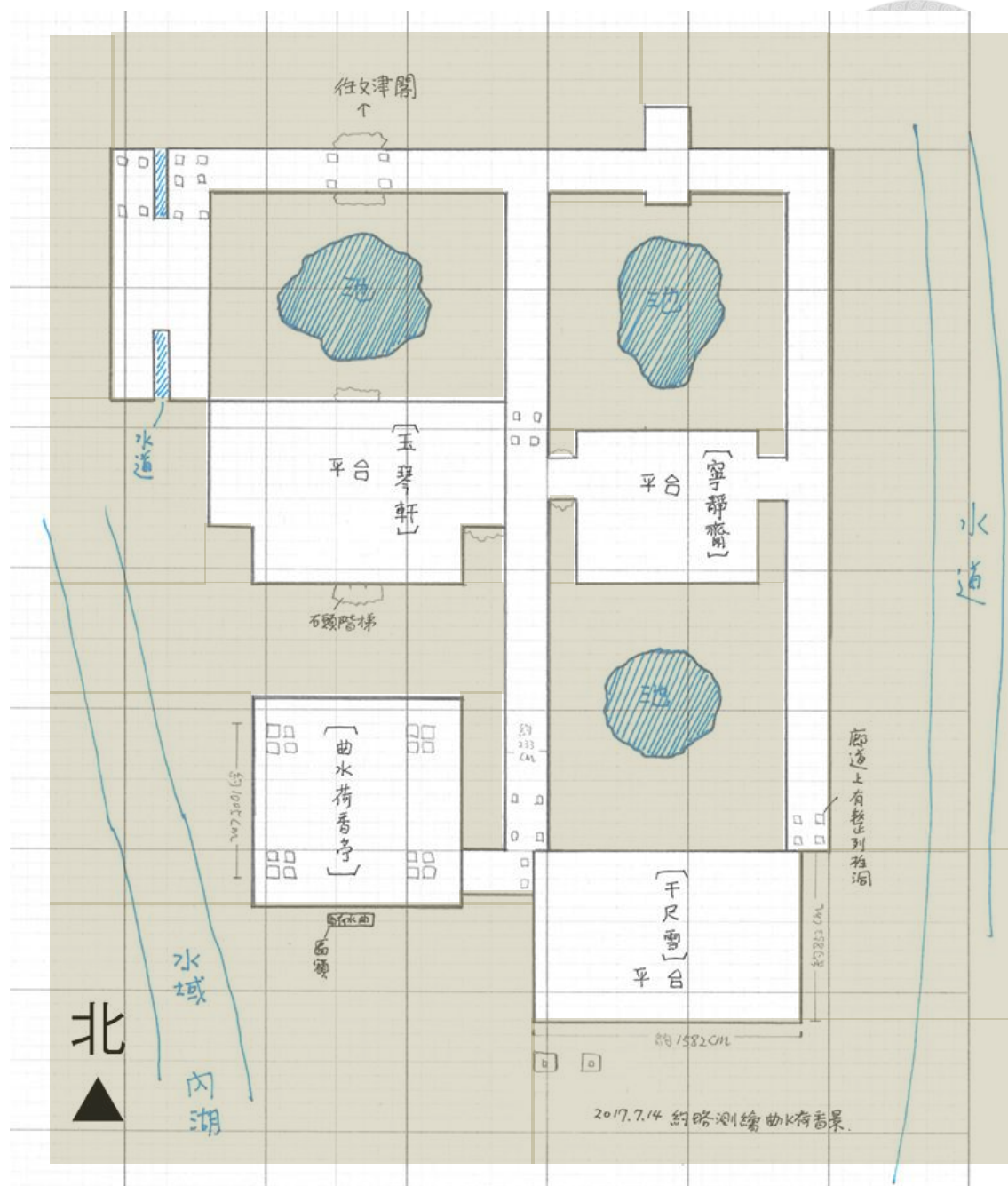
圖Ⅲ-9 清，冷枚，《熱河行宮圖》，局部，「香遠益清」。



圖III-10 清，冷枚，《熱河行宮圖》，局部，「澄觀齋」與「暖溜喧波」。



圖III-11 清，和珅等纂，《欽定熱河志》之〈避暑山莊總圖〉，乾隆四十六年（1781）武英殿刊本。



圖III-12 「曲水荷香」景區建築群示意。「曲水荷香亭」，約 1005×1005 公分。2017 年 7 月 14 日筆者約略測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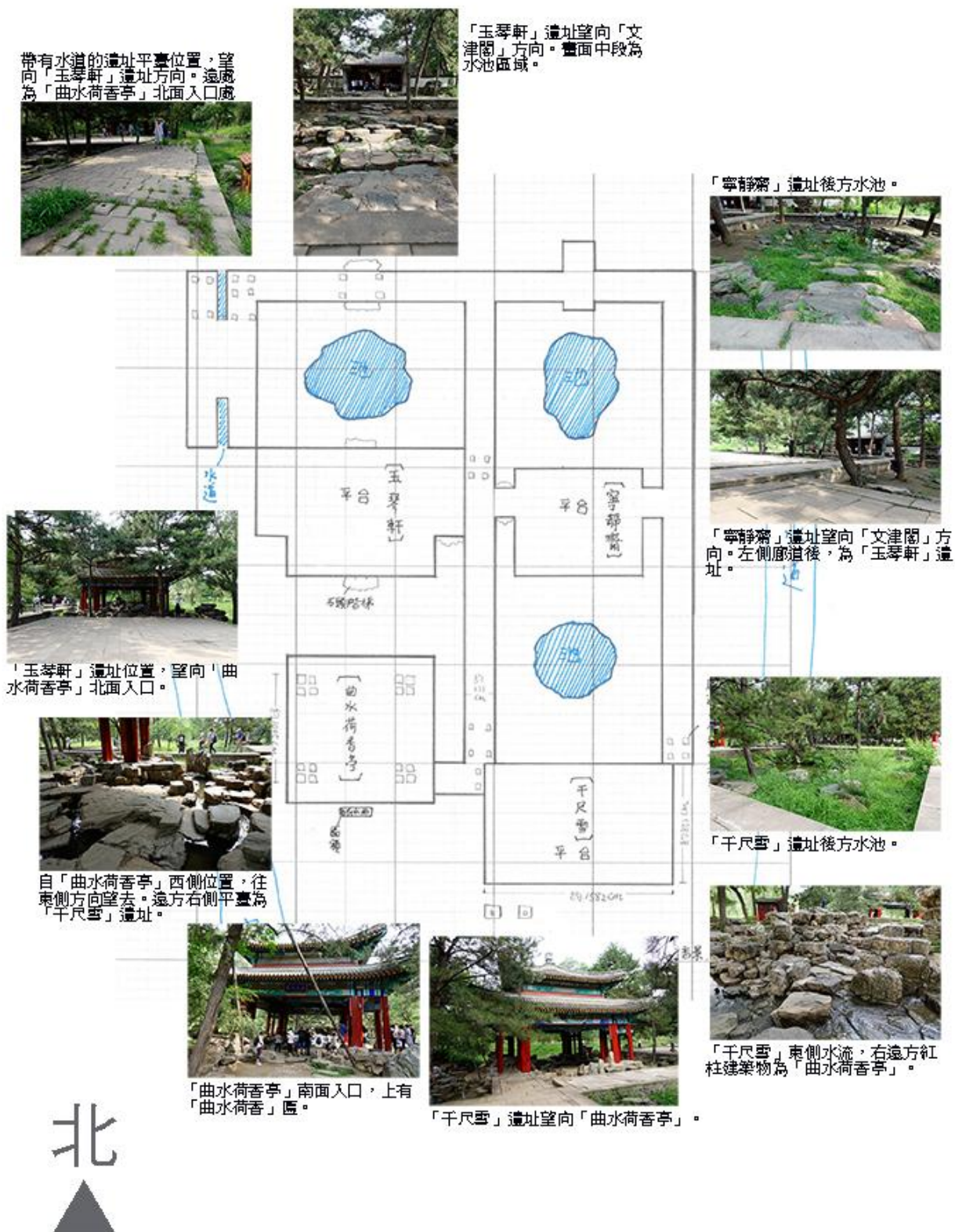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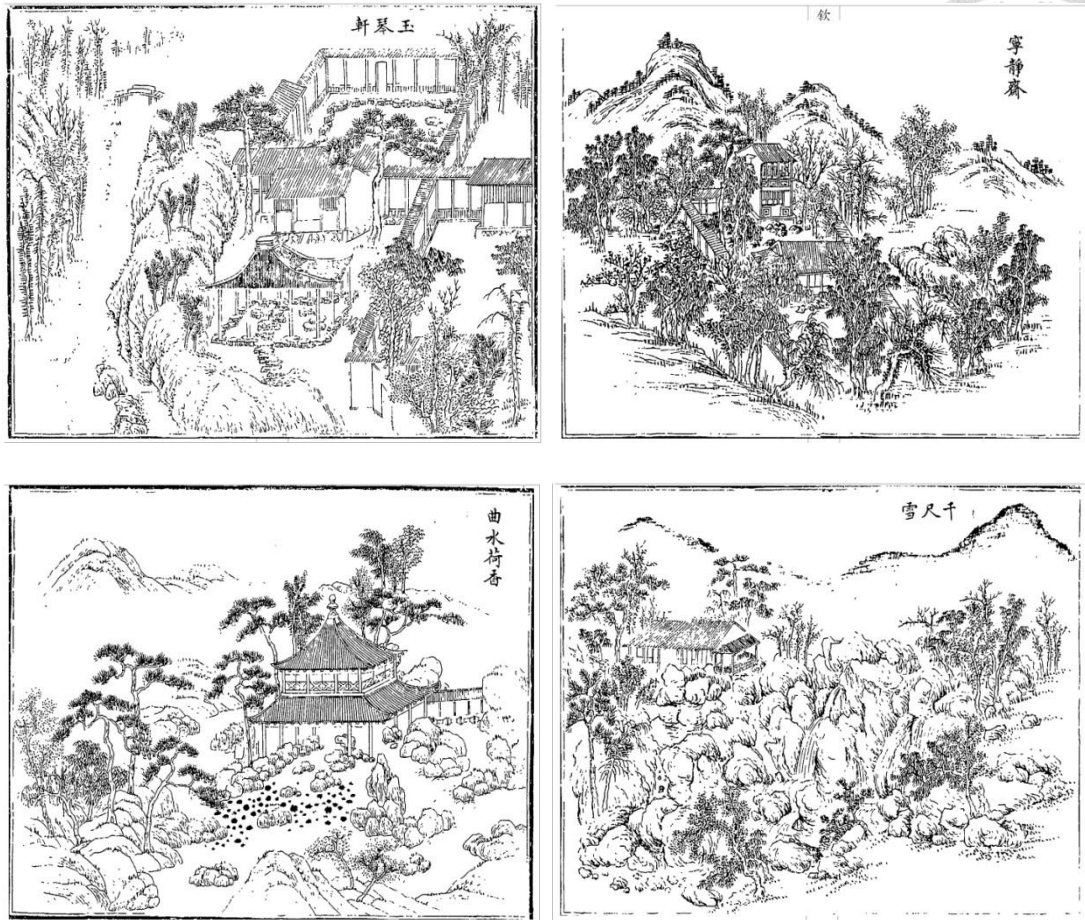


圖 III-13 「曲水荷香」景區建築群示意及今日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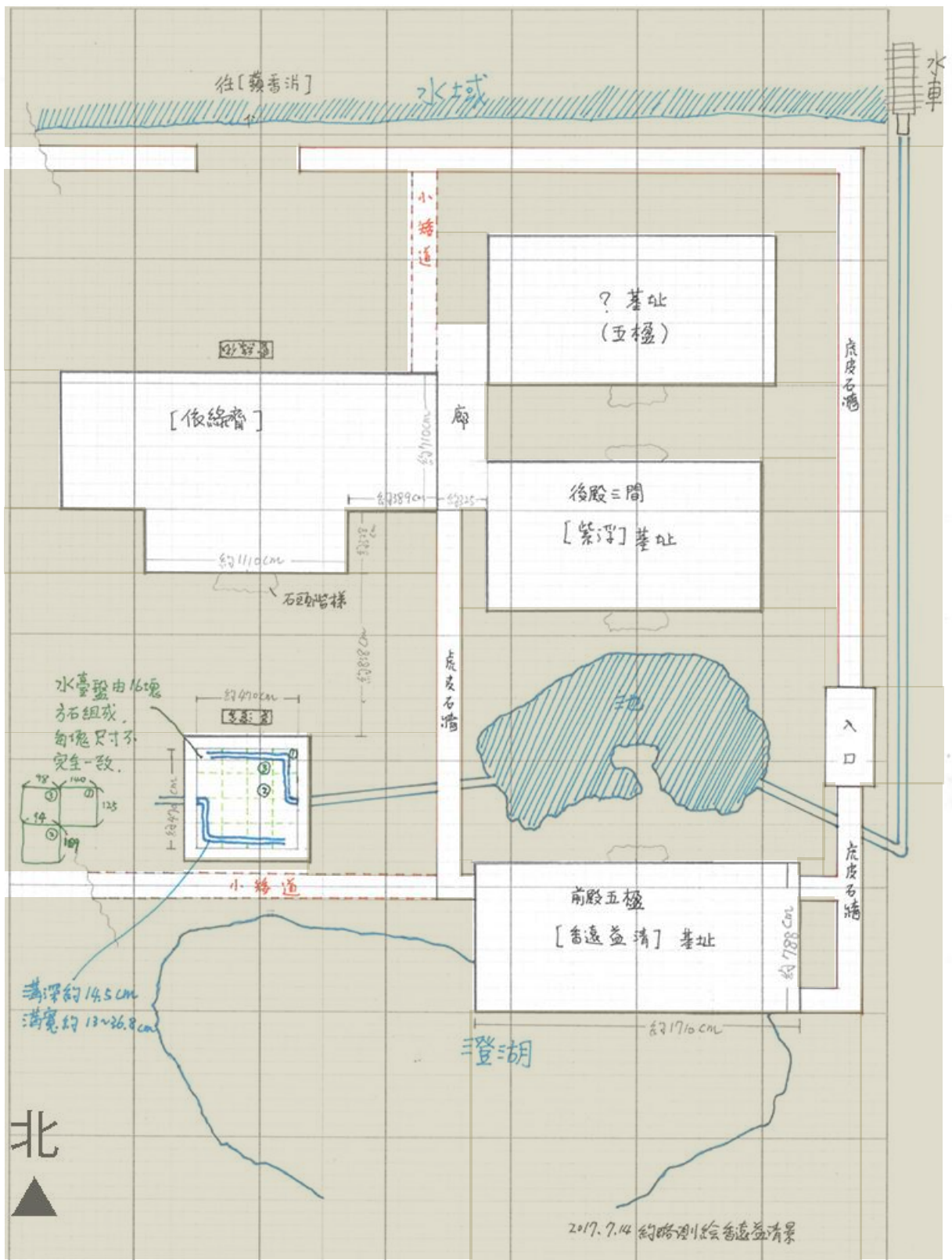
圖Ⅲ-14 清，和珅等纂，《欽定熱河志》之「曲水荷香」，乾隆四十六年（1781）武英殿刊本。



圖III-15 清，和坤等纂，《欽定熱河志》之「曲水荷香」、「玉琴軒」、「寧靜齋」、「千尺雪」四頁，乾隆四十九年（1784）《欽定四庫全書》版。



圖III-16 清，錢維城，《熱河千尺雪圖卷》，1753年，承德，避暑山莊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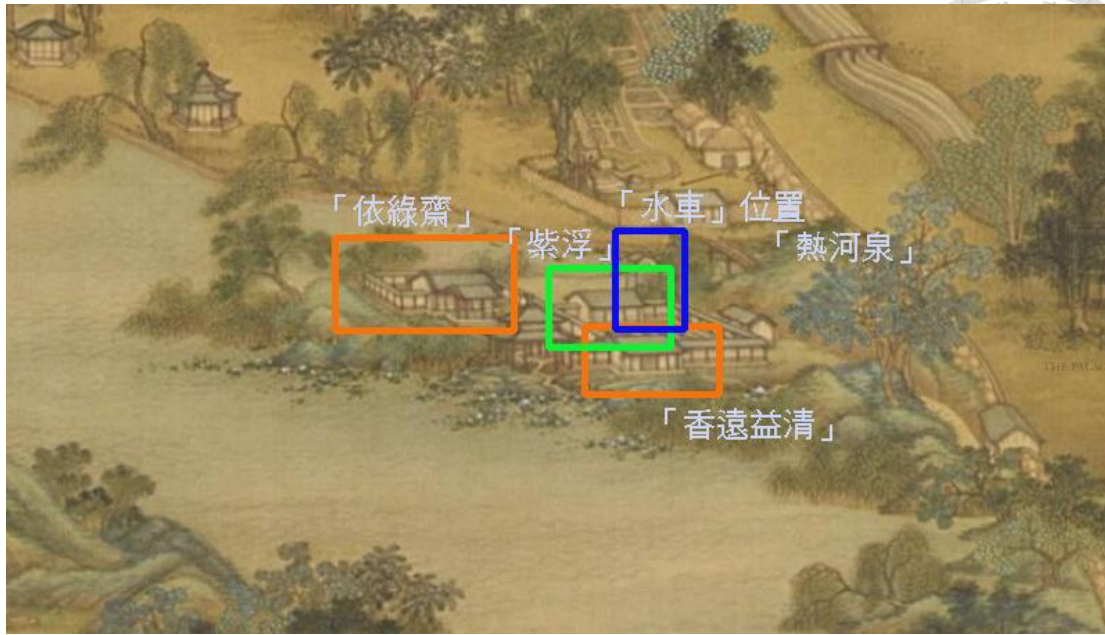


圖III-17 「香遠益清」景區建築群示意。「香遠益清亭」，約470×470公分。2017年7月14日筆者約略測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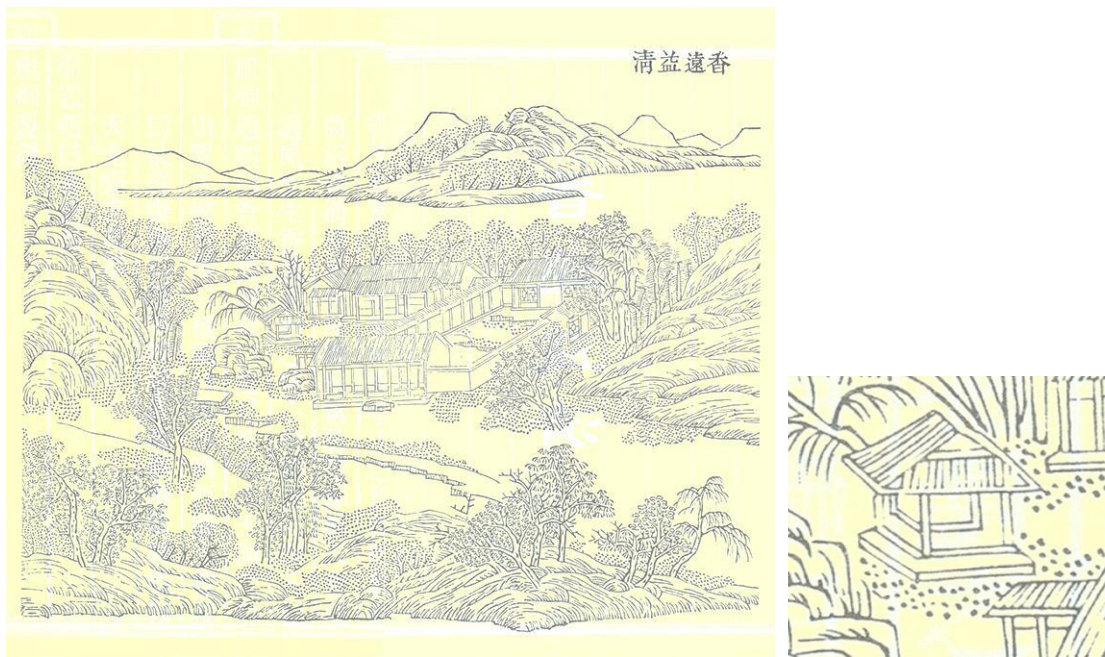


圖III-18 「香遠益清」景區建築群示意及今日景觀。

- 1) 入口右側望向「含澄景」流杯亭。
- 2) 虎皮石城牆外，通往水車之水道。
- 3) 水車望向「依綠齋」，中景為不知名五楹基址。
- 4) 「蘋香汜」望向水車方向。
- 5) 「依綠齋」前入口望向不知名五楹基址，右側為「紫浮」基址。
- 6) 「依綠齋」望向「含澄景」流杯亭。
- 7) 「依綠齋」北面入口全景。
- 8) 「依綠齋」南面。
- 9) 「依綠齋」南面望向「含澄景」流杯亭。
- 10) 「含澄景」中之水道，由西面望向東面。



圖Ⅲ-19 清，冷枚，《熱河行宮圖》，局部，「香遠益清」景區標示。



圖Ⅲ-20 清，和珅等纂，《欽定熱河志》之「香遠益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武英殿刊本。



圖Ⅲ-21 「含澄景」亭之水臺盤，由西面望向東面。



→「引流疊石為盤曲之勢」之處

圖Ⅲ-22 清，高晉等編撰，《欽定南巡盛典》，卷 102，「曲院風荷」，局部，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刊本。



圖III-23 清，姚文瀚，《紫光閣賜宴圖卷》，部分，1761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III-24A 清，王致誠、郎世寧等，《萬樹園賜宴圖》，1755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III-24B 清，王致誠、郎世寧等，《萬樹園賜宴圖》，「三車凌」同列十五人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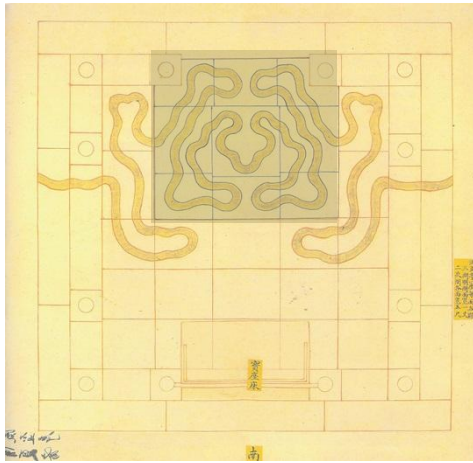
圖III-24C 清，王致誠、郎世寧等，《萬樹園賜宴圖》，「三車凌」局部（右：車凌親王；中：車凌烏巴什郡王；左：車凌孟克貝勒）局部。



圖Ⅲ-25 清，沈源、唐岱，《圓明園四十景圖詠》之「坐石臨流」，1744年，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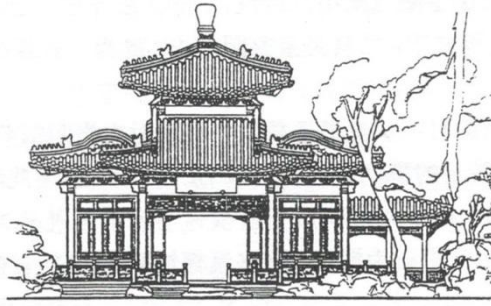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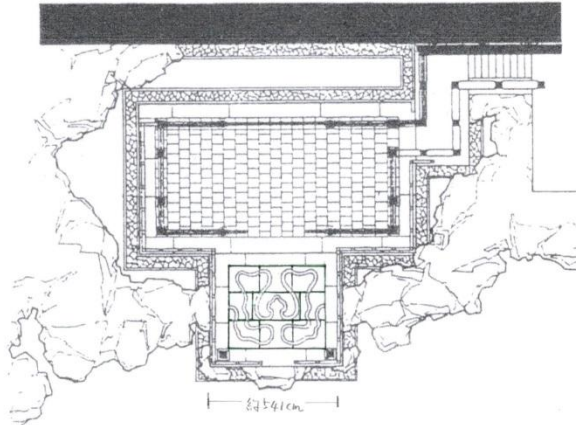
圖III-26 A) 綺春園清夏齋之「寄情咸暢亭」水臺盤，366×320公分，高32公分。B)「寄情咸暢亭」平面圖，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樣式雷排架101-009圖。灰色框起處（有黑線繪製的痕跡），應為舊有面積。



圖III-27 寧壽宮，「楔賞亭」及石渠水道。東面入口約541公分。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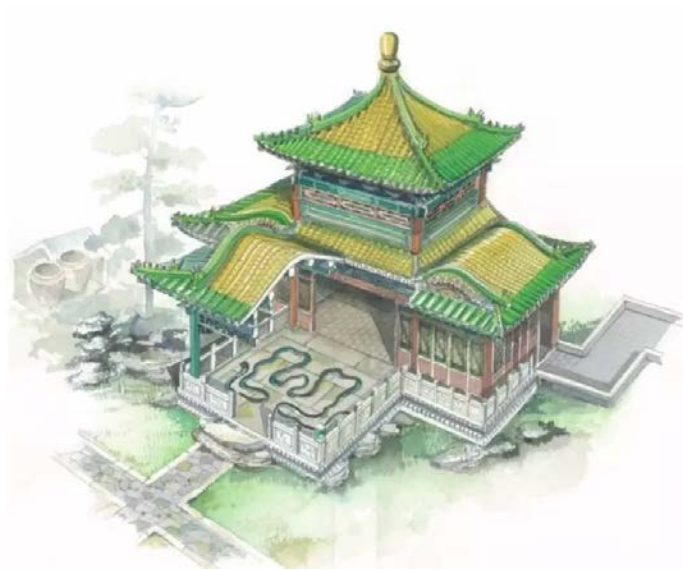
B

圖Ⅲ-28 「楔賞亭」東立面、平面圖。



最左側被遮住的屏欄

圖Ⅲ-29 「楔賞亭」東立面入口踏石、屏欄。



圖Ⅲ-30 李乾朗繪，「楔賞亭」水臺盤及左側假山中之水缸。



圖Ⅲ-31 「楔賞亭」明間中之黑漆雲龍屏門。



圖Ⅲ-32 「楔賞亭」根雕家具三件，單人座椅 105×74×60 公分，臥床 115×237×152 公分。



圖Ⅲ-33 清，郎世寧等，《乾隆帝歲朝圖》，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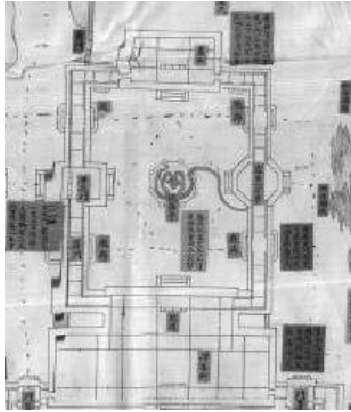
圖Ⅲ-34 寧壽宮「頤和軒」東牆上方，木刻乾隆御書《開感論》，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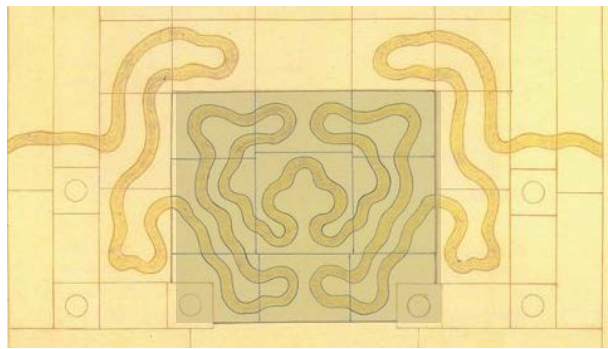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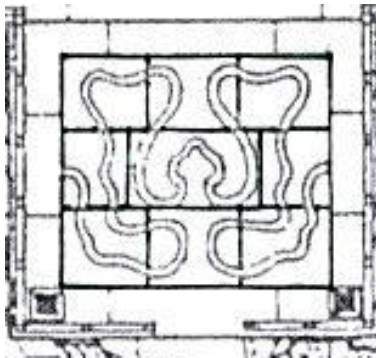
圖III-35 清，《鴻雪因緣圖記》第三集之〈猗玗流觴〉，由北往南望。



圖III-36 潭柘寺「猗玗亭」，由南往北望。約 340×300 公分。A) 圖階梯上方香爐後之屋舍內，有一「乾隆寶座」，但此應為後人所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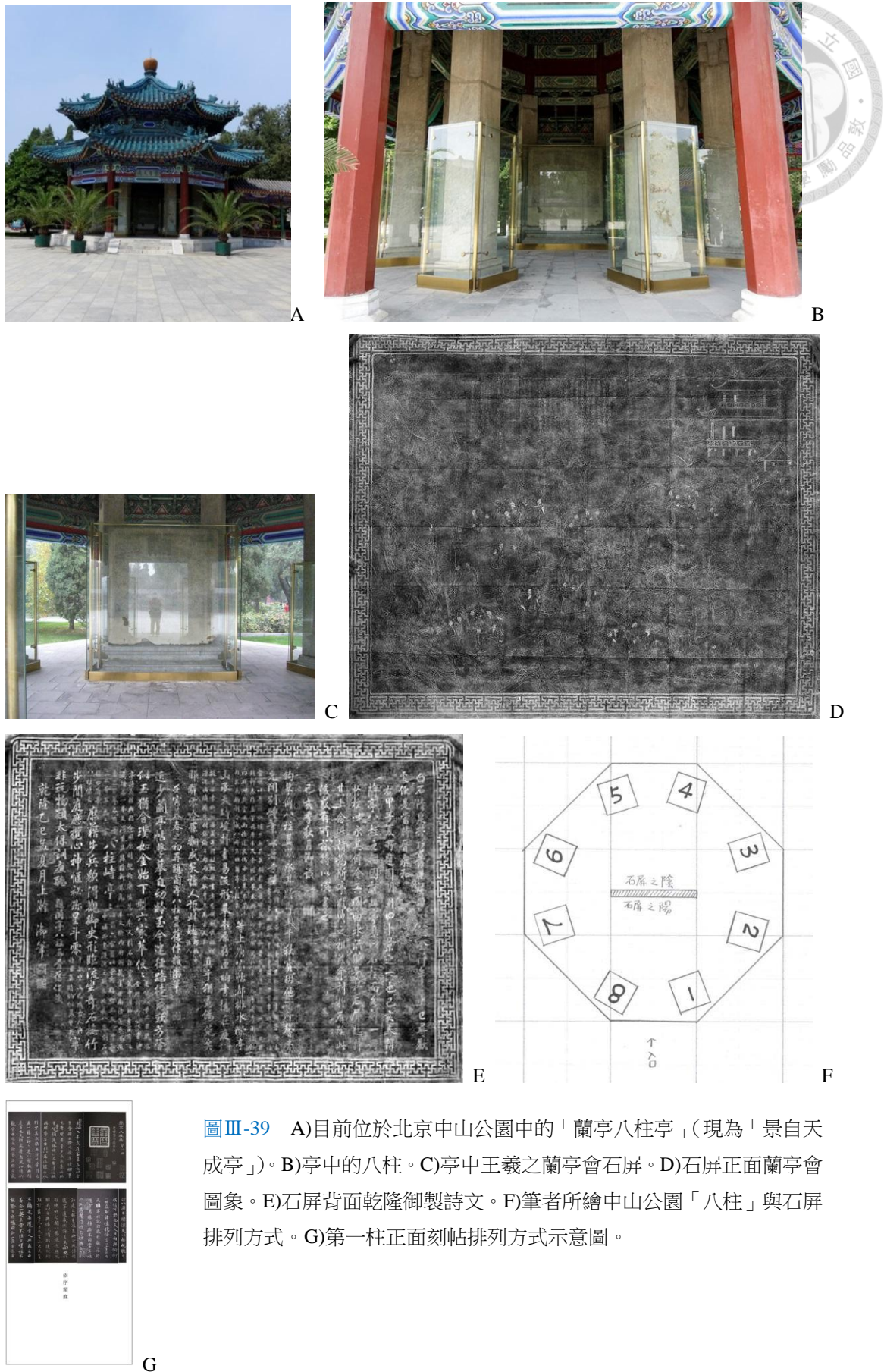
圖III-37 靜宜園中宮圖樣，局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輿 343-0646，「靜宜園內中宮各殿座遊廊圖樣」。



A

B

圖III-38 A)寧壽宮「楔賞亭」。B)綺春園清夏齋之「寄情咸暢亭」。



圖III-39 A)目前位於北京中山公園中的「蘭亭八柱亭」(現為「景自天成亭」)。B)亭中的八柱。C)亭中王羲之蘭亭會石屏。D)石屏正面蘭亭會圖象。E)石屏背面乾隆御製詩文。F)筆者所繪中山公園「八柱」與石屏排列方式。G)第一柱正面刻帖排列方式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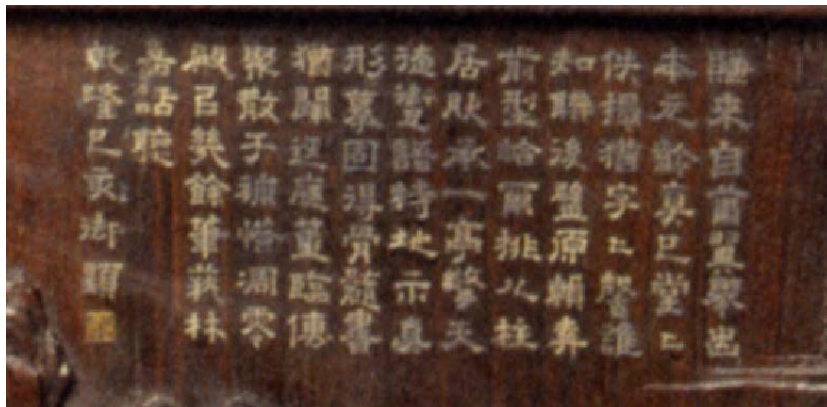
圖III-40 清，《清院畫十二月令圖》，局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



B



C

圖III-41 清，乾隆朝，《清紫檀木雕蘭亭修禊圖八柱帖插屏》，A)正面，B)背面（為《紫禁城》廣告所刊之紅木仿製品），C)正面蘭亭圖上方乾隆四十四年（1779）所題〈蘭亭八柱冊（并序）〉詩。約 1779 年，高 83 公分×寬 62.5 公分×厚 40.5 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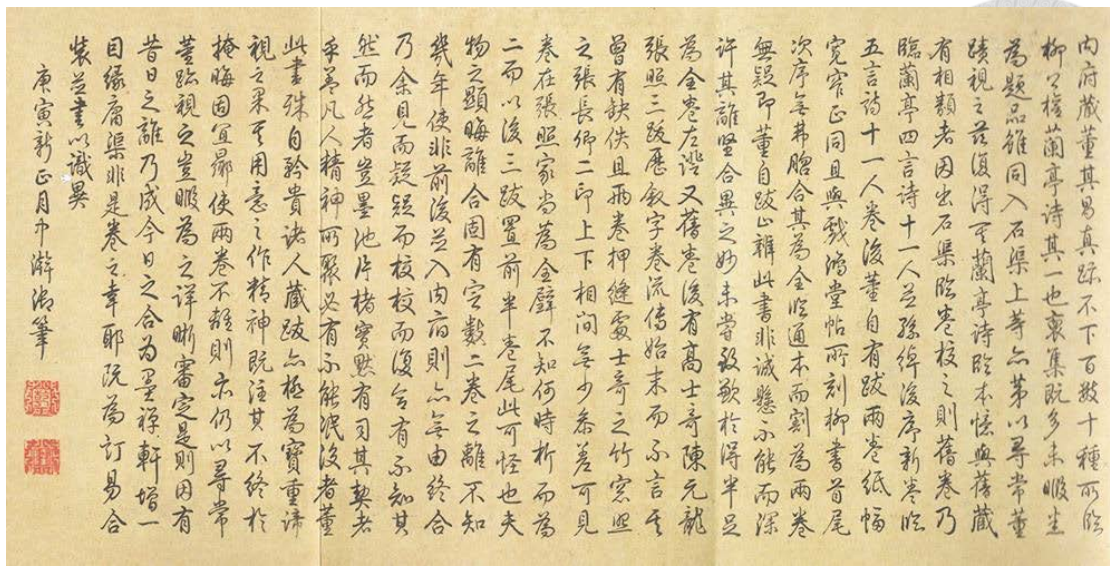


圖 III-42 清，乾隆跋董其昌《臨柳公權書蘭亭詩》，1770 年。取自故宮出版社編，《蘭亭八柱》，「蘭亭八柱第七」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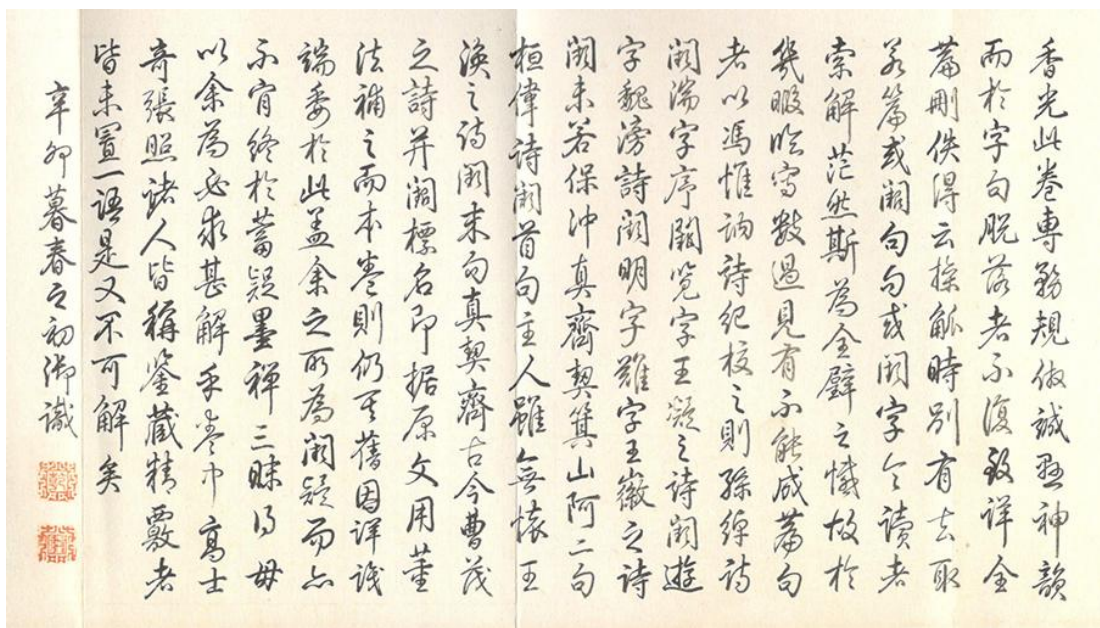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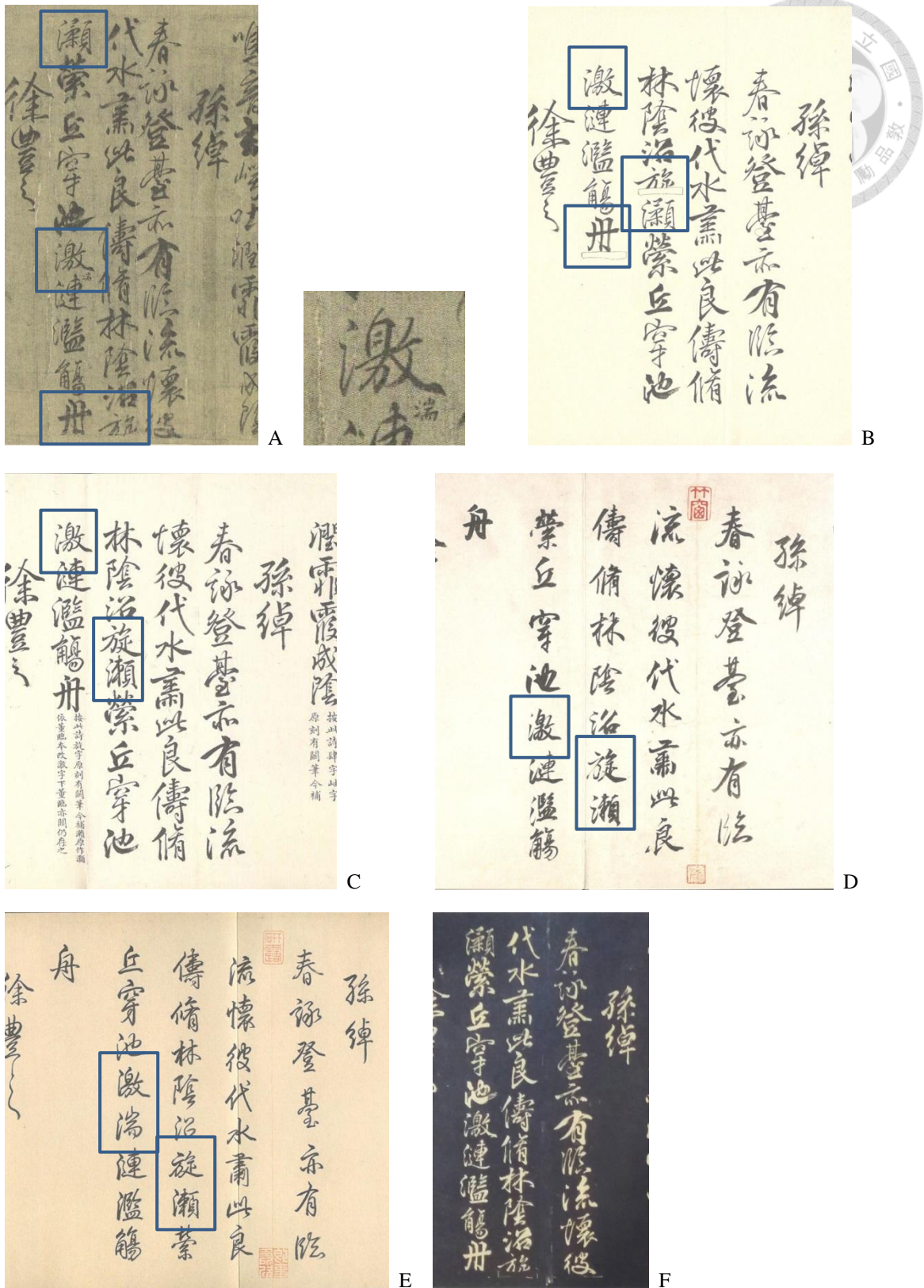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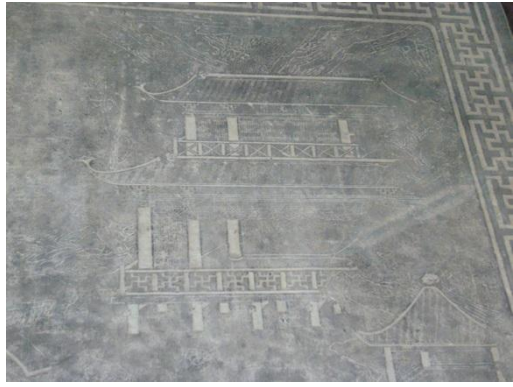


圖 III-43 清，乾隆跋董其昌《臨柳公權書蘭亭詩》，1771 年。取自故宮出版社編，《蘭亭八柱》，「蘭亭八柱第七」冊。



圖Ⅲ-44 柳公權《書蘭亭詩》部分，孫綽四言詩：A)柳公權，《書蘭亭詩》(八柱第四)。B)常福，《內府鈎填戲鴻堂刻柳公權書蘭亭詩原本》(八柱第五)。C)于敏中，《補戲鴻堂刻柳公權書蘭亭詩缺筆》(八柱第六)。D)董其昌，《臨柳公權書蘭亭詩》(八柱第七)。E)乾隆，《臨董其昌做柳公權書蘭亭詩》(八柱第八)。F)《明拓〈戲鴻堂法書〉柳公權書蘭亭詩冊》。



A



B

圖III-45 「蘭亭八柱」石屏與《清紫檀木雕蘭亭修禊圖八柱帖插屏》比較：A)畫面右上角閣樓。B)畫面右側中段王羲之蘭亭段落。



圖III-46 《清紫檀木雕蘭亭修禊圖八柱帖插屏》之「孫綽題壁」局部。



↳題壁

圖III-47 明，「李在」款，《蘭亭圖》，部分，16世紀晚期，個人藏。



圖III-48 (傳)明明，仇英，《西園雅集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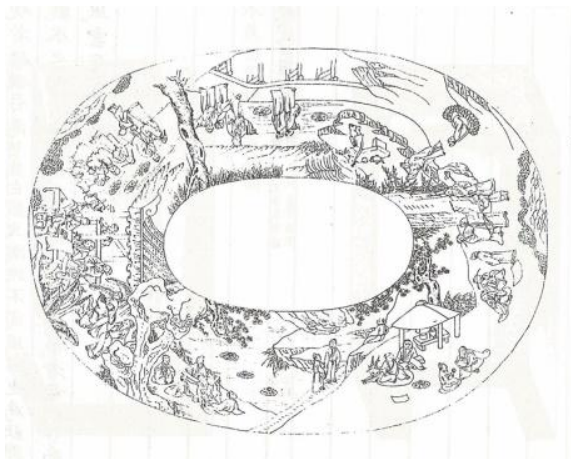
圖Ⅲ-49 明，程大約編，《程氏墨苑》之〈竹林七賢〉，1605年刊行。



圖Ⅲ-50 明，程大約編，《程氏墨苑》之〈修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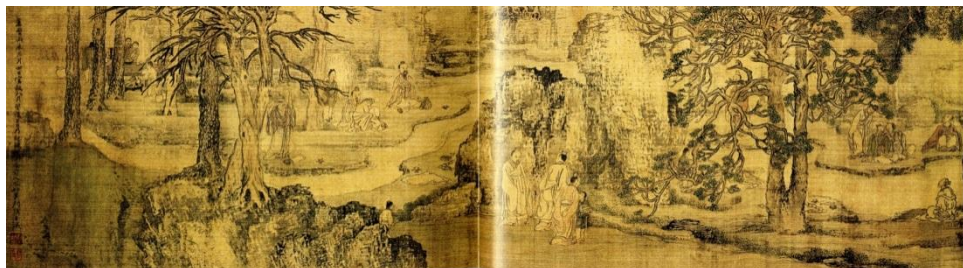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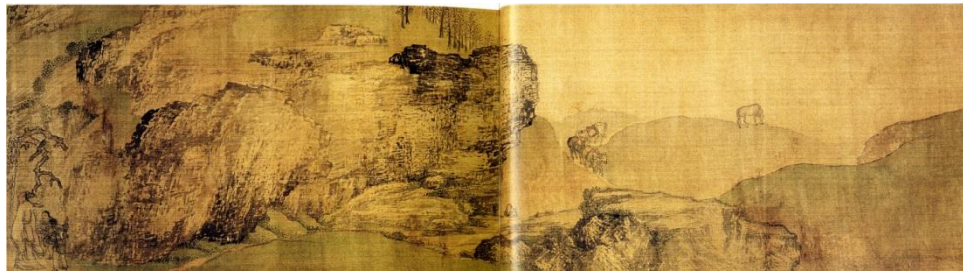
圖Ⅲ-51a 清，于敏中編，《欽定西清硯譜》所收《宋薛紹彭蘭亭硯》側面圖。



圖Ⅲ-51b 清，于敏中編，《欽定西清硯譜》所收《宋綠端蘭亭硯》側面圖。



圖Ⅲ-52 明，仇英，《蘭亭圖》，上海博物館藏。



圖III-53 明，張宏，《蘭亭圖卷》，部分，1616年，北京，中國首都博物館藏。



圖Ⅲ-54 清，《青玉蘭亭修禊圖山子》，背面鐫有乾隆丁卯（十二年，1747年）御臨《蘭亭序》，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Ⅲ-55 明，《明拓明益王重刻大蘭亭圖卷》，部分三段，1592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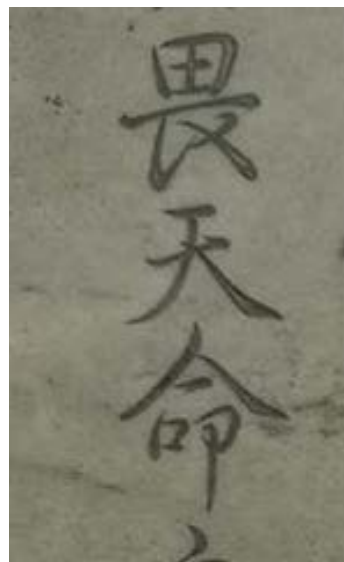
圖Ⅲ-56 清，《清拓乾隆御題補刻明代端石蘭亭圖卷》，部分，1781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Ⅲ-57 清，《欽定補刻端石蘭亭圖緙絲》，部分，私人藏。



A



B

圖Ⅲ-58 A)「蘭亭八柱」第三柱上刻字。B)寧壽宮《敬勝齋法帖》刻石。



圖III-59 清，《清乾隆蘭亭修禊圖御墨》，此為白色，右側局部為「謝滕」形象，1737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III-60 清，《清乾隆竹管蘭亭真賞紫毫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III-61 清，《清乾隆竹管蘭亭真賞紫毫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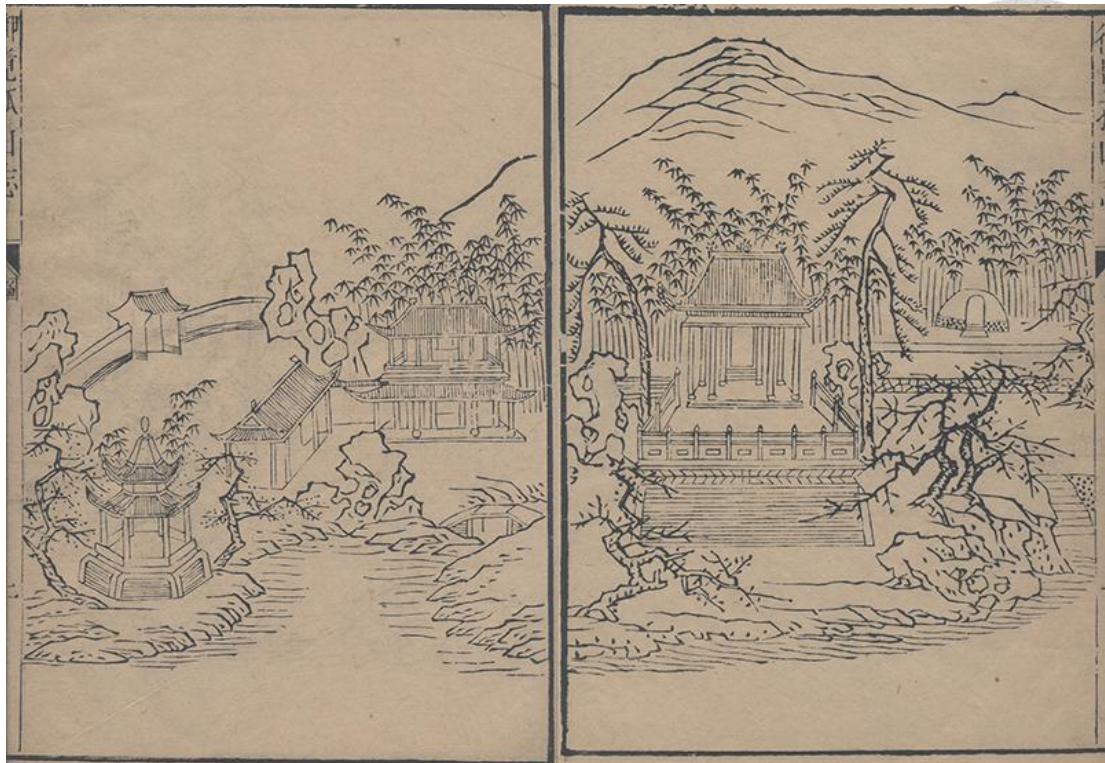
圖IV-1 紹興，戢山，王羲之故居「戒珠寺」。



圖IV-2 紹興，戢山，「題扇橋」，清道光 8 年（1828）重建。



圖IV-3 紹興，戢山，戒珠寺右前方之「墨池」。



圖IV-4 清，佚名，《西湖孤山圖》，收入王復禮編，《御覽蘭亭志》，1719年。



圖IV-5 清，朱其昌，《蘭亭曲水圖》，收入王復禮編，《御覽蘭亭志》，171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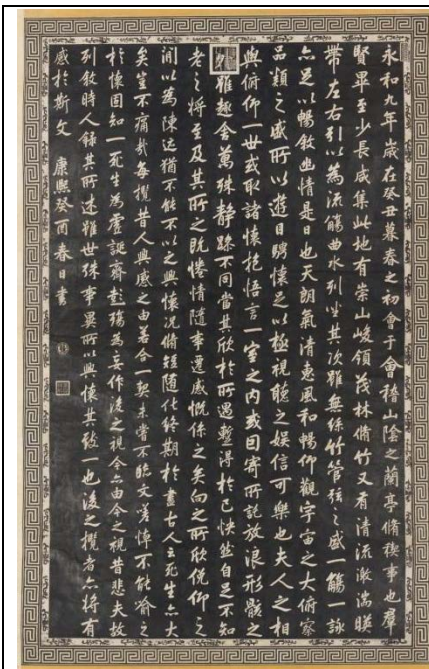


圖IV-6 杭州，西湖，放鶴亭（1915年整修）中之康熙臨董其昌《舞鶴賦》刻石，240×75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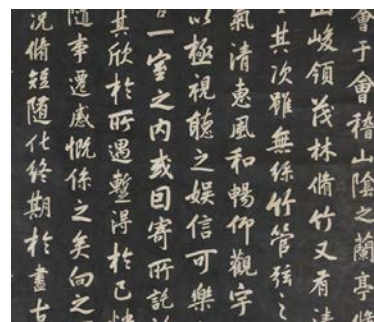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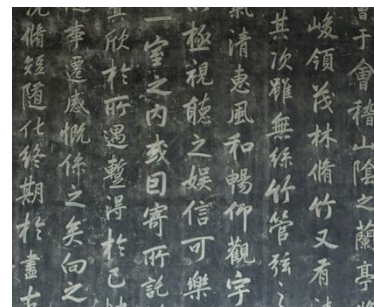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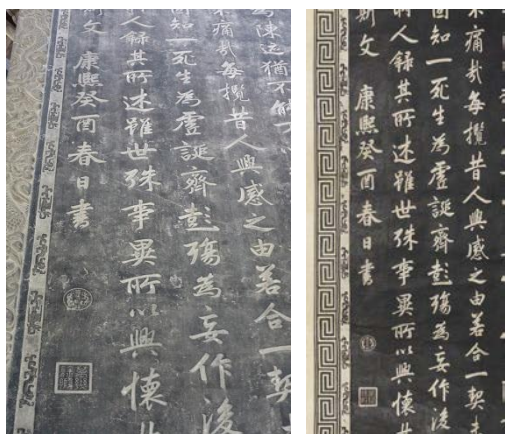
B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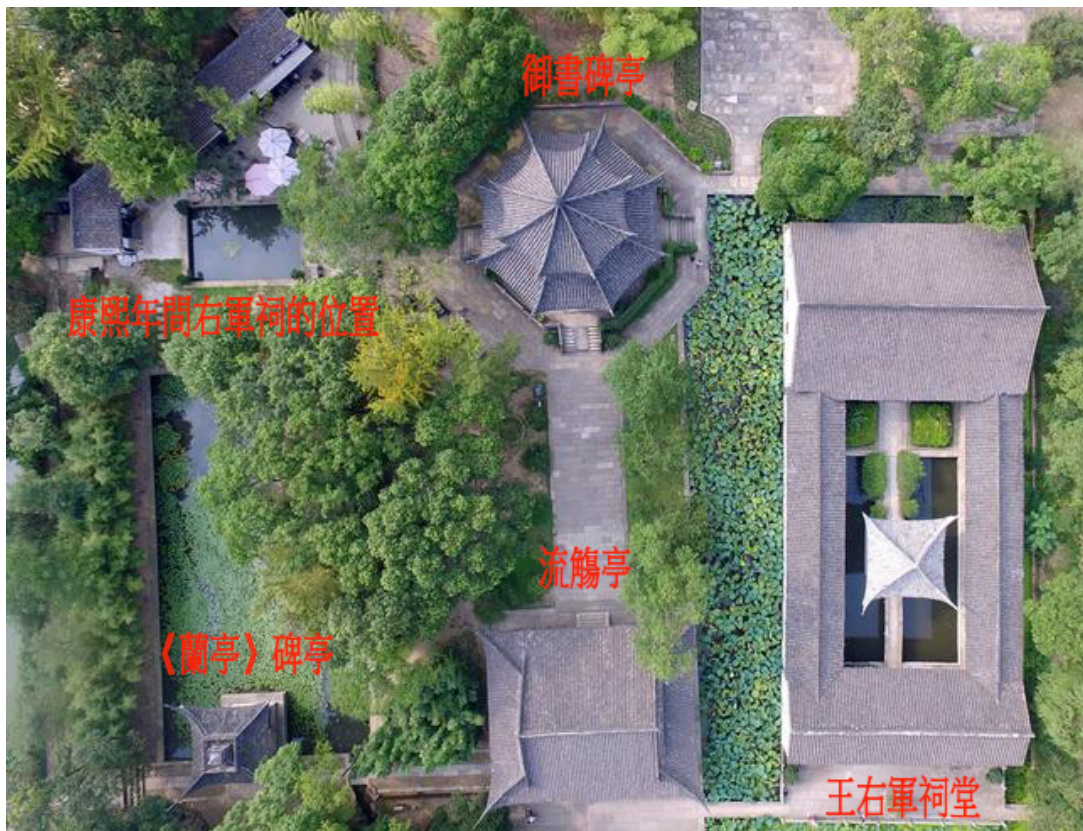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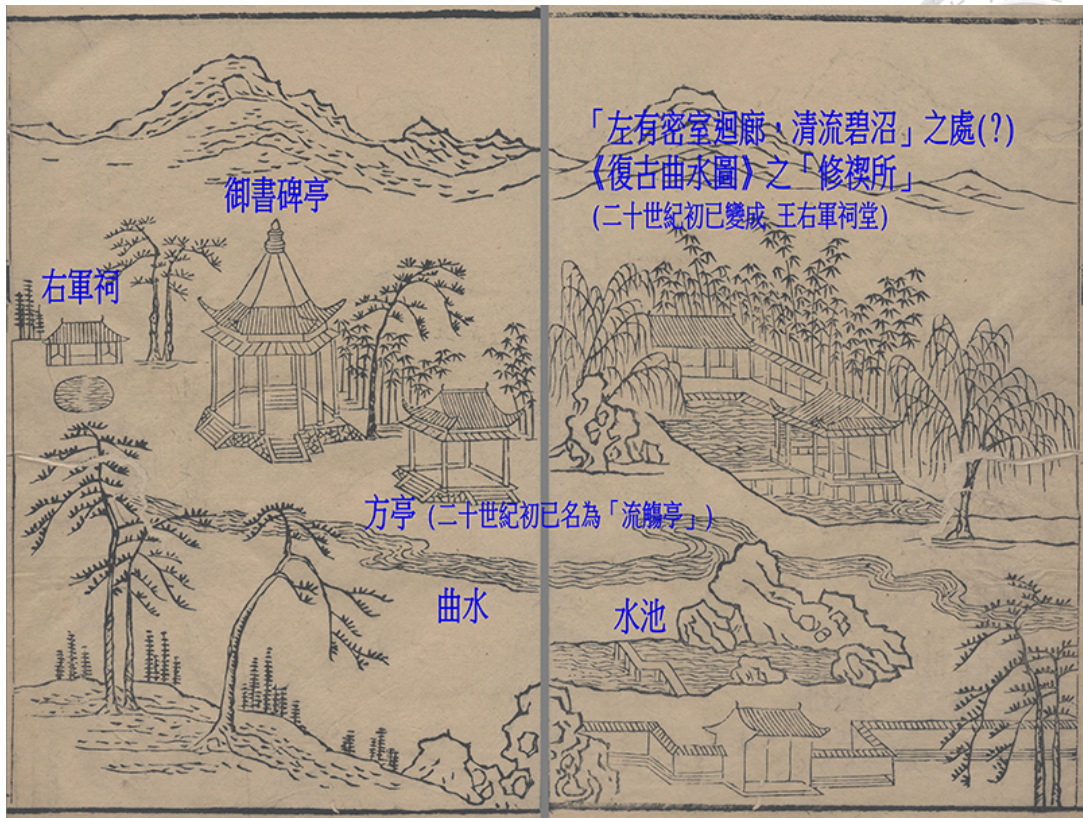


D



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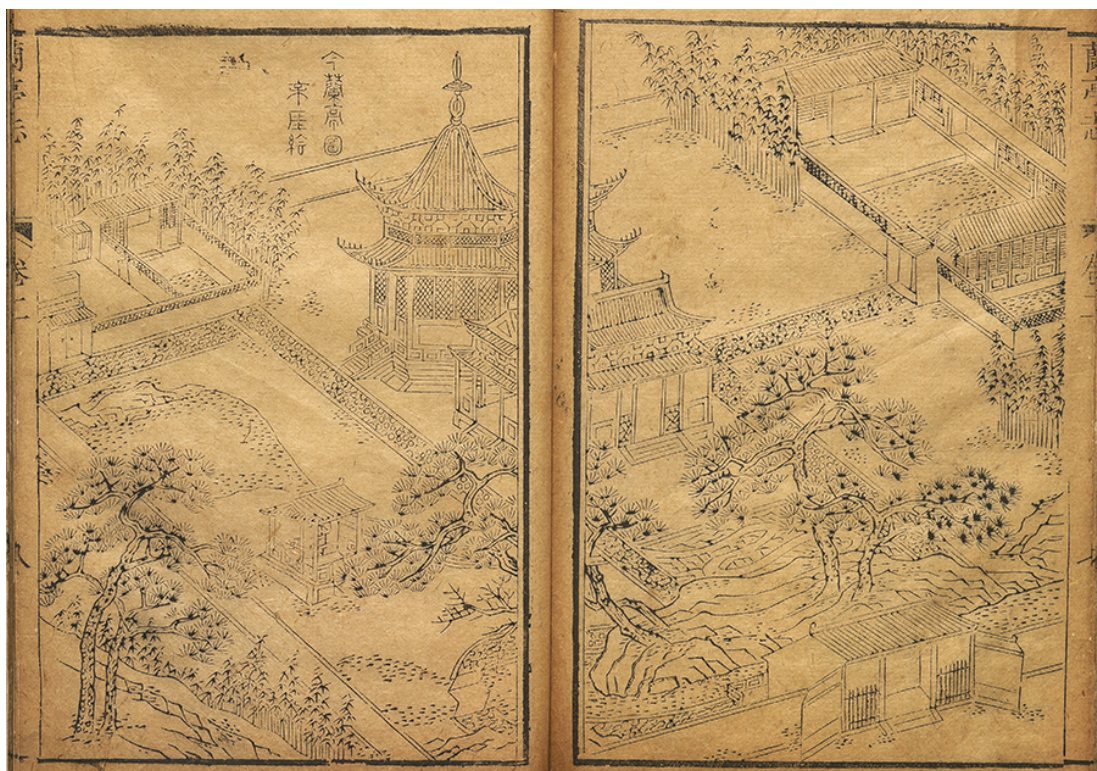
圖IV-7 A、B)紹興，蘭亭，御碑亭（1983年整修）中之康熙《蘭亭序》刻石，碑石尺寸686×264公分。C)清，康熙，《清聖祖御筆蘭亭詩序軸》，1693年，408.1×209.1公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D、E)為B、C局部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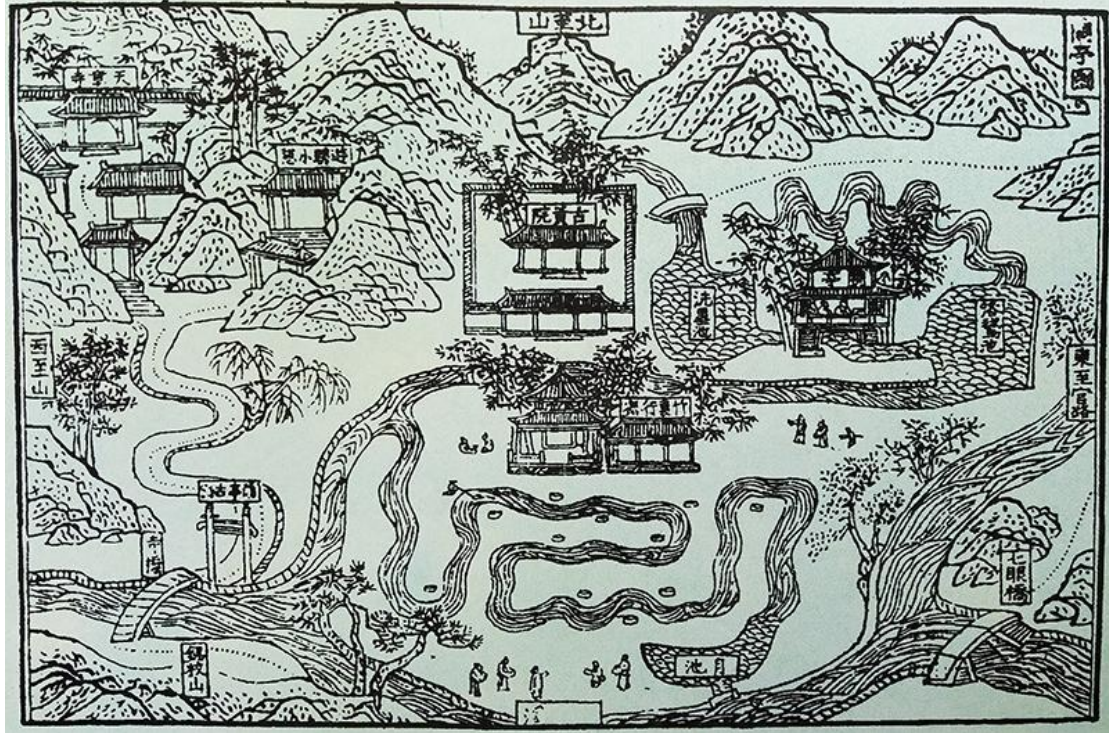
圖IV-8 上：清，朱其昌，《蘭亭曲水圖》，收入王復禮編，《御覽蘭亭志》，1719年。下：紹興，蘭亭，鳥瞰圖。



圖IV-9 清，陸振宗繪，《復古曲水圖》，收入吳高增輯，《蘭亭志》，1752年。



圖IV-10 清，陸振宗繪，《今蘭亭圖》，收入吳高增輯，《蘭亭志》，1752年。



圖IV-11 明，佚名，〈蘭亭圖〉，收入蕭良幹主導編修，《紹興府志》，15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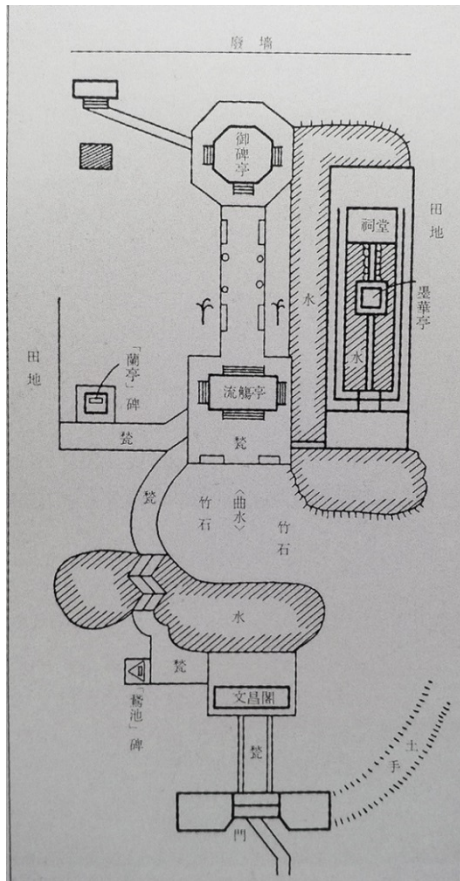
圖IV-12 清，高晉輯，《南巡盛典》之「蘭亭」。



圖IV-13 大正二年（1913）四月九日，長尾雨山及友人於蘭亭續修禊事。



圖IV-14 紹興，蘭亭，王右軍祠（1867年重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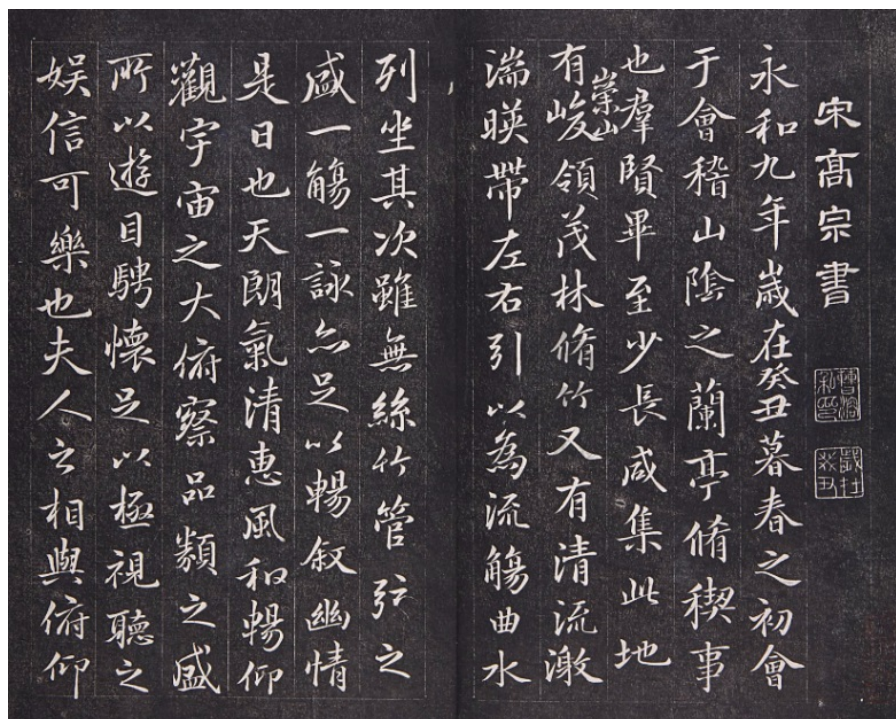
圖IV-15 西川寧目測，《蘭亭平面圖》，1931年。



圖IV-16 清，楊恩澍，《墨池》碑，1867年，紹興，蘭亭，王右軍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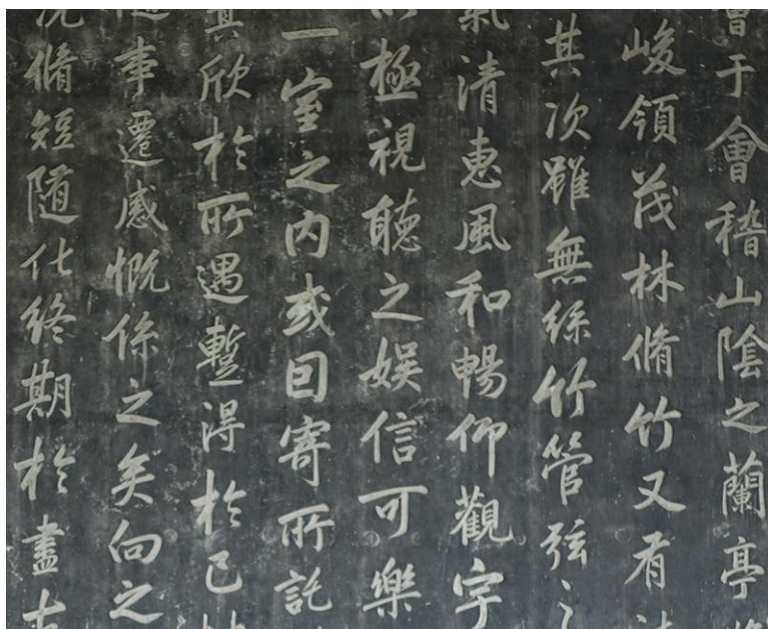
圖IV-17 紹興，蘭亭，《蘭亭》碑亭，碑石尺寸 173×102 公分。



圖IV-18 清拓《安素軒石刻》宋高宗臨《蘭亭序》，部分，1149年，32.5×15.1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IV-19 宋，《定武蘭亭序》（《定武蘭亭真本》）拓本，部分，柯九思藏本，24.9×66.9 公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IV-20 紹興，蘭亭，御碑亭（1983年整修）中之康熙皇帝《蘭亭序》刻石，局部。根據圖IV-14C《清聖祖御筆蘭亭詩序軸》，尺寸應為408.1×209.1公分。



圖IV-21 清，陸振宗繪，《古蘭亭圖》，收入吳高增輯，《蘭亭志》，1752年。



圖IV-22 明，《明拓明益王重刻大蘭亭圖卷》拓本，1592年。



圖IV-23 左：《明周府東書堂重摹唐模賜本蘭亭序及圖跋全卷》拓本，「蘭亭」部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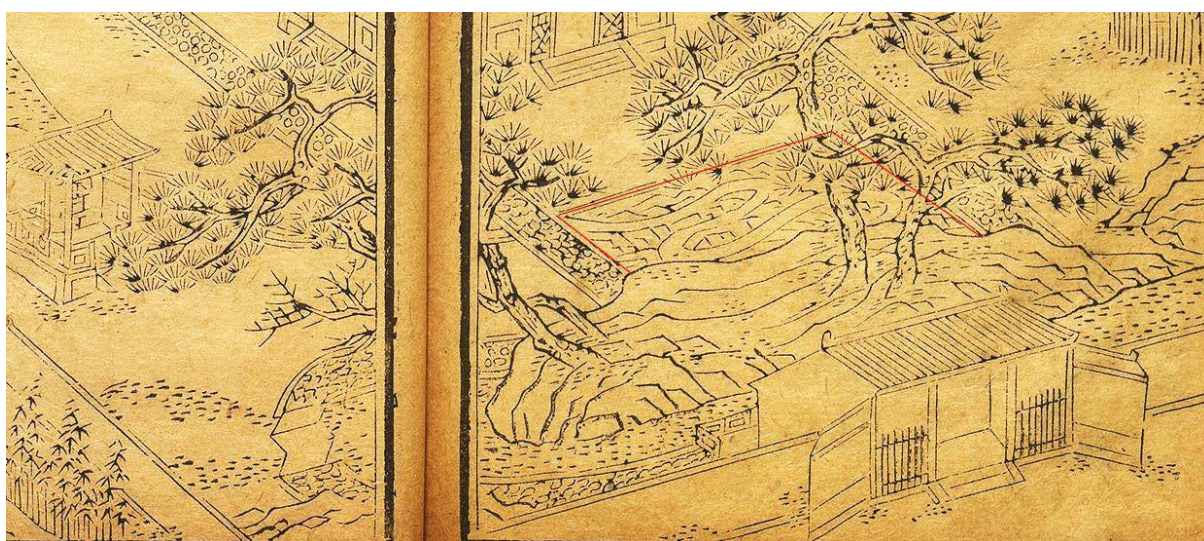
右：清，陸振宗繪，《古蘭亭圖》，「蘭亭」局部。



圖IV-24 左：明，《明周府東書堂重摹唐模賜本蘭亭序及圖跋全卷》拓本，「楊模」局部。
右：清，陸振宗繪，《古蘭亭圖》，局部。



圖IV-25 左：明，《蘭亭修禊圖》拓本，「王獻之」局部，1417年摹刻，藏地不明。
右：清，陸振宗繪，《古蘭亭圖》，局部。



圖IV-26 清，陸振宗繪，《今蘭亭圖》，局部，收入吳高增輯，《蘭亭志》，1752年。



圖IV-27 清，陸振宗繪，《復古曲水圖》，局部，收入吳高增輯，《蘭亭志》，175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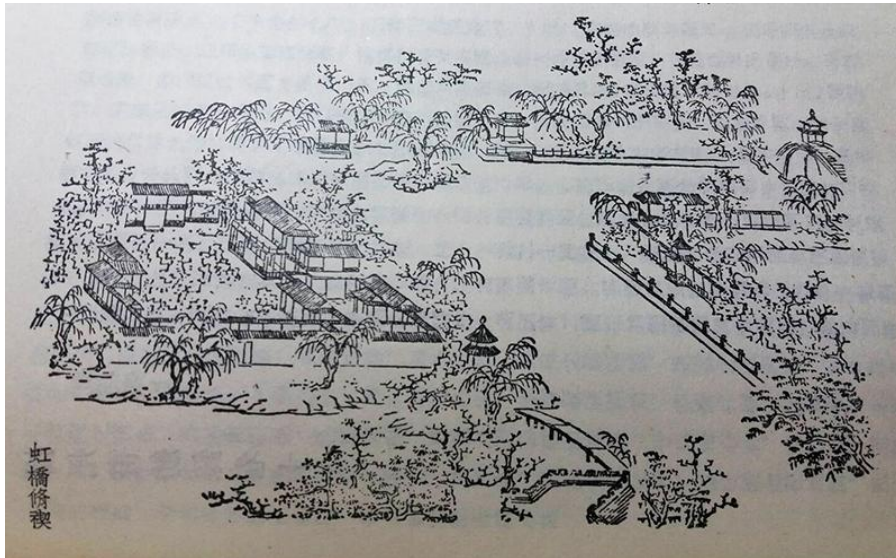
圖IV-28 清，陸振宗繪，《復古曲水圖》，局部，收入吳高增輯，《蘭亭志》，175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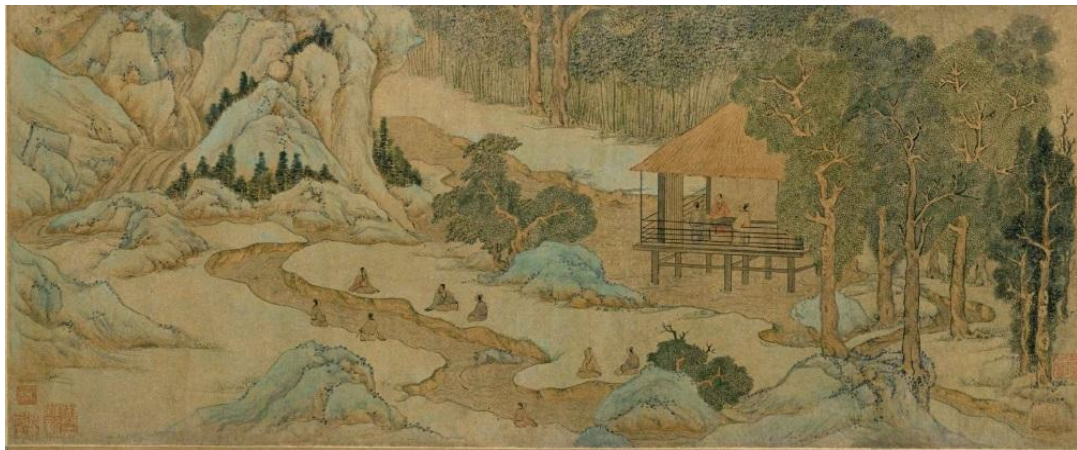
圖IV-29 紹興，蘭亭，御碑亭中之石碑。(左，碑陽)康熙皇帝，《蘭亭序》，1693年；(右，碑陰)乾隆皇帝，《蘭亭即事詩》，1751年。



圖IV-30 揚州，瘦西湖，遠望整修中的紅橋（重建於1973年）。



圖IV-31 清，《揚州畫舫錄》中之「虹橋修禊」，1795年初刻。



圖IV-32 明，文徵明，《蘭亭修禊圖卷》，1542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IV-33 明，文徵明，《祝允明書蘭亭序文徵明補圖卷》，瀋陽，遼寧省博物館藏。



圖IV-34 (傳)明，文徵明，《蘭亭修禊圖軸》，1524年，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IV-35 (傳)明，文徵明，《蘭亭修禊圖卷》，泰和嘉成 2013 秋拍。



圖IV-36 (傳)明，文徵明，《蘭亭修禊圖》，1544年，藏處不明。

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
 于九秋寫
 懷園老公祖題
 錢唐法華堂



此圖乃清丁健、陳栻、闕嵐所繪，畫中人物、亭閣、山水、樹木、雲霧、水石，無不精細入微，設色雅淡，氣韻清幽。畫中人物多為士大夫，或坐或立，或行或止，各得其趣。亭閣之構，亦極其精巧，與自然環境融為一體。山水之勢，亦極其雄偉，雲霧之態，亦極其飄渺。水石之畫，亦極其生動，令人如臨其境。此圖不僅是一幅山水畫，更是一部生動的社會生活圖景。

此圖乃清丁健、陳栻、闕嵐所繪，畫中人物、亭閣、山水、樹木、雲霧、水石，無不精細入微，設色雅淡，氣韻清幽。畫中人物多為士大夫，或坐或立，或行或止，各得其趣。亭閣之構，亦極其精巧，與自然環境融為一體。山水之勢，亦極其雄偉，雲霧之態，亦極其飄渺。水石之畫，亦極其生動，令人如臨其境。此圖不僅是一幅山水畫，更是一部生動的社會生活圖景。

此圖乃清丁健、陳栻、闕嵐所繪，畫中人物、亭閣、山水、樹木、雲霧、水石，無不精細入微，設色雅淡，氣韻清幽。畫中人物多為士大夫，或坐或立，或行或止，各得其趣。亭閣之構，亦極其精巧，與自然環境融為一體。山水之勢，亦極其雄偉，雲霧之態，亦極其飄渺。水石之畫，亦極其生動，令人如臨其境。此圖不僅是一幅山水畫，更是一部生動的社會生活圖景。

畫中人物、亭閣、山水、樹木、雲霧、水石，無不精細入微，設色雅淡，氣韻清幽。畫中人物多為士大夫，或坐或立，或行或止，各得其趣。亭閣之構，亦極其精巧，與自然環境融為一體。山水之勢，亦極其雄偉，雲霧之態，亦極其飄渺。水石之畫，亦極其生動，令人如臨其境。此圖不僅是一幅山水畫，更是一部生動的社會生活圖景。

圖 V-1 清，丁健、陳栻、闕嵐，《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1792 年，69×369 公分，私人藏。



圖 V-2 (上左) 清，丁健、陳枏、闕嵐，《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

(上右) 明，《蘭亭修禊圖》拓本，「王獻之」局部，1417 年摹刻，藏地不明。

(下左) 清，丁健、陳枏、闕嵐，《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

(下右) 《明周府東書堂重摹唐模賜本蘭亭序及圖跋全卷》拓本，「孫統」局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藏。



圖 V-3 清，禹之鼎，《城南雅集圖》，1682 年，50.5×126 公分，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 V-4 清，方士庶、葉芳林，《九日行庵文讌圖》，1743 年，32.4×201.2 公分，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藏。



圖 V-5 清，丁健、陳栻、闕嵐，《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人名標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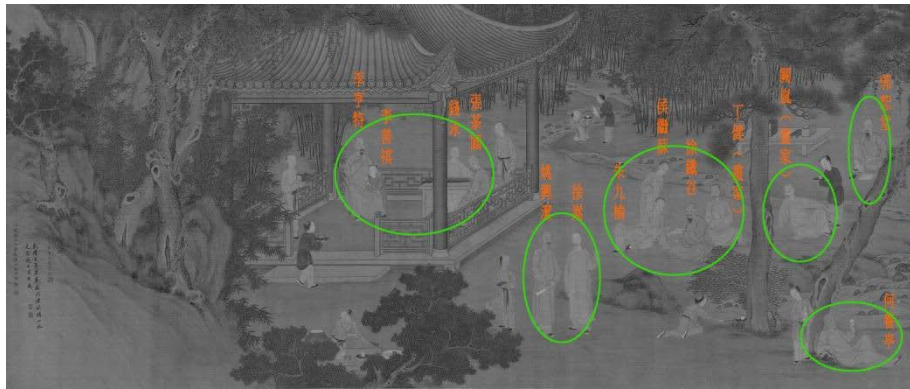


圖 V-6 清，丁健、陳棻、闕嵐，《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畫面分組標示。



圖 V-7 清，丁健、陳棻、闕嵐，《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卷首局部。



圖 V-8 清，丁健、陳枏、闕嵐，《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卷尾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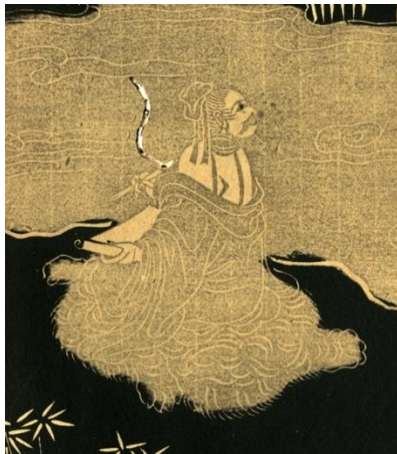
圖 V-9 清，丁健、陳枏、闕嵐，《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李善祺局部。



圖 V-10 清，方士庶、葉芳林，《九日行庵文讌圖》，局部。



圖 V-11 (傳)唐，周昉，《麟趾圖》，局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



B

圖 V-12 A) 《明周府東書堂重摹唐模賜本蘭亭序及圖跋全卷》拓本，「謝萬」局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藏。B) 清，丁健、陳栻、闕嵐，《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郭恕堂局部。



圖 V-13 《明周府東書堂重摹唐模賜本蘭亭序及圖跋全卷》拓本，「王玄之」(右)與「王彬之」(左)局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藏。



圖 V-14 明，《蘭亭修禊圖》拓本，「王獻之」局部，1417 年摹刻，藏地不明。



圖 V-15 清，丁健、陳栻、闕嵐，《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史少岡、平恕局部。



圖 V-16 清，丁健、陳枏、闕嵐，《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何養亭局部。



圖 V-17 《明周府東書堂重摹唐模賜本蘭亭序及圖跋全卷》拓本，「謝滕」（左）「楊模」（中）與「庾蘊」（右）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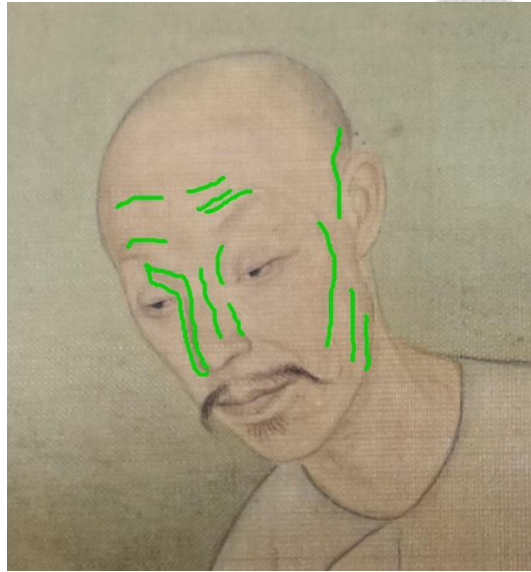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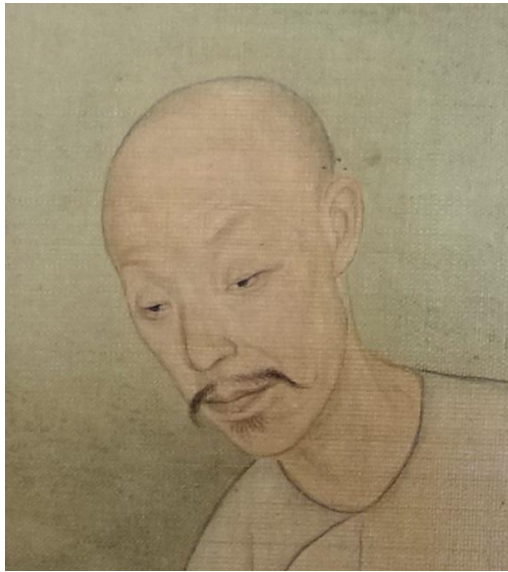
圖 V-18 清，禹之鼎，《城南雅集圖》，局部。



圖 V-19 清，方士庶、葉芳林，《九日行庵文讌圖》，局部。



圖 V-20 清，方士庶、葉芳林，《九日行庵文讌圖》，頭部局部。



陳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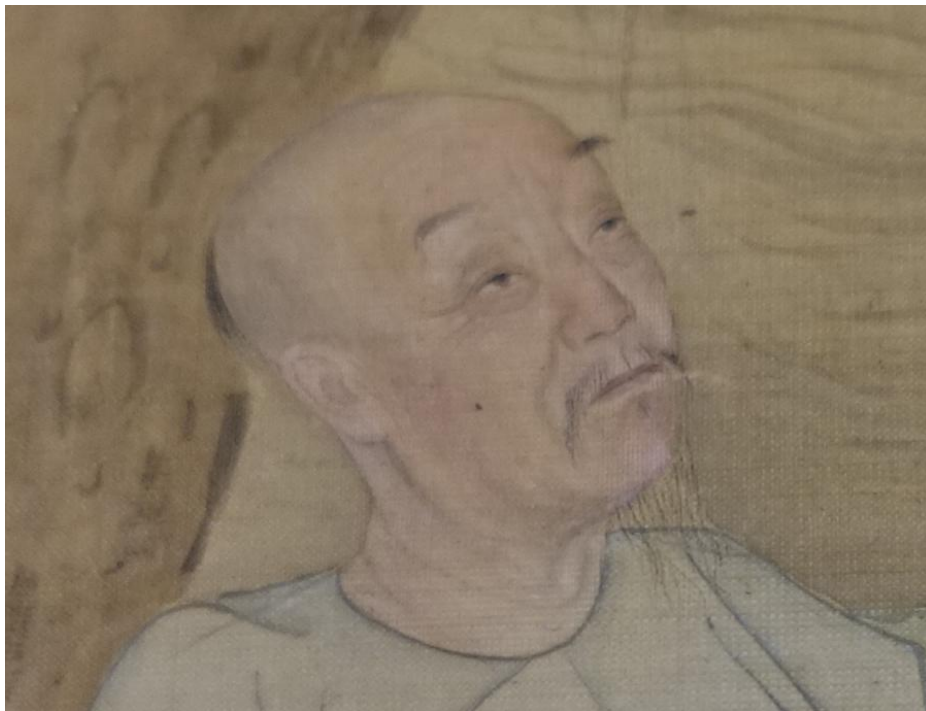


圖 V-21 清，丁健、陳栻、闕嵐，《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何養亭」頭部局部。



圖 V-22 清，丁以誠，《鐵保像軸》，局部，1810 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V-23 清，郎世寧、王致誠等，《萬樹園賜宴圖》，局部，1755 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V-24 清，郎世寧，《瑪瑞斫陣圖》，局部，1759年，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V-25 明，謝環，《杏園雅集圖》，1437年，36.7×240.7公分，鎮江市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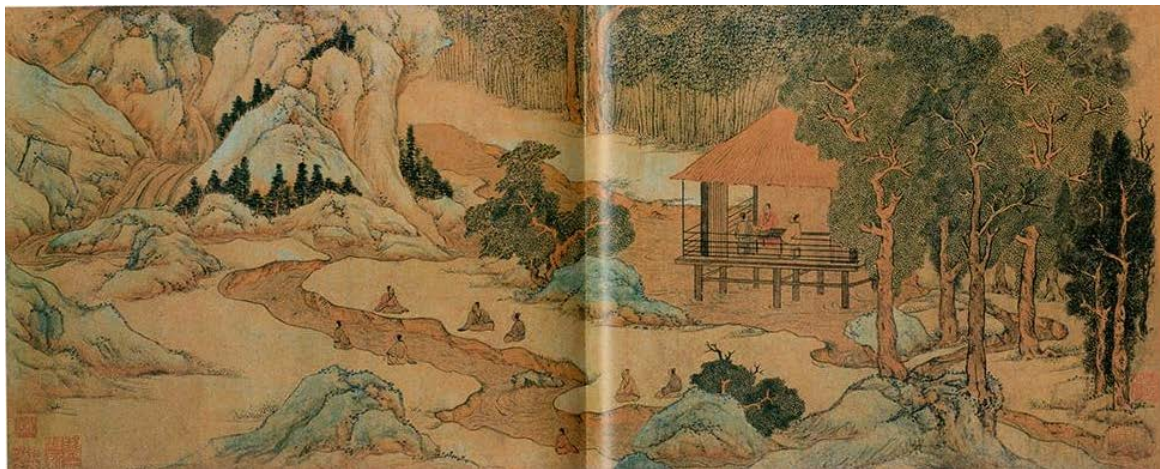


圖 V-26 明，文徵明，《蘭亭修禊圖》，部分，1542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V-27 清，丁健、陳枏、闕嵐，《會稽太守續蘭亭修禊圖》，器用局部。



圖 V-28 清，王宸，《借園修禊圖》，1793 年，41.5×247.5 公分，南京博物院藏。



圖 V-29 清，王宸，《借園修禊圖》，局部。



圖 V-30 明，陸治，《元夜宴集圖卷》，1547 年，上海博物館藏。



圖 V-31 清，徐承熙，《曾賓谷長壽寺後池修禊圖》，全圖及局部，1815 年，41.5×247.5 公分，清遠市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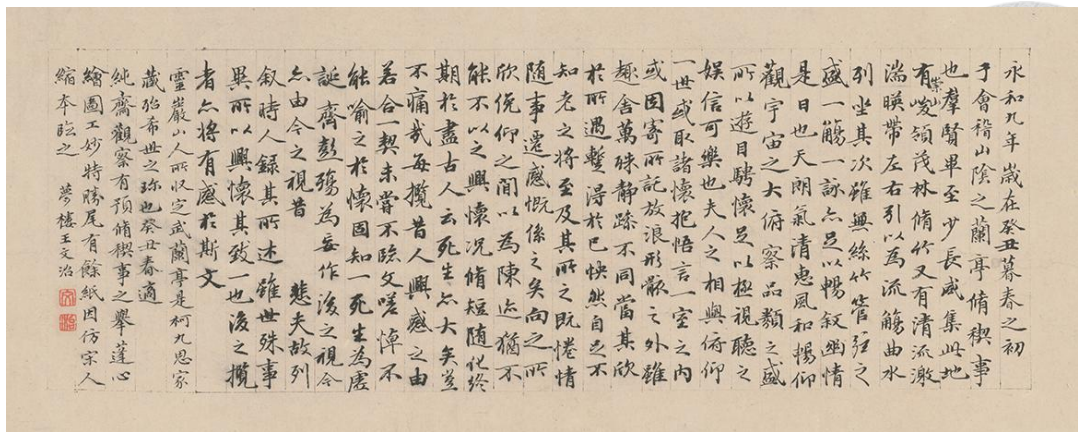


圖 V-32 清，王宸，《借園修禊圖》，王文治題。



圖 V-33 宋，《定武蘭亭真本》拓本，部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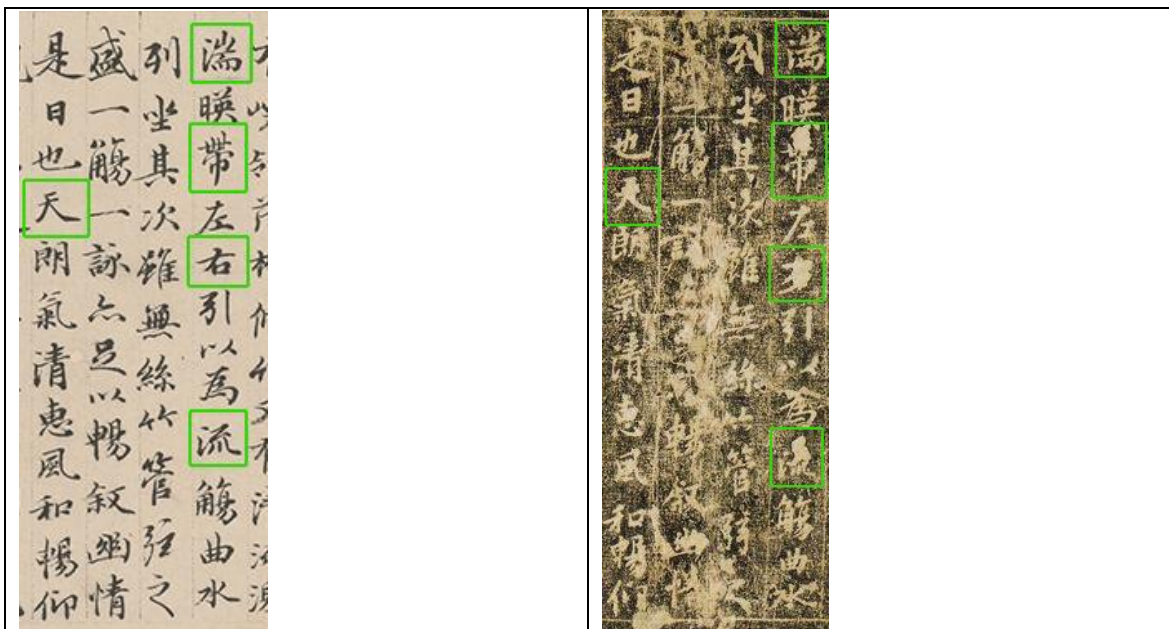


圖 V-34 (左)《借園修禊圖》後王文治縮臨《定武蘭亭真本》局部。

(右)畢沅收藏，《定武蘭亭真本》拓本，部分。



圖 V-35 (左)《借園修禊圖》後王文治縮臨《定武蘭亭真本》，局部。
 (中)畢沅收藏，《定武蘭亭真本》拓本，部分。
 (右)唐，《馮承素行書摹蘭亭序卷》，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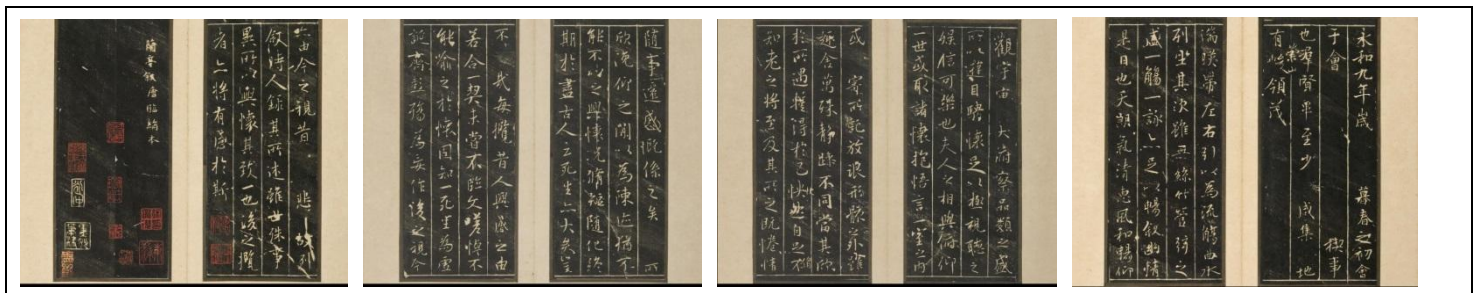


圖 V-36 《清拓穎上蘭亭序》，拓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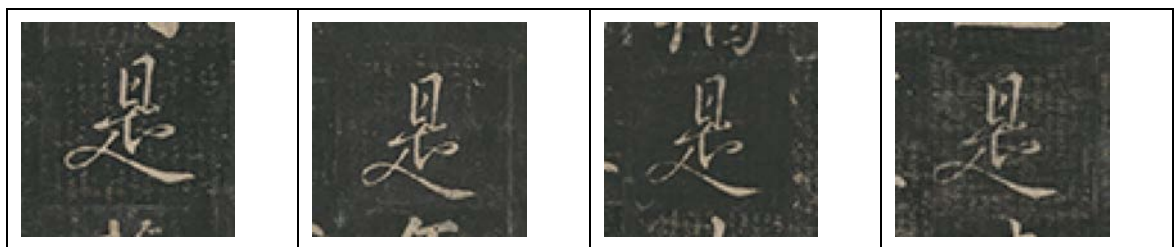


圖 V-37 (一)《借園修禊圖》拓本詩跋，楊撻跋，局部。
 (二)《借園修禊圖》拓本詩跋，王文治跋，局部。
 (三)《借園修禊圖》拓本詩跋，史雲虬跋，局部。
 (四)《借園修禊圖》拓本詩跋，莫允宣跋，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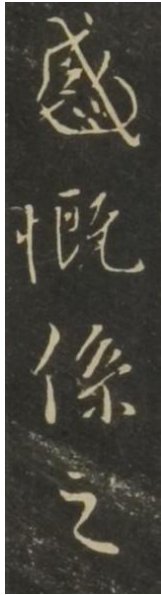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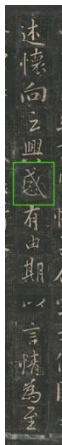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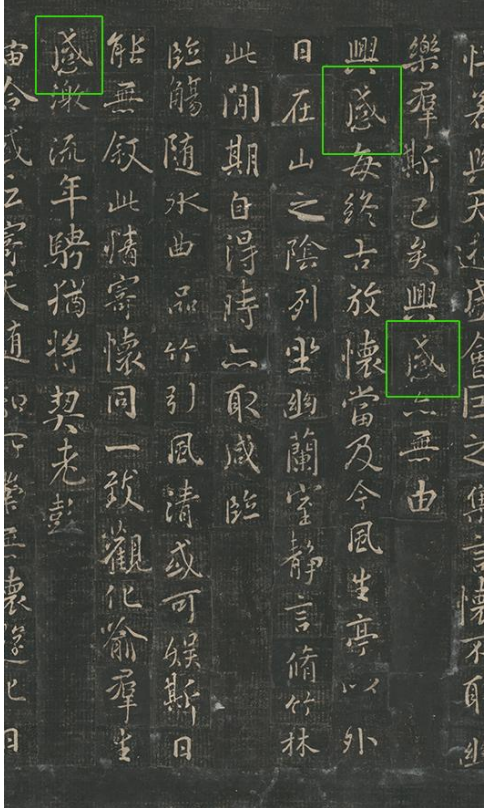

<p>《清拓穎上蘭亭序》，局部。</p>	 <p>(一)「感慨係之」</p>	 <p>(二)「興感之由」</p>	 <p>(三)「感於斯文」</p>
<p>《借園修禊圖》拓本詩跋，楊摺跋，局部</p>	 	<p>無採用</p>	 

圖 V-38 《清拓穎上蘭亭序》、《借園修禊圖》拓本詩跋，「感」字使用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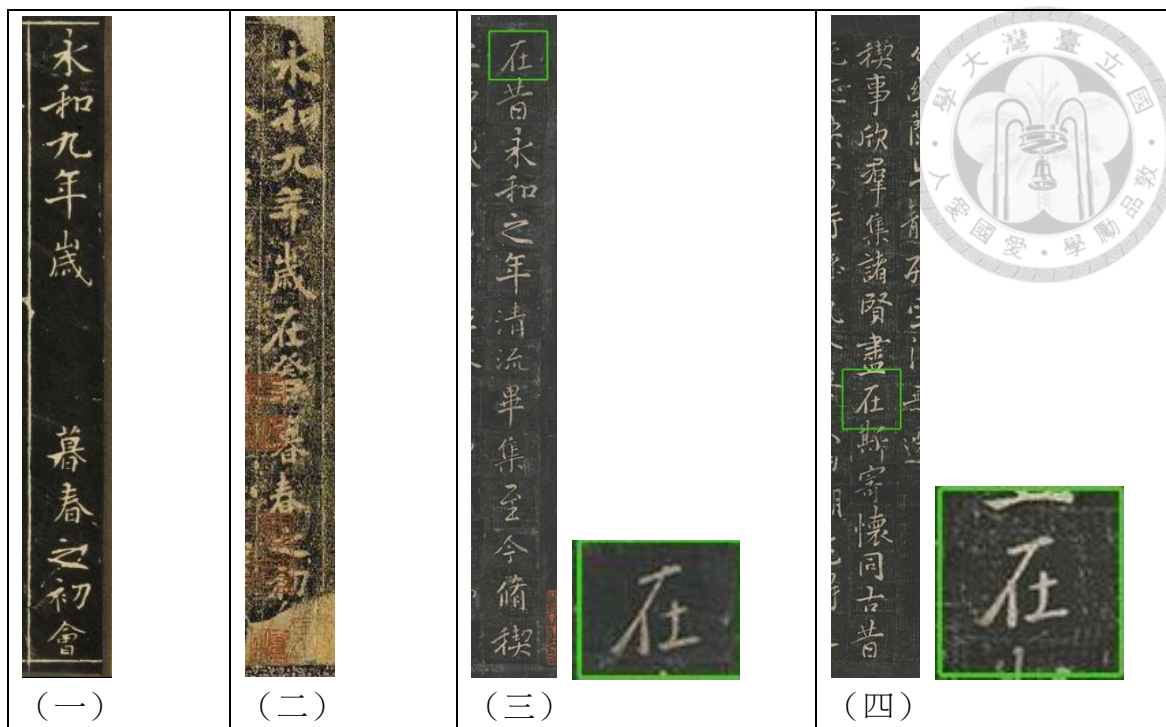


圖 V-39 (一)《清拓穎上蘭亭序》，局部，缺「在癸丑」三字。
 (二) 畢沅收藏，《定武蘭亭真本》拓本，部分，具「在癸丑」三字。
 (三)《借園修禊圖》拓本詩跋，楊摺跋，局部。
 (四)《借園修禊圖》拓本詩跋，王文治跋，局部。



圖 V-40 (一)《清拓穎上蘭亭序》，局部，缺「在癸丑」三字。
 (二) 畢沅收藏，《定武蘭亭真本》拓本，部分，具「在癸丑」三字。
 (三)《借園修禊圖》拓本詩跋，俞大猷跋，局部。
 (四)《借園修禊圖》拓本詩跋，王洽跋，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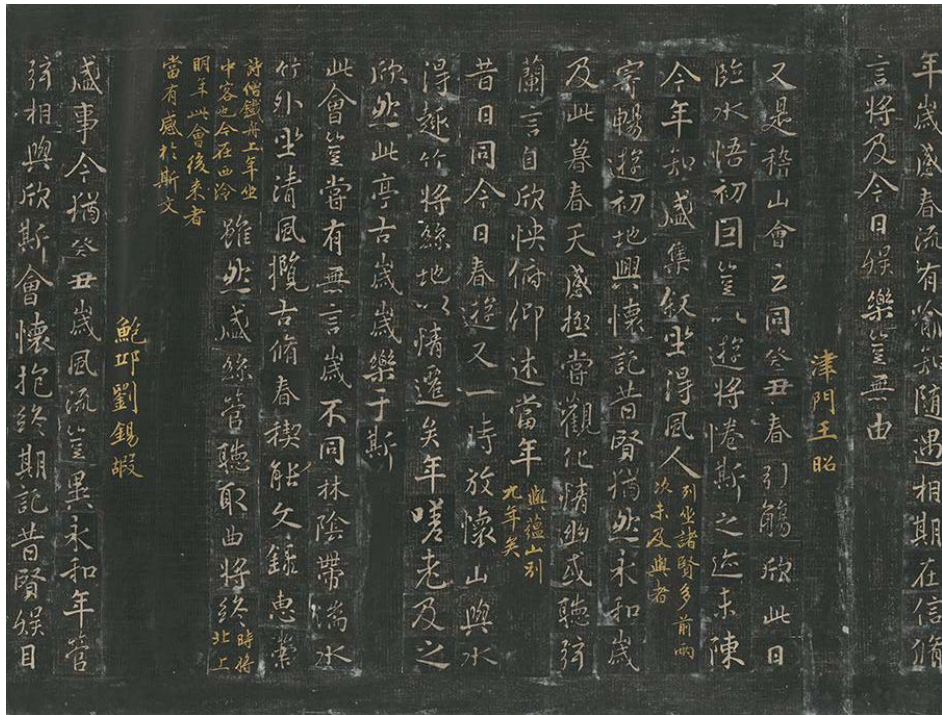


圖 V-41 《借園修楔圖》拓本詩跋，劉錫嘏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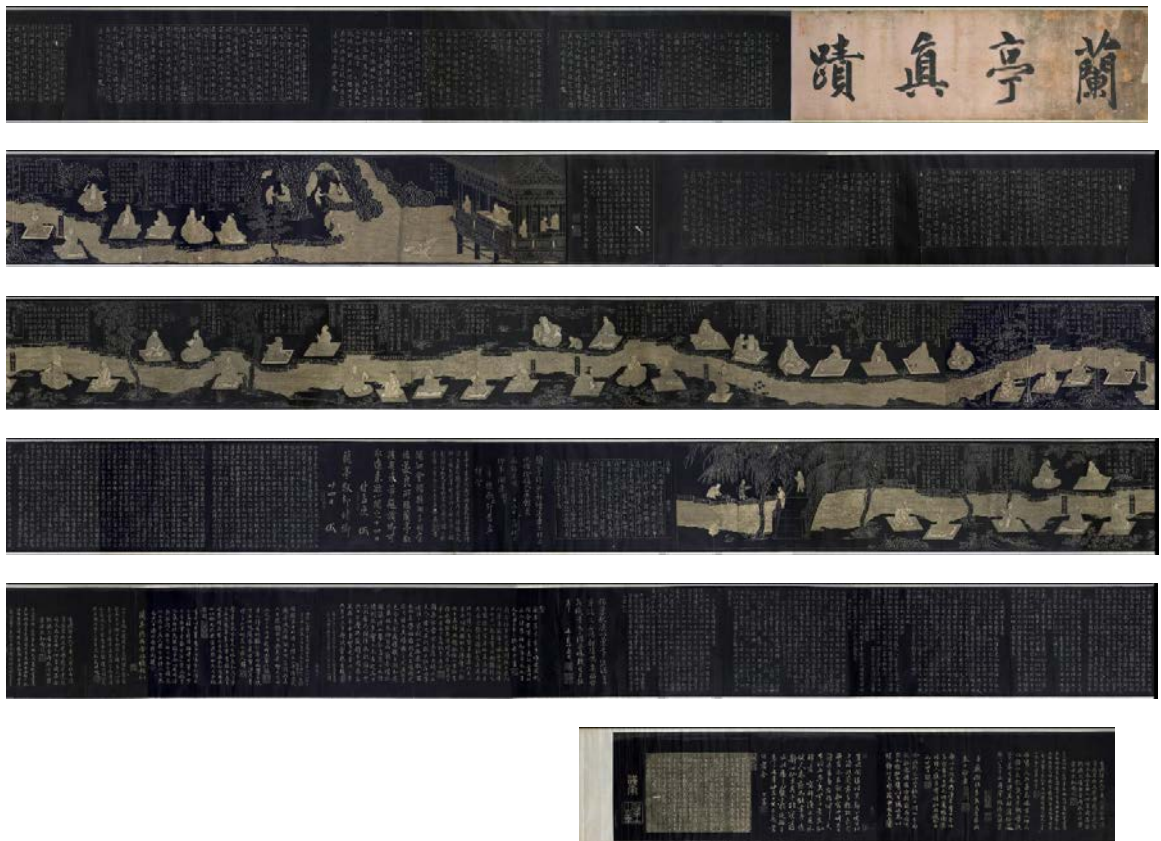


圖 V-42 明，《明拓明益王重刻大蘭亭圖卷》，拓本，1592年初刻，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



B

圖 VI-1 恭王府「沁秋亭」外觀及水道。



圖 VI-2 陳廷敬宅，流杯亭水道。



圖 VI-3 清，徐承熙，《曾賓谷長壽寺後池修禊圖》，1815 年，清遠市博物館藏。



圖 VI-4 首爾，昌德宮後苑之「玉流泉（又稱「玉流川」）」。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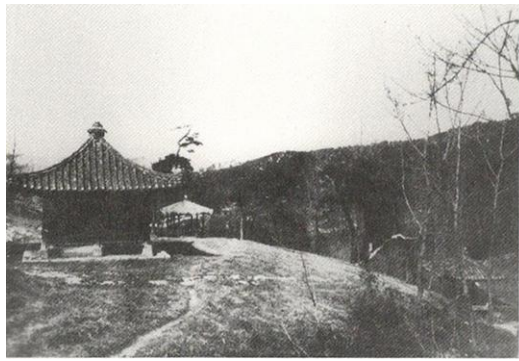
B

C



D

圖 VI-5 朝鮮，劉淑，《修禊圖卷》，1853 年，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A



B

圖 VI-6 二十世紀初期漢陽南山一帶。A) 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藏，玻璃乾版，건판 28559。B) 果川市，國史編纂委員會藏，玻璃底片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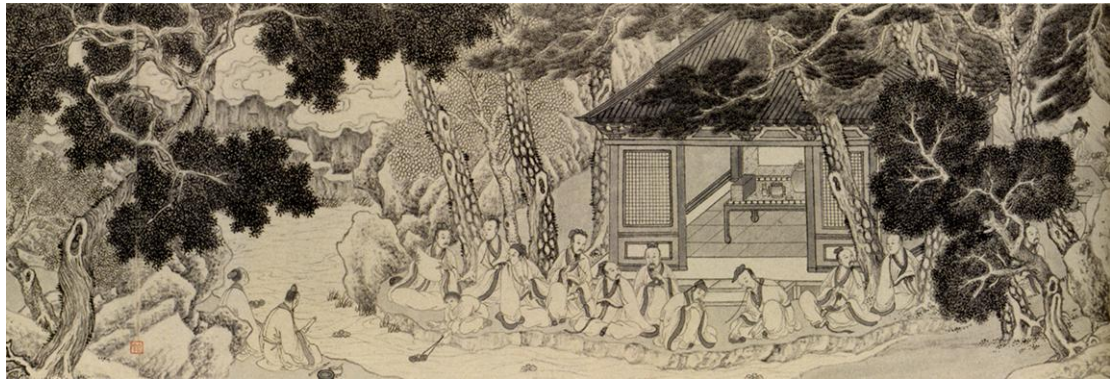


圖 VI-7 明，尤求，《修禊圖》，部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VI-8 明，沈時，《蘭亭修禊圖卷》，部分，1635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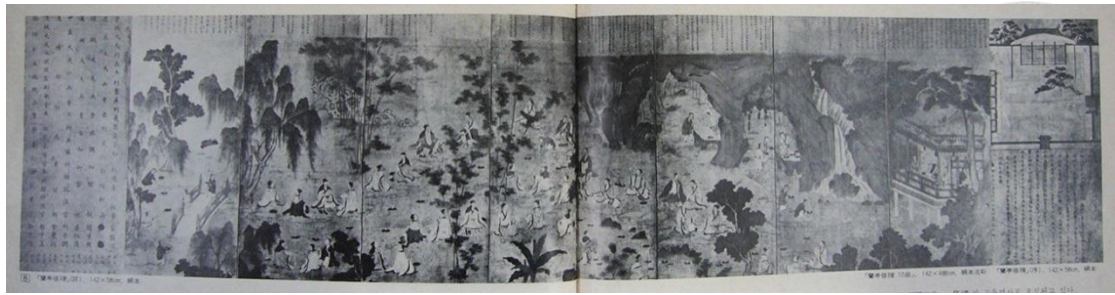


圖 VI-9 朝鮮，佚名，《蘭亭修禊圖》，屏風十曲，東山房藏。



圖 VI-10 富岡鐵齋等六十人，《蘭亭印譜》，1913年，大阪，關西大學「內藤文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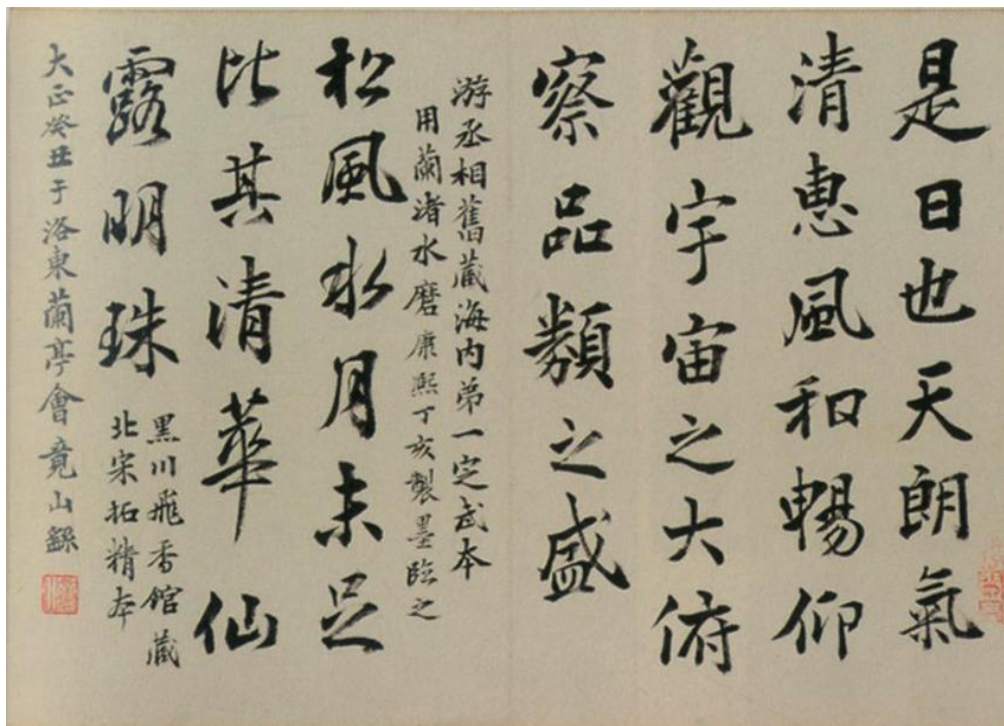


圖 VI-11 山本竟山，《大正癸丑蘭亭會記念合作書帖》，1913年，個人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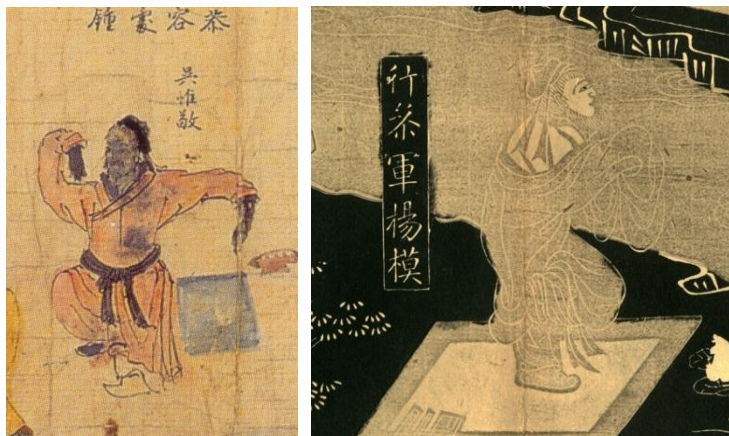
圖 VI-12 韓國慶州，「鮑石亭」址。



圖 VI-13 朝鮮，佚名，《十老圖像圖卷》，1499年，龍仁，湖巖美術館藏。



A



B

圖 VI-14 A、B) 朝鮮，佚名，《十老圖像圖卷》，「金博」、「吳惟敬」局部，與《明周府東書堂重摹唐模賜本蘭亭序及圖跋全卷》拓本，「謝滕」、「楊模」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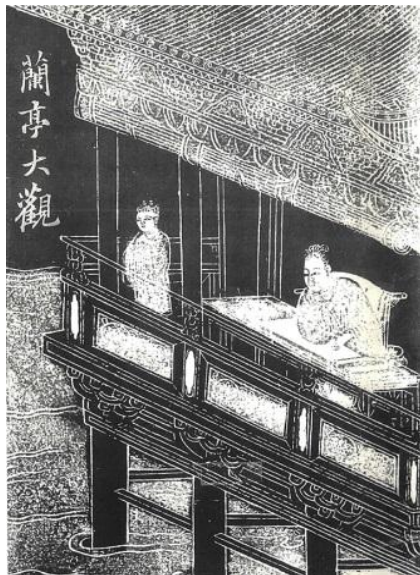


圖 VI-15 《蘭亭大觀》「蘭亭陳列目錄」，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一九七三年四月十日至五月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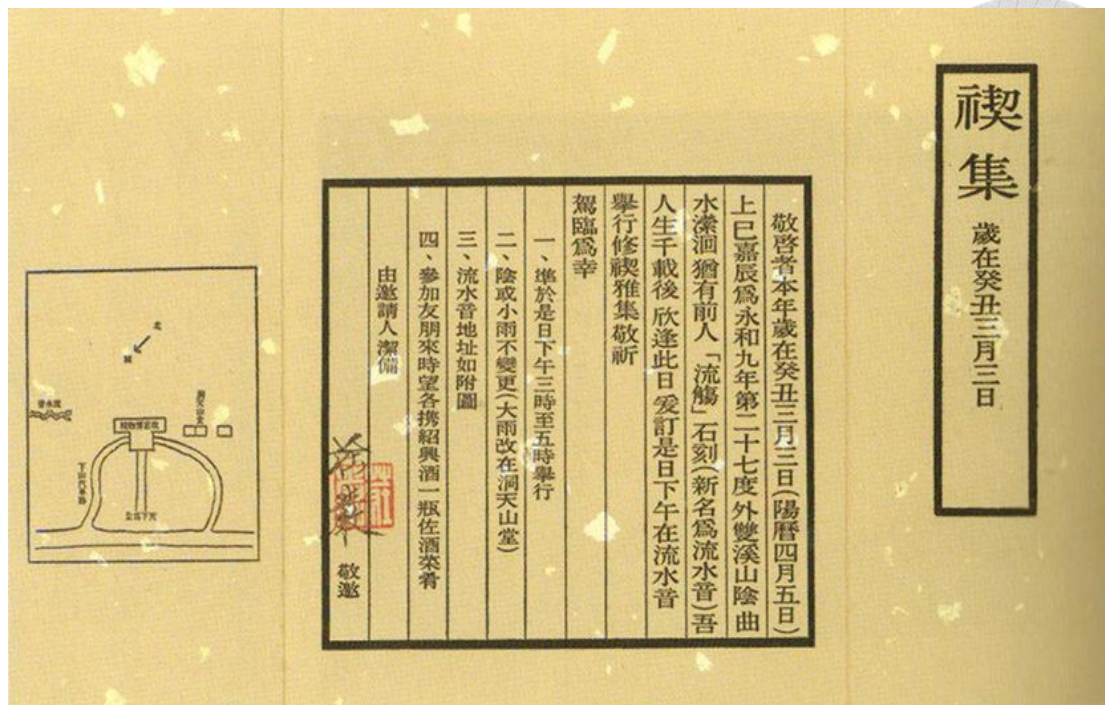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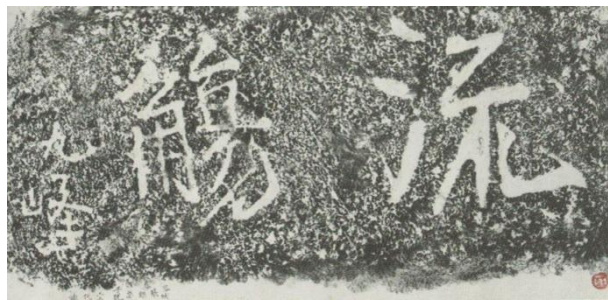


圖 VI-16 「民國第二癸丑修禊」請柬。



A



B

圖 VI-17 臺北士林外雙溪故宮附近「流觴」石刻及張銀武拓之拓本。